



# AMERICAN WAR MACHINE

Deep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 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加拿大] 彼得·戴尔·斯科特 著  
(Peter Dale Scott)  
蒋小虎 刘永贞 陈艳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AMERICAN WAR MACHINE

## Deep Politics, the CIA Global Drug Connection, and the Road to Afghanistan

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尔·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证据，揭露了在政治和国家事务中获得批准的非法暴力活动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实，尤其这些活动与美国长期参与的全球毒品走私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及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老挝、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和现在的阿富汗等国家。斯科特指出，在讨论美国干预阿富汗的活动时，应当更加关注美国情报人员和机构与全球毒品走私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国际犯罪网络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及其政策更多地是在促进而不是削减毒品贸易。所谓的反恐战争，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仅仅是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中的最新篇章。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7973-6  
定价：98.00元

# 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  
网络 and 阿富汗之路

American War Machine: Deep Politics,  
the CIA Global Drug Connection,  
and the Road to Afghanistan

[加拿大] 彼得·戴尔·斯科特 著  
(Peter Dale Scott)  
蒋小虎 刘永贞 陈艳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战争机器：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 (加) 斯科特 (Scott, P. D.) 著；蒋小虎，刘永贞，陈艳鑫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097 - 7973 - 6

I. ①美… II. ①斯… ②蒋… ③刘… ④陈… III. ①美国  
对外政策 - 研究 IV. ①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0968 号

## 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著 者 / [加] 彼得·戴尔·斯科特 (Peter Dale Scott)

译 者 / 蒋小虎 刘永贞 陈艳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丽影 王晓卿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1.75 字 数：43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73 - 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755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merican War Machine  
Deep Politics, the CIA Global Drug Connection,  
and the Road to Afghanistan

Peter Dale Scott

Copyright© 2010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

本中文版根据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年版译出。

谨以此书献给全球毒品网络的无数受害者，特别是那些因此失去生命的人。

## 致 谢

我首先要感谢主编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本书英文版列入“战争与和平图书馆”丛书出版, 马克·赛尔登担任丛书主编——译者注)。他对这本书的耐心指点和辛劳帮助超出以往我撰写的任何一本书。事实上, 这已经是马克负责为我安排的第四本著作了, 第一本是 1974 年的《重塑亚洲: 美国权力行使论文集》(*Remaking Asia: Essays on the American Uses of Power*)。不过, 马克对现在这本书一读再读, 如此细致入微, 我从最真挚的情感上已经将他尊为合著者。最令人难忘的是, 曾有无数次, 对于我绞尽脑汁想付诸笔下的思想, 他比我本人更为清楚了解。

同样还要感谢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的编辑苏桑·麦科伊森 (Susan McEachern) 和詹尼斯·布劳斯坦 (Janice Braunstein)、我的专业助理维多利亚·舒梅科 (Victoria Shoemaker) 以及索引编辑埃伦·吉勒斯 (Allan Giles)。他们与马克对我的共同帮助让原本应该荆棘遍地的撰写之路变得轻松宜行。我还要感谢曾帮助编辑及出版本书部分篇章早期版本的人: 埃里克·威尔森 (Eric Wilson)、麦可·科塞多夫斯基 (Michel Chossudovsky)、詹尼斯·马特休斯 (Janice Matthews) 和杰里米·哈蒙德 (Jeremy Hammond)。我想特别感谢艾伦·考夫曼 (Alan Kaufman) 的法律建议, 这些建议既帮助提升了本书, 也保护了本书。



撰写本书过程中，我曾向许多人学习并与他们交流本书议题。首先是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他是本书援引频率最高的权威人物。麦考伊也是本书开篇描述的帕罗奥图市离奇事件的另一位目击者。麦考伊的《海洛因政治》（*Politics of Heroin*）一书首次出版于1972年，现在已是第三版问世，对所有那些希望了解中情局和毒品走私问题的读者，此书仍旧是必读书籍。

挚友丹尼尔·埃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及其重要著作《秘密》（*Secrets*）对我的思想有着深刻影响。还有很多作者，例如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约翰·丁杰斯（John Dinges）、加雷斯·波特（Gareth Porter）以及我之前的合著者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他们的作品对于我而言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也学会了参考广大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少后来还与我私交甚好，例如鲁斯·贝克（Russ Baker）。有些则由于地理关系，一直只能是通过电子邮件彼此交流，例如杰里米·哈蒙德。

本书不少观点出乎寻常，恐怕会招致非议，因此我必须澄清，对于这些观点，以及本书可能存在的错误瑕疵，相关责任均由我一人承担。

另外，我想特别感谢那些帮助我进一步深化深度政治概念的人：R. T. 奈勒（R. T. Naylor）、已逝的佩尼·莱诺克斯（Penny Lernoux）、莱克斯·布莱德福特（Rex Bradford）、埃里克·威尔森、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理查德·法尔克（Richard Falk）、欧拉·图南德（Ole Tunander）、大卫·雷·格林芬（David Ray Griffin）和萨利·邓顿（Sally Denton）。

我已81岁，也不再期待自己未来能再度撰写一部与本书长度及难度相当的著作了。不过，看到无数年轻一辈在这些领域继续着相关研究，我备感欣慰。我相信，不论美国政府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人员对真相的探寻将永不停歇——且将硕果累累，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这是我真心为妻子洛娜·卡巴茨尼克 (Ronna Kabatznick) 献上的第六部著作。我们携手已 20 年有余, 日久弥坚, 一如年少。怀着同样的热切关爱, 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孩子们、他们的人生伴侣以及他们的爱之结晶。

第二章曾是一篇题为《毒品、准政治和墨西哥: 墨西哥联邦安全全部、毒品走私和美国》(“Drugs, Parapolitics and Mexico: The DFS, the Drug Traff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的论文, 后由埃里克·威尔森和提姆·林德塞 (Tim Lindsey) 编著的《影子政府: 准政治和犯罪主权》(*Government of the Shadows: Parapolitics and Criminal Sovereignty*) 一书收录并发表。

第七章部分内容起初以题为《深度事件和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Deep Events and the CIA’s Global Drug Connection”) 的文章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第八章内容起初以题为《真实的大棋局和战争获益者》(“The Real Grand Chessboard and the Profiteers of War”) 的文章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第九章部分内容起初以题为《“9·11”事件、深度国家暴力和因特网政治的希望》(“9/11, Deep State Violence and the Hope of Internet Politics”) 的文章于 2008 年 6 月 11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第十章部分内容起初以题为《奥巴马与阿富汗: 美国遭毒品腐蚀的战争》(“Obama and Afghanistan: America’s Drug-Corrupted War”) 的文章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彼得·戴尔·斯科特 (Peter Dale Scott)

加利福尼亚, 伯克利

2010 年 4 月 7 日

# 目 录

引 言 深度历史与全球毒品网络 .....	1
-----------------------	---

## 第一部分 概 述

第一章 经批准的暴行、统治机器和特权阶层 .....	31
----------------------------	----

## 第二部分 中央情报局与境外毒品

第二章 墨西哥、毒品、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以及美国 .....	71
第三章 行动方案：美国与泰国及缅甸的毒品走私 .....	108
第四章 回降、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和老挝： 战前准备 .....	153
第五章 老挝——一场靠毒品支撑的战争 .....	196
第六章 亚洲禁毒战争——用真实的血染红的 虚假战争 .....	217



### 第三部分 深度事件与国内毒品网络

第七章	中央情报局、全球毒品网络和恐怖主义 .....	253
第八章	战争机器内幕 暴力不绝的受益者 .....	318
第九章	“9·11”事件和操纵深度事件的美国传统 .....	353

### 第四部分 美国与今日阿富汗

第十章	奥巴马与阿富汗：美国遭毒品腐蚀的战争 .....	395
第十一章	结论：战争机器和毒品的深度政治 .....	433
结束语	.....	460
参考文献	.....	463
索引	.....	474

# 引言

## 深度历史与 全球毒品网络

### 两位调查者遭遇深度事件

如果我们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使用暴力恐吓胁迫”，那么我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在1971年9月就曾经见证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小型恐怖事件：一名家住东帕洛阿尔托（East Palo Alto）的特种部队的越南老兵，曾经在亚洲目睹中情局把鸦片装上美航公司的飞机。起初，他答应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然而，等第二天我们赶到他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示意我们噤声，然后带着我们从前门的台阶悄悄来到他的名爵跑车跟前。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有人为了警告他不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他跑车的铁门上炸了个洞。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肯定是用他曾经服役的部队所使用的一种复杂的内爆型武器炸的，也只有那种武器，才能把车门炸成那样。<sup>①</sup>

你可能认为，这么一件暴力事件肯定令人特别难忘，特别是我还曾经在电话中十分清晰地跟别人谈过这件事。然而，事实上，十多年来，我把所有关于此事的记忆都压抑在心底，甚至前两年还全

---

<sup>①</sup> 他反复强调，车门的钢板全都烧了，车内的木地板却没烧焦。



身心投入诗歌钻研，以恢复这种遭到压抑的记忆。<sup>①</sup>

而且，我怀疑阿尔弗雷德·麦考伊也跟我的情况差不多。2003年，他在那本鸿篇巨制《海洛因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oin*）的序言中，以散文的笔触写到他自己对那件事的那种怪异的压抑：

我乘坐飞机在旧金山着陆，跟诗人，伯克利教授彼得·戴尔·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稍作逗留。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前绿色贝雷帽军团的人，并和对方取得联系，那个老兵刚从老挝的秘密行动中归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中情局的飞机运送鸦片。

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表示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二天早晨，我们赶到东帕洛阿尔托，走进公寓大楼，敲响他的门。他脸色憔悴，对我们说：“我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跟我来。”他说着，带着我们穿过停车场，来到他的名爵跑车跟前。他指着副驾车门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是一种化学爆炸物在铁皮上熔出了一个洞。他说，这是在警告他闭嘴。我看了看那个洞，但是不记得看到了什么情况。第二天，我飞到洛杉矶去看望我的母亲，然后飞往西贡（Saigon），把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sup>②</sup>

时光流逝，进入另一个世纪，我开始回想这段插曲，然而事情

① 我第一次提到这段对往事的回忆是在我的诗集《来到雅加达》（*Coming to Jakart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9, 147-148）；第二次是在十年后出版的《警惕黑暗》（*Minding the Darknes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0, 138）。

②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ffic*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xii, quoting Scott, *Coming to Jakarta*, 147-148. 我想，1990年我第一次跟麦考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他只记得那个老兵带着我们下楼梯去看什么东西，至于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本身似乎没那么让人震惊了。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混乱，就连那些跟我一样的非暴力反战者都遭到了旷日持久的监控。更有甚者，在圣地亚哥，“联邦调查局告密者带领联防队砸了（一家反战出版社的）印刷机，炸毁了一位记者的汽车，还差点儿炸死一名反战人士”。<sup>①</sup>当时在芝加哥，“陆军第 113 军事情报组……提供金钱、催泪弹、马斯导弹和电子监控设备给正义军团（the Legion of Justice）的那些恶棍们，让他们对付反战团体，而芝加哥警察厅情报处（Chicago Red Squad）对他们听之任之”。<sup>②</sup>

我只能记起发生在芝加哥圣地亚哥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那些犯罪事件，那是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深度国家暴力，现在我们将之称为深度势力暴力（来自无法解释或未经批准的暴力势力）。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判断，应该存在各种各样类似的“未经国家核准而实施的”深度暴力行为。在很多案例中，非法暴力行为仅仅是某个非法设立的机构或团体下达的任务。暴力行为在不针对非国家行为体而针对其他国家的机构时，也会产生代理暴力行为。

- 
- ① David E. Kaplan, “Spying on the San Diego Street Journal (and other American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9, 2006, <http://www.todayalternativenews.com/index.php?event=link,150&values%5B0%5D=&values%5B1%5D=2668>. “在《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中，有一个年轻人叫洛威尔·伯格曼（Lowell Bergman），他是电视节目《六十分钟》的制作人，电影《惊爆内幕》（*The Insider*）中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被监视的目标。’伯格曼后来回忆说，‘1971年，我们全都离开了那里。’”
- ② George O. Toole,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Norton, 1978), 145, quoted in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69.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淹没在大规模暴力行动中，政府竟然无端求助于代理行动。正如很多被当作攻击目标的团体那样，政府也由衷地相信革命即将来临，或者说已经开始。至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两起针对非暴力反战团体的行动，应当说是过头的暴力行为，该行为希望或者其所抱的目的就是激起暴力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战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成员“气象员派”真的使用了炸弹。从反战运动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我们不得不掂量一下政府无端使用暴力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气象员派”的创立。



最终，在一些以暴力行为加强国家权力机构统治的案例中，中情局或其他官方机构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这样的暴力行为可能得到了权力机构的绝对支持。还有一些暴力行为可能是由于未能惩办凶犯而间接引发的。在美国南部，黑人聚集地一直都在滥用私刑。在美国西部，新闻媒体鼓励对本土人实施暴力行为，从而达到土地掠夺的目的，其实当地的原住民很多都是非暴力人士。<sup>①</sup> 这种容忍暴力和暗杀的文化渗透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工会的打击。在1914年的“拉德洛大屠杀”（Ludlow Massacre）中，洛克菲勒麾下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的矿工们罢工抗议，只有一名矿工被定罪，而且只受到轻微惩戒。<sup>②</sup>

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愿深思美国国内这种让人烦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麦考伊不约而同地选择把东帕洛阿尔托事件置之脑后的原因。然而，这种事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不断重复发生，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肯深思、不愿面对。

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这样描述过文明的定义：“一场伟大的共谋和有组织的背弃。”<sup>③</sup> 我的意思是说，通过人类的共谋和有组织的背弃，创造一种存在错觉的心理空间。在这个心理空间里，大家将错就错，有意将那些不愉快的事实置之脑后，比如所有的西方帝国都是通过残暴的手段建立的这一事实。<sup>④</sup> 我这么说，就像一个热切地信赖文明的人，唯恐这种极度的否认会让我们自己的文明遭受威胁。

① 那些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人都不曾想过这个大陆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Ned Blackhawk, *Violence over the Land: Indians and Empires in the Early American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② Graham Adams, *Age of Industrial Violence 1910 - 1915: The Activities and Fin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③ Scott, *Minding the Darkness*,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137.

④ 我怀疑大多数读者都会受到引诱，排斥并忘记我所讲的那个车门被炸的故事，因为有的东西跟他们自己观察到的美国“不符”。



拒绝承认美国在工作中存在的暴力势力，不肯面对暴力势力与（本应当保护美国大众的）警察系统和情报系统之间频繁的协作关系，已经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恶果。对暴力事件细节的掩盖，对于我们个体的心理健康来说，可能不无裨益，然而这种掩盖导致越来越虚妄、越来越有失偏颇的政治集体，就因为滥用暴力的重大事件全都不再被人提及。

在谈到政府批准（sanctioned）的犯罪行为和暴力事件时，我希望恢复这种被压抑的记忆的领域。然而，写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自己在帕洛阿尔托的经历和所有这种政府批准的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些事件都应当看作深度事件：被有组织地无视，被有意地压抑，被公众政府（甚至于政府内部）、军队、情报文件、主流媒体、公共意识等扭曲事实。在这些深度事件的背后牵涉到一些深度势力的频繁参与，这些势力要么与毒品交易有关，要么与那些监视机构有关，也可能与两者都有关，那些监视机构的行为极其难以识别，也根本无法用文件去记录。

被确定的“深度事件”常常同时具备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内部特征表现为从各个方面遭到压抑——比如明显可以看出是在遮掩，而外部特征则表现为对所发生的事件旷日持久、无法解决的争论不休。一些深度事件——1968年的暗杀事件、北部湾（Tonkin Gulf）事件、“9·11”事件——很明显都具备这两个特征，而有一些则不然，比如“缅因号”（USS Maine）在哈瓦那港（Havana Harbor）的沉没事件，尽管通常被说成是假标记操作事件（False-flag Operation），即“高层精英蓄意伪造的恐怖袭击事件”，但人们仍旧争论不休，持续引发各种调查。<sup>①</sup>

---

① 尽管这个主题对这本书来说太宽泛了，但我还是要提出深度事件的以下三种类型，这些深度事件可以追溯到比那些与战后全球毒品团体发生勾结的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到现在仍受到人们的热议。这三种类型有：（1）导致战争的挑衅和骗局，比如1915年远洋轮船“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的沉没，（转下页注）





根据我的经验，要理解深度事件，从总体上看比独立看更容易理解。从总体上看的时候，它们会构成一个更为庞大的模式，即深度历史。早在“9·11”事件之前，我就注意到美国有记载的历史和有档案的历史不时会因深度事件而中断，比如肯尼迪暗杀事件。而这些事件被公众归过于无足轻重、毫无威胁的小小特工，比如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译者注）。然而，历史上一系列深度事件对美国政治局势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比如达拉斯事件（Dallas）（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译者注）、水门事件和“9·11”事件。说得更确切一些，美国几次发动对外战争前都曾发生过深度事件，比如北部湾事件、“9·11”事件、2001年美国炭疽袭击事件等，我将就此观点做进一步论证。这说明，战争的背后就是华盛顿的“战争机器”（包括而限于五角大楼和中情局）。

等写完本书后面几个章节，我会针对这个观点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论述。纵观1959年以来美国几次对外战争，你会发现：（1）这些对外战争由美国战争机器率先发难。（2）它们都被粉饰成对敌方无端挑衅的正当反应，通过欺骗性深度事件反复设计遮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对外战争与全球毒品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写完这本书，我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对二战以来全球毒品网络的猖獗应当负全责。就拿阿富汗来说，自从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鸦片生产就成倍增长，这就是非常好的例证。阿富

---

（接上页注①）这一事件使得美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2）引发政策改变的阴谋，比如最高法院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1886年）的判决（被一名刚好曾经担任铁路公司总裁的法院书记官）变成了“裁定”，即企业法人是受到第14条修正案保护的人，see Thom Hartmann, *Unequal Protection: The Rise of Corporate Dominance and the Theft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Rodale Books, 2002)；（3）造成领导人更迭的阴谋，比如1850年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总统死于砒霜毒杀的事件。See Michael Parenti, *History as Myster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 Books, 1999, 304)，林肯暗杀事件或者斯迈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和1935年所谓的商业暗局。



汗在全球海洛因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对此所负的责任仅限于之前 20 世纪 40 年代和 70 年代发生在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事件。这些国家俨然蜕化成了国际毒品交易的中间人，这就是中情局庇护（后来在老挝是法国的庇护）的后果，不然那些毒贩只会止步于当地。

本书将溯及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黑暗时期，其时，中情局开始为南亚和东南亚的毒品交易大开方便之门，阿富汗的毒品交易达到高潮。写这本书让我对帕洛阿尔托事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事件所发生的时间的重要性——1971 年 9 月，正值美国和东南亚毒品交易的关系突然发生重大变化。1971 年，尼克松宣布实施反毒战争，老挝在美国大使馆的授意下，同年 9 月宣布鸦片交易非法。

在中情局庇护缅甸和老挝的毒贩军阀 20 多年之后，中情局的“老油条”们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至少对《纽约时报》那样的报纸来说是这样。<sup>①</sup> 跟我一起去帕洛阿尔托的同伴阿尔·麦考伊刚刚在华盛顿听中情局的资深探员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和卢西恩·寇内因（Lucien Conein）介绍了海洛因政治。<sup>②</sup> 不久前，我曾接触过的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建议我去研究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档案，比如鲍尔·海里威尔（Paul Helliwell）的职业生涯和中情局专属的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Sea Supply Inc）。我后来才发现，他也是中情局的资深探员。我现在怀疑（当时我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那些知情人透露给我线索恐怕也是受到指使，这本身就是一桩更大阴谋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帕洛阿尔托的另一股深层势力反对中情局泄密，于是决定出手阻止？还是说，

① E. g.,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71;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86–287.

② Among the CIA veterans interviewed by McCoy at this time were Edward Lansdale (June 17, 1971, Alexandria, Virginia), Lucien Conein (June 18, 1971, McLean, Virginia), Bernard Yoh (June 15, 1971, Washington, D. C.), and William Young (September 8 and 14, 1971, Chiangmai).

这两股势力根本就是一股，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的行为是为故意泄密的程度设限？直到现在，我都无从得知。不过，本书的写作让我更好地理解了1971年的相关历史发展（见第六章）。

在之前几个版本里，我把帕洛阿尔托事件和后面将要探讨的勒特里尔（Letelier）暗杀事件这些已经遭到惩处的暴力行为归因于中情局与全球毒品网络之间的狼狈为奸，但并未解开其中的奥秘，仅仅是让大家打开了眼界。从文字描述来看，这比我在之前的书中所用的术语更确切，之前的术语有：出现准政治事件的“黑暗象限”或“在全球活动的未知势力X”，我认为该势力可能有助于解释“9·11”事件。<sup>①</sup>这种精确描述对读者产生了误导。在本书中，我会真正尝试去解读、去描述这种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深层势力。

这个谜就是诸多事物的基础，比如威利斯·伯德（Willis Bird）和鲍尔·海里威尔（Paul Helliwell）这些人的职业生涯，又比如跟中情局和国际毒品贸易勾结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这种机构的事业发展。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战争机器这一被忽视的方面，我们将永远都无法挖出致使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屡遭挫折的背后势力。

## 毒品、国家和勒特里尔暗杀事件

1976年，智利前外交家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在华盛顿大街上遭到暗杀，这一事件暴露了暴力势力的存在（或者也可以将之称为神秘深层势力）。这就是一桩秘密安排的“深度事件”，事件的核心毫无疑问从最初就没有被披露，而主流媒体又没

<sup>①</sup> Peter Dale Scott, *Crime and Cover-Up: The CIA, the Mafia, and the Dallas Watergate Connection* (Palo Alto, CA: Ramparts Press, 1977), 46-49;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79.



能坦率地对该事件展开探讨，研究这一事件的几位学者反而被贴上了可笑的标签——“阴谋论者”。

20多年后，关于勒特里尔暗杀事件的基本事实终于渐渐浮出水面，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议了：智利情报机构 DINA 下达了对他的暗杀令，在超国别合作暗杀组织——“飞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的协助下将他杀害。中情局就是“飞鹰计划”的组创者之一。<sup>①</sup> 在本书中，我们将更认真地研究“飞鹰计划”，以及这个组织与毒品之间的关系。要特别注意的是，DINA、“飞鹰计划”和那个涉嫌暗杀勒特里尔的古巴籍美国人都都与毒品交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次暗杀，不仅有智利方面的因素，<sup>②</sup> 也有美国方面的因素。在谋杀案发生前不久，国务院本来要对拉丁美洲“飞鹰计划”发出紧急警告，让其不要参与暗杀事件，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阻止了国务院的警告。<sup>③</sup> 勒特里尔遇刺后两天，中情局局长乔治·H. W. 布什收到一份备忘录，里面详细报告了他们的推测（现在已经证明该推测确实就是事实）：“智利政府如果没有直接下达刺杀勒特里尔的命令，它很可能雇用了【迈阿密】古巴恶棍干掉了他。”<sup>④</sup> 在暗杀事件发生后几个星期，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还言之凿凿地说，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已经排除了勒特里尔先生被智利军事团

① J. Patrice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Operation Condor and Covert War in Latin America* (Lanham, M. 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42, 71.

② 娜奥米·克莱恩在她相当圆滑的分析中，过于简单地把这场谋杀称为“皮诺曹自从其变化以来最令人震惊、最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Henry Holt, 2007), 99.

③ Peter Kornbluh, “Kissinger Blocked Demarche on International Assassinations to Condor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April 10, 2010,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312/index.htm>.

④ Peter Dale Scott, “Miami-Dade Reversal-A Cuban Terrorist Payback to Bush Family?” *Pacific News Service*, December 7, 2000.



体所派出的特工暗杀身亡的可能性”。<sup>①</sup> 联邦调查局为了了解中情局在勒特里尔谋杀案中所调查到的情况，去找布什要相关资料，当时中情局档案中已经有对 DINA 不利的证据，然而布什并没有将这些档案交出来，这让他存在妨碍司法的嫌疑。<sup>②</sup>

从这点上来说，我完全同意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的看法，中情局与 DINA 和“飞鹰计划”的恐怖主义狼狈为奸。

美国当局不肯调查勒特里尔暗杀事件和 DINA 之间的联系，这说明华盛顿和智利暗中勾结，狼狈为奸。“飞鹰计划”事实上成了一个恐怖分子网络……通过在智利的行动，中情局成了推动恐惧的罪恶之手……特别是有证据显示，勒特里尔暗杀事件的发生本来是可以阻止的。<sup>③</sup>

就连对勒特里尔暗杀事件最贴切的解释都常常忽视了毒品在这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1976.

② Joseph J.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81.

③ John Prados, *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424. 高级研究员肯尼斯·麦克斯韦尔（Kenneth Maxwell）在2004年为外交关系委员会写的《外交事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写道：“欧洲‘飞鹰组织’针对其他敌对阵营人士策划的暗杀事件之所以得到了制止，是因为美国提前将消息泄露给了对方（法国和葡萄牙）政府”。David Maxwell, review of Peter Kornbluh, *T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Fleeing the Chilean Coup,”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40101faresponse83116/william-d-rogers-kenneth-maxwell/fleeing-the-chilean-coup-the-debate-over-u-s-complicity.html>. 麦克斯韦尔只是将约翰·丁格斯（John Dinges）和彼得·考恩布鲁之前所提出的详细论据简单地进行了概括。然而，不管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本身，还是其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都不约而同地在今天受到扭曲的政治范围中和稀泥，他们允许基辛格的助手威廉·D·罗杰斯（William D. Rogers）公开这一措辞强烈的否定说法，却拒绝让麦克斯韦尔将他的指控记入档案。麦克斯韦尔最后终于退休了。



一事件中的影响。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古巴民族主义运动的资金来源于 DINA 所组织的毒品交易，<sup>①</sup> 而刺杀勒特里尔的古巴人就来自该组织。美国政府竟然对发生在自己首都、由毒品交易出资支持的暗杀事件百般遮掩，对于这一事实，我也不断地抑制自己的意识，尽管我曾经两次写到此事。这再次说明，更多的事实轻而易举地受到了抑制，也就是说，在与中情局相关的暗杀事件中，毒品交易牵涉其中，这一点为人们所忽视。

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之一，正是美国与全球毒品网络牵扯不清的暧昧关系，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模式，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续下去。我将会在下一章里阐明，这并非独立行为，并非存在于美国社会政治的基本框架之外，而是更庞大的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这是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为目的的。

### 深度事件和非法核准的暴力

我之所以把勒特里尔谋杀案称为“深度事件”，是因为该事件还未暴露，其背后庇护它的隐蔽势力就将其遮掩了起来，没有遭到美国主流媒体曝光。另外，该事件背后的几股势力和秘密情报组织之间的关系错综交织、纠缠不清，通过正常的法律执行程序根本就无法迅速解决，这就是核准暴力。我并不是指该事件事先得到了美国的批准（对这一点我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而是指行凶者在所有的阶段都得到了更高权力机构的庇护。

许多美国人都隐隐约约意识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曾牵涉许多类似的深度事件。其中一些事件对随后而至的美国政治改革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其中包括针对约翰·F. 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谋杀案。我在《通向“9·11”之路》

<sup>①</sup>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The CIA, Drugs, and Armies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30-31, 33.



(*the Road to 9/11*) 一书中曾说过, 我们应当把“9·11”袭击事件看作一个深度事件, 这是我们国家深度历史中的一个章节。

非法核准且受到保护的暴力问题, 也就是通常在我们的意识中受到压抑的暴力行为, 并不一定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跟国家有关。最近, 意大利一名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 (Robert Calvi) 遭到暗杀, 该事件与梵蒂冈银行丑闻有关, 据说就连约翰·保罗二世教皇 (Pope John Paul II) 被杀也跟这一丑闻有关。我们并不知道有哪个国家参与其中, 不过, 只要有掩饰的地方——就如在卡尔维案件中那样——行凶者就会因国家关系而获益。<sup>①</sup>

在美国内部, 中情局和核准暴力势力之间牵扯不清的关系和美国商业不时求助于有组织的暴力势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 19 世纪暴徒参与水果公司的运作以及此后不久对报纸发行量的控制, 到安德鲁·卡耐基 (Andrew Carnegie) 和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用暴徒镇压工会, 再到运输业、服装业、旅馆和娱乐业工会被腐败接管, 也许还包括汽车工业联合会首领沃尔特·鲁瑟 (Walter Reuther) 在飞机失事中丧生的事件,<sup>②</sup>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有钱人或所谓的上流社会确实有理由对暴徒暴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这种行为从来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从最低程度上来说, 他们看到诸如芝加哥或新奥尔良等城市的当地法律执行力度被暴徒的行为削弱, 也不会不乐见其成。他们自己也常常会在当地或国家层次上求助于这一手段, 以影响腐败的立法者

① Robert Hutchison, *Their Kingdom Com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pus Dei* (New York: St. Martin's/Griffin, 2006), 262 - 265; David Yallop, *In God's Nam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urder of Pope John Paul II*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7).

② Scott, *Deep Politics*, 99 - 106 (banana companies), 154 - 159 (newspaper circulation wars); Thomas Repetto, *American Mafia: A History of Its Rise to P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2004), 206 - 210 (Henry Ford), 198 - 206 (entertainment).



们。有时候，这些立法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会求助于暴徒实施暴力，在“香蕉共和国”（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译者注），他们甚少受到惩罚，而在本国，也是偶尔才会受到惩罚。

这段历史一直都没有如实写进历史书。然而，有组织的犯罪在腐败的政界和政治家中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样，他们也会服务于商业目的。当中情局征用暴徒，比如约翰·罗塞利（John Roselli）、山姆·詹卡纳（Sam Giancana）和桑托斯·特拉菲肯特（Santos Trafficante）去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时候，这些商人也在借助于这种势力。<sup>①</sup> 美国和国外电力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早在之前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和毒品交易势力之间纠缠不清，他们这么做，等同于和毒品交易建立了联系。典型案例之一，就是哈瓦那赛马场的租赁事件，1937年，花旗银行将其租给了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sup>②</sup>

我从这些商业案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研究暴力政治时，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待未知势力或深层次势力的模板，这个模板包含了官僚机构、情报机关、工商企业乃至媒体。毒品交易本身就是这个宽泛的模板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深度历史当中的循环因素。为毒品交易洗钱的、为了私人需求而雇用罪犯的，正是上流社会。许多普通大众，特别是在大都市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控制大都源于对毒贩的负债，而不是对国家的负债。他们知道，偷税、漏税会被罚款，甚至要坐牢，可是如果谁胆敢欠毒贩的钱，那就会导致身边的亲人朋友惨遭杀害，特别是他们深爱的人。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这样描述成功的现代国家的：

① Thomas Repetto, *Bringing Down the Mob*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78–81.

② Peter Dal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279, citing Hank Messick, *Lansky* (New York: Putnam's 1971), 89. Cf. Shanghai Power Company (American and Foreign Power) and Tu-Yueh Sheng of the Chinese Green Gang (Scott, *Coming to Jakarta*, 95–96).





“成功维持在执行其指令时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sup>①</sup> 许多政治学者都认同这一点，而根据这一缥缈虚幻的理想，最近很多国家都被判定为软弱的国家（如果该垄断权受到挑战）或失败的国家（如果未能维持该垄断权）。

而我认为，韦伯的定义错误地赋予国家一种结构上的凝聚力，事实上，国家并没有也从来不曾在结构上拥有这一特性，随着民主的发展，国家的凝聚力越来越小。即便是在较为成功的美国，也都一直存在一个“消极空间”，上流社会、企业势力和私人组织的暴力势力都可以乘虚而入，相互利用，制定规则的不是国家，而是这些势力。

或许，这样的非国家规则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以后的芝加哥市。1962年的谋杀案发生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亲自下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随后对案件定罪。这是芝加哥自从1934年以来有组织的谋杀案第一次得以定罪——长达30年里，这里曾发生过上千起谋杀案都悬而未决。<sup>②</sup> 几桩全国范围内的大案得以“合法化”，他们的好运气源自芝加哥暴徒把持权力时的腐败，暴徒对芝加哥市政厅的掌控引发了选择性施政的风气，与其关系最紧密的资本家借此机会大发横财。

1947年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项举措就是“在阿塞克斯基金洗钱1000万美元，用以影响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sup>③</sup> 1948年，随着政策协调处（OPC）的成立，对犯罪行为使用未入账的资金形成了一种机制。该协调处的职责就是“颠覆敌对国家”。<sup>④</sup>

①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154.

② Ovid Demaris, *Captive City*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0), 34 - 35.

③ Amy B. Zegart, *Flawed by Desig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A, JCS, and NS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9, citing Christopher Andrew, *For the President's Eyes Onl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172.

④ Thomas Etzold and John Gaddi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5.



1952年，该协调处并入中情局行政处，所以它们早就形成了无视他国法律行事的习惯。根据国会议员的研究，“保守估计，（按照外国的法律）每天都有秘密行动的官员在进行严重违法行为，一天至少几百次（每年随随便便都有10万次）。这不仅会让美国在政治上陷入尴尬境地，还将参与国的自由甚至人民的生命陷入危险境地，更严重的是，这也让那些官员自己身陷险境”。<sup>①</sup>

在抵御西欧各国被共产主义或苏联同化的行动中，政策协调处甚至将欧洲的毒贩列入结盟名单，而在东南亚，它们就不只是跟毒贩们结盟了。这个机构为毒贩提供武器装备，协助他们建立并控制国际鸦片和海洛因贸易。我们应当看到，政策协调处这么做的目的已经不只是（像在欧洲那样）单纯的防御了。由于缺乏可靠的盟友，政策协调处利用毒品交易的资金帮助建立攻击性的反共军队，该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1959年爆发的印度支那战争负有责任。我们今天仍然在跟当初政策协调处资助的毒品贸易商们做交易，只不过现在这股势力已经从东南亚转移到阿富汗。本书将会详细说明美国在亚洲是如何利用这些毒贩让美国在欧洲的传统防御工事在亚洲摇身变成攻击性战争机器的。<sup>②</sup> 1952年政策协调处并入美国官僚机构，亦与此有关。

政策协调处刚成立的时候，完全由华尔街上流社会的纽约名人控制，比如它的处长就是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不管是国家还是国家与深度势力之间的关系，都经历了相当可观的演变。特别是中情局，它已经有些官僚化，处于国会的官僚主义监管下。此后又创立了一些新的机构，以逃避对

① U. S. Congres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IC 21: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205. 约翰·凯利 (John Kelly) 曾引用其说法：“犯罪与沉默：中央情报局的犯罪行为与媒体的三缄其口。” Kristina Borjesson, *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2), 311.

② 政策协调处在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想要扭转局面的努力没有得到有效支持，最后以失败告终。



国会负责的职责。

最确凿的例证莫过于1980年创立的五角大楼下辖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它扮演着相似的角色。比如在伊朗，该作战司令部至少跟两个涉嫌毒品交易的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sup>①</sup>

今天，或许最声名狼藉的、最不负责任的深度势力（它们也是最厉害的深度势力）莫过于黑水公司，现在，该公司已经正式更名为Xe服务公司。<sup>②</sup>《民族报》报道称，中情局局长里昂·帕内塔（Leon Panetta）2009年6月宣布取消中情局刺杀指令后，黑水公司继续执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刺杀计划，实施刺杀行动。

《民族报》调查发现，<sup>③</sup>在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前线工作秘密基地——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Karachi），黑水公司的精英们聚集一堂，根据一项秘密指令，他们计划暗杀可疑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间谍，“突袭抓获”价值很高的目标人物，在巴基斯坦内外从事其他敏感行动。

我们稍后再讨论黑水公司的问题，现在我想要指出的一点是，

- 
- ① Seymour M. Hersh, "Preparing the Battlefield," *New Yorker*, July 7, 2008,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7/07/080707fa\\_fact\\_hersh](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7/07/080707fa_fact_hersh); Syed Saleem Shahzad, "Where Pakistan's Militants Go to Ground," *Asia Times*, October 23, 2009,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J23Df03.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J23Df03.html). 赫什写道，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利用少数民族破坏伊朗的决策有缺陷”，在后面几章当中，我会批判中央情报局利用老挝的赫蒙族和阿富汗的塔吉克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参与了对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追捕行动，在哥伦比亚卡利派毒品垄断组织协助下成功将其抓捕。
- ② Adam Ciralsky, "Tycoon, Contractor, Soldier, Spy," *Vanity Fair*, January 2010, <http://www.vanityfair.com/politics/features/2010/01/blackwater-201001>.
- ③ Jeremy Seahill, "The Secret US War in Pakistan," *The Nation*,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91207/seahill>.



相对于1948年政策协调处成立时的那些有钱人，黑水公司大佬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的背景有多么的自相矛盾。他来自美国中西部，是新富资本家，他的大笔财富都源自他跟战争机器的合作，其实，他本人也是这个机器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父亲埃德加·普林斯（Edgar Prince）是达拉斯国家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的领袖之一（他妈妈是该委员会的会长）。该委员会是一个极右民族主义组织，它的成立显然就是为了对抗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主义者。

从政策协调处到黑水公司，这一转变集中体现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转变：经济上从以民用为基础转变成以战争为基础，政治上从国际主义转变为民族主义，而军事上也由修建防御工事变成了建设进攻工事。显而易见，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源就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麻烦不断的政治形势，其结果就是战争机器被越战无限扩大。

“飞鹰计划”是20世纪70年代那段麻烦不断的历史组成部分。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由中情局出资建立，在刺杀勒特里的行动中，甚至可以将手伸进美国心脏——华盛顿内部。

## 创建伊斯兰国际军队：凯西、国际商业 信贷银行以及基地组织的创立

中情局之所以变成暴力的前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中情局推进他个人的阿富汗计划。凯西的阿富汗计划引起了包括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尹曼（Bobby Ray Inman）和约翰·麦克马洪（John McMahon）在内的一群特工专家和分析家们的担忧。<sup>①</sup> 然

<sup>①</sup>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Penguin, 2004), 90; cf. Prados, *Safe for Democracy*, 489.



而，他们的担忧无法阻止凯西的一意孤行，他在与外国人秘密会晤时，做出了通过非正常渠道发动阿富汗运动的高层决定。

在这种模式下，凯西与之交易的人当中，就有阿迦·哈桑·阿贝迪（Agha Hasan Abedi）。这个人是巴基斯坦齐亚将军（General Zia）的亲密顾问，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的创始人。

阿贝迪协助安排凯西在伊斯兰堡的行程，并在参观华盛顿期间与这位中情局局长会晤。一般来说，阿贝迪待在酒店，凯西前去见他。三年当中，他们两人时不时见面，谈论阿富汗战争、伊朗门事件、巴基斯坦政治问题和波斯湾的形势，一聊就是大半天。<sup>①</sup>

中情局后来报告说，它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两人会晤的记录。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职员调查了两人的关系后说，凯西是以里根总统顾问的身份跟阿贝迪达成交易的，而不是中情局局长的身份，所以他的行为“未列入档案，完全可以否认，无法有效复原”。<sup>②</sup> [凯西跟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之间的交易水很深。据称，阿富汗的军售运输渠道牵涉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阿曼的分行，而凯西的密友兼生意合作伙伴布鲁斯·拉帕波特（Bruce Rappaport）与那家银行有经济利益关系。<sup>③</sup>]

① Peter Truell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133.

②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33.

③ U. S. Congress, Senate, *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Senator John Kerry, Chairman, and from Senator Hank Brown, Ranking Member,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Narcotic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December 1992, 102nd Cong., 2nd sess., Senate Report No. 102 - 140, "BCCI, the CIA,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320, [http://www.fas.org/irp/congress/1992\\_rpt/bcci/1\\_lintel.htm](http://www.fas.org/irp/congress/1992_rpt/bcci/1_lintel.htm); Alan A. Block and Constance A. Weaver, (转下页注)



毫无疑问，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为凯西提供了机会，让他可以进行不计入档案的行动，比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牵涉很深的伊朗门事件。不过，迄今为止，这些行动当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支持阿富汗圣战组织抵抗苏联入侵者的行动，在这一事件中，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也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阿贝迪的安排下）凯西在巴基斯坦与齐亚将军、<sup>①</sup>沙特情报头子卡马尔·阿德海姆（Kamal Adham）以及费萨尔亲王（Prince Turki al-Faisal）（这两人都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股东）频繁会晤。根据这次秘密会议达成的协议，费萨尔亲王向阿富汗的游击队赞助了10亿美元的现金，中情局随之向其斥资10亿美元。“沙特人提供资金后，政府就可以绕开国会。”<sup>②</sup>当时，“国际商业信贷银行通过它在巴基斯坦的支行将资金划拨过去，同时，它又是战争物资乃至圣战组织驮兽的收款代理行”。<sup>③</sup>

得到中情局金钱赞助相当容易。美元钞票成麻袋成麻袋地空投到巴基斯坦境内，交给三军情报局的局长阿赫塔尔·阿布拉杜·拉曼（Akhtar Abdur Rahman）中将。拉曼把钱存进由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巴基斯坦控制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阿曼银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占该银行1/3的股份）共同运作的三军情报局的户头。<sup>④</sup>

然而，斯蒂夫·科尔（Steve Coll）在《鬼魅战争》里描述中

---

（接上页注③）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Global Ban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27 - 33, 83 - 85;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3, 1991; Scott, *The Road to 9/11*, 95, 108, 325.

① 1978年，当美国因巴基斯坦核武计划而终止对巴的经济援助时，阿贝迪营救齐亚用的就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紧急贷款（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80 - 81）。

②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53.

③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33.

④ Adrian Levy and Catherine Scott-Clark, *Deception: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ret Trade in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Walker and Co., 2007), 125.



情局在阿富汗作战历史对这件事只字未提，同样，在他另一部作品《本·拉登家族》（*The Bin Ladens*）中也对此事只字未提，尽管如此，他还是描述了费萨尔亲王是如何安排“将政府资金转入巴基斯坦”的。<sup>①</sup>

凯西跟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之间的暧昧关系不仅仅是跟一家普通银行之间的秘密交易；这家银行被指控犯罪，而且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这家银行甚至受到自己会员的指控，具体内容如下。

说它涉嫌在全世界范围内运输毒品、走私黄金、偷窃军事机密、暗杀、行贿、敲诈勒索、隐瞒情报、贩卖军火等犯罪行为。而这些是银行间谍、准军事单位、特工以及那些负责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全球最黑暗的交易的卡拉奇骨干的领域。<sup>②</sup>

凯西擅自决定跟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合作，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持久的历史影响。第一，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毒品客户，在齐亚将军的庇护下，在影响阿富汗在全世界海洛因交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sup>③</sup> 20世纪80年代，这些客户相继浮现，显然其中就有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 
- ① Steve Coll, *The Bin Ladens: An Arabian Family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Penguin, 2008), 249.
- ② Jonathan Beaty and S. C. Gwynne, *The Outlaw Bank: A Wild Ride into the Secret Heart of BCC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66. Abid Ullam Jan, *From BCCI to ISI: The Saga of Entrapment Continues* (Ottawa: Pragmatic Publications, 2006).
- ③ Beaty and Gwynne, *The Outlaw Bank*, 48–50;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79–480. 法尔兹·哈克（Fazle Haq）是巴基斯坦西北前沿省的省长；同时，他又是中央情报局的重要联络员，还是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者，而有些圣战者主要是通过经由西北前沿省交易鸦片和海洛因获取经费，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到了1982年，法尔兹·哈克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国际毒贩的名单。然而，跟法尔兹·哈克的儿子进行漫长的通信交流之后，我终于相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法尔兹·哈克在毒品交易中曾经获得私利。See “Clarification from Peter Dale Scott re Fazle Haq,” 911Truth.org, <http://www.911truth.org/article.php?story=20090223165146219>.



Hekmatyar)。据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麦考伊透露：“其在促进巴基斯坦贩毒运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989年贩毒获利高达40亿美元，甚至超过该国合法出口的全部收入。”<sup>①</sup>

第二，中央情报局很多打算供给阿富汗圣战组织的基金都被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吸收，转而流向研究工作实验室（KRL），供他们研制原子弹。“尽管欧洲情报界一再警告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基金会和研究工作实验室的欺骗性行为，里根政府却一再否认问题的存在”。<sup>②</sup> 实验室主任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将核技术秘密扩散到朝鲜、伊朗和利比亚”。<sup>③</sup> 2008年，据称，瑞士政府通过其网络成员的电脑破获了核弹图纸和关于如何制造弹头用的军用铀的说明书，不过调查人员担心这些东西仍旧在国际黑市上流转。<sup>④</sup>

第三，在凯西的协助下，阿富汗建立了所谓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外国志愿军，就连中央情报局兰勒（Langley）等人也都认为“这一做法极不明智”。<sup>⑤</sup> 就是这个外国组织，在1988年更名为“基地”组织。<sup>⑥</sup>

这就是出于微不足道的权谋而进行的考虑欠妥的秘密行动所引发的种种恶果。

① M. Emdad-ul Haq, *Drugs in South Asia: From the Opium Trade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algrave, 2000), 204–205, quoted in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80.

② Levy and Scott-Clark, *Deception*, 128.

③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07, B01.

④ *Guardian*, May 31, 2008,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y/31/nuclear.internationalcrime>. 根据大卫·奥尔布赖特（David Albright）的说法，联合国驻华盛顿武器前核查人员、网络成员厄斯·提纳（Urs Tinner）在1999～2000年曾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在中央情报局的员工名册中，工资非常高”。

⑤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C. 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9 (Casey); Prados, *Safe for Democracy*, 489 (Langley).

⑥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2006), 131–134.





## 美国对全世界海洛因泛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我竟然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的事实，从正常的观念来看，这一事实极其怪诞，以至于我自己都很难相信，那就是美国隐秘的外交政策竟然是造成当今世界毒品泛滥的最大原因。中央情报局对金三角和金新月这两个地区的毒品中间人的支持，实在发人深省。2003年，据联合国记载，这两个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占全球非法鸦片种植面积的91%，鸦片产量占全球预计鸦片产量的95%。（再加上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四个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是全球鸦片种植面积的96.6%，预计产量占97.8%。而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中央情报局也曾经跟毒贩相互勾结。<sup>①</sup>）

虽然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为并非造成鸦片和海洛因泛滥的唯一原因，但是中央情报局对鸦片贸易行业实质性的庇护，显然是造成当今全球灾难的主要历史原因。

中央情报局的航空公司——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AT）于20世纪50年代在缅甸开始秘密飞行，当时，该地区的鸦片年产量仅为80吨。十年时间，该地区鸦片产量竟然增长了四倍，越南战争期间，金三角的鸦片年产量甚至达到1200吨。1971年，在该地区至少有七个海洛因实验所，其中一个距离中央情报局在老挝会晒（Ban Houei Sai）的基地非常近，每年海洛因产量达3.6吨。<sup>②</sup>

①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World Drug Report, 2004*, [http://www.unodc.org/pdf/WDR\\_2004/Chap3\\_opium.pdf](http://www.unodc.org/pdf/WDR_2004/Chap3_opium.pdf).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2, 191, 286 - 287. 对于国民党对扩大生产的影响力，麦考伊的估计极其保守。缅甸掸邦最权威人士贝蒂尔·林纳特（Bertil Lintner）说：“独立时（1945年）的年产量仅为30吨，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竟然飙升至600吨。” Bertil Lintner, “Heroin and Highland Insurgency,” in Alfred W. McCoy and Alan A. Block, *War on Drugs: Studies in the Failure of U. S. Narcotics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288. 此外，国民党对掸邦的剥削导致成千上万的山区部落流入泰国北部，鸦片产量也随之上升。



阿富汗鸦片产量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情报活动反应极其灵敏，美国从1980年开始支持毒贩圣战者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当年，该地区鸦片产量仅为200吨，然而到了1991年，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决定终止双方对其进行援助的时候，该地区的鸦片产量已经飙升到了1980吨。<sup>①</sup>从1979年开始，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首次打进国际市场，到1980年，美国消耗的鸦片和海洛因从0%直接飙升到60%。<sup>②</sup>而巴基斯坦1979年基本上没有吸毒者，到了1992年，吸毒者剧增至80万人<sup>③</sup>。

2000~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控制区内基本上消除了鸦片种植，因而2001年鸦片总产量仅为185吨，而且基本上都来自毒贩组织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控制的东北角，美国入侵后，成了该组织的盟友。2001年，美国入侵，毒品产量一度飙升，一半原因就是美国征用当地毒贩，作为支持自己作战的资金来源。2002年，该地区鸦片产量高达3400吨，此后稳步攀升，“直到2007年，阿富汗鸦片产量高达8200吨（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34%），变成全球最致命的毒品独家供应商（占全球鸦片制剂市场的93%）”。<sup>④</sup>

显而易见，美国的秘密外交政策是导致今天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并不代表美国能够控制自己所造成的现状。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一位专家在写到1979~1980年美国介入阿富汗事件时所说的那样：“毒品控制显然只能服从于战略目标。”<sup>⑤</sup>国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现状，而且似乎也不打算

① State Customs Committee of Azerbaijan, “Opium Production in Afghanistan (1980 - 2005),” <http://www.az-customs.net/en/hq15.htm>.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64.

③ Beaty and Gwynne, *The Outlaw Bank*, 295.

④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07,” August 2007,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4099/afghanistan\\_opium\\_survey\\_2007.html](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4099/afghanistan_opium_survey_2007.html).

⑤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 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33.



这么快就采取措施。

中央情报局不仅要对全球毒品产量的增长负责，还要对毒品走私到美国负责。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司法部就论证了这一事实。1997 年 3 月，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海地警察局长米歇尔·约瑟夫·弗朗索瓦斯（Michel-Joseph Francois）就被指控曾在迈阿密协助毒贩将 33 吨哥伦比亚可卡因和海洛因走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创建的海地国家情报服务处（SIN）也因为该指控成为司法部的调查目标。<sup>①</sup>

几个月前，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创建了一家禁毒机构，该机构的头目雷蒙·纪伦·达维拉（Ramon Guillen Davila）将军也曾被指控将可卡因走私到美国。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央情报局无视缉毒局反对，批准至少一吨纯可卡因进入迈阿密国际机场，以作为收集关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情报的途径。”《泰晤士报》报道称，先是“总计约 2000 磅的货，后来还有一批 998 磅的货”。<sup>②</sup> 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确认：“中央情报局国民警卫队通过秘密行动很快找到了这批从哥伦比亚走私到委内瑞拉的可卡因，其重量超过了一吨半。”<sup>③</sup>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纪伦将军走私的毒品可能超过了 22 吨。<sup>④</sup>

①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8, 1997, A10. 据称，弗朗索瓦（Francois）利用一批为钱卖命的毒贩控制了海地首都太子港。

② *Time*, November 29, 1993,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79669,00.html>. “运输还在继续，直到纪伦试图一次性运送 3.3 万磅海洛因为止。密切关注此事的美国缉毒局阻止了这次规模庞大的贩毒行动，并给予重击。” Cf.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96 (“one ton”).

③ CBS News Transcripts, *60 Minutes*, November 21, 1993.

④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2, 1996. 早在遭到起诉前几年，纪伦·达维拉和弗朗索瓦斯的贩毒行为就在美国媒体曝光。要不是加利·韦伯（Gary Webb）在 1996 年 8 月份的《圣荷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上刊载的反可卡因故事，可能这两个人和阿曼还会像中央情报局全球毒品集团的其他精英那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至于其他精英人物，比如墨西哥的米格尔·纳萨尔·哈罗（Miguel Nassar Haro），后面我们会继续探讨。



然而，美国从来没有提出过将纪伦从委内瑞拉引渡到美国受审，2007年，他在委内瑞拉因密谋暗杀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而遭到逮捕的时候，他受到指控的消息在迈阿密依然遭到封锁。<sup>①</sup>当时，缉毒局局长邦纳（Bonner）认为中央情报局官员马克·麦克法林（Mark McFarlin）也应该受到起诉，可是他根本未受到任何指控，就平平安安地退休了。<sup>②</sup>

弗朗索瓦斯和纪伦都是中央情报局庇护的美国南部边境贩毒情报网当中盘根错节的网络的一部分而已，这些情报网包括秘鲁沃兰迪米洛·蒙特西诺斯（Vladimiro Montesinos）的国家情报服务处（SIN）、巴拿马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G-2体系、洪都拉斯列奥尼达斯·阿里亚斯·托雷斯（Leonidas Torres Arias）的G-2体系，甚至可能还包括墨西哥的米格尔·纳扎尔·哈罗（Miguel Nazar Haro）和费尔南多·古铁雷斯·巴里奥斯（Fernando Gutierrez Barrios）的墨西哥联邦安全部。<sup>③</sup>

然而，纪伦的案子不论在规模还是影响上，都远远超出了上述那些案子的影响，因为在此案中，前缉毒局局长罗伯特·邦纳（Robert Bonner）用60分钟阐述了中央情报局显然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

【麦克】华莱士【画外音】：直到上个月为止，罗伯特·邦纳法官还是缉毒局局长。邦纳法官告诉我们，缉毒局局长有权批准本国任何非法麻醉剂的运输，比如可卡因，即便是中央

① Chris Carlson, "Is the CIA Trying to Kill Venezuela's Hugo Chávez?" *Global Research*, April 19, 2007.

②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R: TrineDay, 2009), 400; *Time*, November 23, 1993. 麦克法林（McFarlin）与20世纪80年代在萨尔瓦多和反游击队力量合作。中央情报局驻委内瑞拉的一把手吉姆·坎贝尔（Jim Campbell）也退休了。

③ Peter Dale Scott, "Washington and the Politics of Drugs," *Variant* 2, No. 11 (Summer 2000): 3-6;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vii-xiv.



情报局携带入境的。

邦纳法官：这么说吧，麦克。未经缉毒局或者美国相关执法机关批准运输非法麻醉剂就是非法的，我们称为贩毒，也就是毒品走私。

华莱士：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中央情报局违反了法律，就是这么简单。

邦纳法官：我认为，除此之外，别无合理解释，中央情报局至少对此给予了批准或默许。

（华莱士和邦纳的对话片段；中央情报局盖章密封）

华莱士：（画外音）邦纳法官说，经过缉毒局职业责任办公室两年的秘密调查，在中央情报局检察长的配合下，得出上述结论。<sup>①</sup>

《泰晤士报》报道称，“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委内瑞拉将军的特工赢得哥伦比亚毒枭们的信任”，特别是麦德林（Medellin）贩毒集团的信任。<sup>②</sup>然而，为大量运输提供便利让中央情报局变成了哥伦比亚吸毒场所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见，20世纪50年代，它变成缅甸—老挝—泰国吸毒场所的组成部分。）我在《毒品、石油和战争》（*Drugs, Oil and War*）中提到了这点。

中央情报局可以指出（也确实指出了）他们在抓捕或消灭很多哥伦比亚大毒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是他们的抓捕并没有减缓可卡因流入美国的势头，2000年，流入美国的可卡因反而达到新高。然而，这让执法集团和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成为惯例，这显然让城市犯罪集团的暴力犯罪更加恶化。

① CBS, *60 Minutes*, November 21, 1993. Cf.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400.

② 当时，中央情报局正在密谋利用贩毒敢死队的头目卡洛斯·卡斯塔诺（Carlos Castano）击溃麦德林派毒品垄断组织的头目巴勃罗·伊斯坎大（Pablo Escandar），而卡洛斯·卡斯塔诺为卡利派毒品垄断组织效力，（Scott, *Drugs, Oil, and War*, 88）。



很多像“哥伦比亚计划”这样的战役，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不切实际地想要彻底消除毒品，而是要改变市场份额比例：确定特定敌人，然后确保毒品交易处于那些毒贩——哥伦比亚国家安全机构的盟友和/或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下。这进一步印证了参议院调查员杰克·布鲁姆（Jack Brum）的判断：十年前，他曾断定，美国并不是在跟毒品犯罪做斗争，而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变成这种犯罪行为的一部分”。<sup>①</sup>

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早在20年前就在为可卡因的大量运输提供便利，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俄罗斯一位将军最近的发言，他说，“毒品常常是用美国的飞机运出阿富汗的”。<sup>②</sup>我们将会在本书结尾部分认真思考、探讨这个问题。

## 核准暴力、灰色暴力、全球贩毒团体

正如我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所指明的那样，我们从纪伦·达维拉故事这样的轶事和传闻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美国的秘密决策变成了威胁美国安全的重要因素，将我们置身于危险境地，尽管有时候它们对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美国人才济济，要想出妙计对付其他国家，并不缺专家，可是我们受秘密等级制度所累，使得那些专家的决策受制于一些小阴谋小诡计，而这些小阴谋都出于更隐秘、更愚蠢同时很危险的目的。公共权力的缺位导致了麦迪逊之后的状态，也就是“国中之国”的产生。<sup>③</sup>

<sup>①</sup>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89, citing Paul Eddy, *The Cocaine Wars* (New York: Norton, 1988), 342 (Blum) .

<sup>②</sup> “Afghan Drug Trafficking Brings US \$50 Billion a Year,” *Russia Today*, August 20, 2009, [http://russiatoday.com/Top\\_News/2009-08-20/afghanistan-us-drug-trafficking.html](http://russiatoday.com/Top_News/2009-08-20/afghanistan-us-drug-trafficking.html). Cf. “Russian State TV Suggests USA Involved in Drug-Trafficking from Afghanistan,” *RAWA News*, February 18, 2008, <http://www.rawa.org/temp/runews/2008/02/17/russian-state-tv-suggests-usa-involved-in-drug-trafficking-from-afghanistan.html>.

<sup>③</sup> David Bromwic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0, 2008, 33.



我希望本书能说服读者暂时将自己的质疑放置一旁，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60年来，美国的秘密行动和毒品—情报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对美国在各国心目中的形象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不得不问一问，就某种程度而言，“9·11”灾难是不是毒品—情报关系的副产品？

在这个国家，很多人口头上提出，在反恐战争中，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安全机构制定的策略有什么疑虑，不应该对我们的安全机构所择定的盟友有什么怀疑。我希望能让他们明白，我们的盟友为我们制造的麻烦远远多于替我们解决的问题。

然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提出批评或者警醒世人，而在于为这个国家寻找更好的出路，让这个国家不再沉陷于核准暴力和毒品的泥淖。我曾指出，文明和扬弃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这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决定——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结论部分详细阐述。

我希望提出三个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会接受的观点：第一，我们的国家今天深受安全机构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立宪政府都遭到了改变，甚至受到威胁；第二，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与核准暴力密切相关，而核准暴力行为无法通过正常的执法程序得以解决；第三，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和威胁，除非将这些关系公之于众，公开进行讨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本书结尾，我们将会看到，在说到全球贩毒团体时，我称为“核准暴力行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全球贩毒团体和其背景比全球毒品网络问题复杂得多。我希望将全球贩毒团体描述成核准的、被华盛顿利用的灰色管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那些证据应当会加强这一让人不安的假设。

最后我要说的是，针对美国在阿富汗的现状，各方分歧和争论愈演愈烈，而美国情报人员和情报机构与全球毒品网络和其他国际犯罪网络的暧昧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 第一部分

## 概 述





# 第一章

## 经批准的暴行、 统治机器和特权阶层

### 经批准的暴行和深度国家

1996年，土耳其苏苏尔卢克市（Susurluk）附近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飞速行驶的奔驰汽车发生事故，由此让人们看到了土耳其政治的黑暗面，甚至可以说看到了全球化的黑暗面。事故当中任何一位当事人都可登上地方报纸头版头条，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这些人一起出行。汽车残骸当中发现数具尸体，一位是国会议员，一位是前任警察局副局长，一位是选美小姐冠军，还有她的情人，名叫阿卜杜拉·凯特里（Abdullah Çatli），是位毒品走私贩和杀手。<sup>①</sup>汽车里隐藏的东西让整个故事更为扑朔迷离：毒品、数千美元现金、安装了消音器的手枪、机关枪、凯特里六套经官方认可的身份证明文件，其中包括一本土耳其内政部长（minister of interior）签字的“绿色护照”（Green Passport）（只限政府官员使用）。<sup>②</sup>

媒体越是深入挖掘这次苏苏尔卢克事故的内幕，其复杂性就越发显露。根据露西·科米萨（Lucy Komisar）的调查，凯特里护照

---

① Gareth Jenkins, "Susurluk and the Legacy of Turkey's Dirty War," *Terrorism Monitor*, May 1, 2008, <http://www.jamestown.org/terrorism/news/article.php?articleid=2374142>.

② Martin A. Lee, "Turkey's Drug-Terrorism Connection," *Consortium News*, January 25, 2008, <http://www.consortiumnews.com/2008/012408a.html>.



上的名字莫梅特·欧茨贝 (Mehmet Özbay) 其实是个化名, 射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杀手莫梅特·阿里·阿加 (Mehmet Ali Ağca) 的护照上也出现了这个化名。<sup>①</sup>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貌似应当不相为谋的一群人同时出现, 阿卜杜拉·凯特里竟然同高层警察及政府官员驾车同行。警局理应是在追捕凯特里, 此人自 1978 年以来就是全球缉拿的走私犯, 曾杀害数十位左翼激进分子。当时, 凯特里是“灰狼计划” (Grey Wolves) 的头目, 该团伙是新法西斯主义全国行动党 (英文为 National Action Party, 土耳其语简称 MHP) 的年轻分支。<sup>②</sup>

凯特里和阿加都是右翼准军事团伙“灰狼计划”敢死队队员。道格拉斯·瓦伦丁 (Douglas Valentine) 在《包袱之力》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一书中写道, 缉毒局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官员们怀疑, “灰狼计划”是伊斯坦布尔反游击中心 (Counter-Guerrilla Center) 的分支, 这主要是中情局官员亨利·P. 沙德特 (Henry P. Schardt) 和杜安 (“杜伊”)·克莱利奇 [Duane (Dewey) Clarridge] 的看法。<sup>③</sup> 丹尼埃勒·刚瑟 (Daniele Ganser) 的看法是, “灰狼计划”和格莱蒂奥 (Gladio) 的“暗箱”秘密反游击势力相互重叠, 后者得到美国军事代表团

① Lucy Komisar, “The Assassins of a Pope,” *Albion Monitor*, April 6, 1997, <http://www.monitor.net/monitor/9703b/turkeycia-sidebar.html>: “两人之前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合作过。1979 年, 阿里·阿加杀害了一名土耳其报纸编辑。凯特里在这起事件中也有份。当警察逮捕阿加时, 他们发现一本属于凯特里的假护照。接着有消息传出, 凯特里先前曾帮助阿加从伊斯坦布尔军事监狱中逃脱, 有人怀疑, 凯特里甚至还参与谋杀教皇一案。” 1998 年, 《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 (*Le Monde Diplomatique*) 指出, 阿卜杜拉·凯特里曾组织暗杀教皇, 为“灰狼计划”“换取三百万德国马克的资金” (“Turkey’s Pivo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Drug Trad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② Ertugrul Kurkcu, “Turkey: Trapped in a Web of Covert Killers,” *Covert Action Quarterly* 61, <http://mediafilter.org/CAQ/caq61/CAQ61turkey.html>.

③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R: TrineDay, 2009), 140.



(U. S. Military Mission) 和中情局的支持。<sup>①</sup>

1990年，人们发现北约组织的秘密地下军队横跨西欧，这之后，据披露，在土耳其，中情局联络官（上校）从“灰狼计划”团伙中大力招募成员，充实秘密地下军队，打着反游击中心的名义在土耳其从事各项活动。

十多年前，土耳其将军图汉（Turhan）就曾透露，自己饱受反游击中心的虐待，“这是北约国家的秘密分支”。<sup>②</sup> 20年来，反游击中心为土耳其军队从事包括黑帮暴行和暗杀等各类行动，施虐者还曾告诉图汉将军，他们还“无视《宪法》和各项法律”开展各种行动。<sup>③</sup> 和其他那些与中情局协作的机构组织一样，反游击中心所指挥和命令的行动包括“暗杀、轰炸、携带武器实施抢劫、虐待……散播假消息、暴行和敲诈勒索”。<sup>④</sup>

在对苏苏尔卢克事故的深入挖掘过程中，在土耳其逐渐形成一个概念，即深度国家（英文为 deep state，土耳其语为 gizli devlet 或者 derin devlet）隐藏在公共国家之下，是由官方警察和敢死队罪犯共同构成的准国家性质联盟，而前者原本是应当全力逮捕后者。土耳其深度国家所折射出的灰色联盟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1982年，凯特里和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Stefano Delle Chiaie）从迈阿密进入美国，后者是意大利籍新法西斯分子和杀手，和凯特里有诸多共性。<sup>⑤</sup>

① Daniele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228–230; Kurkcü, “Turkey”.

②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229.

③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230.

④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230, quoting from *Directive ST 31/15 for Operations against Irregular Forces*.

⑤ 希贝尔·爱德蒙兹（Sibel Edmonds）指出：“1989年，（凯特里）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头号通缉犯’，他来到美国，获得了定居权，最后在芝加哥落脚，在那里他继续着自己的活动，直至1996年。”（*American Conservative*, November 2009, <http://www.amconmag.com/article/2009/nov/01/00006>）。爱德蒙兹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问题，后来得到FBI前任反情报和反间谍主管约翰·M·克勒（John M. Cole）的认同。



戴利·奇阿伊和格莱蒂奥在意大利的恐怖活动，与世界反共联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 WACL），尤其与智利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飞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敢死队都有密切关联。<sup>①</sup>

## 全球毒品网络和全球统治机器

换言之，经批准的暴行和深度国家绝非是土耳其独有的现象，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令人震惊的是，凯特里和戴利·奇阿伊不断执行的秘密暴力行为——“灰狼计划”、世界反共联盟、智利秘密警力（智利国家情报部，简称 DINA）以及 1980 年可卡因政变之后的玻利维亚政府，均仰仗这个国际性的体系，世界各国都指责该体系在毒品走私的资助下，为各类秘密行动提供资金援助。例如，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统治下，智利军队和秘密警力（智利国家情报部）从本国向欧洲出口数吨可卡因。<sup>②</sup>

- 
- ① “Turkey’s Pivo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Drug Trad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cf.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108 – 109, 237 – 238, 298; Scott Anderson and Jon Lee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New York: Dodd, Mead, 1986), 147.
- ② Hugh Shaughnessy, “Revealed: Pinochet Drug Smuggling Link,” *Observer*, December 10, 2000, <http://www.guardian.co.uk/chile/story/0,1026866,00.html>; Rodrigo de Castro and Juan Gasparini, *La Delgada linea blanca* (Buenos Aires: Ediciones B Argentina, 2000). Cf. *Guardian*, July 11, 2006,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6/jul/11/chile.drugtrade>; “据皮诺切特将军的前任情报高级官员所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资产高达 2600 万美元（140 万英镑），均是向欧洲和美国销售海洛因而聚敛的。曼纽尔·孔特雷拉斯在给智利法官克劳迪欧·帕维茨（Claudio Pavez）的证词中提到，20 世纪 80 年代，皮诺切特和他儿子马科·安东尼奥（Marco Antonio）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毒品生产销售网络，将毒品卖到欧洲和美国。孔特雷拉斯曾是皮诺切特的盟友，现在两人已成敌手，根据他的说法，皮诺切特下令军队在距离圣地亚哥 24 米的塔拉甘特（Talagante）农业城镇建造一个秘密可卡因实验室。他安排药剂师在那里将可卡因和其他化学物质混合，从而制成孔特雷拉斯所谓的‘黑色可卡因’，能够逃过美国和欧洲毒品官员的检查，从而达到走私目的。”



在我们论述土耳其深度国家（土耳其语为 gizli devlet 或者 derin devlet）这一概念时，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影子政府，或者说国中之国，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潜在根基，这便是我们所称的深度国家现象。但是，深度国家网络还存在一种更高的可操作性的情报网络、官方执法队伍、非法却经批准的暴力团伙，以及国际毒品黑手党之间坚不可摧的联盟。

就某种意义而言，深度国家的这两种维度也可应用于美国政策协调处（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简称 OPC，1948 ~ 1952 年）深度势力当道的时代。政策协调处和土耳其深度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利用毒品资产在海外执行暗杀行动，但不会在国内搞这些名堂，尤其是格莱蒂奥网络在海外扩张的行动，诸如“灰狼计划”。不过政策协调处留下的最大遗物是亚洲和华盛顿准国家势力加强，美国国内的战争机器愈发霸道无忌。

今天，所有曾被打上“隐形政府”或“影子政府”的事物均可被视为那台机器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中情局和有组织犯罪，也包括那些无法解释的势力，如军队—工业联合（现在已经变成金融—军队—工业联合）、私人军队和情报承包商、公共关系代理、媒体大佬，甚至华盛顿最高端的游说集团。<sup>①</sup>

我们现在所论述的这一事物，绝非代表着中立权，相反，它有既定意图，是一台极具操纵欲望、企图掌握全球主导权的机器。<sup>②</sup>本书所讨论的各种事件的根源就是这台全球统治机器或者说战争机器，其资源来自政府内外，其纽带不是阴谋宣誓和握手为伍，而是

① 2009年8月，谷歌搜索“shadow government USA”（影子政府美国）共有637000个结果。其中有些认为这指代政府内部的团体，有些认为是指代政府外部的组织，有些则认为二者皆有。这种清晰性的缺乏也同样适用于深度国家现象。

② Peter Dal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6-7, 10-11, 29, 383, 395.



大家心怀同样的思想和企图。这种夺取主导权的思想观控制了华盛顿所有觊觎最高权力的人们。因此，今时今日，这种观念决定了总统的决策，而非总统决定此观念的方向。

这种主导权观念或者说战争机器，与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lips）和米奇·哈弗（Mickey Huff）所称的“全球主导集团”颇为类似，但更具广泛性。菲利普斯和哈弗讨论的是“力图让美国军事力量横扫全球的数百人”的特定联合集团。<sup>①</sup>在笔者看来，战争机器的核心是富裕的全球团体，和在此之下，数千个权势较弱的集团盲目尾随，界限模糊，均力图要在机器内部夺取权力。笔者在后文中将会论及，这台战争机器已经扩展到政府之外，进入到整个社会，不仅吸纳了游说者，甚至收服了大学和主流媒体。

也有只说机器而非战争机器的情况。如果这本书要讨论制药行业或者是农业，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的人和集团将会在国内有一番不一样的动作。这些集团之一便是孟山都公司（Monsanto），它为缉毒局“禁毒之战”提供脱叶剂。在国内，孟山都公司常去骚扰那些保存并使用自家种子的大豆农户，以及那些坚称未在自家牛奶中添加生长激素的奶农。

要想更全面分析我们这一体系，就必须将这台机器视为掠夺性资本主义（所谓掠夺性资本主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后期力图从社会当中搜刮财富，而非推动共同富裕）。但是，这台机器要求美国军队施加压力，以强化自身对全球资源和劳动力市场的掌控，因此笔者坚信，最终从战争机器的视角进行分析是妥帖、合适的。

对比以下三种概念或现象，即伦恩·克劳德尼（Len Colodny）在《四十年之战》（*The Forty Years' War*）一书中提出的“影子政

① Peter Phillips and Mickey Huff, "Inside the Military Media Industrial Complex: Impacts on Movements for Peace and Social Justice," *Dissident Voice*, December 22, 2009, <http://dissidentvoice.org/2009/12/inside-the-military-media-industrial-complex-impacts-on-movements-for-peace-and-social-justice>. Phillips and Huff acknowledge their debt to C. Wright Mills's classic *The Power Elite*.



府”，约瑟夫·特伦托（Joseph Trento）在《恐怖前奏》（*Prelude to Terror*）中论述的“私人中情局”概念，弗莱彻·普劳蒂（Fletcher Prouty）在《特工队》（*Secret Team*）一书中总结的“特工队”现象，统治机器，或者说战争机器，则更具宏大性和涵盖性。<sup>①</sup> 它并不是指受某中央指挥中心之命的一队步兵，相反，它指代的是为夺取权力而相互倾轧的集团，不惜代价要站在权力之巅。查尔摩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作者将其描述为“军事—工业联合”，要知道，如今这种联合关系网已经涵盖了主流媒体、汽油和金融公司等机构。<sup>②</sup>

一边论或本质论者认为美国从骨子里就是险恶的，和这种观念截然不同，在笔者看来，战争机器占据着美国权力的核心，并左右其发展，不过这并不代表两者实为一物。这便是为何笔者与自己的反战朋友和同事持有一些不同意见，笔者非常关注诸如肯尼迪遇害、水门事件或“9·11”事件等深度事件。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认为，肯尼迪遇害一事充分证明有个“匪帮国家”在运作，不过在笔者眼中，这是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匪帮作恶的结局，简而言之，正如笔者将在下文所述，这是中情局毒品网络的恶果。<sup>③</sup> 更为广泛地说，笔者认为，这些事件是战争机器内部成员肆无忌惮以实现操控美国政治体制、维持军事主义发展的所作所为。

① Len Colodny and Tom Schachtman, *The Forty Years' Wa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cons, from Nixon to Obama* (New York: Harper, 2009), 275; Joseph J.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xiii; L. Fletcher Prouty, *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3) .

② 笔者在本书末尾将论述一小批关键毒品走私贩庇护者的行为，他们包庇美国毒品网络的头目们逃避逮捕或公共搜索。他们是美国战争机器的重要部分，但绝非是核心成分。

③ Michael Parenti, *Dirty Truth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96), 153 - 191.





要想描述这没有定型的存在实为不易，除非像本书一样对其历史追根溯源。但是，如果忽视其存在，就等于误解了美国政治，就等于是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绞尽脑汁，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注定无功而返。

最后说明一点：虽然笔者提出“美国统治机器”这一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支持美国海外势力的人就一定都是美国人。相反，我们将会发现，二战之后，国会面临游说浪潮，其资金推动力量长久以来都源自海外金融利益团体，亚洲尤甚。这一般是通过地方的灰色要人，如20世纪40年代的宋子文（中国国民党）、20世纪50年代的保罗·海利维尔（泰国）、20世纪60年代的朴东善（韩国）、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官员们以及20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詹姆斯·瑞迪（James Riady）和约翰·黄（John Huang）。<sup>①</sup>

另一股推波助澜的力量是大笔资金投入美国媒体，此举之目的不是赚钱盈利，而是要极大改变主流媒体话语范畴，使其偏离正轨。菲利普斯和哈弗观察发现：

亿万富翁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上的年损失额为5000万美元，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菲（Richard Mellon Scaife）在《匹兹堡先

---

① 理查德·维格里是道德多数派组织（Moral Majority）的共建者，该组织1980年曾帮助里根竞选。此人起初是自由年轻美国人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的筹资人，后来在远东游说团（Far East Lobby）中发挥核心角色，阻止美国承认共产主义中国。1977年，他从文鲜明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竞选直接邮寄宣传中赚得近100万美元。Sara Diamond, *Spiritual Warfare: The Politics of the Christian Righ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citing Joseph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171 - 172. Cf. Scott, *Deep Politics*, 237 - 238).



驱评论报》(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 上的年损失额为 200 万~300 万美元, 亿万富翁菲利普·安舒兹 (Philip Anschutz) 在《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 上的年损失额大约为 500 万美元 (按汇率计算), 亿万富翁文鲜明 (Sun Myung Moon) 在《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 上已经损失 20 亿~30 亿美元。<sup>①</sup>

要不是审判入狱, 康拉德·布莱克 (Conrad Black) 和《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 也将位列其中。上文所列举的四位亿万富翁之中损失最大的两位——默多克和文鲜明 (外加加拿大人布莱克)——均来自美国之外, 笔者认为这一点值得注意。

在下文中, 笔者将论证前文所列举的所有亚洲灰色要人 (包括文鲜明) 的资金源自 (至少部分) 亚洲地区的毒品走私。笔者将在本书论述, 一方面, 美国统治机器是亚洲战后毒品走私的一大凶手, 另一方面, 走私收入被重新注入美国, 以支撑美国统治机器的运转。

笔者坚信, 分析美国战争机器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基石, 将有助于解读为何美国如今要在阿富汗支持它一手创造的毒品—腐败政权, 一如在曾经的老挝和越南那般。

## 深度国家、准国家和美国

笔者在《通向“9·11”之路》(The Road to 9/11) 一书中, 遵循欧拉·图南德 (Ola Tunander) 的思想, 将美国定义为一个“双重国家”。不过这一概念对那些依法治国极其有限的国家更为适

<sup>①</sup> Phillips and Huff, "Inside the Military Media Industrial Complex." 笔者略微修改了对安舒兹的介绍, 他直到 2009 年 6 月才从鲁伯特·默多克手中收购《旗帜周刊》。Cf. Dick Smillie, "The Stealth Media Mogul," Forbes, June 29, 2009, <http://www.forbes.com/2009/06/28/anschutz-weekly-standard-business-media-examiner.html>: "安舒兹最近一次收购是买下《旗帜周刊》, 估计每年损失 500 万美元。"



用，如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等。苏苏尔卢克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谢姆丁利（Semdinli）凶杀案反映了这种双重性，土耳其前总统及首相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曾对此事发表评论：“根本原则应该是只有一个国家。可在我国，却存在两个国家……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台面上的。……理应实际存在的国家被抛至一边，理应被抛至一边的国家却实际存在。”<sup>①</sup>

神父哈维尔·吉拉多（Javier Giraldo）也曾将哥伦比亚描述为一个具有双重性的国家。

哥伦比亚这个国家颇具矛盾性。她试图实现两项职能。一方面，她有着暴力、歧视的体制，偏爱富裕的少数人。占多数的人民甚至连基本需求都无法解决。鉴于此本质，从其核心上来说，这绝非是个民主国家。而另一方面，在公共话语中，她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立足法律的国家，尊重贯彻公平正义、人权准则和民主法律。

政府公务员如何掌控这种矛盾性呢？他们维系着一种双重性：即准国家，这是一种非法而又机密的结构，她的肮脏镇压越来越多。看起来，这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多年以来，哥伦比亚政府一直在创建并维持这类结构。合法的宪法结构与准国家、准军事结构并存。<sup>②</sup>

---

① Jon Gorvett, "Turkey's 'Deep State' Surfaces in Former President's Words, Deeds in Kurdish Town,"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6, [http://www.washington-report.org/archives/Jan\\_Feb\\_2006/0601037.html](http://www.washington-report.org/archives/Jan_Feb_2006/0601037.html). 眼下的危机让土耳其伊斯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争锋相对，以致于这种双重性更为复杂：“任一方都在指责对方操控某种‘深度国家’，或者说影子政府行动。世俗主义者指责正义与发展党（简称AK）企图暗地里推翻土耳其的世俗秩序，而执政党则表示，世俗机制将全力以赴维持秩序——哪怕是改变或是谋杀。”

② Ruth Goring, "Executing Justice: Which Side Are We On? An Interview with Colombian Human Rights Activist Padre Javier Giraldo, S. J.," *Equipo Nizkor*, April 2003, <http://www.derechos.org/nizkor/colombia/doc/giraldo.1.html>.



土耳其的深度国家和哥伦比亚的准国家非常相似，两者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非法毒品走私。今天，美国最机密的势力并不是通过诸如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这种外在准国家而得以显现，相反，是通过公共国家内部外部的主导权或者说战争机器的核心得以体现。<sup>①</sup>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美国无数撰文讨论“影子政府”的作者往往忽视了或未能充分解读全球毒品网络在美国发展历程中的影响。相反，很多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国家甚至毒品资本主义国家的作者又常常低估了公共国家和战争机器的区别。他们也容易忽视战争机器内部多股势力之间紧张甚至时不时地公开冲突——诸如水门等深度事件。

不过未来这种紧张也许会消失。起初，诸如中情局这样的秘密机构受到公共国家的限制和约束，甚至与之发生冲突。而到了今时今日，风水轮流转：现在已经变成公共国家被身边的私人秘密势力控制。奥巴马总统当选，美国陷入阿富汗—巴基斯坦战争，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曾几何时，大家认为，“这改变了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我们太需要找到一个新方向了”。<sup>②</sup>

比起土耳其或者哥伦比亚，美国在民间社会依旧坚定推行法治。不过，到了今天，军事—工业联合——曾被视为生长于国民经济内的毒瘤——已经拥有膨胀的主导权，极有可能颠覆取代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宪法》反映可视结构的公共国

① 如果读者对笔者所描述的现象并不非常熟悉，那么“战争机器”将是一个更有启发性的术语，不过“统治机器”其实更为准确。心灰意冷的评论员哈利·埃尔默·巴纳斯（Harry Elmer Barnes）认为这台机器的目的是“为永恒的和平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其实并非如此。这台机器的目标或是其宣称的目标是永恒的主导地位，必要时将发动战争。

② John Nichols, “Obama’s Campaign Merits a Peace Prize,” *The Nation* (blogs), October 10,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blogs/thebeat/482916/obama\\_campaign\\_merits\\_a\\_peace\\_prize](http://www.thenation.com/blogs/thebeat/482916/obama_campaign_merits_a_peace_prize).



家，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国家政策问题上，将沦为有名无实的空皮囊。<sup>①</sup>

## 战后的国家和暴力变更关系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情报网络，当然最主要是中情局和国际毒品网络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盘根错节和难以捉摸。但是，毋庸置疑，这是有战后根源的。二战之后，美国，连同英国和法国，在冷战期间反复利用毒品网络和恐怖组织做帮手。这些大国支持这类组织，从而让毒品走私团伙和恐怖组织的权力领域和涉足范围越来越广。由此所造成的深远结果是，这些强权势力已经削弱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的法治。

从经济视角分析，冷战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不可兼容的冲突；从政治视角分析，它力图通过全球主导实现国家安全。然而，冷战也存在重要的心理因素，回顾两次极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世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已经备受质疑，全球领导者们的不安全感近乎病态。冷战数十年来，美国和苏联对彼此意图总抱着最坏的揣测。两边均视第三世界为转型区域，要么是投入苏联阵营，要么是倒入资本主义怀抱。

毫无疑问，那时的世界摇摆不定，国家体系的未来黯淡。比起一战之后，更多的国家政府不具备政治理论上应有的组织权力

---

① 《国家应急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是水门事件之后的改革内容之一，该法案明确规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最多六个月之内，并且紧急状态延续时，不得迟于六个月期限之末，国会议院必须召开会议，共同投票表决是否该终止紧急状态” (50 U. S. C. 1622, 2002)。然而未来九年，乔治·W. 布什为应对“9·11”事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从未召集会议进行相关讨论。要求国会履行职责的呼吁完全被当作耳边风。cf. Peter Dale Scott and Dam Hamburg, “To All Readers: Help Force Congress to Observe the Law on National Emergencies!!!!” 911 Truth.org, March 24, 2009, <http://www.911truth.org/article.php?story=20090324183053848>.



和暴力垄断。即便是在诸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French Third Republic）这样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因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右翼集团抵抗运动（“蒙面党”，Cagoule）而弄得四分五裂。

而在新近抬头的国家，例如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公共国家的寿命和未来更加黯淡。不仅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城市官僚精英与那些宗教农村越发疏离，甚至是这些国家本身也不得不面对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国家内部的集团诉诸暴力手段，不仅要保护自身免遭这个对手国家的伤害，更要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因为现在的这个国家也许来日不多。

美国全球主导权扩张，已经让国内的民主机构代价惨重。正如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所述，民主公共国家“制定和平解决争议的广阔路线”，从而将暴力取而代之。<sup>①</sup>然而，当面前的势力不接受自由路线，和苏联一样，美国也同意采用准国家那类暗箱暴力手段，以保护自身免受敌人迫害。

## 华尔街、政策协调处、灰色毒品资产

1951年，中情局依照“行动方案”（Operation Paper），开始向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物资，主要活动是鸦片走私。这支在远东地区得到支持的军队成了执行秘密外交政策的首个典型案例，至于其运作所需的资产，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则全然蒙在鼓里。这场最终败北的行动是经杜鲁门（Truman）批准的，当时的情形如今仍旧备受争议。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重大决策是由一小撮同党派系和秘密组织拍案定夺的，它们的触角有多长至今仍是谜。

<sup>①</sup> Jonathan Schell, *The Unconquerable World: Power, Nonviolence,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2003), 240.



杜鲁门本人后来表示，中情局开展和平时期的秘密行动，自己全然不知。<sup>①</sup> 1951年，中情局局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据报道曾反对此计划（支援国民党在缅甸的残余势力）”，但是，“杜鲁门予以否决，命令中情局继续提供支援，并要严格保密，不得让高级情报官员和美国外交官得知此事”。<sup>②</sup>

事实上，具体落实首项决策的压根不是中情局，而是另一个更为神秘的组织——政策协调处，该机构比中情局藏得更深。中情局至少是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公开赋予权限的，不过中间存有“漏洞”，因此才使得中情局可以出乎国会“意料之外”执行秘密行动。<sup>③</sup> 一年之后，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秘密批准设立政策协调处。

从本质上看，政策协调处的创始人其实是战争时期战略情报局两位老将。一位是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47年，杜勒斯虽然只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不过他却有实力凭借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影响力，诱使犹豫不决的杜鲁门总

- 
- ① “当我设立中情局时，……我之前从未想过……它有一天会在和平年代从事阴谋活动。”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1963, A11, quoted in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63.
- ②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166. 麦考伊的观点是基于两部贸易书籍，这两本书很明显都依赖于中情局的消息。David Wise and Thomas B. Ross,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130 - 131; Thomas Power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 (New York: Knopf, 1979), 81 - 82.
- ③ 大卫·维斯曾服过兵役，后担任情报记者。这一法案批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两者均要发挥提供建议的职能，它同时赋权中情局“执行情报相关的各种其他职能和义务……国家安全委员会则不时发挥领导职能”。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D.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Knopf, 1974), 8.



统开展秘密行动。<sup>①</sup>另一位是杜勒斯的门徒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他也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1945年，他进入国务院，头衔莫名其妙——“被占领国副助理秘书”。

依照约瑟夫·特伦托的说法，“杜勒斯为威斯纳安排了这份工作，后者很快就构建了情报权力基地”。

1947年末，威斯纳以秘密手段在国务院官场上施加了巨大影响力。不管上面批准与否，他的行动都要开展。相反，他成了双面骗子，他总是告诉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或者国防部部长詹姆斯·佛列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对方已经批准他的计划了。接着他便大摇大摆地将计划付诸实际。……政策协调处的员工们大多是威斯纳一手精挑细选的。……威斯纳借用难民管理的幌子来落实自己的各项秘密行动。杜勒斯则在自己的苏利文与克伦威尔（Sullivan and Cromwell）律师事务所指挥威斯纳。<sup>②</sup>

威斯纳和杜勒斯（后者甚至不在政府任职）手握大权，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纽约法律界、银行界、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纽约社会名流录（New York Social Register）等广阔领域都占据着核心地位。

这个广阔体系加快了中情局的设立，不过在等待其建立之时，艾伦·杜勒斯和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采取行动成立了一个私人替代品。有关二战之后华尔街的私人律师艾伦·杜勒斯如何“以自己的势力神不知鬼不觉地组建了一个（私人）间谍组

① 杜勒斯与上层社会的友好关系可从以下这件事中一窥究竟：“艾伦·杜勒斯感到，自己在中情局的未来恐怕会因为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而面临危机，1953年1月21日，他约朋友大卫·洛克菲勒吃午饭。洛克菲勒意图明显地暗示他，如果他想离开中情局，他肯定会被邀请出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主席。杜勒斯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未来。两天之后，《纽约时报》爆出消息，艾伦·杜勒斯即将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London: Granta, 1999), 140-141.

② Joseph J.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Random House/Forum, 2001), 44-47.





织”，相关的论述数不胜数。<sup>①</sup> 根据彼特·格罗斯（Peter Grose）的说法，多诺万后来声称，自己被杜勒斯的计划吓了一跳。<sup>②</sup> 不过后来发现，证据显示，事实上是他本人设立了相类似的组织：世界贸易公司（World Commerce Corporation），该组织的创立者包括了极具传奇色彩的英国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和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sup>③</sup>

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中央情报局局长范登堡将军（General Vandenberg）聘用艾伦·杜勒斯，当时杜勒斯还是纽约苏利文与克伦威尔事务所的一名共和党律师。他的工作内容是“为1947年中情局的设置构成起草方案”。杜勒斯很快就召集了六人顾问小组，其中五人均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或律师。<sup>④</sup> 1948年，杜鲁门任命杜勒斯担任某委员会

①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44.

②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44, citing Peter Grose, *Gentleman Spy: The Life of Allen Dull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4). 格罗斯的这部传记其实是对中情局前任官员理查德·哈里斯·史密斯（Richard Harris Smith）一份手稿的删减改写，这份手稿拖延了很长时间，笔者与史密斯在25年前不时有些联络。史密斯授权笔者可以用其姓名援引其书稿内容——当时原以为此书稿会出版，以证明一种说法，即1957年印度尼西亚大选之际，中情局曾投入2000万美元以帮助所谓的温和穆斯林马斯友美派（Masjumi）和社会党（简称PSI）。Peter Dale Scott, “Exporting Milit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 – 1967,” in *Ten Years’ Military Terror in Indonesia*, ed. Malcolm Caldwell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1975), 209 – 261.

③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09 – 110, 197. 同一时期，FBI监控多诺万，怀疑“他已经采取行动组建反共产主义情报组织，以战前石油和工业为资金来源的某私人机构为模板”。Anthony Cave Brown, *The Last Hero: Wild Bill Donova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821 – 822.

④ Richard Helms with William Hood, *A Look over My Shoulder: 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82 – 83; cf. Burton Hersh, *The Old Boys* (New York: Scribner’s, 1992), 185. 这五个人分别是迪伦·理德公司（Dillon Read）的经营搭档金曼·道格拉斯（Kingman Douglas），（转下页注）



主席，评审中情局业绩，为此杜勒斯再度聘用两名纽约律师协助工作。<sup>①</sup>

和先前的战略情报局一样，在刚成立的头些年，中情局内部完全由纽约高层贵族主导。当时，中情局共有七位广为人知的副局长，均来自纽约法律金融界，其中至少六人（包括杜勒斯和威斯纳）被列入纽约社会名流录。<sup>②</sup>事实上，中情局早期的情况和政策协调处如出一辙，威斯纳任命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等人在政策协调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借用威斯纳前妻的话，菲茨杰拉德这帮人“本来就腰缠万贯，完全有能力打通（华盛顿政府层）”。<sup>③</sup>

我们知道，1952年，有关政策协调处支持赞助国民党毒品走私的丑闻越闹越大，中情局局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政策协调处连根拔起，原雇员全部调入中情局自身的秘密行动团队和新成立的规划部（Department of Plans，后更名为行动部，英文为Department of Operations）。<sup>④</sup>此举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监管政策协调处，结果却事与愿违，对美国和全球都造成了巨大破坏。中情局非但没能吸纳接管政策协调处，相反，在艾伦·杜勒斯的带领下，政策协调处强有力地控制了中情局。

自此，中情局便成了具有迥异文化特质的扭曲结合体。此时此

---

（接上页注④）卡特·利德亚德 & 米尔本律师事务所（Carter Ledyard & Milburn）的威廉·H·杰克森（William H. Jackson）和弗兰克·威斯纳，迪伦·理德公司的保罗·尼兹（Paul Nitze），以及前任中央情报局长西德尼·索耶斯（Sidney Souers）上将，他于1946年退伍，后在圣路易斯做投资银行家。

① Helms, *A Look over My Shoulder*, 99. 两人指威廉·H·杰克森（William H. Jackson）和卡特伊阿斯·科瑞（Mathias Correa）。

②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87, 200-201. 七人包括卡特·利德亚德 & 米尔本律师事务所的威廉·H·杰克森和弗兰克·威斯纳，两人均被列入纽约社会名流录。

③ Hersh, *The Old Boys*, 301, quoting Polly (Mrs. Clayton) Fritchey.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78.



刻，除了原本是学术研究员的情报分析师，以及那些如有必要不惜瞒天过海、僭越法纪的中情局特别行动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Operations）的在职特工，现在还加入了政策协调处的老将们，其中有些人即便是犯下重罪也毫不在乎，甚至乐在其中。

政策协调处这些重罪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已经对美国深度历史造成了严重影响，远远超乎一般想象，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就可窥一二。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对如今美国的阿富汗问题追根溯源。

### 秘密特工的罪行

占据主导地位的几个世界大国都曾凭借一种愈发强大的机器，从而建立关系，落实行动，在国内公共社会看来，这显而易见是违背法纪的。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 1948 年 6 月 18 日第 NSC10/2 号令要求中情局新成立的政策协调处执行“秘密行动”，其中包括“颠覆敌对国家，如支持地下反叛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自由团体”。<sup>①</sup>

那时，政策协调处被授权可超出法律界限采取行动，通过与职业犯罪组织暗地里建立联盟，主要是毒品走私团伙，从而保护盟友，打击共产主义。<sup>②</sup> 二战之前，这类关系不过是断断续续，而此时却已成为一种体制，受到庇护。政策协调处不仅为世界各地的非法毒品走私团伙提供武器支援，甚至（下文将提及）还为驻扎在缅甸、靠贩毒为生的国民党军提供物资，从而让战后毒品走私活动起死回生。<sup>③</sup>

① Thomas Etzold and John Gaddi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5.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15.

③ See Chapter 6; see also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 - 3, 59 - 68.



换言之，一些大国已经不再局限于依靠扩大（借用谢尔的话）“政治圈为主的非暴力行动范围”。<sup>①</sup> 它们正以飞快的速度将国家触角延伸到秘密的地下暴力领域，以实现其政治意图。但是，和毒品有关联的绝非政策协调处一家。美国军队早就借用西西里黑手党来弥补自己人手不足的问题，从而监管战后的意大利，之后甚至向西西里派去 60 多名黑手党成员，扩大这股灰色联盟势力，强化支援力度。其中一位被派去的黑手党成员便是弗兰克·科波拉（Frank Coppola），他后来是纽约黑手党分子詹姆斯·普卢梅里（James Plumeri）的主要毒品供应方，后者与中情局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在下文详述。<sup>②</sup>

美国军队与黑手党在意大利联盟早就不是秘密了。派驻美国第五部队的英国情报官员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在他的日记中准确写道：

（黑市）的运作受到军队政府联盟（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高层官员的庇护，这已是众所周知。……该联盟的最高领导是查尔斯·普莱蒂上校（Colonel Charles Poletti），他的搭档是维托·基诺维斯（Vito Genovese），此人曾是美国黑手党的头目，现在成了普莱蒂的顾问。……显而易见，附近城镇的镇长均为黑手党—克莫拉（Camorra）派系的人，全都是他（基诺维斯）提名的。这些曾为国务院机密的事实，如今早已传遍那不勒斯街头巷陌。然而，大家对此无所作为。<sup>③</sup>

普莱蒂曾是纽约副州长，他把自己从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学到的那一套腐败手段充分搬到意大利。其中一项就是

① Schell, *The Unconquerable World*, 240.

② Scott, *Deep Politics*, 174 - 178,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76, 98 - 99, 112.

③ Norman Lewis, *Naples'44: A World War II Diary of Occupied Italy*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109 - 110.



omertà（黑手党用来表示“闭嘴”的代号）：1993年，他告诉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我们与黑手党之间不存在瓜葛。从没听说过它们。”<sup>①</sup>然而普莱蒂可是亲手招募了基诺维斯，拉凯·卢西亚诺（Lucky Luciano）还将普莱蒂描述为“我们的好朋友之一”。<sup>②</sup>普莱蒂在上流社会和黑帮的好搭档都不少：他后来还成了哈佛大学的监督员和康奈尔大学的理事。<sup>③</sup>

与此同时，中情局批准的首次秘密行动便利用没收的轴心国资金，支持1948年意大利大选期间反共的政党，为纽约精英布鲁克俱乐部（Brook Club）的富裕资本家首次私人筹资提供赞助。<sup>④</sup>在20年里，中情局为意大利反共分子投入了至少6500万美元，不仅支持主流政党，甚至还扶持极右翼地下集团，这些人在1970年策划了一起新法西斯主义军变——黑手党支持的鲍格才家族（Borghese）军变，不过最终失败。负责掌控鲍格才军变的维托·米塞里（Vito Miceli）将军在两年后，还从美国大使馆额外拿到80万美元。<sup>⑤</sup>

部分参与鲍格才军变的人也执行了意大利的假旗帜恐怖暴力行动。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1969年的米兰丰塔纳广场（Piazza Fontana）爆炸案和1980年的博洛尼亚火车站（Bologna Railway Station）爆炸案的罪魁祸首是一个由米塞里和意大利军事情报组织控制的特别小组，他们和美国中情局以及策划阴谋的共济会P-2

---

① Tim Newark, "Fighting the Mafia in World War Two," AmericanMafia.com, May 2007, [http://www.americanmafia.com/Feature\\_Articles\\_388.html](http://www.americanmafia.com/Feature_Articles_388.html).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5-36; Scott, *Deep Politics*, 8.

② Gaia Servadio, *Mafioso: A History of the Mafia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Dell, 1978), 88.

③ Scott, *Deep Politics*, 8. 1982年纽约市的一家大型发电厂以他的名字命名。

④ Amy B. Zegart, *Flawed by Desig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A, JCS, and NS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9,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60;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26-27.

⑤ Weiner, *Legacy of Ashes*, 298-300. 据说，1972年基辛格不顾中情局地方主管反对，执意要给米塞里拨付资金。



分会 (Masonic Lodge P-2) 颇有关联。<sup>①</sup> 1989年2月,意大利特别公诉人杜门尼科·西加 (Domenico Sica) 表示,过去十年里,至少部分爆炸案的罪魁祸首是黑手党——换言之,也就是笔者所称的全球毒品网络,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右翼派系。<sup>②</sup> 阿卜杜拉·凯特里的同行搭档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最后被指控参与丰塔纳广场和博洛尼亚爆炸案,同时涉嫌参与了鲍格才军变。<sup>③</sup>

显而易见,所谓冷战焦虑偏执症是促使准国家诉诸暴力的主要因素。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国自1945年之后对秘密暴力的实际利用,尤其是在诸如伊朗(1953年)和智利(1970~1973年)等国家,我们就能发现,冷战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偏执症被反复拿来掩饰金钱动机,这其实只是借口。

因此,1953年,英美两国策动的军变推翻了民选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 (Muhammed Mossadeq),此举目的是要防止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的国有化。为此目的,“中情局完善了一份军变详细计划”,其中包括“派暴徒匪帮袭击神职人员,破坏其财产,并制造这一行动是受摩萨台或其随从之命令的假象”。<sup>④</sup> 将该计划卖给华盛顿的英国特工依照“上级指示”,刻意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避而不谈,而是强调摩萨台“正在为共产主义接管伊朗铺路”。<sup>⑤</sup>

① See Daniele Ganser, “Beyond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Propaganda Due Masonic Lodge and the CIA in Italy’s First Republic,” in *Government of the Shadows: Parapolitics and Criminal Sovereignty*, ed. Eric Wilson and Tim Lindsey (London: Pluto, 2008).

② Leonard Weinberg and Ami Pedahzu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errorist Groups* (London: Routledge, 2003), 56.

③ J. Patrice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Operation Condor and Covert War in Latin Americ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43.

④ Dilip Hiro, *The Iranian Labyrinth: Journeys through Theocratic Iran and Its Furies* (New York: Nation Books/Avalon, 2005), 76.

⑤ Hiro, *The Iranian Labyrinth*, 74.



在这一背景下，20 世纪后半叶，相关国家的民主体制受到政府内外多股秘密势力的破坏。内部的破坏因素包括残暴军变（印度尼西亚和希腊，1967 年）、右翼黑帮鼓动暴行（意大利，1969 年、1979 年）以及单个刺杀行动。在这些事件的同一时间内，外部破坏因素包括权力大国的情报组织煽动或支持各类运动，其中有些运动早已自己上演。不过，本段所述所有深度事件均与毒品走私大有关系。

跨国机构还有其他的腐败行为，有些还是和国家警力狼狈为奸，国家之间的相互颠覆由此而愈演愈烈。例如，据报道，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已经“在 73 个国家开展业务，与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界高层建立了联系”，几乎全是“通过银行向相关官员行贿或分红”。<sup>①</sup> 这张全球网络让统治机器更具有跨国性，已经超出美国范围。与此同时，跨国石油公司被指在诸如阿塞拜疆等遥远国家为多次军变提供资金，以获取或保住资产。<sup>②</sup> 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阿塞拜疆这两件事上，毒品代理问题再度浮现。

笔者将这种自相矛盾的交互关系命名为“深度政治”，意指符合《宪法》的民选政府与秘密暴力势力——犯罪势力——之间时时刻刻狼狈为奸的关系，而两者本应是敌对关系。例如，中情局成立以来，几乎所有行动都笼罩着神秘面纱，未经法律审批。<sup>③</sup> 尽管这

① U. S. Congress, Senate, 102nd Cong., 2nd sess., *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Senator John Kerry, Chairman, and from Senator Hank Brown, Ranking Member,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Narcotic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eptember 30, 1992, 1 - 2.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163 - 167.

③ Dorothy J. Samuels and James A. Goodman. "How Justice Shielded the CIA," *Inquiry*, October 18, 1978), 10 - 11; 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Justice Department Handling of Cases Involving Classified Data and Claims of National Security*, 96th Cong., 1st sess., House Report No. 96 - 28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一种运作方式在水门事件之后已被官方取消，然而里根政府出台的一份新决议，特批中情局无须上报非自身员工的毒品走私问题。<sup>①</sup> 我们再一次看到，公共国家再次被蚕食，深度势力最终凌驾公共国家之上。

2007年，哥伦比亚公共政治家与毒品准军事敢死队上演政治冲突，从而让问题浮出水面，正因为如此，人们已经习惯将这类冲突总结为 *parapolitica*（西班牙文）或 *parapolitics*（英文），即“准政治”。<sup>②</sup>

中情局依赖非法组织，而又不受制衡，可以预料，这最终导致非法组织愈发猖獗。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telligence Committee）1996年指出，在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中，每天，数百位员工接到命令，严重违反世界各国法律，逃避相关外国政府的严厉追踪。……保守估计，行动员工进行严重违法（外国法律）活动，频率每天大约有上百次（显然每年就有十万次），不仅会让美国陷入政治丑闻，也会让相关国家的自由权甚至国家命运受到牵连，而且更为可能的是，这些秘密员工本人的自由和生命都将面临危险。<sup>③</sup>

因此，牵扯到国家政权、经批准的暴力、犯罪和毒品等问题的苏尔卢克事件是准政治（或者说深度政治）的标志性代表——不仅是对土耳其，也是对全球各国。

① Alexander Cockburn and Jeffrey St. Clair, *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 (London: Verso, 1998), 391–392.

② “Colombia: The Perils of ‘Parapolitics,’” *Economist*, May 22, 2007. 笔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试图区分蓄意的准政治和无法掌控的深度政治（Scott, *Drugs, Oil, and War*, xx; Scott, *The Road to 9/11*, 267–269），不过随着这两种表述已经流行开来，两个术语已经可以通用了。

③ 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IC21: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taff Study, 104th Congress, 205.



## 公共国家和帝国扩张

过去 300 年间，体制国家已经承载了许多进步的价值观，例如官僚理性化（如法国），洛克的责任、宽容、透明和终极民主的理想（如英国）。凭借公共国家的各种体制，民间社会开放发展起来，并享有权利，当然，印刷媒体和大众言论的不断崛起也发挥着推动作用。

然而，国家积极自由发展阶段却没有永久持续下去。貌似如同不可避免的辩证路线，国家促进了社会繁荣，繁荣发展点燃了某些大国的扩张野心，扩张野心又导致某些主导国家出现贫富差距。<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主导权国家本身发生了改变，公共服务快速下滑，以此来满足少数人的安全需求，践踏多数人的权益。<sup>②</sup>

因此，多年来，英格兰在亚洲的外交事务大部分是交给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该公司不仅管理英国印度殖民地，还负责其他诸如圣赫勒拿岛（St. Helena）等殖民地。相类似的，美国的阿美石油公司（Aramco）是埃索（Esso）、美孚（Mobil）、加州标准石油公司（Socal）和德士古（Texaco）等石油巨头的联合体，在阿拉伯国家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中情局及 FBI 均有私交。<sup>③</sup>

东印度公司采取单边行动，其资金来源于它与中国的鸦片交易盈利，这种做法让不少英格兰人大为不耻，所造成的灾难余热直到现在仍萦绕着亚洲地区。阿美石油公司与中情局攀上关系，后来不仅资助了沙特君主，还创建了世界穆斯林联盟（World Muslim League），进而为世界各地的瓦哈比主义、伊斯兰教以及“基地”

① 根据基尼系数，如今美国的收入差距和巴西、墨西哥、中国一样，均排在世界首位。See Phillips, *Wealth and Democracy*, 38, 103; Greg Palast, *Armed Madhouse* (New York: Dutton, 2006), 159.

② This is the subject of my book *The Road to 9/11*, 4-9.

③ Anthony Cave Brown, *Oil, God, and Go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213.



组织势力的抬头推波助澜。<sup>①</sup> 通过这种手段，英国和美国沿袭了超级大国曾采用的政策，公共秩序和安全陷入危机。<sup>②</sup>

结果，主导权国家在发展后期对（至少是间歇性）人性价值产生了厌恶情绪，甚至对其打击破坏，而它们在发展初期正是凭借这些人性价值而得以健康壮大。<sup>③</sup>（谁能料到，到了21世纪初，美国会公然藐视人权，批准虐待行径？）但是，人性或者说进步价值一旦生根发芽，就能在世界慢慢立足生长，即便是在曾几何时对其排斥的体制土壤之中，例如俄罗斯。<sup>④</sup> 毫无疑问，主导权国家（曾经的西班牙、荷兰和大不列颠，以及现在的突出代表美国）崛起之后，由于帝国扩张，渐渐衰败，最终陨落，这一现象将会重现。<sup>⑤</sup> 然而有些地区（东亚、东南亚，也许还包括中美），此时此刻崛起的公共国家比起以前任一时期都更具团结性，大力捍卫公民权益。

很有可能，笔者也半信半疑，国家在发展初期曾帮助进步价值观找到自我巩固的途径。与此同时，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在帝国时代后期渐渐复苏，比起先前，社会更为开放公平（以其不断缩小的收入差距为判断标准）。

- 
- ①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276. 在主持世界穆斯林联盟期间，“费萨尔（Faysal）在阿美石油公司有个高级搭档，给他们在背后撑腰的是美国政府……在沙特阿拉伯东部，中情局特工詹姆斯。”
  - ② 也可引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的关系，或者荷兰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为例。
  - ③ 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革命与反革命，最终以冷战达到高潮，要想冷眼探讨这场演变实属困难。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人士更倾向于关注病态国家。相反，西方高校社会科学学者则认为，国家是社会秩序所需的前提条件。
  -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
  - ⑤ For this process, see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vin Phillips, *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2) .



欧洲帝国纷纷壮大的后五百年间，其中一个积极特征在于，理性意识的声音越发嘹亮，影响力也越发强大：西班牙墨西哥殖民地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84 ~ 1566）、荷兰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的穆尔塔图里（Multatuli, 原名爱德华·道维斯·戴克尔, Eduard Douwes Dekker, 1820 ~ 1887）以及英格兰反奴隶运动的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 ~ 1833）。这些声音的出现，让那些帝国开始舍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残暴行径和奴隶制度，这一进程虽然缓慢，但总算是切切实实。那些坚信只有民间社会才能帮助国家从根源上拨乱反正的人们看到，这些先锋人物成了20世纪大获全胜的南部民权运动和波兰团结运动的先辈鼻祖，人们希望这些运动能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不仅仅是在今天的美国。<sup>①</sup>

各类运动轮番上演，这充分彰显了软实力在帝国中的强大作用，其发起初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运动渐渐独立于国家权力体制之外。如果对比西班牙耶稣会士（Spanish Jesuits）、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British Methodist）和服务和平队（Peace Corps）的美国志愿工作者，我们就会发现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历时历代，软实力更多以人民为导向，立足民间社会而非依赖国家。

另一相关的发展在于，随着时间推移，帝国的文化对影响的接受力度加大，一改先前闭门之态。在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帮助下，天主教迅速传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之后美国占领了日本、韩国和泰国，佛教对美国的影响加大，其力度远远超过基督教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基督教传教活动复杂深奥，能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不过，在历史上的帝国之中，这一活动并不是直接由公共国家推动的。）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论述过，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

<sup>①</sup> Scott, *The Road to 9/11*, 245 - 260.



将宗教视为帝国衰败的永恒根源，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缺乏说服力，不过，在分析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上，凯文的论证有根有据。<sup>①</sup> 这便揭露出不同帝国的最惊人的共同特点，即扩张的动机实则赤裸裸的经济剥削。

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所有帝国都可被视为天文学上的巨大红星，它们处在核心、其不可一世的能量在边缘地带快速消散，已经到了陨落末期。荷兰帝国大可视为国家权力屈从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Dutch East Indies Company)，大英帝国效力于英国印度公司 (British India Company)、英国西印度公司 (British West Indies Company) 以及它们的副产品英格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sup>②</sup>

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 在慕尼黑向希特勒有条件投降，T. S. 艾略特 (T. S. Eliot) 向大英帝国发问：“我们的社会，曾为自己的优越高尚和正直不阿而备感自豪，……如今却围绕着一群银行、保险公司和工业企业团团转，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东西了吗？除了想着集团利益和保住分红，难道就没有更基本的信仰了吗？”<sup>③</sup> 艾略特看得一清二楚，20世纪30年代，伦敦的价值观已经致命性地背离了两千年的文化传统。

笔者个人的历史观是，在最深处，虽然鲜有记述，但我们正缓缓走向人性关爱和社会互动的 new 高度。<sup>④</sup> 这一进程有时是得益于公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2-3 (income disparity); 253, 386 (religion), citing Kevin Phil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2006), 9, 221-222, 226-228, 375.

② The Royal Charte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as enacted as part of the Tonnage Act of 1694 (Statutes of the Realm, VI, 483-495), An Act For Granting to Their Majesties [William and Anne] Several Rates and Duties upon Tonnage of Ships and Vessels.

③ T. 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2).

④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有根据的乐观情绪和米德 (Mead) 的看法相类似，不过没有米德对盎格鲁—美国资本主义的那种没道理的贡献心。



共社会的推动，有时也是因为国家，恰好是因为国家滥用权力操纵其他民众，并且对这一发展进程怀恨在心，由此出现反弹。这是信念之举——最为崇高——笔者仍旧坚信，尽管政治史上的暴力活动屡屡来犯，然而深度地进程将会更为长久和强大。罗马衰败，黑暗时代降临，可是从更深层的视角来观察，后来长久的积极发展让欧洲重生，实现了政教分离，远远好过东方死守的单一等级社会。<sup>①</sup>

## 公共国家和掠夺性资本主义

笔者目前所撰写的文字主要是脱胎并延展于自己先前著作的分析结论，尤其是《通向“9·11”之路》。在这部著作中，笔者将主要聚焦私人及联合财团对公共国家所构成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

掠夺性资本主义，即“玩弄”公共法律以实现个人非法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美国19世纪镀金时代（Gilded Age）强盗式资本家的诞生之日。<sup>②</sup>一段时期以来，为应对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的“新政”似乎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更稳定的新时代，工人工资和利益要经过双边均认可的仲裁程序进行谈判协商，工会力量强大，银行受到监管。

① 黑暗时代是充满自由和创造力的一段时期，如果读者对此有所怀疑的话，可以参阅小林恩·唐森德·怀特（Lynn Townsend White 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1899年，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将掠食视为文化进化的一个阶段，‘只有当掠夺式态度已经变成一种习以为常、众人推崇的一种精神状态，当斗争已经在当前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之时，……才能算是完成此阶段’。一个世纪苦苦挣扎，力图摆脱这一阶段，结果却重蹈覆辙。掠夺者无处不在。联合国、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组织的设立原是要控制掠夺者，结果反而被人控制。掠食再度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标志”。James K. Galbraith, “Taming Predatory Capitalism,” *Nation*, March 30, 2006,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60417/forum/4>.



“二战”之后，司法部想要强化对美国石油巨头的现行反垄断法治，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自此，新政被侵蚀。美国石油巨头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原本就不可小觑，从这场国内战局胜出之后，该力量再度加强。1946年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保护地中海，确保坦克能够安全运送沙特阿拉伯石油）以及1948年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开发西欧市场，销售中东多余石油）便能说明问题。

为应对令人忧虑的苏联威胁，中情局获取的大量秘密权力很快便出于金钱动机而被用来庇护美国海外企业。<sup>①</sup> 1953年，中情局首度推翻外国政府，其动机是出于防止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被国有化（通过这一过程，也为美国石油公司分了一杯羹），这绝非偶然。除此之外，各种行动，例如1954年在危地马拉（联合果品有限公司，United Fruits）、1964年在巴西（汉纳矿业公司，Hanna Mining）、1970年和1973年在智利〔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水莽铜矿开采有限公司（Anaconda）和美国国际电讯公司（ITT）〕，都毫不遮掩地支持美国企业的自身利益，这和19世纪英国海军为英国印度公司跑腿的情况一模一样。20世纪50年代末期，石油巨头在战争机器中的重要地位愈发明显，他们成功游说美国向东南亚派兵（之前在那里发现了新的近海油田）。<sup>②</sup>

在保驾护航下，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海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比起发达程度更高、管制力度更大的美国国内经济体，海外利润回报更高，投资者们对此也习以为常。随着美国工业在海外的重新排布，海外投资迎来了第二阶段。更加富有的上层阶级要求国内经济进一步放松管制，好让美国经济能为他们带来与在第三世界收获的等量盈利额。

进入21世纪，美国人民发现，国家经济现在落入掠夺性资本

<sup>①</sup> 笔者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提到，纽约金融上层社会先是规划中情局，之后便鼓动中情局支持政变。

<sup>②</sup>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40.



家之手，他们在遥远免税岛的近海石油收入不用纳税，可是由于其规模巨大，如果金融领域出现海外亏损，则要公共大众为之埋单。美国人民发现，我们现在的银行大而不倒，同样也因为规模大而可以逃避惩罚。我们看到，诸如花旗银行和纽约银行等美国大银行，它们滥用权力而臭名昭著，是受了惩罚，被罚了款，然而数额太低，压根不足以改变其运作。<sup>①</sup>（瑞士联合银行曾为美国人逃税出谋划策，最后同意向美国支付7.8亿美元的罚款，不过只有一名官员被判入狱——告密者<sup>②</sup>）

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笔者写道，必须区别对待上层阶级和世袭阶级概念，或者弗雷德里克·隆贝格所称的世袭“超级富人”的概念。<sup>③</sup>但是，随着公共大众被富裕的掠夺者蚕食，这种区别恐怕即将消失。

## 上层阶级和跨国统治机器

与公共权力衰退并生的是自治性右翼国际体制的显著抬头，它服务于国际财团的私人利益。这一体制的全球触角解释了，为何这两个和情报组织有关联的通缉罪犯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和阿卜杜拉·凯特里，能够一起在世界各地畅行无阻。

在进入美国前两年，1980年9月，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参加了世界反共联盟拉美分会——靠毒品收入维系的拉美反共联盟（Latin American Anti-Communist Confederation, CAL）——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举行的会议。1980年这次会议的主席是阿根廷将军吉列尔莫·苏亚雷斯·梅森（Guillermo Suárez Mason），

①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是最臭名昭著的一家银行，为毒品交易洗钱，它关闭之时，只有五位美国雇员和三位英国雇员被判刑。Cf. Scott, *The Road to 9/11*, 177-178.

②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6, 2009, B1.

③ Scott, *The Road to 9/11*, 275, Frederick Lundberg, *The Rich and the Superrich* (New York: Lyle Stuart, 1968).



是该市“肮脏战争”的组织者。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马里奥·桑多瓦尔·阿拉尔空 (Mario Sandoval Alarcón), 中美敢死队危地马拉“教父”, 罗伯托·德·奥布伊森 (Roberto d'Aubuisson), 不久之后, 此人便在萨尔瓦多组织了一次残暴血腥的镇压行动 (据说, 该国财富由土地寡头控制, 分为 14 个家族);<sup>①</sup> 约翰·卡布 (John Carbaugh), 以北卡罗来纳州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 (Jesse Helms) 助理身份参加此次会议。<sup>②</sup>

笔者将在下文再度论述世界反共联盟, 以及中情局特工在协助组建该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例如雷·克莱恩 (Ray Cline) 和霍华德·亨特 (Howard Hunt)。不过笔者坚信, 中情局和世界反共联盟以及拉美反共联盟之间的关联远比一般人所想的要更为微妙复杂。<sup>③</sup> 在笔者看来, 世界反共联盟是一个刻意与中情局保持距离的独立势力, 有时与帮助自己的中情局联手合作, 有时也与中情局对着干, 甚至暴力相向。

戴利·奇阿伊和拉美反共联盟会议的参会人员早已熟络, 他之前曾因为智利国家情报部 (DINA)、“飞鹰计划”与美国人迈克尔·唐雷 (Michael Townley) 联手开展了数次暗杀行动。正如先前所述, 智利国家情报部的恐怖行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毒品走私获取资金和人力。

戴利·奇阿伊和迈克尔·唐雷所执行的一次暗杀对象是在罗马的雷顿一家 (Leightons), 正如前文所述, 此次暗杀行动还牵扯前

① Robert Armstrong, *El Salvador: The Face of Revolu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37.

② Anderson and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147.

③ E. g., Mark Zepezauer, *The CIA's Greatest Hits*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4), <http://www.doublestandards.org/ciahits.html>. 当一个意大利委员会询问戴利·奇阿伊是否是世界反共联盟成员时, 奇阿伊坚决否认, 理由是他认为世界反共联盟“总给中情局打头阵” (<http://www.parlamento.it/bicam/terror/stenografici/steno26.htm>)。笔者试图证明, 事实远比此复杂。





中情局帮手、古巴人维基李奥·帕兹·罗迈洛 (Virgilio Paz Romero)。<sup>①</sup> 另一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谋杀智利将军卡洛斯·帕莱茨 (Carlos Prats)。<sup>②</sup> 唐雷曾通知他在智利国家情报部的智利联络员, 情报部另一位刺客恩里克·阿兰希比亚 (Enrique Arrancibia), 此人曾在 1970 年协助中情局谋杀智利将军施耐德, 他在 1977 年秋季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加利福尼亚, 目的是为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张罗银行业务。<sup>③</sup>

最有名的事件是唐雷和帕兹·罗迈洛, 而非戴利·奇阿伊, 共同策划组织在华盛顿谋害智利前大使奥兰多·勒特里尔 (Orlando Letelier)。<sup>④</sup> 绝大多数美国书籍都倾向于将罪名推给智利将军皮诺切特以及智利国家情报部部长曼纽尔·孔特雷拉斯 (Manuel Contreras), 后者最终因此次谋杀案在智利被捕并被判处七年监禁。<sup>⑤</sup> 不过自 1974 年, 中情局就一直为智利国家情报部提供培训, 还将孔特雷拉斯收为中情局的特工, 并两次安排孔特雷拉斯与中情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 (Vernon Walters) 在华盛顿见面。<sup>⑥</sup> 在接受审判过程中, 孔特雷拉斯指证道, 沃尔特斯将勒特里尔视为对美国的一大威胁, 唐雷在执行这次谋杀时得到中情局特工的帮助。当

① FBI Report, Directorat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NA), January 21, 1982,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8/ch02-06.htm>.

② FBI Report, Directorat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NA), January 21, 1982,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8/ch02-06.htm>.

③ FBI Report, Directorat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NA), January 21, 1982,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8/ch02-06.htm>.

④ John Dinges and Saul Landau, *Assassination on Embassy Row* (New York: Pantheon, 1980).

⑤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316.

⑥ John Prados,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423.



时，中情局认为美国人唐雷是智利国家情报部的特工，而在拉美地区，他又被视为中情局特工。<sup>①</sup> 华盛顿对“飞鹰计划”的了解和作用已经有不少作者著书论述，较有名的要数约翰·丁杰斯（John Dinges）、彼特·肯恩布鲁（Peter Kornbluh）以及帕特里斯·迈克谢利（Patrice McSherry）。<sup>②</sup>

值得一提的是，迈克谢利提供了详尽细节，其中涉及美国及中情局在拉美地区协调平行结构、提供虐囚和暗杀技巧培训、为“飞鹰计划”跨国合作提供基础装备和设施，以及官方为恐怖手段开后门。

然而，普拉多斯和迈克谢利都忽视了“飞鹰计划”中跨国恐怖主义的跨国企业维度。谋杀勒特里尔的阴谋之前由古巴流亡恐怖分子小组——古巴联合革命组织协会（西班牙文 *Coordinación de Organizaciones Revolucionarias Unidas*, CORU）策划，杀害勒特里尔的两位凶手为其成员。该协会的资金来自世界金融公司（World Finance Corporation），这家位于佛罗里达的金融集团还从事毒品和洗钱活动，头目是一位猪湾事件的古巴流亡分子。据戴德县（Dade County）的一位调查员所说，世界金融公司的其中一家附属机构完全是“中情局的前哨”。<sup>③</sup>

当时，由于美国政府无力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因此联合革命组织协会的那些古巴人被弃之一边；据说其中一位成员奥兰多·

①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6. Cf., e. g., “Michael Townley: Ex agente de la CIA relata la conspiración,” *El Correo de la Diaspora Argentine*, May 10, 2000, [http://www.elcorreo.eu.org/esp/article.php3?id\\_article=4329](http://www.elcorreo.eu.org/esp/article.php3?id_article=4329).

② John Dinges, *The Condor Years: How Pinochet and His Allies Brought Terrorism to Three Continents* (New York: New Press, 2004), 165; Peter Kornbluh, *T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③ 除此之外，古巴联合革命组织协会组织了古巴民族分子运动，还为智利国家情报部物色了刺杀勒特里尔的人选，据说，该运动的资金来源是海洛因走私，而这些走私活动则是智利国家情报部组织的。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The CIA, Drugs, and Armies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30–31, 33.



布斯 (Orlando Bosche) 曾于 1976 年提议刺杀亨利·基辛格。<sup>①</sup> 该协会在凯科 (Keck) 家族镍矿公司法肯多 (Falcondo, 全称 Falconbridge Dominicana, C. pro A.) 位于博瑙市 (Bonaó) 的度假村举行过一次会议, 主席是弗兰克·卡斯特罗 (Frank Castro), 据说他是掠夺性资本主义集团海湾和西方工业有限公司 (Gulf and Western) 的行政官。<sup>②</sup> 分析各种事实, 作者邵尔·兰道 (Saul Landau) 总结认为: “如果没有多米尼加安全势力和企业集团的同谋相助, 30 位古巴流亡恐怖分子要想在一个地方碰面, 恐怕不太可能。”<sup>③</sup>

我们借此一窥近海非政府影子的势力, 它们背后有私人财团和毒品资金的撑腰, 协助古巴联合革命组织协会开展恐怖活动。然而在一个更大的国际关系网中, 该协会的触角能够延伸至更多活动, 这恐怕主要是因为背后势力, 例如后来在中美地区的阿根廷“飞鹰计划”则得到中情局撑腰。<sup>④</sup> 实际上, 这股势力是美国统治机器跨国扩张的结果。

在勒特里尔事件中, 美国企业界希望勒特里尔从美国消失, 这一动机很明显。勒特里尔于 1976 年 9 月 21 日遇害,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 他曾发表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 解读军事执政团体如何将自由资本主义强加于智利。正如纳奥米·克莱因 (Naomi Klein) 所

① 哥斯达黎加政府后来表示, 布斯在哥斯达黎加瞄准的对象不是基辛格, 而是帕斯卡·阿连德 (Pascal Allende), 他是智利遇害总统的侄子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159)。

② Henrik Küiger, *The Great Heroin Coup-Drug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Fascism*, trans. Jerry Meld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186n18, citing *NACLA Report*, January-February 1978 (Falconbridge)。

③ Saul Landau, *They Educated the Crows: An Institute Report on the Letelier Moffit Murders* (n. p.: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978), 28。

④ “据迈阿密的一些消息渠道, 在博瑙市的聚会以及古巴联合革命组织协会的组建均得到中情局大力资助, 而且至少还得到 FBI 的默许, 因为卡斯特的安哥拉政策, 只要不牵连美国政府, 古巴联合革命组织协会可以自行给他些教训” (Dinges and Landau, *Assassination on Embassy Row*, 251)。



述，勒特里尔于1976年8月28日在《国家》（*The Nation*）上发表的文章对中情局支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构成了威胁，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为多个国家开出的药方——尤其是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智利，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均经历了中情局撑腰的残酷军事政变。<sup>①</sup>

勒特里尔详细记述了这个过程，“过去三年间，工薪阶层被掠夺去数十亿美元，全都落入资本家和地主的口袋”。

智利如今所贯彻的经济规划实现了一群智利经济学家的历史性野心，他们大多数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阿诺德·哈柏格（Arnold Harberger）的思想。这群人在智利被称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他们积极筹备政变之事，还说服各将军，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用军队所缺乏的知识资本去弥补军队的残暴酷刑。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披露，中情局的同伙帮助规划了经济措施，智利军事执政者夺取权力之后，这些措施立即付诸实践 [《智利经济病患的残暴药方》（*A Draconian Cure for Chile's Economic Ills*），《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月12日]。委员会证词说明，部分“芝加哥男孩”获得中情局研究赞助，撰写了一份300页篇幅的经济蓝图报告，在政变前递交给军事领导。因此，正如《华尔街邮报》（*Wall Street Journal*）（1973年11月2日）所述，夺取权力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要对智利经济动刀子，这也就容易理解了。<sup>②</sup>

①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7), 66-71, 76-78, 81-86, 98-100.

② Orlando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Economic Freedom's Awful Toll," *T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到了今天，勒特里尔遇害案的终极凶犯仍不为所知。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遇害为罗纳德·里根竞选铺平了道路，笔者曾在他处提到，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早就迫不及待要将里根推上舞台。<sup>①</sup>

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笔者试图说明，对于不少经批准的暴力和犯罪，人们往往将责任推到帝国统治或中情局身上，然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上层直接干预国家进程的结果。两个被曝光的典型是尼克松推翻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以及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对伊朗政界的灾难性干预，不出所料，这最终导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使馆官员被押为人质。显而易见，这两起暴力，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干预事件，最终夺取无数人的生命，其煽风点火者就包括尼尔森·洛克菲勒和大卫·洛克菲勒。<sup>②</sup>

基辛格曾与尼尔森·洛克菲勒和大卫·洛克菲勒一道，都和布热津斯基合作过，帮助被废的伊朗国王入境美国。此举完全无视卡特总统公开反对意见。国务院向卡特提出，如果让此人入境，将会导致美国大使馆面临袭击危险，卡特对此提醒深信不疑。<sup>③</sup>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公共国家所谓的权力垄断明显被更深度的权力踩在脚下，这其中就有洛克菲勒家族的上层势力。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21 - 22, 51 - 52.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39 - 42, 89 - 102;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12 - 13. 大卫·洛克菲勒在回忆录中近乎带着自豪骄傲的情绪记述道，在劝说基辛格和尼克松领导的白宫政府采取行动对付阿连德的过程中，自己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Scott, *The Road to 9/11*, 80 - 81, 309; Bernard Gwertzm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1979. 1976年阿根廷军事政变令当时在福特总统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大为高兴。基辛格安排政变经济部部长乔瑟·艾尔弗瑞多·马丁奈兹·德霍茨(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与大卫·洛克菲勒及尼尔森·洛克菲勒见面，商讨阿根廷私人化和外国投资的计划。据纳奥米·克莱因的分析，一年之内，“工资价值下降40%，工厂倒闭，贫困加剧”(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89)。



## 附 言

本书聚焦美国政策、统治机器和全球毒品网络。然而我们必须谨记，在这场博弈之中，还有其他力量去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与墨西哥和拉美地区毒品走私贩的关联，类似于二战时期德国秘密组织在那里的关系网。20世纪70年代，吉米·卡特消减美国对中美地区与毒品有关联的安全部队的援助，阿根廷利用手上的资产，例如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sup>①</sup>

在二战之后的亚洲，美国沿用了英国和法国在当地的帝国毒品网络。在中情局当道的时代，得益于缅甸鸦片，包括潮州在内的中国地区毒品走私黑帮三合会迅速富裕起来，到了今天，这股势力已经扩张并被北京接纳。

1993年4月8日，被英国统治的香港人渐渐开始习惯回归“祖国”的概念，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陶驷驹与香港电视记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新闻发布会。他明确指出，1989年为国家民主而在天安门游行示威的“反革命分子”不会被减轻刑期。说完这话，他便说起三合会：“对于香港三合会这样的组织，只要这些人是爱国的，只要他们关心香港繁荣稳定，我们就应该和他们连为一体。”陶驷驹甚至还邀请他们到中国大陆开展业务。<sup>②</sup>

---

① Ariel C. Armony, *Argent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ti-Communist Crusade in Central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xiii, 35-46. 卡特的人权政策被中情局腰斩。1987年，阿根廷情报特工利安多·桑切茨·莱瑟 (Leandro Sánchez Reisse) 向一个美国国会下属委员会证实，1978年阿根廷情报机构经中情局批准，在迈阿密建立了一个“飞鹰计划”基地。该基地代表阿根廷和中情局处理拉美地区的毒品收益洗钱和反叛乱行动 (Armony, *Argent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ti-Communist Crusade in Central America*, 46-47;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212-213)。

② Bertil Lintner, *Blood Brothers: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of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8-9.



类似于邓小平家族，陶驷驹和毒品走私三合会有不少私交，尤其是与新安义三合会。这倒并不一定是说此人本身腐败，而是“折射出‘挂钩’现象，即‘连接机制’。‘挂钩关系中的成员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搭档’，一位名叫邱旭路（音译）的中国南方商业顾问解释说。‘不过他们都承认，彼此有共同利益，有时为此采取相应行动’”。<sup>①</sup>

这种挂钩关系以这样或那样的模式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但是，中情局的毒品网络却有不同之处。战后毒品走私问题恶化——从缅甸到老挝，再到现在的阿根廷——中情局要负主要责任。美国战争机器原本是在西欧保护西方文明不受侵犯，然而在中情局的推波助澜下，它已经演变成竭力夺取中亚资源的侵略型机器。换言之，它已经成为美国战争机器力图控制亚洲乃至全球自然资源阴谋的有机组成部分。

---

<sup>①</sup> Frank Viviano, "Hong Kong Triads' New Frontie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5, 1997, <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ile=/chronicle/archive/1997/05/28/MN25477>. DTL. Cf. Fredric Dannen, "Partners in Crime, Part II," *New Republic*, July 14/21, 1997. "近期，香港著名中文报纸《苹果日报》(*Apple Daily*)披露，据传一位14K三合会成员宣扬，他和自己三合会弟兄们已经与共产党官员建立了‘绝佳关系’，还以盈利丰富的跨境卖淫合作为佐证。"

第二部分  
中央情报局与境外毒品





## 第二章

# 墨西哥、毒品、墨西哥联邦 安全指挥部以及美国

墨西哥毒品非法交易之所以盛行不衰，是因为精英人士能够从中获得利益。<sup>①</sup>

### 政府、缉毒体系以及语言

政府或团体与缉毒体系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已知体系和一种相对未知体系之间的冲突，也是有着明确定义的实体和周围相对模糊的环境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必然偏向从政府或团体的观点来阐述其相互作用，因为它们有备案可查。因此，在实际中我们更倾向于这样申明，如，“墨西哥有缉毒体系（缉毒经济）”。但是，这里动词“有”显然被人误解了。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也可以这么说，“缉毒体系有其政府”。这里的动词“有”也没有抓住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所在。在墨西哥，单独的缉毒体系中会有（在

---

① From U. S. government investigative file, in Jamie Dettmer, “Family Affairs Mexican Businessman and Politician Carlos Hank Gonzalez Allegedly Involved in Drug Trade,” *Insight*, March 29, 1999,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71/is\\_12\\_15/ai\\_54246287](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71/is_12_15/ai_54246287).



被人误解的条件下)两个或多个政府。<sup>①</sup>事实证明,它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彼时,让华盛顿感到威风扫地的是,其压根无法对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做出任何有效反抗。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缉毒体系几乎掌控了整个墨西哥政府。这便是笔者本章将要阐述的内容。<sup>②</sup>

## 墨西哥的毒品问题

在美国,要写一本关于墨西哥政治的权威著作难度很大。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最终允许人们将墨西哥写成是一个“缉毒的民主国家”,但很少有人能为墨西哥政府的腐败问题开出一剂美国良药,而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腐败已经困扰其多年。<sup>③</sup>

在本章节,笔者将尝试对美国与墨西哥毒品买卖携手抵制左派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阐述——美国此举与其在同时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做法如出一辙。问题的关键便是三头政治系统,在此系统中,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DFS)对该国的毒品走私活动给予了部分操控与袒护,而作为回报,其“兄弟”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会对前者予以部分管理与庇护。

- 
- ① 一种两侧主要用于进行走私和腐败活动的边界。例如,2006年4月,一位前联邦调查局领导在埃尔帕索受到指控,称其先后五次收受了一名墨西哥赛马场场主赠送的礼物,而墨西哥官方认定后者为墨西哥一个贩毒集团的成员(Reuters, April 12, 2006, <http://www.msnbc.msn.com/id/12292463>)。
- ② 笔者将在第六章提出类似的观点,“麦塔集团”在全球缉毒体系中,能够通过俄罗斯政府来控制具体的贩毒活动。
- ③ The term “narcodemocracy” received currency in 1995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Eduardo Valle’s *El Segundo Disparo: La Narcodemocracia Mexicana (The Second Shot: The Mexican Narcodemocracy)* (Mexico City: Oceano, 1995). Cf. Leonardo Curzio, “Organized Crime and Political Campaign Finance in Mexico,” i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Mexico and the U. S. — Mexican Borderlands*, John Bailey and Roy Godson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0), 85.



笔者并不是说该事件的整个过程都受到了美国的完全掌控。因为，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不可能完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产。然而，它能知法犯法却不受任何惩处，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其违法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保护。据墨西哥著名的记者曼纽尔·布恩迪称，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处于主导地位，以至于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一些情报只有前者才能看到。<sup>①</sup>

笔者从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说起吧。墨西哥非法的毒品买卖大约始于1914年，由三个事件发展而来，其中仅有一件跟墨西哥有密切联系。第一个事件是墨西哥革命，它使“墨西哥北部处于一种动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而大约在同时期的美国，毒品交易是违法的”。<sup>②</sup>第二个事件是中国革命，其间国民党党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全球毒品走私的财力支持。这主要是通过分布在多个国家的中国秘密社会组织或帮派来实现的，这些国家就包括墨西哥和美国。<sup>③</sup>第三个事件是美国在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缉毒法案。

最初，多数涉及墨西哥毒品走私活动的都是些“华裔墨西哥居民，尽管他们并非全部的走私犯”。<sup>④</sup>他们进行的很可能是双向跨境贩毒活动。1931年，一位墨西哥官员声称“毒品买卖活动从美国进入墨西哥的居多，反之则较少。此外，他和（美国）麻醉药品监管员哈维·史密斯一致认为大规模的毒品交易存在于边界的北部”。<sup>⑤</sup>

同年，在一次毒品大搜查中，一名流窜作案于全美的“协胜

① Manuel Buendia, *La CIA en Mexico* (Mexico City: Oceano, 1983), 24.

② John Bailey and Roy Godson, "Introduction,"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24.

③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62.

④ Luis Astorga,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rime,"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61, cf. 67-68.

⑤ Astorga, "Organized Crime,"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63.



堂”首领被拘捕，一并被捉拿归案的还有查理·卢西安诺妻子的同伙托马斯·佩纳奇。<sup>①</sup>

墨西哥是传统的鸦片输出国，其输出的鸦片作为药用及美国专利药品的同时，还为亚洲的非法鸦片走私提供货源。<sup>②</sup> 1937年以后，随着中国的鸦片输出中断，墨西哥的鸦片产量随之增长。同一时期，美国给予了国民党更多的庇护，罗斯福总统也对其予以支持。

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美国有意识地将毒枭，如拉凯·卢西亚诺，和其暴力行径作为抵制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武器。在墨西哥，我们看到美国把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和毒贩当作马前卒，进行暴力对抗拉丁美洲左翼的活动。

1985年，由于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涉嫌谋杀一名缉毒局特工，美国中央情报局终止了对其进行的保护。但是由毒品—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美国中情局构建的三角关系还继续存在，并一直持续到卡洛斯·沙尔林纳斯·德·戈塔（1989~1995年）及其继承人欧内斯托·塞迪略（1995~2001年）执政期间。

然而，时至今日，在美国，这些肮脏的关系还有多半被雪藏。<sup>③</sup>

## 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 遗产以及法律之外的约束

尽管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于1985年被撤销，但其“遗产”却得以存留。1989年，卡洛斯·沙尔林纳斯·德·戈塔当选为墨西哥

①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93.

② Elias Castillo and Peter Unsinger, "Mexican Drug Syndicates in California,"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200.

③ 这个墨西哥大毒枭在美国很少被提及，直到最近出现在处于中情局庇护之下的古巴移居者社区：艾伯特·西西里·凡尔克。Alberto Sicilia Falcón. Cf.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Drugs, Armies, and the CIA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33-34.



哥总统，受到了美国媒体近乎一致的称赞。作为少数的几个反对者之一，世界策略研究所的安德鲁·雷丁却指出沙尔林纳斯任命费尔南多·古铁雷斯·巴里奥斯为政府的秘书长（隶属墨西哥内政部门）。

古铁雷斯的公共生涯始于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政府秘书处的情报机构。1964年，他升任为该部门的主管。1968年古铁雷斯掌管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坐镇指挥了三文化广场（墨西哥特拉特罗尔科广场）大屠杀，数百名爱好和平的抗议者就此殒命。这次事件给墨西哥人的国民意识蒙上一层阴影。<sup>①</sup>

雷丁随后描述称：“这是一起多名专业警察和政府秘书处下属情报机构应对复杂情况的事件。”

最臭名昭著的机构要数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而最声名狼藉的三位发动者分别是费尔南多·古铁雷斯·巴里奥斯（1964~1970年），哈维尔·加西亚·帕尼瓜（1970~1976年）以及米格尔·纳扎尔·哈罗（1976~1981年）。

古铁雷斯—加西亚—纳扎尔组成的“三头统治”是“白色劲旅”阵营的幕后黑手。“白色劲旅”是一支秘密的武警部队，其在1972~1980年导演了数千名反对者的“失踪”，并有超过500名反对者彻底从人间蒸发。<sup>②</sup>

① Andrew Reding, "Mexico under Salinas: A Façade of Reform,"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989, <http://www.worldpolicy.org/globalrights/mexico/1989-fall-WPJ-Salinas.html>.

② 在雷丁的文章发表十年之后，古铁雷斯·巴里奥斯仍然是幕后操控者。1999年11月，他组织后来居上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弗朗西斯科·拉巴斯迪达的候选人“为人强势，但未经证实，他在十年前就斩断了毒品贩子的退路，时任锡那罗亚州州长，该州位于太平洋沿岸”（J. Michael Waller, "The Narcostate Next Door," *Insight*, December 27, 1999,（转下页注）



总之，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军事情报组和中央情报局都曾对这个国家施加了诸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而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多见。中央情报局没有利用其影响推广民主和公立制度，反倒借其支持反抗力量，并与众多越过法律管辖、对人民进行从上而下压制的深度国家建立联系。古铁雷斯和古斯塔沃·迪亚兹·奥尔达斯总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资产，他们曾对埋伏在屋顶的警察下达命令，向特拉特罗尔科广场的学生开枪射击。<sup>①</sup>

### 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 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毒贩

从1947年借助联邦调查局建立起，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便与毒贩们建立了日益体系化的联系；毒贩主力军为新招募的成员，他们没有因进行暴力活动而上政府的黑名单。<sup>②</sup> 缉毒局的特工认为，截至20世纪80年代，谁拥有了获得缉毒局认可的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识别卡，就意味着他可以凭此“一路绿灯”进行毒品走私活动。<sup>③</sup>

---

(接上页注②) [http://www.geocities.com/dmontero\\_trejo/Politica/The\\_NarcoState\\_Next\\_Door.htm](http://www.geocities.com/dmontero_trejo/Politica/The_NarcoState_Next_Door.htm) )。古铁雷斯·巴里奥斯的前任助手曼利奥·费边·贝尔托斯·里维拉，以索诺拉的长官身份成为了大毒枭阿玛多·卡里罗·福特斯的政治支持者。

- ① Jefferson Morley, "LITEMPO: Los ojos de la CIA en Tlatelolco," *Proceso*, October 1, 2006, in English as "LITEMPO: The CIA's Eyes on Tlatelolco,"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04/index.htm>.
- ② Sergio Aguayo Quezada, *La Charola: Una Historia de los 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en México* (Mexico City: Grijalbo, 2001), 74–75, 84;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04–105.
- ③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105, quoting from Elaine Shannon, *Desperados* (New York: Viking, 1988), 179.



有了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凭证作为挡箭牌，探员们便可以明目张胆地护送毒品出入墨西哥，并提供其他服务，他们甚至经常向有优先权的机构兜售被查封的毒品。随后的情报显示，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在进行着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将全国范围内的毒品走私活动整合成一个贩毒系统，并对其给予庇护。<sup>①</sup>

1985年，缉毒局特工恩里克·卡马雷纳尤里在墨西哥遭到谋杀，随后调查得到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都在包庇谋杀案的责任人，因为他们都是顶级的毒品走私贩。<sup>②</sup>

随着卡马雷纳尤里谋杀案的水落石出，以及其他的毒品丑闻相继曝光，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在名义上被撤销，但实则不然。最后两名安全部指挥官员均受到了指控并获罪。米格尔·纳扎尔·哈罗在圣地亚哥因走私盗窃汽车被检举，约瑟·安东尼·索瑞拉·佩雷斯也在1984年因谋杀前来调查的记者曼纽尔·邦迪亚而在墨西哥被批捕。<sup>③</sup>一个新的机构——政治和社会调查总理事会继而又宣告成立，虽然重操旧业，但它这次只向高级毒贩发放具有保护作用的证章。<sup>④</sup>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二者均干涉和抗议1981年在加利福尼亚对纳扎尔·哈罗德的控告，它们辩称纳扎尔是“中情局工作站设在墨西哥城的重要副本和线人”，从事“反恐、情报以及

① Terrence E. Poppa, *Drug Lord: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Mexican Kingpin* (Seattle: Demand Publications, 1990), 165.

②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A Tangled Web: A History of CIA Complicity in Drug International Trafficking,"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7, 1998, H2956, [http://www.fas.org/irp/congress/1998\\_cr/980507-1.htm](http://www.fas.org/irp/congress/1998_cr/980507-1.htm). Compare Aguayo Quezada, *La Charola*, 241.

③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36; Aguayo Quezada, *La Charola*, 247; Peter Dale Scott, *Minding the Darknes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0), 136.

④ Poppa, *Drug Lord*, 74, 166.





反情报的相关工作”。<sup>①</sup> 当司法部副部长洛厄尔·詹森拒绝继续对纳扎尔进行控诉时，美国圣地亚哥一位名叫威廉姆的律师当众揭发了其对于本案的干涉行径，但是，很快这名律师就遭到了解雇。<sup>②</sup>

飞行员维尔纳·洛茨做证称，尼加拉瓜反抗军在一家牧场接受训练。这家牧场位于韦拉克鲁斯附近，主人是受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庇护的贩毒集团的轴心人物拉斐尔·卡罗·昆特罗。<sup>③</sup> 此外，洛茨还和其他证人称，尼加拉瓜反抗军收到了卡罗贩毒团伙米格尔·费利克斯·盖拉多的资金援助，而后者每个月能将4吨可卡因运入美国。<sup>④</sup> 他们在洪都拉斯的合伙人胡安·拉蒙·马塔·巴列斯特罗拥有一条毒品走私航线，即塞特克航线，它由中情局挑选，是反抗军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境上的重要补给线。<sup>⑤</sup>

换句话说，美国中情局和墨西哥政府都在有意识地利用墨西哥毒贩及其保护者，把他们当作无形的资产。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阿富汗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因此，一个不可企及的体系得以建立，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对毒贩予以保护和帮助，反过来，美国中情局又对上述二者施以庇护。

随着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丑闻曝光，墨西哥的情报机关经历了第二次重组，国家安全调查中心由此建立，即便墨西哥制度革命党于2000年垮台，国家安全调查中心遭受的声誉损失也只不过其

① Cables from Mexico City FBI Legal Attaché Gordon McGinley to Justice Department, in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36.

② Scott, *Deep Politics*, 105, quoting from *San Diego Union*, March 26, 1982.

③ Cf.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41. “他对缉毒局探员说，中情局在经营这个设施，但它们会拿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做个幌子’。” Cf. Charles Bowden, *Down by the Riv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2), 148. “他离世后，有谣言称布恩迪亚将会负责在毒品业务、中情局和尼加拉瓜的反抗军之间牵线搭桥。”

④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41.

⑤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10, 42, 56-58, 98-100.



前身，即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少一点。<sup>①</sup> 2004年，国家安全调查中心对外承认，在“9·11”事件之后，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不受众人欢迎的安全程序问题上继续进行合作。<sup>②</sup>

2000年比森特·福克斯的当选，使人们看到墨西哥将有希望步入一个少腐败、少暴力的时代。然而，很明显的事实是，大型贩毒集团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垮台后继续顽固存活了下来。一些观察人士据此预测：“墨西哥将沦为下一个哥伦比亚。”<sup>③</sup>

正如《洛杉矶时报》2006年8月17日报道的那样：

去年，造成墨西哥数以百计伤亡的案件多与海湾贩毒集团……和杰奎因“El Chapo”古斯曼与伊斯梅尔“El Mayo”扎姆巴达领导的锡那罗亚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紧密相关。手榴弹、大口径突击武器以及准军事性攻击等逐渐成为残酷的毒品战争的代名词。警察和检察官被杀死后，还会被斩首示众。<sup>④</sup>

① “国家安全与调查中心还需付诸更多努力，才能掩盖其黑暗历史：国家安全与调查中心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前身是备受轻视的联邦安全局……费尔南多·古铁雷斯·巴里奥斯是国家安全与调查中心前调查员队伍中的高级间谍，被称为前执政党黑暗秘密的掌管者。另一个原国家安全与调查中心调查员豪尔赫·卡利洛·奥莱亚，其后来成为了莫雷洛斯州州长，但因被指控与犯罪集团有联系而离职，但至今没有被定罪”。Ricardo Sandoval, *Dallas Morning News*, May 27, 2003; <http://www.thestate.com/mlid/thestate/news/world/5951462.htm>.

② 巴纳德·R. 汤普森：“墨西哥将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Mexidata. Info*, January 12, 2004, <http://www.mexidata.info/idl17.html>, citing Mexico City, *Milenio*, January 7, 2004.

③ Ted Galen Carpenter, “Mexico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IA and FBI,” *Cato Institute*, Foreign Policy Briefing No. 87, November 15, 2005, [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5149](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5149). Cf. Ted Galen Carpenter, *Bad Neighbor Policy: Washington's Futile War on Drug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④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7, 2006.

2006年，有报道称国家安全调查中心在恰帕斯州和格雷罗州进行着一场“肮脏的战争”，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sup>①</sup>路透社在2010年1月曾估计称，墨西哥的毒品交易在短短三年内“已经导致大约17000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为健康的年轻人”。<sup>②</sup>

## 墨西哥毒品走私，美国集团 犯罪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

20世纪70年代正逢美国脱离东南亚、中情局甩开在该处的毒资之际，后者与东南亚的毒品走私者的关系被大量曝光。<sup>③</sup>与此同时，毒品走私、相关暴力活动以及中情局在墨西哥的涉足都骤然增加。中情局与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的毒品走私者的关系达到了历史最佳时期。<sup>④</sup>对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此时，对于上述各方在这一时期的关系而言，任何控诉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中要害。

“二战”后，墨西哥成为国际鸦片和海洛因流入美国与加拿大

---

① Carlos Montemayor, *La Jornada*, May 13, 2006; cf. *The Eyeopener*, Ryerson University's independent newspaper, January 18, 2005.

② Reuters, January 20, 20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N19153111>.

③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麦考伊丰富的脚注表明，他采访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要员吕西安·寇内因和杨东川。笔者个人作品《战争的阴谋》(*The War Conspiracy*) 在麦考伊之前发表，该书能够透露更多毒品贩运的细节，包括直到1991年，麦考伊才提到的关键人物保罗·海利维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笔者偶然遇见（彼时这样认为）一名作者和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与他们一番对话使笔者受益良多。

④ The best essay is by Jonathan Marshall, "CIA Assets and the Rise of the Guadalajara Connection," in *War on Drugs: Studies in the Failure of U. S. Narcotics Policy*, ed. Alfred W. McCoy and Alan A. Bloc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197-208.



的主要中转站。<sup>①</sup>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一些重要的国际成员，像美国的迈耶·朗斯基主宰，这些人与情报网络进行合作，并享有实际豁免权，战后墨西哥的毒品走私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sup>②</sup>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毒品走私方面的行家之一，向我们阐述了一种不同的情形。战后，毒枭迈耶·朗斯基凭借其墨西哥城众议院议员的身份，打开了进军墨西哥毒品市场的大门。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写道：“将墨西哥变成美国瘾君子的主要鸦片供应地的努力失败后，梅尔泽感到有点沮丧。”<sup>③</sup>麦考伊补充道：“他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梅尔泽集团与卢西亚诺的接触太少……而且也没有朗斯基的财力支持。”<sup>④</sup>

这不是我们从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FBN）的附录中了解到的信息，也不是从艾伦·A. 布洛克那获取的信息。前者称梅尔泽是迈耶·朗斯基的副手，黑帮组织的重要人物。他经常去美国以外的国家，譬如“加拿大、墨西哥、古巴、中国香港、日本以及菲律宾等”。<sup>⑤</sup>布洛克写道，传言称梅尔泽得到朗斯基和尼格·罗斯的资

①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Organized Crime and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s*, Hearings, 88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henceforward cited as *Narcotics Hearings*), 899. Cf. Jean-Pierre Charbonneau, *The Canadian Connection* (Ottawa: Optimum, 1976).

② 二战期间，朗斯基可谓是战略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处里面的主力，在纽约海滨和随后西西里岛进行的行动中，朗斯基能够充分利用拉凯·卢西亚诺提供的情报完成任务 (Scott, *Deep Politics*, 100, 145, 165)。其墨西哥的对手为科西嘉·保罗·蒙多里尼，后者同样受到法国政府的庇护。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323.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44.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443.

⑤ *Narcotics Hearings*, 81, 989. Lansky was an undicted coconspirator (and conceivably even an informant) in the case that convicted Meltzer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95).



助，广泛的财力支持来自墨西哥、哈瓦那、纽约和洛杉矶。<sup>①</sup>事实上，对于这个横跨东西海岸、哈瓦那和墨西哥城，众议员牵扯其中的毒品买卖集团，有许多的官方资料可供参考。<sup>②</sup>

麦考伊证明梅尔泽失败的主要证据是1949年梅尔泽被捕的事实（以及其随后的罪状）。但在暴力集团重组期间，有很多重要成员被捕，甚至被谋杀，尤其是朗斯基先前的密友——毕斯·西里尔（战后墨西哥毒品走私的重要人物，麦考伊对其却视而不见）。因此，被自己人逮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1936年，卢西亚诺被捕入狱，直至1962年他在那不勒斯去世前，他仍在国际地下毒品交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sup>③</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梅尔泽当作一个潜在的“黑市资产”，就像之前罗西亚诺的作用一样。1960年，美国中情局官员威廉·哈维为该局的暗杀计划（ZR/RIFLE计划）收集了一系列的潜在资源，其中就包括梅尔泽的档案。当时，对于（约翰）罗塞里来说，“梅尔泽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偶尔也会扮演冷血杀手的角色”。他是中情局用来对卡菲德尔·卡斯特罗实施暗杀阴谋的

---

① Alan A. Block, *Perspectives on Organizing Crim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1), 230-231.

② Scott, *Deep Politics*, 140-141. 保罗·罗兰·琼斯是墨西哥的一个财团代表，他在墨西哥开有一家赌场。在后来的一次重大缉毒行动中，琼斯受到了罪名指控，同时卷入其中的还有杰克·鲁比（后来杀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元凶）和他的哥哥海米（Scott, *Deep Politics*, 138-141）。在谈及美国政府如何停止其在墨西哥城的行动时，一名达拉斯侦探，乔治·巴特勒中尉录下了琼斯的话，“最起码要等到阿莱曼加入再说”。Butler notes, in records of 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 cf.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Appendix to Hearings, Vol. 9, 516.

③ 在卢西亚诺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死亡的30分钟后，联盟麻醉药品管理局的副局长，亨利·乔尔达诺就宣布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由于强大的黑手党成员在过去十年间将价值1500万美元的海洛因带入美国，所以官方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抓捕行动”。Charbonneau, *Canadian Connection*, 168, quoted in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247.



黑手党的核心人物。<sup>①</sup>

和麦考伊一样，1960年以前，比特·卢普萨曾对墨西哥的毒品政治不屑一顾。他描述道：“在还没有与上层社会进行沟通的必要之前，这些地方的土匪控制着市场，各自划地为王。”<sup>②</sup>但是，卢普萨这次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1931年，因涉嫌策划借道墨西哥进行国际毒品走私活动，墨西哥内政部部长卡洛斯·里瓦·帕拉西奥市引咎辞职。<sup>③</sup>1936年，海关的艾尔·萨尔夫一举粉碎了一个借道哈瓦那从上海延伸到墨西哥城的毒品买卖集团，抓获的毒贩里面包括墨西哥城警察局局长的伊斯坦布尔籍女婿。<sup>④</sup>该贩毒集团与艾利·艾利奥普勒斯关系密切，并与查理·卢西安诺和迈耶·朗斯基在业务上时有往来，《时代报刊》曾称其为“近年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贩毒集团之一”。<sup>⑤</sup>

路易斯·阿斯托加却给出了一个与卢普萨截然相反的说辞，其辩称，一百多年以前，在墨西哥毒品交易出现之初，这些“高级别的政客”就已经与其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sup>⑥</sup>他进一步声称，“从一开始，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毒贩既不是政治阶级的一员，也不是政客的教父或控制者，而是政治的追随者”。<sup>⑦</sup>

① Richard D. Mahoney, *Sons and Brothers: The Days of Jack and Bobby Kennedy*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99), 269, citing Mason Cargill Memorandum to the File, Subject: Project ZR/RIFLE and QJ/WIN, April 30, 1975, HSCA.

② Peter Lupsha, "Drug Lords and Narco-Corruption: The Players Change but the Game Continues," in McCoy and Block, *War on Drugs*, 177-179, 181.

③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104.

④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43, cf. 10, 46.

⑤ "Balkans Products, Ltd.," *Time*, April 3, 1933,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753621,00.html>.

⑥ Luis Astorga, "Drug Trafficking in Mexico: A First General Assessment," 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MOST, *Discussion Paper*, No. 36, UNESCO, <http://www.unesco.org/most/astorga.htm>.

⑦ Astorga, "Organized Crime,"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63.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亚洲当地的情报机构与贩毒活动之间的联系始于中情局之手，并受到后者很大的鼓励，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墨西哥才是其继承者。

## 美国中情局—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 毒品走私三角关系的起源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于 1947 年协助创建了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

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毒品走私者之间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结合，其产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利益的一部分可用于换取相关部门的庇护；另一方面，从毒贩的立场出发，其可作为一种牵制暴力和政治企图机制。<sup>①</sup>

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创建者——阿莱曼·弗雷德总统的朋友兼顾问卡洛斯·I. 塞拉诺上校，自身就与毒品交易脱不了干系。正如我们从巴里·凯尔教授口中得知的，创建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主要初衷不是为了制止毒品暴力；相反，其旨在制造、发动暴力，对抗左倾亲共分子。

阿莱曼所创建的最为重要的机构，即为国家安全理事会或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阿莱曼总统最有名、也是臭名昭著的顾问之一，卡洛斯·塞拉诺上校对此功不可没。

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效仿美国联邦调查局，其职责是“用所提供的设备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协助进行电话窃听工作”。1947 年中期，联邦安全指挥部雇用了联邦调查局的教员，对从军校新征募来的九名新兵进行培训，并将他们编进新的秘密警察队伍之中。墨西哥联

<sup>①</sup> Lufs Astorga, "The Limits of Anti-Drug Policy in Mexico," 428, <http://www.justiceblind.com/drugwar/mexicolimits.pdf>.



邦安全指挥部保留了一部分原属于内政部其他集团的职责。后的一个主要职责便是监视工人运动和左派分子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这项工作一直到1947年中期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生在1948年10月袭击墨西哥铁路工人协会（STFRM）总部的事件其实也不是什么巧合，而是第一次镇压强大联盟的成功尝试。此次镇压活动由卡洛斯·塞拉诺亲自坐镇，并由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成员推动执行。<sup>①</sup>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是否利用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和毒贩进行反共活动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国务院和陆军武官对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涉嫌毒品交易进行了谴责。但在1949年，中情局在墨西哥建立情报站时，对此却只字未提。

1947年9月4日，一位陆军副武官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对卡洛斯·塞拉诺从事的毒品走私活动进行了说明，并在上面罗列了塞拉诺、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官马赛利诺·因纳莱塔，以及副指挥官 Lt. Col. 曼纽尔·马格拉尔（曼纽尔市长加西亚）三位牵扯到毒品走私案件之中的人员。

报告称，曼纽尔控制了墨西哥城大麻的非法交易。该报告对某些疑点也进行了记录，即上述几人如何从美国政府那里申请到相关信息，用其摆脱竞争，达到控制毒品生意的目的。美国陆军副武官莫里斯·C. 霍顿将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比作盖世太保，因为它被赋予太多权力，而且这些经过征募、组成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人员身份都非常可疑。<sup>②</sup>

① Barry Carr, *Marxism and Commu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Mexico*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145. 当 E. 霍华德·亨特于1949年在墨西哥城设立第一家中情局办公室时，他接手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联邦调查局一无所有的办公室”，interview, <http://www.gwu.edu/~nsarchiv/coldwar/interviews/episode-18/hunt1.html>。

② Luf Astorga,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rime,”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72, citing U. S. State Department, Confidential Report No. 4543 of the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é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of Mexico, September 7, 1947, NARA Record Group 59, 812. 105/9-447.





霍尔顿的想法很快就被证实。1949年，一个背井离乡、身在洛杉矶的墨西哥记者拉斐尔·加西亚·土瓦在报纸上撰文称，卡洛斯·塞拉诺的汽车因运输鸦片在美国遭到扣押。<sup>①</sup>新成立的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马上将其拘捕归案，并将加西亚·土瓦遣返至墨西哥。后者在墨西哥被以莫须有的重婚罪名关押在牢，直到阿莱曼任期结束才得以释放。<sup>②</sup>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墨西哥城的中情局工作站于1951年将墨西哥城六个情报站的情况写进了一份秘密档案。在这些情报机构中，该报告对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进行了重点阐述，尽管报告也显示了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有些人员滥用职权，从事一些“非法活动，如贩毒”。

在一个传记增刊上，“组织和操控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塞拉诺被描述为“肆无忌惮地进行非法活动，包括毒品交易”。尽管他有这些不足，但在众多竞争比较激烈的部门里，中情局对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有竞争力和能力”的人员情有独钟。<sup>③</sup>

毒贩当然能对中情局，而非国务院管辖范围之内内的任务表现出声名狼藉的“竞争力和能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情局见证了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和墨西哥毒品走私者执行的一系列隐秘活动。有些由前者执行（如窃听苏联和古巴大使馆），有些由后者执行（如约瑟·艾戈兹，其在1974年“申请获得中情局的支持，实现了推翻葡萄牙政府的右翼阴谋”）。<sup>④</sup>

① *El Angelino*, edición especial, December 16, 1949; Aguayo Quezada, *La Charola*, 84. 司机是缉毒局二把手，最终成为一把手的官员胡安·拉蒙·古罗拉的侄子。Luis Astorga, *Drogas sin Fronteras* (Mexico City: Grijalbo, 2003), 285. Cf. Drew Pearso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9, 1948.

② Aguayo Quezada, *La Charola*, 84-86.

③ Aguayo Quezada, *La Charola*, 74-75, quoting (in translation) from CIA, "Mexico," SR-18, January 24, 1951, 57-58, 69.

④ Marshall, "CIA Assets," 198, 200; cf.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34, 86; James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s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360-363.



1949 ~ 1985 年，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中央情报局以及毒贩相互依存，三者的势力也日渐增强；与此同时，政治暴力和贫富差距也变得越来越严峻（稍后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 霍华德·亨特来墨西哥是因为毒品吗？

1950 ~ 1951 年，政策协调处墨西哥站的站长为 E. 霍华德·亨特。1972 年，亨特因策划了水门事件而臭名远扬。<sup>①</sup> 中情局对毒贩的利好评估使得人们开始质疑水门事件是否是由亨特搞的鬼。战略情报局在中国昆明设有 202 特遣部，该部由保罗·海利维尔掌管，而亨特正是这间小办公室里的毒品行家；探员在此工作获得的报酬便是鸦片。1949 年或更早的时候，海利维尔一直在努力为政策协调处购买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航线。后来，他成为迈耶·朗斯基和美国黑社会洗钱的银行顾问。<sup>②</sup> 亨特是否仍属于海利维尔的集团成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海利维尔集团于 1949 ~ 1951 年（我们会进行了解）在东南亚为政策协调处树立了良好的形象。<sup>③</sup>

- 
- ① 据广泛报道称，亨特曾于 1950 ~ 1951 年任中央情报局站长。See, e. g., “E. Howard Hun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E.\\_Howard\\_Hunt](http://en.wikipedia.org/wiki/E._Howard_Hunt); *Daily Telegraph* (London), January 26, 2007; cf.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07, Associated Press obituary for Hunt, *St. Petersburg Times*, January 24, 2007 (“station chief”)。然而，洛克菲勒委员会报告，确认亨特曾于 1950 ~ 1951 年在墨西哥城的中央情报局站点工作，但否认其是站长或负责站长职务。亨特后来澄清他实际上在政策协调处工作。Howard Hunt, with Greg Aunapu, *American Spy: My Secret History in the CIA, Watergate, and Beyond* (Hoboken, NJ: Wiley, 2007), 40. 依据现有证据推断，笔者认为亨特是政策协调处的站长。
- ② 昆明至少有六名战略情报局的探员——保罗·利维尔、霍华德·亨特、雷·克莱因、卢·柯南、约翰·辛洛布以及米切尔·韦贝尔，他们在战后继续为中情局开展与毒品相关的活动，Se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20, 207。
- ③ Se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1 - 62, 198. 主要资产有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和 CAT 航空运输公司（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即后来的美国航空公司）。



二战后，尽管亨特在取得古根海姆学者奖后前往了墨西哥，但他先前的政府经历并非源于拉丁美洲，而源于昆明的国民党。由此一来，国民党通过居住在墨西哥当地的中国人，深深地涉足墨西哥国内的鸦片走私活动，二者或许不无关联。1946年，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报道称：“最近在墨西哥召开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中，一大笔用来进行未来鸦片贸易的运转资金已经签署。”<sup>①</sup>

按照道格拉斯·瓦伦丁的说法，由于毕斯·西里尔的情妇弗吉尼亚·希尔经常出入墨西哥，国民党的鸦片贸易能够再一次经过墨西哥打入美国市场。在旅行期间，希尔和钟丽淇博士同行。钟博士是旧金山协胜堂的荣誉会员，也是二战时陈纳德在中国飞虎队飞行员的医生。希尔在墨西哥的拉雷多市开了一家酒吧，直接横穿梅尔泽在得克萨斯州新拉雷多的基地边境即到。<sup>②</sup>

二战前，朗斯基和国民党一直保持着联系。由于弗吉尼亚·希尔应其之邀来到墨西哥，并诱引到了墨西哥“一些顶级政客、军队高官、外交官和警官”，朗斯基就装模作样地负责监督这些运作。<sup>③</sup>据哈利·安斯林格提供的消息称，西里尔和弗吉尼亚·希尔还就该国北部的罂粟文化投资与墨西哥的政治家们进行过商议。<sup>④</sup>

霍华德·亨特在中情局墨西哥站只工作了两年，即1950~1951年。他于1954年返回墨西哥城，为中情局颠覆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的PBSUCCESS计划寻求政治支持。但实际上，亨特在墨西哥城所做的事情与这个有点出入：他为世界反共联盟创建了拉丁美洲分

①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73.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70-71. 希尔 & 钟都处于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的监管之下，但是二人尚未遇到任何不快之事。

③ Ed Reid, *The Mistress and the Mafia: The Virginia Hill Story* (New York: Bantam, 1972), 42.

④ *Novedades*, May 14, 1962; Astorga, "Organized Crime," in Bailey and Godson,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65.



支。其第一个化身——亚洲人民反共联盟（APACL），在1954年就由国民党开始运作了，与其同盟的还有韩国和一个名叫 Yoshio Kadoma 的日本战犯。他是一个毒品走私嫌疑犯，因与中情局以及美国威洛比将军进行合作而在1950年得到释放。<sup>①</sup> 在缅甸，国民党负责毒品走私的将军李弥有一个助手叫丁作韶，他早在1952年就尝试着招募缅甸部落加入正在筹划中的反共联盟。最终，有一支克钦分遣队参加了该联盟。<sup>②</sup>

1954年，亨特在墨西哥城聚集了一个由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右翼分子组成的政治联盟，意图在危地马拉反抗所谓的共产主义影响。<sup>③</sup> 亨特在墨西哥获得的成果要受到一个反犹太主义群体，即新法西斯主义者“泰科斯”的管控，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与右翼敢死队建立了联系，圈子里也包括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特工。<sup>④</sup>

### 亨特、克莱因、辛格逸伯、海利维尔、 朗斯基以及多诺万是第三力量的麦塔集团吗？

海利维尔在昆明的战略情报局分遣小队成员（海利维尔、亨特、克莱因、雷·克莱恩、吕西安·寇内因以及米切尔·温贝尔）

- 
- ① Scott Anderson and Jon Lee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New York: Dodd, Mead, 1986), 46-47. For Kodama and drugs, see David Kaplan and Alec Dubro, *Yakuza* (Reading, MA: Addison - Wesley, 1986), 66; Jonathan 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 - 1952," in *Drug Control Policy: Essay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William O. Walker II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0 - 103.
- ②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Silkorm Books, 1999), 134, cf. 234.
- ③ 豪尔赫·普列托·劳伦斯是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窃听的政客之一（Aguayo Quezado, *La Charola*, 308）。
- ④ Anderson and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79; Rogelio Hernández, *Zorrilla: El Imperio del Crimen* (Mexico City: Editorial Planeta Mexicana, 1989), 26.

中的影响力很大，不亚于二战后情报、三头政治的历史影响。<sup>①</sup>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昆明的另外一位毒品行家——约翰·辛格逸伯接管了世界反共联盟。吕西安·寇内因则做了越南官方情报机构的官员。<sup>②</sup> 米切尔·温贝尔则像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那样，继续为情报工作研发轻型武器，并且最终因毒品而受到起诉。<sup>③</sup>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世界反共联盟成员因毒品走私以及相关活动屡次遭到控告。在这些案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便是1980年所谓的玻利维亚可卡因政变。在这场政变中，一位顶级的毒贩在世界反共联盟的帮助下，将其堂兄弟安插进玻利维亚政府机关，并作为内政部部长。<sup>④</sup> 参议院顾问杰克·布卢姆描述了美国和阿根廷在这场政变中（借助世界反共联盟资产）所扮演的角色：

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人权问题成了公共优先考虑的一项内容，我们悄悄地鼓动其他国家作为我们的代理。附属委员会从阿根廷军政府前文职雇员莱昂德罗·桑切斯·赖斯那里提取了重要的证词。后者将他们为反共产主义所做的努力和盘托出。他告诉附属委员会，阿根廷军方对玻利维亚所谓的可卡因政变负有责任。他说，阿根廷军方情报人员运用他们所控制的

---

① Anderson and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54 - 55; Jonathan Marshall, Peter Dale Scott, and Jane Hunter, *The Iran-Contra Connection: Secret Teams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Reagan Er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65; Thomas Bodenheimer and Robert Gould, *Rollback: Right-Wing Power in U. S. Foreign Polic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Foreign\\_Policy/GlobalRollbackNetwork.html](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Foreign_Policy/GlobalRollbackNetwork.html).

②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203, 210.

③ Marshall et al., *The Iran-Contra Connection*, 62 - 64.

④ Anderson and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204;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45 - 46, 109. 1971年4月，世界反共联盟首席老挝代表，在巴黎纽约大道因携带价值1350万美元的60公斤高纯度海洛因而被捕（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63;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379）。



玻利维亚可卡因市场进行营利。他还向附属委员会透露，他在罗德岱堡要塞建立了一个洗钱场所，为这个秘密军队提供资金。他声称，我们的政府对他的活动予以支持。<sup>①</sup>

政变发生之前数周，佛罗里达进行了一次与此相关的缉毒行动，但以无条件释放毒贩约瑟·罗伯托·加赛而宣告失败，且未对毒贩进行任何控告。<sup>②</sup>（加赛的父亲埃德文是政变阴谋的关键人物。）

与此类似的是，危地马拉最为臭名昭著的马里奥·桑多瓦尔·阿拉尔空和萨尔瓦多的罗伯托·德·奥布伊森都负责在中美洲发展敢死队。<sup>③</sup>作为回报，马里奥·桑多瓦尔·阿拉尔空受邀参加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第一次就职演讲。

国际贩毒活动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利用无记录在案的毒资对抗左翼分子，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秘密政策。1947年在法国马赛市，美国工会成员欧文·布朗和科西嘉黑手党成员古埃里尼兄弟一起粉碎了由共产主义分子组织的码头工人大罢工，因此“为马赛市的海洛因实验创造了理想的环境”。<sup>④</sup>破坏罢工所使用的策略与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同年破坏

① 特别顾问杰克·A. 布鲁姆的证词，关于毒品走私和抵抗斗争的参议院情报听证会；*Washington Weekly*, October 28, 1996.

② Mike Levine, *The Big White Lie*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3), 35 - 36.

③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46; Marshall et al., *The Iran-Contra Connection*, 20 - 25; Loretta Napoleoni, *Terror Incorporated*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 19, 247.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59 - 60. 通过科西嘉黑手党，布朗也“接触到了意大利黑手党”（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112）。瓦伦丁（Valentine,）的主张证实，由于其无法解释为何会在科西嘉毒贩莫里斯·卡斯特拉纳的公司出现，20世纪60年代，布朗遭到了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的调查（362 - 363, cf. 270 - 274）；See also Douglas Valentine, “The French Connection Revisited: The CIA, Irving Brown, and Drug Smuggling as Political Warfare,” *Covert Action*, <http://www.covertaction.org/content/view/99/75>.



罢工的手法如出一辙。

1951年，或者更早些时候，马赛市的科西嘉人保罗·莫多利尼将墨西哥作为中转站，将海洛因运往蒙特利尔和纽约。<sup>①</sup> 乔治·莫雷诺·肖维是此次行动在墨西哥方面的主要联络人（据称他是1964年“墨西哥最重要的毒贩”）。<sup>②</sup> 在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内部网络中，拉斐尔·切瓦里上尉与其里应外合。<sup>③</sup>

1947年，据称威廉·多诺万通过意大利当局向发生在西西里岛的五一大屠杀提供财政支持。在这次由前底特律黑手党大人物弗兰克·科波拉组织的惨案中，有8人丧命，33人受伤。<sup>④</sup> 最近，弗兰克·科波拉被意大利当局驱逐出境，一同被驱逐出境的还有拉凯·卢西亚诺以及60多名美国黑手党分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据称是乘坐美国的一架军机离开的。<sup>⑤</sup> 他们中包括科波拉和卢西亚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和高级别的毒品走私活动牵连甚深。<sup>⑥</sup>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为西尔维斯托·卡罗拉的毒品走私贩，来自新奥尔良，1947年暂住在阿卡普尔科，据称就是此人帮助卢西亚诺一手创建了“墨西哥犯罪公司”。<sup>⑦</sup>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家出现了三大格局——当地安全武装、毒品走私活动以及美国中情局共同存在——除了墨西哥

① Charbonneau, *The Canadian Connection*, 69, 75;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328, 331.

② Charbonneau, *The Canadian Connection*, 209.

③ *Proceso*, August 5, 1985, 30; Peter Lupsha, "Drug Lords and Narco-Corruption," in McCoy and Block, *War on Drugs*, 180. 切瓦里被卢普沙描述为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的创始人。在创始官员的列表中没有拉斐尔·切瓦里，而费尔南多·罗恰·切瓦里在其中。

④ Gaia Servadio, *Mafioso* (New York: Dell, 1976), 125 - 28; Scott, *Deep Politics*, 174.

⑤ Scott, *Deep Politics*, 174.

⑥ Scott, *Deep Politics*, 174 - 177.

⑦ Wikipedia, "Sylvestro Carolla," citing Jay Robert Nash, *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Crime* (Wilmette, IL: CrimeBooks Inc., 1990), Vol. 1 (A - C).



之外，古巴、泰国（炮·斯里亚诺恩领导）、越南（陈丽春）、黎巴嫩、意大利，以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sup>①</sup>

多诺万在意大利以及泰国的活动，海利维尔在泰国以及巴哈马群岛的活动，朗斯基和亨特在东南亚、日本以及墨西哥的活动，以及布朗在法国的活动，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假设这些小派系和阴谋集团仅仅是中情局或美国在国外政治影响的一个个独立缩影。但是现在，它们可能还有更多的意义存在：这便是战后由朗斯基、海利维尔以及多诺万控制的第一个麦塔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该集团有能力操控毒品走私的资源，它同时兼备党派性质和（至少在朗斯基案中）经济性质。有时候它似乎拥有完整性和自己的企图。因此，该集团的存在不能归结于美国政府官方目标的驱使。

## 多诺万和世界贸易公司

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关闭，三年后，即1947年，中情局宣告成立，在此期间正是绝密且通畅的情报网络填补了这段空白，许多作品对此均有描述。艾伦·布洛克记叙了这一时期令人无法控制的情报亚文化。他称：“许多情报网络就从这种亚文化中衍生出来，并通过资金充足、信息流畅，但却并非政府固有机机构的形式表

<sup>①</sup>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9 (Lebanon), 162 (Thailand), 197 (Vietnam), and 476-477 (Pakistan); Jeffrey M. Bale, "The 'Black' Terrorist International: Neo-Fascist Paramilitary Networks and the Strategy of Tension' in Italy, 1968-1974"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70 (Italy); Warren Hinckle and William Turner, *The Fish Is 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314 (Cuba); Daniele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240-243. 甘瑟还提供了一个涉及西班牙情报（第106~107页）和法国秘密军队组织，或OAS（100）的中央情报局毒品三巨头的证据。截至20世纪80年代，其所安排的活动已在拉丁美洲随处可见（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vii-xii, 79-85）。





现出来。”<sup>①</sup> 约瑟夫·特伦托当时在华盛顿散布谣言，称杜勒斯“正利用美国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运作一个位于华尔街 44 号的情报机构”。<sup>②</sup>

在二战后的同一时期，因怀疑多诺万“涉足一个反共产主义、战前受石油和工业资助的情报机构（以私人企业的模式运行）”，中情局曾对多诺万进行过监视活动。<sup>③</sup> 1948 年 5 月，一位中情局官员偷偷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卡萨·德洛克称：“战略情报局多个早先在法国巴黎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旧部，在其前主管威廉·多诺万的领导之下，在同一地区进行着以私人商业为基础的情报活动……而且多诺万此前还曾动身前往巴黎对该集团的情报活动进行调查和监视。”<sup>④</sup> 马克·雷布林证实，多诺万在 1948 年确实有过这么一次出行；他还补充道，前战略情报局成员，包括米尔顿·卡茨、霍华德·亨特（都效力于马歇尔计划集团）、威廉·凯西，彼时都在为多诺万的法律公司工作。<sup>⑤</sup>

马克·雷布林还发现，多诺万私人赞助的世界贸易公司（WCC）可能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关注。世界贸易公司是一个跨国商业情报公司，由多诺万的伦敦合伙人威廉·斯蒂芬森先生在 1946 年创建。很多前战略情报局的旧部和英国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也为该公司效力。按照斯蒂芬森的挚友兼自传作家威廉·史蒂文森的说法，世界贸易公司的建立是为了“继续推进英美两国的情

① Alan A. Block and Constance A.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Global Ban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28.

② Joseph J.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Peter Grose, *Gentleman Spy: The Life of Allen Dulles* (Boston: Richard Todd/Houghton Mifflin, 1994), 295.

③ Anthony Cave Brown, *The Last Hero: Wild Bill Donova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821 - 822.

④ Quoted in Mark Riebling, *Wedge: The Secret War between the FBI and CIA* (New York: Knopf, 1994), 97 - 98.

⑤ Riebling, *Wedge*, 98.



报合作”。<sup>①</sup>从创立伊始，多诺万的法律公司就为世界贸易公司处理法律事务，多诺万本人于1947年亲自挂帅出马，担当主管职务。世界贸易公司得到了诸多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上流社会的资本家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尼尔森·洛克菲勒、麦克罗伊、拉塞尔·弗甘、莱斯特·阿蒙尔、悉尼·温伯格、理查德·梅隆、雷克斯·本森以及维克多·沙逊男爵。<sup>②</sup>

在自传作家史蒂文森眼中，世界贸易公司就是一个“商业情报机构”。<sup>③</sup>毫无疑问，在二战后支离破碎的经济体系中，世界贸易公司有自己的关于推销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划，即通过投资和代理易货交易等手段进行。<sup>④</sup>刚开始时，它似乎也有一个情报规划，到了1950年（或者更早），该规划就将秘密行动纳入其中（随后我们会了解到）。

1944年，杜鲁门决定撤销战略情报局。尽管多诺万对此深感失望，他还是继续以情报特工的身份和前战略情报局的探员保持联系。而这些人员现在隶属战略服务处，名义上受制于美国军方。此外，在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公司（连同其处于美国上流社会的赞助商）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进行接触。由此，在1950年的早些时候，一个有巴拿马背景的公司——（中国）国际贸易公司（CI）投靠了蒋介石，并给台湾提供军事武器，而在此时，国务卿艾奇逊还不允许美国官方向台湾提供援助。<sup>⑤</sup>布鲁斯·康明思质疑“（中国）国际贸易公司可能是一个由中情局持所有权的公司”。

① William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The True-Life Sequel to The King and I* (London: Constable and Robinson, 2001), 4.

② Brown, *The Last Hero*, 796.

③ Brown, *The Last Hero*, 795-800.

④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509-512;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09-110, 197.

⑤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511;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09-110, 197. 桑尼·法苏里斯，因利用国际商业集团副总裁的身份贿赂而受到指控，在潜伏十年之后，因与黑社会有关的古特马丑闻而浮出水面。



相关的事实是，负责巴拿马事务的中情局站位于墨西哥市，而亨特就在该站。<sup>①</sup>

此外，多诺万和中国国民党还有着私人交情。1949年，多诺万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法律抗争，迫使在香港的中国民用航空编队未进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盟友克莱尔·陈纳德将军想将这批飞机作为“袭击大陆的武器”。<sup>②</sup> 1950年，世界贸易公司操控了世界大豆价格，中国国民党也从中渔翁得利。<sup>③</sup>

鉴于随后全球毒品贸易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刺激下的毒品贸易的发展，笔者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以战后的第一个麦塔集团——亨特、多诺万、海利维尔、朗斯基强强联手，进行全球毒品走私活动——为鉴，延续其历史传统，引导美国政府与国际贩毒活动之间的关系。前者就经常在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贩毒活动，但会受到政策的庇护。

众所周知，现在中情局和其他大国的情报机构一样，对几乎全球范围内的毒品贩子都加以利用。笔者曾将这种利用关系描述为“政治边缘化”的典型案列，决定政府的秘密行动和政策的惯用伎俩是“迂回、混淆和欺骗，而非理智的讨论和负责的决策程序”。后来，笔者将故弄玄虚的政治放在深度政治更大的舞台上，才发现整个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不管故弄玄虚也罢，货真价实也罢，都具有强制实行的特点，而非要取得人们的认同。<sup>④</sup>

近来，笔者觉得或许看不见的领域会更加复杂。霍华德·亨特

①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511. Paul Collin, "Global Economic Brinkmanship," [http://www.totse.com/en/politics/corporatarchy/Valentine\\_global-economic170320.html](http://www.totse.com/en/politics/corporatarchy/Valentine_global-economic170320.html).

②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513; cf. William M.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Asia*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102.

③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09-10, 197;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50, 34.

④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xx; Scott, *The Road to 9/11*, 267-269. 如前所述，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使得这种区别已经模糊。



和昆明战略情报局其他成员在贩毒活动上面的通力合作——其中，保罗·海利维尔被指与迈耶·朗斯基脱不开干系——表明毒品贸易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合作更加隐秘，并且少有在案记录，在此阶段，系统的意识指向便来源于合法组建的政府。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非政府边缘政治：某些集团和机构决定行动和政策的实施，而国家对此则鞭长莫及。

能证明这一假设的证据寥寥无几。但是人们可以寄希望于蒙多里尼和卡罗拉来，二人均与卢西亚诺关系密切，他们获得国际多个机构，其中包括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对其贩毒活动的“庇护”之后，不久将会踏上墨西哥的土地。

### 强制执行、贩毒以及谍报研究中心的合并

1947年以后，墨西哥联邦安全部继续推行其反左暴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联邦安全部的官员米格尔·纳扎尔和埃斯特万·古兹曼征募并指示布瑞格丹·布兰卡进行相关活动，而后者被多人指控犯有虐待罪行，并被指是致使数千名学生和政治对手失踪不见的幕后元凶。<sup>①</sup>

与此同时，二人在供职墨西哥联邦安全部期间，（据美国政府中一位有名的见证人声称）均“为毒品走私活动提供庇护，并根据毒品走私量从中获利”。令人惊愕的是，1989年沙尔林纳斯竟任命上述二人去掌管墨西哥区警察局。<sup>②</sup>

此外，美国也在利用墨西哥的黑市毒品交易进行不法勾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时任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对墨西哥毒枭米格尔·菲利克斯·盖拉多提供保护，而后者每个月将四吨可卡因打入

<sup>①</sup> *St. Louis Post-Dispatch*, January 8, 1989.

<sup>②</sup>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1989.



美国市场。<sup>①</sup> 他的副手维纳尔·洛兹向缉毒局透露，菲利克斯预付给他超过 15 万美元，让他将毒品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抗军。与此同时，据官方估计（援引《新闻周刊》的文章），美国所消费的可卡因可能有 1/3 是由菲利克斯在洪都拉斯的供货商胡安·拉蒙·马塔·巴列斯特罗供应的。但是中情局和后来的国务院利用马塔的赛特科航空公司向尼加拉瓜反抗军运输毒品，即便马塔因涉嫌卷入 1985 年的虐囚事件，以及在墨西哥谋杀缉毒局雇员恩里克·卡马雷纳尤里而受到调查，其活动仍未停止。直到国会在 1988 年终止了对尼加拉瓜反抗军的援助，菲利克斯和马塔才被缉拿归案。<sup>②</sup>

随着毒品走私活动在这种保护之下不断激增，其所造成的腐败现象也蔓延到执法机关的各个部门，包括墨西哥联邦法警，负责处理国际贩毒活动的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邦区警察。<sup>③</sup> 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卡洛斯·萨利纳斯出任墨西哥总统时，甚至连“司法部长的办公室（PGR）也（有时会）有多达 95% 受制于毒品。因此，墨西哥的司法机关事实上已经成了贩毒的罪恶之手，成为政府与罪犯之间同流合污的中间媒介”。<sup>④</sup>

墨西哥联邦安全部借助某些更高级别的毒贩，以及受到管辖支配的新垄断联盟的帮助，展开了高级别的缉毒突击行动，并制定出一套制度化的流程。

秃鹰行动是墨西哥一项缉毒计划，由中情局的航空公司提供协助，旨在打击消灭反对者，此举为瓜达拉哈拉省建立垄断联盟做出

①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37, cf. 41 - 42.

②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41 - 42 and passim, quoting *Newsweek*, May 13, 1985.

③ Lupsha, "Drug Lords and Narco-Corruption," 185 - 187.

④ Peter Lupsha, "Transnational Narco-Corruption and Narco Investment: A Focus on Mexico," excerpted from Peter Lupsha, "Under the Volcano: Narco Investment in Mexico,"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Journal*, Spring 1995. *Frontline*, April 8, 1997, <http://www.eco.utexas.edu/~archive/chiapas95/1997.04/msg00066.html>.



了巨大贡献。<sup>①</sup>

在墨西哥，情报机构与贩毒的联系虽然紧密，但已不再局限于最初反共产主义的目的，其转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墨西哥与（如我们所见）美国强权的主要利益来源。

### 经济角度：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

人们有太多理由对墨西哥殖民地不再抱有希望，特别是南部乡村地区这种情况尤为严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数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剧。

一直以来，拉丁美洲都是全球较贫困地区中收入最不均等的一个。即便是到了1978年……该地区最为贫困的1/5人口获得的总收入也低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欧洲南部地区的5%，其仅有2.9%，相比亚洲东部地区，仅有6.2%，较之中东和北美地区，仅有5.3%，而较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仅有6.2%。<sup>②</sup>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美国的影响虽不是其始作俑者，但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却是使其加剧的罪魁祸首。在墨西哥，穷人获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逐年降低。1984年，最贫穷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7%；1989年，这一比重降到了18.7%；三年后，降为18.4%；而到了1996年，仅占16%。<sup>③</sup> 墨西哥的中产阶级也在减少，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60%，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仅为35%。<sup>④</sup>

① Elaine Shannon, *Desperados* (New York: Viking, 1988), 67, quoted in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38-39.

② Jorge Castañeda, *The Mexican Shock: Its Mean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222.

③ Castañeda, *The Mexican Shock*, 215;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96.

④ Clyde Prestowitz, *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78.



与此同时，1994年，墨西哥上《福布斯》排行榜的亿万富翁人数为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墨西哥共有24位亿万富翁。他们公开的财富几乎赶上了墨西哥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sup>①</sup>（其中毒品走私、美国市场意识形态和唯亲资本主义在这些财富聚积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和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除了非洲以外，“墨西哥的贫富差距在全球六个国家中排在首位”。<sup>②</sup>当然，不能就此认为墨西哥会一直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之中。不可避免地是，墨西哥的无业人员将会继续想办法从本国非法移民到美国去。

## 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外逃 以及墨西哥日益加剧的贫困

20世纪90年代，经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之后，墨西哥被迫使其货币贬值，此举导致了墨西哥人民收入降低、失业率攀升和极端贫困的加剧。贫困刺激了毒品生产，同时在事实上也宣告墨西哥传统的经济政策对于消除贫困效果不够理想。

毒品生产和贫困息息相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数穷困的农村人口会受到小农经济的缺陷和有效措施的缺失带来的影

<sup>①</sup> Castañeda, *The Mexican Shock*, 37.

<sup>②</sup> Anthony DePalma, "Gap between Mexico's Rich and Poor Is Widening,"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96. 今天，占墨西哥人口10%的最富有群体掌握了全国41%的财富，而底层劳动人口的一半却只能获得全国人均财富的16%。墨西哥政府承认，极端贫困人口已达2200万人，较之过去的15个月增加了500万人，这几乎相当于苏格兰的总人口数。2008年，一份来自经济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其30个成员国中，墨西哥的家庭贫富差距最大，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和美国。同样，墨西哥的贫困率也是最高的，超过20%（Jim Lobe, "Rich-Poor Divide Worst among Rich Countrie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October 21, 2008, <http://ipsnews.net/news.asp?idnews=44381>）。



响；再者，毒品产业的成长会带来一系列重要的“消极外部效应”，如暴力、腐败、国内和国际冲突，以及超出法律与正常经济范围的活动，这些都会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阻力……毒品生产和贫困互相为虎作伥：贫困和经济方式的缺失会刺激毒品生产，而毒品生产反过来会使贫困长期存在下去，并抑制经济方式的新生。<sup>①</sup>

引起墨西哥贫困现象的另一个因素，即强加于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而华盛顿一直支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便是其幕后推手。这个集贸易自由化、财政稳定性、私有化和自由资金流向的一揽子计划事实上很难服众；《华尔街日报》援引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称，“很明显，它是经济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sup>②</sup> 在经验方面，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主义学说是主张理想财政的凯恩斯学说的补充，后者在条件不适的情况下，如果施用过度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sup>③</sup> 但是不久，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便转而成为一个被过度实施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美国政府不太相信采用弗里德曼的学说能够指导美国进行投资活动，打开国外市场，因此便采取了干预措施。

如今，新的共识又呼之欲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远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会使其不断加剧。<sup>④</sup> 蔡美儿，曾供职于

① Chris Humphrey, "Narcotic, Economics, and Drug Production in the Southern States," [http://wbln0018.worldbank.org/lac/lacinfoclient.nsf/d29684951174975c85256735007fef12/63a3f4e71ce14d2385256dc500661aaf/\\$FILE/Mexico%20SouthStates%20Narcotics%20and%20Poverty.pdf](http://wbln0018.worldbank.org/lac/lacinfoclient.nsf/d29684951174975c85256735007fef12/63a3f4e71ce14d2385256dc500661aaf/$FILE/Mexico%20SouthStates%20Narcotics%20and%20Poverty.pdf).

②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30, 1998.

③ George Soros,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8), 117.

④ See, e.g., 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John Williamson,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stor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约翰·威廉姆森于1990年最早提出“华盛顿共识”概念。



一家美国银行，负责墨西哥的一个私人项目，对华盛顿共识双手赞成。在其书中，蔡美儿抨击了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墨西哥出现日益加剧的贫困危机的“美国促进计划”，称其是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一种西方国家很早就弃之不用的市场组织形式”。<sup>①</sup>她对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批评，称让市场脱离政府的管控，“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意义”。<sup>②</sup>正如乔治·贾斯达涅达的评述称：“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它十有八九不会在拉丁美洲持续多久。”<sup>③</sup>

事实上，“自由放任主义”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唯亲资本主义”则更能反映出我们日常看到的情况：由政府助推的全球化在国内对其亲信更为有利——如哈利伯顿和安然公司——不管谁入主华盛顿情况均是如此；而对接受方来说，对作为接受方的政府更为有利。

## 毒品、资金流失和美国银行

这种情况放在墨西哥身上再合适不过。墨西哥 12 个亿万富翁，俗称“墨西哥十二金刚”，便得益于沙尔林纳斯的项目（事实上，这些项目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产物）而富甲一方。这些‘有人管理’的项目要么违规，要么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自由化贸易”。<sup>④</sup>据美国国务院的伊丽莎白·卡罗尔称，有些私人项目“被毒贩子抢购一空，这样他们就可以洗掉黑钱，并借贩毒活动获取的利润进行

① 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14.

② Chua, *World on Fire*, 195.

③ Castafieda, *The Mexican Shock*, 239.

④ Andres Oppenheimer, *Bordering on Chaos: Mexico's Roller-Coaster Journey Toward Prosperit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8), 90-93. 银行辅助盗窃的问题当然不会局限于墨西哥。



投资”。<sup>①</sup>

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自由贸易的另一个特点，即资金运作管控的缺失，这是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1994年12月，墨西哥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国内国外资金回撤现象，导致“墨西哥公司估计高达700亿美元的市值损失，并引发了这些公司破产浪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近百万人失业在家”。政府数据显示，在随后的15个月里，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增加了500万~2200万。<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处于急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只有……毒品贸易”。<sup>③</sup>

对该资金流失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国内和国外的权贵们为了保护其在墨西哥的既得利益，将它们转换成稳固的美元资产。这种资金运转模式不仅仅见于墨西哥，在全球范围内也很常见。通常，受到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贸易自由化的获益对象并非该国本身，而是亲信精英阶层，那些含有各种要素的地方经济体，只要它们对亲信的地位构成威胁，其收入就很可能回归美国所有。说得更明白些，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改革所带来的成效是为了加强美国和其亲信精英阶层的联系，与市场团体关系不大。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美国银行的资金外流会持续地促进、刺激大量的外国资金流入自己的口袋。通常它们借助设立私有银行来实现这个目的，有时候也会通过避税港。1996年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最近有人披露花旗银行在帮助劳尔·沙尔林纳斯·德·戈塔（墨西哥前总统的兄弟）将一笔资产隐藏至安全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节目‘60 Minutes’在6月23日称，这些隐匿的资产可能价值达3亿美元”。<sup>④</sup> 沙尔林纳斯与花旗银行的丑闻引起了不同以往的关注，这是因为有确切证据显示其所涉及的部分

① Tom Barry, Harry Browne, and Beth Sims, *The Great Divide: The Challenge of U. S. - Mexico Relations in the 1990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69.

②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96.

③ Oppenheimer, *Bordering on Chaos*, 5, 164.

④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5, 1996.



资金是由墨西哥毒枭予以支付的。<sup>①</sup>

据专家分析，花旗银行帮助沙尔林纳斯运作并藏匿的资金是“蓄意”（或完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毒品黑钱。<sup>②</sup> 另一个更为人所不齿的例子是，墨西哥地区行政长官马里奥·维兰纽瓦·马德里因贩毒和诈骗勒索受到调查后畏罪潜逃，而雷曼兄弟打着他的名号到处进行疯狂的活动。为此，雷曼兄弟的一名员工遭到了指控，但该公司最后安然无恙。<sup>③</sup>

因此，美国对外国收入差距应担的责任已超出了华盛顿共识强迫他国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围。墨西哥的实例就揭示了美国主要银行在国外和国内与罪犯（如劳尔·沙尔林纳斯）狼狈为奸，获取非法利益（包括毒品利益在内）的内幕。它表现为美国银行强有力地参与，游说美国政府，以图扼杀针对沙尔林纳斯等多种洗钱行为的规范提案。

国会和财政部的记录文件已经使得多个记者得出结论，美国银行“绝对是全球最大的毒品贸易受益方”。<sup>④</sup> 据估计，每年流入美国的资金高达 2500 亿美元（不包括房地产转入资金），它们自然而然地被用来抵消美国每年约 3000 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但是，贩毒活动削弱墨西哥萌芽般的市场经济，并导致其他多

① Cf. Oppenheimer, *Bordering on Chaos*, 306 - 307.

② Arguments for this can be found in 1996 issues of *Money Laundering Alert*,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mexico/family/citibankaffair.html>. Cf. Stephen Bender, "American Banks and the War on Drugs," *Z Magazine*, March 2001, <http://www.zmag.org/ZMag/articles/mar01bender.htm>.

③ Cf. "Mexican Governor Pleads Not Guilty to Drug Charges in US," *AFP*, May 10, 2010. 银行辅助盗窃的问题当然不会局限于墨西哥。“尼日利亚前独裁者，萨尼·阿巴查将其国家的 1.1 亿美元存在花旗银行，并使之成为自己的财富。”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4), 274.

④ Stephen Bender, "American Banks and the War on Drugs," *Z Magazine*, March 2001; <http://www.zmag.org/ZMag/articles/mar01bender.htm>. The Minority Staff Report is at [http://govt-aff.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http://govt-aff.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



种不幸的出现，寡头政治毒品利益造成的资金流失仅仅是其中一种。法国经济学家蒲吉兰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墨西哥的毒贩就掌控了哥伦比亚到美国的毒品交易的半壁江山，其每年赚取的利润高达 30 亿~80 亿美元，比墨西哥的石油出口额还要多。由沙尔林纳斯发起的私有化在仓促中进行，这也为美国获取缉毒利益提供了良机，尤其是银行赚得盆满钵溢，其对多家公司的出售额达 120 亿美元。危机过后，这些银行被迫承担了超过 600 亿美元的债务，随后由政府为此埋单。<sup>①</sup>

美国的银行并非这种资金回收的唯一受益者。半个世纪以来，毒品交易所获得的黑钱被投资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房地产业，以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尤甚。<sup>②</sup> 美国政府也在其中捞了一把。1982 年，为了预先防止放账过多的银行可能遭遇的欠款不还危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了紧急援助贷款，在此之前，中情局先就毒品交易对墨西哥外汇的重要性进行了核实，明确其可用于偿还银行的贷款。<sup>③</sup>

## 墨西哥寡头政治、毒品走私及美国

在一个接一个国家中，唯亲资本主义——尤其是在货币监管缺失环节上——产生了很多超级富豪，他们掠夺国家的财富来充实自己。在墨西哥，一个新的独裁集团，类似于俄罗斯叶利钦的集团，在沙尔林纳斯的控制之下的私有化改革中显现出来。

① Guilhem Fabre, "Prospering on Crime: Money Laundering and Financial Crises," [http://www.mamacoca.org/FSMT\\_sept\\_2003/en/doc/fabre\\_prospering\\_on\\_crime\\_en.htm](http://www.mamacoca.org/FSMT_sept_2003/en/doc/fabre_prospering_on_crime_en.htm). Details in Guilhem Fabre, *Criminal Prosperity: Drug Traffic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Financial Crise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Cha 5.

②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98, 207.

③ 1982 年，在第一笔贷款发放之前，美国政府已经从缉毒局和中情局调查清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从毒品出口获得的收益“可能占到国家出口利润的 75%”。James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1135, 1181.



据墨西哥《改革报》(Reforma) 一篇文章的报道, 公共广播公司在线发行重印版, 政府报告披露, 早在 1987 年, 劳尔·沙尔林纳斯就与墨西哥的毒枭往来甚深。这些文件表明, 彼时, 沙尔林纳斯保证会对胡安·加西亚·阿卜列戈领导下的贩毒集团予以庇护。而作为回报, 据该文件称, 沙尔林纳斯从海湾集团的头目手中收取了“巨额的好处”。<sup>①</sup>

沙尔林纳斯—塞迪略旗下的一家墨西哥国民银行似乎就很乐意接受美国的这种庇护。1998 年 5 月, 在一次代号为“卡萨布兰卡计划”的行动中, 警方一举抓获了两名墨西哥国民银行的高级公职人员并将其起诉, 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称这次行动为“美国执法史上最大、最全面的毒金洗钱案件”。<sup>②</sup> (在内华达一家赌场, 事实上这是美国海关故意设的一个陷阱。彼时, 上述二人和其他墨西哥银行高级公职人员正在“激烈地讨论如何处理已经到手的肥肉, 即通过毒品交易获得的 5 亿美元巨款”。<sup>③</sup>) 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同样也查处了墨西哥国民银行 38 亿美元的资金。但是随后鲁宾离开了美国财政部, 担任了花旗集团的二把手, 此后花旗银

① Reforma ( Mexico City ), May 22, 1996,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mexico/news/reforma.html>. An article in *Proceso*, February 16, 1997. 基于经过严格审查的美国法庭文件, 借此可以还原当事人如下主张: 一位妇女声称其已经付给劳尔的堂弟约瑟·鲁伊斯·马修 30 万~100 万美元。Cf. Charles Bowden, *Down by the River: Drugs, Money, Murder, and Famil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2), 167.

② CNN, May 18, 1998.

③ Sally Denton and Roger Morris, *The Money and the Power: The Making of Las Vegas and Its Hold on America, 1947-2000* (New York: Knopf, 2001), prologue. 莎莉·丹顿随后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论述: “70 个国家, 美国, 银行卷入其中, 他们彼此勾结串通, 每一笔电汇和交易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涉及的银行包括华友银行、纽约银行、花旗银行、美国运通……克林顿总统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牵涉其中, 他们对整个调查工作百般干涉和阻难, 并且最后将其终止。” discussion at Taos Community Auditorium, October 12, 2002, [http://www.taosplaza.com/taosplaza/2003/pages/tmff\\_drugs.php](http://www.taosplaza.com/taosplaza/2003/pages/tmff_drugs.php).



行收购了墨西哥国民银行，卡萨布兰卡计划的指控也不了了之。<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持续对公共安全产生威胁，毒品交易本质上成为美国—墨西哥经济体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sup>②</sup> 然而，贩毒集团的头目遭到暗杀或被收监在牢，涉毒谋杀（包括对警官实施斩首）的案件持续增加，从2001年的1080起，到2008年的6200起，到2009年已经有超过6500起此类案件发生。<sup>③</sup>

① Interview with Al Giordano, *Multinational Monitor*, April 2002, <http://multinationalmonitor.org/mm2002/02april/april02interviewgiordano.html>.

② 据信墨西哥联邦（贩毒）集团每年就能赚170亿~300亿美元。Richard Parker, "U. S. Fickle on Anti-Narcotics Aid," *ABQ Journal (Albuquerque Journal)*, <http://www.abqjournal.com/news/drugs/2drug3-5.htm>. 这种估计似乎与官方估计的美国毒品消费量同时出现，每年有640亿美元（Prestowitz, *Rogue Nation*, 259），根据墨西哥的估计，考虑到美国和墨西哥双向的交易量，1996年前9个月总额就已经达到940亿美元。

③ CNN, July 9, 2009; Fox News, January 12, 2009.

### 第三章

## 行动方案：美国与泰国及 缅甸的毒品走私

可以断定的是，正是美国当局出于更大的政治原因，时不时地唆使才导致了海洛因非法走私的猖獗。理解了这层含义，就能启示将来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亚洲的毒品走私活动。<sup>①</sup> 如果利用鸦片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种模式就显而易见了。我们就对鸦片加以利用。<sup>②</sup>

### 泰国和毒品：个人的开场白

如今，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在1950年11月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一项行动，代号为“行动方案”，准备让缅甸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开始对云南发动进攻。同样清楚的是，这支国民党将军李弥麾下所谓的第93师已经深陷毒品走私活动而不能自拔。最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杜鲁门总统最终批准对由来已久的毒贩提供援助。

---

① William O. Walker III, "Drug Trafficking in Asia,"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34, No. 3, 1992, 204.

② William Peers [OSS/CIA] and Dean Brellis, *Behind the Burma Road*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64.



本章节旨在探寻杜鲁门总统利用毒品援助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始末。在深度历史中，它将尝试提出可查文献档案无法最终解答的疑问。但是，许多相关档案主要是关于政策协调处（OPC）如何发起这次行动方案的档案，公众仍无法一窥究竟。其他档案，如世界贸易公司或曼谷的威利斯·伯德进出口公司，即便我们手里有它们的资料，获得的信息也乏善可陈。而某些重要事件，如泰国毒品垄断集团是通过何种方式很快打入波士顿的，也许压根就没有记录在案。

本章节将着重阐述战后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全球毒品贸易的发展历史。凭借必要的美国援助，其中最主要的是空运和武器装备，李弥的非正规军很快就投入了战斗，按照其美国监督员理查德·史迪威（政策协调处远东指挥官）的说法，“他们掌控着全球近1/3的毒品供应”。<sup>①</sup>伯顿·赫什转达了史迪威的观点，并补充道，李弥的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中情局重要的商业资产”。

为了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中展示这些材料，笔者必须在此做出一项个人声明。笔者在泰国生活了超过18个月，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因此，就个人来讲，很难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在撰写19世纪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针对当地人的屠杀惨案时，笔者经历了一些困窘情况。这些事件想起来都是一场噩梦，但笔者现在生活的环境与此息息相关。

在来泰国之前，笔者写过美国在该地区的独裁政治，以及缅甸在流向泰国的毒品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通往“9·11”之路》中写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因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但我所见到的泰国人的生活方式使人着迷不已，并且能让人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

<sup>①</sup> Burton Hersh, *The Old Boys: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A* (New York: Scribner's, 1992), 300.





笔者要讨论的内容可能读起来像是在罗列美国对泰国历史施加的不利影响，但有两方面内容可能会遭到人们的误解。第一个是中情局和牵涉毒品的秘密阴谋清单，它仅能代表美国对这个国家影响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涵盖教育、医疗、科技援助，尤其是两国人与人之间之间的联系等软实力的影响。

另一个方面则更加难以理解。尽管在某些细节问题上美国人做得不甚光彩，但其介入对泰国过去 50 年的重大发展功不可没。相比之下，泰国的四个邻国正深陷冲突和杀戮中不能自拔。用一首诗来形容笔者看到一张图片的震惊感觉吧，它与毒贩军阀在美斯乐的国民党鸦片基地有关。

段将军和两个面带微笑的和尚

他们穿着藏红花长袍

我暗忖

难道我错了吗？

为何这些存活下来的人儿

就没有微笑的权利？

尽管在不远的柬埔寨

他们的尸骨堆积如山……<sup>①</sup>

不列颠和法兰西

遗留的殖民地烂摊子，

那就是

贫穷与仇恨<sup>②</sup>

以后的历史学家将会对中情局的可信度争论不休。我们应该明

<sup>①</sup> Peter Dale Scott, "Mae Salong," in *Mosaic Orpheu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45.

<sup>②</sup> Peter Dale Scott, "Wat Pa Nanachat," in *Mosaic Orpheus*, 56.



白，在泰国，某些由中情局暗中支持的镇压活动，其实就是一些虚假行动。因此，在过去数十年中无法盛行的非暴力活动，以后也不会流行。

后面的两个章节将对泰国进行讨论。本章涉及杜鲁门总统统治的内容，将对美国给予泰国边境巡逻警察（BPP）的支持进行阐述，后者是泰国以及东南亚多数国家国防的主要力量。第四章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引领的时代作为开始，将围绕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的作战单位，即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创建展开，很明显，后者是作为一支进攻性的边境作战单位来建立的，并在老挝和其他地方执行任务。中情局对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的帮助是否有助于东南亚局势的稳定，这点还存在争议。不可否认，老挝和印度支那最终的战争正是由美国对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援助一步一步煽动起来的。而泰国的边境巡逻警察和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财政援助则来自贩毒活动。

最后请注意：比尔·莱尔，接下来内容中的关键人物，将会以核心人物的身份出现在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发展之中，该部队受中情局支持，但其最终的财力支撑则来自毒品走私活动。这仅仅是比尔·莱尔的一面。比尔·莱尔和一家颇有影响力且具有英泰背景的家庭结亲；同时，他也是美国政策在泰国和（老挝）赫蒙族地区所急需且能够掌控局势的调解人员。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谦逊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但实际上，他狡黠多变，洞悉美国在亚洲活动目的的优势和局限性所在。<sup>①</sup>

① Vietnam Archive, Oral History Project,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Texas Tech University, December 12, 2001, <http://www.vietnam.ttu.edu/star/images/OH/OH0200/OH0200-part1.pdf>. 莱尔也招募到了威廉·杨，后者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在泰国—老挝的山区部落长大，说当地语言。杨也致力于改善山区部落与泰国政府的关系。在这项工作中，阿萨文·威利斯·伯德，即威利斯·伯德的美籍泰人儿子（莱尔的堂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作为主要人物出现。



## 概 述

20 世纪 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来重建一个更加和平、有秩序、法治与开放的世界。甚至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都达成了一致，通过在中立机构联合国进行斡旋来解决彼此之间严重的分歧。彼时，美国将充足的财富投入到了欧洲满目疮痍的战后重建工作上，并且随后出资建立了许多国际项目，如为刚从旧殖民地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医疗和农业项目。

从战后初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寻求自己的代理人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革命活动。这些代理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经被人们忘却，如乌克兰游击队，其最初受希特勒的纳粹党卫军组织控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借由政策协调处背景的组织与苏联进行斗争，结果以必然的失败告终。有些代理人，如意大利和马赛的黑手党组织，很快就摆脱了美国的援助，在事实上成为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地方巨头。

但是这些早期的代理部队之一，即缅甸和泰国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民族主义者，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还在持续地接受美国的援助。和欧洲的黑手党以及日本的黑社会组织一样，这些毒品代理人的优势便是其隐秘性，他们主要靠毒品交易谋生，并且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

最初，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对该项目的支持是通过在东南亚地区重建一个贩毒集团来实现的，此举使得中情局惯于利用以贩毒为生、没有记录在案的人员，得以在可能威胁到美国获得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地区进行斗争——如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的印度支那，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富汗和中美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的哥伦比亚以及 2001 年 7 月的阿富汗。<sup>①</sup>

<sup>①</sup> I write about this practice in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



由于与美国官方反对毒品的政策相左，美国对于毒品代理人的扶持只得秘密进行。这就意味着实际上主要项目和长期结果要受到美国情报部门一小部分人的发起和掌控，美国政府几乎毫不知情，如今美国大众对此也是知之甚少。这些同心同气的知情人士明目张胆地和毒贩以及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合作，同时他们也是受到美国高层精英集团支持的棋子成员。

美国对于缅甸国民党贩毒走私部队的利用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政策协调处为国民党军队设立的基础设施（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参见下文）受到了威廉·多诺万与艾伦·杜勒斯的支持，经过扩张和改造，在泰国发展并支持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游击部队，即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虽不及国民党部队那么为世人所知，但其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却比国民党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在保证泰国独立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决定利用其在老挝和越南进行活动。由此，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早期成功使得美国由最初的半遮半掩，到最后的公开透明，逐渐介入了老挝和越南的战争之中。我们将会了解到，根据美国方面的组织者詹姆斯·威廉（比尔）·莱尔的说法，和国民党部队一样，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初期在一定程度上靠毒品走私活动谋生。

简而言之，一部分美国人，可预见又近乎难以停止地，惯于寻求尚无在案记录的毒品走私者作为资产。美国的政策旨在通过联合国来寻求国际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但上述情况却是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例外情况。这凸显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对秘密机构（即政策协调处）的冷战分子持反对态度，后者将这些毒品资产作为其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一个小小的美国官僚集团即便遭到国内的反对，也能获得高层的幕后支持，并展开一些超出官方最初准许范围的行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发生多次。1979 年，这种具有明显一致性的模式在阿富汗问题上一再上演；在泰国，这次官方提出的最初目标是为当地政府提供防卫力量，并牵制对其产生威胁的共产党军队。目标又一次



得以实现，但是未能幸免的是，获得胜利的初始防御性阵营却转而产生了一个具有攻击性的扩张集团，并最终发展成为如今越来越多的、让我们感到绝望的伊斯兰问题。<sup>①</sup>

美国对国外日积月累的介入——包括防御性的（获得了成功）和进攻性的（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已经对自身产生了影响。成功的行动使得美国举步向前：一般人都会从中吸取教训。而失败的行动（如越南战争）则更加使人们铭记成王败寇的原因何在。

因此，分析这种最终导致代价“巨大的失败、周而复始的成功”模式非常重要，它也能让我们如释重负。因为很明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想要获得帝国的过度扩张，就得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基于此，笔者将尝试从二战后的泰国，到如今被美国占据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东南亚地区毒品代理人和操控其秘密集团的关键节点展开阐述。

## 中情局与泰国毒品联系的始末

要理解二战后中情局对东南亚地区毒品走私活动的介入，我们还得追溯到19世纪大英帝国的鸦片政策。暹罗政府禁止吸食鸦片的努力止步于1852年，彼时，“蒙克库特国王（拉玛四世）迫于英国的压力，建立了一个皇家鸦片特许农场，后来将其租赁给了暹罗的中国人”。<sup>②</sup> 三年后，依据《鲍林条约》的不平等条款，暹罗被

① 可类比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历史，尽管此处不易发现其相似性，但最相关的一点是，美国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对科威特提供的成功防务，美国因此面临国内极大的压力，而新保守派集团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计划领导下的新世纪美国集团，从本质上将美国推向了另一个回降阵营，即深陷伊拉克泥潭而不能自拔。

②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166-167;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101; Bertil Lintner, *Blood Brothers: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of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234.



迫接受英国享有鸦片免税的权利，并且根据其附加条款，该地区的鸦片只能出售给皇家特许农场。1856年，暹罗又与美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该鸦片农场成为皇家政府和经营该农场的中国秘密组织或三合会财富与力量的源泉。通过“将现代的消费者所熟悉的现金经济引入农民的观念”，鸦片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也使暹罗建立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sup>①</sup>

直到其最终在1959年被禁止时，鸦片种植产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占据了暹罗政府收入的20%。<sup>②</sup>这也正是政府在1907年禁止中国商人种植鸦片，而将其转为垄断产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暹罗政府意在借此削弱中国秘密社团（三合会）的影响，并鼓励中国人迁往暹罗。结果，三合会的力量在20世纪受到了广泛削弱，仅在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中国时得以复苏。此时还在进行秘密活动的国民党已经成为泰国中国人社团中最为强大的力量，与戴笠麾下的国民党情报网络以及毒品走私活动同时进行着联系。<sup>③</sup>

尽管暹罗农场鸦片的官方来源是印度，但是因为其价格相对较高，所以暹罗越来越多地从缅甸东部的掸邦走私鸦片。20世纪初，随着鸦片的非法走私愈演愈烈，英国在缅甸禁止食用掸邦鸦片，但继续对其征税。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鼓励掸邦将鸦片走私到泰国市场。<sup>④</sup>

1942年，泰国对英国宣战，掸邦鸦片成为其谋取暴利的垄断行

- 
- ① Carl A. Trocki, "Drugs, Taxes, and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 - 1952*, ed.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99.
-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02; James C.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1850 - 197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7.
- ③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166 - 67, 236 - 244, 264 - 265.
- ④ Cf. Robert Maule, "British Policy Discussions on the Opium Question in the Federated Shan States, 1937 -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3 (June 2002): 203 - 224.



业的唯一货源。同年，泰国北部（Prayap）的军队入侵了盛产鸦片的掸邦，以此配合日本将英国赶出缅甸的行动。<sup>①</sup> 1943年1月，日本将要战败的局势越来越明显，泰国总理披汶·颂堪启用了景栋的北部军队，利用其对掸邦鸦片的掌控打通了与中国军队的关系，尽管上述二者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彼时中国军队已经撤回了中国云南与缅甸的前线阵地。<sup>②</sup> 其中有一支部队便是第93师，驻守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sup>③</sup> 由于双方均在鸦片走私活动中获利颇丰，因此很快便达成一致，停止了敌对状态（政策协调处的一位观察者称，云南的军阀将军龙云和其表亲卢汉，即第93师的指挥官，彼时二人正忙于将鸦片从云南边境走私到缅甸和泰国去<sup>④</sup>）。

由哈珀·昆仲（卡波·昆扎拉）中校领导的一个政策协调处的自由泰人组织（也称自由泰国运动），表面上受命于昆明的政策协调处，

① 人们经常看到掸邦北部军队入侵的消息，认为这是为了给日本入侵缅甸提供支持。事实上，日军（可能对掸邦的鸦片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数月内一直拒绝泰国军队展开行动，直至受到东京政府的上层政治压力被迫接受其援助。See 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 and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1940-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115-117.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05. Cf. E. Bruce Reynolds, "'International Orphans'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8 (September 1997): 365-88: "为了和日本人保持距离，披汶总理开始通过掸邦的泰国军队秘密与中国国民党进行接触，旨在从根本上摆脱日本人并和中国国民党建立军事联系。" 由于受到了总理披汶的指示，景栋的泰国北部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从1943年1月起，就开始象征性地释放囚犯，随后熄火停战。"Thailand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http://www.geocities.com/thailandwwii/shan3.html>.

③ 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The Free Thai, OSS, and SOE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0-171.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2-163, citing Archimedes L. A. Patti, *Why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16-217, 265, 354-355, 487. 龙云的儿子龙兴向詹姆斯·米尔斯否认其父亲是走私贩："我的家人是最大的运毒者。说我父亲是走私贩简直是荒谬。过去，政府对鸦片征税，这倒是真的。过去100年来一直如此。你不能把这个罪名强加在我的家人身上。" James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s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737.



实际上却两面三刀，在1944年3~4月与双方秘密进行联络。<sup>①</sup>当哈珀抵达第93师的总部时，“他发现南部云南和掸邦（缅甸）之间从1943年初期起就已经达成了在边境地区的停火协议，且双方约定，泰国的对手应不定期地给第93师的长官赠送威士忌、香烟和枪炮”。<sup>②</sup>

得到政策协调处督察员尼科尔·史密斯的允许后，哈珀从勐海给自己以前的学生捎去了一封信，后者现在是景栋的泰国北部军队成员。<sup>③</sup>“信中称泰方军队需要在合适的时机与对方互换场地，并询问泰方在该区域的指挥官名称，其是否愿意与盟军进行合作。”<sup>④</sup>哈珀将附有政策协调处正式许可的信件送到曼谷的披汶，并借此于战后在北部军队和第93师之间开启了畅通无阻的合作。<sup>⑤</sup>

- ① 华盛顿给战略情报局任务的办法是和披汶的政治敌人——比里·帕依荣建立联系。但是，此项任务的指挥官哈珀·昆仲，执行了多次话题较为敏感的任务，在背地里却是披汶的虔诚追随者，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便可以对哈珀致力于推进泰国和国民党对话的动机和成功进行解释。Nigel J. Brailey, *Thailand and the Fall of Singapore: A Frustrated Asian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 100.
- ② Judith A. Stowe, *Siam Becomes Thailand: A Story of Intrigu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282. 该人工边境是中英两国19世纪谈判的产物，从缅甸的泰雅（掸邦）处将历史上就连在一起的泰鲁王国（位于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一分为二。Stephen Sparkes and Signe Howell, *The House in South-east Asia: A Chang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omai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134; Janet C. Sturgeon, *Border Landscapes: The Politics of Akha Land Use in China and Thail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82.
- ③ Stowe, *Siam Becomes Thailand*, 282-283. 笔者尚未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行动指挥官尼科尔·史密斯是否知晓掸邦鸡片贸易谈判的言外之意。
- ④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171, 175-176.
- ⑤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171; Brailey, *Thailand and the Fall of Singapore*, 100; 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7; John B. Haseman, *The Thai Resistance Movement* (Chiang Mai: Silk Worm Books, 2002), 62-63; Stowe, *Siam Becomes Thailand*, 282; Nicol Smith and Blake Clark, *Into Siam: Underground Kingdom*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46), 146. 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卢将军亲自负责将战略情报局的特赦消息传至泰国北部军队；而据哈森曼称，这封信“被送至泰方前线阵地，最后又分别交到了沙荣（披汶以前的学生）、MG Han（颂堪）、LTG 契拉（Wichitsongkhram）以及马歇尔·披汶手上。





然而，哈珀在政策协调处内部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角色，由于他与戴笠有合作关系，当局对他并不十分信任；我们从雷诺兹详细的记录文件中可以了解到，戴笠、哈珀与政策协调处初期在中国的总指挥官米尔顿·麦尔斯一道推出了一项计划，旨在利用泰国北部军队对抗日军。<sup>①</sup>但是，麦尔斯的继任者约翰·考夫林数月之后向华盛顿的多诺万请示，并表达了自己对该计划的担忧。多诺万随后发来备忘录，也对哈珀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我……怀疑这个家伙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任……我感觉他会和戴笠进行合作，但对我有所隐瞒……除非我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无关紧要的协议存在，要不然，得知戴笠对他很感兴趣，我真的有点失望。<sup>②</sup>

正如他的消息源一样，雷诺兹对鸦片问题在档案上只字未提。但是戴笠和泰国、缅甸的国民党之间的鸦片交易却被政策协调处所熟知，而且考夫林对此可能也一清二楚。<sup>③</sup>

- 
- ① 米尔，多诺万在中国的战略情报局第一任长官，通过一个半自治的网络，SAGO，和争议颇大的戴笠走得越来越近。1942年12月，多诺万警惕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将米尔替换为约翰·考夫林。Richard Harris Smith,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246-258.
- ②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191-192, citing documents of September 1944, cf. 175; Stowe, *Siam Becomes Thailand*, 270.
- ③ Cf. Jonathan 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1952," in *Drug Control Policy: Essay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William O. Walker II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6: "美国人……知道(戴笠的)手下在庇护其大宗的鸦片走私活动。"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47: "戴笠的手下在云南和西贡之间护送毒品走私活动，并利用'红十字'行动打掩护，为日本人贩卖鸦片，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北部军队、第 93 师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的联系可谓是影响深远。再说随后的 30 年里，掸邦鸦片成为缅甸地区的国民党以及曼谷地区的国民党和北部军队收入的源泉。泰国军队 1947 ~ 1975 年的将领都出自北部军队，其中有频·春哈旺、其女婿炮·斯里亚诺恩、沙立·他那叻、他依·吉滴卡宗、普拉帕特·查鲁沙天和江萨·差玛南。他们的势力轮番上台，并从国民党第 93 师的鸦片供应中谋利，而后者在战后缅甸得以重建。<sup>①</sup> 1947 年 11 月，曼谷发生军事政变，直到江萨在 1980 年辞去职务才得以平息。<sup>②</sup> 随后接连发生的政变——1947 年、1951 年和 1975 年——可认为是毒品贸易掌控下冲突的一部分。<sup>③</sup>

在印度尼西亚和亚洲的其他国家，这些将领的毒品生意大多由当地的华人操作。频·春哈旺和炮·斯里亚诺恩的中国银行合作伙伴陈弼臣是自由泰国运动的成员，其在战后一手促成了炮·斯里亚诺恩“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sup>④</sup> 1957 年，沙立·他那叻取代炮·斯里亚诺恩接管了政府和毒品贸易，频·春哈旺和炮·斯里亚诺恩不得不开始了流亡生活。<sup>⑤</sup>

## 美国助力重建战后毒品贸易联系

为了便于理解毒品贸易联系有何重要性，我们有必要牢记在心，到 1956 年为止，国民党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生产的鸦片，

- 
- ① 1949 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之后，第 93 师接收整编了国民党第 8 师和第 26 师的残军旧部，国民党第八路军的李弥担任新的指挥官。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9), 111 - 115.
  -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06, 188 - 191, 415 - 420.
  - ③ Thomas Lob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Denve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nver, 1977), 27.
  - ④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92.
  - ⑤ Lintner, *Blood Brothers*, 241 - 244. 沙立·他那叻元帅在 1963 年逝世后，频·春哈旺才得以返回泰国。



哪怕远在云南山区，也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世界大战和革命的结束使远东地区的鸦片顽疾一并被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开始秘密扶持泰国和国民党毒贩在东南亚进行的秘密活动，在长达 20 年间，美国将其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鸦片和海洛因的源头。

美国和泰国、缅甸的毒贩进行合作的目的尚不明确。然而，看起来卷入其中的有四人：威廉·多诺万、其盟友兼世界贸易公司的组织者威廉·斯蒂芬森男爵及保罗·海利维尔、威利斯·伯德（二者均为潜伏在中国的战略情报局老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廉·斯蒂芬森男爵掌控的世界贸易公司“在曼谷的活动日益积极”，斯蒂芬森和拉玛九世国王建立了牢固的私人交情。<sup>①</sup>

此外，斯蒂芬森还将詹姆斯·汤普森纳入麾下，后者是战略情报局在曼谷的最后一任指挥官，让其担任曼谷的世界贸易公司代表。此举使得世界贸易公司的财力通过汤普森的泰国丝绸公司大为增加。后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公司，它很好地掩护了汤普森在泰国西北边境与老挝进行的贩毒活动。该地区即所谓的伊森地区，共产主义叛乱在此最为严重，中情局日后的行动也将聚焦于此。<sup>②</sup>可能很多人都想了解世界贸易公司是否也和威利斯·伯德有着类似

① William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The True-Life Sequel to The King and I* (London: Constable and Robinson, 2001), 4, 162, 195. 该国王个人将威廉·斯蒂芬森男爵的个人自传翻译成了泰语版本。

② Anthony Cave Brown, *The Last Hero: Wild Bill Donova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797;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162. 1970 年，汤普森的自传作家威廉·沃伦，对汤普森公司的建立进行了详细描述，但没有对世界贸易公司做出参考。William Warren, *Jim Thompson: The Unsolved Mystery*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1998), 66–67. 前中情局官员理查德·哈里斯·史密斯称汤普森后来“被人频繁地与中情局联系在一起” (Smith, OSS, 313n)。乔·特伦托，没有援引任何参考，将汤普森作为本章节的中心来进行阐述：“吉姆·汤普森……（事实上，其身份为中情局官员）征募到了炮将军，即泰国警察部队的头目，以此收取国民党的鸦片用于分配”。Joseph J.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Random House/Forum, 2001), 346. 1967 年，汤普森在马来西亚神秘失踪；他的妹妹调查其失踪的原因，却在几个月后在美国被残忍地杀害。



的进出口业务，但这方面的消息却寥寥无几。

在战后的同一时期，保罗·海利维尔，即早前云南省昆明市负责特别情报的战略情报局指挥官，担任了战略服务处（战略情报局的继任机构）远东地区的处长。<sup>①</sup> 在任期间，据称他“一手掌控了用于战后东亚地区进行秘密活动的秘密基金的要害通道”。<sup>②</sup> 最终，海利维尔负责将美国中情局的资产——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即后来的美国航空公司）——合二为一。此举为泰国北部军队的炮·斯里亚诺恩和缅甸的国民党毒品大本营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是对于其在1948年以前的作为，人们却知之甚少。

在这个阶段初期，为海利维尔提供初始资金的其他投机活动涵盖如下方面。

第一，世界贸易公司上流社会人物的深度财富。援引前USG调查员丹尼尔·哈金斯的话，约翰·洛夫特斯与马克·艾伦斯称，艾伦·杜勒斯和威廉·斯蒂芬森男爵通过世界贸易公司的渠道为纳粹进行洗钱和资金运作，纳粹的资金在战后流往泰国。当哈金斯将此事通报国会时，他“突然遭受解雇，并被搭乘轮船（从泰国）遣返至美国”。<sup>③</sup>

第二，日本海军上将山下（Yamashita）和其他人员<sup>④</sup>或德国纳

- 
- ①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155. 海利维尔在昆明利用鸦片，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强势货币，来换取情报（*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8, 1980）。
- ② Sterling Seagrave, *The Marcos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361.
- ③ John Loftus and Mark Aarons, *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110 - 111.
- ④ 对此，最好的证据便是查莫斯·约翰逊所报导的M-基金，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进行讨论。Cf. Sterling and Peggy Seagrave, *Cold Warriors: America's Secret Recovery of Yamashita's Gold* (London: Verso, 2003), 3. 日本从菲律宾掳掠了黄金，而西格雷夫一干人等将此与海利维尔联系起来，他们推测，凭借这些没有证据的传言，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和CAT航空运输公司均能获得初始创立资金（147 - 148, 152）。尽管笔者难以评价或者是相信他们诸多古怪的主张，但笔者还是相信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美国已经准备支持并利用纳粹党卫军战犯克劳斯·巴比克，相关行动的费用便从纳粹党卫军的财富中（转下页注）



粹党卫军将非法掠夺的黄金和其他资源收集起来。

第三，毒品贸易自身。当保罗·海利维尔的金融界开始与迈耶·朗斯基以及社会下层出现重叠时，就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才能建立毒品贸易联系。而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的银行要在十年乃至更久之后才会建立它们作为这种联系的外在标识（迈阿密国家银行和帕莱茵银行）。还需确认的是，由海利维尔代表的东部开发公司是否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朗斯基以及其他一起合作为新生的以色列提供武器的那家公司。<sup>①</sup>

上述内容中，最有利的证据指向的目标便是纳粹黄金。我们将会了解到，海利维尔在佛罗里达获得了一个新的银行合作伙伴，即E. P. 巴里，后者是战后战略情报局在维也纳的反情报机构（X-2）的头领，在避难所计划中负责监视纳粹党卫军黄金事件的进展情况。<sup>②</sup>毋庸置疑的是，1947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创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协同其他力量，为了对（意大利）大选（1948年）施加影响，洗掉了从Axis基金收集的1000万美元资金”。<sup>③</sup>需要

---

（接上页注④）予以支付。据西格雷夫称，他曾见过一些秘密文件证据，美国用东南亚某个非常有名的领导开了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并将为数不少的黄金存入其中。

- ① Leonard Slater, *The Pledg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1), 175. 曾有一位律师称伯顿·坎特（海利维尔在卡斯托银行洗黑钱的合作伙伴）是由威廉·J. 多诺万将军引荐给海利维尔的……但是坎特对此予以否认。“我个人从未见过多诺万。我觉得我可能曾在保罗·海利维尔的要求下和他说过几句话。” Pete Brewton, *The Mafia, CIA and George Bush* (New York: S. I. Books, 1992), 296.
- ② 在“避难所计划”中，美国陆军第三军带领纳粹党卫军的一名将领“去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多次，花费了超过50万美金购买金子、宝石，最后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Anthony Cave Brown, *The Secret War Report of the OSS* (New York: Berkeley, 1976), 565-566.
- ③ Amy B. Zegart, *Flawed by Desig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A, JCS, and NS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9, citing Christopher Andrew, *For the President's Eyes Onl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172; see also U. S. Congress, Senate, 94th Cong., 2nd Sess.,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April 26, 1976, Senate Report, No. 94-755, 28-29.



注意的是，在1948年6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第10/2文件之前，该项授权就获得了批准，这也是后来的政策协调处所资助的第一次秘密行动。

问题是，在1949~1950年美国官方对此授权之前的一段时间，资金已经到了海利维尔在中国的前战略情报局盟友，身在曼谷的威利斯·伯德手中。伯德利用此资金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为频·春哈旺及其女婿炮·斯里亚诺恩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后者在1950年成为泰国警署署长。到了1951年，政策协调处为伯德提供了一家资金由中情局所有的公司（即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保罗·海利维尔在迈阿密以律师的身份入股该公司。正如此前所知道的那样，海利维尔也成为迈阿密银行的总顾问，据称迈耶·朗斯基便借其手来洗掉从亚洲毒品走私活动所牟取的暴利之财。

有消息称，在20世纪40年代，多诺万也曾到访曼谷。截至1946年，他与世界贸易公司的联系还仅为情报方面的合作。<sup>①</sup>斯蒂芬森的传记作者威廉·史蒂文森写道，由于麦克阿瑟在二战期间斩断了多诺万在太平洋的毒品贸易，后者“因此将暹罗（如泰国）变成了其在亚洲进行（战后）秘密活动，抵抗苏联威胁的大本营”。<sup>②</sup>对

①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50. 道格拉斯·瓦伦丁称1947年中，多诺万介入曼谷政治局势，以解决警察和以鸦片走私活动为生的军队之间发生的冲突。1947年，多诺万以官方注册在案的外事人员的身份为泰国政府服务，代表其与法属印度支那就战后边境问题展开斡旋谈判。瓦伦丁的报告显示，在1947年中，“多诺万造访曼谷，联合泰国这些意见不统一的小集团，建立同盟关系以对抗共产主义”，国民党在曼谷的商人经营毒品生意，将毒品从泰国打入香港和澳门，并“从多诺万的介入中获取最大利益”（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70）。同时，瓦伦丁也注明了，“截至1947年中，国民党的毒品走私活动已经通过墨西哥打入美国市场”。同年11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比里的民事政府遭到放逐。随后不久，泰国战后第一个军事独裁者披汶就职掌权。很快，泰国就悄悄地抛弃了其在1948年宣布建立的反对毒品阵营，本来泰国借此便可在1953年前彻底禁止鸦片吸食活动。Francis W. Belanger, *Drugs, the U. S., and Khun Sa* (Bang-kok: Editions Duang Kamol, 1989), 75-90.

②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50-51.



此观点，威廉·沃克尔在1947~1948年间表示同意。

冷战初期，美国很快就将泰国定义为西方战略政策的要害之地。为此，美国对战时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J. 多诺万和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进行合作的威利斯·H. 伯德进行了密切关注……战后，伯德……依然是军方情报机关的预备役上校，其在曼谷经营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次年11月（即1947年泰国政变），伯德……恳请多诺万：“有没有什么机构能代替战略情报局的职能……请让它们和我们尽快取得联系。”披汶出任总理之时，多诺万通报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称：“伯德是个可靠的人选，他为我们获得苏联政权在泰国的活动情报很有价值。”<sup>①</sup>

1948年6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第10/2文件，很快就对伯德的请求做出回应，并建立了政策协调处。对于泰国可在冷战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前线盟友角色，华盛顿也迅速表示认同。1948年，美国情报处开始在炮将军的参与下武装并训练一支单独的武装力量，后者便是人们所熟知的泰国边境巡逻警察。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美方与泰方的关系得到加强。泰国的将领为了呼应美国的反共宣传，杀害了许多据称是左派的人士。同年年中，美国中情局（政策协调处）派遣了一支分队抵达曼谷，对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展开训练，以此暗中支持与中国共产党在缅中边境交战的国民党力量。1949年下半年，美国开始武装并训练泰国军队，同时为这个军权王国提供经济援助。<sup>②</sup>

① William O. Walker III,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nglo-American Search for Order in Asia, 1912 - 195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184 - 185, citing letters from Bird, April 5, 1948, and Donovan, April 14, 1948 (Donovan Papers, box 73a,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U. S. Army, Carlisle Barracks, Pennsylvania).

② Paul M.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pol Adulyadej*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5.



国民党军队在中国的溃败使得华盛顿将反对毒品的政策降到了次席，以此来牵制共产主义。对此，沃尔克这样写道：

1949年，国民党溃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报告，得知共产主义成功在中国扎根，并将触角伸向了泰国，此外泰国军队也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鉴于泰国军队在事实上掌控着西方国家与泰国安全关系，因此，国外的鸦片管控政策不得不屈居次席，而将优先权让给了其他政策。<sup>①</sup>

1950年3月9日，当杜鲁门总统被问及是否会核准对泰国给予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时，艾奇森的援助备忘录显示，其已经核准将500万美元给到了泰国“警察部队”手中。<sup>②</sup>这笔钱据推测来自政策协调处的秘密预算：笔者在国务院其他公开的记录文件中找不到这项数额达500万美元的预算。两年后，一位美国官员埃德温·马丁在一则秘密备忘录中写道，炮将军掌控之下的泰国警察部队“没有收到美国军方一分钱的援助”。<sup>③</sup>

### 小集团、暴徒、国民党以及行动方案

美国决定对国民党军队予以支持——即所谓的李弥计划或行动方案——的大背景是，当时美国官方在对新生的中国政权采取何种政策时产生了严重分歧，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官僚主义作风，甚至是居心叵测的建议。历史学家布鲁斯·康明思表示，国民党财政支持的中国游说团体和共和党人士，如多诺万，以及远在日

<sup>①</sup> 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185.

<sup>②</sup>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51* (hereinafter *FRU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6, 40-41; memo of March 9, 1950.

<sup>③</sup> *FRUS, 1952-1954*, Vol. 12, 651, memo of October 7, 1952.





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均在得知国务卿迪恩·艾奇森未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继续支持蒋介石而感到震怒不已。<sup>①</sup>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艾奇森仍坚持不对中国台湾提供任何安全保证。<sup>②</sup>

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即政策协调处下属航空公司的初始所有者，是支持缅甸和云南的国民党最主力的游说人员。他为人们所铭记，是因为他是战后采用账外资产进行活动的最早支持者：他的“陈纳德计划”印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对自筹资金的国民党军队从本质上进行了规划，而后者则受到了美国后勤航空公司的支持。<sup>③</sup>由于这次陈纳德担任了蒋介石的美方军事代表，所以某些不太喜欢他的美国官员对其逐渐产生了疑心。<sup>④</sup>即便如此，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朋友兼生意同盟托马斯·科克伦（“软木塞托米”），在1950年之后成了注册在案的代理人，仍竭力在陈纳德和政策协调处的高级官员之间牵线搭桥，其中就包括政策协调处远东分部的指挥官理查德·史迪威。<sup>⑤</sup>

① 1951年4月11日，就在其被免职不久前，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发布了一项声明，号召“美国立刻介入朝鲜战争，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不断加强军事行动，以此告诫中国不要冒着被毁灭的风险参战”。

②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在这一时期，多诺万成了委员会的副主席，通过援助反共活动对抗中国，以保卫美国。

③ Martha Byrd, *Chennault: 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7), 325-328; William M.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Asia, 1946-1955*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67-68;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2.

④ Jack Samson, *Chennault*, 62.

⑤ John Prados, *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125. Cf.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2, 2000. “最新解密的美国情报文件披露了绝密的保险情报处的来龙去脉。保险情报处是战略情报局的组成部分，中情局的前遣部门，其拥有出色的反情报机构X-2。尽管拥有超过（转下页注）”



还有其他一些人对行动方案表现出了兴趣。1972年，笔者注意到美国内部对陈纳德鼎力支持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保罗·海利维尔和托马斯·科克伦均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了远东一家与战略情报局有关的保险公司，该公司隶属科尼利厄斯·V. 斯塔尔旗下。<sup>①</sup>（斯塔尔战前在中国上海进行活动，它帮助战略情报局中国分支建立了遍布中国和全球的网络。<sup>②</sup>）科尼利厄斯·V. 斯塔尔的公司（即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据称与中国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sup>③</sup>自然而然，他们对重建国民党，以及在东南亚地区展现西方国家的势力有着浓厚的经济兴趣。<sup>④</sup>在科克伦进行游

（接上页注⑤）6个机构，但保险情报处的主要目标是收集敌方保险行业、纳粹保险巨头以及有重大嫌疑的保险合作伙伴的情报……保险情报处的后台是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和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保险大亨科尼利厄斯·V. 斯塔尔。从1919年起，斯塔尔就开始在中国上海卖保险……斯塔尔将其保险特工派遣至亚洲，甚至是战争仍未停止的欧洲，这才有了如今的美国国际集团。该集团现在的总部位于纽约市中心一幢大楼上，而战略情报局就缩在里面最不起眼，但保密性最高的角落里。”

① Peter Dal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46-47, 263-264. 杨东川，科克伦的法律伙伴，同时也是战后美国支持陈纳德阵营里的要员，1960年之前是科尼利厄斯·V. 斯塔尔西贡公司的总裁。

② Smith, *OSS*, 267.

③ Smith, *OSS*, 267.

④ 陈纳德计划的背后支持者很可能自己结盟，像海利维尔，就有自己的犯罪集团。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科尼利厄斯·V. 斯塔尔旗下公司之一 U. S. Life 通过与黑帮联系密切的业务代理人保罗和阿尔·多尔夫曼的努力，成为了 Teamster 保险合同的受益方，尽管该合同被认为是一份不太可靠的合同（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97;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79）。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位于美国西海岸，其主要的一个支持者是钟丽淇博士，后者被怀疑进行毒品走私活动，因为她频繁地出入墨西哥城，并且有弗吉尼亚·希尔的陪同。希尔是迈耶·朗斯基和毕斯·西里尔的信使。See Ed Reid, *The Mistress and the Mafia: The Virginia Hill Story* (New York: Bantam, 1972), 42, 90; Peter Dale Scott, "Opium and Empire: McCoy on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September 1973, 49-56.



说期间，斯塔尔旗下的美国国际保险公司从中国香港的大本营扩张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该公司成为“东南亚第一大保险公司”。<sup>①</sup>在其2008年垮掉之前，其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曾在《福布斯》榜上有名，在全球上市公司中位居第18。

科克伦也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美方代理人。宋子文是中国游说团体的幕后支持者，有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sup>②</sup>宋子文和国民党很可能就是陈纳德计划背后的支持者和推动者。1949年，在经过对中国台湾和蒋介石的讨论之后，文职顾问丁作韶提出了一项补充计划，以对李弥将军在缅甸的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力量进行支援。<sup>③</sup>

和蒋介石一样，陈纳德也获得了来自美国 Time-Life 出版社的亨利·卢斯以及远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与其情报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少将的支持。但是，他们旨在恢复并重建国民党在中国的势力的计划，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和杜鲁门与国务院的计划产生了重大分歧。<sup>④</sup>前战略情报局指挥官威廉·多诺万现在已不在政府部

① Ronald Shelp with Al Ehrbar, *Fallen Giant: The Amazing Story of Hank Greenberg and the History of AIG* (Hoboken, NJ: Wiley, 2006), 60.

② 《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游说团”在华盛顿的花费据称是由所谓的中国游说第一人约瑟夫·科尔伯格所提供的，其主要生意为当时市价较好的亚麻和蕾丝。但是通常人们都怀疑他只是受人之托对游说团进行资助，幕后支持者尚不明确。

③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11-114. 早在1950年，丁作韶就一直提倡建立反共联盟支持国民党的抵抗活动（134, 234）。随后国民党建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即后来著名的世界反共联盟）就对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支持。1971年，老挝的反共联盟代表因在行李箱夹带60公斤的顶级海洛因而被逮捕。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63, 194-195.

④ 麦克阿瑟1949年建议国务院美国应该部署“500架战斗机，交到像陈纳德这样富有经验的人的手中”并对国民党提供美国志愿者的进一步援助。Memo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5, 1949, *FRUS, 1949*, Vol. 9, 544-546;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03; Byrd, *Chennault*, 344. 陈纳德向诺兰议员回应称，国会应该任命麦克阿瑟为整个远东地区的高级指挥官。



门担任要职，转而进行支持国民党的工作，他也力挺蒋介石和陈纳德二人，<sup>①</sup>一如他曾支持陈纳德在战时与威廉·伯雷进行联系一样。威廉·伯雷是一个海外投资商，与海利维尔一样，他也因与贩毒的暴徒联系紧密而恶名在外。<sup>②</sup>

多诺万对陈纳德的支持只是其一贯对抗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作为，他也对游击队充满了兴趣。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一种极强的保守意识形态最终使得他在1953年被任命为泰国大使。他的情报盟友为前托洛茨基主义支持者詹姆斯·伯恩汉姆，彼时其是受政策协调处亨利·卢斯保护的人员（半个世纪后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前身）。

### 姗姗来迟的行动方案授权

在一片混乱之中，政策协调处的指挥官弗兰克·威斯纳在1948年夏天开始筹措资金，并且最终一举将陈纳德的CAT收入囊中。CAT，即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是蒋介石的朋友克莱尔·陈纳德借助战后联合国用于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投送供给的赈灾款项组织建立的。威斯纳“负责与科克伦就购买CAT的事宜展开谈判（科克伦与陈纳德均对此抱有浓厚的经济兴趣）。（1950年）3月，通过一个‘志趣相投’的银行家或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中情局支付给CAT 35万美元，清偿了其用于未来运作的40万美元欠款，同时还支付了100万美元用于开展业务”。<sup>③</sup>

理查德·史迪威，即政策协调处的远东指挥官以及行动方案后

- 
- ① 多诺万建议陈纳德在重建的国民党机构任职。陈纳德、多诺万以及远在日本的威洛比将军择时进行了私人会面。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513.
-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260;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33.
- ③ David McKean, *Peddling Influence: Thomas "Tommy the Cork" Corcor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Lobbying* (Hanover, NH: \$ teerforth, 2004), 216.



来的督察员，与科克伦就购买事宜讨价还价。<sup>①</sup> 1950年，所有的细节终于尘埃落定，彼时正值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CAT在朝鲜战争中业务繁多，狠狠地赚了一笔。<sup>②</sup> 阿尔弗雷德·考克斯，即政策协调处香港的指挥官兼CAT的首席执行官，一手指导了对李弥将军的援助行动。<sup>③</sup>

中情局曾安排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威廉·科森中校执行特殊任务，据其不利的评估称，政策协调处在1950年夏天，征募（或雇用）了一批士兵，并将其派遣到缅甸北部对中国展开游击队突袭活动。彼时提出该项目的人却没有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其一，杜鲁门已经拒绝了蒋介石让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请求；其二，缅甸人的中立地位被此举消耗殆尽；其三，蒋介石提供的军队士兵的素质无法满足此次任务要求。<sup>④</sup>

此后不久，1950年10月，杜鲁门就任命了一个新的中情局主管，即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此人更加独断专行。上任不到一周，史密斯就第一次明确了政策协调处以及威斯纳对中情局负有的责任，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表示的。<sup>⑤</sup> 最终，史密斯凭借其强势的作为将威斯纳和政策协调处一并纳入麾下，这其中一部分要得益于其利用艾伦·杜勒斯对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的竞争对手——

① Hersh, *The Old Boys*, 299.

② McKean, *Peddling Influence*, 216; Christopher Robbins, *Air America* (New York: Putnam's, 1979), 48 - 49, 56 - 57, 70; Byrd, *Chennault*, 333; Alan A.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n the Bahama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1), 169.

③ Curtis Peebles, *Twilight Warriors: Covert Ai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USS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88 - 89.

④ William R.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Empire* (New York: Dial Press/James Wade, 1977), 320 - 321.

⑤ Hersh, *The Old Boys*, 284. Cf. Samuel Halpern (a former CIA officer) in Ralph S. Weber, *Spymasters: Ten CIA Officers in Their Own Words*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9), 117. 比德尔突然说道：“它们在我的掌控之下。”……的确如此。在他担任中情局局长的第一个星期他就这么做了。



特别行动局（OSO，战略服务处的接替机构）进行监督。<sup>①</sup>然而，1950年11月，就在其被任命为中情局主管满一个月之际，史密斯尝试终止行动方案的努力宣告失败，这是由于政策协调处（背后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撑）未能及时将该项提议呈给杜鲁门总统进行批准。

1950年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含一个对当地反共力量提供秘密支持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介入冲突后，这项提议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就在中国参战后不久，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处就提议将中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地区。该项提议号召美国对国民党第93师予以援助，随后李弥的部队就在云南对共产党发起了进攻。有趣的是，中情局的主管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却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其太过冒险。但是哈里·S. 杜鲁门认为政策协调处的提议有价值，并批准执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行动方案。<sup>②</sup>

①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319; 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137; Henry G. Gole, *General William E. DePuy: Preparing the Army for Modern War*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8), 80. 中情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反对这项计划，但是杜鲁门总统却批准了该项计划并驳回了沃尔特的反对意见，要求对此进行最严格的保密。

② Victor S.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93rd Nationalist Division,"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441, citing Memorandum, Bradley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April 10, 1950, and Annex to NSC 48/3,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2, 1951.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National Security File-Meetings, box 212, Harry ·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issouri. Cf. Sam Halpern, in Weber, *Spymasters*, 119. "五角大楼想出了这个聪明的计划，我明白：最起码，我的（中情局/特别行动局）头儿，劳埃·德乔治，远东分部的指挥官，当时就告诉我这个消息了。"



杜鲁门在1950年11月批准行动方案的时候，国务卿迪恩·艾奇森对此是否知情就无从获知了。记录显示，缅甸和泰国的美国大使对该项授权一无所知，直到1951年末，才从英国闻得风声，并得到了披汶的亲自确认。<sup>①</sup> 学者维克多·考夫曼称其“在杜鲁门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或美国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的文件中，无法找到任何确切信息以表明艾奇森对行动方案是否了解，如果了解，又了解多少”。<sup>②</sup>

麦克阿瑟和陈纳德均对缅甸拥有CAT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抱有极大信心。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CAT在为美国军队空投物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③</sup>

政策协调处在缅甸孟萨的国民党大本营帮助其修建了一条主要的跑道，后来美国军队在此进行日常运输活动。<sup>④</sup> 然而，李弥在1951~1952年攻占云南的企图（麦克阿瑟说是在1953年，而林特

①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42-443;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41-142.

②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43. “国务卿迪恩·艾奇森是否……知道行动方案还没有确定下来。艾奇森在对采用秘密活动对抗中国进行讨论……但是自1950年起，国务卿就开始致力于裁掉非正规军队。因此，无法确认艾奇森是否知道此次行动，有没有将其通知给下属也无从得知，甚至是他自己对情况也还是一头雾水。”在这样明显的矛盾之中，威廉·沃尔克写道：“艾奇森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5号决策的整个过程，因此他对采用秘密行动对抗共产党南部侧翼的讨论非常清楚”（*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203）。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5号决策主要是关于朝鲜的指导文件，日期为半年后，即1957年5月17日。

③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116-117.

④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129-130. 里亚雷称，美国将武器最远投递到泰国北部，最后一拨投递由泰国边境巡逻警察来操控，但是有很多现场报告显示，美方人员在缅甸孟萨帮助装卸货物之后，会将鸦片装进飞机（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0;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320-322）。林特纳用照片再现了1953年，三名美国人在缅甸国民党的行动中被杀害的画面（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68）。1953年4月1日，仰光披露了从中将李弥总部截获的一封信件，内容是“欧洲教导师对学生展开训练”。



纳说是在 1957 年)很快就被当地的民兵组织粉碎了, 尽管后者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才换来不到 96 千米的优势。<sup>①</sup> 中情局的顾问参与了此次入侵行动, 其中有些人因此而命丧沙场。<sup>②</sup>

美国的记者和历史学家都喜欢将中情局的行动方案, 即旨在支援李弥和缅甸第 93 师日益增长的鸦片贸易的行动, 归功于杜鲁门总统在 1950 年的授权, 及随后在同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 特别是中国军队跨过了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sup>③</sup> 但是历史学家丹尼尔·法恩曼却指出, 杜鲁门总统只不过是授权批准了一个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的武装运输项目而已。

1950 年 4 月, 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不久后, 美国开始对(国民党)军队输送装备和物资。(一位美国军官未经授权, 就从泰国驻缅甸的大使馆出现在了缅甸北部, 这引发了缅甸人的抗议活动。<sup>④</sup>) 同年秋天, 中情局开展了代号为行动方案的秘密行动, 为缅甸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武装, 以便其对云南发起进攻。<sup>⑤</sup>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9 - 171; Lintner, *Blood Brothers*, 238. 尽管在军事上彻底惨败, 但国民党在东南亚地区一方面作为保护伞, 另一方面, 维持东南亚地区以毒品为财政来源的国民党三合会的传统社会结构。See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85 - 186;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0, 192 - 193.

② Donald F. Cooper, *Thailand: Dictatorship of Democracy?* (Montreux: Minerva Press, 1995), 120.

③ E. g.,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5 - 169. Cf.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60. “美国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最终将手术室放在了缅甸。在 1951 年初,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路追赶着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往南撤退, 五角大楼认为通过开辟第二前线战场, 就能减轻麦克阿瑟的部分压力……中情局开始(原文如此)将中国国民党的士兵运往泰国……并将他们和武装弹药一起投送到了缅甸北部地区。” Cf. 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200. 有些援助在 1951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数月之前……就已经抵达了缅甸的国民党手中。

④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89.

⑤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7.





李弥军队对中国的进攻无异于隔靴搔痒，很明显，其在1952年接到了华盛顿的指示。但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却在随后的十年间继续掩盖李弥与泰国的毒品联系。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年度贩毒报告的一项纪录显示，1949年，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查处了不少由泰国政府垄断的鸦片贸易活动，次年，“这种机会”愈演愈烈。而到了1951年行动方案开始之后，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在十年间仅查处了一次泰国的贩毒活动（嫌疑人为两名水手），11年后，即1962年，该局才开始继续对此查处活动予以通报。<sup>①</sup>

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与中情局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指责中国反对死敌国民党的贩毒活动，每年约有200~400吨鸦片从中国云南被运往泰国曼谷”。<sup>②</sup>这种对于全球顶级毒贩（中情局的代理人）的庇护从安斯林格的手中一直延续到了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的手中，而后者彼时已经被这种庇护腐蚀不堪，并在1968年被美国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代替；1973年，最终由缉毒局将其取而代之。笔者在2010年就写道，美国只是一味指责阿富汗在塔利班领导下进行的暴力与

① U. S. Treasury Department, Bureau of Narcotics,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13; (1950), 3; (1954), 12. 在十年间，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在美国国务院的指示下，向联合国麻醉药品会议坦诚，泰国是流入美国的鸦片和海洛因的源头。(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91, 203, citing UN Documents E/CN.7/213, E/CN.7/283, 22, and E/CN.7//303/Rev.1, 34; cf. 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201 [State Department]) 1962年，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鸦片走私报告重新开始公布泰国毒品查处活动时，肯尼迪政府已经开始花大力气将国民党从该地转移他地(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2)。

② 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206, cf. p213 - 215. Cf. also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133, 150 - 152. 安斯林格并非唯一一个指责中国大陆毒品横流之人。爱德华·亨特（战略情报局中国区和政策协调处的老手，作为回报，陈纳德为其定期提供情报）和理查德·L. G. 德沃奥（美国联邦自由贸易工会委员会成员），与安斯林格一道声讨毒品。



贩毒活动，而联合国的数据则显示（本书后面再详细解读），在阿富汗被毒品彻底腐蚀的贩毒总收入中，塔利班组织仅占了不到 12%。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了解的，安斯林格在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就职期间，正是中情局和西西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以及马赛和科西嘉黑手党在 20 世纪 40 年代联手打造反共毒品联盟之际。国民党暗中支持的贩毒活动进行了许多年，并对美国以及东南亚产生了持续影响。它将由缅甸、泰国和老挝组成的金三角地区（该地区在战争前一直处于全球毒品经济的边缘位置）变成了 20 年之内全球鸦片增长最快的核心区域。

### 有人故意要借行动方案 发展毒品走私活动吗？

很明显，武装李弥的决定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而且鲜为人知。对于政策协调处支持国民党航空公司及其军队的做法，那些赞成者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在战争期间第 93 师将会继续扮演毒品走私者的角色。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保罗·海利维尔可能对此具有双重兴趣，因为他曾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也是迈阿密国家银行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律顾问。该银行在 1956 年之后成了迈耶·朗斯基洗黑钱的渠道。<sup>①</sup>我们在下一章节将会了解到海利维尔也曾是炮将军控制下的毒品财政政府在美方的代表，并通过这种方式为其筹措资金。<sup>②</sup>

可能在海利维尔心里，尽管其依然无法正确理解地下世界与迈耶·朗斯基的关系，但李弥的军队并非用于入侵中国，而是为了恢

①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7, 60-61, 198, 207, citing Penny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Garden City, NY: Anchor/Doubleday, 1984), 42-44, 84.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15.



复被战争打乱的国际毒品走私活动，以支持反共的国民党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买办资本主义活动。<sup>①</sup> 一位军事史学家这样评价：“李弥比中国国民党更像黑手党或战争头子。靠他的军队打败毛泽东不过是政策协调处在痴人说梦罢了。”<sup>②</sup>

还有一种可能是其他贩毒网络也成了李弥用来开展行动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可以从陈纳德在亚洲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口中得到答案，他们都处在社会底层，地位低下，据说却因此得到了毒品走私的天赐良机。<sup>③</sup> 根据威廉·R·科森（海军陆战队上校，受命于中情局在某个分点执行任务）的说法：

中国国民党游击队种植的鸦片被政策协调处的飞机从远处基地运至曼谷，出售给通过各种“渠道”而来的买家。开这种推进式飞机的飞行员通常都是特工，或者混在游击队领导和鸦片买家之间的一帮闲杂人员。有些以前是纳粹分子，有些则是随战争在国外流亡的人员。<sup>④</sup>

此时，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对钟丽淇，即陈纳德战时航空公司飞行员的主治医生，涉嫌卷入毕斯·西里尔之友弗吉尼亚·希尔“旧金山进行麻醉品走私”的活动了如指掌。<sup>⑤</sup> 二战期间，美国海军情报局为了获取中国的详细情报，通过战略情报局与钟医生进行了接触，后者“主动称其可以提供详细的信息……‘从旧金山的走

① I explore this question in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0–64.

② Gole, *General William E. DePuy*, 80.

③ 陈纳德自己也因为这种走私活动而遭到调查，“但由于其享有政治庇护，所以官方并未对其采取任何行动。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1952,” 92; cf. Barbara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7–78; Paul Frillmann and Graham Peck, *China: The Remembered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152.

④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322.

⑤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71, quoting Reid, *The Mistress and the Mafia*, 42.



私贩口中’获知的情报”。<sup>①</sup>

人们可能会问陈纳德对此是怎么看的。陈纳德也曾因为走私活动而受到调查，“但由于其享有政治保护，所以官方并未对其采取任何行动”。<sup>②</sup> 笔者尚无理由去怀疑陈纳德是否希望从这些毒品走私活动中获得个人利益。但其对抗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在种族上，将与中央有分歧的省份，如新疆、西藏，特别是云南分裂出去。

陈纳德最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云南，由于穆斯林少数民族回族在此生活已久，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云南西南地区的人）在传统上掌控着输往泰国的鸦片贸易。<sup>③</sup> 第93师重建的军队主要由云南的回族人组成。<sup>④</sup> 直至今日，国民党部队的云南人还有一个泰国名称，“*Gaan Beng Gaaosipsaam*”（“第93师”），游客来到国民党段希文将军部队基地的旧址时，看到清真寺一定会感到大为吃惊。<sup>⑤</sup>

笔者在此怀疑陈纳德可能已经知晓，重建的第93师中没有任何人在二战中“获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sup>⑥</sup> 二战期间，驻扎在景洪的第93师已经卷入了毒品走私活动之中，<sup>⑦</sup> 此外，第93师在1946年移师至缅甸北部和老挝，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收获那里的鸦片”。<sup>⑧</sup>

① 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 - 1952,” 98, citing OSS CID 126155, April 19, 1945.

② 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 - 1952” .

③ Andrew Forbes and David Henley, *The Haw: Trader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Bangkok: Teak House, 1997) .

④ Cooper, *Thailand*, 116.

⑤ Wen-chin Chang, “Identification of Leadership among the KMT Yunnanese Chinese in Northern Thailan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3 (2002): 125. 由于国民党的村镇还在增加，也在“慢慢抛弃以前军队留下来的遗产”，张雯勤称其为“通俗易懂的误称”。

⑥ Taylor,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uomintang Intervention in Burma*, 10.

⑦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2 - 163.

⑧ Sucheng Chan,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42; cf. John T. McAlister, *Vier Nam: The Origins of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228;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67.



因此，该师在战后驻守缅甸，掌控毒品走私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纳德与蒋介石夫人、宋子文以及国民党走得很近，这使得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鸦片走私中捞到了不少好处。<sup>①</sup> 由于与泰国的贩毒集团（通过戴笠的间谍网络）以及美国联系紧密，国民党在被赶出云南之后，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鸦片供应地，以维持与鸦片走私巨头，以及东南亚戴笠旗下的资产之间的联系。<sup>②</sup>

20 世纪 20 年代，从国民党建立政权初始，国民党官员就已经在向美国走私鸦片和海洛因的活动中被逮个正着。<sup>③</sup> 正如之前了解的，一位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的督察人员在 1946 年报告中称：“最近于墨西哥城举行的国民党大会中，有人提议筹措大量资金以用于日后在鸦片贸易进行相关活动。” 1947 年 6 月，美国国务院报告称，中国国民党在“孤注一掷地进行鸦片买卖活动，为仍在与共产

①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 - 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61 - 279; Jonathan Marshall, "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 - 1945,"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July-September 1976, 19 - 48;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107, citing Nelson T. Johnson to Stanley K. Hornbeck, May 31, 1934, box 23, Johns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② 在对全球鸦片贸易的调查中，人们经常会在战后泰国毒品环境中感受到潮汕话（潮州）的重要性。e. g., Martin Booth, *Dragon Syndicates: 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the Triads*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1999), 176 - 177;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89, 396. 尽管三合会是香港毒品走私的核心，甚至在现今的中国也是如此。潮汕话在当地的毒品贸易中作用突出，但是其是否依然如二战前一样，被三合会完全掌控仍不可获知。Cf.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264 - 267.

③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14, citing Melvin L. Hanks, *NARC: The Adventures of a Federal Agent*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3), 37, 162 - 166; Brook and Wakabayashi, *Opium Regimes*, 263. 要了解美国对于国民党毒品走私活动的大概知识，可参见 Marshall, "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 - 1945".



党进行斗争的部队提供支持”。<sup>①</sup>《纽约时报》在1949年7月23日报道称，受中情局暗中支持的国民党从昆明前哨向外运输的一批重达22磅的海洛因在香港被查处。<sup>②</sup>国民党1949~1950年在云南的失利意味着其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鸦片供应源。

国民党能够幸存下来，自然要得益于其在1949年退守台湾并在此建立政权。陈纳德和其CAT帮助运送国民党领导和物资至台湾，并抵御新生的共产党民用运输部队（此举使其卷入了香港一宗漫长的官司之中，其中CAT方面由威廉·多诺万代表出席）。<sup>③</sup>到了1950年的时候，陈纳德战时的一个飞行员，塞特里斯·法索利斯经营了一家公司——中国国际商业有限公司，秘密地向台湾的蒋介石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布鲁斯·康明思推测塞特里斯·法索利斯之所以为了政策协调处这么做，是因为彼时正值艾奇森公开拒绝向美国担保为台湾提供防御之际。<sup>④</sup>

最终，所有参与向政策协调处递交行动方案的人员（菲茨杰拉德、海利维尔、朱斯特、CAT的首席执行官阿尔弗雷德·考克斯以及伯德）均在二战期间对该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如果他们不希望李弥及CAT卷入重建国民党贩毒活动之中的话，那他们就必须保证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对CAT的活动没有管控权。但是威斯纳和海利维尔的举动却与之恰恰相反：他们掌管了CAT，并将CAT的大

①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72-73, citing Terry A. Talent report of November 15, 1946; Douglas Clark Kinder and William O. Walker III, "Stable Force in a Storm: Harry J. Anslinger and United States Narcotics Policy, 1930-196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March 1986, 919.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77.

③ Victor S.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 U. 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20-21.

④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508-525;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271-272.



部分管控权交给了台湾地区的金城银行。<sup>①</sup> 此后的很多年里，CAT便在李弥阵营和国民党之间往返，为前者运输武器，为后者运输毒品。

政策协调处对于鸦片走私活动的兴趣在于其战略性和经济性。正如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所观察的那样，炮将军在泰国对于国民党的支持活动“是中情局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应对中国在东南亚富裕且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人阵营日渐增加的受欢迎度”。<sup>②</sup> 笔者在其他地方注意到，国民党与这些阵营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毒品巨头，以及其他传统贩毒的秘密组织（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的秘密组织）来实现的。因此，要想在缅甸重建一个鸦片供应地，以代替国民党在中国云南所失去的那个，就必须维系一个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sup>③</sup>

① 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46, 48–51. 笔者在其他地方曾将中国国际商务公司描述为世界贸易公司的附带产物。自此以后，笔者了解到该公司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但现在，笔者对世界贸易公司与其关系产生了疑虑。在随后的一起股票诈骗案件中，法苏里斯被指控涉嫌参与了这次精心组织的诈骗大案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69;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68–169, 178)。截至2005年，法苏里斯成为中投国际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身家高达1.5亿美元。中投国际是中国国际商业公司的接任者，其公司如今为美国提供武装供应服务，据估计营业额约为8.7亿美元 (“The 50 Wealthiest Greeks in America,” *National Herald*, March 29, 2008)。由于出现了投机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可能会在事实上支持中投国际有限公司，使其作为业务代理之一，进行武器装备、技术部件、后勤等重大的情报活动”。Paul Collin, “Global Economic Brinkmanship,” [http://www.totse.com/en/politics/corporatarchy/Valentine\\_globaleconomic170320.html](http://www.totse.com/en/politics/corporatarchy/Valentine_globaleconomic170320.html).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88.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85.

③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92–193. 安斯林格对国民党毒品走私活动的庇护还引出了一个结果，即在美洲加强并巩固了国民党的包围态势。1959年，一个支持国民党的贩毒网络协胜堂在旧金山被摧毁，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一位与战略情报局和中情局均有联系的高官乔治·怀特对中国国民党的毒品运输活动进行了谴责，与此同时，其又纵容毒贩头目逃离至台湾。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3;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195。



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鸦片走私是反共产主义策略中重要的一环，其可以成为东南亚国家的收入来源。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泰国一直凭借其对鸦片的垄断获得财政收入；1953年，“泰国代表在4月召开的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 CND）会议上坦诚，泰国政府无法承受放弃鸦片贸易收入的代价”。<sup>①</sup>

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商人用鸦片利益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后者在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参见威廉·斯蒂芬森男爵和世界贸易公司的历程）。这些掌控当地业务的中国人的是否会投向北京，取决于有无潜在业务机会的可用资金。炮将军的银行家陈弼臣成了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反共产主义商人的资金来源。

陈弼臣建立了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且该银行为其带来了极大的盈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3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称，曼谷银行特殊的地位使得其每年能够带来超过100%的资金回报（该项声明为陈弼臣的副官所发布）。毫无争议的是，该银行充沛的存款基本额在泰国不能单独以最合适的利率借出。这便是陈弼臣为东南亚银行业带来的一股改革新风。他亲自造访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结识并向新一代的后殖民地大亨进行招商活动……陈弼臣将香港之外的关键人物都一一收入麾下——其中有马来西亚的罗伯特·库克，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泰国的 Chearavanonts，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其他大亨……陈弼臣以毒品首脑人物炮·斯里亚诺恩，以及其他参与毒品业务的政治家的个人理财专家的身份，与泰国的海洛因交易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sup>②</sup>

① 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214.

② Joe Studwell, *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7), 95-96.





陈弼臣效法 19 世纪暹罗种植鸦片的 Khaw 家族，其商业影响力最终“跨过了暹罗的南部边境，传到了马来西亚和荷兰东印度群岛”，并成了诸如锡矿和船运公司一样的合法产业。<sup>①</sup>

美国还有另一个认可李弥走私活动的原因，即可将其作为缅甸急需的钨矿来源。据乔纳森·马歇尔称，能够证明政策协调处/中情局支持李弥残部的证据少之又少，而且这也会“帮助西方国家控制缅甸的钨矿”。<sup>②</sup>

### 创建秘密部队无须追究责任

政策协调处对泰国警察的援助极大地增强了炮·斯里亚诺恩（即该援助的接受方）和威利斯·伯德（战略情报局的老手，已经是泰国军方和警察的供应者）的影响力。注意到了 1947 年组织发动军事政变的将领们与美国大使斯坦顿（后者仍为政治官员们提供服务），存在较大分歧，伯德便和炮将军以及 1947 年参与政变的其他将领进行合作，共同组建了一个秘密的“纳瑞宣委员会”。绕开美国大使馆的所有人员之后，纳瑞宣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平行的半国营频道，为政策协调处和炮将军的边境巡逻警察之间的美泰政府关系提供服务。

1950 年，伯德组建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联合主要将领和政治家推行一项反共产主义策略，其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说服美国提高军事援助。该集团，即纳瑞宣委员会的成员有警方

① J. W. Cushman, "The Khaw Group: Chinese Busines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ena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7, 1986, 58; cf. Trocki, "Drugs, Taxes, and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99 - 100.

② 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 - 1952," 106. 国民党从朝鲜反政府人员手中获得了钨矿，后者控制着一个重要矿藏，他们用矿石来换取中情局提供的现代化武器。



的强硬派人物炮·斯里亚诺恩、炮将军的岳父，空军总司令福恩·罗纳法卡特，以及伯德的堂兄弟（空军上校）西提（沙卫西拉，后来担任泰国外交部部长十年之久）……伯德和上述将领绕开美国大使并……通过（伯德的）战略情报局旧部，后者现在就职于中情局，展开活动（原文如此，例如，政策协调处）。<sup>①</sup>

托马斯·洛比对伯德进行了驳斥，他写道，组建委员会的是“泰国军方集团”。但是我们从他的散文中了解到可能并非上述二者单独创建了委员会，而是在其过程中加入了一项支持缅甸国民党的新策略，后者由政策协调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

一位美国军方的高官和中情局（政策协调处）的官员来到曼谷（1950年）考察其政治环境。<sup>②</sup>……通过“（纳瑞宣）反共委员会”，炮·斯里亚诺恩与中情局（政策协调处）之间相继展开了几次秘密谈判。美方代表表示有必要建立一支准军事部队，其既能够保卫泰国边境，也能跨境进入泰国的邻国，即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和中国展开秘密行动……中情局新政策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支精英部队不受泰国安全部门和泰国国家警察局（Thai National Police Department, TNPDP）管辖。炮·斯里亚诺恩和披汶就此协议达成一致，因为武装力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3, 153. Bird at the time was a “private aviation contractor”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8). 伯德彼时是一个“私人航空承包商”，因为泰国的道路系统仍然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所以航空活动是泰国边境巡逻警察保卫其边境的重要手段和策略。由于伯德就是委员会成员，其堂弟西提·沙卫西拉空军上校成了炮将军最为得利的助手，并担任其翻译。20世纪80年代，他在上一届泰国军政府中担任总理达十年之久。

② 笔者未能辨识政策协调处的这位官员。他有一种可能是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海洋供给公司、行动方案、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和（待议）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督察员及一把手，还有可能是保罗·海利维尔。



量的增加意味着这支新的国家警察部队将面对面地与武装力量斗争。<sup>①</sup>

此举是为了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号召，即1950年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特别秘密行动组织，以干预共产党在东南亚进行的活动”，并注明“要具备新的活力，比中国国民党部队要更加有效”。<sup>②</sup> 相关行动很快得以展开。

（伯德的）中情局（例如，政策协调处）的线人派遣了一个观察员与委员会接洽，其被泰国表现出来的决心所震惊，请求美国同意向泰国提供更多的秘密援助项目。由于认为此事紧迫，泰美双方的策划者均决定无须签署一份援助项目的正式协议。取而代之的是由伯德的战略情报局好友（中国分站）、现于佛罗里达州从事法律工作（同时他也是军队的预备役军官和政策协调处的特工）的保罗·海利维尔在迈阿密设立一家公司，即海洋（例如东南亚）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掩盖其行动的幌子。中情局（政策协调处）负责美方的协助工作，并在曼谷设立一个海洋供给局……1951年初，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接收武装运输物资，并将其发配出去……中情局（政策协调处）任命伯德的运输公司为曼谷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总代理机构。<sup>③</sup>

伯德通过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运输过来的武器装备很快就送到了泰国警方和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的手中；此外，从1951年开始，缅甸的国民党第93师，彼时还在自给自足，也在战争期间通过毒

① Lob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19-20.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7;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5.

③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4, emphasis added.



品走私活动获得了该武器装备。<sup>①</sup> 李弥将军，时任第 93 师的战后指挥官，向伯德和泰国的炮·斯里亚诺恩将军寻求武器援助，以装备缅甸孟萨基地的国民党军队。1951 年 1 月，曼谷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而在数月之前，国民党就已经获得了部分武装，这次李弥请求二人也对这部分军队予以援助。<sup>②</sup> 从曼谷向缅甸孟萨的国民党基地进行供给的航空公司为 CAT，后者是海利维尔另一个属于政策协调处所有的资产，1959 年更名为赫赫有名的美国航空公司。官方故意做出如此正式的安排，目的是掩人耳目，使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能够将话题比较敏感的武器装备运送到国民党的鸦片基地去。<sup>③</sup>

在陈纳德的航空公司进行复杂的法律交接程序期间，其资产分成了三个独立的部分：飞机（台湾民航空运公司，Taiwanese Civilian Airline Civil Air Transport, CATCL）、飞行员（后来的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地面支持活动（亚洲航空公司）。其中，中情局只占飞机 40% 的股份；其余 60% 仍由国民党财团持有（据称与宋子文与蒋介石夫人有所关联），其由大陆迁至台湾，与金城银行关系密切。<sup>④</sup> 金城银行处于国民党所谓的“政治科学集团”的掌控之下，其成员陈仪成了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的第一任最高统帅。<sup>⑤</sup>

政策协调处精心组织的 CAT，其 60% 的飞机在国民党手里，确保了其所进行的活动不受华盛顿的管控。<sup>⑥</sup> 事实上，海利维尔、伯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8 - 169.

② 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200, 205.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8.

④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87 - 189, 201 - 202; Robbins, *Air America*, 48 - 49, 56 - 57, 70;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110 - 112.

⑤ Chen Han-Seng, "Monopoly and Civil War in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Far Eastern Survey* 15, No. 20 (October 9, 1946): 308.

⑥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87 - 189. CAT 并非唯一支援李弥的航空公司，还有跨亚洲航空公司，其中在缅边境线上运行，用来对抗中国。



德以及伯德泰国的堂兄弟西提·沙卫西拉均避开了美国大使馆，并在台湾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了精心策划的布局。而行动方案真正的总部则位于 Chen Zengshi 的私人办公室之中，后者是黄埔军校的学员。<sup>①</sup>

伯德对炮·斯里亚诺恩的快速提拔，确切地讲是在美国大使馆努力消除其腐败影响期间，这导致在 1951 年大使馆举行的照会上，有人因美国对伯德此举的不作为而进行了抗议活动。“为什么伯德要让这个家伙（炮·斯里亚诺恩）来当警察局长？”照会记录提出质疑。<sup>②</sup>

这个问题需要很迫切地解决，但是却没有收到任何公开回复。伯德支持的所谓“政变集团”（频·春哈旺、炮·斯里亚诺恩以及沙立·他那叻）很明显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因为伯德通过行动方案和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鼓舞了上述军人在 1951 年 11 月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政变”，公然挑衅美国大使斯坦顿，解散议会，并在 1932 年将战后泰国宪法替换为更加反动的宪法。<sup>③</sup>

## 国民党为东南亚留下的毒品遗产

20 世纪 50 年代，政策协调处的 CAT 开始在缅甸执行秘密任务，该地区每年的鸦片产量约为 80 吨。在十年时间内，鸦片产量翻了四番，乃至在越南战争期间的某一时间里，金三角地区每年的鸦片产量达到了 1200 吨。截至 1971 年，该地区仍有不少于七个毒品实验室，其中靠近中情局在老挝的班会晒基地，每年的海洛因产

①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46.

② *FRUS, 1951*, Vol. 6, pt. 2, 1634;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50 - 151. 该项备忘录将伯德描述为“无任何授权便可给以泰国警察众多军事武器之人”，笔者尚无授权记录发现，至少，其在当地情报机关的身份模糊不清。

③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3, 153. 汉德利的报告信息丰富，但其完全忽略了伯德在政变准备阶段扮演的角色。*The King Never Smiles*, 113 - 115.



量估计有 3.6 吨。<sup>①</sup>

越南战争的结束并未阻止国民党第 93 师的残部将受中情局保护的毒品源源不断地打入美国市场，前者现在李文华和段希文将军的带领下，盘踞在泰国北部地区。李、段二位将军，彼时已被官方划归为泰国的防卫力量，但仍与中情局保持着特殊关系，并受到其保护。据詹姆斯·米尔斯称，凭借中情局的庇护，李文华成了“全球最有实力的毒品走私贩子之一……掌控着大部分流入美国的精炼毒品”。<sup>②</sup>

在行动方案初期，美国就感觉到了其所带来的影响。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阐述的那样，泰国的鸦片和海洛因，通过国民党长期保持联系的美国黑手党渠道，被分销至美国各地。<sup>③</sup>因此，安斯林格的诡辩为亚洲毒品销往美国的最主要的犯罪网络提供了保护。中情局在亚洲的贩毒活动远比其在欧洲的贩毒盟友的影响要大得多，其所造成的毒品危机在越战期间就让美国头疼不已，如今美国依然对此心有余悸。进一步讲，美国对国民党

①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40, citing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2, 286 - 287. 麦考伊对国民党增加毒品产量的估计极为保守。“年产量从独立初小小的 30 吨（1945）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 600 吨。” According to Bertil Lintner, the foremost authority on the Shan states of Burma, “The annual production increased from a mere 30 tons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1945] to 600 tons in the mid - 1950s”. Bertil Lintner, “Heroin and Highland Insurgency,” in *War on Drugs: Studies in the Failure of U. S. Narcotics Policy*, ed. Alfred W. McCoy and Alan A. Bloc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288. 国民党对掸邦的利用使得数千名山区村民涌至泰国北部地区，该地区的鸦片产量也增加了不少。

② 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789. 米尔斯也援引段将军的话称，泰国边境警察“已经腐败不堪，对毒品走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米尔斯认为，“这有点意思，因为泰国边境巡逻警察是中情局一手创建的，却要受到 SRF 的控制，曼谷的中情局站点”（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780）。更多有关中情局——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关系的细节，请参见瓦伦丁的报告，“From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Sources,”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254 - 255。

③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2 - 63, 193.



毒品走私活动的领军人物进行的庇护工作，使得国内的毒品强制机关面临着巨大的中立压力。同时，也使得缅甸东部的部落经历着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压力，也许他们才是本次活动的最主要受害者。

截至 1951 年底，杜鲁门深信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对其牵制计划而言，产生的威胁比其利用价值还要大，于是杜鲁门总统就“总结称这批非正规军必须要裁掉”。<sup>①</sup> 美国对李弥的直接援助终止了，这使得国民党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鸦片收入上。尽管如此，1952 年 6 月，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100 名泰国边境巡逻警察训练营的学员在缅甸对李弥的部队进行雨林作战的训练。<sup>②</sup> 1953 年，在一场小规模冲突之后，缅甸军找回了三名白人士兵的尸体，但除了华盛顿和纽约有他们带地址的文件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对其身份进行确认。<sup>③</sup> 行动方案至此便只能自生自灭，斯坦顿大使既不过问，美国总统也对此缄默不言。

1953 ~ 1954 年，部队公开撤往台湾只是艾森豪威尔驻泰国大使的一个小把戏，尽管威廉·多诺万为此进行了五个月的艰辛谈判。老人、男孩和山地部队都被 CAT 从泰国空运至台湾，但随后新的部队、新的武器和指挥官又卷土重来，驻守此地。<sup>④</sup>

行动方案彻头彻尾的失败起因发生在 1952 年，中情局最终决定撤销政策协调处。据 R. 哈里斯·史密斯称：

比德尔·史密斯……传唤了政策协调处的远东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用目击者的话说，对其“痛斥一番”，上校“含

① Kaufin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43.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41.

③ Rangoon Nation, March 30, 1953; Cooper, *Thailand*, 123;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74;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39.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74 - 176;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195 - 196; Lintner, *Blood Brothers*, 238; *Life*, December 7, 1953, 61.



着泪走出了大厅”。……缅甸的土崩瓦解是政策协调处最为难堪的一件事，同时它也确认了该机构将被取消的消息。1952年，比德尔·史密斯将政策协调处并入了中情局的特别行动局（以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方案）。<sup>①</sup>

促成这项决定的事件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为“泰国动荡事件”。事件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但其核心是一次与毒品有关的室内谋杀案件。艾伦·杜勒斯的自传作者详细地对其进行了描述，1952年，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不得不派遣双方秘密分支的高级官员（双方即为中情局的特别行动局与政策协调处）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掩护下，解决诸多鸦片贸易争端”<sup>②</sup>（笔者从一位前中情局官员口中得知，一位特别行动局通过泰国渠道调查毒品流向的官员被一位政策协调处的官员所杀害<sup>③</sup>）。很多年之后，在1968年举行的一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77-178.

② Peter Grose, *Gentleman Spy: The Life of Allen Dulles* (Boston: Richard Todd/Houghton Mifflin, 1994), 324.

③ 据阿尔弗雷德·麦考伊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78) 称，一位名叫杰克·吉拉姆的CAT飞行员“1951年在一次鸦片交易出错后遭到杀害，并被中情局（例如，政策协调处）特工谢尔曼·朱斯特埋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墓穴里”——谢尔曼·朱斯特是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约瑟夫·特伦托对此给出了惨不忍闻的评价，称两名“醉酒且狂暴”的CAT飞行员“在曼谷被打死”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347)。根据威廉·科森的说法，“熟知吉拉姆案件的人提出了一些推测，中情局利用东南亚的贩毒活动作为自己敛财的工具，并用收益支付服务和人员的费用。但这种雇佣方式在美国是无法通过批准的……或者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情报机构这种‘无赖’的手段有些欠妥当呢”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323)。正如我们了解到的，这种阴谋造成的恶果之一便是政策协调处被取缔。中情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严厉地斥责了政策协调处的远东指挥官理查德·史迪威，并将其下调到了部队。而在美国国防部内部，“截至1981年底，史迪威一直在操控着政府最为机密的行动之一”，并与前中情局官员西欧多尔·沙克利进行合作，后者是史迪威前政策协调处的二把手。Joseph J.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213.





次秘密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该会议是为了回顾官方情报行动，前中情局官员理查德·比塞尔回顾了中情局——政策协调处的动荡事件，称其为“一场精心策划的灾难”。<sup>①</sup>

但是何为一场精心策划的灾难，看起来它可能对政策协调处财大气粗的纽约共和党（其中包括威斯纳、菲茨杰拉德、伯恩汉姆以及其他人员）的政治目的更为有利，这些共和党人建立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飞地，承诺将会实现杜鲁门对共产党进行牵制的承诺（回想一下威斯纳在政策协调处围绕自己建立的圈子，用其前妻的话来说，“这些家伙钱多得要命，都传到华盛顿来了”<sup>②</sup>）。这次秘密会议已开始尝试施行反转政策，而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2年恰恰以此政策来进行竞选活动。<sup>③</sup>

杜鲁门对这种华尔街共和党人上流社会的飞地并不相信，中情

---

① Marchetti and Marks, *CIA and the Cult*, 383.

② Hersh, *The Old Boys*, 301, quoting Polly (Mrs. Clayton) Fritchey. 该集团负责行动方案的其他人员也都是共和党的活跃分子，其中之一便是保罗·海利维尔，他后来成为佛罗里达共和党阵营非常显眼的人物，一部分原因要得益于其能够以泰国驻迈阿密总领事的身份，从泰国获得资金。哈里·安斯林格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拥趸，他能够被任命为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第一任局长，要归功于其娶了共和党大亨（兼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外甥女（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16）。多诺万，在杜鲁门执政后期与一个纽约女继承人兼政策协调处顾问结亲，终其一生，多诺万都在纽约共和党阵营扮演一个行动主义者。

③ 恐怕一个无法回答的深度问题便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尤其是海利维尔，是否知道国民党从缅甸的毒品走私活动中获益，并资助中国的游说团体对杜鲁门的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迪恩·艾奇森以及乔治·C. 马歇尔发动猛烈攻势。我们了解到，在20世纪50年代，多诺万和海利维尔从炮·斯里亚诺恩获取资金，用于国会的游说工作。Cf.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14-215。援引约翰·洛夫特斯和其他人的说法，安东尼·萨莫斯写道，艾伦·杜勒斯在加入中情局之前，就已经为年轻的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大选摇旗呐喊，而且很有可能还向尼克松总统透露了一些爆炸性的信息，后者使得尼克松一举成名：前国务院高官阿尔杰·希斯对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了如指掌。Anthony Summers with Robbyn Swann, *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Viking, 2000), 62-63.



局和政策协调处也已经对此给予了管控，因此杜鲁门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无疑是正确的。杜鲁门任命的四位局长分别是西德尼·苏尔斯、霍伊特·范登堡、罗斯科·希伦科特以及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他们的任务是对中央情报局进行监督，四人均均为军人出身，且都来自美国中部。<sup>①</sup> 这与六名下属的副局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要么来自于纽约市，要么（有一个）来自波士顿，法律和/或财务出身，除了一个之外，其他的都在社会名人录可查。<sup>②</sup>

比德尔·史密斯被杜鲁门选中掌管中情局，然而他却漫不经心地准备迎接中情局的巨大胜利，1951年1月，他任命艾伦·杜勒斯（华尔街共和党，社会名人录，战略情报局）来“管控弗兰克·威斯纳”。<sup>③</sup> 随着共和党在1952年的竞选中获得胜利，比德尔·史密斯想要撤销政策协调处的打算被彻底扭转。政策协调处的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负责争议颇大的行动方案，其也成了中情局在远东分部的一把手。<sup>④</sup> 美国的武器和供给持续不断地运抵李弥的部队，此次并非直接从政策协调处运调，而是通过泰国边境巡逻警察或台湾的国民党之手，间接交付给李弥的部队。与此同时，至少在七年的时间里，泰国边境巡逻警察都会对国民党的鸦片交易“上演”突袭好戏，并转手将其交给泰国的鸦片垄断集团。这样做的“回扣”

① 西德尼·苏尔斯（第一任中情局局长，简称DCL，中央情报组，1964）出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霍伊特·范登堡（局长，中央情报组，1946~1947）出生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罗斯科·希伦科特（第三任中情局局长，也曾是第一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1947~1949）出生在圣路易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第四任中情局局长，1949~1953）出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② For the details, se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61. 来自波士顿的罗伯特·艾默利在社会名人录里的知名度不高，其兄弟克利夫兰·艾默利是1960年出版的畅销书 *Who Killed Society* 的作者。

③ Weiner, *Legacy of Ashes*, 52-53. 比德尔·史密斯自己是个右翼共和党拥护者，他曾披露向艾森豪威尔告密纳尔逊·洛克“是个共产党员”（Smith, *OSS*, 367）。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5-178; cf.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71.



便是销售收入的 1/8 要用于对边境巡逻警察提供财力支持。<sup>①</sup>

中情局对炮·斯里亚诺恩的援助在 1955 ~ 1956 年逐渐减少，尤其是在边境巡逻警察在边境地区查处 20 吨鸦片的消息被《星期六晚邮报》以一种戏剧性的故事曝光以后，援助更是每况愈下。<sup>②</sup>但是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在毒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亚洲人权委员会最近在香港发布的一项报告就对此进行了暗示。该报告以警方对谋杀案件的记录文件，以及泰国边境巡逻警察被抓现行的案件为基础。“据称，泰国边境巡逻警察会为了捏造案件劫持并虐待囚犯，以获取赎金。”该报告还补充如下。

如今，泰国的警方部队目的和动机正如法炮制炮·斯里亚诺恩将军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模式……通过一些新的单位，如边境警察，泰国的警方部队具备了准军事功能。其经营毒品贸易、实施劫持和无罪杀害人质，并被炮·斯里亚诺恩及其盟友当作政治基础。特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尽管人们都普遍承认现在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泰方持续不断地对警察进行改革的努力均宣告失败。<sup>③</sup>

最后一句话同样适用于中情局涉嫌卷入全球毒品网络的有关情况。

---

① McCoy, *Politics of Heroin*, 184.

② Darrell Berrigan, "They Smuggle Drugs by the Ton,"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5, 1956, 42.

③ "Thailand: Not Rogue Cops but a Rogue System," a statement by the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HRC - STM - 031 - 2008, January 31, 2008, <http://www.ahrchk.net/statements/mainfile.php/2008statements/1359>.

## 第四章

# 回降、泰国空中警察增援 部队和老挝：战前准备

事实上，作为一个机构，我们对国外的毒品走私来源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活动……希望这样有助于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sup>①</sup>

笔者认为，从来没有人真正地对老挝的遗产进行过思考。那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展开的最大规模的行动与印度支那的鸦片贸易结构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sup>②</sup>

### PSB D - 23 文件、多诺万和泰国空中警察增援 部队：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战前准备

1952年，随着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中情局与东南亚的毒品联系在总体态势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防守保持策略转变为长期回降准备。在这一年的选举期间，共和党号召“压制”苏联在东欧

---

① Richard Helms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1971, quoted in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1), 477.

② Interview with Alfred McCoy by David Barsamian, February 17, 1990, <http://www.lycaem.org/drugwar/DARKALLIANCE/ciah3.html>.



的利益，并对蒋介石“松手”。之前陈纳德的支持者，《时代与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则要求美国改变其在远东的政策和人员部署。但是，共和党一旦当选并面对现实情况时，其对李弥军队的兴趣就下降了，而炮将军在美国政府和大使馆的地位却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1953年，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回降主张得到了认可，但美国这次主要指望的是泰国，而非国民党。<sup>①</sup>

根据国务院的《美国外交关系》(FRUS)文献和五角大楼提供的部分文件可知，美国在1953年介入印度支那的目的是为了“深化”其对法国的支持。后来，美国对越南的介入同样延续了其在1953年针对介入泰国而制定的关键决策，但当局对此视而不见。<sup>②</sup>

1953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份编号为PSB D-23的重要战略文件，提议对法国提供支持，并“通过扩大跨越泰国边境的准军事力量以及其他方案”以“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从而逐步营造胜利的形势”。<sup>③</sup>该提议“明确指出将泰国作为基地，对共产主义展开公开和秘密的准军事行动；在该计划的第二阶段，泰国可能会充当美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展开类似行动的前

- 
- ①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第一次《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威胁“放弃蒋介石”，但是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连续两年不断的贩毒问题使得蒋介石和其朋友陈纳德均失去了华盛顿当局的支持。截至1953年，华盛顿中央当局一致同意，国民党的丑闻事件助长了缅甸的共产主义势力，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See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3-19, 46-49, 53-62.
- ②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Vol. 1, 85; cf. David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Press, 2000), 11.
- ③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2, September 14, 1953, 688-691. 这些完整的文件从未示以众人。它们被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法恩曼总结并援引了艾森豪威尔图书馆PSB D-23文件的一个早期版本，该副本仍可查询到印度支那的内容。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170-173, 299-300.



沿阵地”。<sup>①</sup>

这项文件由艾森豪威尔的特别助理 C. D. 杰克逊进行指导起草，他曾被卡尔·伯恩斯坦称为“亨利·卢斯的中情局私人密使”。<sup>②</sup> 彼时，美国意识到法国在越南很快就会战败，它亟须启动后继措施，以便共产党将来掌控印度支那地区后，在此建立进行秘密抵抗活动的中心。<sup>③</sup> 这种新的战略基于伪人类学前提，可谓无知而滑稽：假想“泰国人民的种族联系在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和中国同样存在”。<sup>④</sup>

无论这种前提多么荒谬，但在 1953 年，即法国和越南在 1954 年签署日内瓦和平协定的数月之前，执行 PSB D-23 文件所采取的措施在 1960 年 12 月成功地在老挝煽动起了一场战争——后来演变为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次公开武装冲突。这些措施的第一步是增加对炮将军的边境巡逻警察的援助，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另一个机构——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sup>⑤</sup>

- 
- ① William O. Walker III,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nglo-American Search for Order in Asia, 1912-195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209.
  -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70 (drafted); Carl Bernstein, "The CIA and the Media," *Rolling Stone*, October 20, 1977, 63, quoted in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5 (Luce).
  - ③ 这表明短剑组织的后续部队已经在欧洲和土耳其扎稳脚跟。
  - ④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2, 689;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72. 按照法恩曼的说法，PSB D-23 文件“基于众多已知事实、待定事实和误解，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的基础之上”。他指出，PSB D-23 文件表明，美国不再对非泰国人的赫蒙族抵抗泰语的低地老挝人的活动提供支持。“泰国人的种族联系”之说仅能认为是作为二战后，基于荷兰与德国，或法国与意大利的“种族联系”。而此次，这确实反映出披汶有着将缅甸与泰国相关的区域、老挝以及柬埔寨等（二战中日本允许披汶占据）国家与地区联合起来的民族主义眼光。
  - ⑤ PARU 的其他解释有泰国空中增援部队 (Police Aerial Resupply Unit)、空中警察营救部队 (Police Airborne Rescue Unit) 等。所有的称呼都暗示着一个事实，即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这个预备役部队正在逐渐发展其进攻能力。



截至1953年后期，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发展成为辖有94个排，每排成员45人（或4230人）的规模。这些应对暴力行径的部队装备精良，机动性良好，擅长沿泰国边境收集情报以及执行跨境作战和侦察行动……通过其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中情局顾问，美国对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和边境巡逻警察的训练与行动几乎了如指掌——因为后者是“他们的”组织……但美国顾问的行动剑走偏锋，导致一些人在行动中被杀害。<sup>①</sup>

比尔·莱尔的口述历史访谈清楚地表明，虽然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曾一度遭到中情局中层官员的反对，甚至差点被终止，但该部队仍获得了两位战略情报局官员的重要支持，他们是战略情报局远东分站站长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纽约社会名人录成员、政策协调处职员，负责监管行动方案）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sup>②</sup>

## 从华尔街上流社会了解威廉·多诺万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新任命的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

- 
- ① Thomas Lob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Denve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nver, 1977), 24, emphasis added. 洛比称，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在1953年多诺万抵达之前就已经被建立了；这一说法在德州理工学院比尔·莱尔的采访中得到了确认 [第65页：“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1951年3月），为了进行游击战争并进行准军事训练活动，我就筹建了这所培训学院”]。65：“The PARU? When I first went there (in March 1951), I opened this training school for guerilla warfare including parachute training”. In contrast, Fineman writes that “Donovan helped Phao found (PARU) in 1953”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2). 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创建于1958年。Timothy N. 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 1955-19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7-38.
- ② Texas Tech University, Vietnam Archive Oral History Project,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December 11, 2001, <http://www.vietnam.ttu.edu/star/images/OH/OH0200/OH0200-part1.pdf>, 83-85.



尔·史密斯将前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作为大使派遣到了曼谷。多诺万此行身负双重使命：一方面，他要承担中情局与李弥的毒贩之间进行直接联系的责任；另一方面，他要使炮将军的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建设成为可单独对抗中国共产主义的替代堡垒。

多诺万被授予的具体指示是实施 PSB D-23 文件所述的远期战略，并为“在泰国建立一个堡垒（从此可向毗邻区域发起各种行动）”做准备。<sup>①</sup> 多诺万的选择虽然重要，却充满争议。前战略情报局局长，蒋介石和回降计划的支持者，也是“一位秘密行动和游击斗争的狂热信徒”，而且他与麦克阿瑟、华盛顿、新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及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②</sup>

与此同时，多诺万拥有的资源能对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不仅可通过美国共和党政府，而且可通过政府之外的力量来实现。如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威廉·凯西一般，多诺万能够从上流社会调集非政府力量和资源。他从哪里获取这些资源尚未可知，但其传记经常提及华尔街、艾伦·杜勒斯以及英国特务头子威廉·斯蒂芬森等。

在朝鲜战争前的一段时间里，多诺万已经“数次造访东亚，并成为回降计划强有力的提倡者”。<sup>③</sup> 1950 年，他造访了“‘缅甸和日本之间的所有国家’，号召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秘密行动”。此外，

① Chairman of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Walter Bedell Smith (the former CIA director) to Cutler, September 11, 1953, in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SPANSA) Papers, NSC Series, Briefing Notes Subseries, SEA folder, box 16, Eisenhower Library, quoted in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79. The quoted words do not occur in the truncated version of this memoreproduced in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2, 687-88. However,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rust of that memo and still more with the document, PSB D-23, which it transmitted. We shall see below that there are questions whether in fa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had authorized the document's proposed cross-border operations, which led to the Vietnam War.

②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0.

③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31.





“早在1950年比德尔·史密斯对中情局进行重组之时，多诺万便作为顾问进出中情局”。<sup>①</sup> 他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传播，这有点像一年前陈纳德的计划，但不同的是多诺万特别呼吁为整个区域任命一位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sup>②</sup>

得到任命后，多诺万便反复要求，作为大使以及“总统的个人代表”，他有必要“拥有对这些区域展开自由造访的权利”。<sup>③</sup> 尽管多诺万寄予希望的获得更高级别的区域性任命被美国拒绝，但他仍“开始飞遍亚洲，自己负担自己和其助手的费用”，因为他相信，“如果能让泰国确定反对共产主义，就必须解决该地区和本地的问题”。<sup>④</sup> 多诺万还“最先”从美国给其战略情报局的老伙伴威利斯·伯德发送电报。<sup>⑤</sup>

新聘用的中情局预备役军事案长官比尔·莱尔于1951年3月1日抵达泰国，并开始训练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初始地点在洛布里，后来移到皇宫附近的华欣<sup>⑥</sup> [比尔·莱尔很快就迎娶了斯蒂·萨瓦特斯拉 (Sitthi Savetsila) 的妹妹，因此他将成为威利斯·伯德的姐夫]。随着多诺万的到达，中情局对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的援助（从

① Burton Hersh, *The Old Boys: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A* (New York: Scribner's, 1992), 410.

②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514, quoting British Foreign Service Report of interview with Donovan.

③ Anthony Cave Brown, *The Last Hero: Wild Bill Donova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822-823.

④ Brown, *The Last Hero*, 824-825. 在同一页，布朗指出，多诺万在“迅速朝贫困进发”(825)指出，到1954年1月他受到中情局和艾伦·杜勒斯以现金赠送方式的帮助(828)。多诺万还说服艾伦·杜勒斯将本地中情局站点建设成为囊括“众多前战略情报局成员的‘微型战略情报局’”，其中有备受争议的人类学家和种族理论家卡尔顿·库恩和戈登·布朗(825)。库恩和布朗曾与摩洛哥的穆斯林部落为中情局工作。库恩为多诺万的战时服务还涉及一个报告(他在该报告中主张组建一支刺杀精英部队)(252-253, 269)。

⑤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1.

⑥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62.



1951年开始)骤增。截至年末,泰国至少有76位对外公开的美国顾问,并有多达200位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秘密候补顾问。<sup>①</sup>多诺万自己周末大多在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洛布里省的伞兵营地度过,该营地于1950年设立,用来训练炮将军麾下的警察部队。<sup>②</sup>毫无疑问,此时该营地已经成为PSB D-23文件所要求的“越过泰国边境地区(特别是在老挝)展开更多准军事行动和其他行动”的基地。<sup>③</sup>为确保得到足够的支持,中情局和美国新闻处(很快)开始在曾攻击君主政体的泰国制造虚假的共产主义手册。<sup>④</sup>

与行动方案如出一辙的是,这些回降行动在1953年9月PSB D-23文件正式被授权之前便开始进行。对此,1952年美国选举之前,该文件已经作为获准的美国政策目标的组成部分代替了回降计划。截至1952年6月,已经有100名人员从洛布里营地毕业前往缅甸,(按照行动方案)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者展开丛林战训练。<sup>⑤</sup>

## 1954年:法国战败,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 第二部分授权姗姗来迟

PSB D-23的第二部分——多诺万的回降计划——在1954年

- 
- ① Lob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24.
  -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4, 181. 法恩曼说,多诺万的到访“与其说是监督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不如说是重温与老伙伴的旧时光”。Cf. Brown, *The Last Hero*, 825, 下一段涉及法恩曼的优秀著作中罕见的错误之一:认为泰国边境巡逻警察是“在多诺万在任期间成立的”。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是在1951年成立的。
  - ③ 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彼时中情局远东站的头目、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均到访过营地。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84.
  - ④ Paul M.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pol Adulyadej*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4.
  - ⑤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41.



之前是否收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仍有待商榷。正如法恩曼所提到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直接向法国军队提供援助，迫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9月仅对第一阶段（即增强泰国进行抵抗的意愿和能力）予以授权，由此却无限期推迟了第二阶段（即将心理战带到邻国）的执行。<sup>①</sup>

截至9月，经过充分修订的PSB D-23文件承认：“印度支那仍是抵抗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美国军队和物资不能从此地转移走。”（这一改变反映出陆海空三军更倾向于在印度支那向法国提供传统的空中和海上支持，而对中情局提议的非传统战争的兴趣索然）因为这一转变，海军上将雷德福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该报告可能没有什么异议”。罗伯特·鲍伊促成了该计划进一步的修改，从而“明确表明，任何启动泰国计划第二阶段的决定必须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自身决定”。<sup>②</sup>

在《美国外交关系》里，直到法国在印度支那战败后的1954年7月，尚无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考虑PSB D-23计划的任何迹象。此时，一份呈递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印度支那的军事发展……打断了PSB D-23计划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形象地表明了印度支那对共产主义的损失程度”。<sup>③</sup>

但是，多诺万在1953年到达泰国后，便利用海洋供给股份有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79-180, emphasis added; cf.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1, 689-690. 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异议由雷德福上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表明，但多诺万似乎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并非伟人”）、杜勒斯兄弟和比德尔·史密斯（他们“毁了”中情局）的胆怯政策的失望。Brown, *The Last Hero*, 826.

②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1, 685-686.

③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1, 732.



限公司在洛布里拥有训练基地（曾用来训练炮将军的警察部队）的有利条件，采取措施直接实施第二阶段（截至1953年，“200名中情局的顾问来此培训泰国警察部队，并为其提供保障”<sup>①</sup>）。法恩曼写道，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在这一期间扩展成为一个具有攻击性的跨境组织。他认为，这里面有极大一部分是由莱尔发起的行动造成的，虽然华盛顿某些人士截至1953年已经决定停止洛布里的训练计划，但该营地的中情局长官威廉·莱尔对其进行了抵制。他建议组建一个新的泰国组织，以在邻国开展秘密行动。因为这一计划符合PSB D-23计划的要求，所以多诺万和华盛顿方面欣然批准了莱尔的建议。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于是得以成立。经过1953~1954年两年的发展，该组织俨然成为一个小型高效的游击和反游击部队。<sup>②</sup>

但是，从《美国外交关系》得知，C. D. 杰克逊，即PSB D-23计划的原作者，认为法国被击败后，泰国就成为进行反共产主义活动的一个后备基地。1954年初，在拒绝海军上将雷德福关于美国军队在莫边府介入的建议后，艾森豪威尔命令五位高级安全顾问（包括C. D. 杰克逊）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如何应对“印度支那即将发生逆转的形势”。据加雷斯·波特称，“会议上讨论的其中一个方案是，如果印度支那失败，泰国可在此‘设立一个堡垒’”。<sup>③</sup>

杜勒斯和雷德福均认为，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后，“侵略”最可能的形式就是颠覆活动。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颠覆活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5.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2, emphasis added. 法恩曼引用了对莱尔的个人采访，笔者据此推断此处的“华盛顿”是指中情局。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学校从华富里（Lopburi）重新迁到华欣。Cf. Roger Warner, *Back Fire: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War in Vietn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31-32. The date that the BPP school relocated from Lopburi to Hua Hin was 1953.

③ Gareth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72, citing *FRUS, 1952-1954*, Vol. 13, 981-982.



动可能“受到当地类似泰国的武装袭击……他指出，这比建造一个区域内的主要军事防御力量代价要小得多”。<sup>①</sup>

很明显，华盛顿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案。在一个新的却基本无效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即 SEATO，由八个国家组成，其中只有泰国位于东南亚大陆上）的框架之下，美国军队加强了对泰国的支援。条约承诺美国将为保卫泰国而战斗，但谨慎地以“为了排除美国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武力……最有可能在越南”这种方式来起草内容。<sup>②</sup>

换句话说，美国不会使用武力推翻日内瓦协议。但是，同样清楚的是，美国仍在计划抵制协议的全面执行，尤其是对 1956 年越南选举的控制上。此时，无论从哪方面估计，河内均将取得对北越和南越的控制。

美国此举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除泰国的焦虑，美国明确表态，特别是像老挝这样的国家，不会屈服于北越的影响。

在与泰国外交部部长翁昭旺·怀他耶功（Wan Waithayakorn）亲王和大使波特·沙拉辛的磋商中，杜勒斯将新的协定（东南亚条约组织）描绘为，在包括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区域，可能还包括越南的部分地区，构建一条新的防御线。<sup>③</sup>

此时，美国唯一可用来履行这一保证的非军事资产就只有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我们了解到，该部队确实成为美国介入老挝的中流砥柱，并成为美国在老挝进行秘密战争的初始骨干力量。

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披汶领导下的政府变得越来越中立，

①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84, citing *FRUS, 1952-1954*, Vol. 12, 528.

②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84, cf.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97.

③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84, citing *FRUS, 1952-1954*, Vol. 12, 613.



1957年8月，泰国发生政变，而上述情况就在政变之后随之发生。泰国的新任领导人是陆军总司令沙立·他那叻，他是炮·斯里亚诺恩和警察的敌人。炮将军随后迅速逃往瑞士，而美国幕后支持的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则被永久关闭。另一方面，沙立重申了泰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承诺，并同中情局商谈了谅解协议。

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和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将被取消自治权，美国不再对警察部队提供大量关键援助，但中情局的情报活动，以及以泰国为根基的区域性行动可以继续进行。事实上，不久之后，中情局（部分通过泰国站）开始对身处老挝的沙立的堂兄弟进行支援。沙立和中情局对此达成共识。<sup>①</sup>

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是美国在该地区用来推翻《日内瓦协定》的主要准军事力量。截至1954年初，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对在越南内部发展敌后游击组织的计划展开了讨论。截至1955年，中情局情报官员爱德华·兰斯戴尔一直利用牵涉毒品走私的泰语部落以及其他山区部落对北越展开攻击。<sup>②</sup>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47.

② 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 1975* (New York: Knopf, 1986), 44;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3, *FRUS, 1952 - 1954*, Vol. 12, pt. 1, 364. According to Sucheng Chang, 中情局第一次听到老挝的赫蒙族是在爱德华·兰斯戴尔 (Edward Lansdale, 其在老挝的一名特工) 熟悉赫蒙族和他们的战斗力之时。Sucheng Chang, ed.,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 1961年，一份由兰斯戴尔发给肯尼迪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备忘录表明了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泰国边境巡逻警察、“老挝赫蒙族出色的战士”以及“总计99人、与老挝的赫蒙族游击队共同行动的13个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小分队”等精确信息 (备忘录未标注日期，显然是从1961年7月开始的，五角大楼文件) (undated memo, apparently from July 1961,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 643 - 649).



## 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如何获得 报酬？部分通过毒品实现

据法恩曼所述，“中情局对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泰国边境巡逻警察以及其他部队支付工资”。<sup>①</sup>但上述内容仅能在炮将军的警察局长的继任者翁昭旺·怀他耶功·瓦拉旺亲王于1957年的声明中得到确认，对此我们稍后进行讨论。事实上，该计划的负责人比尔·莱尔在其口述传记中承认，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通过上缴从国民党处获取的鸦片来获取部分资金。<sup>②</sup>

截至1953年，中情局已经给炮将军的警局提供了价值3500万美元的援助。<sup>③</sup>中情局也是通过自身来历不明的资金，为已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定的计划的第二阶段埋单吗？或者，它严格遵循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资产和资源的禁令，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吗？<sup>④</sup>

其中一个可能性，正如斯戴林和佩吉·西格瑞夫所写，到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专门用于秘密行动的秘密政治行动资金，其来源是纳粹党卫军欧洲的战利品，以及日本在亚洲盗取并囤积的黄金。<sup>⑤</sup>这一假设争议性极大，而且似是而非。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毫无疑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7年12月创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该小组在缴获的轴心国资金中洗钱超过一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2.

②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137 - 139.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84.

④ 法恩曼指出，美国为两项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管理的补充计划提供资金，一项是群众性的“志愿保卫队”，另一项是针对北部山区部落村庄的学校、诊所和基础设施的永久计划（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2 - 183）。这些计划被归入PSB D-23文件的第一阶段，但某些泰国边境巡逻警察新兵从一开始便被培训“从敌后战线跳伞”。Lob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24.

⑤ Sterling Seagrave and Peggy Seagrave, *Gold Warriors: America's Secret Recovery of Yamashita's Gold* (London: Verso, 2003), 3.



千万美元，并用这些资金影响 1948 年意大利的选举”。<sup>①</sup>

尚不清楚这一行动在何时终止。但可以确定的是，在 1972 年以前的多年内，中情局曾大方地给日本自由民主党提供资金。<sup>②</sup> 诺伯特·施莱（一位杰出的律师，后因调查此事而受到严重的处罚）认为，资金来自一个秘密的“M 基金”<sup>③</sup>，后来查默斯·约翰逊证实了 M 基金的存在。

① Amy B. Zegart, *Flawed by Desig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A, ICS, and NS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9, citing Christopher Andrew, *For the President's Eyes Onl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172. See also U. S. Congres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April 26, 1976, 94th Cong., 2nd sess., Senate Report No. 94-755, bk. 4, 28-29.

② Chalmers Johnson, "The 1955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A Bibliographic Introduction,"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JPRI Working Paper No. 11, July 1995, [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_11.html](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_11.html); These issues reentered the news when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on October 9, 1994]. 中情局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耗资数百万美元支持日本右翼。这一报道并未提及之前从未遭受强烈怀疑的事情，但它却提到了某些重要的参与者，包括阿尔弗雷德·C. 厄尔默，1955~1958 年中情局东亚行动的负责人；罗杰·希耳斯曼，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处头目；厄·亚力希克斯·约翰逊，1966~1969 年美国驻日本大使。上述人物均承认向自由民主党亲自或授权打款。Cf.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116-121. 这种说法有点偷工减料，它错误地宣称中情局与儿玉誉士夫（全球贩毒联系的一部分和非法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的联系在 1953 年“被切断了”（part of the global drug connection and a major source of illicit funds）“was severed” in 1953.

③ Norbert A. Schlei, "Japan's 'M-Fund' Memorandum," January 7, 1991,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JPRI Working Paper No. 11, July 1995, [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_11.html](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_11.html). 战后早期，麦克阿瑟将军了解到，为在日本发展民主制度，并重建其被摧毁的经济，有必要对其进行财务援助。因为这些资金的一部分会用来资助政治活动（为使民主力量有良好开端），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基金。随后建立的该项基金主要被用在战争结束后日本武装力量在战争期间占据的占领区（如中国、朝鲜、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等），掠夺那里的资金和财产。这笔财富（战争结束后被转交给美国）在日本国内并未记录在案，且麦克阿瑟无须任何美国的公开立法活动便可自由使用。





M 基金……初始来源是没收的日本军队资产，包括他们储备的从所占领国家掠夺而来的工业钻石、白金、黄金和白银的销售额，解体的财阀公司股票的销售额，以及所谓的政府救济占领区拨款（GARIOA）或对等基金（不可兑换的日元账目，来源于美国官方支援进口的物品和授权的石油类进口物品在日本的销售额）。所有这三类资产在占领结束后均被汇聚到 M 基金。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将其移交给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该资金由美国和日本共同运作。<sup>①</sup>

管理 M 基金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儿玉誉士夫，这位被关押的战犯转移了中情局的资产，我们之前谈到，此人是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的共同创办人：“儿玉誉士夫在日本黑手党、执政的自由民主党（LDP）以及游走在前战犯羁押之处的维持秩序的美国执法机关之间建立了邪恶的三位一体关系。”<sup>②</sup>

施莱因调查 M 基金而被迫害并定罪可视作本文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象征或警告，美国政府在公众面孔的背后仍保留着诸多秘

① Johnson, “The 1955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I have not seen-and Worldcat is not aware of-Hajime Takano, *M-Fund: The Unknown World of Underground Finance*. Cf. 永治武田：“作为一名学者，明白什么东西能够发表很重要。”“On the M-Fund,” Japan. Inc, <http://www.japaninc.com/article.php?articleID=1327>.

② Declan Hayes, *The Japanese Disease: Sex and Sleaze in Modern Japan* (Bloomington, IN: iUniverse, 2005), 262. Cf. David E. Kaplan and Alec Dubro, *Yakuza: The Explosive Account of Japan's Criminal Underworld* (Rending, MA: Addison-Wesley, 1986), 68. 在缅甸的儿玉誉士夫和李弥的国民党部队均参与了向中情局提供彼时供给短缺的战略性金属钨。Jonathan Marshall, “Opium, Tungsten,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40–52,” in *Drug Control Policy: Essay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William O. Walker II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0–104.



密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sup>①</sup>

此外，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基金进行循环利用的，可能不只日本一个国家。笔者本人从前中情局情报官员处得知，中情局曾白白花费 2000 万美元支持印度尼西亚两个右翼党派参加 1957 年的选举。

但最终，正如我们从比尔·莱尔口述历史所了解到的那样，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资金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其自身的毒品交易得来的。<sup>②</sup> 在比尔·莱尔口头采访中，他描述了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是如何搜查泰国北部国民党残部的鸦片仓库，并缴获“大量”鸦片的。因为根据泰国政府规定，他们有权保留所缴获鸦片价值的一定比例。“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去那儿的原因。”<sup>③</sup> 不管莱尔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都详细地描述了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同国民党走私犯在缅甸与泰国边境附近进行的枪战，尽管这是按照设定程序、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行动。国民党游击队总是无一例外地丢弃鸦片扭头逃跑，而英勇的泰国警察（莱尔是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的一名长官，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是这次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把鸦片带到曼谷，并将鸦片零售价值的 1/8 作为奖励收入囊中。<sup>④</sup>

莱尔补充道，“我认为应该有 40 吨的鸦片，这可不少”（之后他进一步补充称，“还有很多小规模的行动”<sup>⑤</sup>）。40 吨实在是不小的数目，这比二战前缅甸的年总产量还要多，是 1949 ~ 1950 年泰国鸦片消费量的 2 倍；大概是缅甸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年总产量

① Fo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Schlei's conviction, se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1, 2003; Johnson, "The 1955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Seagrave and Seagrave, *Gold Warriors*, 130 - 137.

② 正如前文提到，科森将此作为吉拉姆谋杀案和 1952 年中情局“Thai Flap”的一个可能解释。William R.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Empire* (New York: Dial, 1977), 323.

③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137 - 139.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86.

⑤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139.



的 1/10 ~ 1/5。边境巡逻警察（由上将炮·斯里亚诺恩执行）在 1955 年夏查收的 20 吨鸦片所获奖励是 120 万美元或该鸦片总值的 15%。<sup>①</sup>

莱尔退休于得克萨斯州，他似乎从未从毒品交易中中饱私囊。<sup>②</sup>没有人能够确认莱尔的姐夫威利斯·伯德是何人物，他未曾在政府部门服务，但后来在 1961 年他帮助建立了泰国证券交易所。<sup>③</sup>据说，泰国的毒品走私使炮·斯里亚诺恩（中情局的一位线人）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sup>④</sup>（一位英国专家 2002 年告诉笔者，数以吨计的缅甸海洛因仍然通过泰国秘密出口）。

- 
- ① Darrell Berrigan, "They Smuggle Drugs by the Ton,"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5, 1956, 42, 156 - 57. 联合国麻醉药品管理委员会第 10 届（1995 年）会议之前，美国代表就指出，每年有 200 ~ 400 吨的鸦片穿越缅甸—老挝边境往南流入泰国，而泰国只消费其中的 100 吨（UN Document E/CN.7/303/Rev.1, 34）。人民一定对国民党营地外的骡车队印象深刻，它们很难接近。之前装载量为 65 吨的大篷车需要 180 头骡子才能拉动。Andrew D. W. Forbes, "The 'Cin-Ho' (Yunnanese Chinese) Caravan Trade with North Thailand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7 (1987): 25.
- ② 同时，在他的口头采访中，他坦陈，他因缴获 40 吨鸦片而获得过奖励，但随后的解释却含糊不清：“西奈尔（他的泰国替身）想要结婚。他说他钱不够，要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的话，就可以赚到一笔钱，喏，就是那笔奖励。但是等级不同，获得的也不同。所以，我也从中获得了一点利益，他们给我支付的东西，我永远也留不住。我用得到的钱买了骡子回来。”伯利根援引道，靠着这些奖励（缴获 20 吨奖励 120 万美元），我们或许可以计算出莱尔的缴获量，他可以获得超过 200 万美元，支付婚礼，“买一些骡子”绰绰有余。
- ③ "An Interview with Willis Bird Jr.," <http://www.irrawaddy.org/database/2004/Voll2.5/interview.html>.
- ④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Silkorm Books, 1999), 192;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51, 187, 192 - 193. 但是，与其他银行家的身份相比，炮将军在泰国毒品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短暂的。陈弼臣是当地中国潮州社区的领导人。根据一项研究，“陈成为泰国最富有的人，银行之王，被列为企业界世界十大富翁之一”。“The Tycoons of Thailand,” <http://www.geocities.com/wallstreet/district/1193/tycoon.htm>.



## 泰国毒品资金以及美国政治

很明显地，将毒品资金用于游说美国国会的建议存在着巨大阻力。泰国游说团的秘密部门召集了不少资源……通过多诺万、伯德或其他中情局联系人，彼时，炮将军已经雇用保罗·海利维尔律师……充当其除了多诺万之外的说客。据称，多诺万从泰国政府收到10万美元，而海利维尔则将国会任务一分为二，由多诺万负责共和党方面，海利维尔负责民主党方面。<sup>①</sup>

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律师，海利维尔全职供职于迈阿密，他是如何“拿下”民主党的？通过查询有关国外注册说客的年度报告得知，詹姆斯·诺维，供职于影响力大且和中情局往来甚深的华盛顿法律公司，即科克伦和诺维法律公司，作为泰国在迈阿密的国外说客，每年会得到三万美元的薪酬。托马斯·科克伦是民用航空公司，后称美国航空公司（曾向缅甸的国民党毒品营地运送武器）的一名关键人物。而泰国驻迈阿密的领事，毫无疑问，就是保罗·海利维尔。<sup>②</sup>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14 - 215, cf. 206.

② 笔者尚不清楚泰国政府付给了海利维尔多少钱，该政府15%或更多的收入来自其依然合法的鸦片垄断，也许还有更大一部分来自非法的毒品走私活动。法恩曼告诉我们，多诺万作为大使退休后，被泰国雇用为“一位‘经济顾问’（即说客）……他们给多诺万25000美元做开销，而且在1955年后期，据说又额外增加了75000美元”（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06 - 207）。自此，不时会有未加调查的报道，有一笔可疑的资金从亚洲到达美国政治家的手中（正如第2章中提到的）。如需了解像“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 Citizens in Asia for Nixon”（由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领导）之类的非调查资源，see Renata Adler, *Canaries in the Mineshaft: Essays on Politics and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65 - 68。如需了解受到毒品侵袭的巴基斯坦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贡献，请参见第7章。如需了解与巴基斯坦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有关联的印度尼西亚的利亚迪斯（即所谓的Lippo Gate）（转下页注）



由于莱尔的揭露，我们必须对 1957 年由边境巡逻警察头目翁昭旺·怀他耶功·瓦拉旺亲王（可能是中情局的线人）发布的公开声明——中情局对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和边境巡逻警察支付薪酬，做出更加严格的审视。<sup>①</sup> 不能由 1954 年国家的安全委员会授权的事实自动推断其为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第一个未授权年。同时，翁昭旺·怀他耶功·瓦拉旺的揭发也促使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倒闭，此外，国际合作总署（国际开发署前身）对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进行了支持，后者由此做出了转变。美国则一直在幕后推动这次改变，用以弱化其与炮将军的联系，并降低中情局与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联系的公开程度。<sup>②</sup>

但在 1957 年，翁昭旺·怀他耶功·瓦拉旺对外宣称边境巡逻警察和空中警察增援部队随时随地都在接受非法毒品走私活动的支

---

（接上页注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克林顿的贡献，see Peter James Rimmer and H. W. Dick, *The City in Southeast Asia: Patterns, Processes and Poli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215–216。利亚迪斯是印度尼西亚教父林绍良（其在陈弼臣的帮助下上台）的门徒。Joe Studwell, *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7), 95–96。

- ① 笔者个人认为，中情局到 1957 年可能还一直在向这些组织支付薪酬，但这并不能揭开 1953~1954 年的所有秘密。作为炮将军的敌人沙立的继任者，翁昭旺·怀他耶功亲王无论如何绝不会是一位中立的观察员。1957 年，他攻击了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因为他和沙立错误地认为，炮将军可能借助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来对抗自己，从而避免受到驱逐，并夺取政权。中情局借助沙立的攻击行动切断其与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已变得臭名昭著和不受欢迎）的公开联系。翁昭旺·怀他耶功亲王是老挝王子佩差拉亲王（后者成了沙立和泰国在老挝的主要盟友）的堂兄弟（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6）。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在 1953~1961 年间所采取的很多措施（以美国的视角看，这些措施可以对抗“共产主义”）肯定也被控制毒品贸易的人员看到了；彼时，缅甸人正逐渐将国民党赶出缅甸，因此这些措施就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受到庇护的通道，使得老挝的毒品得以运往其他地方。
-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44–247; cf.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79–81。我们现在知道了，中情局一直从美国经济援助中抽取数百万美元，原因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Weiner, *Legacy of Ashes*, 28–29）。



持，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也不该期待，丹尼尔·法恩曼会在其杰出著作（耶鲁大学论文）中提出，是否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会像边境巡逻警察一样，通过毒品获得资金援助的问题。在此，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准政治性研究的社会学上。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情局是否在利用毒品交易为其行动提供资金这样的问题，在那时的博士论文中可谓是凤毛麟角。<sup>①</sup>

与此同时，有关中情局通过毒品活动获得行动资金这一话题被禁止讨论，由此带来的困惑和缄默造就了美国政治中所谓的黑暗象限（dark quadrant），人们对此只能通过外部收集来的线索推测其具体情况。<sup>②</sup> 黑暗象限的存在慢慢地剥夺了我们对政治历史的了解。<sup>③</sup> 一旦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将不再是一个民主社会，也不再是一个共和政体的社会。

这对国家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它就能帮我们解释为何一个官僚集团（利用泰国作为基地），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总是能够在总统授权甚至知晓之前，促成美军在东南亚的行动。

① 1972年，即中情局在老挝建立毒品资产一年多之后，查尔斯·斯蒂芬森在 *The End of Nowher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since 1954*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中对此事有所提及，但也是不痛不痒，无关政治。斯蒂芬森的书原本是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教授的哈佛大学论文。

② *FRUS, 1952-1954*, Vol. 12, pt. 2, 有关与缅甸、菲律宾和泰国的交易。在这一时期，中情局在上述三个国家中都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在742页的全文中，仅有两处简单地提到了中情局（第39、681页），而对其行动压根就没有任何记录。这是《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内容的一大特点，中情局推翻伊朗的摩萨德一事没有记录在案。

③ 数十年来，美国人有关泰国的学术著作既没有提及鸦片，也没有提及中情局，这令人很难理解。See, e.g., David Wyatt's otherwise useful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在1967年末之前，中情局出品、补助或赞助了超过一千本书，其中一部分明显属于学者研究的领域。U. S. Congres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April 26, 1976, 94th Cong., 2nd sess., Senate Report No. 94-755, bk. 1,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453.



截至 1965 年，或晚些时候，美军在东南亚的介入终于导致了越南战争的爆发。

## 五角大楼、中情局和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 在老挝的战前准备，1958 ~ 1959 年

1954 年，随着法国在印度的战败，泰国开始与其北部的赫蒙族以及其他山地部落展开合作。但请注意，他们很多是“半游牧的部落……在未定界的边境地区……自由地游走，并且通常与邻国的亲戚维持着紧密的关系”<sup>①</sup>（与此相关的是，赫蒙族在炮将军麾下的泰国边境巡逻警察的鼓励下，为了种植鸦片，纷纷从北部涌入泰国的丘陵地带<sup>②</sup>）。

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再次利用中情局资金和设备，于 1954 年夏季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在北部的山地部落和村庄建立永久存在。在公开方面，泰国边境巡逻警察设立了学校和诊所，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而在秘密活动方面，它为游击战中的部落男子提供武器和培训。美国最终希望将这些流动的部落男子连同其在邻国老挝的种族联系一起部署到位。中情局将很大比例（可能是绝大部分）的资源用于该项计划。<sup>③</sup>

从泰国的角度看，这一计划部分程度上是属于防御性质的。大多数山地部落，尤其是赫蒙族，对划分国家的边境或者边境上的政府都不太关心。但在 4 年之内，这却成为一场跨境侵略行动，对梭

①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3.

② 二战后，规模最大的赫蒙族向泰国进行迁移。彼时，他们和山区部落开始“在泰国北部山区漫山遍野地种植罂粟”（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18）。

③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3.



发那·富马亲王统治下的新老挝政府的中立立场发出了挑战。<sup>①</sup>

“约1958年”，法恩曼写道，“中情局在泰国的帮助下，开始构建反共产主义的赫蒙族山区居民部队——老挝最大的此类组织，受赫蒙族领袖王宝指挥”。<sup>②</sup>这只是中情局既定目标的一部分，其竭力谋求推翻保持中立的老挝国王的侄子梭发那·富马亲王。后者1951年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当选为总理，1956年重新执政，最终在1958年被美国一系列的介入行动赶下台，然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在1960年通过一位受到美国培训的中立主义长官贡勒上校的努力重新夺回大权。<sup>③</sup>

威廉·M. 里亚雷是这一时期老挝经中情局批准的历史学家，他描述了中情局为阻止大使霍勒斯·史密斯对梭发那·富马亲王的支持（以及1956年签署的《日内瓦协定》）所做的努力。

史密斯想要鼓励梭发那·富马亲王（受过法国教育的政治领袖，领导联合政府，共产党员巴特寮是政府成员之一）保持中立立场。中情局情报站站长亨利·赫克歇尔认为，美国应该向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反共以及亲美势力提供秘密的财力援助。由于华盛顿的犹豫不决，中情局便无视大使存在，按自己的方式行事。<sup>④</sup>

- 
- ① 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36. “从1957年起，由美国出资，一小部分老挝士兵在泰国军事基地接受了非正式的培训”。
  -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3. 根据华纳所述，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和莱尔是在泰国北部的赫蒙族之间第一次听说王宝这个人。Warner, *Back Fire*, 32.
  - ③ 对于美国在1958~1960年的介入活动（其中CAT公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e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28-133.
  - ④ William M. Leary, “Foreword,” in *Covert Ops: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by James E. Park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x. Leary's account of “CIA Air Operations in Laos, 1955-1974,” is posted on the CIA's websit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winter99-00/art7.html>.





在美国战争机器为战争做准备的过程中，中情局并不是唯一的力量，它与五角大楼的人员以及两位就职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亲国民党官员（沃尔特·S. 罗伯森和 J. 格雷厄姆·帕森斯）一起合作。在罗伯森的指导下，美国的财力援助得以输送到老挝，用来建立与老挝政府有联系的老挝军队。<sup>①</sup> 随后，1958年6月，通过保留按月拨付的援助款项，这些人员迫使梭发那·富马亲王辞职。他的替代者培·萨纳尼空于1959年2月宣布，老挝不再受《日内瓦协定》条款的约束。培·萨纳尼空承认了台湾当局，并同意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引进非正式的顾问。

参谋长联席会议从1958年9月开始一直在努力将军事援助顾问团引入老挝。<sup>②</sup> 他们迅速批准了9个美国陆军特种部队（Operation Monkhood，僧侣行动）小分队，分别于1959年3月1日、4月1日和5月1日3个人一组，着便服抵达老挝。<sup>③</sup> 中情局也做出了响应，于1959年3月将其航空公司——民用航空公司重组为由中情局完全控制的公司，并将其名称更改为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第一次开始出租C-130大型运输机，并准备训练直升机（由海军陆战队分配而来）飞行员。<sup>④</sup>

五角大楼推动军事援助顾问团在老挝培养军事精英一事（虽然他们的到访对热爱和平的佛教国家的任何人而言，不太和谐）符合当时美国战争机器发展第三世界的战略。兰德公司于1959年召开了一次有关“不发达国家的军事角色”的会议，与会者为来自巴

---

① Martin E. Goldste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Rutherford,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35. “1956年，美国在老挝的防卫支持上花费了4770万美元，而在技术合作上仅花费了100万美元”。

② Editorial note, *FRUS, 1958-1960*, Vol. 16, 478.

③ Udorn Royal Thai Air Force Base, “Escalation in Laos,” <http://udornrtafb.tripod.com/id15.html>.

④ John Morrocco, *Thunder from Above: Air War, 1941-1968* (Boston: Boston Press, 1984), 10.



西、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军官。在本次会议上，与中情局有所联系的美国学者向“军国主义社会”的“偏见”发出挑战，并督促军官团发挥更加积极的政治作用。以下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教授的评价远非最极端的。

军事领导人对西方的怀疑往往远小于文职领导人，原因是他们本身在情感上更加安全……军人的统治如果对国家整体发展不感兴趣，那其本身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这使我们得出结论，不发达国家的军队可能会对加强本国行政职能做出重大贡献。<sup>①</sup>

6年内，缅甸、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某些参加了兰德会议）的军官们成功地在各自国家上演了军事政变。正如我们将要了解的，截至1960年末，五角大楼和中情局在老挝也诱导了一场军事政变。

受到美国军力集结的鼓舞，培·萨纳尼空于1959年5月命令巴特寮部队服从老挝皇家军队的纪律。但其中一个营却发生叛变，并向北越边境的东北地区撤退。该营从7月中旬开始驱逐孤立前哨的皇家军队。因此打响了可能演变为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枪。<sup>②</sup> 这不需要多少火力就可以实现，一支小型皇家卫队“早已做

① Lucian R. W. Pye, "Armi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d. John J. Johns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87-89. 在同一会议上，兰德公司的盖伊·鲍克催促印度尼西亚官员“袭击、清扫他们的老窝”，quoted in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No. 2 (Summer 1985), 239-264, 那些礼物一部分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政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② Grant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Crows Nest: Allen and Unwin, 2002), 113.



好了向更安全的环境撤退的准备”。<sup>①</sup> 历史学家认为，1959年7月和8月的这些事件仅发生在局部地区，并未牵涉北越。据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所述，“直到1959年9月……北越才激活一个新的援助小组，为新的巴特寮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补给”。<sup>②</sup>

然而在1959年8月，老挝官员抱怨称“北越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积极地在边境地区展开巡逻”。<sup>③</sup> 史密斯大使在8月9日给国务院发电报称，老挝官员所言“明显夸大了事实”，并指出北越军队的积极参与“尚未得到证实”。<sup>④</sup> 但是艾伦·杜勒斯8月6日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称，“对老挝的战争是由共产主义势力促成的，而且毫无疑问，北越时任领导人胡志明在莫斯科就已讨论过此事”。他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使用自由世界志愿者，并指出“泰国与南越有素质很好的士兵，可以成为有效的志愿者”。<sup>⑤</sup> 在老挝使用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努力因此未能赢得艾克的支持。

事情在8月30日发生了改变，据伯纳德·福尔所述，当时在东北部的桑怒省（现今更名为华潘省）“再次发生了针对老挝军队哨所的重型局部攻击”。老挝军队再次斥责了北越的攻击。西方新闻报道将其解读为“北越军队挺进到桑怒市13英里的范围内（合众国际社）”，而在9月5日，《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专栏作家约瑟夫·奥尔索普的“精彩的现场报道”，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北越

① Martin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8. 威廉·里亚雷在中情局的网站上写道：“美国人出现的时间和 FAR 与巴特寮之间爆发冲突的时间刚好吻合。”我们将会了解到，第1支美国军队3月份抵达，而战争是在5月后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的。

②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04.

③ Paper prepared by Assistant White House Staff Secretary John S. D. Eisenhower, *FRUS*, 1958-1960, Vol. 16, 548.

④ Telegram of August 9, 1959,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FRUS*, 1958-1960, Vol. 16, 555-556.

⑤ Dulles briefing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6, 1959, *FRUS*, 1958-1960, Vol. 16, 553.



发动的有炮兵支持的全面入侵”。

“所有这些”，福尔评论道，“简直是在瞎说”。<sup>①</sup>更确切地说，这是出于奥尔索普的利益，由老挝军队的两位将军（其中一位是陆军参谋长欧安·莱提肯）在桑怒上演的一出好戏。他们向“四个骨瘦如柴、高个的年轻村民（其中一个腿部受伤严重）”介绍了奥尔索普。据其所述，他们刚刚在季风季节徒步穿越了45英里的丛林，而事实上，在这样的季节，要穿越10英里以上都很困难。<sup>②</sup>将军们的动机可能很简单：要在近期一份提到有关该计划转接的国会报告发布后，维持用于支付步兵工资的美国援助资金的流入。<sup>③</sup>但约瑟夫·奥尔索普的及时赶到表明，华盛顿某些人士希望使用一次虚假的老挝危机来推动他们自身的深层次议程。

自从其远房堂兄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施政后，奥尔索普一直是一位华盛顿内部人士。在哈佛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由波斯廉组建的“绅士俱乐部”，后者也接收了他的叔公西奥多·罗斯福，但却拒绝了奥尔索普的堂兄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加入。<sup>④</sup>奥尔索普后来又成为“纽约精英布鲁克俱乐部”的一员，他便与亨利·卢斯、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沃尔特·罗伯逊等人为伍。二战中他担任海军情报官员，并在此范围内被分配到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虽然技术层面上是陈纳德的助理，但事实上他和他的朋友托马斯·科克伦是陈纳德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直接中间人。

1949年，奥尔索普支持并宣传陈纳德不太受人欢迎的计划，该计划旨在使用空中力量帮助蒋介石在大陆生存。<sup>⑤</sup>为了应对法国

① Bernard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64), 334.

② Bernard Fall, *Anatomy of a Crisis: The Laotian Crisis of 1960 - 1961*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115.

③ Hugh Toye, *Laos: Buffer State or Battlegrou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6.

④ Leann Grabavoy Almquist, *Joseph Alsop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ist as Advocat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9 - 10, cf. 76.

⑤ Almquist, *Joseph Alsop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57.



1954年在奠边府遭遇的危机，奥尔索普“主张美国空中支援、部署美国军队，甚至使用战略原子弹”。<sup>①</sup> 奥尔索普长期的私人朋友和支持对象还包括国防部、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人员，如乔治·佛瑞斯塔、艾伦·杜勒斯，尤其是前政策协调处长官弗兰克·威斯纳及其密友，即《华盛顿邮报》的菲利普和凯瑟琳·格雷厄姆。<sup>②</sup> 因此，奥尔索普从1959年起帮助实施中情局计划，即从陈纳德的旧航空公司（现已重组为美国航空公司）对老挝军队进行空中支援，也就不足为奇了。<sup>③</sup>

老挝的虚假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被机敏的观察者，如伯纳德·福尔（法国人）和丹尼斯·华纳（澳大利亚人）等人充分告知于天下。<sup>④</sup> 但是像威廉·里亚雷这样的历史学家依然辩称，中情局1959年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应对那年夏天的战斗。

老挝平静的局面在1959年夏天发生了骤变，巴特寮和皇家政府爆发了战争……美国回应了支援请求，并派遣特种部队（后来称为“白星”）去训练老挝皇家军队。与此同时，中情局还通过其秘密拥有的航空公司，即美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增加对其军队的后勤支持。<sup>⑤</sup>

事实上，来自美国航空公司（1959年3月被重新命名）的首

① Almqvist, *Joseph Alsop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80.

② Hersh, *The Old Boys*, 307-308, 438.

③ 笔者参考了1970年“奥尔索普的‘入侵’事件”后，笔者的一个朋友，可能在《纽约书评》工作，委托一位共同的朋友向奥尔索普就其1959年发表的文章提问。据说，实际上奥尔索普回复称，他仅是团队的一分子，帮别人一个忙而已。奥尔索普到底帮助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人们对此表示好奇。

④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34-335; cf. Fall, *Anatomy of a Crisis*, 136; Denis Warner, *The Last Confucian*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210.

⑤ Leary, “Foreword,” x.



批两架飞机于8月23日便到达了万象，一周之后奥尔索普才宣称发生了“新的大规模攻击”。<sup>①</sup>

## 1960年五角大楼、中情局和泰国空中警察 增援部队在老挝发动战争

由于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艾伦·杜勒斯和美国促成的上校联盟——位于老挝的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CDNI）的支持，富米越来越频繁地介入老挝政治。1959年12月23日，杜勒斯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指出，“在老挝，如果巴特寮受到抑制的话，则需要政府做出巨大的改变方可”。<sup>②</sup>第二天，富米就在老挝首都万象部署了军队，强迫总理辞职，若非西方大使“告知他们反对建立一个军事政府”，他可能自己就夺取了政权。<sup>③</sup>

1960年4月，为了支持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中情局官员给村庄的首领分发了大量金钱，帮助并操纵了一次具有欺骗性的议会公开选举。<sup>④</sup> 见识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腐败情况之后，受到美国培训的陆军上校贡勒于1960年8月让梭发那·富马亲王重新执政，老挝议会

①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72. Cf. Leary's further details about the CIA's preparations on the CIA's website, 参见里亚雷的中情局网站上，有关中情局准备的进一步行动的详情：“1959年夏天，老挝引入了一个美国特种部队小组，代号为赤脚（Hotfoot），由亚瑟·布尔·西蒙斯中校指挥。12个移动培训团队分别负责越南的琅勃拉邦、沙凡内克和巴色地区。美国人出现的时间和FAR与巴特寮之间爆发冲突的时间吻合。鉴于这些发展，老挝的CIA官员要求了额外的空中运输资源”。William M. Leary, “CIA Air Operations in Laos, 1955 - 1974,”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winter99-00/art7.html>, emphasis added.

② Dulles NSC briefing of December 23, 1959, *FRUS, 1958 - 1960*, Vol. 16, 491.

③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09 - 110.

④ Arthur J. Dommen, *Conflict in Laos: 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1), 133;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10 - 111. 斯图亚特·福克斯援引了南隅的例子，巴特寮在此地掌权，他们的候选人收到13票，而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收到6508票。



批准了梭发那·富马的新政府。随后，美国政府也正式承认该政府的合法性，但五角大楼和中情局这些战争机器却对此莫衷一是。梭发那·富马亲王也受到来自南越的吴廷琰和泰国的沙立·他那叻（与富米有联系）的反对，沙立则对万象实行了全面的贸易禁运。

对老挝政治进程失去控制的五角大楼和中情局开始准备军事政变，第二次罢黜梭发那·富马亲王，并让富米·诺萨万取而代之。截至1960年9月，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泰国飞到泰国边境的沙湾拿吉，为富米的叛军基地提供物资，并给“200名刚在泰国完成培训的老挝伞兵部队”提供物资。<sup>①</sup> 同月，美国对贡勒的军事援助被切断，“用来按月支付政府和军队物资的资金”被推迟了一个月。<sup>②</sup>

富米的军队经过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培训（由美国特种部队军官领导），于1960年12月从沙湾拿吉向万象北迁。<sup>③</sup> 两周后，他们杀出了一条通往万象（在此地“牺牲了多达500人”）的血路。<sup>④</sup> 据罗杰·华纳所述，由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培训的军队是此次军事进攻的主力；此外，“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通信和医疗人员（与美国军队顾问合作）在富米夺取万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⑤</sup>

① 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23. 笔者在别处已经提到过艾森豪威尔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批准，正如他早先对 PSB D-23 回降计划的批准一样，授权总是姗姗来迟，而航班早在数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78-85, expanding slightly on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33-138.

②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14.

③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15.

④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16. According to Grant Evans, “some 600 people were killed”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119).

⑤ Warner, *Back Fire*, 32-33（受到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培训的军队）；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38（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技术人员）。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可能也对柬埔寨高棉沙立的非正规军进行了培训（在南越招募，据威尔弗雷德·伯切特所述，该部队在1956年和1957年从泰国基地突袭了柬埔寨）。Wilfrid Burchett,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Cambodia and Lao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41. 到了1959年，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在培训非正规军，即南越平民游击队。



以下是里亚雷对这些情况发展做出的解释，其中包括华盛顿对此的反应。

1960年12月万象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那时候，富米的军队到达了首都。里亚雷并未提及，在国外曾受中情局支持的叛乱者正在对美国承认的政府发动攻击。到了年末，贡勒（当时接收来自苏联空运的支持）撤退到了查尔平原。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12月31日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称，“如果我们失去老挝，我们可能会失去泰国和东南亚的其余地方”。伯克预测全世界范围内都能感觉到这一损失的影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任的最后几天里拒绝了直接进行军事介入的建议。然而，美国政府确实批准了中情局为老挝北部的赫蒙族部落成员提供武器和培训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菲尔特上将和国务院官员的支持。1961年1月，中情局预备役军事专家詹姆斯·W. 比尔·莱尔会见了赫蒙族领袖王宝。他发现王宝正为赫蒙族如何获得现代化的武器和培训而着急。鉴于中情局打算在老挝保持低调姿态，莱尔遂安排泰国边境警察培训首批1000名赫蒙族新兵。<sup>①</sup>

这就是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对赫蒙族的培训计划，据法恩曼所述，实际上，该计划于1958年便已开始实施。

所有人都认为，比尔·莱尔和中情局的远东负责人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于1960年12月，“在浓烟依旧滚滚之时”各自乘机抵达万象。<sup>②</sup> 两星期内，莱尔和他的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指挥官与

<sup>①</sup> Leary, "Foreword," xii.

<sup>②</sup> Warner, *Back Fire*, 32-33.





赫蒙族领袖王宝（莱尔在泰国首次听闻此人）进行了直接接触。<sup>①</sup>

因此，中情局便展开了代号为“动力方案”（Operation Momentum）的行动，这也是中情局为与北越为敌的王宝的赫蒙族提供培训和武器的计划。<sup>②</sup> 在老挝的99名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伞兵培训了赫蒙族部队，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与他们并肩作战。<sup>③</sup> 正因如此，莱尔才成了中情局“3万军队的建立者和领导者”。<sup>④</sup>

按照官员在1961年向《时代》杂志的解释，中情局的目标是要“分化老挝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阵营”。<sup>⑤</sup> 到1960年，这一动摇行动将中情局（利用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引向了老挝的战争。但是，这次单边行动与驻老挝的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布朗的建议相左。它也标志

- 
- ① 根据赫蒙族的说法，哈里·C·阿德霍特将军也出席了莱尔与王宝之间的会议，他代表美国政府与赫蒙族签署了协议。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人口、难民、移民报告之前，赫蒙族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发布谭克拉布寺集体提议。因此，根据约翰·普拉多斯的说法，中情局官员斯图尔特·麦斯文出于政治目与赫蒙族进行了接触。John Prados, *Lost Crusader: The Secret Wars of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7. 普拉多斯写道：中情局官员斯图尔特·拉普多斯的说法，中情局官员斯图尔特·麦斯文“经过一系列造访，终于说服了王宝与中情局结盟”，John Prados, *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346, 但蒂姆·维纳和华纳意见一致，他们认为是比尔·莱尔“发现”了王宝 (Weiner, *Legacy of Ashes*, 212)。Keith Quincy, *Harvesting Pa Chay's Wheat: The Hmong and America's Secret War in Laos* (Spokane: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6 - 177; cf. finally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U. S.),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1999, 77.
- ②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85; Warner, *Back Fire*, 36 - 47;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08. 法恩曼援引对前大使莱昂纳德·乌格尔的个人访谈录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3) 称，“中情局在泰国的帮助下”在“约1958年”开始设立并培训王宝的军队，而非莱尔、华纳、温纳、卡斯托和麦考伊所宣称的1960年。
- ③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84.
- ④ Warner, *Back Fire*, 377. 从1963年开始，莱尔也利用赫蒙族和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来支持老挝贡勒领导下的中立主义部队。1963年8月，莱尔派遣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爆破专家和赫蒙族人一起去破坏连接北越与查尔平原的主要干线N7。See Quincy, *Harvesting Pa Chay's Wheat*, Cha 8.
- ⑤ *Time*, March 17, 1961; discussion in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78.



着自 1954 年《日内瓦协定》签订起，印度支那又一次重新燃起战火，而此次带头的正是中情局、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以及他们的代理人。

虽然中情局表面打算反击北越在老挝的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它的行动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万象之战的政治效果是迫使贡勒的中立主义者投入帕特寮的怀抱。”<sup>①</sup> 北越给了帕特寮部队（主要由该国多数民族，即老龙族组成的军队，其自身日渐陷入冲突的泥潭）越来越多的支持。

麦考伊已经表明，中情局和美国航空公司通过提供稻米和空运来帮助赫蒙族进行传统的罂粟收割。为维持王宝的忠诚并帮助支付他军队的薪水，他们运输“部落的经济作物”鸦片（后来运输的是海洛因）。<sup>②</sup> 但是麦考伊并未提到，部分通过毒品支持的动力方案，在何种程度上是原先走私鸦片的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受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活动的延伸。

虽然得到包括 C. D. 杰克逊、多诺万、杜勒斯、菲茨杰拉德在内的高级阴谋集团的支持，但某些中情局人士也与原先的海利维尔—威廉·伯德派系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便不是像伯德那样忠诚的中情局特工，比尔·莱尔还是在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掩护之下来到了泰国。<sup>③</sup> 莱尔后来成了伯德的姐夫，因为两人都迎娶了盎格鲁——泰国战略情报局老兵西提·萨维斯拉的妹妹。<sup>④</sup> 炮·斯里亚

① Stuart-Fox, *A History of Laos*, 116.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90, cf. 317 - 327. 麦考伊将王宝描述为一名个人赞助商，并至少参与了一次海洛因运输活动，该海洛因是在中情局——赫蒙族在龙城基地的实验室精炼出来的（284 - 285, cf. 290 - 291）。

③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58.

④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3. 正如之前所述，他们的泰国姐夫西提·萨维斯拉于 1950 年被伯德招募进“其秘密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物委员会，以制定反共战略”，绕开了美国大使馆，并游说美国增加军事援助。委员会成员还包括炮将军、其岳父赖·春哈旺和沙立。因此，西提“作为炮将军最亲密的副官和翻译官之一便开始了长期的服役生涯”。后来，1980 - 1990 年，西提出任了 Prem 将军（泰国最后一位军事统治者）政府的外交部部长（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33）。



诺恩“得知莱尔效力于中情局，并以莱尔也成为泰国警局合法一员为条件，接受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计划”<sup>①</sup>（“合法”一词遮掩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炮将军那时在利用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可能还包括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来建立一个缅甸鸦片出口的实质性垄断组织”<sup>②</sup>）。

据称是威利斯·伯德亲戚<sup>③</sup>，曼谷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领导人，威廉·伯德获得了中情局的合同，为赫蒙族村庄修建飞机起落跑道。他还购买了一个由50架飞机组成的队伍，为赫蒙族运送物资，到1965年，他以100万美元将飞机出售给了美国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 Services，由罗伯特·鲁斯洛领导，罗伯特是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曾给在清迈的国民党运送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武器）。<sup>④</sup>

威利斯·伯德被授予美国在老挝的援建合同，但在1959年的国会报告中，此人最终被指控贿赂和无所作为。<sup>⑤</sup>三年后，正当肯

① Warner, *Back Fire*, 31; interview with Bill Lair, 67.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84. 笔者的声明并非对莱尔进行个人讽刺，他的确（不像炮将军）富可敌国。通过华纳对莱尔的同情描述，以及对其口头历史的采访中的自述语言（之前曾引用），笔者相信莱尔具有个人理想主义。

③ 几年前一位来自亚洲的美国人告诉笔者，威廉和威利斯·伯德是堂兄弟，但却没有找到进一步的证据。据有关C-46运输机的专题著作称，“Bird & Sons是美国中情局的控股公司，在东南亚运营各种飞机，主要是轻型飞机。事实上，Bird & Sons, Inc（由威廉·H. 伯德经营的私营航空公司）是A Bird and Sons（在越南和老挝经营的旧金山重型建筑公司）的一个航空分部”（<http://www.laoveterans.com/about.html>）。有关A Bird and Sons，笔者目前只能找到这些信息。20世纪70年代从泰国退休后，威廉·伯德买下了加州奥克兰的Leamington酒店，并着手经营。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569, citing, in part,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07-208;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129-131.

⑤ 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U. S. Aid Operations in Laos*, House Resolution 546, 86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2; Goldste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186-190.



尼迪竭力从老挝抽身之际，伯德又受到了鲍比·肯尼迪的司法部门的控告。<sup>①</sup>

## 1959 ~ 1961 年国民党军队在老挝加入中情局和 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

早在 1959 年 3 月起（中国台湾的民航空运公司在此月被重新命名为美国航空公司），一部分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便移师老挝，在那里，他们通过伯纳德·福尔所谓的“未知飞机型号的空运活动”获得物资。<sup>②</sup> 国民党帮助中情局在老挝西部建立存在，以与东部的赫蒙族遥相呼应。飞机隶属美国航空公司这一事实，在一架补给飞机 1961 年被泰国空军击落时得到了证实，亚洲反共联盟的台湾团体声称对此负责。<sup>③</sup>

1958 ~ 1962 年，中国遭受了大范围饥荒，受此报道的鼓舞，台湾的国民党从 1958 年便开始向缅甸投送新的武器和军队。按照考夫曼的话来说，“中国遭受困难的报道让蒋介石认为，是发动反攻的成熟时机了”。<sup>④</sup> 但是，国民党对云南的进攻反而使北京启动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反击行动。1961 年 1 月，缅甸军队在实力更加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之下，最终将国民党残余部队从其缅甸

①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62. 作为一名诗人，笔者将此视作美国身上正在发生之事的转喻。威利斯·伯德在泰国的生活直到其 1991 年去世一直平静无扰——唯一不便的是他无法再返回美国。那些胆敢起诉他的司法部长和他的兄弟（徒劳地想使老挝中立）均遭到了谋杀。同时，在老挝，伯德的姐夫，即中情局特工詹姆斯·W. 比尔·莱尔与赫蒙族领袖王宝敲定了一项协议，旨在向美国航空公司和毒品运输活动开放赫蒙族的鸦片产区。William Leary, “CIA Air Operations in Laos, 1955 - 1974”, <http://www.cia.gov/csi/studies/winter99-00/art7.html>.

② Fall, *Anatomy of a Crisis*, 99.

③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94 - 195.

④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0.



总部驱逐出去。在国民党向难以控制的掸邦边境地区下达政府指令时，缅甸和中国开始针对国民党新的挑衅活动做出反应。

端掉国民党在孟帕辽的老巢后，缅甸对外展示了数箱于近期投放的弹药，这些全是美国从旧金山附近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运来的弹药。随后的宣传使得新任总统肯尼迪和国务卿迪安·鲁斯克下定决心消除国民党在缅甸的存在，这曾使他们感到无比尴尬。然而，驻台北的美国“官员”埃弗雷特·庄莱德对国民党抱有一丝同情之心，他缓和了肯尼迪要求台湾照此执行的一部分压力。<sup>①</sup>

大约 1000 名国民党士兵向南撤退，李文焕和段希文将军则撤到了泰国北部。至少 2000 ~ 3000 名士兵穿过湄公河进入老挝，在南隅安营扎寨。<sup>②</sup> 受到来自肯尼迪的压力，台湾削减了在泰国的所谓的国民党第 3 军和第 5 军的支持活动。<sup>③</sup> 但它新成立了一个编号为 111 的特别营（即 Battalion Special 111），并将其加到了南隅部队之中，该部队士兵是从朝鲜战争中的反共分子中征募而来的。<sup>④</sup>

肯尼迪和鲁斯克仅获得了来自像庄莱德大使等人的忠诚支持，他们由衷地希望能够终止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尴尬存在。<sup>⑤</sup> 然而，“在数月之内，中情局开始征募这些脱离关系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为雇佣兵，用来执行其在老挝西北部的秘密行动”。<sup>⑥</sup> 因此，国民党对缅甸鸦片贸易的控制并未终止，与此相反，他们还在泰国和老挝之外进行活动。1962 年，随着仰光发动针对吴努（U Nu）的政变，

①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1.

②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2, citing State Department Dispatches and Telegrams;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49.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52, citing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1971.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49;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235.

⑤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1 - 453.

⑥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77.



国民党重新进入缅甸。<sup>①</sup>事实上，人们估计，国民党通过孤立的哨所继续控制着掸邦多达5万平方千米的面积。<sup>②</sup>

林特纳对一份中情局文件总结之后，写道，“据称，老挝军队招募了400名或500名国民党士兵，用来在琅勃拉邦和班会赛之间的海域进行巡逻——此外，万象政府正试图征募更多士兵到远致北部的要塞南隅省展开活动”。<sup>③</sup>

林特纳未能清楚地说明，此处提到的“老挝军队”是受中情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的叛军，其主力是忠于比尔·莱尔的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仅仅在一个月之前的1960年12月，中情局、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以及五角大楼（伴随有来自美国大使积极却无用的反对意见）已将此所谓的政府安置在了万象。事实上，这是中情局的线人富米·诺萨万针对梭发那·富马亲王主张立宪并保持中立的政府发动的武装叛乱行动。<sup>④</sup>

1962年，南隅的国民党军队（1961年未遵照美国建议而建立）挑起了一个重大的国际危机。他们与国民党十年之前的行动如出一辙，即首先打探着进入敌人领地；之后，在经过第一次报复性开火后，便令人意外地撤退至泰国。<sup>⑤</sup>

在此次危机期间，中情局对南隅国民党部队的财务支持成了一

①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234.

② Tzang Yawnghwe, *The Shah of Burma; Memoirs of a Shah Exil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124-149.

③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202, citing CIA,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hinese Irregulars in Southeast Asia* (NLK-77-320, July 29, 1961). 维克多·考夫曼估计，2000~3000名的非正规军留在了老挝，其中一些人加入了该军队（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3）。

④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28-138.

⑤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51; Toye, *Laos*, 182. 《伦敦时报》1962年5月16日，《纽约时报》1962年5月7日，发表评论称，富米没有听从美国建议，而将他的部队集中于南隅“是为了挑起一场攻击”（Goldste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256）。



个争议话题。肯尼迪总统试图通过停止财力援助来清除国民党残余部队，但徒劳无功，某些未知力量继续保持着它们的存在。<sup>①</sup>《伦敦时报》暗示称，中情局自身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但资金可能来源于其他美国客户，可能来自中国台湾或泰国富米的堂兄弟沙立·他那叻，也可能来自毒品走私活动。<sup>②</sup>

随着1962年《日内瓦协定》的签订，肯尼迪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老挝的和平态势，但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即允许五角大楼将4000名美国士兵投送到泰国（首批投送到亚洲大陆的此类军队），并同意在越南建立类似补充性活动。<sup>③</sup>而这些军队的行动可能很快会将美国卷入越战。<sup>④</sup>

富米和国民党在老挝目中无人的挑衅得到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大力支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泰国对共产主义老挝，尤其是在其共同边境两侧，对所谓的红色赫蒙族产生了忧虑。另一个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解释，可能是美国（像之前的法国）想要确保老挝收获贵重的鸦片，使其不落入当时较活跃的越共手中。

①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51 - 152.

②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51 - 152, citing *London Times*, May 24, 1962, and May 31, 1962. 笔者同意麦考伊的观点，即在这场危机中，富米利用毒品走私活动来为其军队提供财力支持（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00），但笔者不相信，此时他有足够利润来弥补中情局的补贴资金缺口。

③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127 - 130, 135 - 138; *FRUS, 1961 - 1963*, Vol. 23, 936 - 939, 968 - 969. Cf. William Shawcross, "How Tyranny Returned to Thai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9, 1976,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8648>: "1964年，美国开始在泰国建立进行越战必要的基地；该国被转变成‘一个陆基航空母舰’。美国对越南轰炸于1965年从泰国基地开始；泰国军队（又美国支付薪酬）‘志愿’在越南和老挝参加战斗”。

④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xiii - xiv, 3 - 41;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09 - 111, 119 - 158. 需要了解导致越战中老挝所扮演角色的独立证据，see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20 - 35, “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让他的继任者面对一个介于战争与和平的当即抉择”（34），但正如几乎所有的档案历史学家一样，凯泽低估了毒品走私和中情局的航空公司，即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操纵事态的影响，cf. My Comments in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3 - 14.



但是，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所写的那样，最简单的解释便是，美国想要继续对陈纳德进行高级别的支持，而后者则希望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能够再次入侵中国南方地区，其第一次行动由杜鲁门总统于1951年授权进行。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这一梦想被中国“大跃进”引起的大范围饥荒的报道强化了。<sup>①</sup>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不愿意再提供任何援助，但中情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一部分人员，尤其是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有着不同的想法。

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和经过其培训的王宝领导下的赫蒙族继续在中情局在老挝的战争中扮演核心作用。中情局远东头目科尔比1967年访问老挝时得知，巴特寮每月400人的死亡是赫蒙族所为，赫蒙族还为空袭提供情报，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是400人的两倍。“通过对比，老挝皇家军队所造成的战争死亡人数仅仅是70人。”<sup>②</sup>王宝的赫蒙族（当其伤亡率增加时，其由泰国苗族替换人员增强了）越来越融入RLA的活动。<sup>③</sup>

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也被派遣到了老挝西北部一个最新建立的游击根据地，位于南隅，以便与中情局官员威廉·扬（由莱尔招募）领导下的瑶族和拉祜族游击队展开合作。<sup>④</sup>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到1966年南隅根据地注定会成为曼谷麻醉药品管理局毒品指控的焦点。<sup>⑤</sup>

①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451.

② Prados, *Lost Crusader*, 169. 与赫蒙族不同，低地老挝是虔诚的佛教徒，对他们而言，任何情况下杀戮都是令人憎恶的。他们的美国顾问发现这一品质是老挝下等文明的标志。

③ Roger Warner, *Shooting at the Mo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Clandestine War in Laos* (South Royalton, VT: Steerforth Press, 1996), 254.

④ Quincy, *Harvesting Pa Chay's Wheat*, 321.

⑤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R: TrineDay, 2009), 77;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421 - 422.





## 中情局对总统的操纵以及其对毒品贸易的影响

中情局在 1949 年与 CAT 公司在同年的表现（仅对公众隐瞒）和十年之后他们在老挝的表现（主要对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隐瞒）是有所区别的。政策协调处资助中情局的秘密计划在与国务院磋商之后就逐渐清晰明了起来，并经由总统批准的国会的紧急投票提供资金。<sup>①</sup>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高级领导阶层与艾森豪威尔的密谋还不如针对其进行的暗算活动多。<sup>②</sup> 通常，他们给总统的建议要么姗姗来迟，要么刻意误导。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9 年 12 月被告知，富米·诺萨万在老挝即将发动右翼政变。虽然这一政变事实上是由中情局所煽动，但艾森豪威尔在一个中情局备忘录中却被告知，“整个事件过程，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回避”。<sup>③</sup> 事实上，只有大使史密斯（此人强烈反对中情局的政变）在 12 月 22 日被告知美国对此事要保持“回避”。<sup>④</sup>

十个月后，即 1960 年 10 月 11 日，艾森豪威尔被告知，物资“将被空运至北部的非共产主义地区”，也就是王宝的赫蒙族地盘。<sup>⑤</sup> 而事实是，美国航空公司到王宝的空运活动（借此将其力量与中情局和富米绑到了一起）早在 10 月 5 日已经开始实施了。<sup>⑥</sup>

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详细描述的那样，美国逐步对富米增加支持的关键决策，是在艾森豪威尔处于由人为造成的孤立期（在苏格兰度假时、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时或在医院时）内由其延后

①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81 - 82.

②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33 - 156, 196.

③ *FRUS, 1958 - 1960*, Vol. 16, 720.

④ *FRUS, 1958 - 1960*, Vol. 16, 708, 720;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46.

⑤ *FRUS, 1958 - 1960*, Vol. 16, 893.

⑥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11;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34 - 135.



批准的。<sup>①</sup> 1960年12月的最终决定——提供美国飞机以支持富米——产生的影响是美国批准了美国航空公司一年多来一直在老挝进行的秘密行动。<sup>②</sup>

这与同一时期，美国批准在猪湾进行军事入侵古巴的决策有相同的结果，即限制和延迟了肯尼迪对赫鲁晓夫提出的缓和建议做出应对的能力。<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陈纳德一贯的支持者海利维尔和波利均卷入了猪湾军事入侵准备之中。<sup>④</sup>

中情局则更加积极地反对肯尼迪在古巴和老挝的意图声明。到了1961~1962年，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中情局积极地反对肯尼迪总统旨在平息老挝与中国与日俱增的对抗的意图。中情局密谋反对肯尼迪政策的一个例子即为，其将查尔斯·墨菲关于古巴和老挝的失实报道安排在《财富》杂志进行发表，对此，中情局竟然寻求国务院的正式通行证。<sup>⑤</sup>

威利斯·伯德阴谋集团也在老挝扶持了一个毒品政权。得到他们保护的从事毒品买卖的中情局线人富米·诺萨万第一次直接让其

- 
- ①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31, 135. 此外，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被人为阻隔在华盛顿之外（应对核攻击的“末日计划”预演的一部分）时发生了U-2侦察机事件。James Bamford, *Body of Secrets: Anatomy of the Ultra-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49-53.
- ② FRUS, 1958-1960, Vol. 16, 1009;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29-30;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29-137.
- ③ 中情局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后来提及相同原因称，他在1960年驾驶U-2侦察机横跨整个苏联，这个任务前所未有的，困难重重。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87, 112-113, 136.
- ④ Henrik Krüger, trans. Jerry Meldon, *The Great Heroin Coup-Drug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Fasc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16; cf. Alan A.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n the Bahama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1), 169-170.
- ⑤ Charles J. V. Murphy, "Cuba: The Record Set Straight," *Fortune*, September 1961, 94. Discussion in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136-137; Paul W. Blackstock, *The Strategy of Subvers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4), 250.



军队涉入鸦片贩运，“以作为其老挝军队和政府收入的替代来源……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决定最终导致老挝西北部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中心之一”。<sup>①</sup>与此相反，当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从老挝撤退时，那里的鸦片生产最终却一落千丈，产量从1975年的200吨降到了1984年的30吨。<sup>②</sup>

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那时，保罗·海利维尔（使中情局卷入CAT公司和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策划者）自己和中情局进一步牵扯进了朗斯基和洗钱活动之中。1965年，海利维尔帮助在巴哈马群岛建立了卡斯托银行，该银行迅速募集到了来自中情局、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国民党人物（如蒋介石女儿）的存款。<sup>③</sup>虽然笔者尚未见到证据，称设立该银行的目的是为了给毒品利润洗钱（这点经常遭到控诉），但毫无疑问，在伯德的阴谋集团直接介入中情局在老挝毒品买卖之际，20世纪60年代在巴哈马群岛，海利维尔和波利则加强了中情局与暴徒的联系。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政府——政策协调处——开始与无在案记录的人员加强联系，以开展不可告人且难以控制的活动，这显示了美国宪政整体的健康正在弱化，而且美国国防建设正在向具有攻击性的美国战争机器方向转变。换句话说，适合帝国无人监管的管理体系正在逐渐扩张，甚至开始转移，但国内的民主政府却要为此付出代价。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些无在案记录人员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与美国秘密外交政策相关，其对美国国内的健康发展带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00.

②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40.

③ Alan A. Block and Constance A.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Global Ban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39-44,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1, 67. 卡斯托银行的母行商业信托银行由海利维尔于1962年建立。



来了越来越多的灾难性后果。此外，毒品继续在财政资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美国肆无忌惮地支持阿富汗通过毒品黑市谋利，是（从此美国一直要面对的）“基地”组织威胁上升的主要因素。<sup>①</sup>

这种不计后果的支持使得巴基斯坦有超过500万人成为海洛因成瘾者，在阿富汗也有100万之多。而在1979年，上述两个国家的海洛因成瘾者可谓是寥寥无几。

### 派系决策：泰国的长期影响

受中情局支持的国民党在缅甸的贩毒军队也对泰国的民主有着类似的负面影响。通过泰国进行毒品贸易，这一路人皆知的事实，使得泰国政坛的继任者清一色地都是来自北部军队从事毒品贩运的军事强人——从炮·斯里亚诺恩（1947~1957年）和沙立·他那叻（1957~1963年）到江萨·差玛南（1976~1980年）。这些人的上台都得到了强大的背后支持，刚开始来自海利维尔和伯德，后来来自中央情报局。<sup>②</sup> 20世纪70年代，当上述支持活动在越战结束后下降时，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

这些军事强人背景相同，都在泰国北部的军队服役过。1943年，这支军队仍然占领着从缅甸夺取过来的鸦片种植地，即掸邦，他们与国民党军队联系密切，并与其建立了战后毒品联系。<sup>③</sup> 虽然

① See chapter 10; see also John K. Cooley,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on: Pluto, 1999), 81–161.

②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47–160. “炮将军”出于他的利益利用中情局，而中情局正利用他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的意愿。Surachart Bamrungsuk,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ai Military Rule, 1947–1977* (Bangkok: Editions Duang Kamol, 1988), 62.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05–106; Sterling Seagrave, *Lords of the Rim: The Invisible Empire of the Oversea Chinese* (New York: G. Putnam's Sons, 1995), Cha 10.



这些将军之间存在着竞争（尤其是炮将军和沙立将军之间），但这一小型派系对北部军队开发地下毒品贩运的共同依赖使得他们成为一个阴谋集团。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和伊朗鸦片从世界市场逐渐消失，国民党急剧增加了缅甸掸邦鸦片的年产量，从二战后每年不到80吨增加到了1962年的（据估计）300~400吨。<sup>①</sup>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泰国边境警察和曼谷流往世界各地：“1954年，新加坡的英国海关声称，曼谷已成为东南亚国际毒品买卖的主要中心……到了1955年，炮·斯里亚诺恩将军领导下的泰国警察已成为泰国最大的鸦片毒品买卖集团，并涉入毒品走私的各个阶段。”<sup>②</sup>

炮将军领导下的警察部队和沙立领导下的军队之间涌现的冲突，部分是对来自该贸易的可观利润展开的争夺。<sup>③</sup>出于对新诞生的SEATO的兴趣，美国对沙立及其军队的支持陡增，而炮将军的毒枭身份也随之在美国媒体上遭到曝光。在华盛顿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会见后，沙立通过两次快速政变（一次中止了宪法，一次废除了政党）中的第二次巩固了他的权力。但是中情局的联系却未受到影响。<sup>④</sup>

这些将军和毒品贩运的联系使得他们各个富可敌国。这也使得他们在与共产主义及其同盟的斗争中能够接近那些无在案记录的中情局资产。1961年，当国民党军队最终被缅甸（在中国的帮助下）驱逐时，李文焕和段希文将军的部队得到沙立的允许，在泰国边境内部的淡萼和美斯乐重建其力量。作为继续自由进行毒品走私活动的交换条件，两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第3军和第5军）要给泰国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62.

② Bamrungasuk,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ai Military Rule, 1947-1977*, 63.

③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56.

④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57.



保护，防御缅甸的进攻，并帮助镇压国内北部区域的本土起义运动。<sup>①</sup> 1972年，李、段两位将军和他们的军队正式并入泰国防御力量，并“直接受曼谷统帅部的统领”。<sup>②</sup> 他们的鸦片交易才得以生生不息。

---

① Catherine Lamour and Michel R. Lamberti, *Les Grandes Manoeuvres de L'Opium* (Paris: Seuil, 1972), 108 - 111.

②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05.

## 第五章

# 老挝——一场靠毒品支撑的战争

### 中情局对老挝毒品交易的介入

描写美国介入老挝，并与王宝进行合作的主流历史作品汗牛充栋，如提姆·温纳的 *Legacy of Ashes*，但有关鸦片或毒品走私的作品凤毛麟角。<sup>①</sup>然而，1972年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写就的不朽著作——*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一举打破了这种沉寂。他在作品中揭示道，在王宝的支持之下，赫蒙族在美国航空公司着陆场所的周围种植经济作物鸦片进行出口；中情局在老挝的探员富米·诺萨万曾用鸦片交易所获的利益对军队和政府进行资助；连同富米的继任者坎温·拉蒂康纳将军，上述二人均是老挝军事首领兼半官方的鸦片政府头目，从中情局工作人员和缅甸的掸邦领导人手

---

<sup>①</sup>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212, 253-255, 344. 韦纳写道，1950年，海科舍尔领导下的中情局“扶植了一个新的首相，即索瓦那·富马亲王”。实际上，他是指富米·诺萨万短暂地推翻了索瓦那·富马。然而，韦纳确实提到，泰国多诺万宣扬的中情局秘密行动有助于“泰国国家警察部队，其指挥官（炮·斯里亚诺恩，未命名）是一个鸦片大王”。



中进口鸦片。<sup>①</sup>

在总结对老挝和其他地方的调查成果时，麦考伊对中情局涉嫌卷入毒品交易做出了大胆断言。即便轻描淡写，此举在当时也引起不小轰动。

美国的外交官和间谍从三个不同层面参与到毒品贸易之中：第一，同时与好几个主要从事毒品贸易的团伙结盟；第二，通过掩护知名的毒贩并容忍其罪行来教唆毒品交易；第三，主动从事鸦片和海洛因的运输活动。退一步说，讽刺的是，美国的海洛因泛滥成灾全是自作自受……美国对毒品贸易的涉入不仅局限于与毒贩同盟这么简单；美国大使馆通过其（盟）国政府来掩护涉毒行为。中情局的合约航空公司为其运输，而中情局探员对这种鸦片走私活动视若无睹。在1972年以前，美国涉足金三角地区的间接结果便是该地区鸦片产量一直处于平稳上升趋势。<sup>②</sup>

与此同时，麦考伊评论称，“中情局与其他情报机构不同，它并没有借助毒品贸易来对其秘密行动进行财力支持”。<sup>③</sup>为此，麦考伊还与伯顿·赫什争论不休。伯顿·赫什写道，国民党军队在李弥的调集下，“逐渐发展成中央情报局重要的商业资产”。<sup>④</sup>在本章

①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58 - 261 (Phoumi and Ouane), 277 - 281 (Hmong);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1), 299 - 302, 317 - 321. Cf. Roger Warner, *Back Fire: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War in Vietn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121, 366 - 367.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14, 353;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3, 383.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5.

④ Burton Hersh, *The Old Boys* (New York: Scribner's, 1992), 300, citing Penny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Garden City, NY: Anchor/Doubleday, 1984), 67.





节，笔者将对以下内容进行论述：尽管我们对中情局与国民党等毒品走私者之间是否有正式的财务联系不可获知，但中情局运用其影响力、军事手段（如有必要）去操控毒品走私，以对其自身行动进行支持是确定无疑的。

尽管官方在长达近 40 年的时间里，一直对麦考伊的断言半信半疑，但他的很多观点站稳了脚跟。如今，有一部分人认为，麦考伊对其观点持有的态度比较谨慎，而非草率行事，乃至在其作品的第一版中，1972 年麦考伊就称“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是曼谷一家神秘的美国公司”，这暗示着，中情局不但对一些知名毒贩提供庇护，还鼓励并帮助其进行毒品交易。<sup>①</sup>

麦考伊近来强调称，中情局除了与毒贩结盟，并对其提供庇护之外，还雇用他们，加强这些人的实力。

如今，我们将中情局征募的这些结盟人员称为毒枭。1950 年，中情局借助这些毒枭的贩毒活动在缅甸东北部对抗中国共产党；1965~1975 年（越战期间），这些毒枭们在老挝北部进行着毒品走私活动；而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毒贩还利用其毒品走私活动对抗苏联在阿富汗的武装力量。在该地区，那些有权势、地位的政治大腕们掌控了社会与经济，而鸦片贸易在其中也占据了一部分江山。中情局将毒枭也纳入盟友范围内，而后者也借此机会，将他们在当地小打小闹的鸦片贸

<sup>①</sup>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130. In his 2001 edition, 麦考伊详细地指出：“在其 2001 年的版本中，麦考伊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华盛顿（实际上是迈阿密），政策协调处官员兼律师保罗·海利维尔，创立了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以掩护军火走私”到李弥在缅甸的贩毒军队。假设在 20 世纪 70 年代麦考伊的线人没有向他提过海利维尔，但笔者数月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书中，即 *The War Conspiracy*，确认了海利维尔和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其律师保罗·L. E. 海利维尔在 1951 年后同时也兼任 C. V. 斯塔尔的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The War Conspirac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2), 210.



易发展壮大，为全球市场以及美国提供服务。一旦和美国政府结盟，毒枭们就全然不受任何调查的影响。如果涉及任何非法商品交易，比如毒品走私活动这样经过精心组织的犯罪活动，想要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便是不受（任何调查）影响，而中情局恰恰能够给予这个特权。只要毒枭们和中情局结盟，当地警察和缉毒局也就不再靠近他们。<sup>①</sup>

从1972年开始，越来越多新出版的图书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中情局在毒品贸易中不再简简单单地充当“使眼色”的角色。1987年，在对满脸阴沉的缉毒局官员和海关官员进行了采访之后，詹姆斯·米尔斯对外宣称，中情局与“世界范围内的”毒贩有着密切联系，它不仅阻挠缉毒局的调查，还为此撒谎。

相关证据数不胜数。龙先生是美国政府联系人中的第2号人物，他身材矮小但具有贵族气质，他笑着谈论道，受中情局暗中支持的泰国人乘直升飞机翻山越岭，去中情局的线人坤沙那里收集“好东西”。坤沙是全球顶级的鸦片经销商，其海洛因交易合伙人，也因依附于中情局而出名。缉毒局策划了一个代号为“榴莲方案”的行动，旨在袭击卢徐水，但该计划后来被终止。卢徐水的妻子恰好是老挝政府“海洛因总理”波希里·查亚萨克的表妹。作为大麻、海洛因以及可卡因的重要走私者，阿尔贝托·西西里亚·法尔肯也被怀疑受雇于中情局……他得到一名墨西哥高官的营救，之后，中情局确定其（米格尔·纳扎尔·哈罗）为“墨西哥以及美洲中部地区最重要的毒品资源。”中情局在巴拿马禁止了缉毒局的一次情报行

<sup>①</sup> “An Interview with Alfred W. McCoy,” Education Forum, <http://educationforum.ipbhost.com/index.php?showtopic=6941&pid=63550&mode=threaded&start=#entry63550>, emphasis added.



动，此外还阻止了巴拿马毒品头目与缉毒局领导在华盛顿的一次会晤。<sup>①</sup>

道格拉斯·瓦伦丁在关于美国战后毒品管制历史的新书，《群体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Pack*）第2卷中，详述了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缉毒局以及海关官员们的抱怨之声。瓦伦丁描述了一位前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探员做出的声明，此人称其在越南逮捕了王宝，并缴获了50千克的吗啡碱。中情局在查明了事实后，却将毒品还给王宝，并将他驱逐出这个国家。<sup>②</sup>

经过对此人的认真调查之后，瓦伦丁转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断言，“中情局从色诺机场（靠近老挝南部巴色市的一个机场）空运海洛因”。<sup>③</sup>瓦伦丁亲自证实了阿尔弗雷德·麦考伊的陈述：即通过巴色和色诺的鸦片是经由多人之手协作才得以成交，这些人既有来自越南的空军也有科西嘉的企业家等不一而足。<sup>④</sup>走私者中的一部分（如越南空军长官阮玉湾）是中情局的线人；其他人，如科西

① James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1142 - 1143; cf. 727, 731.

②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R: TrineDay, 2009), 94; cf.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332 - 334.

③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73.

④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64;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99, 212. 不必惊讶，一些美国人亲眼见证了受保护的毒品流通之后，自己便从东南亚的海洛因中获利。两个显著的例子分别为，伯纳德·霍顿和迈克尔·汉德，他们移居到澳大利亚，并帮助创立了主要用来贩毒的纽甘—汉德银行。该地区参加秘密行动的其他老兵，如前曼谷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詹特伦，也加入了他们。也有其他老兵参与了银行的业务，包括前老挝中情局工作站站长西欧多尔·沙克利以及他的助手，还有曾与王宝一起在龙城担任基地中情局局长的托马斯·克莱恩斯。See Alfred W. McCoy, *Drug Traffic: Narco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in Australia* (Sydney: Harper and Row, 1980); Jonathan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New York: Norton, 1987) .



嘉人，或许并非在为中情局服务。

瓦伦丁写道，国民党的基地在老挝西部的南隅（Num Yu），“其向远东地区提供大量麻醉药品，国民党的这项运作受到中情局的保护”。<sup>①</sup> 也有其他人将南隅基地描述为 118A 号利马点（Lima Site 118A），它位于老挝西北部，是中情局“天空行动”（Project Sky）的空中支援基地。<sup>②</sup> 该基地的首任长官为威廉·杨，将其作为“中情局的指挥部，用来指挥深入中国南部的跨境情报袭击”。<sup>③</sup> 威廉·杨的最后一任继任者——托尼·坡（又名安东尼·坡塞坡尼，曼谷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也训练部落武士，并向中国派遣情报小组。<sup>④</sup> 地面潜入情报小组最好的办法是，将情报探员安插在国民党沿传统路线定期用大篷车运送毒品的队伍之中。

通过引用托尼·坡和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 1966 年的一条备忘录，瓦伦丁称，大量的鸦片被装在油桶内，从南隅运出，在暹罗海

- 
- ①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77. 将南隅描述为中情局“战略情报网络 118A”的所在地，中情局官员威廉·杨将两个拉祜族人通过国民党的大篷车渗透进了中国。Cf.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f*, 420 - 422;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35 - 337.
- ② “Lima Sites,” LaoVeterans.com, <http://www.laoveterans.com/about.html>; LaoTrip Report, May 5 - 13, 2008, 泰国 - 老挝 - 柬埔寨兄弟会组织, <http://www.tlc-brotherhood.org/Assistance/Laos%20Assistance%20Reports/May%20May%202008.htm>.
-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37.
- ④ William Leary, “The Death of a Legend,” <http://www.air-america.org/In-Remembrance/poe.shtml>. 坡在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的上级，即约斯特的继任者沃尔特·库兹马克，是霍华德·亨特的长期密友；当亨特起诉一家报纸时，他为亨特的代表做证称，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那一天他在达拉斯。Lisa Pease, “James Angleton Part II,” in *The Assassinations*, ed. James DiEugenio, Lisa Pease, Judge Joe Brown, and Zachary Sklar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3), 196. 1945 年 7 月，库兹马克被空投到泰国去执行战略情报局赋予的一项使命，彼时，亨特还在昆明的战略情报局工作站。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The Free Thai, OSS, and SOE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60.



湾通过复杂的空投，最终被运往香港。

托尼·坡证实了中情局的鸦片从南隅基地运出，运往班会赛附近的机场。<sup>①</sup>坡告诉作者，鸦片被装在油桶里，然后装到由台湾雇佣兵驾驶的C-47运输机上，在飞到暹罗海湾之后，就空投到海里，最后在特定地点守候的合伙人乘小船打捞起来。这些鸦片运到中国香港之后，由中国的药剂师将其加工成海洛因，最后通过相关代理人之手，卖给来自战略情报局的中情局的黑手党合伙人。1966年1月，中情局官员唐·惠特克在越南会见了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探员埃尔·哈比卜，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托尼·坡的陈述。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知道中情局的所作所为。惠特克的上司詹姆斯·里利在1989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一清二楚。<sup>②</sup>

瓦伦丁对中情局拥有鸦片份额的指控受到大多数观察人士的有力抗辩，且他的论述多源于托尼·坡的带有离间性质的回忆录，因此其可靠性受到了质疑。但是，瓦伦丁对于空投油桶的论述在罗杰·沃纳的《射向月球》（*Shooting at the Moon*）一书中得到了证实，这也表明老挝的毒品贸易是由有经验的国际毒贩组织的，而不是由像王宝或者老挝空军这样的外行进行组织。<sup>③</sup>

## 国际毒品网络联系以及老挝的鸦片

在数年间，科西嘉人一直通过驾驶小型飞机出入老挝的毒品泛滥地区（包括班会赛）。1962年，一名来自科西嘉航空公司老挝商

①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0.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388, citing interview with Tony Poe and Albert Habib Memorandum Report, FBN, January 27, 1966, cf. 77, 170;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422.

③ Roger Warner, *Shooting at the Mo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Clandestine War in Laos* (South Royalton, VT: Steerforth Press, 1996), 264.



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中国台湾被批捕并在泰国被短暂拘留，因为他向柬埔寨南部的海域空投了“29个防水锡箱，每个箱子里面都装有20公斤的生鸦片，并用可悬浮的安全带包裹着”。这家航空公司的老板波纳文图拉·弗朗西斯科和马赛市的古埃里尼财团关系密切（正如前文所述，他的手下曾帮助欧文·布朗清除了马赛市码头的共产主义分子）。<sup>①</sup>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到2010年，彼时，有指控称，阿富汗出口的大量毒品并非受阿富汗人掌控，而是由一些手段高明的国际毒贩进行操控。至于在老挝的这些国际毒贩是哪些人，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可能：其一，台湾的国民党分子。1961年，他们曾派遣马敬国去老挝领导第一独立分队。马敬国的基地在老挝的丰袞地区，由高级别的情报专员邵端松率领。邵的三个主要助手是雄心勃勃的兄弟：魏学龙、魏学刚、魏学贤，后者在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就立刻飞往云南。他们号称“魏氏三兄弟”，主要从事间谍活动及鸦片贸易。<sup>②</sup>

按照麦考伊的说法，魏学刚（前国民党中情局特工）是该地区四个最大的毒贩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李文华、罗兴汉和坤沙），他通过扩大鸦片输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sup>③</sup>

更大的毒贩是香港潮州三合会的马思雨。1967年，其辗转至金三角地区，与国民党将军李文华签署了一项采购协议。但是在老挝，马思雨组建了其最有价值的联盟，他与欧安·莱提肯将军达成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96–297.

②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9), 235–236.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40, 455, 1993. 1993年迁至缅甸后，魏学刚在新泽西州受到起诉，后来又因运送680公斤（1.3吨）的海洛因而被定罪，*Bangkok Post*, June 27, 1999; *Nation* (Bangkok), September 9, 2003. 七年后，有报道称，他成为了一名银行家，并购买了仰光五月花银行80%的股份（*Asian Economic News*, July 24, 2000）。



了供货协议。在1965~1971年，欧安·莱提肯还是老挝军队首脑，同时也是曼谷、西贡以及香港毒品圈的幕后操控者。……马思雨是否在香港约见了特莱菲肯特（他在1968年造访过香港）尚不可知，但是香港警方认为，从事后看来，他们在不久之后就为菲律宾毒品走私者建立了一个通信网络，以便其借道智利、巴拉圭及加勒比海航线向美国走私毒品。<sup>①</sup>

1977年，马思雨最终飞往台湾，并在那里继续受到“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保护”。他的哥哥马思纯，以及其侄子随后在各自缴纳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也纷纷逃走。<sup>②</sup>从台湾开始，马思纯就把他们家族的毒品生意转押到媒体行业上，就连美国最大的汉语报纸《世界日报》也包含在内。1998年，其家族产业，即香港最大的汉语报纸——《东方日报》报道称，四年前马思纯向英国保守党捐献了100万英镑。三个月以后，马庆万受邀与梅杰先生在唐宁街共进晚餐。<sup>③</sup>

① Martin Booth, *Dragon Syndicates: 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the Triads*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1999), 175, 177, 179;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79, 399-401, 405-408.

②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10-311. 马思雨于1992年在台湾逝世。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05-406. 1977年马家兄弟从香港飞到台湾不久，香港的星报就援引缉毒局的资料报道称，“大老板马思雨涉嫌犯罪，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针对中国大陆进行特务活动的台湾网络集团”，援引殖民地调查局资料后，其进一步宣称，中国内地的特工“为香港警察取证、粉碎涉嫌犯罪集团提供了很大帮助，使得犯罪集团的10人在香港被捕，马思雨在台湾被捕”。

③ *Independent*, January 20, 1998, <http://www.mapinc.org/drugnews/v98.n058.a10.html>. 《英国独立报》报道称，“附有马先生的儿子与约翰·梅杰的合照，自1978年开始，马先生一直作为一个逃犯在台湾生活，为了使其顺利从台湾返回香港，马方支付了这笔款项。三个月后，马先生的儿子，马庆万与梅杰先生在唐宁街共赴晚宴。“《东方日报》报道了邀请函的副本以及菜单——黄瓜和茵陈蒿汤、迷迭香烤羊肉、橙汁焦糖柠檬挞……昨晚，保守党拒绝对捐助方进行讨论，但是有个发言人称，捐款不附加任何条件。‘我们可以明确地保证，保守党从来不会或者永远不会接受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发言人说道。梅杰先生的发言人表示，梅杰先生昨天身在美国，因此不可能对1994年9月27日马庆万出现在唐宁街一事进行解释，因为这并没有列在前首相的官方活动清单之上。”



其他的国际毒贩主要是美国人。法国研究人员阿兰·拉布罗塞曾写过，曼谷的美国人，包括参加过老挝战争的老兵，如何在战后与科西嘉人、窝藏在老挝的赫蒙族残余势力，以及中国人进行协作，继续做老挝的鸦片买卖。<sup>①</sup> 这些毒贩很多都是行内高手，其中有一个叫阿特金斯的前美国士兵与其在美国本土的堂兄弗兰克·卢卡斯发展出了一个复杂的贩毒网络，“几乎专门用军用飞机向美国东部沿海地带运送海洛因”。（他们更为有名的手段便是，在装有越战亡灵的棺材里面塞上数公斤毒品。<sup>②</sup>）阿特金斯—卢卡斯的团伙受到了来自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内部的庇护，两名该局的官员因此还在1970年受到指控，但在两次无效宣判后均被无罪释放。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线人遭到谋杀后，美国一项针对阿特金斯亲信的案件则不了了之。<sup>③</sup>

按照前缉毒局探员迈克尔·莱文（其身份现为海关人员）的说法，清迈一家为阿特金斯—卢卡斯的团伙制造海洛因的工厂也受到了中情局的庇护。莱文的身份是一名黑手党高层人员，正是他开启了和曼谷下家的初次毒品贸易，后者承诺会带莱文去清迈的制毒工厂（而国民党的鸦片恰恰也在此进行加工）。然而，中情局的一名官员出面阻挠并禁止莱文前往此处，声称“我们国家还有比这（即毒品战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他命令莱文去捉拿其最初的目标，但最后就连这次行动也被终止。<sup>④</sup>

由此可见，这种错综复杂，保护重重的行动显然是经过精心组

① Alain Labrousse, *La Drogue, L'argent et les Armes* (Paris: Fayard, 1991), 240–244.

② Mark Jacobson, “The Return of Superfly,” *New York Magazine*, August 2000, <http://nymag.com/nymetro/news/people/features/3649>. Cf. <http://www.Wanttoknow.info/militarysmuggledheroin>.

③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1; cf. 103.

④ Michael Levine, “Mainstream Media: The Drug War’s Skills,” in *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ed. Borjess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2), 261–264.





织的犯罪行为。威廉·钱布利斯教授对此称，老挝的贩毒活动引起了南佛罗里达的黑手党头目桑托·特莱菲肯特的极大兴趣。

缉毒局的一位线人告诉我，朗斯基的宿敌桑托·特莱菲肯特在1968年携带“数百万”美元现金前往东南亚地区，<sup>①</sup>并将这些财物慷慨地捐献给亚洲的毒品制造商，特别是王宝，以此来换取这些人持续不断的海洛因供应。<sup>②</sup>

约瑟夫·特伦托也写道，在此期间，桑托·特莱菲肯特成了“王宝将军最大的客户”。<sup>③</sup>联邦调查局当时的记录对此确认称，1968年1月，特莱菲肯特乘机飞往中国香港和越南人弗兰克·富尔奇进行会面。<sup>④</sup>途中，他分别短暂停留在洛杉矶、新加坡和曼谷。在路上，（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官员告诉麦考伊）桑托·特莱菲肯特在西贡“与科西嘉的毒枭进行了接触”。随后不久，一批批海洛因便通过加勒比海和智利，从中国香港运抵美国。<sup>⑤</sup>

与特莱菲肯特不同的是，罗塞利过去一度与沙克利在高级别的预备役行动中紧密合作。1962年，威廉·哈维和沙克利在迈阿密将

- 
- ① William J. Chambliss, *On the Take: From Petty Crooks to Presid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3.
  - ② Joseph J.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Random House/Forum, 2001), 345.
  - ③ FBI document 92 - 2781 - 1276, April 24, 1968; NSA # 124 - 10197 - 10282, [http://www.maryferrell.org/mffweb/archive/viewer/showDoc.do? docId = 89707&relPageId = 2](http://www.maryferrell.org/mffweb/archive/viewer/showDoc.do? docId = 89707&relPageId = 2;); FBI document 92 - 2781 - 1262, February 16, 1968; NSA #124 - 10205 - 10242, <http://www.maryferrell.org/mffweb/archive/viewer/showDoc.do? docId = 128895&relPageId = 2> (Roselli).
  -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53.
  - ⑤ David Corn, *Blond Ghost: Ted Shackley and the CIA's Crusad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67. 考恩写道，哈维亲自将钥匙交给了罗塞利，但是中情局记录却显示，罗塞利、哈维和沙克利等，只是作为观察人士与奥康在一起，且罗塞利当时并不知道哈维和沙克利也在场。



一辆装满武器的 U 型卡车停在了当地一家餐馆的停车场，并在车上预留了钥匙，以便由罗塞利挑选的古巴人进行接应（后者与中情局官员吉姆·奥康尼尔一同对整个行动过程进行了监视）。<sup>①</sup>当中情局决定干涉美国的黑手党，刺杀哈维尔·吉拉多时，中情局的线人罗伯特·马休“将此信息”告知了哈维尔·吉拉多和罗塞利。“作为回报，他们征募特莱菲肯特促使这个密谋的刺杀行动得以实施。”<sup>②</sup>罗塞利和特莱菲肯特后来才得知，实际上中情局并未对其进行公诉，至少二人均已利用中情局这张牌获得了一次幸免于难的机会。

为何特莱菲肯特在香港联系老挝顶级人物王宝之前就先和罗塞利通气？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如这本书里面的其他问题一样扑朔迷离，笔者和多数读者根本就无从知晓。然而，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特莱菲肯特的香港之行绝对是在中情局全球贩毒网络的控制范围内展开的。

笔者对这些频繁遭遇的控诉所知寥寥，老挝中情局的指挥官西欧多尔·沙克利一手在特莱菲肯特和王宝之间牵线搭桥，可能他自己也牵涉其中。但是，许多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沙克利和其幕僚从迈阿密抵达老挝，并在那里和毒枭，如约翰·罗塞利进行合作。<sup>③</sup>更有甚者，沙克利老挝的下属大卫·莫拉莱斯成了巴色基地的长官

①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Report*, 173;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II: The New Revelations in U. S. Government Files, 1994 - 1995*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7), 59 - 63.

② 1987 年，笔者写了以下内容：“基督教会提出指控称，沙克利协助安排将老挝游击队的鸦片销往圣多明哥，‘作为回报，沙克利组织会收到固定比例的收入’。” Jonathan Marshall, Peter Dale Scott, and Jane Hunter, *The Iran-Contra Connection: Secret Teams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Reagan Er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36. 现在，笔者相信，克里斯蒂诉讼的宣誓书是毫无根据的，且其作者肯定受到了中情局资料的误导。

③ David Talbot, *Brothers: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ennedy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109.



[该基地位于靠近空军基地的色诺 (Seno)，王宝的鸦片就在此装船运输出国]。据罗塞利迈阿密的同事汤姆·克莱恩斯 (王宝在龙城基地的长官) 称，大卫·莫拉莱斯这个人“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甚至是和黑手党进行合作”。<sup>①</sup>

尽管这并非本章节的主要话题，我们还是值得了解一下，特莱菲肯特和莫拉莱斯经常受到指控，称其与约翰·F. 肯尼迪的暗杀行动脱不了干系——特莱菲肯特通过其终生律师弗兰克·拉加诺应对指控，而莫拉莱斯则通过其自身来发布声明。<sup>②</sup>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被派遣至老挝处理那边的贩毒活动之前，沙克利的老挝下属汤姆·克莱恩斯和大卫·莫拉莱斯就已经在和古巴的流亡人员 (以及特莱菲肯特在南佛罗里达的黑手党组织) 在贩毒活动上进行着广泛的合作。<sup>③</sup> 负责这次任务的是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他既是政策协调处负责行动方案的专家，也是莱尔和泰国

- 
- ① Corn, *Blond Ghost*, 85. 埃德·威尔逊告诉约瑟夫·特伦托，莫拉莱斯“将为沙克利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建立无线电发射塔，还是为毒枭付款。他已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了沙克利”。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344.
- ② 1963年后，在第三个证人出席时，莫拉莱斯对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即罗伯特·沃尔顿说道：“我们帮了那个兔崽子大忙，对吧？”Lamar Waldron with Thom Hartmann, *Ultimate Sacrifice: John and Robert Kennedy, the Plan for a Coup in Cuba, and the Murder of JF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6), 766-767, 808, 818-819; Gaetano Fonzi, *The Last Investigation*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3), 383-390. 沃尔顿后来在摄像头前告诉 BBC 记者肖恩·沙利文：“莫拉莱斯告诉他‘我们在达拉斯抓到了那个大混蛋 (JFK)，在洛杉矶抓到了那个小混蛋 (RFK)’” (Talbot, *Brothers*, 399)。笔者需要澄清一下，对拉加诺和莫拉莱斯的指控言论，笔者并未增添多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增添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根据来自霍华德·亨特、大卫·菲利普斯和约翰·马蒂诺的不同陈述，这些很可能是虚假信息，就像轰炸机会投放铝箔条以对敌方雷达产生虚假回波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与沙克利在迈阿密的中情局工作站有关，所有人，无论以哪种方式，都以个人身份牵扯进中情局的全球毒品网络之中。
- ③ Theodore Shackley with Richard A. Finney, *Spymaster: My Life in the CIA* (Dulles, VA: Potomac Books, 2005), 281.



空中警察增援部队的支持者。<sup>①</sup>沙克利自传的作者阿尔弗雷德·考恩称，菲茨杰拉德“与沙克利一见如故”，并“助力推进沙克利的事业，将其安插在中情局的最高层位置”。<sup>②</sup>

随后不久，沙克利成了政策协调处精神的最佳典范，在随后一届的中情局行动工作人员中，乃至其1979年中情局正式离任后，均被传为佳话。根据约瑟夫·特伦托的说法，沙克利在里根时期和前政策协调处高管理查德·史迪威紧密合作，后者据称“截至1981年……一直在进行（美国）政府最为机密的行动之一”。<sup>③</sup>史迪威在退休之前，一直在帮助五角大楼筹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该机构是隶属于军方的武装组织，用来进行类似中情局那样的秘密行动。<sup>④</sup>

### 沙克利、西科德、毒品以及无在案记录的秘密行动

瓦伦丁将沙克利添加到了麦考伊的报告中，即所谓的1967年发生在老挝班坤地区的一次鸦片战役：国民党段将军和李弥将军在受清缅军阀昆沙控制的老挝西部地区拦截了一辆大篷车，该车装载有16吨鸦片，随后老挝部队也成功地介入其中。据麦考伊称，坎温·拉蒂康纳“从琅勃拉邦派遣出一个T-28战斗机中队参与战斗”，并获得了胜利。在麦考伊的报告中，“坎温将军毫无疑问是这

- 
- ① John Prados, *Lost Crusader: The Secret Wars of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5.
  - ② Corn, *Blond Ghost*, 96. 这样说是否中肯尚无定论，沙克利在中情局的第一次海外任务是在吕西安·柯南的领导下进行的。吕西安·柯南是二战时战略情报局的官员，“与许多西贡的科西嘉黑帮有一些共同经历”。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49.
  - ③ Joseph J.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213.
  - ④ Susan Lynn Marquis, *Unconventional Warfare: Rebuilding U. S.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156. 史迪威担任国防部办公室的副部长，负责政策方面的工作。



次战役的胜利一方”，而“昆沙则必然是失败一方”，“坎温将军的部队获权可对缅甸进入老挝的鸦片征税……老挝的班会赛地区后来发展成为缅甸鸦片的主要加工中心”。（这种方式与之前炮·斯里亚诺恩和泰国边境巡逻警察享有的权利相似。<sup>①</sup>）

然而，根据瓦伦丁的报告，以及对美国前空军长官（以及中情局官员）理查德·西科德的采访内容，事实才浮出水面，原来派遣 T-28 战机参加战斗的并非坎温，而是中情局当地站点的长官沙克利本人。

得知情况后，中情局万象站点的长官沙克利通知了帕特·兰德里，即中情局在泰国乌隆主要基地的长官，后者命令空军少校理查德·西科德派遣一个 T-28 战机中队前去支援。战斗在数小时内就得以结束，昆沙方面和国民党方面均悉数撤退，老挝人掌控了整个局势。<sup>②</sup>

（沙克利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中情局将昆沙用大篷车运输毒品的情报传给了坎温将军，却声称对此一无所知，且感到困惑不已。<sup>③</sup>）

此时的其他事件也对这种频繁的指控做出了明证，沙克利受中情局的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庇护，其并非对老挝的毒品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积极地对其进行利用。中情局已经将飞机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61. 特伦托写道：科尔比早些时候就向坤沙派出了使者，“看他是否会加入其他军队与巴特寮战斗。当他拒绝后，沙克利就针对其策划了一起媒体攻击事件……并指出缅甸军阀是全球最大的海洛因走私集团”（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32）。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427. 正如在这本新书中的内容一样，瓦伦丁并未提供额外证据，而是做出了一个有倾向性的结尾：“由王宝和众多老挝政治家以及军事官员指挥的战斗在昆沙结束，随后国民党军队撤走，中情局控制了该地区的鸦片贸易”（第 333 页）。其更有同情成分的坦陈，中情局正在试图扶植一个由资本主义统治的老挝，而其唯一的资本来源，毫无疑问就是鸦片。

③ Shackley, *Spymaster*, 208 - 209.



交付给老挝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将会很快“为中情局进行毒品运输活动”。<sup>①</sup> 1967年末，为了配合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沙克利也帮助王宝建立了私人航空公司，即川圻航空运输公司。

两架 C-47 运输机被从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调遣过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很明显意识到了任何在龙城（王宝的基地）的活动可能会卷入毒品之中，但还是决定对该计划予以支持。据赫蒙族可靠的报道，川圻航空运输公司被用来在龙城和万象之间运输鸦片和海洛因。<sup>②</sup>

中情局官方禁止其航空公司，即美国航空公司运输毒品，为此还在乌隆建立了一个 15 人一组的队伍，并配有能够嗅出毒品的警犬，对飞机和人员进行盘查”。<sup>③</sup> 但是目击者和医药研究者控告美国航空公司，有意无意地将王宝在龙城的鸦片和/或海洛因直接运至曼谷和西贡等城市，且并不带任何毒品回到乌隆以避免检查。<sup>④</sup>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些警犬就没有派上用场，而被放在了错误的机场。

1971 年 6 月，在基辛格准备秘密造访北京的同时，尼克松总统对毒品宣战。这两个重要的事件对在老挝受中情局毒品活动支持的战争宣判了结果，并且对那里与国民党有关的毒品活动产生了威胁。（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在麦考伊前往揭露老挝贩毒活动的路上，

① Prados, *Lost Crusader*, 168.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18, 援引 1971 年对川圻航空运输公司总裁的采访，他是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也是赫蒙族高级官员。试比较，*Shackly Spymaster*, 182：“莱尔也拥有一个愿景——即赫蒙族有一天会有自己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我支持这种努力，最后我们帮助王宝利用一架旧式 DC-3 运输机建立了川圻航空运输公司。”

③ Curtis Peebles, *Twilight Warriors: Covert Ai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USS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255.

④ See, e. g., William J. Chambliss, *On the Take: From Petty Crooks to Presid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6-189.



他和笔者就遭到了前绿色贝雷帽成员用燃烧弹发出的威胁，而此人刚答应告诉我们，他亲眼看到中情局的飞机在老挝装卸鸦片。）

麦考伊等对中情局做出裁定，并坚称“中情局不像其他情报机构，它没有利用贩毒活动来对其秘密行动进行财力支持”。<sup>①</sup>然而，彼时即将成为中情局专员的维克多·马切蒂后来告诉记者约瑟夫·特伦托：“沙克利在老挝时，中情局官方每年花费在毒品战争上的费用为2700万美元。而真正费用是这个数字的十倍之多。对此，操作办法其实已经路人皆知：他们借助毒品买卖来支持财政，为此还给沙克利颁发了奖章。”<sup>②</sup>

威廉·科森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受中情局之命在越南展开特别行动，他也告诉其合作者约瑟夫·特伦托，“金三角地区用来对中情局的秘密行动进行财力支持的鸦片利润高达数百万美元”。<sup>③</sup>

马切蒂和科森的声明均清楚地表明，在1967年的鸦片战争中，沙克利对国民党在泰国基地的分遣队进行轰炸的原因。西科德的轰炸行动确保了从大篷车运输毒品获得的利润能够留在老挝并对其征税，以对老挝皇家军队的活动提供财力支持，而非转至泰国为国民党军队提供支持。这些钱没有必要存入中情局自己的账户下面，因此就没有在案记录，这场秘密战争也由此得以掩人耳目。

（出于某些人道主义原因，毒品活动也许该得到促进。一旦中情局的赫蒙族人因为战争，被迫迁至连旱稻都很难种植的地方去，赫蒙族人为了生存便不得不出售大量鸦片，此举促进了适于鸦片发展环境的形成，或者说促进了赫蒙族人生存下来必需的市场系统的形成。）

我们会了解到，很明显，沙克利返回华盛顿后就迅速得到了提拔，直到1976年，掌管中情局的乔治·W. 布什（其与沙克利私交甚好）将其提拔至中情局开展秘密行动的副局长一职。在任期间，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5.

②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38.

③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33.



沙克利与前中情局探员埃德·威尔逊定期碰面，正值威尔逊“开始利用其熟悉中情局的优势，向利比亚人兜售服务”。<sup>①</sup>同时，“由前中情局探员操纵的无在案记录的贩毒活动正在失去控制，导致中情局默许的非法活动屡屡发生”，布什对此却毫无意识。<sup>②</sup>

随着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布什的中情局局长职位被斯坦菲尔德·特纳上将代替。当埃德·威尔逊的情况被透露给美国媒体时（最初都是有关勒特里尔遭到谋杀的消息），特纳才逐渐了解了威尔逊和沙克利，以及沙克利的助手汤姆·克莱恩斯的亲密关系（后者早前曾是王宝在龙城基地的长官）。特纳对这两个人均予以降级，随后据称二人离开了中情局并（与理查德·西科德一道）卷入和埃德·威尔逊不清不白的业务之中。结果在1982年，克莱恩斯因对政府实施诈骗行为而受到指控，并对其罪行供认不讳。<sup>③</sup>

即使是在与威尔逊建立联系后，沙克利、西科德以及汤姆·克莱恩斯仍作为一支团队，卷入能使他们频繁接触全球毒品网络中的各路人马。上述三人后来成为帮助迈克尔·汉德即沙克利下属绿色贝雷帽在老挝的一名成员，澳大利亚纽甘·汉德银行进行毒品走私

① Peter Truell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130; 美国地区法院，得克萨斯州南区，埃德温·保罗·威尔逊，刑事案件 H-82-139。有趣的是，1968年，威尔逊仍是借助商业活动来掩盖其中情局调查员的身份，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他与爱德华 K. 莫斯（为中情局穿针引线的暴徒，将在第七章出现）“有限”的接触。Memo of 14 May 1973 from Jerry G. Brown to Deputy Chief, Security Research Staff, CIA, NARA Record #104-10122-10376.

② Scott Armstrong and Jeff Nason, *Mother Jones*, November-December 1991, quoted in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30.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1991), 471-472, 477. Cf. Corn, *Blond Ghost*, 328, 356; Christopher Robbins, *The Ravens: The Men Who Flew i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New York: Crown, 1987), 131. 沙克利和威尔逊错综复杂的故事增加了约瑟夫·特伦托文章的可信性。当吉米·卡特以控制中情局的承诺当选美国总统时，沙克利也加快了“利用中情局资产创建一个完全私有的情报网络”的步伐。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113-114.





的主要人物。<sup>①</sup> 一支澳大利亚联合特遣部队对该银行进行了调查，据称，该武装毒品走私活动中的一名主犯，即伯纳德·霍顿已逃亡至澳大利亚，而帮助霍顿逃亡的另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国人，已经确认是托马斯·克莱恩斯”。<sup>②</sup>

沙克利、西科德和克莱恩斯以及其他毒品走私者后来涉嫌帮助伊朗—尼加拉瓜反抗军进行部署，并为尼加拉瓜反抗军提供财力和物力支持，而那个时候，美国国会明令禁止中情局这样做。<sup>③</sup> 等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理查德·西科德在阿塞拜疆（借着石油公司的幌子）与黑尼亚·埃德侯特和埃德·迪尔伯恩，以及中情局在老挝的两名经验丰富的老手一道参照美国航空公司的模式，筹建了一家航空公司，后者很快“从阿塞拜疆的穆斯林游击队中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雇佣军队”。<sup>④</sup> 这些圣战分子被前中情局支持者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招募至麾下，彼时此人与奥萨马·本·拉登关

- 
- ① Jonathan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New York: Norton, 1987), 291–292, 317, 385. 澳大利亚毒品走私联合特遣部队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纽甘·汉德活动的报告。该报告称，沙克利、西科德、克莱恩斯、(拉斐尔)昆特罗、威尔逊等人的背景“与人们所了解的纽甘·汉德集团的活动，以及与该集团相关的人员有关”。Joel Bainerman, *The Crimes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S. I. Books, 1992), 75.
-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76, citing Australia-New South Wales Joint Task Force, *Report, Volume 4: Nugan Hand*, 747–748.
- ③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50, 74, 164. Cf.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34, 139.
- ④ Thomas Goltz, *Azerbaijan Diary: A Rogue Reporter's Adventures in an Oil-Rich, War-Torn, Post-Soviet Republic*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272–275. 据称，理查德·西科德试图借助在以色列探员大卫以色列调查员大卫·吉姆奇的帮助，贩卖以色列武器，后者是奥利弗·诺斯的另一名同盟伙伴。毒贩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在阿富汗征募了不少圣战者，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情局援助阿富汗的顶级接受者，最近其成为了“基地”组织——塔利班抵抗美国及其盟友哈米德·卡尔扎伊组织的领导者。See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7, 8, 20.



系密切，并参与了反抗卡尔扎伊的起义行动。<sup>①</sup> 这些阿拉伯地区的阿富汗圣战者在阿塞拜疆展开的行动也靠阿富汗的海洛因贸易的财力支撑。<sup>②</sup>

## 附 录

瓦伦丁的报告既记述了中情局如何解决班坤地区所谓的战役（即1967年发生的所谓的鸦片战争），也有关于沙克利毒品策略的其他内容，而那场战役中没有真正的输家。国民党的将领返回该地，并将军力集中部署在泰国的淡蓐和美斯乐地区；就在此地，所有的将领和士兵最终都作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划归泰国军队之下，段将军也加入了泰国军队阵营，与主张不同的游击队进行斗争。<sup>③</sup> 昆沙仍在进行鸦片走私活动，最后和段将军比邻而居，并在泰国万欣德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林特纳援引报告称，昆沙的毒品活动在班坤地区不仅仅是被坎温（麦考伊这样说）截获那么简单，“这些鸦片已经被兜售一空，而且……昆沙随后还在泰国进了第一笔重要的投资”。<sup>④</sup>

中情局在班坤地区的介入最终使得该地的武装力量得以原地保留，继而用来对付共产党。尽管昆沙从来都没有被泰国军队正式接收，但很明显，泰国方面对其足够宽容。麦考伊个人的报告对此

① John K. Cooley,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on: Pluto, 1999), 180-181.

②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63-165.

③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05;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63. 昆沙死于2007年，但美国游客现在却都蜂拥至其儿子在泰国—缅甸—老挝边界地区开设的酒店和俱乐部 (Bertil Lintner, *Asia Times*, November 1, 2007)。

④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04. 林特纳指出，激烈的交战过后，“双方士兵都在（泰国）清迈接受治疗，他们常常在同一间病房结束治疗，然后相互聊天，分享香烟”。



进行了印证。他记述了美国海军修建营是如何帮助修建泰国北部的道路，“将美斯乐（段将军的国民党基地）和主要的省道连接起来”，他还写道，“尽管这些路对泰国军队的作用不大，但其为国民党进行国际毒品走私活动铺平了道路”。<sup>①</sup> 这条路在旅游地图上可以查找到，它同时也打通了至万欣德的大门，如今新修了铺面道路，极大地促进了该地的走私活动，也使其逐渐展现出比美斯乐地区更加繁荣的种种迹象。<sup>②</sup>

---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82 - 383.

② 林特纳写道，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建设的第二条泰国公路使得昆沙直接从中获益良多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79) . Cf. William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The True-Life Sequel to The King and I* (London: Constable and Robinson, 2001), 218 - 219。

## 第六章

# 亚洲禁毒战争——用真实的血 染红的虚假战争

大部分成熟的海洛因网络很快便走向了两方利益的互补：一方是毒品贩子，另一方是负责阻止非法毒品贸易的执法机构中的贪污腐败分子。<sup>①</sup>

本章将阐释由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6月17日宣布启动的禁毒战争如何受到远东政治局势的约束而无法倾注全力。有时为了保护中情局的同盟者和代理，也就是那些最大的亚洲走私犯，禁毒实际上沦为了次要目标。这种对大毒枭的庇护不只是远东才有的现象，中东和非洲也同样存在。在下一章中您将看到，前缉毒局驻中东的高级调查员丹尼斯·戴尔（Dennis Dayle）曾在电视上表示，“我为缉毒局和相关机构工作了30年，结果发现我所调查的主要目标几乎都是为中情局服务的”。<sup>②</sup>

对于这场备受约束的战争，前海关探员和缉毒局特工，曾被中情局要求不能对清迈某家大型海洛因工厂进行调查的迈克尔·莱文，对战争的结果给出了这样的总结。

---

① Alfred McCoy, *Drug Traffic: Narcotics and Organised Crime in Australia* (Harper and Row, 1980), 30.

②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x - xi. 戴尔在一次录像的远程会议上发表了这一言论，当时我和马歇尔都在场。



1971年，当尼克松总统首次宣布启动禁毒战争时，美国的吸毒者不到5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吸食海洛因……30年过去了，尽管已经从联邦税和州税中支出了1万亿美元，但预计吸毒者的数量很快就会超过500万人。<sup>①</sup>

(30年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几乎没有海洛因吸食者。如今，巴基斯坦预计有500万名吸毒者，而阿富汗也有100万名。)

这并不表示缉毒局的工作毫无成效。相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禁毒设备已经转移到国外政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经常被国外政府用于镇压目的。<sup>②</sup>因此，不论缉毒局特工是否出于善意，如今的缉毒局和中情局已成为美国战争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当莱文谈到他在泰国为海关及其所属的硬性毒品缉私队(Hard Narcotics Smuggling Squad)工作的经历时这样写道：

我们总能看到中情局为主要的毒贩提供庇护。实际上，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尽管我们能够证明有大量海洛因从金三角涌入美国……但我们当中有成千上万名缉毒队员在归国前已经染上了毒瘾，而美国的执法机构没有对任何一个东南亚的重要毒贩提起控诉。这绝非偶然。一个接一个的案子……都因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干预而被毙掉，我们却对此无可奈

---

① Michael Levine, "Mainstream Media: The Drug War's Shills," in *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ed. Christine Borjesson (Amherst, N. Y.: Prometheus Books, 2002), 258.

② 此外，缉毒局每年还会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一项教育计划，其预算概要显示，该计划的首要重点是“反合法化教育”。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http://www.ncjrs.gov/ondcoppubs/publications/policy/budget98/agency-09f.html>.



何。<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的金新月也是这种情况，那时候阿富汗成了世界主要的海洛因产地。)

目前，道格拉斯·瓦伦丁已经编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禁毒史的书籍，该书共分两册，以档案研究和对多名工作受阻的缉毒局特工的采访为依据。他所揭示的问题和前述观点非常相近。

联邦禁毒史带给人们的教训其实很简单：在调查有组织犯罪过程中，立案特工总会因为中情局参与毒品走私以及它的政治庇护者而陷入困境。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之所以被废除，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立案特工们发现了这些政治和间谍阴谋。适应这一现实也许正是缉毒局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禁毒战争当然不会成功。<sup>②</sup>

有迹象表明，尼克松总统想要缩小中情局对禁毒的影响，可能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才建立了缉毒局，希望为白宫争取这项重要的权力。<sup>③</sup>然而在尼克松总统卸任后，事实很快演变成，之前在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安插官员的中情局，现在又将这些官员安插到了缉毒局。<sup>④</sup>

① Levine, "Mainstream Media," 265.

②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R: TrineDay, 2009), xi - xii. 全面披露：莱文和瓦伦丁都是我的朋友，我在此推荐瓦伦丁的重要著作。

③ Richard Lawrence Miller, *Drug Warriors and Their Prey: From Police Power to Police State* (Westport, CT: Praeger, 1996), 158 - 159; Edward J. Epstein, *Agency of Fear: Opiat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New York: G. Putnam's, 1977), 165 - 166.

④ Valentine, *Strength of the Pack*, 6 - 8, 32 - 36. Cf. the stories of James Ludlum and John Cusack later in this chapter.



## 尼克松禁毒战争的起源

1971年6月，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启动禁毒战争。他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项主要原因是非常简单并且直接的。尼克松从竞选开始就很关心毒品问题，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军人中吸食海洛因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还因为国内民众对犯罪的担忧使毒品成了一项政治的热点话题。

1969年9月，他采取的首次重大行动“拦截计划”将目标对准了来自墨西哥的大麻。

政府沿墨西哥边境部署了2000名海关人员和边境巡逻员，官方称这次行动是“美国行政当局在和平时期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搜捕行动”。意图过境的汽车和卡车在上百度的高温下被耽搁了长达6个小时；对可疑或拒不服从的游客还会脱光其衣服进行搜身。在这次为期3周的撒网式行动中，虽然有超过500万名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接受了检查，但基本上未从游客身上截获任何海洛因或麻醉毒品。<sup>①</sup>

观察员认为，虽然“拦截计划”令已经普遍枯竭的大麻供应更加紧张，但随之而来的是东西海岸海洛因走私与销售的增长。<sup>②</sup>不

① Epstein, *Agency of Fear*, 83.

② *The New York Times Encyclopedic Almanac*, 1972, 29. “有人对一名联合立法委员说，因为拦截计划，联邦政府试图限制从墨西哥流入的大麻，但国内儿童消费海洛因的现象出现了激增”；Humberto Fernandez, *Heroin* (Center City, MN: Hazelden, 1998), 214: “大麻交易被拦截计划查封或耽误造成了大麻的短缺，因此这一时期加州南部以及北部的旧金山都有海洛因走私增加的现象。”埃里克·C·施奈德（Eric C. Schneider）对这些报告却不以为然，他写道，拦截计划“只持续了20天，还不足以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除了美墨关系”。（转下页注）



过，白宫可能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尼克松总统的禁毒顾问埃吉尔·克罗赫（Egil Krogh）指出“拦截计划……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建议采用类似的代号开展更多大规模的打击行动。<sup>①</sup>

1970年6月21日，司法部启动了“雄鹰计划”。全国各大城市共逮捕了150名嫌疑犯，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称这次行动是“联邦禁毒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捕主要毒品贩子的行动”。<sup>②</sup> 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表示，这次行动捣毁了“一个全国性的毒品批发团伙，它们掌握着美国30%的海洛因销售和75%~80%的可卡因销售。”<sup>③</sup>

还有一项人们较少了解的数据，那就是被捕人员中有70%都曾参与中情局策划的猪湾事件入侵行动。<sup>④</sup>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与中情局的联系第一次没能为毒品贩子提供庇护。<sup>⑤</sup>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尼克松的败选，这导致尼克松不再信任中情局并在他的任期内试图缩小中情局的影响。伦恩·克劳德尼和汤姆·沙赫特曼（Tom Schachtman）称，“尼克松厌恶中情局，他认为在1960年的大选中，正是因为中情局在‘导弹差距’问题上误导了他，才让约翰·F. 肯尼迪在这一问题上略胜一筹，

---

（接上页注②）Smack: *Heroin and the American C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148, 但是海洛因是一种令人上瘾的毒品，因此哪怕只吸食一点，也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 ① Epstein, *Agency of Fear*, 84.
- ② *BNDD Bulletin*, September-October, 1970; quoted in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26.
- ③ Warren Hinckle and William Turner, *Deadly Secrets: the CIA-Mafia War against Castro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FK*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2), 373.
- ④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26.
- ⑤ 其中一名被捕人员胡安·雷斯托伊（Juan Restoy）“后来逃出监狱并在枪战中被击毙，之后小哈瓦那（位于迈阿密）就出现了一种传言，说他是被中情局的执法队设计陷害和处决的，目的是防止他出庭指证中情局参与了毒品走私”。Hinckle and Turner, *Deadly Secrets*, 373.





赢得了大选”。<sup>①</sup>

“雄鹰计划”中的被捕人员都是以特莱菲肯特为首的“古巴黑手党”的核心成员。1970年2月,《纽约时报》对这些人的描述是,“大部分都是以前不为人知的黑社会成员,被美国黑手党雇用和训练后,活跃在前卡斯特罗时期的古巴”。<sup>②</sup>逮捕这些人有助于切断与法国的历史联系,因为通过巴蒂斯塔的古巴(Batista's Cuba)赌场输入美国的海洛因很多都是由马赛地区的科西嘉人提炼的。

到了1971年6月,尼克松总统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理由来挑战中情局在东南亚的活动,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泰国和老挝的行动。在未知会中情局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要求基辛格秘密准备7月前往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之后不久,便在1971年8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中情局停止云南境内的跨境活动以及其他侵犯中国的活动。<sup>③</sup>

到1971年为止,尼克松总统签署的这些涉及中国和东南亚的法令形成了美国战略重点的大逆转。

## 禁毒战争以及美国的海洛因供应源 从土耳其转到东南亚

此时,尼克松成立了临时内阁禁毒委员会(Ad Hoc Cabinet Committee Narcotics),由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担任主席。尼克松的禁毒战争将下一阶段的矛头指向了土耳其种植的鸦片。虽然

① Len Colodny and Tom Schachtman, *The Forty Years' Wa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cons, from Nixon to Obama* (New York: Harper, 2009), 20.

②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70; Peter Dale Scott, Paul L. Hoch, and Russell Stetler, *The Assassinations: Dallas and Beyond*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76), 371.

③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341, citing *Washington Post*, August 6, 1971.



土耳其的鸦片产量就全球来讲很少，但这里却是科西嘉海洛因实验室以及著名的“法国运输线”的主要供应源。<sup>①</sup>

爱德华·J·爱泼斯坦（Edward J. Epstein）在他旁征博引但又十分片面的说明中指出，选土耳其作为目标是非常奇怪的。对此，存有私心的詹姆斯·安格勒顿（James Angleton）和他的中情局支持者们提供了一些证明：

根据中情局为临时委员会所做的估计，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泰国、老挝和缅甸生产的违禁鸦片远远多于土耳其。而且在禁种鸦片13年后，1969年伊朗国王决定种植20000公顷罌粟，这比土耳其当时的种植面积还要多出50%。总之，中情局估计土耳其生产的鸦片仅占全球违禁鸦片交易量的3%~8%。<sup>②</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在回避远东的海洛因问题。爱泼斯坦认为，采用这种回避的态度是出于现实考虑而非战略考虑：“就缅甸而言（阿富汗和老挝也是如此），可以发现事实上中央政府对种植和走私鸦片的部落没有任何控制，而美国给予缅甸中央政府的任何压力或激励不过是徒劳而已。”<sup>③</sup>

但是，中情局驻委员会代表詹姆斯·鲁德鲁姆（James Ludlum）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宣布黎巴嫩和东部地区为禁区。此次会议的焦点是土耳其的鸦片流向马赛的海洛因实验室”。<sup>④</sup>从中不难看出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印度支那采取的策略，而

① Epstein, *Agency of Fear*, 86-87. 爱泼斯坦指出，“当时中情局估计土耳其生产的鸦片仅占全球违禁鸦片交易量的3%~8%，然而，土耳其也被认为是欧洲海洛因批发商最便捷、最直接的毒品来源”。

② Epstein, *Agency of Fear*, 86.

③ Epstein, *Agency of Fear*, 87.

④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45, 总结了鲁德鲁姆在1969年11月3日“执行”会议上的评论发言。



在老挝，这一策略仍严重依赖于王宝的苗族军队和老挝皇家陆军。<sup>①</sup> 引用麦考伊的话说，“美国（驻老挝）大使馆非常清楚，著名的老挝领导人（比如欧安将军）也从事走私贸易，因此美国担心对他们施压迫使其停止毒品贸易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战争进程”。<sup>②</sup> 这场战争（尤其是在柬埔寨）再加上其他问题，也是造成法美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即便是在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后，情况依然没有改善。<sup>③</sup>

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特工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主要负责该局针对土耳其的打击行动，他统计的数据显示，从马赛流入的海洛因80%都是以土耳其的鸦片为原料。<sup>④</sup> 稍后，笔者会证明库萨克（瓦伦丁称他是一名“与中情局有着密切联系”的特工）关于海洛因的估计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有助于保障在老挝的战争。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土耳其不是美国主要的毒品来源地，而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很快也发现，“法国运输线中的海洛因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土耳其，而是从金三角经由马尼拉和香港输入的”。<sup>⑤</sup>

① 黎巴嫩的毒品大部分是通过一个赌场输出的，而马塞尔·保罗·弗兰奇希（Marcel Paul Francischi）是这里的赌博业特许经营权所有人。该赌场由优素福·拜达斯（Yusef Beidas）通过联行控制，在赌场的所有人优素福·拜达斯死后，可耻的金融家罗伯特·韦斯科（Robert Vesco）曾试图接管赌场但最终失败。Arthur Herzog, *Vesco: From Wall Street to Castro's Cuba*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150. 没有人曾经对韦斯科与尼克松、他的侄子唐·尼克松（Don Nixon）、尼克松的助手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以及中情局的神秘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See, e. g., James Rosen, *The Strong Man: John Mitchell and the Secrets of Watergate* (New York: Doubleday, 2008), 228.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81.

③ Jussi Hanhimäki,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90; *Time*, March 9, 1970.

④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53.

⑤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88.



最终，美国于1971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提供了3500万美元，导致土耳其的违禁鸦片出现了暂时性枯竭。不过，这几乎没有影响海洛因的供应，违背了尼克松政府设定的国内政治目标。

虽然这一胜利只是切断了全球鸦片来源中的一小部分（不到8%），而且就连这点成果很快也会被东南亚、印度及其他产地的鸦片所取代，但是白宫的战略家们明白，只要在新闻中对这一结果进行适当的宣传，就会让人觉得政府在与犯罪势力和吸毒者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sup>①</sup>

与此同时，1970~1971年的一系列重大逮捕和查封案件让美国当局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远东的海洛因对美国构成的直接威胁是何等严重。<sup>②</sup>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案件是，1971年4月在巴黎的奥利

① Epstein, *Agency of Fear*, 92, cf. 310 - 11. Cf. also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46, 引用詹姆斯·鲁德鲁姆：土耳其的“执行太过虚弱，整个土耳其计划最终失败了”。这项可以预见的失败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3500万美元至少可以部分用于一些其他目标。基辛格同时正在酝酿一项计划，打算利用土耳其作为第三方绕过国会关于禁止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的限制（Hanhimäki, *The Flawed Architect*, 181）。1970年，美国开始与土耳其人协商，当时土耳其已陷入了政治混乱的局面，就像两年前的法国一样。在这场危机中，时任中情局站长的杜安（“杜威”）·克拉里奇（Duane “Dewey” Clarridge）与土耳其反抗游击队（土耳其的格莱蒂奥）紧密合作。通过反抗游击队，马丁·李（Martin Lee）为克拉里奇和“灰狼计划”的武装人员建立了联系，“‘灰狼计划’的武装人员曾发动过一轮爆炸袭击和政治暗杀行动，并在（1971年3月）的一次成功行动中达到了袭击的顶峰……与此同时，‘灰狼计划’的成员都深度参与了国际毒品贸易”。Martin A. Lee, *The Beast Reawakens* (Boston: Little, Brown, 1997), 202. 多年后，土耳其国防部部长哈桑·埃萨特·伊西克（Hasan Esat Isik）“严厉地谴责了通过美国资助的反抗游击队颠覆土耳其主权的行：‘主意是美国出的，资金也是美国给的’”。Daniele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233.

② 利迪身边负责海洛因事务的助手戈登·明尼克（Gordon Minnick）考察了金三角地区，带回的（根据霍华德·亨特的说法）“报告令白宫非常坐立不安”。E. Howard Hunt deposition,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November 3, 1978, RIF #180 - 10131 - 10342, [http://www.aarclibrary.org/publib/jfk/hasca/secclass/pdf/Hunt\\_11-3-78.pdf](http://www.aarclibrary.org/publib/jfk/hasca/secclass/pdf/Hunt_11-3-78.pdf), 35.



机场查获了 60 千克产自老挝的高纯度鸦片。这些鸦片是在老挝皇太子、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常驻代表、老挝候任驻法大使 Sopsaisana 的行李箱中发现的。虽然没有逮捕皇太子，但是此次事件迫使中情局必须重新评估它在远东的毒品联盟。

根据美国（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后来收到的报告，皇太子的冒险行为获得了中情局秘密部队指挥官、苗族将军王宝的资助，海洛因是在龙镇的一个实验室中提炼的，该实验室也是中情局在老挝北部（苗族）开展秘密行动的总部。<sup>①</sup>

事实上，尼克松和中情局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使自己摆脱与这次行动的干系，并对其实行制裁。在本次制裁中，《纽约时报》暂时打破了在中情局—毒品问题上的一贯沉默。1971 年 6 月，《纽约时报》根据中情局泄露给它的一份机密报告，发表了一篇关于金三角地区海洛因提炼厂的报道。那时候赫尔姆斯仍任中情局局长。<sup>②</sup> 一个月后，《纽约时报》又宣布尼克松政府将对参与毒品走私的老挝、泰国和南越领导人实施制裁。<sup>③</sup>

## 美国禁毒战争与泰国反叛乱行动

从 1971 年 6 月尼克松启动禁毒战争开始，白宫与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就已认识到目前必须将泰国作为主要目标。虽然美国在泰国投入的资源远比在墨西哥或土耳其投入的资源多，但结果同样没有收效。甚至当中情局驻泰国特工秘密走私毒品被逮捕时，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84 - 285, citing interview with BNDD agent, November 18, 1971.

②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71;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88.

③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71.



中情局还阻止了案件的审理。<sup>①</sup>

泰国禁毒战争的失败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都揭示了禁毒战争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第一，首要毒品供应商（最突出的有国民党将军李文华和段希文）被泰国政府和中情局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不可以撼动。比如，海关探员迈克尔·莱文在1971年时被禁止调查某家海洛因工厂，而这家工厂当时可能正在加工李文华提供的鸦片。（短短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便正式进驻了泰国最高司令部。）第二，他们在曼谷的贸易伙伴——潮州走私犯在泰国政府中也有自己的庇护者。<sup>②</sup> 第三，泰国政府接受美国的禁毒运动，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和增强中情局对边境巡逻警、空军增援队以及相关计划的支持。因此，禁毒战争不但未能打击中情局与毒品走私之前的贪腐关系，反而成了一种延伸这种关系的方式。禁毒成了反叛乱行动也就是镇压运动新的旗号。

美国与泰国的统治阶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泰国方面同意合作开展禁毒战争，以换得美国对其镇压萌芽期游击叛乱的援助。20世纪60年代末，公共安全办公室开始对泰国国家警察第7分部开展禁毒和情报收集方面的咨询式培训，希望抑制美国大兵的毒品来源。他们还建立了一支空军增援队，目的是增强海关和边境巡查，同时偶尔也能为中情局在邻国老挝和越南开展行动提供幌子。

库兹曼若夫（Kuzmarov）表示，美国的禁毒战争援助转而服务于国内镇压，后来缅甸也是这种情况。

随着越南毒品危机的加剧，尼克松将驻泰国的联邦禁毒特工从

<sup>①</sup> For the case of Puttaporn Khrankhruan, see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254 - 256; David Corn, *Blond Ghost: Ted Shackley and the CIA's Crusad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300.

<sup>②</sup>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10 - 414.

5人增加到了11人。1971年8月4日，埃吉尔·克罗赫拜访了泰国官员并向国务院官员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对那些向美国军队提供毒品的贩毒势力全面开战”。<sup>①</sup> 1971年9月28日，在美国大使伦纳德·昂格尔（Leonard Unger）的推动下，美泰两国签订了一项协议，美国同意派遣黑鹰直升机支援泰国皇家警察禁毒。此前在自称是出于国内“安全目的”的公共安全办公室计划中，泰国也获得过美国的资金援助。后来国会在一项调查中发现，美国的禁毒战争援助很多仍继续用于这些方面，并最终成为泰国政府警察机构的资金来源。该机构经常开展现场执法和刑讯活动。<sup>②</sup>

在不断加剧的禁毒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居于泰国北部的山地部落。之前政府一直允许他们种植鸦片，现在却从空中对他们进行轰炸，有时还会批准美国人乘直升机参与行动。<sup>③</sup> 紧接着，政府又在曼谷的重点大学——法政大学内发动了一次有组织的屠杀，目标那些是反对军事独裁的学生。1974年，“边境巡逻警——与中情局反叛乱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帮助组建了‘印度红野牛（红

① 埃吉尔·克罗赫，白宫与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的联络人，后来因为监视所谓的白宫泄密调查特工进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而入狱。伦恩·克劳德尼称克罗赫是“一名具有中情局背景的律师……克罗赫……在加入白宫前曾在西雅图为埃利希曼（Ehrlichman）的公司工作过，但是之前在越南和中情局有过联系。克罗赫向埃利希曼吹嘘，说自己曾为中情局携带黄金到越南。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Haldeman）后来开始相信，克罗赫甚至在服务白宫期间也保持着与中情局的联系。上述言论均未获得证实”。Colodny and Schachtman, *The Forty Years' War*, 101, 113.

② Jeremy Kuzmarov, "From Counter-Insurgency to Narco-Insurgency: Vietnam and the International War on Drugs,"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20, No. 3 (2008): 358-359, citing many sources, including *Southeast Asian Narcotics*, 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Narcotics Abuse and Control,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5th Cong., 1st Sess., July 12-13, 197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2-3. See also Surachert Bamrungasuk,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ai Military Rule, 1947-1977* (Bangkok: Editions Duangkamol, 1988).

③ 笔者已经了解但没有办法证明，遭此对待的部落常常是那些没有贿赂泰国警察和边境巡逻警的部落。



牛) 并使其合法化”。<sup>①</sup> 该组织中包含“曾为美国在印度支那战斗的泰国部队老兵”，如今他们回到家乡又有了新的工作。<sup>②</sup> 1976年10月，边境巡逻警、印度红野牛以及乡村侦察员（Village Scouts，边境巡逻警建立的另一组织）被召入曼谷，执行杀害法政大学学生的军队电台命令。“一些试图逃跑的学生在大学校园外被残忍地处死、强奸甚至活活烧死。根据官方数据，共有43名学生和2名警察惨遭杀害。当天有3000多人被捕，后来又大约有5000人被捕。那个晚上，一支军团通过政变掌握了政权。”<sup>③</sup>

一年后，最后一位北部军队的统治者江萨·差玛南掌握了军事独裁政权。差玛南是1976年政变的领导者，他“深度参与了（毒品）贸易，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座上宾”。<sup>④</sup>

1999年，一名泰国人提议编写一本研究法政大学大屠杀原因的书，最终因为争议过大而未能完成。不过，被控当时从事毒品贸易的两名北部军队的将军巴博·乍鲁沙天（Praphat Charusathien）和他的女婿纳隆·吉滴卡宗（Narong Kittikachorn），后来确认称：

- 
- ① Jim Glassman, *Thailand at the Margin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7-68; “印度红野牛的控制者有两个，一个是受雇于中情局驻老挝的泰国雇佣军的前领导人威吞·亚萨瓦特将军，一个是频的儿子、炮的内兄，后来成为总理的察猜·春哈旺（Chatchai Choonhavan）将军。”
- ② William Shawcross, “How Tyranny Returned to Thai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9, 1976.
- ③ Chris Baker and Phasut Phongph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4-195; cf.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235-236: “在曼谷警察局长发出自由开火命令后，这座校园就像敌军的据点一样遭受了攻击，而……边境巡逻警的部队就冲在最前面。”此次宣传运动是基于早前在1975年发布的错误报告，那时科尔比仍任中情局局长。（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226）。在这更早的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和美国信息服务处联合伪造并生产关于共产主义攻击君主制度的泰语宣传册”。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124.
- ④ Robert Harris,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nd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3), 181.



这次暴力镇压行动的幕后指使，并且有证据证明……有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这场屠杀的背后是否还有“第三只手”。（一些证据）表明某个机构参与了这次行动，目的是破坏独裁统治的声誉。少将威吞·亚萨瓦特（Witoon Yasawat）被控与这一神秘势力有联系，现在他已经74岁，疾病缠身。在最近一次《暹罗邮报》对他的采访中，威吞承认他曾代表第三方行事。不过，他拒绝说出第三方是谁，只是说他“会将这个秘密带入棺材”。资料显示，第一枪是从屋顶射出的，而开枪的人是受雇于中情局的老挝雇佣兵。<sup>①</sup>

亚萨瓦特曾领导受雇于中情局的驻老挝的泰国雇佣军，因此更让人觉得空军增援队甚至是中情局可能就是所说的参与“机构”。

毫无疑问，中情局这招借刀杀人的计谋促成了这场政治危机，并引发了法政大学血案。1975年，平民总理克利·巴莫（Kukrit Pramoj）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一年内必须开始从泰国撤兵，“美国和泰国右翼势力制造了越南计划入侵泰国的‘证据’”。法政大学血案发生时军队在曼谷集结，正是为了抵御这种凭空捏造的威胁。<sup>②</sup>

1975年初，社会上有一些“广为流传但实为虚构的美国情报，详细阐述了越南打算控制整个东南亚大陆的战略”，泰国特工“随后便在泰国最大的越南移民聚居地、东北部省会煽动了叛乱”。<sup>③</sup>这次策动反越暴力所使用的手段与1970年柬埔寨军事政变推举郎

① “The Murky Events of October 1973: A Book Proposal Reopens Thai-Land’s wounds,” *Asia Week*, February 3, 2000; <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2000/0128/as.thai.history1.html> . See also Benedict Anderson, “Withdrawal Symptom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9, No. 3 (1977), in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London: Verso, 1998), 139–173.

②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229.

③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226. Cf. Shawcross, “How Tyranny Returned to Thailand.” 泰国外交部部长访问越南时，因军队对众多生活在泰国的越南居民发起寻衅攻击而被迫中断。”



诺上位时发生的反越大屠杀如出一辙。一些观察员发现，1970年政变也受到了美国情报的影响。<sup>①</sup>

向前追溯仍然可以找到证据。柬埔寨大屠杀又可以牵出1965年印度尼西亚推翻苏加诺的政变后掀起的反华大屠杀。事实上，柬埔寨人据说是听了印度尼西亚“心理战”专家的建议，而这些专家是在郎诺政变后数日内到达金边的。<sup>②</sup>美国训练出来的心理战专家是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的核心人物。<sup>③</sup>

虽然只关注了中情局、空军增援队和边境巡逻警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说中情局是那个时代所有反学生暴力的罪魁祸首，即使在东南亚也是如此。继1968年巴黎学生起义后的十年里，全球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残杀事件，包括1968年发生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尔科学生大屠杀，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的美国学生惨案，1972年土耳其的克孜勒代尔大屠杀，1974年缅甸学生起义，以及1975年柬埔寨反知识分子种族大屠杀。暴力在人类历史上有自己的推动力，因此不能全部归罪于“心理战专家”。

1976年美国从泰国撤军后，美国的专家们便预测泰国将陷入更严重的暴力局势。不过，最终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受法政大学大屠杀的影响，约有3000~10000名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了泰国东北部的反共产主义行列。但是伴随着美国的撤军，泰国政治也慢慢回归到平民政府，这是自1947年以来平民政府首次获得延续。在国际政

① K. J.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22.

②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74, 182-183, citing, inter alia, Wilfred Burchett,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Cambodia and Lao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65.

③ See Peter Dale Scott, "Drugs and Oil: The Deep Politics of US Asian Wars," in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ed. Mark Selden and Alvin Y. So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71-198.



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泰国逐渐走向了调和与正常化的进程。<sup>①</sup>

简而言之，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泰国撤军后，泰国获得自由民主的希望（曾因美国政府秘密施压而被积极颠覆）也从根本上改善了。

## 虚假的美国禁毒战争如何帮助建立 并保护了最大的毒品贩

许多观察员认为，美国在东南亚耗费巨资开展禁毒战争不但徒劳无益，而且犯了方向性错误，导致缉毒局没能以真正的大毒枭——比较突出的有泰国和中情局的盟友、国民党第3军的李文华将军——为目标。相反，缉毒局将矛头指向了不受泰国而受缅甸保护的次要目标。首当其冲的便是缅甸果敢的民兵领袖罗兴汉。1971年9月，美国高级禁毒顾问纳尔逊·格罗斯（Nelson Gross）曾公开称罗兴汉是“东南亚海洛因走私的毒枭首脑……从罌粟田到海洛因实验室，都是他的控制范围”。

在格罗斯发表上述讲话前，尼克松刚刚于1971年6月宣布启动禁毒战争。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探讨该项政策的起源以及9月成立的内阁禁毒委员会（格罗斯任该委员会工作组组长）。

当时最优秀的驻缅甸观察员贝蒂尔·林特纳表示：

大部分敏锐的观察员都不赞同纳尔逊·格罗斯关于罗兴汉的言论，认为那是以媒体为导向给出的夸张说法。就在禁毒机关试图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地位和重要性均属中等的

<sup>①</sup> Michael Leifer,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94; “以（1979年）柬埔寨冲突为开端，泰国共产党被驱赶出老挝的庇护所，他们的事业也被中国牺牲，为的是联合泰国从越南手中夺取柬埔寨。从这一刻起，泰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瓦解，直至冷战结束时泰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活跃的实体已不复存在。” Cf. Baker, *A History of Thailand*, 216-220.



走私犯身上时，景栋两个不太知名的鸦片商人——Shi Kya Chui 和 Yang Sang（也叫 Yang Shih-li）——实际上比这位“毒梟首脑”的贩毒规模要大出许多。从掸邦北部的腊戍基地出发，罗兴汉一年只能组织 3~4 次运输活动，携带鸦片、玉器和其他违禁品前往泰缅边境的大其力（金三角的顶点）。而 Shi Kya Chui 和 Yang Shih-li 在景栋的据点更加便利，距离大其力北部仅 170 公里，因此一年最多可以组织 10 次运输活动。<sup>①</sup>

目前据瓦伦丁透露，将罗兴汉作为打击目标的主意是由三位熟悉东南亚的中情局官员提出的：

中情局官员吉姆·鲁德鲁姆（Jim Ludlum）、约瑟夫·E. 拉扎斯基（Joseph E. Lazarsky）和克莱德·麦卡沃伊（Clyde McAvoy）描述了缅甸的“情况”……为了确保在东南亚的军事利益不受损害，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库什曼（Robert Cushman）将军出席了 CCINC 会议，会上，拉扎斯基、鲁德鲁姆和麦卡沃伊提出了他们的打击计划……（在与缅甸奈温将军的会面中）格罗斯介绍了上述三人的计划，罗兴汉就是该计划中的……替罪羊。<sup>②</sup>

① Bertil Lintner, "Heroin and Highland Insurgency in the Golden Triangle," in *War on Drugs: Studies in the Failure of U. S. Narcotics Policy*, ed. Alfred W. McCoy and Alan A. Bloc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296. Cf.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9), 278. 麦考伊根据美国国会的数据中心并不赞同林特纳的说法，并表示纳尔逊·格罗斯的言论“纯粹是媒体夸张，罗（兴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掸邦最大的毒梟”（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24）。英国的电影制作人阿德里安·考埃尔（Adrian Cowell，先和罗兴汉相处过一段时间，后又与昆沙在一起）同意林特纳的看法，认为罗兴汉“绝不是最大的毒梟之一”。Adrian Cowell, *Frontline*, 1977, PBS,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heroin/interviews/cowell.html>.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3 - 174.



紧接着，掸邦内就反对派提出的方案开始了复杂的谈判：他们向罗兴汉出售鸦片，然后由罗兴汉将全部鸦片交给缉毒局。与罗兴汉有着密切联系（后又与昆沙密切接触）的英国电影制作人阿德里安·考埃尔向美国大使馆提出了这一方案。罗兴汉本想和美国人谈判，于是很快他便毫无防备地走上了一架泰军的直升机。他被带到了清迈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后被逮捕并引渡到缅甸。“事实上，罗被逮捕对缅甸的整个毒品输出没有任何影响。”<sup>①</sup>但在美国，媒体则使用了诸如“毒品大王落网”这样的标题来宣传此次的逮捕事件，并声称是在经过一场激战后才将罗兴汉抓获的，而他的5名手下也在抓捕中受了伤。<sup>②</sup>

1971年9月，格罗斯向奈温提出了打击罗兴汉的方案。就在3个月前，尼克松刚刚吹响了禁毒战争的号角，同月，老挝迫于美国的压力，在与美国大使馆编写的新法中规定鸦片贸易为非法行为。格罗斯知道泰国人肯定不会放弃国民党将领李文华的势力（据说他控制着2/3输入泰国的鸦片），于是提出了一项不同的方案：

买断他们的鸦片贸易……尽管内阁委员会已有禁止优先购买鸦片的政策……1972年3月还是达成了一项交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交出了26吨棕色物质，据猜测这是他们全部的鸦片储备，并保证若干年内不再从事鸦片贸易。多份未经鉴定的中情局报告……流入了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手中……报告称这些棕色物质……实际上掺有大量的牛饲料。<sup>③</sup>

①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279 - 281; cf. Cowell, *Frontline*.

②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20, 1973, 18.

③ Epstein, *Agency of Fear*, 161; James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777 (two-thirds). C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hereinafter FRU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20, 328 - 330. 1972年2月29日（转下页注）



瓦伦丁引用前中情局官员威廉·杨给海关的一份内部报告，称这个想法不是来自格罗斯，而是由中情局驻清迈的基地负责人罗伯特·布鲁尔（Robert Brewer）提出的。泰国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局长弗雷德·迪克（Fred Dick）也向瓦伦丁表示，“我知道中情局就是这场表演的幕后编导”。<sup>①</sup>虽然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已对中情局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质疑，但迪克补充说，“我们都知道，他们（泰国的国民党）从未停止鸦片走私。如果把钱给了‘救世军’，说不定他们现在会更富有”。<sup>②</sup>

由于罗兴汉被逮捕，“昆沙的掸邦民族军和泰国的国民党只好负责收拾残局，而昆沙也成了未来20年缉毒局打击的长期目标”。<sup>③</sup>这仍旧是美国避免与大毒枭交锋的惯用伎俩。林特纳称：“昆沙，不像……许多西方禁毒机构宣扬的那样，他不是国际毒品贸易的操纵者。”瓦伦丁也表示：“人人都知道，该地区的鸦片贸易只有大约10%掌握在昆沙手中。”<sup>④</sup>

昆沙搬到了他在满星叠的泰国基地，并经常在那里接待访客，其中包括阿德里安·考埃尔这样的西方人。林特纳介绍了参议院滥用毒品委员会首席顾问约瑟夫·涅利斯（Joseph Nellis）如何乘泰国直升机前去和昆沙会面，如何受到“众多全副武装的泰国边境巡逻警”的欢迎，又如何与昆沙进行面谈，其中“前中情局驻老挝的

（接上页注③）国务院执行秘书（埃利奥特）致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基辛格）的备忘录。白宫国际麻醉剂管制委员会主席埃吉尔·克罗赫也前往远东，买下了金三角地区所有的海洛因实验室。Epstein, *Agency of Fear*, 237; Russ Baker, *Family of Secrets: The Bush Dynasty, the Powerful Forces That Put It in the White House, and What Their Influence Means for America*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9), 225–226.

①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2–173. *FRUS, 1969–1976*, Vol. 20, 286, 297–298.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4, 引用与弗雷德·迪克的通信内容。

③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4; cf. 399;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179.

④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2.



雇佣兵”担任了他们面谈时的翻译。<sup>①</sup>

像罗兴汉一样，对既定目标昆沙的战争就是一场已写好剧本的游戏。有人告诉作家詹姆斯·米尔斯：

这场对昆沙（中文名：张奇夫）的战争只是表面功夫，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美国人相信泰国正竭尽所能抓捕昆沙并结束他的鸦片贸易。实际上，泰国和昆沙是有关联的，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共享关系。<sup>②</sup>

1982年，新任泰国政府因为昆沙大张旗鼓地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而感到尴尬，于是派边境巡逻警发动攻击，暂时捣毁了满星叠基地。（昆沙本人因及时获得了警告而逃脱。<sup>③</sup>）不过在他设于贺蒙的缅甸新基地，这种游戏仍在继续。1987年，波·格里茨（Bo Gritz）

- 
- ①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13 - 314. 詹姆斯·米尔斯希望乘泰国的直升机从清迈出发前去会见昆沙，但最终未能成行，不是因为昆沙不同意，而是遭到了缉毒局驻清迈的地区负责人的拒绝。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778 - 779, 786 - 788.
- ②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787. 在众多采访昆沙的西方人里，伊迪丝·米兰特（Edith Mirante）后来写道：“人们都知道昆沙生活在清迈，他甚至只是偶尔去看望在曼谷的妻子，不过他和泰国小说中描写的悬赏通缉犯的形象却不是很像。” Edith T. Mirante, *Burmese Looking Glass: A Human Rights Adventure and a Jungle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3), 170.
- ③ Francis Belanger, *Drugs, the U. S., and Khun Sa* (Bangkok: Editions Duang Kamol, 1989, 102 - 104); cf. 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1071 - 1072;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21 - 323;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18 - 421. 此次攻击前，昆沙“针对泰国北部的美国官员发出了恐怖分子行动指令。昆沙的指令发出后，两名中情局特工被杀，而事实证明这次的行动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成群的美军官员从北部各省逃往曼谷寻求庇护，以昆沙为目标的战争一触即发……（攻击发生）几周后，昆沙方面又恢复了正常。当中间被问到为何要下令杀害西方人士时，昆沙回答说，“因为他们惹怒了我”，他大喊道，“我曾经把他们当成合作伙伴——他们，就是缉毒局和中情局”。Belanger, *Drugs, the U. S., and Khun Sa*, 102 - 104.



前往那里拜访昆沙，在刚刚获悉泰缅双方对这里联合发动了猛烈的军事攻击后，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竟没有一点战争的痕迹。

当我向昆沙询问这件事时，昆沙表示泰国和缅甸的军官早在（1987年）1月就来见过他，说如果他们不采取一些像样的行动，就会失去数百万美元的美国禁毒基金。所以他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昆沙同意让泰缅军方进入边境，然后向空中开枪、发射几枚火箭弹，这样他们便可以宣称已经履行职责抗击昆沙这个“魔鬼”，也就是（美国驻泰国）大使威廉·布朗口中的“世界上最可恶的敌人”。

昆沙也告诉格里茨，实际上为了换来这场演出，泰国同意在湄宏顺府和边境线上与贺蒙相对的某地之间新建一条公路（1285号公路，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再次修建）。<sup>①</sup>换句话说，为了让昆沙在这次阴谋策划的表演中充当指定的打击目标，美国实际上已给予昆沙本来没有的讨价还价的权利。<sup>②</sup>

作为缉毒局的指定目标，昆沙和罗兴汉利用这种身份与缅甸政府达成了双方均满意的谅解。缅甸的闭关锁国令经济遭受冲击，因此，政府越来越依赖于昆沙和罗兴汉所缴纳的收益税——政府相信这两个走私犯不再是美国的资产（即便昆沙曾经是）。<sup>③</sup>随着老派国民党将领的逐渐衰落，昆沙进入了地位提升的新阶段。

① James Gritz, *A Nation Betrayed* (Boulder City, NV: Lazarus, 1989), 86, quoted in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79 (Route 1285 can be seen on Google Maps). 格里茨的详细叙述过于散乱、不可信，但当时身在泰国边境的林特纳使笔者相信他的整个描述是准确的。Cf. Be-langer, *Drugs, the U. S., and Khun Sa*, 108 - 109: “这条能够容纳10吨卡车的公路是泰国政府利用美国资助的人力、时间和材料修建的，所有资金均来自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建立的禁毒基金，因此极具讽刺意味。”

② 1982年，昆沙不再听命于国民党将领，开始自己统治市场。之后，昆沙在缅甸的境况改善了许多。

③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92.





在昆沙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缅甸的鸦片生产从550吨猛增至2500吨，惊人地增长了500%。在缅甸罂粟连年丰收的推动下，东南亚的毒品在纽约市海洛因市场中的份额从1984年的5%增加到了1990年的80%。那时候，昆沙控制着缅甸80%以上的鸦片生产，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毒枭。<sup>①</sup>

当缅甸的鸦片生产呈现5倍的大幅增长时，奈温政府正从美国国务院手中获取一种威力巨大的化学脱叶剂2,4-D，准备来一场大规模的空中喷洒行动，不过很明显效果不佳。这个一年耗费1800万美元的计划再一次证明了，如果不能理解偏远地区的问题，那么光投钱是没用的：“禁毒官员认为这个计划不但没能抑制鸦片生产，反而鼓励了罂粟种植区的农民扩大种植，以弥补喷洒可能带来的损失。‘我们的行动招致了他们的超额生产’，曼谷的一位禁毒专家说。”<sup>②</sup>

缅甸军方开展这次喷洒行动也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其打击的目标是克钦族和佤族这种反对中央政府的山地部落，据称像昆沙这样支持政府的人都能幸免。所以，喷洒行动的最终结果是帮助昆沙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2,4-D没有减少鸦片生产，却对作为打击目标的山地部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伊迪丝·米兰特从两个反对政府的掸邦团体收到报告，称“这种毒药会使人员患病，牛群死亡”。<sup>③</sup> 谢尔比·图克(Shelby Tucker)是此期间少数到达缅甸克钦地区的人之一，别人

① Alfred W. McCoy, "Lord of Druglords: One Life as Lesson for US Drug Policy,"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November 1998, 309.

②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92.

③ Mirante, *Burmese Looking Glass*, 147: “我怀疑，奈温并不在乎这种毒药除了杀死掸邦山上种植的罂粟外，是不是还伤及其他。”一位教授告诉米兰特，在该计划开始前就已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评估显示，缅甸的喷洒行动将危害环境，效果值得怀疑。最后政府隐匿了这份报告，还是执行了该项计划……美国驻缅甸大使奥多诺霍(O'Donohue)告诉我们公会，称这次喷洒计划是近年来美缅关系取得的最大成功。” Cf. *Mother Jones Magazine*, February-March 1989, 41.



告诉他，2,4-D 毒性非常强，接触到它的东西几乎都会死亡。它混在河流溪水中，传播到了目标地区以外的地方。饮用河水或是吃了受其污染的食物的人就会患上严重的疾病。它的污染作用将长存于地下。可用作并曾经被用作战术中的脱叶剂，以及阻止人们支持叛乱并鼓励人们支持缅甸军队。它是一种理想的种族清洗工具。<sup>①</sup>

之后，鸦片开始从北部和东部经果敢运往中国，昆沙和罗兴汉也因此有了新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被缉毒局指定为打击目标，此二人才能与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相安无事，并成了缅甸重要的资本企业家。

对于缉毒局耗费巨资在东南亚开展的、时常带有镇压性质的禁毒战争，麦考伊和林特纳给予了难以驳斥的严厉批判：

昆沙的经历证明了，美国对全球毒枭发起的禁毒战争最终只是无功而返。大毒枭仍旧是毒品贸易的核心力量，在政府内部强大势力的庇护下，国际压力对其始终没有影响。像昆沙一样，只有在毒品产区的政治经济发生转变导致这些毒枭变得多余时，政府才会逮捕他们——夺取他们在当地的势力、毒品利润和外部支持。事实上，只有在毒枭不再是毒枭时我们才能将其俘获。这一悖论就全球毒品贸易的性质和美国禁毒政策的恰当性提出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与同世纪中的所有其他人相比，昆沙在建立全球毒品走私贸易的过程中发挥了无人能及的作用——使缅甸的海洛因产量增加了5倍，改变了美国毒品滥用人口的特征。不过即使在他权力鼎盛时期的1990年，他被俘获也不会对毒品走私有任何影响。罂粟田和城市中的瘾君子仍

① Shelby Tucker, *Among Insurgents: Walking through Burma* (London: Radcliffe, 2000), 93. For similar Reports on the DEA's use of 2,4-D against the FARC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in Colombia, see David Weir and Mark Schapiro, *Circle of Poison: Pesticides and People in a Hungry World*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81).

会存在，很快就会有一些其他毒枭利用他们的联系获取其中利益。在过去的50年里，缅甸出现过四位毒枭——李文华将军、罗兴汉、昆沙和现在的魏学刚——他们通过极大地提高鸦片输出累积了惊人的财富和权力，随后又都一一陨落，没有对毒品供应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sup>①</sup>

1975年中情局从老挝撤离后，这种毒品环境保留了下来，不单苗族，就连整个老挝经济都极度依赖于这种毒品环境。新任的共产党政府穷困潦倒；很快，各独立省的领导人以及之后两个首都的领导人都不得不与当地的走私犯结盟。

仅仅三年后，即1978年，中泰走私犯布恩茜瑞·陈阿萨克（Poonsiri Chanyasak）（从前在泰国被称为“Mr. Big”）<sup>②</sup>成功地贿赂了越南新任共产党政府，开始将老挝鸦片卖给曾经属于国民党网络的人物。他在泰国的主要买家卢徐水（化名 Vichien Wachirakaphan）是缉毒局打击的主要目标。在执行“某一高级别、高保密性的国家安全计划”时，中情局决定在他的案子中先抓捕线人，而卢最终逃过了抓捕。<sup>③</sup>

《纽约时报》称，卢徐水“曾经是（并且仍有可能是）从东南亚向美国输入海洛因的头号进口商”。<sup>④</sup>因此，Poonsiri - 卢徐水的联系构成了笔者所说的麦塔集团（Metagroup）：一个有能力在政治冲突中获得双方庇护的团体。据米尔斯介绍，卢徐水和他的两个表

① McCoy, "Lord of Druglords," 454-455;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278, 380-381, 377-378.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70;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34.

③ 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201-203, 222;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31. 布恩茜瑞在泰国的主要买家卢徐水用鸦片向泰国北部的国民党换取黄金，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Lintner, *Burma in Revolt*, 307）。在旧金山，卢徐水和他的两个儿子花150万美元买下了肖酒店（Shaw Hotel），即今天的雷诺阿酒店（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214）。

④ Christopher Lehmann-Haupt, *New York Times*, June 16, 1986.



兄弟在逃过了起诉后，仍明显与拉斯维加斯、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服务保持着特殊的关系。<sup>①</sup>

这则轶事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某些上层走私犯被中情局用于半国营集团的世界中，这些走私犯在最好的庇护下将站上世界贸易的顶峰。然后，禁毒便成了一项有利于这些上层走私犯的活动：一方面人为地提高了毒品价格，另一方面对那些参与竞争但不受庇护的走私犯进行有选择性地起诉。

毒贩掌握这种超越政治部门的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 东南亚和阿富汗的鸦片生产：相同抑或不同？

我们有理由推断，1975年中情局被迫撤离老挝可能造成了同一时期阿富汗鸦片生产的扩大，之后不久，中情局又从1978年（甚至更早）开始破坏阿富汗的稳定。如果要概括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径，那就是杜勒斯兄弟和中情局将老挝这样一个种植鸦片的内陆国家，也是该地区唯一一个从未侵犯他国的国家作为打击的目标，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政府持中立态度，而不是出于打击其他犯罪的目的。中情局决定分化该国，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最后，美国的代理人彻底失败，而他们的敌人老挝战斗部队则建立了新的政府。

在此之前，美国曾对老挝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空中打击：1968～1972年，美国对查尔平原一地投放的炸弹吨数便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投放的炸弹总吨数。<sup>②</sup> 其中许多炸弹仍未爆炸，还在引起平民的伤亡。不过在这场罪恶的战争彻底失败后，1978年（也就是美国从泰国撤出最后一支军队的两年

① 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1076 - 1078.

② Keith Quincy, *Hmong: History of a People* (Cheney: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3.



后), 布热津斯基和中情局一致决定重演历史, 对另一个种植鸦片的内陆国家——阿富汗实施破坏行动。

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介绍过, 不久布热津斯基便和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者法左·哈克 (Fazle Haq) 取得了联系。1982年,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将法左·哈克列为国际毒贩。<sup>①</sup> 美国的分化政策导致了阿富汗的国内政变, 之后一支共产党派系建立了新政府。不过由于该政府过于极端, 苏联 (正如布热津斯基预言的那样) 出面干预, 试图加以约束。在之后十年的反苏抵抗中, 美国将一半的援助都给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 (Gulbuddin Hekmatyar), 很快他便成了“阿富汗的首要毒枭之一”。美国国内也因此受到影响, 1979年以前, 来自金新月的海洛因尚微不足道, 但到了1980年, 金新月的海洛因已占据了美国市场的60%。<sup>②</sup>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毒品的影响。1980年, 吉米·卡特的禁毒顾问大卫·马斯托 (David Musto) 告诉白宫毒品滥用战略委员会, “我们要进入阿富汗支持鸦片的种植者”, 他问道, “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避免重蹈在老挝的覆辙吗?”<sup>③</sup>

麦考伊指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海洛因进口出现大幅减少, 原因可能是尼克松禁毒战争的成功, 也可能是吉米·卡特在1976~

①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73-75, citing Christina Lamb, *Waiting for Allah: Pakist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H. Hamilton, 1991), 222;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79. 法左·哈克是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省长, 同时也是一名重要的中情局联络人和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者。在这些圣战者中, 一些人通过在该省从事重大的鸦片和海洛因走私来维持生计, 这已经不是秘密。不过在和法左·哈克的儿子进行了长期通信后, 笔者相信没有任何已知的理由可以作为谴责法左·哈克从毒品走私中获取个人利益的依据, See “Clarification from Peter Dale Scott re Fazle Haq,” 9o11Truth.org, <http://www.9o11truth.org/article.php?story=20090223165146219>.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73-75, citing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75 (leading drug lords), 464 (60 percent).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61; citing interview with Dr. David Musto.



1978年禁止了中情局的重大暗箱操作。（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从印度支那撤离。）虽然麦考伊承认全球毒品贸易非常复杂，但他还是给出了谨慎的结论：“总的来说，对于20世纪70年代海洛因供应的骤减以及随后80年代出现的复增，禁令和庇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与此同时，自美国首次干预阿富汗之后的30年里，东南亚的鸦片和海洛因生产出现了明显下降：从全球鸦片销售总量的70%以上降到5%左右。《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对这种巨大的变化给出了如下解释：

来自中国的经济压力、对鸦片种植者的打压以及毒品犯罪分子转向冰毒生产，显然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同时，一些曾经靠毒品贸易获得资金支持的叛乱组织现在却说，他们正敦促农民摧毁他们的罂粟田。

结果，金新月超越了金三角——金新月位于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的交界处，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全球约有92%的鸦片都来自这片罂粟种植区。<sup>②</sup>

然而，笔者怀疑阿富汗的毒品走私和东南亚之变化的受益者一样，都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这就像缅甸和罗兴汉重新结盟是造成后来昆沙事业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样，所以在东南亚毒品生产受到挤压的问题上，阿富汗成为全球海洛因贸易的新霸主可能是其中一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62.

② Thomas Fuller, "No Blowing Smoke: Poppies Fad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2007. Cf.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Opium Poppy Cultivation in Southeast Asia: Lao PDR, Myanmar and Thailand," 2009, 3. 老挝、缅甸和泰国的罂粟种植总面积已经从1998年（即联合国大会毒品特别会议召开的同年）的157900公顷左右降至2007年的29400公顷，尽管2007年出现了22%的增长，但九年中仍然整体下降了81%。



个主要因素。联合国毒品问题办事处制作的图表显示，1990~2005年，全球鸦片生产相对稳定，阿富汗产量的增加大体上弥补了缅甸产量的下降。<sup>①</sup>

这是否意味着，那些从东南亚毒品走私中获益最多的人已经被新的、毫无关联的参与者所取代？对此笔者非常怀疑。阿富汗人进入全球毒品市场始于1971年，那一年老挝宣布鸦片贸易为非法行为，而印度支那和美国之间的大量空中通信也开始减少。两位法国记者报道称，1971年有数百名欧洲人和美国人在阿富汗做起了毒品走私的买卖。<sup>②</sup>笔者怀疑其中一些人是从东南亚过来的，原因是他们预见到那里的走私机会将发生变化。

有一种联系可以解释1985年当缅甸的毒品开始流入中国的华南地区时，为什么中国开始允许国际银行进入毗邻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而允许进入的第二家银行为什么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sup>③</sup>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1980年起，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便作为首席银行，负责将中情局的支持资金传送给在阿富汗从事毒品种植的圣战者，该银行亦因此在全球建立了显赫的声望。

1990~2007年鸦片生产的变动确实很像是1968~1972年美国海洛因进口变化的翻版。

1968~1972年，国际毒品走私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8年以前，输入美国的海洛因90%都来自中东种植的鸦片……

- 
- ① “Figure 2: Global Opium Poppy Cultivation (Hectares), 1990 - 2007,”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Opium Poppy Cultivation in Southeast Asia: Lao PDR, Myanmar and Thailand,” 4. 1990年的鸦片种植面积刚刚超过250000公顷，2007年则略低于这一数字。波动最大的是2001年，这一年塔利班成功地禁止了阿富汗地区的鸦片生产，使全年的鸦片总产量减到了平均值的一半左右。
- ② Catherine Lamour and Michel R. Lamberti, *Th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Opium from Growers to Pusher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190 - 192.
- ③ Peter Truell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94 - 95.



但到了1972年，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那时候，进入美国的海洛因45%以上都来自金三角种植的鸦片……来自中东—法国一线的海洛因出现了近乎同幅度的下降。<sup>①</sup>

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也许能够帮助解释这一变化。第一个是特莱菲肯特1968年访问香港，在那里他可能见到了王宝，但也可能没见到（就像钱布利斯在缉毒局的内线告诉他的那样）。麦考伊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推测，他认为特莱菲肯特的到访“是为了解决地中海地区的毒品走私危机，想要为美国的黑手党毒贩找到一个可靠的海洛因新来源”。<sup>②</sup>

第二个是尼克松于1971年启动的禁毒运动，其第一阶段的目标锁定了作为鸦片来源地的土耳其，而忽视了东南亚。<sup>③</sup>关于尼克松打击土耳其的行动，麦考伊对其最初影响以及最终的徒劳无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在第一次美国禁毒战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摧毁了土耳其—马赛运输线。不过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的海洛因贩卖者将采购的地点从土耳其转到了东南亚，然后又转到了墨西哥，之后是中亚——始终比美国的缉毒特工快一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事实证明尼克松的成功不过是后来失败的铺垫而已。<sup>④</sup>

① William J. Chambliss, *On the Take: From Petty Crooks to Presid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3.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53.

③ 愤世嫉俗者想知道，尼克松最初忽视了亚洲的毒品是否与以下事实有关：之前提到的、由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领导的“在亚美国公民支持尼克松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 in Asia for Nixon）为他筹集了在亚洲的竞选基金。相关信息参见莱那塔·阿德勒 See Renata Adler, *Canaries in the Mineshaft: Essays on Politics and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65-68.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57, emphasis added.



换句话说，30年的禁毒战争如今已花去了大约1万亿美元美国纳税人的钱，但毒品走私的规模丝毫未减，只是影响了像特莱菲肯特这种大毒枭的行为。<sup>①</sup>如果麦考伊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曾经支配毒品走私的主要海洛因运输线现在已将采购地转到了中亚，而且只能是阿富汗。

这一切让笔者想到了一个问题，可能会无法回答，那就是麦考伊没有问出来的：这两次都是在毒品走私的现有供应源即将面临危机时，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出面干预，帮助其他深度势力建立新的供应源，这难道是巧合吗？

## 深度势力、中情局以及全球鸦片 生产向阿富汗的转移

库萨克宣布法国的海洛因实验室的鸦片是由土耳其提供，以及他设想的收购计划以断绝马赛海洛因实验室的鸦片供应，都是一项规模更大的运动的一部分，即切断所谓的法国运输线。许多书都介绍过这次运动，但大部分都没能指出其所导致的亚洲鸦片供应增

---

① 在澳大利亚期刊《太阳》(The Sun)对他的采访中，麦考伊已经极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这一点：“突然之间，随着法国运输线的断裂，我们开始从东南亚向美国进口大量海洛因。越南战争结束了，最后一支美国军队也撤离了，东南亚的毒品生产者又拥有过剩的产能，所以他们开始向美国大规模输出海洛因。而尼克松在他的禁毒战争中又打了一场胜仗。他派遣了30名缉毒局特工前往曼谷，这些人与泰国警方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并且非常有效地为美国掌握了海洛因的运输路线，对出口到美国的海洛因征收一种非正式的关税。于是，东南亚的走私贩开始转为出口到数十年来几乎不曾出现毒品的欧洲。法国的辛迪加与政府达成了某种协议：他们可以生产海洛因，但不能在法国销售，而必须出口。由于法国运输线已经切断，东南亚贩毒组织开始向欧洲大规模输出海洛因。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的海洛因瘾君子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此外，贩毒组织还让很多澳大利亚人染上了海洛因毒瘾。”“Tricks of the Trade: Alfred McCoy on How the CIA Got Involved in Global Drug Trafficking,” *The Sun*, May, 2003, <http://www.derrickjensen.org/mccoy.html>.



加，以及它在中情局和法国情报机构——法国外国情报与反谍报署的转变中发挥的作用。由于所有的上层走私犯都有情报机构的庇护，因此走私路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他们的情报联系。<sup>①</sup>

尤其是在1969年乔治斯·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接替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成为法国总统后，上述两个情报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并导致新旧机构之间出现了内部矛盾。中情局向来反感戴高乐，于是便和蓬皮杜的支持者联手撤换了法国外国情报与反谍报署中的戴高乐派。很快，这些支持者的领袖亚历山大·德·马兰奇斯（Alexandre de Marenches），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位美国联络员，便于1970年11月在蓬皮杜的安排下成了法国外国情报与反谍报署的署长。

1969年11月，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局长和新任蓬皮杜政府中的法国官员开始讨论“如何粉碎马赛（科西嘉）奥尔西尼组织”。<sup>②</sup>在笔者作序的一本书中，丹麦记者亨利克·克鲁格（Henrik Krüger）称这次讨论是一系列协调会议（包括特莱菲肯特1968年的香港之行、尼克松的禁毒政策计划以及黑手党在意大利举行的峰会）的一部分；这些会议都是为了执行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即重建和重定向美国的海洛因贸易，使“美国的海洛因来源地从马赛（科西嘉）转到东南亚和墨西哥（黑手党）”。<sup>③</sup>

克鲁格的基本观点是，他所说的“伟大的海洛因政变”部分是由下任总统（尼克松和蓬皮杜）和“他们的老牌情报服务机构”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导致的。<sup>④</sup>他的观点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中情局通过美国和法国反对戴高乐派、支持蓬

① Cf. my remarks about *Newsday's The Heroin Trail* in "Foreword," in Henrik Krüger, trans. Jerry Meldon, *The Great Heroin Coup-Drug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Fasc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4.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55.

③ Scott, "Foreword," 3, summarizing Krüger, *The Great Heroin Coup*, 117-129.

④ Scott, "Foreword," 4.



皮杜的缉毒特工参与了策划和谋杀摩洛哥左翼分子本·巴卡·梅迪（Mehdi Ben Barka）的行动。本·巴卡是哈瓦那三洲会议的组织者。戴高乐的传记作者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准确地评论了这次谋杀行动，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双重目的的行动——首先是通过消灭本·巴卡来打击第三世界，其次是打击戴高乐。”<sup>①</sup> 据《时代》杂志报道，在随后的骚乱中，至少有 37 人失踪，克鲁格将其归因于法国外国情报与反谍报署中戴高乐派和蓬皮杜支持者之间的矛盾。<sup>②</sup>

麦考伊还研究了海洛因供应的这种变化。他在其最新版的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少了几分阴谋论调：毒品市场的来源地从土耳其转到亚洲，只是代表了美国的海洛因贩卖者决定避开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的侦查。用他的话说，过去 40 年里，“美国的海洛因贩卖者将采购的地点从土耳其转到了东南亚，然后又转到了墨西哥，之后是中亚——始终比美国的缉毒特工快一步”。<sup>③</sup>

相反，麦考伊在这部著作的 1972 年版中表达了与克鲁格更为接近的观点，因为麦考伊也认为，供应的变化至少部分是源于政府在土耳其的重要性问题上故意弄虚作假。

1971 年正值美国海洛因泛滥，政府首脑和媒体记者们将极为复杂的国际毒品走私归纳成了一句话。他们令人感到安慰的总结是这样说的：美国 80% 的海洛因都是以土耳其险峻崎岖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种植的生鸦片为原料，在马赛的秘密实验室中提炼而成，然后再通过冷酷无情的国际贩毒组织走私到美国。如果有任何一家媒体不辞辛苦对这一言论进行考证，可能

① Alexander Werth, *De Gaulle: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6), 400.

② *Time*, December 29, 1975; Krüger, *The Great Heroin Coup*, 4-5, 59-71.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57, emphasis added.



就会发现其主要是以法国缉毒警察局的随意猜测为依据的。法国缉毒警察局只有 11 名警官和 3 辆警车，靠着微薄的预算拨款完成整个法国南部的缉毒工作。<sup>①</sup>

麦考伊在他 2003 年版的书中删除了这一段，而且就像接受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样，承认“美国 80% 的海洛因都来自土耳其鸦片”。<sup>②</sup> 道格拉斯·瓦伦丁认为，对土耳其鸦片供应数据的过分夸大以及对土耳其鸦片的收购计划都是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特工约翰·库萨克一手策划的。瓦伦丁称，库萨克“野心勃勃、聪明机智，和中情局有着密切的联系，时常利用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的调查作掩护，暗中执行中情局的任务”。<sup>③</sup>（瓦伦丁在他早期的书中写道，中情局利用库萨克实施了克鲁格所说的中情局谋杀本·巴卡的阴谋。<sup>④</sup>）

要了解美国目前对阿富汗的干预情况，就必须确定政府的政策是否正如克鲁格所说，过去主导了海洛因供应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追随变化。在 1991 年出版的《可卡因政治》一书中，笔者和乔纳森·马歇尔都主张政府的作用应更加适度。也就是说，中情局应该

- 
- ①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44.
-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003), 393. 麦考伊向笔者解释说，删掉原来的那一段是为了给 2003 年版的新增材料留出空间。
- ③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53: 库萨克“制作的统计数据显示，从马赛输入的海洛因 80% 都是以土耳其鸦片为原材料”。Cf.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468.
- ④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370. Cf. Krüger, *The Great Heroin Coup*, 4-5, 59-74. 克鲁格没有意识到库萨克和本·巴卡谋杀案之间有任何联系，不过，他指出了库萨克制作的其他一些误导性统计数据。库萨克谎报称美国的吸毒者减少了 20 万人，但实际情况是吸毒者人数增加了。克鲁格斥责他运用“瞒天过海的手段，企图掩盖尼克松的海洛因战争不过是粉饰门面的事实”（Krüger, *The Great Heroin Coup*, 171-173）。



与全球各地的走私犯结成联盟，而不是引导他们向全球各地扩张。

我们写道：

长久以来，中情局与下述人员的勾结，包括西西里岛黑手党、法国的科西嘉黑社会、东南亚金三角的海洛因生产者、迈阿密从事大麻和可卡因走私的古巴流放者以及阿富汗的鸦片走私圣战者，不过是强化了对抗期吸取的教训而已：美国情报组织非但没有把毒品网络视为敌人，甚至还将他们当作重要的同盟者，以助其秘密扩大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sup>①</sup>

笔者在本书中给出了相关证据，证明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过去的政策为鸦片走私的变化铺平了道路，而不仅仅是追随变化。<sup>②</sup> 国民党走私犯通过缅甸的行动方案建立了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进而使缅甸成了新的全球鸦片供应国。由于泰国空军增援队推翻了老挝原来的中立政府并将权力授予了欧安将军，因此老挝也成了全球鸦片的重要供应国。后来，沙克利出面调停了1967年鸦片战争，沙克利的军队又与从事毒品走私的纽甘—汉德银行勾结，使老挝作为毒品供应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笔者的结论是，中情局撤出老挝、进入阿富汗的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毒品供应从东南亚的金三角转到了阿富汗的金新月。问题是，这种变化是非刻意安排的，还是中情局在马斯托的提醒下，有意急于找到一块鸦片生产基地的其他黑暗力量保持一致，以应对美国撤出东南亚的现实状况。

这个问题又和另外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极为相关：为什么美国不听专家的建议，如今使自己陷入了另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阿富汗战争。

①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4.

②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50; cf. Scott, *The Road to 9/11*, 73-75.

**第三部分**  
**深度事件与国内毒品网络**



## 第七章

# 中央情报局、全球毒品 网络和恐怖主义

保罗·海利维尔 (Paul Helliwell)、  
政策协调处和中央情报局

笔者将在本章介绍全球毒品网络体系的复杂基础框架，以及该体系与所谓“翻版”或“影子版”中央情报局的关联。描述过程中，相对而言，个人、机构及其关联者的具体名称并不十分重要。核心在于认识到这种体系曾经存在，而且不停运作，牵涉面广，备受庇护；由于逐渐摆脱政府的掌控，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它已经对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产生了影响。

至少从1945年开始，在那些共产主义力量看似强盛的地区，美国周而复始地支持从事毒品走私活动暴徒的报复性暴力行为。起初，比如在战后的意大利，这些安排只是形势使然的一时之计。例如，纽约黑手党头目维托·基诺维斯 (Vito Genovese) 被安排在查尔斯·波勒提查尔斯·普莱蒂 (Charles Poletti) 将军的联合军事政府办公室 (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Office) 担任口译员，查尔斯将军曾是纽约坦幕尼派 (Tammany) 的政客。<sup>①</sup> 然而在1947年，一个更为密切的关系网浮出水面，由拉凯·卢西亚诺 (Lucky

---

<sup>①</sup> Alan A. Block, *East Side - West Side: Organizing Crime in New York, 1930 - 1950*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83), 109.





Luciano) 和弗兰克·科波拉 (Frank Coppola) 牵头, 多达 60 位新近被驱逐出境的美国黑手党分子与战略情报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前任领导威廉·多诺万 (William Donovan) 等人一道, 协助中情局所偏爱的基督教民主党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sup>①</sup>

1948 年, 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成立了政策协调处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OPC), 意图“针对敌对国家开展颠覆行动”, 换言之, 视颠覆法纪为国家政策, 自此, 这类行动变得更为官方化、集权化。正是由于政策协调处的运作, 美国开始为世界各地有组织毒品走私提供秘密支持, 包括远东、欧洲以及后来的中东和拉美。

这些涵盖全球的行动变得越发盘根错节。我们看到, 最迟自 1950 年起, 就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中情局—毒品的网络, 断断续续地运作着。随着局势变化, 这种网络导致了一些无法解释的重大事件, 强化了国内外的全球主导思想。具体说来, 全球毒品网络是导致众多扑朔迷离事件的一个基本因素, 诸如约翰·F. 肯尼迪遇刺、1964 年第二次东京湾事件 (Tonkin Gulf) 和伊朗门事件 (Iran-Contra)。

全球毒品网络绝非仅是中情局外勤特工和毒品走私贩之间横向联系这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游资体系, 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黑社会均牵涉其中。有系统地为世界各地政客, 包括美国两党领导人, 提供非法财物、好处便利甚至色情服务, 从而维持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其结果是, 形成了一个也许可称为间接帝国的体系, 它寻求海外市场和资源, 乐于颠覆海外现行管治, 但又不造成变革式转变。

<sup>①</sup> Gaia Servadio, *Mafioso* (New York: Dell, 1976), 125 - 128;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74 - 177.



战后全球毒品网络连接着中情局、有组织犯罪和两者在毒品走私中的双边利益，其主要促成者当属战略情报局前任官员保罗·L. E. 海利维尔（Paul L. E. Helliwell）。他曾担任战略情报局驻昆明特别情报小组组长，后来在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担任重要职务。与此同时，他成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Key West）的帕莱茵银行（Bank of Perrine）和其姐妹银行卡特勒·利吉银行（Bank of Cutler Ridge）的行长，前者“两次为郎斯基（Lansky）暴徒和中情局洗钱”。<sup>①</sup>我们会在全球毒品网络中看到许多为相互勾结的暴徒和中情局洗钱的银行，毋庸置疑，其中最关键的要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

绝大多数人从未听闻保罗·海利维尔。有关中情局违法乱纪行为的主流书籍，例如提姆·温纳（Tim Weiner）的《灰烬传奇》（*Legacy of Ashes*）对此人只字未提，对他和中情局有重大关联的位于巴哈马群岛的卡斯托银行（Castle Bank）也未曾提及，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对之后替代卡斯托银行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这个更为重要的组织，也毫无论述。自1992年之后，中情局文件大批量公布，人们在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和美国科学家协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文件中并未发现海利维尔这个人。在玛丽·费罗基金会（Mary Ferrell Foundation）网站上保存并可查询的长达百万页的机密文件中，海利维尔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这仅有的一次是出现在一张文件列表清单上，中情局在1974年的搜寻工作中，这些文件由于保密需要，不对外公开，全部与水门

<sup>①</sup> R. T. Naylor, *Hot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Debt* (New York: Linden/Simon and Schuster, 1987), 295 (“laundromat”). See Alan A.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1), 165–166.



事件有关!<sup>①</sup> 即便是公开的中情局文件也对战后中情局—毒品网络的主要框架一字不提, 这本身就意味深长。

我们对于海利维尔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源自于一次媒体报道, 时值 20 世纪 70 年代, 中情局成功拦截了内部预算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针对海利维尔洗钱银行的调查, 即“信风计划” (Operation Tradewinds)。海利维尔和中情局的纠葛始于 1972 年, 当时内部预算局的调查员理查德·杰夫 (Richard Jaffe) 正在调查已被捕获的大麻和迷幻药商贩艾伦·乔治·帕尔马 (Alan George Palmer) 的资金源头, 他发现帕尔马“本人曾携带部分现金, 前往南部的帕莱茵—卡特勒·利吉银行办理存款”。<sup>②</sup>

杰夫还发现, 这些资金被存入一家在巴哈马群岛注册名为“卡斯托银行”的账户里。吉姆·卓林克霍尔 (Jim Drinkhall) 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表示, 这家银行由海利维尔“设立并主要掌控”, 海利维尔“在协助领导中情局地下行动网络和‘资产’中扮演重要角色”。<sup>③</sup> 卓林克霍尔写道, 中情局阻止了杰夫对卡斯托银行的调查, 原因在于“该银行是中情局用来拨付上百万美元资金的专用渠道, 以开展针对古巴的地下行动以及指向拉美和远东国家的秘密情报行动”。<sup>④</sup>

① CIA Memo dated April 24, 1974, “代码 RYBAT/JMSPUR/PLVWCADET 运输文件在水门事件文件搜索中被从 C/WHD 个人文档中移走。运输文件现保存于 WH/COG3D46 号房第 1322 号保险柜中, 用一高度机密信封密封”, NARA#104 - 10095 - 10326。1974 年, 西部分局主管 (Chief of 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 简称 C/WHD) 由西欧多尔·沙克利担任, 后有论述。Seen on the Mary Ferrell website at <http://www.maryferrell.org>。

②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61 - 162, 166.

③ 艾伦·布洛克后来发觉, 银行创立者、芝加哥律师“伯顿·坎特才是卡斯托银行创建的关键人物, 而非海利维尔”。他援引的猜测起初是针对先前克利夫兰市的暴徒诈骗犯莫里斯·克莱曼。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72.

④ Jim Drinkhall, “IRS vs. CIA: Big Tax Investigation Was Quietly Scuttled by Intelligence Agency,”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8, 1980.



卓林克霍尔进一步发现，海利维尔最为赫赫有名的要数下述这件事（笔者之前曾在《战争阴谋》（*The War Conspiracy*）一书中有所论述）：

1951年，海利维尔先生帮助设立并管理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Sea Supply Corp.），这是一家由中情局控制的公司，用作幌子。近十年里，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一直给驻扎在缅甸的中国国民党一万名士兵以及泰国警力运输大量的武器装备。<sup>①</sup>

不过当时卓林克霍尔并未指出那个时至如今尚未被论及的问题：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以及泰国警力都是中情局—国民党—缅甸—泰国毒品网络的两大主力，都参与了鸦片种植和国际市场（包括美国境内）上的走私活动。<sup>②</sup>

海利维尔从中情局尝到的甜头可不局限于远东地区。通过和国民党—缅甸毒品网络的两位旧相识——中情局的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以及中情局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CAT）的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海利维尔“早在1953~1954年，还参与了中情局在中美洲地区开展的行动。这一时期的目标是危地马拉及其政府”。<sup>③</sup>

类似于陈纳德以及海利维尔在中国那段时期的其他老同谋——

① Drinkhall, “IRS vs. CIA.”

②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168-174;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69 (Thai police).

③ Alan A. Block and Constance A.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Global Ban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38, citing Stephen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Kinzer, *Bitter Fruit: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83), 119. Cf. Peter Dal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47, 67.



怀汀·维劳尔 (Whiting Willauer) 和威廉·保雷 (William Pawley), 1954年, 海利维尔协助中情局开展针对危地马拉的行动, 1960年之后, 又瞄上了卡斯特罗。依照卓林克霍尔的论述, “一位曾协助调查卡斯托银行的前任联邦政府官员表示, ‘卡斯托银行是中情局开展针对古巴行动的资金渠道之一’。据传, 在1961年以失败告终的猪湾入侵事件中, 以及中情局在拉美地区开展的其他‘广泛’行动中, 海利维尔先生均为付款人之一”。<sup>①</sup>

关于那位曾蹲监狱的华莱士·格罗夫斯 (Wallace Groves) 与中情局的勾结, 中情局后来公开的大量文件均证实了这种关联。其中一份经过重新编辑的文件中写道:

文中所述那位与迈耶·郎斯基 (Meyer Lansky) 以及玛丽·卡特涂料公司 (Mary Carter Paint Co.) / 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Resorts International, Inc.) 有来往的华莱士·格罗夫斯, 和编号为 OS file #473 865 的文件所指的华莱士·格罗夫斯为同一人。该文件证实, 自1966年4月到1972年4月, 格罗夫斯与 (中情局) 综合咨询办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存在利益关联, 该办公室雇用格罗夫斯为顾问, 甚至可能为 × × × 项目单位担任官员。该文件中的补充信息从侧面表明, 格罗夫斯和迈耶·郎斯基有往来。<sup>②</sup>

笔者推测, 所谓“× × ×项目单位”使用了源自黑市的资金, 而非中情局核准预算。

① Drinkhall, “IRS vs. CIA.”

② 中情局备忘录, 1976年8月18日, 发送对象首席及安全分析小组, NARA# 104-10059-10013。在这份备忘录的边角, 手写体文字出现山姆·吉安卡纳的名字, 此人是中情局—黑手党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阴谋的主要人“文档/山姆·吉安卡纳/未提及”。



## 海利维尔与灰色行动的关联

自卓林克霍尔的文章发表以来，几乎所有提及海利维尔的论述都不免将其视为猪湾事件的付款人，笔者对此论述有所考证。然而，中情局动用了另一家与海利维尔相关的机构——国际多元化公司（Intercontinental Diversified, I. D. C.）近500万美元，从此便可一窥海利维尔与中情局金钱往来的程度。再次引用卓林克霍尔的原文如下。

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关于国际多元化公司的文件中并未提及中情局，不过一位中情局前任官员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语出惊人。他提到，1970~1976年，国际多元化公司大约500万美元的资金被中情局调用，理由是“我们在那里有人”。非常明显，中情局的关系网远比“有人”牢靠。中情局的文件表明，华莱士·格罗夫斯是国际多元化公司的创立者，拥有该公司46%的股份，1978年以3310万美元的价格将股份售出，1965~1972年，他一直在为中情局秘密工作。

毋庸置疑，银行家绝不会因为友情就转账上百万美元资金。更为可信的推测是，海利维尔不会为诸如猪湾事件这种经过官方批准的行动埋单，而是通过灰色操作调用资金。

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曾断言：“海利维尔通过位于巴哈马群岛的卡斯托银行为中情局洗钱。”<sup>①</sup>不过这论调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国际多元化公司是一家名为本格特矿业（Benguet

<sup>①</sup> Jonathan Marshall, *Drug Wars: Corruption, Counterinsurgency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Forestville, CA: Cohan and Cohen, 1991), 54, citing Drinkhall, "IRS vs. CIA."



Mining) 的亚洲企业的分支,海利维尔的公司为其代表,该亚洲企业的有些掌控在菲律宾独裁者费迪南·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手里。<sup>①</sup> 因此,资金是从亚洲汇入国际多元化公司,笔者个人的推测是,海利维尔利用这些灰色资金,而非国会核准的中情局资金,来资助地下活动。<sup>②</sup> 尤其惹人注目的是,1970~1976年,当中情局从国际多元化公司获取资金,与此同时,美国麻醉剂官员捕获了一个庞大的“马尼拉网络”,该网络从金三角将海洛因运送到美国。<sup>③</sup> 马尼拉网络中的头号人物李姆·森 (Lim Seng) “用其收益购买股票,其中就包括本格特矿业的股票”。<sup>④</sup>

- ① 布洛克指出,本格特矿业公司旗下国际多元化公司的分支曾“向一家香港银行支付 329438 美元”(也许是汇入马科斯的一个账户)。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98.
- ② 来自菲律宾金矿——有可能就是黄金本身——的利润通过亚洲进入国际多元化公司。斯戴林·西格勒夫 (Sterling Seagrave) 和佩吉·西格勒夫 (Peggy Seagrave) 曾提出此观点,但笔者并未发现证据,他们二人认为,事实上,格罗夫斯和海利维尔正将日本战争时期的秘密金库“伪装成本格特矿业公司的黄金,从菲律宾运至”巴哈马群岛。Sterling Seagrave and Peggy Seagrave, *Gold Warriors: America's Secret Recovery of Yamashita's Gold* (London: Verso, 2003), 14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科斯家族也参与了和中情局密切相关的纽甘—汉德银行业务(详见下文论述),有些人认为,其中包括有关秘密运送马科斯家族黄金的谈判。Jonathan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New York: Norton, 1987), 182, 186-187, 190.
-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79-280, 400-401. 李姆·森的部分人脉关系,曼谷的苏克瑞·苏克瑞皮洛姆 (Sukree Sukreepirom) 和香港的吴思侯 (Ng Sikho, 中文为音译),而后被马思雨 (Ma Sikyu) 和马思春 (Ma Sikchun) 接手,第五章对此有所论述,香港警方认为,此二人曾在 1968 年与桑托·特莱菲肯特会面。(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00, 404, 410-411).
- ④ Sterling Seagrave, *The Marcos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326;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00. 在《黄金战士》(*Gold Warriors*) 一书中,斯戴林·西格勒夫和佩吉·西格勒夫提出,本格特—拿骚 (Nassau) —海利维尔这张关系网曾被用来将日本战争时期的黄金运送至巴哈马群岛,“这是蓄谋已久的洗钱计划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为毒品收益洗白”。Seagrave and Seagrave, *Gold Warriors*, 147, cf. 209.



问题在于，中情局是否从李姆·森在巴哈马群岛的收益中征税，正如同它允许其老挝客户欧安·莱提肯（Ouane Rattikone）从老挝出口的鸦片运输中征税那样。

我们无从得知海利维尔从国际多元化公司提取资金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政治回报，起因便是：“20世纪70年代初，内部预算局的特工就上报证据，通过电话录音发现，卡斯托银行运作的国际多元化公司向巴哈马群岛的首相林登·O. 平德林（Lynden O. Pindling）支付了10万美元，以将控股公司的[大巴哈马（Grand Bahama）]赌场经营许可证期限延长2年。”<sup>①</sup>

不论是赌场还是中情局，都对腐败有着病态迷恋，卡斯托银行只是银行和特工网络用来贿赂世界各地政府的一小部分。因此，卡斯托银行还曾与开曼群岛的一家ID公司（ID Corp）有过神秘交易。美国人片山诗（Shig Katayama），ID公司的唯一所有人，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为获得飞机订单，曾贿赂日本政客，而此人是关键牵线人之一。一位日本记者曾撰文指责片山诗，“他真正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要为美国的情报机构运输麻醉剂”。<sup>②</sup>

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利用其全球网络，通过特工，如阿德南·哈绍吉（Adnan Khashoggi）和儿玉誉士夫（Yoshio Kodama）的影响力，例如以贿赂形式，将非官方资金注入洛克希

① Penny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Garden City, NY: Anchor/Doubleday, 1984), 83.

② Marshall, *Drug Wars*, 54-55. Cf. 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Oversight Hearings into the Operations of the IRS (Operation Tradewinds, Project Haven, and Narcotics Traffickers Tax Program)*, *Hearing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909; Peter Dale Scott, *Coming to Jakarta: A Poem about Terror*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9), 99-103. 至于ID公司和国际多元化公司是否牵涉其中，目前尚属未知。





德公司的国际销售合同里。<sup>①</sup> 1965年5月，就在1965年9月反苏加诺政变爆发前的5个月，洛克希德公司和洛克威尔公司（Rockwell）给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贿赂目标不再是原来那两位支持苏加诺总统的人，而改成了另外两位中间人，他们支持反苏加诺的苏哈托将军。<sup>②</sup> 1965年的军事政变和大屠杀得到了中情局的支持，之后，苏哈托取代了苏加诺，其中一位中间人，穆罕默德·“鲍勃”·哈桑（Mohamed “Bob” Hasan）成了苏哈托家族两大头号金融同盟成员之一。<sup>③</sup>

而在当时，“国会已经同意将美国投入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资金（不同于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视为保密事项，并将总统对印度尼西亚援助决议的国会复议特别交给两位参议院委员以及众议院议长，他们均同时负责监管中情局”。因此，洛克希德公司的支付行为是通过两位中间人，此二人无视美国参议院公开

- 
- ① For the CIA's close involvement in Lockheed payoffs, see Anthony Sampson, *The Arms Bazaar* (New York: Viking, 1977), 137, 227-228, 238. 美国空军也牵扯其中，1983年10月24日第22期《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描述了空军—洛克希德公司联手在东南亚的一次行动，“1965~1972年加州诺顿空军基地执行代号‘黄油盖行动’”。
- ②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58 No. 2 (Summer 1985): 239-264, <http://www.namebase.org/scott.html>: “1976年参议院针对（洛克希德公司）这些支付行为进行调查，结果无意中发现，1965年5月，洛克希德公司的法律顾问提出反对意见，洛克希德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资金被转而投入一个新的合同项目和企业，该企业是由洛克希德公司在当地的长期代理商或者说中间人创建的。当时其内部备忘录说明，此举毫无理由，然而后来的一份备忘录却显示，据报道，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经济参赞提出，‘背后有政治因素’。如果此事当真，那么就意味着，1965年5月，就在军变5个月之前，洛克希德公司重新将资金投入新的政治领域，而且（正如其首席顾问助理所说）还面临着被指控未能履行前一项合同义务的风险”。
- ③ George Aditjondro,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5, 1998, C1. 另一位是林绍良（Liem Sioe Liong），据早些时候的消息，炮·斯里亚诺恩（Phao Sriyanon）时代的泰国银行家陈弼臣曾为这位教父级的人物提供首批资金。



表示的决议，参议院曾决定，全面停止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sup>①</sup>

## 海利维尔与黑帮暴徒的关联

如果说海利维尔和中情局的关联无人能及，那么他与黑帮暴徒之间的往来，尤其是与迈耶·郎斯基，也绝不逊色。帕莱茵银行是郎斯基将资金从巴哈马群岛的世界商业银行（Bank of World Commerce, BWC）转入美国的首选储蓄机构，由郎斯基的“先头兵”约翰·铂尔曼（John Pullman）在1961年设立。<sup>②</sup>世界商业银行的一位董事便是阿尔文·梅尔尼克（Alvin Malnik），他是郎斯基在迈阿密海岸的继承人；其中一位股东名叫艾德·莱文森（Ed Levinson），他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参议院同事鲍比·贝克（Bobby Baker）的商务伙伴，而在他以漏税罪名被捕审判之前，他的头衔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多数派秘书。<sup>③</sup>海利维尔和郎斯基的第二层关系是他作为迈阿密国家银行（Miami National Bank）这家小机构的法律顾问，迈耶·郎斯基利用该机构为自己的海外收益洗钱，并从拉斯维加斯的各赌场

① 参议院在1964年曾要求无条件终止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然而该命令却在悄无声息之中遭到废除，原因在于一个误导性的前提，即《外国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要求总统必须无所保留并同一时间向国会两院上报有关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计划”（U. S. Cong., Senate, Report No. 88 - 1925,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4*, 11）。实际上，该法案所要求总统上报“国会”的情况只是针对另外18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这件事情上，总统只需要上报两个参议院委员会和众议院议长（Foreign Assistance Act, Section, 620）。

② Tom J. Farer, *Transnational Crime in the Americas: An Inter-American Dialogue Book*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65.

③ Ed Reid and Ovid Demaris, *The Green Felt Jungl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64), 217 - 220. 莱文森曾为朗斯基在拉斯维加斯的沙滩酒店赌场打头阵。

谋利。<sup>①</sup>

世界商业银行虽然常被视为受郎斯基控制的黑帮银行，可是还实现了国际化，对此中情局极为关注。来自瑞士国际信用银行（International Credit Bank）的资金流入该组织，以色列枪支贩提波·罗森鲍姆（Tibor Rosenbaum）是这家银行的创立者，“也是欧洲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合资企业的银行家。不过同时，该银行也为以色列及其盟友购买并运送武器、提供资金，尤其是在非洲和中美洲地区，而且众所周知，它还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位于欧洲的埋单者”。<sup>②</sup>

根据艾伦·布洛克（Alan Block）的调查，铂尔曼的银行在巴哈马群岛另有一家分支，“和黎巴嫩贝鲁特的联行（Intra Bank）有着扑朔迷离的关联”。联行掌控着黎帮赌场（Casino de Liban），“赌博经营特许权受马赛尔·保尔·弗朗西茨（Marcel Paul Francis）的控制，他是法国头号海洛因商贩。一些调查员坚信，郎斯基和弗朗西茨是海洛因敲诈案的同伙，并且郎斯基及其助手都

①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7, 60-61, 198, 207, citing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42-44, 84.

② Naylor, *Hot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Debt*, 22. 仅凭一条尾注无法客观公正描述提波·罗森鲍姆。他是战争时代的犹太地下英雄，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匈牙利犹太人，1951年，他成了摩萨德的一名特工，并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联手设立了国际信用银行（International Credit Bank），以支持摩萨德的各项行动。借此身份，他和迈耶·朗斯基接触上了。据报道，罗森鲍姆还应友人荷兰王子本哈德之邀，加入了1001精英俱乐部。这个面向全球的俱乐部成员还包括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创建者阿贝迪·罗伯特·维斯克（Robert Vesco）、奥萨马·本·拉登的兄长萨勒姆·本·拉登（Salem bin Laden）以及中情局撑腰的扎伊尔独裁者及掠夺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Joël van der Reijden, “The 1001 Club,” *Socio Política*, September 18, 2008, [http://www.biblioteca.pleyades.net/sociopolitica/sociopol\\_1001club01.htm](http://www.biblioteca.pleyades.net/sociopolitica/sociopol_1001club01.htm)).



开设赌场”。<sup>①</sup>反过来，弗朗西茨和一位当地的黎巴嫩吗啡基地出口商萨米·埃尔·克瑞（Sami El Khoury）狼狈为奸，萨米又和西里岛的拉凯·卢西亚诺（Lucky Luciano）建立了“长期交易关系”，后者是郎斯基在纽约市的战前盟友，现在是活跃在欧洲的头号走私犯。<sup>②</sup>

萨米·埃尔·克瑞曾受到黎巴嫩警察甚至可能还有中情局的庇护。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阅读过1963年8月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的官方通信记录，其中说道：“萨米·埃尔·克瑞已从监狱释放，是否要利用他做线人。”<sup>③</sup>两位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联络员之一的丹尼斯·戴尔（Dennis Dayle）后来曾告诉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一直是国际头号走私犯之一的”埃尔·克瑞的确成了线人。<sup>④</sup>20世纪90年代，丹尼斯·戴尔从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中东首席调查员的职位退休，在一次反毒品大会上，他提到：“为缉毒局和相关机构供职30年，我的调查对象最后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在为中情局效力。”<sup>⑤</sup>

卡斯托银行则是另一台既为中情局也为黑帮服务的“双用洗钱

①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51. Intra Bank also had a Bahamian branch, Intra Bahamas Trust Ltd.

② Staff and editors of *Newsday*, *The Heroin Trai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137 (Francisi);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9 (Luciano). 埃尔·克瑞“利用卢西亚诺的资金收买了黎巴嫩的警察和海关人员”。Alexander Cockburn and Jeffrey St. Clair, *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 (London: Verso, 1998), 131.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541.

④ James Mill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70.

⑤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The CIA, Drugs, and Armies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x-xi. 戴尔在一次电话会议中提出了此番言论，马歇尔和笔者均参加了那次会议，并有会议录音。

机”。吉姆·卓林克霍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大大低估了黑帮在卡斯托银行的利益。该文章只是提及卡斯托银行一长串的账户持有人，“其中三位——莫里斯·达利茨（Morris Dalitz）、莫里斯·克莱曼（Morris Kleinman）和萨缪尔·A. 图克（Samuel A. Tucker），司法部在文件中将这三人视为有组织犯罪成员”。<sup>①</sup> [克莱曼和海利维尔均与名叫伯顿·坎特（Burton Kanter）的芝加哥律师共同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投资，后者和海利维尔联手组建了卡斯托银行。<sup>②</sup>]

艾伦·布洛克指出，实际上，如果必须迅速从巴哈马群岛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Mercantile Bank and Trust）调转资金，此时卡斯托银行便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机构是海利维尔的另一家银行，“与卡斯托银行类似……也是中情局资金渠道”<sup>③</sup> 并且即将破产。坎特“急不可耐地要求”转移资金，“因为在众多面临困境的账户里，其中一位持有人是莫里斯·克莱曼，自禁酒令开始实施起，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有组织犯罪头目。关于这件事，卡斯托银行的行长山姆·皮尔森（Sam Pierson）……就曾表示，必须这样做，如若不

① 卓林克霍尔：“IRS vs. CIA”。达利茨、克莱曼和图克均是克利夫兰市赌场上的老手，后来接管了拉斯维加斯沙漠酒店赌场业务。*Investig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 Interstate Commerce: Hearings before the (Kefauver) 特别委员会调查州际商业有组织犯罪前所举行的听证会*，美国参议院，第81次国会，第2环节，以及第82次国会，第1环节，第10部分。（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907-926。之后，布洛克和维夫进行了更为仔细的调查研究，从而提出，达利茨在卡斯托银行没有账户，不过朗斯基先前的帮手罗·罗斯克普夫（Lou Rothkopf）在该银行有账户，此人被列入黑帮名单。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45.

②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89.

③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citing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3, 1977, February 17, 1981; see also *Parapolitics*, Spring 1981, 88: “与卡斯托银行类似，商业银行是中情局资金渠道，普华事务所的会计们‘依照命令’，要确保‘外人’无法查阅记账簿。据中情局消息，如果他们发觉异样，‘必须把消息透露给情报组织’。”



然，‘坎特就要葬身芝加哥河’”。<sup>①</sup>

坎特似乎已经对如何解决黑帮财富合法化的税收问题相当老练。除了和海利维尔共同组建卡斯托银行，他“还在加州积极走动”，投身拉·科斯塔（La Costa）房地产开发，该项目还牵扯到克利夫兰市商业财团成员摩尔·达利茨（Moe Dlitz），“他是好几家赌场、沙漠酒店（Desert Inn）和星尘酒店（Stardust Hotel）的共同所有人”。<sup>②</sup> 布洛克和坎特联手，拉·科斯塔得以从卡车司机联盟中部州退休基金会（Teamsters Central States Pension Fund）获得更多的巨额资金：“坎特之所以能接触到退休基金会，可能是得益于他的朋友兼同事艾伦·多尔夫曼（Allan Dorfman）。多尔夫曼是至为重要的一位基金官员和诈骗高手，1985年，为避免有关黑帮投资的事情外泄，他曾遭人谋杀。”<sup>③</sup>

## 中情局、黑帮势力和灰色操作

海利维尔绝非是中情局与黑手党的唯一联系，也绝非是最上层的一个。1960年刺杀卡斯特罗的阴谋就是中情局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Security）通过一位中间人罗伯特·马休（Robert Maheu）发起的，此人在安全办公室另一位员工的帮助下创立了独立企业。正是通过罗伯特·马休才将中情局暗杀计划传递给了约翰·罗塞利（John Rosselli）和山姆·吉安卡纳（Sam Giancana），两人又将计划

①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40; cf.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88-191, 克莱曼“也许是”卡斯托银行“暗地里的持有人”。

②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63;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1989 (“part Owner”).

③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Final Report,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March 1978), 173;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64.



传给了桑托·特莱菲肯特 (Santo Trafficante)。<sup>①</sup>

和黑帮建立更为持续关系的，要数由中情局反情报科 (Counter Intelligence, CI) 首席特工詹姆斯·阿格勒顿 (James Angleton)。他也利用了中间人，名叫马里奥·布罗德 (Mario Brod) 的纽约律师，根据中情局的备忘录，1952~1971年，他曾在纽约市担任反情报科特工。<sup>②</sup> 布罗德在纽约接触过的其中一位机密反情报科代理，名叫杰伊·拉佛斯通 (Jay Lovestone)，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组织国际事务主任 (AFL-CIO)，曾为马赛 (Marseille) 的暴力团伙提供资金，他们是科西嘉岛 (Cosican) 的毒品走私同谋，也是郎斯基—卢西亚诺全球毒品网络的一部分。<sup>③</sup>

根据道格拉斯·瓦伦丁 (Doug Valentine) 的分析，拉佛斯通的助理欧文·布朗 (Irving Brown) 被牵扯进欧洲的毒品走私案，与此同时，他利用中情局的资金在马赛试图“和皮埃尔·费利—皮桑尼 (Pierre Ferri-Pisani) 共同建立一个‘兼容性的左翼’公会。

① 1967年中情局针对中情局—黑手党暗杀卡斯特罗计划的主管报告 15-16, NARA #151993.08.11.16: 44; 08: 750007, 3-4. Cf.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II: The New Revelations in U. S. Government Files, 1994-1995*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7), 59-63.

② 1975年9月5日反情报科首席乔治·卡拉里斯 (George Kalaris) 发给行动理事会的备忘录, NARA#104-1010-10003。美国陆军情报前队长马里奥·布罗德，要想用一条脚注就定义此人非常困难，他曾和安格勒顿在罗马有联系。据理查德·马赫尼 (Richard Mahoney) 所言，1960年，约翰·F. 肯尼迪参议院参加总统竞选，其父亲选中约翰·罗塞利“帮忙替他和黑手党领导牵线搭桥。不过罗塞利所能做的最大限度，也仅是让芝加哥服装会 (Chicago Outfit) 和律师马里奥·布罗德碰面，这非常奇异”。Richard D. Mahoney, *Sons and Brothers: The Days of Jack and Bobby Kennedy* (New York: Arcade, 1999), 43-44.

③ Tom Mangold, *Cold Warrior: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s Master Spy Hunter* (New York: Touchstone/Simon and Schuster, 1991), 314-315. 杰伊·拉佛斯通从原来的共产党领袖，后来调转枪头变成与安格勒顿联手反共，他的这段离奇人生请参阅泰德·摩根 (Ted Morgan), *A Covert Life: Jay Lovestone, Communist, Anti-Communist, and Spym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费利—皮桑尼是一个和马赛犯罪头目安东尼·古埃利尼 (Antoine Guerini) 相互勾结的毒品走私贩, 他替布朗和中情局雇用了一群打手, 镇压力图反抗、信奉共产主义的码头工人”。<sup>①</sup>

曾经的共产主义者拉弗斯通后来反转成了反共产主义的军事分子, 他的领导是国际女装工人联盟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的大卫·杜宾斯基 (David Dubinsky), 拉弗斯通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抗设立更为残暴的产联联盟运动, 尤其是沃尔特·鲁瑟 (Walter Reuther) 和维克托·鲁瑟 (Victor Reuther) 设立的汽车工人联合会 (United Auto Workers, UAW)。<sup>②</sup> 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抗局面正如拉弗斯通所愿, 后来恶化成了拳脚相向, 还雇用了约翰·迪奥卡迪 (John Dioguardi) 担任纽约地区主管, 他是鲁查斯 (Lucchese) 黑手党家族的成员。<sup>③</sup> 后来, 美国律师保罗·威廉斯 (Paul Williams) 指控迪奥卡迪刺瞎公会记者维克多·里赛尔 (Victor Riesel), 之后还杀害了朝里赛尔脸上泼硫酸的男子。<sup>④</sup>

阿格勒顿和黑帮的中间人布罗德接触过的另一位机密代理是俄国叛徒阿纳托利·戈里钦 (Anatoliy Golitsyn), 阿格勒顿在长期搜寻中情局高层内奸时, 将他从中情局常规官方程序中单独拿出。阿格勒顿 [根据其传记作者汤姆·曼格德 (Tom Mangold) 的记述] “正在悄悄创建一个翻版中情局”, 有自身的交流体系、档案和财政, 利用拉弗斯通和戈里钦提供的极为模棱两可的情报。这个中情

① Douglas Valentine, “The French Connection Revisited: The CIA, Irving Brown, and Drug Smuggling as Political Warfare,” *Covert Action*, <http://www.covertaction.org/content/view/99/75>.

② Paul Buhle, “Lovestone's Thin Red Line,” *The Nation*, May 6, 1999, <http://www.thenation.com/doc/19990524/buhle>.

③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ppendix to Hearings, Volume 9 (March 1978), 47.

④ Ed Reid, *The Grim Reapers: The Anatomy of Organized Crime in America* (New York: Bantam, 1969), 174.





局翻版的核心是反情报科的“内部密室：最高机密的专门调查小组（Special Investigation Group, CI/SIG）”，那里收集的文件显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很可能是克格勃（KGB）内奸。<sup>①</sup>

布罗德接触过的第三位机密代理名叫赫伯特·伊特金（Herbert Itkin），他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双面特工，一边为黑帮集团做事，一边为中情局和 FBI 效力。不过和伊特金相似，布罗德本人也和“黑手党有来往”。<sup>②</sup> 1970 年，司法部和 FBI 利用伊特金起诉一群暴徒和哈瓦那（Havana）有勾结，包括詹姆斯·普卢梅里（James Plumeri）、艾德·兰兹厄力（Ed Lanzieri）和山姆·曼纳瑞诺（Sam Mannarino），罪名是协同卡车司机联盟非法收取回扣。美方律师针对马里奥·布罗德出庭协助国防部门一事电话咨询了中情局法律顾问。<sup>③</sup>

依照法庭记录，“国防部门计划传召马里奥·布罗德，他被认为是伊特金与中情局之间的中间人。据传，布罗德将说明，自己发誓绝不相信伊特金，而且伊特金所说言辞不足为信”。<sup>④</sup> 中情局法律顾问与美方律师的做法相同，要阻止布罗德出庭做证。其办公室文件记录了布罗德对此行为的解释：“其中一位名为兰兹厄力 [原文如此；也就是爱德华·“强者”·兰兹厄力（Edward “the Buff” Lanzieri）] 的被告人是布罗德在黑手党唯一的联络人，一旦他陷入

① Mangold, *Cold Warrior*, 329–330, cf. 305, 337. 其他作者曾写道，杜勒斯和安格勒顿维系着一个“二号局”或者是“局中局”；see, e.g., Mark Aarons and John Loftus, *Unholy Tri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260.

② Mangold, *Cold Warrior*, 105.

③ Memo of November 4, 1970, from John K. Greaney, Assistant General Counsel, CIA, NARA #104–10106–10374.

④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Leonard Russo, et al., Defendants – Appellants*.



险境，一定会提醒布罗德。”<sup>①</sup>

但是，布罗德的行为恐怕绝非出自保护自身利益这么简单，因为事实说明，这桩回扣案中的一些黑手党被告和中情局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络，即使是暗地接头。根据丹·莫戴（Dan Moldea）的调查，其中两位被告，约翰·拉·罗卡（John La Rocca）和加布利亚·曼纳瑞诺（Gabriel Mannarino）曾和霍法（Hoffa）一起参与古巴军火走私活动。他认为霍法说服了拉·罗卡和曼纳瑞诺，他们联合另外两位回扣案被告 [塞尔瓦托·格莱尼洛（Salvatore Granello）和詹姆斯·“吉米·多伊勒”·普卢梅里（James “Jimmy Doyle” Plumeri)]，“与中情局合作”。<sup>②</sup> 不仅如此，在这场由伊特金做证人、由布罗德为国防部门出庭干预的回扣案审判中，所有被告都是卡车司机联盟（以及早期的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内设的有名无实的成员，都由普卢梅里的外甥约翰·迪奥卡迪掌控。

阿格勒顿的“混乱计划”被走漏消息，导致阿格勒顿被罢免，1975年6月，《时代》杂志指责中情局利用布罗德在黑手党内部的联络人普卢梅里和格莱尼洛“对古巴进行间谍活动，为1961年的猪湾入侵做筹备”。<sup>③</sup>（笔者并未在中情局公开的文件中找到能够支撑《时代》这一论述的证据。）

和布罗德相同，阿格勒顿本人也被指控和黑手党有联系，并且至少一次阻碍中情局另一部门调查郎斯基在拉斯维加斯的非法收入和银行信息。罗伯特·肯尼迪主导的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

① Memo of November 4, 1970, from John K. Greaney, Assistant General Counsel, CIA, NARA #104-10106-10374. 约翰·拉·罗卡和加布利亚·曼纳瑞诺在1971年被判无罪，“其中一位关键目击者居然是中情局地方办公室的头目”。Robert Sam Anson, *They've Killed the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1975), 296. 安森告诉笔者，这位目击证人就是布罗德，不过笔者并未发现布罗德证词的法庭记录。

② Dan E. Moldea, *The Hoffa Wars: Teamsters, Rebels, Politicians, and the Mob* (New York: Paddington Press, 1978), 130-131.

③ *Time*, June 9, 1975, 14.



高级官员约翰·怀顿 (John Whitten) 曾要求中情局西部分局 (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 墨西哥/巴拿马办公室的前任主管调查巴拿马的几个编号银行账户, 因为拉斯维加斯的一些赌徒正利用这些账户走私现金, 这些现金“超过了每日最高入账”。怀顿以自己在中情局的假名“约翰·斯凯索” (John Scelso) 向丘奇委员会 (Church Committee) 证实了阿格勒顿的行为。

当时, 我们所有条件统统具备……我心想这真是绝妙的主意。结果这突然被阿格勒顿先生获悉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向他说明, 他说道: “嗯, 我们不能和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这是局 (FBI) 里的事。”非常突兀的, 谈话结束了。我们被叫停。我把事情告诉给了 J. C. 金 (J. C. King) 上校, 当时他担任西部分局主管, J. C. 金答复说: “……嗯, 你知道, 阿格勒顿在黑手党有这些联络人, 他绝不会破坏这些联络。”于是我说自己并不了解这些事情。他回答说: “是的, 肯定和古巴有关。”<sup>①</sup>

阿格勒顿要保住朗斯基的高额收益, 这和他在中情局的第二职责不无关系: 他还负责以色列办公室。阿格勒顿与摩萨德的来往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 他当时负责协调战略情报局和犹太地下组织在意大利的活动, 地方领导是泰迪·克莱克 (Teddy Kollek, 后来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市市长)。<sup>②</sup>

<sup>①</sup> Church Committee, Testimony of John Scelso, May 7, 1976, 41 - 42, NARA # 157 - 10014 - 10083, 45 - 46. 阿格勒顿的反应说明, 他也许相信了汉克·麦斯克 (Hank Messick) 等人而后提出的指控: 朗斯基得到局里的保护。Hank Messick, *John Edgar Hoover*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2), 229 - 231.

<sup>②</sup> William R. Corson, Susan B. Trento, and Joseph J. Trento, *Widows* (New York: Crown, 1979), 71.



## 阿格勒顿的“翻版中情局”及其遗物

不仅如此，1963年，阿格勒顿“翻版中情局”的“内部密室”——反情报科/专门调查小组（CI/SIG），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自1960年12月对外开放以来，关于“李·亨利·奥斯瓦德”[Lee Henry Oswald，此人全球共知的名字是李·哈维·奥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在所谓201号或他个人文档中，包含了错误和造假信息。1963年10月，201号档案中的两条信息再次被伪造，以此让奥斯瓦德成为一个月之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害事件中值得怀疑的“指定疑犯”。<sup>①</sup>

奥斯瓦德的201号档案造假恐怕是源自一次合法反情报行动。笔者曾指出，蓄意造假的信息是所谓标记卡片或钋餐测试的一部分，以此来检测是否有敏感信息泄露，以及泄露途径。这是惯常手法，也是反情报科/专门调查小组的责任，201号档案也属于它们的职责范围。<sup>②</sup>

然而我们看到，在1963年10月，有迹象表明，中情局有关奥斯瓦德的信息被人操纵，目的在于让其成为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害案件的指定嫌疑犯。1963年10月的一份中情局发给FBI的电报（由反情报科/专门调查小组一位官员起草）避开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据报道，奥斯瓦德在墨西哥城与苏联副领事夫拉耶·科斯特克夫（Valeriy Kostikov）会面，中情局官员们坚信，他肯定是克格勃官员。<sup>③</sup>故意对此避而不谈确保了奥斯瓦德在会面之后，不会被FBI监视，而这种监视将会减少他成为指定疑犯

① For details se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387; Scott, *Deep Politics II*, 30-33.

② See Scott, *Deep Politics II*, 17-18, 92; see also Peter Dale Scott, "Oswald and the Hunt for Popov's Mole," *The Fourth Decade* 3, No. 3 (March 1996): 3, <http://www.maryferrell.org/mffweb/archive/viewer/showDoc.do?absPageId=519798>.

③ Scott, *Deep Politics II*, 30-33.



的可能性，因为在肯尼迪总统达拉斯游行路线中，他出现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方位。笔者之前曾论述，2000~2001年，中情局也曾刻意向FBI隐瞒关于“9·11”事件中两位被指控的劫机者的信息 [纳瓦茨·哈兹密 (Nawaz al-Hazmi) 和哈立德·阿米达 (Khalid al-Mihdhar)]，同样是通过避开FBI的监视，从而让两人成了指定疑犯。<sup>①</sup>

1974年12月，水门事件之后，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 (William Colby) 要求阿格勒顿从中情局辞职，当时公众获悉阿格勒顿参与了中情局也许是超越法律界限的“混乱计划”一事 (在美国对美国人进行监视)。这一事件宣告阿格勒顿在反情报科的“翻版中情局”彻底落马。大概一年之后，中情局和布罗德黑帮组织相互勾结的内幕暴露，人们进一步得知中情局和古巴流放的恐怖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全球毒品网络成员的复杂关联。

然而在1976年，在所谓的“万圣节大屠杀” (Halloween massacre) 中 (由福特总统所执掌的白宫政府决策)，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和迪克·切尼 (Dick Cheney) 让乔治·H. W. 布什取代威廉·科尔比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拉姆斯菲尔德则出任国防部长职位，自此，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sup>②</sup> 如果说1975年，即水门事件之后一年，有关中情局与古巴流放之徒和黑帮分子共同参与刺杀事件的消息铺天盖地被曝光，那么在1976年，和黑帮分子联手古巴流放之徒，以及智利情报机构DINA，两者均涉及毒品走私，他们执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主义刺杀行动，均得到中情局的保驾护航。其中就包括炸毁了一架古巴民用飞

---

① See discussion in Peter Dale Scott, "The JFK Assassination and 9/11: The Designated Suspects in Both Cases," *Global Research*, July 5, 2008,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9511>.

②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0-54.



机，在华盛顿暗杀智利前外交部部长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sup>①</sup>

但是，那时的中情局不再是 DINA 所支持的国际“飞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的唯一或者主要美方牵线人了，该行动执行了无数次暗杀事件。美国驻巴拉圭大使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对这类谋杀事件极度反感，里根当选之后，这位美国国务院专业官员丢了饭碗，他从巴拉圭武装部队司令官那里得知“来自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情报官员使用了‘美国（军队）电信网络内部的一套加密系统’，涵盖了整个拉美地区，以‘协调情报信息’”。<sup>②</sup>

1976 年，亨利·基辛格在其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一年里，在与这场右翼暴力浪潮的角逐中，他完美地发挥着模棱两可的角色。基辛格在圣地亚哥面向智利公众发表有关该国违反人权的演讲（“人权现状……曾经并且未来还会破坏我们与智利的关系”）之前，他曾私下宽慰皮诺切特（Pinochet），自己受美国政界所迫，不得已做此言论，而实际上，他的首要关切是美国国会计划切断对智利的援助。<sup>③</sup>

① J. Patrice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Operation Condor and Covert War in Latin Americ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139 - 175; John Dinges, *The Condor Years: How Pinochet and His Allies Brought Terrorism to Three Continents* (New York: New Press, 2004), 190 - 198, 248 - 250. Peter Kornbluh, *T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②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95, citing White Cable of October 13, 1978, <http://foia.state.gov/documents/State/Chile3/000058FD.pdf> (a URL inactive in 2008); see also Diana Jean Schemo, “New Files Tie U. S. to Deaths of Latin Leftists in 1970s,”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1.

③ “这是我最起码应该完成的，不能让美国做出法律限制。这番话不是要针对智利。……我个人的评价是，你们是全球左翼组织的受害者，你们最大的罪孽是推翻了一个即将走向共产主义道路政府。” Dinges, *The Condor Years*, 159 - 162, citing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75 (July 5, 1976): 4.



美国于1976年对恐怖分子的庇护甚至支持，已经延续到了今天。古巴空军轰炸总设计师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Luis Posada Carriles）“因为古巴轰炸罪名而被关入委内瑞拉监狱”，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他代表中情局在中美地区再度出山，帮助协调伊朗门事件的网络供应”。<sup>①</sup>2000年，波萨达因试图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巴拿马再度被捕审判，这次是和吉莱默·诺福（Guillermo Novo），后者曾参与勒特里尔谋杀案。二人很快就被即将卸任的巴拿马总统赦免。<sup>②</sup>2008年5月，波萨达被指控非法入境美国，可在得克萨斯州却被一位联邦法官无罪释放，后来在迈阿密，500名美籍古巴人热烈欢迎他，欢迎会上座无虚席。<sup>③</sup>

中情局局长布什也给自己的朋友西欧多尔·沙克利（Theodore Shackley）升了职，他数年来一直在处理迈阿密地区那些与中情局政见相左的古巴流亡分子。根据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的论述，“1976年末，布什还庇护了很多执迷不悟或者行事欠妥的中情局特工——曾参与智利谋杀案、越南凤凰项目（Phoenix Program）和国内违规监视的各种老部员——让他们免受福特总统司法部的制裁”。<sup>④</sup>

然而，卡特总统和中情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Stansfield Turner）上台之后，中情局再次沿袭了水门事件后的秘密做法。主要是因为有关沙克利的朋友埃德温·威尔逊（Edwin Wilson）的消息大量外泄，沙克利1978年离开中情局，其影响开始减弱。<sup>⑤</sup>

①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159.

② McSherry, *Predatory States*, 161.

③ *Los Angeles Times*, May 7, 2008,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8/may/07/nation/na-posada7>.

④ Kevin Phillips, *American Dynasty: Aristocracy, Fortu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it in the House of Bush* (New York: Viking, 2004), 280.

⑤ Joseph J.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Forum/Prima/Random House, 2001), 436-437. 1978年，特伦托本人曾接触了一起泄露案，这关系到威尔逊和沙克利。



但是，威廉·科森（William Corson）和约瑟夫·特伦托（Joseph Trento）却认为，退休不久的沙克利让中情局保持了那个变相的、更为激进的翻版，我们之前就了解，他是政策协调处这个临时部门的特工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的门徒。约瑟夫·特伦托撰文写道，伊朗狩猎俱乐部（Safari Club，请见后文论述）的领袖和美国驻伊朗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都曾支持沙克利。中情局驻伊朗常任主管“多次抱怨，赫尔姆斯似乎在大使馆之外有独立门户的情报机构”，而曾在中情局官员西欧多尔·沙克利麾下供职的中情局老员工“在美国官方情报机构内部，组建了一批私人化的影子情报组织”。<sup>①</sup>

## 海利维尔、卡斯托银行和上层社会

我们尚未论及卡斯托银行遍布全球的世界网络。最富裕的储户当属“芝加哥普利茨克（Pritzker）家族富可敌国的成员，也是坎特公司（Kanter firm）的客户”。<sup>②</sup> 布洛克发现，普利茨克家族庞大的产业包括君悦（Hyatt）连锁酒店，该家族还从卡车司机联盟退休基金会申请到一笔贷款，用于内华达州的一个酒店—赌场投资项目，“吉米·霍法（Jimmy Hoffa）和艾伦·多尔夫曼私下为普利茨克家族的贷款张罗跑腿”。<sup>③</sup>

①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395 (Helms), 344 (cadre). 此时的沙克利正在和秘密的国际自由基金会（International Freedom Foundation）合作，该机构的创始人是游说专家杰克·阿布拉姆夫（Jack Abramoff）。David Teacher, *Rogue Agents: The Cercle Pinay Complex, 1951 - 1991*, available at <http://www.isgeu>.

②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91.

③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92: “普利茨克家族与卡车司机联盟之间的主要关系人是斯坦福·克林顿（Stanford Clinton）”，这位律师是“芝加哥主要黑帮暴徒的代表”，在卡斯托银行开有账户。





坎特和卡斯托银行还曾计划与上层社会的其他成员共谋发展，例如亨利·福特二世及其夫人克里斯汀娜（Christina）。<sup>①</sup> 卡斯托银行的前身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曾吸引两大船舶巨头的投资：亿万富翁丹尼尔·K. 路德维格（Daniel K. Ludwig）以及富可敌国的挪威造船商英奇·戈登·莫斯沃尔德（Inge Gordon Mosvold），后者也许是在为路德维格做掩护。<sup>②</sup>

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和卡斯托银行都和海利维尔在巴哈马群岛的另一家银行来往甚密，也就是最后的核保银行（Underwriters Bank, Limited）。近95%的股权均掌握在美国保险商巨头美国国际核保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 Corp.）手上，其前身原是战略情报局特工C. V. 斯塔尔（C. V. Starr）所执掌的保险帝国，今天已经是大型跨国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一部分了。布洛克的报告非常正确，美国国际核保公司（今天的AIG）“这家保险业巨头，被人质疑恐怕与东南亚地区的中情局分支有关联”，并且“被认定，曾经参与东南亚的情报工作”。<sup>③</sup>

第三章曾述及，托马斯·“软木塞托米”·科克伦（Thomas “Tommy the Cork” Corcoran）在华盛顿代表着C. V. 斯塔尔集团，二战之后，该集团由科克伦前任法律搭档威廉·S. 杨曼（William S. Youngman）执掌。因此，1940年，它和所谓的陈纳德（Chennault）团体（亦可称为陈纳德的“华盛顿中队”）在罗斯福的首肯下结为盟友，这个力量强大的秘密组织为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在中国的飞虎队提供了设备、人力和资金支持。<sup>④</sup>

自20世纪30年代起，科克伦就一直是华盛顿的关键人物，他领导了“罗斯福时期的非官方情报工作和国际间谍行动，很久之后

①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95.

②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71, cf. 32-33.

③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72-173, 182.

④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46-47, 60, 64-68, 263, 278-279.



才诞生了战略情报局”。<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财富》杂志说他维持了“华盛顿最完美的情报工作”,他的游说活动和中情局极具影响力的地下活动密切相关。

他的绝大多数(顾客)都是关切国际利益的公司,而他是该领域的最佳选择。这些公司包括联合果品有限公司(United Fruit Co.)、美国国际核保公司(部分影响到C. V. 斯塔尔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Inc.)。试举一例,1951年末,科克伦加班加点忙碌于情报工作,一定要跟上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对此事的一举一动将指引他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才能保住自己的顾客——联合果品有限公司不至于被赶出危地马拉。<sup>②</sup>

海利维尔和科克伦在延长陈纳德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两人说服政策协调处的弗兰克·威斯纳买下陈纳德战后的航空公司——民用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并重新注入资金[后来,该公司成为中情局的产业——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威廉·伯雷也在这项重大决策中发挥了作用,他在二战时期陈纳德所谓的“华盛顿中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sup>③</sup> 民用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利维尔的另一家公司——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一起,为国民党在缅甸毒品走私的军队提供了主要运输设施。<sup>④</sup>

① 厄尼斯特·库尼欧(Ernest Cuneo)是战略情报局官员,同时也是科克伦的朋友, quoted in David McKean, *Peddling Influence: Thomas "Tommy the Cork" Corcor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Lobbying* (Hanover, NH: Steerforth, 2004), 286。

② “Lawyers and Lobbyists.” *Fortune*, February 1952, 142, quoted in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47.

③ Joseph J.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9.

④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78 - 279.



## 海利维尔及其政治影响

海利维尔和科克伦创立的法律公司——科克伦 & 罗维法律公司 (Corcoran & Rowe)，也曾和威廉·多诺万联手，使用泰国资金，影响国会。海利维尔本人就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关键组织者，1952年，曾帮助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 赢得该州的选举，由此让共和党在美国南部的影响力扶摇直上。[海利维尔后来与尼克松亲信比比·瑞波佐 (Bebe Rebozo) 关系密切。①]

而科克伦和罗维却是偏向民主党，后者和即将上任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 来往甚密。20世纪40年代，科克伦曾负责打理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的银行账户和政治交易，宋子文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中国黄金转入其在加利福尼亚的账户（也许还有来自毒品交易的收入），这让他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②

科克伦和宋子文联手，成功地为国民党和一个私人的美国志愿队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游说到了一个租赁项目，他们为一家私营企业从武装部队里招募飞行员，该企业是由科克伦的朋友威廉·伯雷所领导。事实上，招募的飞行员主要被派去中国作战，这是陈纳德为蒋介石政府提供的非常规空军的一部分。③ “实际上，科克伦正私下发起一次地下战争，中国国防运输公司 (China Defense Supplies) 作为私营企业，将原本计划送入中国的部分作战物资，运给了美国志愿队。”④

①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70.

② “1934年，财政部专员尼克尔森 (Nicholson) 上交了一份报告，暗示蒋介石或者宋子文在北美从事海洛因交易。”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37.

③ McKean, *Peddling Influence*, 140-143;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64-65.

④ McKean, *Peddling Influence*, 149-150.



战争结束后，宋子文、科克伦和伯雷成了支持国民党“中华游说会”（China Lobby）的坚定后盾。<sup>①</sup>要是哪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倒霉透顶进了宋子文的“黑皮书”，就会遭到 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以及后来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thy）的清理和迫害。<sup>②</sup>

1954 年，随着麦卡锡势力的衰退，宋子文支持的中华游说会也日薄西山。这一时期，正如第四章所述，曾为陈纳德支持国民党行动合作过的科克伦和多诺万再度联手，确保亚洲资金源源不断流入，以左右国会。新的源头是泰国独裁者炮·斯里亚诺恩（Phao Sriyanon），他是海利维尔一手打造的国民党毒品网络、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主要受益人。<sup>③</sup>（他在瑞士流亡时去世，据说，当时的他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sup>④</sup>

## 海利维尔、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政治腐败

海利维尔还为郎斯基组织处理了房地产投资。

海利维尔的手段层出不穷，在因此而获益的众多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公司之中，有一家名为大众发展公司（Gener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由路易斯·查斯勒（Louis Chesler）控制，这位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开发商是郎斯基和“火力麦克”科波拉的搭档，后者也是郎斯基的密友。查斯勒还是华莱士·格罗夫斯的同伙……查

①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7, 153;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9.

②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Arthur R. Ringwalt, June 5, 1974, Truman Library, <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ringwalt.htm>.

③ 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214-215, cf. 206.

④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 Mai: Silksworm Books, 1999), 192;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51, 187, 192-193.



勒斯和格罗夫斯二人，联合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办了赌场，中介是大巴哈马公司（Grand Bahamian Company），其顾问则是海利维尔、梅罗斯（Melrose）和德沃夫（DeWolf）的法律公司。<sup>①</sup>

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由詹姆斯·克罗斯比（James Crosby）所执掌的玛丽·卡特涂料公司，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是巴哈马“天堂岛”旅游度假区的主要所有者，该公司之前一直无法获得许可证，直到1966年，华莱士·格罗夫斯被邀请成为合作伙伴。关于所有权的易主，当时的美国司法部官员罗伯特·佩洛金（Robert Peloquin）写道，“此时的气氛有助于郎斯基牟取利益”。数年之后，“新泽西禁毒执法办公室（Gaming Enforcement Division）的律师拒绝向克罗斯比及其公司（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赌博经营许可证，理由是‘与不良人士及组织有关联’，特别提到了有关天堂岛的记录”。<sup>②</sup>

与海利维尔和格罗夫斯相似，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情局和黑帮势力全球网络的一部分。中情局1976年的一份备忘录提到了《迈耶·郎斯基安全文件》，“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Security, OS）第591 722号文件的主题是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该文件表明，在1972年和1973年，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曾引起易装和商业办公室（Cover and Commercial Staff）、行动理事会（Operations Directorate）的关注”。<sup>③</sup>

中情局的这份备忘录明确指出，1969年由艾德·莱德（Ed Reid）撰写的《恐怖的收割者》（*Grim Reapers*）一书揭露了该公司与华莱士·格罗夫斯的关联，通过赌场经理埃迪·契里尼（Eddie

① Lemoux, *In Banks We Trust*, 82-83.

② Anthony Summers with Robbyn Swann, *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Viking, 2000), 242.

③ 1976年8月18日备忘录，送交主管，安全分析小组（Security Analysis Group）；部分内容在迈耶·朗斯基6页安全文档中也有所透露，1993.08.13.17: 42; 12: 560059。



Cellini), 进一步发现了中情局备忘录所说的“有组织犯罪头目迈耶·郎斯基的赌博活动”。<sup>①</sup> 换言之, 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情局和埃迪·契里尼之间扮演着保险丝的角色, 这和提波·罗森鲍姆的国际信用银行在摩萨德与迈耶·郎斯基之间发挥的作用如出一辙。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1960年, 中情局猪湾事件的总指挥托尼·瓦罗纳 (Tony Varona) 也在中情局和契里尼之间扮演着类似的保险丝角色。

1972年, 中情局盯上了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年, 迈耶·郎斯基和迪诺·契里尼 (Dino Cellini, 他是埃迪的兄弟) 在迈阿密被指控。其中一项罪名是, “1968年, 郎斯基至少对前往天堂岛赌场的旅游活动 (这是赌场经营利润丰厚的环节) 施加了一些影响”。<sup>②</sup> 笔者将在下文说明, 在这两年里, 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和郎斯基面临的指控让中情局高度警惕, 因为这是水门事件爆发前, 尼克松和中情局之战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

中情局也许已经留意到这些指控, 其实在1972年就已现出端倪, 天堂岛赌场资金被一位赌场员工秘密转移给了尼克松及其友人比比·瑞波佐。此人就是西蒙·阿特尔 [Seymour (Sy) Alter], 他既是郎斯基和其搭档埃迪·契里尼的同伙, 又是“尼克松和比比·瑞波佐的朋友, 他们早在1962年就结识了”。<sup>③</sup> 这些资金的源头是天堂岛桥梁公司 (Paradise Bridge Company), 该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归本格特国际公司 (Benguet International), 后者的代表便是保罗·

① Memo of August 18, 1976, to Chief, Security Analysis Group, NARA #104 - 10059 - 10013; Reid, *The Grim Reapers*, 119 - 123.

② Jeff Gerth, “Richard M. Nixon and Organized Crime,” in *Government by Gun - play: Assassination Conspiracy Theories from Dallas to Today*, ed. Sid Blumenthal and Harvey Yazji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 138.

③ Summers, *The Arrogance of Power*, 242, 252; Jim Hougan, *Spooks: The Haunting of America—The Private Use of Secret Agent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8), 398. Cf. Denny Walsh,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74; Gerth, “Richard M. Nixon and Organized Crime,” 137 - 139.



海利维尔。<sup>①</sup>也许尼克松在天堂岛桥梁公司有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信风计划”披露，一位名叫“理查德·M. 尼克松”（没有其他标注）的人，在海利维尔的卡斯托银行设有账户。<sup>②</sup>

## 中情局、埃迪·契里尼、爱德华·K. 莫斯 (Edward K. Moss) 和中情局 - 黑手党的阴谋

不过中情局与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相互勾结还藏有更多的秘密。早在1967年，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赌场（当时在天堂岛）就曾雇用埃迪·契里尼担任赌场经理，此人先前曾负责管理郎斯基在哈瓦那国际酒店（Havano's Hotel International）的赌场。<sup>③</sup>正是在1967年这一年，中情局总督察在其有关中情局计划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报告中写道，埃迪·契里尼和比他还要臭名远播的兄弟迪诺被认定和托尼·瓦罗纳（中情局猪湾行动的先遣队队员）有接触。而且据报道，两人曾向瓦罗纳提供了大笔资金以开展针对卡斯特罗的行动，并知道二人将在“古巴未来发展中”享受特殊待遇。<sup>④</sup>

总督察之所以撰写这份报告，主要是为了应对由于1967年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提出的惊人指控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指控提出，也许是因为卡斯特罗的刺杀阴谋，结果“事与愿违”引火上身，这才是约翰·F. 肯尼迪遇害的原因。<sup>⑤</sup>杰克·安德森的最终消息源头是约翰·罗塞利，这位黑帮成员担心自己协助中情局刺杀阴谋的过往，无法保护他免受即将来临的指控，甚至会被驱逐出境。

事态发展到最后，罗塞利在1969年因赌博诈骗被起诉。1968

①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94 - 96; Summers, *The Arrogance of Power*, 244 - 245.

② Summers, *The Arrogance of Power*, 244 - 245, 253 - 254.

③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46, 101.

④ Scott, *Deep Politics II*, 60.

⑤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3, 1967, 41, quoted in Scott, *Deep Politics II*, 67.



年，特莱菲肯特在前往香港的路上（详见第五章）见了罗塞利，之后，罗塞利被指控非法在美国定居，并要求驱逐出境至意大利。似乎，罗塞利没有享受到中情局的免除法律追究的特权，也没有不了了之。不过事实是，罗塞利从未被流放到意大利，相反，1976年他在佛罗里达州被人谋杀，而3个月前，他曾向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证实约翰·F. 肯尼迪刺杀案。<sup>①</sup>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1968年1月，特莱菲肯特和罗塞利的会面是否牵涉到具体的毒品交易，是否有关必须将毒品供应从土耳其转到亚洲，是否有关他们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或者是否是所有这些问题。

艾伦·A. 布洛克研究员也提到，1967年，天堂岛刚刚从自身的有组织犯罪丑闻中脱身，在这个时候雇用埃迪·契里尼是极其失策之举。<sup>②</sup> 不过，由于杰克·安德森的专栏文章，中情局陷入了更严重的有组织犯罪丑闻，《总督察有关中情局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阴谋的报告》（以下简称《I-G报告》）也提醒了中情局主管赫尔姆斯，契里尼也许是瓦罗纳和特莱菲肯特这两大刺杀阴谋策划者之间的中间人。<sup>③</sup> 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雇用契里尼，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为确保他不会和罗塞利一样向公众坦白。

FBI有一份重要报告，中情局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将其引用在有关郎斯基的安全文件中，据披露，该文件对郎斯基只字未提，可却绝对称得上是说明中情局—黑手党阴谋的重要文档。<sup>④</sup> 根据

① David Kaiser, *The Road to Dallas: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6–208.

②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00–101.

③ Inspector - General's Report on CIA Plots to Assassinate Fidel Castro, 29–30, quoted in Scott, *Deep Politics II*, 59.

④ Some of the documents in this file, including the FBI report quoted in this paragraph,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spector - General's Report on CIA Plots to Assassinate Fidel Castro, 29–30, quoted in Scott, *Deep Politics II*, 59. 除此之外，有关中情局对休闲国际的关注，前文已有提及，手写体文字标识“文档/山姆·吉安卡纳/未提及”。在笔者看来，提到吉安卡纳有益于分析中情局—黑手党之间的阴谋，但也仅此而已。





FBI 这份报告，瓦罗纳和契里尼兄弟的联络，这是黑帮的一头，主要是通过华盛顿公共关系特工爱德华·K. 莫斯来实现的。

瓦罗纳（原文如此）利用爱德华·K. 莫斯做助手，为针对卡斯特罗的行动募集资金。……茉莉亚·契里尼被指控为莫斯的情人，负责秘书服务，（这）实际上是为爱德华·K. 莫斯的行动打头阵。……茉莉亚·契里尼的两位兄弟，迪诺·契里尼和另一位（名字未知）为在古巴经营的两家最大赌场积极活动，这两家赌场一直在营业，直至巴蒂斯塔政权上位。……契里尼兄弟被指控通过爱德华·K. 莫斯为中间人，和托尼·瓦罗纳（原文如此）有密切往来，并通过爱德华·K. 莫斯向托尼·瓦罗纳提供巨款（报告称高达 200 万美元），以支持针对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并认为，他们将在“古巴未来发展”中获得不可小觑的一杯羹。<sup>①</sup>

依据中情局同一份备忘录，莫斯曾经担任美国公共关系协会（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主席。与此同时，根据时任中情局特工的埃德温·P. 威尔逊对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的一份口头报告，“莫斯的行动似乎主要是和地下活动相关的政府合同，可能是要将黑手党的钱用于合法商业活动”。<sup>②</sup>

① “Moss, Edward K. #172 646,” CIA Memo of May 14, 1973, in Meyer Lansky Security File, 9, NARA #1993.08.13.17: 42: 12: 560059. 中情局使用的错误拼写“Verona”，该字眼曾在 FBI 情报文件中出现过一次，中情局忽视了正确拼写“Varona”，这个拼写使用频率也很高。在其他相关的中情局文件中，它们被写成“Cellino”（而非“Cellini”），“Lenzieri”（而非“Lanzieri”）。通过这种方法，FBI 和中情局就能避免用正确姓名拼写搜索文件。例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情局告之法国，他们没有关于党卫军战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的文件，此时中情局正窝藏包庇此人。凡提及此人的美国文件，均称其为“Barbier”。

② “Moss, Edward K. #172 646,” 中情局 1973 年 5 月 14 日备忘录，发送人杰里·G. 布（Jerry GBrown），接收人安全调查科（Security Research Staff）副主管 NARA #1993.08.13, 17: 42: 12: 560059。



所有这些信息都为 1962 年 11 月 7 日中情局安全办公室的决策提供了背景，就是要确保通过秘密安全审核（Covert Security Approval），同意中情局秘密行动组（Covert Action staff）政治行动队（Political Action Group）可以利用莫斯。<sup>①</sup> FBI 已经告知中情局，有消息称“契里尼兄弟通过莫斯和瓦罗纳有来往，并且曾资助多达 200 万美元资金，用于反卡斯特罗的行动”，中情局的决策当然是一年多之后了。<sup>②</sup> 不仅如此，FBI 给中情局的消息指出，莫斯的情人茱莉亚·契里尼和其兄弟迪诺·契里尼都被指控为共犯，与此同时，“契里尼兄弟早就和古巴麻醉剂及妇女性奴交易案有关联”。<sup>③</sup> 中情局自己在 1960 年 12 月 16 日就曾告知 FBI，茱莉亚·“塞利诺”（Cellino）已经承认，她的两位兄弟“早就和古巴麻醉剂及妇女性奴交易案有关联”。<sup>④</sup>

FBI 的消息进一步指出，迪诺·契里尼“之前曾和华盛顿现场办公室（WFO，位于华盛顿）的约瑟夫·弗朗西斯·奈斯莱恩（Joseph Francis Nesline）有关联，是赌博活动的头号流氓”。<sup>⑤</sup> 笔者

① “Moss, Edward K. #172 646,” CIA Memo of April 19, 1967 (at the time of the I - G Report mentioning Moss), NARA #104 - 10122 - 10006; Inspector - General Report on CIA - Mafia Plots to Assassinate Fidel Castro (henceforth I - G Report), NARA # 104 - 10213 - 10101, 38. Cf. memo of November 7, 1962, in CIA's Edward K. Moss folder, 26, NARA #1994.05.03.10: 54; 53; 780005.

② “Manuel Antonio Varona,” FBI Memorandum of January 16, 1961, to A. H. Belmont, 105 - 76826 - 20; NARA #124 - 90055 - 10139.

③ “Manuel Antonio Varona,” FBI Memorandum of January 16, 1961, to A. H. Belmont, 2, 105 - 76826 - 20; NARA #124 - 90055 - 10139. Cf. “Moss, Edward K. #172 646,” CIA Memo of May 14, 1973, in Meyer Lansky Security File, 9, NARA #1993.08.13.17: 42; 12; 560059; CIA letter of December 16, 1960, to FBI, FBI file 105 - 76826 - 18; NARA #124 - 90055 - 10133.

④ CIA letter of December 16, 1960, to Director, FBI, FBI File 105 - 76826 - 18; NARA #124 - 90055 - 10133. 非常明显，中情局档案里并没有对外公开这封信的复本。

⑤ “Manuel Antonio Varona,” FBI Memorandum of January 16, 1961, to A. H. Belmont, 2, 105 - 76826 - 20; NARA #124 - 90055 - 10139.



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及，迈耶·郎斯基和约瑟夫·奈斯莱恩“有计谋地实施性敲诈勒索（主要是通过妇女性奴），以控制一批在华盛顿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sup>①</sup>

据中情局回忆，莫斯令人生疑。1962年11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提到了他“‘肆无忌惮而又不合规矩的’经营手法”。<sup>②</sup>依据《I-G报告》和其他备忘录，“1965年由秘密行动组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表明，没有记录留下了利用莫斯的痕迹”，<sup>③</sup>不过如此小心翼翼的措辞也无法排除曾暗地里利用莫斯的事实被记录在案。实际上，有关莫斯的文件卷宗充分验证了中情局对他的兴趣，而且很多文件都论及茱莉亚、艾迪、迪诺和戈弗雷多（Goffredo）·契里尼。

那些有关莫斯、契里尼家庭和瓦罗纳的文件揭示了内幕。“考虑到（黑帮）渗入中情局支持的（反对卡斯特罗）行动将带来的严重影响”，FBI警告中情局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还曾向瓦罗纳提供200万美元。<sup>④</sup>1961年1月23日，FBI将自己的担忧告知了新任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当时他上任还不到一周。<sup>⑤</sup>

中情局的反应大大超乎常理：中情局非但没有远离莫斯及其同伙，还向他们报信。中情局通过黑手党将毒药运送给瓦罗纳，他是1961年2月中情局—黑手党策划刺杀卡斯特的罪魁祸首。<sup>⑥</sup>1962

①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45, cf. 238 - 240.

② "Moss, Edward K. # 172646," CIA Memo of November 28, 1962, NARA # 1994.05.03.10; 54; 53; 780005.

③ *I - G Report*, 38.

④ "Manuel Antonio Varona," FBI Memorandum of January 16, 1961, to A. H. Belmont, 2, 105 - 76826 - 20, NARA #124 - 90055 - 10139.

⑤ FBI Memorandum to Attorney General, January 23, 1961, NARA #124 - 90055 - 10140.

⑥ Summers, *The Arrogance of Power*, 194, citing *I - G Report*.



年，瓦罗纳再度被选为 ZRRIFLE - 2 刺杀行动成员，这是威廉·哈维重新策划的卡斯特罗刺杀阴谋。<sup>①</sup> 同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情局亲自动手使唤莫斯。

## 有关中情局、莫斯和政治腐败的 更多内幕：阿德南·哈绍吉

通过中间保险丝（瓦罗纳），中情局和莫斯之间的间接关联似乎一直维系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这之后，扮演中间保险丝角色的是阿德南·哈绍吉，此人曾在一段时期内被称为“全球最富有的人”（就像在他之前的宋子文和炮·斯里亚诺恩一样）。在凯里一布朗（Kerry-Brown）有关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报告中，哈绍吉被列为“美国主要的外国特工”之一，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时期，他拉拢爱德华·K. 莫斯成为其公共关系特工。

哈绍吉重现了通过金钱和色情而取得政治影响力的政治腐败，前文已有论述。他对尼克松竞选游行的贡献——有些是合法的，有些则是非法的——被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进行了调查。有些人指出，哈绍吉曾在 1972 年暗地给尼克松 100 万美元，据传是放在一个公文包里，他“一时疏忽”落在了尼克松位于圣克利门蒂（San Clemente）的住所里。

除此以外，据称，哈绍吉曾将上百万美元（也有说是 2 亿美元）存入尼克松朋友比比·瑞波佐的银行里。<sup>②</sup> 而后，他“以支

① Don Bohning, *The Castro Obsession: U. S. Covert Operations against Cuba*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5), 181.

② Summers, *The Arrogance of Power*, 283 (\$ 1 million); Robert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New York: Crown, 2003), 43 (briefcase); Ronald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6), 170 (“several million”); Renata Adler, “Searching for the Real Nixon Scandal,” *Atlantic*, December 1976, 76-84 (\$ 200 million). 哈绍吉公开承认，自己曾在 1972 年为尼克松竞选赠款 43000 美元。



票的形式仅取出其中的 20 万美元，要求‘现金’，并签字让与沙滩酒店（Sands Hotel）”，该酒店位于拉斯维加斯。<sup>①</sup>哈绍吉此举似乎表明正在借用沙滩酒店作为个人的洗钱机器。作为“有史以来席卷拉斯维加斯的第一富豪”，哈绍吉将在一瞬间损失掉 25 万美元。<sup>②</sup>

沙滩酒店部分所有权最初归迈耶·郎斯基，他旗下的拉斯维加斯赌场为数可观，从中牟取的盈利借助存入迈阿密国家银行而被洗白（参见前文论述）。<sup>③</sup>20 世纪 70 年代，沙滩酒店已归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所有；然而郎斯基时代的两位老将，卡尔·科亨（Carl Cohen）和杰克·安查特（Jack Entratter）继续在赌场工作。<sup>④</sup>与此同时，哈绍吉在公司业务中与休斯在拉斯维加斯的财产经理——F. 威廉·格（F William Gay）联系上了；最后，休斯被威廉·格秘密带离了拉斯维加斯，来到了华莱士·格罗夫斯位于巴哈马群岛自由港（Freeport）的度假地，他搭乘的正是哈绍吉的飞机。<sup>⑤</sup>

即便是在休斯的时代，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仍旧是洗钱的最佳场所（被伪装成赌博损失）。这种做法早已成为惯用手法，以至于当美国海关在“卡萨布兰卡计划”（Operation Casablanca）中故意在拉斯维加斯附近建了一家假赌场，结果吸引了一批墨西哥银行高层官员来此会集，“旁若无人地讨论如何解决最近从毒品交易中已经

①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170.

②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142, 181.

③ 据称，1960 年，在沙滩酒店，FBI 发现赌场的公关小姐从参议员杰克·肯尼迪的包厢“进进出出”，据说酒店物主将 100 万美元装在一个褐色皮质小包里，送给肯尼迪。John William Tuohy, “The Sands,” *American Mafia*, August 2001, [http://www.americanmafia.com/Feature\\_Articles\\_155.html](http://www.americanmafia.com/Feature_Articles_155.html).

④ Omar Garrison, *Howard Hughes in Las Vegas* (New York: Dell, 1970), 48–49, 56, 58; Peter Dale Scott, *Crime and Cover – Up: The CIA, the Mafia, and the Dallas – Watergate Connection* (Palo Alto, CA: Ramparts Press, 1977), 29.

⑤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149–150.



到手的 5000 万美元资金”。<sup>①</sup> 在一个重要案件中，人们在佛罗里达州一架涉嫌毒品走私的飞机上查获了上千万美元现金，用星尘赌场（前文已论述）的袋子包着。<sup>②</sup>

还有报告称，除了金钱，哈绍吉“通过性贿赂笼络美国的执行官员”。用来支付给那些带着一批女孩来到他地中海游艇上的女皮条客的费用，高达上百万美元。<sup>③</sup>

中情局对哈绍吉和莫斯的兴趣可绝不局限于两人所持有的资金。20 世纪 70 年代，莫斯是肯尼亚狩猎俱乐部这个精英组织的主席，他邀请哈绍吉以主要所有人的身份加入俱乐部。<sup>④</sup> 前沙特情报主管费萨尔亲王（Prince Turki Bin Faisal）曾在公共场合披露，很多国家（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以及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情报主管曾定期在狩猎俱乐部会面，以开展秘密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中情局因为水门事件丑闻和其他后续改革而无

① Sally Denton and Roger Morris, *The Money and the Power: The Making of Las Vegas and Its Hold on America, 1947 - 2000* (New York: Knopf, 2001), prologue. 萨利·邓顿后来丰富了细节：“当情况明朗，70 家联邦国家各级别银行都曾参与其中、有所牵连，每一笔电汇和转账情况都已掌握在手——银行包括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纽约银行、花旗银行和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克林顿总统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插手干预，终止了整个调查，并封锁所有案子”。discussion at Taos Community Auditorium on October 12, 2002, [http://www.taosplaza.com/taosplaza/2003/pages/tmff\\_drugs.php](http://www.taosplaza.com/taosplaza/2003/pages/tmff_drugs.php).

② Gigi Mahon, *The Company That Bought the Boardwal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136.

③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275 - 278. 据哈绍吉的朋友拉里·克伯（Larry Kolb）所说，哈绍吉本人承认，自己和约翰·肯尼迪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交情，“是从两人一起嫖娼开始的”。Larry J. Kolb, *Overworld: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Reluctant Spy* (New York: Riverhead/Penguin, 2004), 236. 1987 年，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的总统梦被一个女人彻底毁灭，这个女人是哈绍吉手下的妓女之一。

④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238, 240.

法开展的。<sup>①</sup>

诸如麦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和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James Critchfield）等中情局官员已经是哈绍吉体系的一分子。他们针对外交倡议向哈绍吉提出建议，例如设立中东和平基金（Mideast Peace Fund），旨在为那些相互认可的以色列人和巴基斯坦人颁发奖金。<sup>②</sup> 哈绍吉有实力同以色列人谈判。据说，通过前军火商汉克·格林斯潘（Hank Greenspan）的牵线搭桥，哈绍吉与以色列机构互相结识，此人是《拉斯维加斯太阳报》（Las Vegas Sun）编辑，颇具政治影响力。<sup>③</sup>

一般而言，哈绍吉代表着战后跨洋过海的巨额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他的角色如同“保险丝”，或者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那些在各项行动中禁止现身的人物。例如，洛克希德公司压根没有出现在为尼克松 1972 年竞选游行提供非法服务的军队承包商名单里。不过没有哪部法律可以禁止他们的官方代表哈绍吉，他通过尼克松的朋友比比·瑞波佐的银行实现 2 亿美元资金的流动。<sup>④</sup>

中情局对莫斯的兴趣，而后对哈绍吉、华莱士·格罗夫斯、前文提及的“×××行动”以及埃迪·契里尼在休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雇主的兴趣，所有这些均表明，那些暗箱操作的秘密行动得到

---

① 费萨尔亲王向乔治城大学校友会直白解释了狩猎俱乐部的构成原因，主要是为应对水门事件之后的各种限制：“1976 年，这里发生了水门事件，这里的情报业实际上已被国会掌控。情报业束手无策。不能派遣特工，不能撰写报告，不能支付资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个由数个国家构成的团体应运而生，以期打倒共产主义，这个团体就是狩猎俱乐部。该俱乐部包括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伊朗。”

② Kolb, *Overworld*, 238, 242-243.

③ Denton and Morris, *The Money and the Power*, 72, citing laudatory article on Greenspan in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1993.

④ 国会调查员提出洛克希德公司是唯一一家没有为尼克松 1972 年总统竞选捐赠资金的大企业，据记者吉姆·豪根的调查报告，这种说法不可信。Hougan, *Spooks*, 457-458.



了非常规渠道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想要成功流通，事实证明，染指其中的便是保罗·海利维尔。《华尔街日报》认为，此人在1964~1975年与一系列针对古巴的秘密侵略行动的资金募集“密切相关”。<sup>①</sup>

## 海利维尔、卡斯托银行、布鲁斯·拉帕波特 (Bruce Rappaport) 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

通过对海利维尔的银行快速调查，我们发觉，他是多国情报组织、有组织犯罪、全球毒品走私、政治家和投机投资关系网中的核心人物，常常在酒店、赌场这样的场合与黑暗势力相勾结。不过这张关系网的动力引擎可绝非海利维尔一人，还有其他手握强权的人藏在背后，1976年海利维尔去世后[时值卡斯托银行开始引起各报业，如《新闻周刊》(Newsweek)的关注]，他们中有些人还维持着这张关系网。

其中最重要的一人也许要数战略情报局前任领导威廉·多诺万(下文将对此人详细论述)。根据皮特·布鲁顿(Pete Brewton)的调查：

“飞越疯人院”一案中，其中一位律师认为，在威廉·J. “野蛮比尔”·多诺万将军的介绍下，坎特结识了海利维尔，多诺万将军是“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名声赫赫的领导人，也是海利维尔在此办公室的上司。坎特否认这一说法，“我个人从未见

---

① 卓林克霍尔：“IRS vs. CIA”。卓林克霍尔还提出，“在1961年以失败告终的猪湾入侵事件中，据说海利维尔是付款人之一”，自那时起，几乎任何一部有关海利维尔的书籍(除了笔者的书之外)，都会引用这番言论。笔者曾经阅读了没有上百份也至少数十份中情局有关猪湾事件的文件，其中多数都会论及向反对卡斯特的个人和团体的支付行为，然而笔者却从未在哪份文件中发现海利维尔的名字，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假名字。



过比尔·多诺万。印象中，自己也许曾经有一次在保罗·海利维尔的要求下，与他通过电话”。<sup>①</sup>

另一位关系更为深入的战略情报局人物是海利维尔在佛罗里达州控股银行的搭档 [银行原名 HMT，后来改为“佛罗里达州共享银行” (Florida Shares)]，旗下还有帕莱茵银行和卡特勒·利吉银行。此人便是 E. P. 巴利 (E. P. Barry)，二战期间曾在战略情报局担任美国军队情报官员。战争结束后，他曾担任美国反情报科 (X-2) 驻维也纳主管。根据卡斯托银行一位官员的说辞，巴利长期以来一直和 (中情局局长) 威廉·卡西 (William Casey) 关系密切。<sup>②</sup>

巴利同时还是佛罗里达州共享银行和布鲁斯·拉帕波特的国际海事银行 (Inter Maritime Bank) 的关键股东，布鲁斯·拉帕波特是威廉·卡西的密友和商业伙伴。拉帕波特是位石油商，也是位油轮经纪人，“据传他和美国及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均有关联”，与实际上最大的情报—毒品洗钱机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有着理不清的关系。<sup>③</sup> 巴基斯坦格卡尔 (Gokal) 轮船家族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主要投资商，后来也是他们加快了该银行的破产，这个家族和拉帕波特及巴利一样，都是国际海事银行的股东。<sup>④</sup>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董事会成员阿尔弗雷德·哈特曼 (Alfred Hartmann)，同时身兼拉

① Pete Brewton, *The Mafia, CIA and George Bush* (1992), 296-297.

②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36-37, citing Robin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377-378 (X-2 in Vienna).

③ Peter Truell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384 (“ties”).

④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86. 英国检察官起诉阿巴斯·卡西马利·格卡尔 (Abbas Kassimali Gokal) 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盗窃 13 亿美元，1978~1982 年，此人是国际海事银行的董事会成员。1997 年，因牵涉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诈骗案，英国法庭判处格卡尔 13 年监禁。



帕波特在瑞士的银行纽约—国际海事银行（Bank of New York - Inter maritime）副董事长，以及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瑞士分行——商业投资银行（法语 Banque de Commerce et de Placements, BCP）的董事长。<sup>①</sup>

根据布洛克和维夫（Weaver）的调查，“拉帕波特曾在阿曼银行 [Bank of Oman, 该银行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及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合资银行] 就职，负责将中情局和沙特上百万美元资金转给巴基斯坦，以支持 20 世纪 80 年代与苏联斗争中的阿富汗叛军”。<sup>②</sup> 拉帕波特在阿曼银行的关键眼线是基瑞·汤桑德（Jerry Townsend），据称他是中情局前任特工，当时还负责管理位于亚特兰大的殖民轮船公司（Colonial Shipping Co.），在那里他结识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搭档贝特·兰斯（Bert Lance）。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一位以色列情报特工通过一家位于安提瓜岛（Antigua）的“甜瓜农场”，参与了麦德林（Medellin）军火交易，该农场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威廉·卡西的朋友布鲁斯·拉帕波特。<sup>③</sup>

布鲁斯·拉帕波特……拥有毛利斯·萨法提（Maurice Sarfati）开设甜瓜农场所在地的土地所有权，萨法提曾是以色列部队军官。拉帕波特位于安提瓜岛的其中一家银行向萨法提提供了一笔高额贷款——从未偿还。萨法提（也未曾偿还美国政府保

- 
- ①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384. 图艾尔和古温提出，哈特曼从国际海事银行转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凯里—布朗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报告》指出，拉帕波特将哈特曼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瑞士分行商业投资银行挖到自己的银行。
  - ②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85.
  - ③ U. S. Congress, Senate, 102nd Cong., 2nd sess., *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Senator John Kerry, Chairman, and from Senator Hank Brown, Ranking Member,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Narcotic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eptember 30, 1992, 1-2 (cited henceforth as the Kerry - Brown Report), 69.



险机构 OPIC 给他提供的贷款) 要履行的责任是, 首先笼络一帮政府官员, 然后让自己的同胞雅尔·克莱恩 (Yair Klein) 进入他们的办公室。

克莱恩的工作 (是) 在哥伦比亚, 他那家获得以色列审批的“安全”公司——矛头有限公司 (Spearhead Ltd.) ……为麦德林可卡因联合企业培养一批恐怖分子小组, 训练他们的暗杀和轰炸技能, 该公司逐渐招来不满的目光。……1988 年, 克莱恩来到安提瓜岛, 希望能够找到为其麦德林客户乔瑟·贡扎鲁·罗杰古茨·噶查 (Jose Gonzalo Rodriguez Gacha) 提供军火的新渠道。<sup>①</sup>

拉帕波特与摩萨德显而易见的关联引发了一个疑问: 海利维尔和郎斯基的世界商业银行以及与提波·罗森鲍姆的关联, 难不成也和摩萨德有联系?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海利维尔在东部开发公司 (Eastern Development Company) 的合法代表身份上 [依据马丁代尔—哈贝尔法律登记库 (Martindale-Hubbell Legal Register)]: 以此名称登记的公司和郎斯基、汉克·格林斯潘等人合作, 为还处在动荡时期的以色列提供军火。<sup>②</sup>

显而易见, 和很多其他少数民族一样, 犹太人也是全球毒品网络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是该网络财政技术的重要一环——不过即便是在此层面上, 他们也绝非孤军作战。全球毒品网络将位于佛罗里达州、瑞士, 东南亚的潮州、福建和闽南华人、香港的犹太人银行联系起来; 还包括中东的穆斯林联合银行 (Muslims Bank of Intra) 和后来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 除此之外, 还包括意大利银行, 例如由米歇尔·辛多纳 (Michele Sindona) 和罗伯托·卡尔维 (Roberto Calvi) 开设的银行, 此二人均是与情报

① Jane Hunter, “Covert Operations: The Human Factor,” *The Link* 25, No. 3 (August 1992): 8, <http://www.ameu.org/page.asp?iid=139&aid=183&pg=8>.

② Leonard Slater, *The Pledg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1), 175.



工作相关的共济会意大利分会 P-2 (Masonic Lodge P-2) 成员, 在两人的银行因为黑手党干预而破产之后, 二人均遭谋杀。<sup>①</sup> 笔者个人的印象是, 这些少数民族分子的权力, 从未曾超越那些主流人物的掌控力, 例如多诺万和海利维尔。

(笔者本人历来推崇非暴力, 然而也必须承认, 全球毒品网络中那些使用暴力手段的少数民族团体, 虽然后来手中权力增加, 也的确曾和情报组织相互勾结, 不过在起始时期, 生存在一个由欧洲和美国利益独霸的体系下, 他们却是为了抵制暴力。)

其中一个主流人物便是神秘的 E. P. 巴利, 他是和海利维尔以及拉帕波特一起的投资商。我们对巴利的事迹所知甚少, 不过有一件是在二战时期, 他曾在战略情报局供职, 在战争快要结束时, 多诺万委任他为战略情报局反情报科 (X-2) 驻维也纳主管。<sup>②</sup>

战略情报局 X-2, 亦为反情报科, 是战略情报局最为神秘的分支, 其最终目标是要渗入德国安全部 (German Sicherheitsdienst, 简称 GS)。<sup>③</sup> 根据 1946 年战略情报局的一份报告, “一项同样惹人注意的反情报科行动是调查 RSHA (亦即德国安全部) 的资金转账” [避难所计划 (Operation Safehaven)]。<sup>④</sup> 调查过程中, 美国第

① 辛多纳与意大利情报机构 SISMI、罗萨利奥·刚比诺 (Rosario Gambino) 等毒品走私贩, 以及尼克松政府均有来往。See Jonathan Marshall, Peter Dale Scott, and Jane Hunter, *The Iran - Contra Connection: Secret Teams and Cover Operations in the Reagan Er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71, 73;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178 - 179, 193 - 195.

②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36, citing Winks, *Cloak and Gown*, 377 - 378.

③ Richard Harris Smith,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165.

④ “避难所计划”是美国财政部为找到被盗的纳粹党黄金所制定的行动方案, 也许还能借此找到纳粹分子在美国的帮凶。战略情报局反情报科 X-2 接管之后, 党卫军的资产再度被用来资助前党卫军特工, 如克劳斯·巴比, 这些特工转而成为美国办事。



三陆军带着一位安全部少校“数次前往直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这些先期行动之后，便发现了价值高达50万美元的黄金珠宝”。<sup>①</sup>巴利监督之下所发现的这些纳粹党黄金，之后被用来资助美国战后几年在德国的各项行动。

巴利有着令人诧异的背景，象征着两个关系网的延续，即，在1972年之前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海利维尔情报—毒品网络（这一年，内部预算局的“信风计划”着手调查帕莱茵银行），以及在1972年之后开始发展壮大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情报—毒品网络（这一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建立）。

与之前的哈绍吉相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有能力协调阿拉伯—以色列—中国的军火交易，也能胜任与西方情报机构和政治家们之间的沟通工作。的确，1978年《联邦反腐败法案》（*Corrupt Federal Practices Act*）通过之后，美国公司不得向外国人直接支付，这家银行似乎就承袭了哈绍吉的大部分功能，成为在中东及其他地区能够施加影响力的机构。<sup>②</sup>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不仅继承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哈绍吉利用金钱影响并贿赂美国政客的做法。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巴基斯坦总裁阿迦·哈桑·阿比迪（Agha Hasan Abedi）帮助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财政秘书贝特·兰斯摆脱破产困局，从而让自己和卡特建立了联系。<sup>③</sup>

参议院一份有关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报告总结道：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73个国家开展业务，它系统性地依

① Anthony Cave Brown, *The Secret War Report of the OSS* (New York: Berkeley, 1976), 565-566.

② Kessle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162, 300; Jonathan Beaty and S. C. Gwynne, *The Outlaw Bank: A Wild Ride into the Secret Heart of BCC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54, 80, 263-264.

③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83-87.



赖于和其中绝大多数地区高层政治人物的关系，必要时是支付关系。……结果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这种依赖与世界各国官员关系的做法，有些令人诟病，有些不合法规，有些完全是行贿受贿，其中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喀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加纳、危地马拉、科特迪瓦、印度、牙买加、科威特、黎巴嫩、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sup>①</sup>

《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们出版了两部调查研究细致的著作，从中我们了解到，在后期那些得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慷慨资助的位高权重人士之中，资金的所有人和分支机构均归属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财政秘书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他拒绝调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sup>②</sup>除他以外，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两人都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要员，也拒绝调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sup>③</sup>

## 中情局、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 “秘密银行的历史传统”

但是巴利并不是海利维尔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毒品—银行网络的唯一连接。更为核心的人物要数乔治·奥姆斯特德将军（George Olmsted），他是位于华盛顿的控股银行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① Kerry - Brown Report.

② Beaty and Gwynn, *The Outlaw Bank*, 357.

③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373 - 377.



的一把手。<sup>①</sup> 1973年3月，奥姆斯特德要求国际银行（“众人所知的中情局专有银行”）购买了即将破产的、位于巴哈马群岛的商业银行（卡斯托银行的前身）66%的资金股票，尽管“国际银行的官员们对商业银行金融状况的实际情况心知肚明”。<sup>②</sup> 从1977年开始，国际银行便开始将其股票在金融大众共享银行 [Financial General Bankshares, 后来改名第一美国 (First American)] 上销售，此银行是一家美国大型控股公司，股票卖给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名誉负责人，而后第一美国被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接管。<sup>③</sup>

最常见的解读是，中情局不仅利用了这家银行，而且还助长其发展。记者彼特·图艾尔 (Peter Truell) 和拉里·古温 (Larry Gurwin) 撰写了一部极具权威性的有关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书籍，他们推测，中情局和该银行的创建者阿迦·哈桑·阿贝迪的关联也

---

① 奥姆斯特德与情报行业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在中国为阿尔伯特·魏德迈 (Albert Wedemeyer) 将军效力的战争年代，当时他负责秘密行动，从此开启了和战略情报局的合作。在笔者所称的战略情报局—中国关系网中，他算是一位高层，这个网络还集结了海利维尔全球毒品交易中的众多重要人物。前文已经论述过海利维尔这个人，此人在曼谷创建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之前，曾担任战略情报局驻昆明特别情报小组的头目。威利斯·伯德 (Willis Bird) 是战略情报局驻中国副主管，1951年海利维尔从曼谷返回美国，那时伯德便成了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最显著的人物。后来成为科克伦代言人的 C. V. 斯塔尔在中国开设了自己的保险业帝国，在战略情报局—国民党合作协议之外，另创建了一个战略情报局关系网。敬请参阅 Smith, *OOS*, 267 (Start), 237 (Bird), 326 (Helliwell)。不过这绝非就是总体情况。笔者在其他地方曾论述了，保罗·海利维尔领导的战略情报局派遣小队 202 其他成员在昆明开展了战后行动：E. 霍华德·亨特、雷·克莱恩、寇内因、约翰·辛劳博 (John Singlaub) 以及米切尔·温贝尔。战后，这些人都曾为中情局和毒品走私贩牵线搭桥：亨特在墨西哥，克莱恩在中国台湾，寇内因在越南，温贝尔在老挝，辛劳博在全球反共联盟 (World Anti Communist League)，亨特和克莱恩曾帮助设立该联盟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20, 207)。

②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41; cf. Block, *Masters of Paradise*, 191.

③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41 - 42;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40 - 43.



许可以追溯到1972年银行建立之前。另外，他们还注意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只是众多参与多项交织复杂洗钱行动的银行之一，这些银行一直在为中情局效力，例如迪克公司（Deak & Company）、卡斯托银行和纽甘—汉德银行（Nugan Hand）。<sup>①</sup>

## 全球网络和麻醉剂

其中一家有关联的银行是佛罗里达州的世界金融公司（World Finance Corporation），它成了“或许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麻醉剂调查案”的目标。不过这次调查“牵扯到数十位联邦和州级特工，不得不在推迟一年，因为中情局向司法部投诉称，12位头号罪犯均‘有所关联’”。<sup>②</sup>

另一家和毒品有关联的银行是澳大利亚纽甘—汉德银行，1976年该银行委派普华事务所（Price Waterhouse）负责稽核，同年，卡斯托银行和商业银行均面临倒闭。<sup>③</sup> 1980年，澳大利亚纽甘—汉德

①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23 - 124, cf. 128 - 129: 作者用七页篇幅论述了各类情报关系网，并提出疑问，银行非法收购一家美国银行的控股公司——第一美国共享银行（First American Bankshares），此举难道不是在切切实实服务美国情报业？在这次银行接管事件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无人能否认：奥姆斯特德控制该公司（第一美国）数年之久；米登多夫（Middenforf）是兼并集团的一把手；阿贝迪协助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客户将公司从米登多夫手中买下；伊万尼（Irvani）是为实现兼并特意设置的数家虚假公司的其中一位总裁；他的搭档理查德·赫尔姆斯为伊万尼提供建议；（前任沙特情报局局长卡马尔·亚当是阿贝迪组织的首要投资者；克利福德（Clifford）钻法律空子刺激了这次交易，还成了公司的总裁……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或者，很有可能第一美国一直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附属，接着又从中情局的某个联盟组织传给下一个？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一定就是现实，不过这也绝非是牵强离奇的空想。

②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96.

③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162.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也曾聘请普华事务所作为自己的稽核员。除此之外，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纽甘—汉德银行曾雇用同一家法律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代理商布鲁斯·坎贝尔公司（Bruce Campbell & Company）。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25.





银行轰然倒塌，澳大利亚的调查员总结认为，纽甘—汉德银行曾参与了重大毒品交易的资金转移，还为交易收益洗钱：两项官方调查“认为纽甘—汉德银行秘密扮演着将毒品收入转移至海外的关键角色，而且显而易见，它在海外进行更为严重的违法毒品交易”。<sup>①</sup>

纽甘—汉德银行笼络了为数众多的中情局前任官员以及曾与其联手的战后老兵，其中就包括“神秘的木偶戏演员”贝尼·豪夫登（Bernie Houghton），据说在越战期间，此人曾“从泰国出发，驾驶数架C-47集装箱飞机”，<sup>②</sup>还有中情局前任局长威廉·科比。尤其令人诧异的要数托马斯·克莱恩斯（Thomas Clines）和纽甘—汉德银行的关系，此人是和王宝（Vang Pao）一起在老挝工作的中情局官员，受西欧多尔·沙克利指挥，他后来辞职并加入埃德温·威尔逊外包性质的情报网络工作。1980年，纽甘—汉德银行的倒闭引起世人瞩目 [弗兰克·纽甘（Frank Nugan）自杀，也有人说是被谋杀]，正是在托马斯·克莱恩斯的帮助下，豪夫登才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澳大利亚。<sup>③</sup>此二人，连同埃德温·威尔逊、西欧多尔·沙克利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都曾参与在阿富汗开展的地下秘密反苏联阴谋，不是为中情局，而是为狩猎俱乐部。<sup>④</sup>

纽甘—汉德银行位于清迈的办事处和缉毒局地方办事处在同一楼层，清迈市的主要商业活动就是鸦片走私。根据乔纳森·奎特尼（Jonathan Kwitny）的调查，“如果纽甘—汉德银行的代表们都外

①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243.

② Bangkok embassy intelligence officer Allan Parks, to Jonathan Kwitny, in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59. 奎特尼询问有关豪夫登的事情，在亚历山大·巴特费德（Alexander Butterfield）的帮助下，让奎特尼与帕克斯联络上，巴特费德是水门事件尼克松窃听系统听证会的曝光者，之前也曾在亚洲担任情报官员。Cf. Russ Baker, *Family of Secrets: The Bush Dynasty, the Powerful Forces That Put It in the White House, and What Their Influence Means for America*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9), 234-235.

③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334-335.

④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313-314.



出，那么缉毒局的接待员便负责接听纽甘—汉德银行的电话并记录讯息”。纽甘—汉德银行驻清迈的代表，尼尔·埃文斯（Neil Evans）曾说过，当迈克尔·汉德（Michael Hand）和罗恩·普尔盖·福瑞姆（Ron Pulger-Frame）（之前曾在迪克公司任情报员，后来来到纽甘—汉德银行工作）二人讨论将中情局的资金转移至中东、沙特阿拉伯和巴拿马时，他正好在场。埃文斯曾说过，纽甘—汉德银行曾为中情局一次性转移大约 5000 万 ~ 6000 万美元资金，并且该银行还参与了第三世界的军火交易。<sup>①</sup>

埃文斯也曾向澳大利亚电视台透露，他所经手的上百万美元都是“来自毒品交易地区。他的措辞非常明确，称这家银行是苗族（越南称为‘赫蒙族’）商人及其他一些罂粟种植者的‘洗钱机器’”。<sup>②</sup>

笔者在《通向“9·11”之路》（*The Road to 9/11*）一书中论述了卡西如何凭借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借此美国得以帮助阿富汗圣战分子对抗俄罗斯人。源源不断的美国人的加入，加速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的内讧，此人是阿富汗地区势力最大的毒品走私犯，（得益于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帮助）他很快就成为全球头号毒品走私贩。<sup>③</sup>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不久陨落，而在这之后，这种毒品网络模式不断复制。我们已经看到，在阿塞拜疆，（以石油公司名号为掩护）曾受沙克利和克莱恩斯领导、参加老挝行动的中情局三位老员工，理查德·西科德（Richard Secord）、黑尼亚·埃德侯特（Heinie Aderholt）和埃德·迪尔伯恩（Ed Dearborn），依照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的模式，建立了

① Kwitny, *The Crimes of Patriots*, 207, 208.

② James A. Nathan, "Dateline Australia: America's Foreign Watergate?"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82 - 1983, 183, quoted in Marshall et al., *The Iran - Contra Connection*, 38.

③ Scott, *The Road to 9/11*, 126 - 127.



一家新的航空运输机构，不久便“从阿富汗搭载了上百位圣战分子雇佣兵”。阿拉伯的阿富汗人在阿塞拜疆的行动资金也依赖于阿富汗海洛因买卖。<sup>①</sup>

洛蕾塔·拿破里奥尼 (Loretta Napoleoni) 认为，“基地”组织拥有一个横穿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毒品路线，始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穿过阿塞拜疆和车臣，最后抵达科索沃。<sup>②</sup> 这便让我们认识到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1998年，克林顿选择支持以“基地”组织为后盾的科索沃解放军 (Kosovo Liberation Army, KLA)。“在1998年，美国国务院将科索沃解放军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并认为该组织的行动资金来源于国际海洛因交易以及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如奥萨姆·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的贷款”，可是即便如此，克林顿依然做此举动。<sup>③</sup>

最后，如果 FBI 前翻译希贝尔·爱德蒙兹 (Sibel Edmonds) 可信，在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国会，其腐败也是源自于同样的海洛因交易盈利。2002年，爱德蒙兹因指控某位同事是国家安全

① Thomas Goltz, *Azerbaijan Diary: A Rogue Reporter's Adventures in an Oil Rich, War-Torn, Post-Soviet Republic*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272 - 275. 据传，理查德·西科德也曾试图通过以色列特工大卫·基姆奇 (David Kimche) 的协助，销售以色列军火，基姆奇是奥利弗·诺斯的另一同伙。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在阿富汗招募圣战分子，20世纪80年代，此人是中情局资助的首要对象，而最近，他是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塔利班的领导人之一，同时还致力于推翻美国在当地的扶持对象哈密德·卡尔扎伊。Se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7, 8, 20.

② Loretta Napoleoni, *Terror Incorporated: Tracing the Dollars behind the Terror Network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 90 - 97: “(IMU leader) 纳曼加尼 (Namangiani) 在塔吉克斯坦和中亚的关系网被用来走私来自阿富汗的鸦片。这部分是因为纳曼加尼在车臣的关系网，借此，海洛因运至欧洲” (91) ……“正是在车臣犯罪团伙的斡旋下，科索沃解放军和阿尔巴尼亚黑手党才能控制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海洛因流通” (96)。拿破里奥尼并未提及阿塞拜疆，然而这个地区却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车臣之间。

③ “KLA Funding Tied to Heroin Profits,” *Washington Times*, May 3, 1999.



的破坏分子而被 FBI 辞退。她抗议自己被辞退并提出诉讼，因此爆出内幕，政府利用国家安全特权中止了诉讼，她也被禁止不得公开谈论此事。

根据丹尼尔·艾瑟贝格 (Daniel Ellsberg) 的调查，爱德蒙兹担忧的问题正是拿破里奥尼所论述的“基地”组织网络。

根据多次面谈记录，她曾向国会陈述，“基地”组织 95% 的资金都依赖于毒品——美国政府对这些毒品交易视而不见，一直如此，因为这些交易牵扯到美国众多的盟国和资产。例如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及所有这些以“斯坦”结尾的国家。在这些毒品交易中，阿富汗是鸦片的源头，转站土耳其，然后送抵欧洲，欧洲 96% 的海洛因原料均来源于此，负责运送的是位于阿尔巴尼亚或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位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教徒——基本上是科索沃解放军，美国曾在 20 世纪末大力扶持该组织。……希贝尔表示，装有现金的公文包被送至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 (Dennis Hastert) 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家里，这个公文包来自土耳其，主要是毒品收益。<sup>①</sup>

近些时候，她在《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 出版的访谈录中向菲利普·杰拉迪 (Philip Giraldi) 透露，“美国政府中有些特定势力在和土耳其准军事组织合作，包括阿卜杜拉·凯特里 (Abdullah Çatli) 组织”。美国国务院或是中情局曾开展牵涉到本·拉登的中亚行动。“基地组织”这个词不止一次被提及。经常提到“圣战分子”，经常是“本·拉登”，实际上，不是单指“本·拉登”一人，而是指称多个类似“本·拉登”的人。很多和本·拉

<sup>①</sup> Daniel Ellsberg with Kris Welch, KPFA, August 26, 2006, <http://wotisitgood4.blogspot.com/2006/10/ellsberg-hastert-got-suitcases-of-al.html>.



登角色类似的人都曾搭乘私人喷气式飞机前往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驻阿塞拜疆大使曾与他们合作。

这些人得到巴基斯坦或沙特阿拉伯的帮助，受美国领导。马克·格洛斯曼（Marc Grossman）全权监管，把人从土耳其东部带进吉尔吉斯斯坦，从吉尔吉斯斯坦带入阿塞拜疆，再将有些人从阿塞拜疆带到车臣，有些则带到波斯尼亚。在土耳其，所有这些人都会被安排搭乘北约组织的飞机。人和武器过去，毒品过来。

杰拉迪：美国政府是否知道这种循环贸易？

爱德蒙兹：百分之百知道。很多毒品正是通过北约组织的飞机抵达比利时。之后，还送至英国，有些会通过军队飞机来到美国的芝加哥、帕特森和新泽西的派发中心。永远不会被搜查的土耳其外交官常会携带装有海洛因的公文包入境。

杰拉迪：自然，所有这些均未接受调查。<sup>①</sup>

2005年，《名利场》杂志也报道了希贝尔·爱德蒙兹案子的部分情况。报道中透露，因为她以前能够获取到FBI的窃听录音，从而得知美国—土耳其委员会（American-Turkish Council）的成员想要贿赂当选的美国官员，并且“听着像是讨论大宗毒品运输和其他犯罪活动”。<sup>②</sup>

① Sibel Edmonds and Philip Giraldi, "Found in Translation: FBI Whistleblower Sibel Edmonds Spills Her Secrets," *American Conservative*, November 2009, <http://www.amconmag.com/article/2009/nov/01/00006>.

② *Vanity Fair*, September 2005. 根据美国土耳其协会的官网，“美国土耳其协会（简称ATC）是美国地区领先企业协会之一，致力于推动双方商业、国防、技术和文化交流，有效增强美国—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协会成员众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和土耳其企业、跨国公司、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关注美国—土耳其关系发展的个人”。因此，这和美国安全委员会（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有所类似，有关该委员会1963年的各项行动的论述见Scott, *Deep Politics*, e.g., 292。爱德蒙兹在其《火判》（*Trial by Fire*）一书中，曾经对胡瑟（转下页注）



## 结论：与毒品密切相关的 秘密连锁事件

黑手党和帝国有着很多特定的共同点。两者均在无法管制的领域，借用系统性的暴力强制手段以实现管制。两者均为达成目的而使用残暴手段，不过只要两者所控制的暴力结局比未能控制的暴力毁灭程度要轻，则大家都选择容忍。（笔者尝试性地提出，黑手党和帝国有一重要区别：随局势变迁，黑手党将逐渐成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它们曾破坏此社会的规则，而帝国却是不可挽回地站在了这个曾由它们控制的社会对立面。）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美国黑手党基石和美国帝国部分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在本章中，笔者试着从体系的角度论述这一关系的核心，将其外围扩展到了全球关系，笔者将其称为全球毒品网络，它和美国明的、暗的组织均有密切往来。这种全球关系将美国情报机构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报机构联结起来，例如中国台湾、以色列、意大利和智利。它还涵盖了多个国家的高层政客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美国两党。

笔者坚信，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的重大秘密事件均和这个全球毒品网络脱不了干系。（不仅如此，笔者将在第九章进一步论述，自1950年，美国所参与的绝大多数重大冲突事件——1959年老挝、1979年和2001年阿富汗，甚至于1989年哥伦比亚，

---

（接上页注②）因·拜巴辛（Huseyin Baybasin）的部分言论表示赞同。拜巴辛是另一位土耳其海洛因头目，如今被关押在荷兰监狱里。书中写道：“我处理了从土耳其驻英格兰领馆来的毒品”。不过，他又补充道：“我是和黑手党一道，不过在我合作过的黑手党组织当中，有些成员是土耳其官员。”拜巴辛宣称，自己得到了北约组织驻比利时的土耳其官员的协助。Adrian Gatton, “The Susurluk Legacy,” *Druglink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6, [http://adriangatton.com/archive/1990\\_01\\_01\\_archive.html](http://adriangatton.com/archive/1990_01_01_archive.html).



在爆发前，均有刻意操纵的事件掩人耳目，这些事件大多可以追溯到全球毒品网络。<sup>①</sup>

——战后美国首次出现在东亚，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依靠毒品收入维持。

——美国进入东南亚，与此同时，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支持国民党在缅甸东部的毒品走私贩，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同依赖毒品为生的泰国空军增援队（Police Aerial Reinforcement Unit, PARU）进入老挝，同时，中情局通过控制当地的毒品派发而钳制了西贡（现称“胡志明市”）。

——由战略情报局退伍军人尼古拉斯·迪克（Nicholas Deak）建立的金融公司——迪克公司，背景复杂，“据报道，中情局利用该公司为多项秘密行动提供资金，其中包括1953年推翻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q）”。<sup>②</sup>

——1954年美国成功推翻民主选出的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Jacob Arbenz），部分是得益于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帮助，他是20世纪40年代郎斯基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中坚力量，他的国民警卫队（Guardia

① 主要例外也许是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可即便在这件事上，依然有人认为，美国要承担起引发战争的部分责任。See, e. g., Edward Mortimer: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萨达姆·侯赛因执意入侵的原因在于，他坚信，美国除了口头谴责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动作。他曾和美国大使阿普利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于7月25日的会面、华盛顿国务院官员的发言、美国表示不会插手科威特安全问题的公开言论、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成功阻止美国参议院因伊拉克之前违反国际法而计划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的举动，基于这些因素，他才有如此推测。”（*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2, 1990）；需要指出的是，朝鲜战争也属于这两类情况，see Peter Dale Scott, “Korea (1950), the Tonkin Gulf Incident, and 9/11: Deep Events in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Asia -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June 22, 2008, [http://japanfocus.org/~Peter\\_Dale\\_Scott/2784](http://japanfocus.org/~Peter_Dale_Scott/2784)。

② Marshall, *Drug Wars*, 55, citing Tad Szulc, “The Money Changer,” *New Republic*, April 10, 1976, 10 - 11.



Nacional) 和之后的加勒比海毒品走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59~1960年，中情局向老挝派驻秘密部队，最终变成了依靠毒品收入的非常规军，成员多达上万名，主要是凭借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在泰国的行动。肯尼迪总统曾希望掌控中情局在老挝的秘密之战，但是白费心力，这无疑是美国越南之战的真正起点。<sup>①</sup>

——阿格勒顿的“翻版中情局”，反情报科/专门调查小组，操纵并伪造有关李·哈维·奥斯瓦德的“情报”，从而将其变为约翰·F. 肯尼迪总统谋杀案中的“指定疑犯”。

——1965年美国推翻通过民主手段选出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部分是凭借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资金资助，部分是因为中情局颇有影响力的特工笹川良一(Sasakawa Ryoichi)和其搭档儿玉誉士夫，以及一群日本黑帮(Yakuza)。<sup>②</sup> 笹川良一和儿玉誉士夫也收到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资金，部分是通过该公司，另外则是通过片山诗(Shig Katayama)出手，他在开曼群岛的ID公司和海利维尔的卡斯托银行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业务交易。<sup>③</sup>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为1979年中情局干预阿富汗局势提供了最早的基础，随后立即与主要的毒品走私贩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建立联盟。巴基斯坦总统齐亚(Zia)安排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与法左·哈克(Fazle Haq)中将共同合作，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一位告密者告知美

① Se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②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 - 1967," 239 - 264.

③ *AMPO* (Japan), January 1974, 44 (Indonesia); David E. Kaplan and Alec Dubro, *Yakuza*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90 (Deak); Marshall, *Drug Wars*, 54 - 55 (Katayama, Kodama). 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都曾被美国以战犯罪名逮捕，却未被判刑。1941年，儿玉誉士夫策划用炸药谋害日本首相近卫文磨(Konoye)，以阻止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二战”期间，儿玉誉士夫在上海发了财，据说部分是因为他与宪兵队联手控制了毒品走私。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是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的坚实拥护者，正如前文所述，该联盟和战后亚洲毒品走私活动一直有关系。





国当局，法左·哈克“与麻醉剂走私密切相关，还通过（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转移海洛因收入”。<sup>①</sup>后来的十年里，希克马蒂亚尔从中情局获得的资助，远远超过中情局之前或之后给其任何一位帮手所提供的资产。

——1970年，一位假名是亨利·J. 斯罗曼的中情局官员被派驻智利，他也是“一位高危险走私犯，和黑手党有直接关联”，他和智利右翼分子联手，图谋暗杀智利军队总参谋长勒内·施耐德（René Schneider）将军。<sup>②</sup>

——1976年9月，奥兰多·勒特里在华盛顿遇害，凶手包括一群古巴流放毒品走私犯，据说，该团队为依靠毒品收入的智利情报机构DINA效力。尽管美国政府知道DINA的“飞鹰计划”时常在国外进行暗杀活动，不过中情局局长布什还是选择在公共场合为DINA消除嫌疑。<sup>③</sup>

——根据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的论述，1980年7月和10月，狩猎俱乐部的亚历山大·德·马朗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安排威廉·卡西（马耳他骑士成员）与伊朗和以色列驻巴黎代表会面，卡西承诺向伊朗提供所需的美国军备，要求延迟美国在伊朗人质的回国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共和党十月反惊喜事件”。帕里怀疑，在为秘密交易提供资金以及后来将以色列军备送往伊朗的事件中，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均牵涉其中。<sup>④</sup>

① Beaty and Gwynn, *The Outlaw Bank*, 48; cf. Truell and Gurwin, *False Profits*, 160. 正如前文所述，哈克的儿子曾告知笔者，他的父亲是前任西北边境省军事总指挥，希克马蒂亚尔等人运送的毒品曾途经这个地区，不过没有证据能够说明，他父亲曾从中获利。

②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1983), 279, 290.

③ Dinges, *The Condor Years*, 190-198.

④ Robert Parry, *Secrecy and Privilege: Rise of the Bush Dynasty from Watergate to Iraq* (Arlington, VA: Media Consortium, 2004), 112-138; Scott, *The Road to 9/11*, 99-107. According to Parry, Michael Ledeen was also part of this effort.



——1981年，土耳其毒品走私团伙“灰狼”（Grey Wolves）成员莫梅特·阿里·阿加（Mehmet Ali Ağca）图谋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报道，这次暗杀阴谋是有组织的，发起人是土耳其黑手党头目贝克·科伦克（Bekir Celenk），组织者是阿卜杜拉·凯特里，此人是为土耳其情报组织效力的敢死队、毒品走私团伙“灰狼”头领。《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在报道中指出，凯特里为中情局格拉迪奥（Gladio，亦指“幕后”）组织的土耳其分支开展秘密行动，一年之后，凯特里和臭名昭著的“飞鹰计划”杀手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Stefano delle Chiaie）共同现身迈阿密。<sup>①</sup>

——在建立与1985~1986年的伊朗门事件非法关联中，沙克利、哈绍吉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均有份，它们将军火交易的盈利转入伊朗，以支持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sup>②</sup>

——在20世纪90年代的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掠夺的财富是通过拉帕波特的国际海事银行将资金转入纽约银行，后者与拉帕波特有着非决定性的但至少是极重要的利害关系。<sup>③</sup>

——1991年，沙克利的同事理查德·西科德在阿塞拜疆建立了一家航空公司，并用飞机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招募的上百位

- 
- ① “Turkey’s Pivo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Drug Trad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http://mondediplo.com/1998/07/05turkey>. Cf. Daniele Ganser, *NA TO’s Secret Armies: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237–238. 克莱尔·斯戴林（Claire Sterling）曾指责克格勃是暗杀行动的罪魁祸首，在她看来，克格勃是所谓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核心，而她的这一观点完全是威廉·凯西和罗伯特·盖茨强加给中情局分析员的（see note 192）。
- ② *Iran – Contra Affair*,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 – Contra Affair, 100th Cong., 1st sess., House Report No. 100–433, Senate Report No. 100–216, 164, 166, 228.
- ③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95–116. Burt Kanter, the cofounder of Castle Bank, was recurrently involved in Rappaport’s IMB – BONY dealings (Block and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100, 102, 193, 105, 113).



圣战分子送出阿富汗。<sup>①</sup>

——1998年，美国扶持科索沃解放军，该组织以“基地”组织为后盾，部分资金来自毒品，而后人们发现，数年来，至少有一位科索沃解放军头目和美国私人军火公司 MPRI 存在长期往来。<sup>②</sup>（最迟在1997年，美国将科索沃解放军视为部分资金依赖于海洛因走私的恐怖组织。）

[这个名录可以无限延长。例如，澳大利亚成了依赖美国的盟友，这个转变完全可以追溯到1975年，通过民主渠道选出的首相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下台，佩尼·莱诺克斯（Penny Lernoux）等人已经发现，纽甘—汉德银行暗地里从中作祟。<sup>③</sup>]

二战之后，美国扩张所依赖的这类深层的延续性事件，让本书所描述的令人诧异的现象有理有据——换言之，诸如肯尼迪遇害和“9·11”事件等深度问题绝非互不相关，或者只是美国境外力量所作所为。相反，至少从部分来看，它们是因为本书所论述的这种深层次关联，而进入了公众视野，尽管这种关联依然存在，但是几乎被人完全忽视。

## 最后的结论：稳定的民主面临更大威胁

如果概括性地观察这一长串的秘密干涉和深层事件，我们看到的事实模式和公共机构政策的偏离越拉越大。这张全球网络帮助中情局干预伊朗（1953年）和危地马拉（1954年），其实这些行动早就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更早之前的外交关系委员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163 - 165, 351; Goltz, *Azerbaijan Diary*, 272 - 275.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167 - 168, citing Michel Chossudovsky, "Macedonia: Washington's Military - Intelligence Ploy," Trans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eace and Future Research, [http://www.transnational.org/SAJT/forum/meet/2001/Chossudov\\_Washingt\\_Ploy.html](http://www.transnational.org/SAJT/forum/meet/2001/Chossudov_Washingt_Ploy.html).

③ Lernoux, *In Banks We Trust*, 72; cf. *Mother Jones*, March 1984.



会) 所批准。

不过, 中情局在泰国所培养的武装力量, 资金来源是毒品交易, 最后演变成了入侵老挝的暴乱势力, 这项行动可以完完全全不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丹尼尔·法恩曼 (Daniel Fineman) 指出:

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 倾向于为法国势力提供直接资助,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迫于 (1953 年) 9 月批准通过实施第一阶段行动 (“强化泰国反抗意志及能力”), 并无限期推迟第二阶段的执行, 即将心理作战带入邻国。<sup>①</sup>

阿格勒顿掌管的反情报科/专门调查小组伪造有关奥斯瓦德的文件, 虽然也许在初始阶段得到批准, 以合法手段搜寻传言在中情局的内奸, 然而却最终促成了约翰·F. 肯尼迪遇害阴谋的得逞, 而且事后还全部掩盖。此时此刻, 全球网络不再是支撑美国公共社会的力量, 它已经和破坏公众稳定的势力相互勾结。这时候, 亚洲的全球毒品网络正在为侵犯性不断增强的美国战争机器提供军事力量。

这个表里差距越发拉大的模式大可用来描述美国的深层机制。起初, 这种深层机制可从政策协调处一窥究竟,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该机构 (当时悄无声息), 从而促进了最初的海利维尔—中情局—黑帮之间的关联。1953 年, 该机构合并到中情局, 饱受争议的美国深层机制数年来都未能展现出权威应有的相对连贯统一、井然有序的权力集中, 而土耳其、意大利和哥伦比亚的深层机制, 甚至连某一时期的智利和阿根廷, 却体现出这一特性。与合法权利

<sup>①</sup>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179 - 180; c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12, No. 1: 689 - 690.



力量扑朔迷离的关系主要局限在阿格勒顿“翻版中情局”，1974年12月阿格勒顿被辞退，这种关系也随之消散。

但是在约瑟夫·特伦托看来，一个为狩猎俱乐部和沙特阿拉伯情报组织办事的“影子中情局”却间接地让这种关系复苏。20世纪80年代，这个“影子中情局”“不仅为以色列组织办事，还参与了从中美洲到伊朗的各项秘密行动”。<sup>①</sup>此时，理查德·史迪威（Richard Stilwell）——他是沙克利的搭档和政策协调处的老将，也是“行动方案”（Operation Paper）前任监管——在五角大楼创立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sup>②</sup>设立该组织的部分意图是想摆脱国会监管，这是之前丘奇委员会针对中情局改革所指定的一项措施。

当然，在卡西的首肯下——他本人就和拉帕波特、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以及全球毒品网络有着直接的关联，沙克利、哈绍吉还有他们一帮盟友最终推动了伊朗门事件。<sup>③</sup>沙克利的团伙中，至少有一人，即理查德·西科德，在当时建立了一家航空公司，将伊斯兰教圣战分子带入阿富汗。另一人，新保守主义者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不仅促成了伊朗门事件，还连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共同创立了新世纪美国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up>④</sup>

诚然，威廉·卡西执意要与这张全球网络合作，说得更具体些，与伊朗门事件中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西欧多尔·沙克利团伙合作，其中缘由绝非仅凭分析全球毒品网络便可知晓究竟。要想理解卡西行为背后的原因，就必须观察伊文·科里斯托尔（Irving

① Tren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410.

② Susan Lynn Marquis, *Unconventional Warfare: Rebuilding U. S.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156.

③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 - Contra Affair, 100th Cong., 1st Sess., House Report No. 100 - 433, Senate Report No. 100 - 216, 164.

④ Trento, *Prelude to Terror*, 283 - 284.



Kristol) 所称的 20 世纪 70 年代的智力反革命 (Intellectual Counterrevolution) 的背景, 这一时期, 基辛格和卡特竭尽心力创造出与苏联的外交缓和期,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 (Frank Church) 等人在水门事件后苦心经营的改革, 这一切被颠覆推翻。笔者曾在他处写道, 1975 年所谓的万圣节大屠杀事件是一个导火索, 引发众多事件, 其中包括阿格勒顿落得罪有应得的下场, 威廉·科比下台, 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部长, 基辛格长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日子画上了句号。<sup>①</sup>

1976 年, 智力反革命已经形成了崭新的反对基辛格的联盟, 其中包括: (1) 福特政府麾下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 (2) 当前危机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极力游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3) 理查德·珀里 (Richard Perle) 和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等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抵制基辛格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简称 SALT), 并且在中情局新任局长乔治·H. W. 布什的帮助下竭力夸大中情局对苏联威胁的评估。在结成反苏联联盟的过程中, 卡西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6 年, 连同其全球网络的长期搭档雷·克莱恩 (Ray Cline, 海利维尔在战略情报局位于昆明的老搭档)、杰伊·拉佛斯通和乔治·奥姆斯特德一起, 加入当前的危机委员会。

新保守主义右翼势力的反政府偏见继续恶化, 其对中情局越发不满, 此时的中情局不再被视为盟友而是敌方。<sup>②</sup> 然而, 即便是诸如黑水公司 (Blackwater) 这样的私营安全公司, 新招募的外包性质的暴力分子, 其源头还是传统全球毒品网络中的暴徒——对黑水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52 - 53.

② See Rowan Scarborough, *Sabotage: America's Enemies within the CIA*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7); Kenneth R. Timmerman, *Shadow Warriors: The Untold Story of Traitors, Saboteurs, and the Party of Surrender* (New York: Crown/Random House, 2007).



公司尤甚，其招募的人都来自例如哥伦比亚等国的准军事组织。<sup>①</sup>

简而言之，对全球毒品交易非法暴力分子的依赖，起源于冷战动荡不安的早期，结果却延续下来，越发严重，四处蔓延，直至如今已经对宪法民主构成致命威胁。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想要参透缘由实为不易。就短期而言，非法暴力手段引发了反抗性的暴力冲突，从而为其存在正名——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的私人安全公司，常常可以获得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交易合同，去镇压那些由他们自己引发的抵抗行动。

不过，间接帝国的新体制貌似并不稳定：即便伊拉克局势暂缓，也只是因为那些抗争者发觉，在阿富汗，如果打仗，好处更多。不过，有些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缓解，结果，间接帝国成了政治的暴力替代品。

如果这个国家真心实意要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它就应当减少而非增加镇压力度，这已经导致阿富汗、伊拉克、车臣、克什米尔、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反抗性暴力事件源源不断。现今局势极有可能让原本就恶化的现状越发严重，即便是在我们的盟国，这也会加速美国资源、影响力和形象的衰退。

希望现状得以纠正是否是痴人说梦？如果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9·11”事件中，那群“丧尽天良”的阿拉伯人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这也许真的是痴人说梦。不过，如果制定更为理智的政策，也许世人便能明白，正如希贝尔·爱德蒙兹所暗示的，“9·11”事件背后藏着阴谋，与美国的全球毒品网络密切相关。

---

① “运作方式是黑水公司将赢得一份政府合同；接着公司将这笔业务外包出去——和灰石公司（Greystones）联手。灰石公司又去寻找其国际下设机构，如智利皮泽洛（Pizarro）的战略组织（Grupo Tactico），或是哥伦比亚的ID系统公司（ID Systems），他们都暗地里和行话叫作‘公文包猎头’的人保持往来。” Bruce Falconer and Daniel Schulman, “Blackwater’s World of Warcraft,” *Mother Jones*, March - April 2008. Cf. Jeremy Scal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8).



笔者所称的美国全球毒品网络，在过去曾是诸多世界性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例如“飞鹰计划”，它进一步巩固了其他国家政府的毒品网络，例如老挝、巴基斯坦、黎巴嫩、土耳其和哥伦比亚。数十年来，这个国家极力否认自己和这些勾当有所牵连，把责任推到苏联（“罪恶之国”）以及近期的伊拉克和伊朗（“罪恶轴心”）的恐怖分子身上。<sup>①</sup>

要想推翻这数十年的托词并不容易。然而对于控制恐怖主义，重建一个更清醒的世界，这一步不可或缺。

---

① 即便是在中情局内部，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也不断强化。克莱尔·斯戴林在其《恐怖主义网络》（*The Terror Network*）一书中宣称，“主要的恐怖组织都是由苏联控制的”。到了今天，这本书已经没有什么可信度了，不过在当时却备受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的推崇，还将其推荐给威廉·凯西，凯西又将该书的主要思想告诉给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凯西还委派中情局高级分析师和苏联问题专家以此书为基础，准备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专家们在报告中指出，斯戴林的言论压根站不住脚，凯西的副情报局长罗伯特·盖茨让新入职的一批基层员工改写重编了这份负面报告。See Mark Perry, *Eclipse: The Last Days of the CI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2), 47 - 49, 319 - 320. Today, Robert Gates is America's secretary of defense, reappointed to that position by President Obama.



## 第八章

# 战争机器内幕

# 暴力不绝的受益者

透过军事—产业结合，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政府的各类协会获得超乎常理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必须严加防范。权力错位，膨胀之后带来恶果，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并且将延续。我们一定不能让这些势力狼狈为奸，破坏我们的自由，或是阻碍民主进程。任何事情不可想当然。所有公民应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此，才能将庞大的工业军事国防体制与我们的和平道路和目标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安全自由和共同繁盛。<sup>①</sup>

全国选举对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AIC）的企业环境究竟会造成何种影响，笔者个人对此知之甚少。联邦开支的项目讨论重心时常变化，然而联邦总开支从未减少。尽管华盛顿政治领导层风云变化，但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却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sup>②</sup>

我们制定了一项美国军事原则。<sup>③</sup>

---

①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Military - Industrial Complex Speech," 1961,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eisenhower001](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eisenhower001).

② Former SAIC manager, in Donald L. Barlett and James B. Steele, "Washington's \$8 Billion Shadow," *Vanity Fair*, March 2007, <http://www.vanityfair.com/politics/features/2007/03/spyagency200703?currentPage=1>.

③ Ed Soyster, MPRI, *The Economist*, July 8, 1999.



## 大棋局神话：地缘政治学和 帝国权势狂

在《通往“9·11”之路》一书中，笔者从辩证角度分析了开放社会：社会如何凭借自身能量实现扩张，从而导致企业和机构变得愈发扑朔迷离，最终由于毫无必要的毁灭性战争使本国走向衰退之路。<sup>①</sup>

有些人认为，自文艺复兴之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纷纷落马，而现在美国已经处于这一阶段的末期。

笔者所撰写的内容总结了之前很多学者的思想，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然而，笔者低估了这一扩张过程的一个环节：控制权如何使国家狂妄自大、忘乎所以，误以为自己具备无人匹敌之力，而这一幻觉又是如何反过来演变成主流的意识形态，使人人信而不疑。笔者深感诧异的是，迄今为止，极少有人指出，从公众角度来看，这类意识形态完全是痴心妄想，甚至是丧失理智的。笔者将在本章论述，大众视角下的所谓癫狂之想，倘若是对一个更为狭隘的群体而言，则有利可图，这群处在战争体制内部的人，从暴力和情报私人勾当中牟取利益。

1919年，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就描述了英国统治者的霸主意识形态：“统治了东欧就控制了核心地带；统治了核心地带就控制了世界之岛；统治了世界之岛就控制了全球。”<sup>②</sup> 尽管此番言论发表时，英国权力已经开始衰落，可依旧准确传达了帝国规划者的处心积虑，他们沉湎于“博弈游

①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7-9.

②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olt, 1919).



戏”，最终在 1839 ~ 1842 年，将英国所有军队葬送在阿富汗的荒野之中。

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还有其他德国学者拓展了所谓的地缘政治“科学”，这一学科激发了希特勒毁灭性的“征服东方”的计划，瞬息间终止了纳粹第三帝国的千年宏图。有人也许会想，如今，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教训应该将这些幻想打击得体无完肤，不会再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控制“世界之岛”，更别说全球了。例如，基辛格似乎就总结了这一教训，他写道：“我所说的地缘政治是指一种注重平衡条件的方法。”<sup>①</sup>（主要是因为他毕生致力于世界秩序的平衡），基辛格还是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各种事件的发生而被踢到边缘，最终，诸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学者倡导的全球主导论思想占领上风。<sup>②</sup>

布热津斯基本人也承认，他在 1978 ~ 1979 年针对阿富汗构思的计谋，促使“基地”组织和圣战恐怖分子迎面还击。1998 年，当被问及是否为自己的冒险主义后悔，布热津斯基回答说：

后悔什么？那次秘密行动是个绝佳构想。它把俄罗斯人带入了阿富汗圈套，你还想让我后悔？苏联正式跨过领土边界的那天，我写信给卡特总统，着重提到：“我们现在有机会让苏联尝尝越南战争的滋味了。”

《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您也从未后悔自己支持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他们可是给未来的恐怖分子提供了武器和建议。”

① Henry Kissinger, in Colin S. Gray and G. R. Sloan.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Portland, OR: Frank Cass, 1999).

② 导致基辛格被边缘化的事件详情，请查阅 Scott, *The Road to 9/11*, 50 - 54.



布热津斯基：“世界史中什么才更为重要？塔利班还是苏联帝国瓦解？那些躁动不安的穆斯林教徒，中欧的解放，还是冷战的结束？”

当被问及宗教激进主义是否是世界的祸害时，布热津斯基回答说：“瞎扯！”<sup>①</sup>

从某种程度而言，阿富汗战争之后，布热津斯基对美国权力的期待变得更为小心翼翼：众所周知，1990年，他反对海湾战争，也在办公室里警告蠢蠢欲动的副总统切尼，不要对伊朗进行某些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他在1997年撰写的《大棋局》一书中依然大放厥词，暴露了“控制”亚欧核心地带的幻想。

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非亚欧大陆国家崛起，不仅成了亚欧权力关系的仲裁国，还成了世界霸主。苏联的失败和解体是美国这个西方半岛政权迅速崛起的最后一步，美国是唯一，诚然，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霸主。……

对于美国而言，主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就是亚欧大陆。……现在，亚欧大陆由一个非亚欧大陆国家主宰——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直接依赖于自身在亚欧大陆的统治时间和效率能否得以延续。……

如果倾听古代帝国那血腥朝代的回声，大可如此描述帝国地缘战略所倡导的三大当务之急：防范串通一气并保持封臣对安全的相互依赖，确保附庸国听命于我不受外侵，防止刁民蛮

<sup>①</sup> *Le Nouvel Observateur*, January 15–21, 1998. 布热津斯基不惜代价想要削弱苏联势力，因此说服卡特停止美国对巴基斯坦开发核武器的制裁 David Armstrong and Joseph J. Trento,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Bomb: The Deadly Compromise* (Hanover, NH: Steer–forth, 2007). 因此，布热津斯基总将苏联视为眼中钉，无意之中催生了“基地”组织及伊斯兰核武器这样的副产品。



族沆瀣一气。<sup>①</sup>

发布这种厚颜无耻言论的绝非布热津斯基一人。类似叫嚣单边独大的言辞不绝于耳，例如，1992年，新保守主义者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路易斯·“斯库特”·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为国防部部长切尼准备的《国防规划指南草案》（*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我们必须继续维持震慑机制，避免潜在竞争国扩大地区或全球势力，不能给它们哪怕只是想想的机会”<sup>②</sup>）；2000年制定的新美国世纪研究计划——“重建美国国防”，2002年9月布什一切尼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sup>③</sup>还有狂妄自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制定的《2020年共同愿景》（*Joint Vision 2020*）的战略文件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全方位的主导地位意味着美国军队的实力，单打独斗或是联手盟国，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击溃任何敌国，掌控整个局面。”<sup>④</sup>

这种自以为是的言辞脱离现实，危害甚大，痴心妄想，甚至可以说是疯癫乱语。却反映了美国的目标，并且美国为了追求这些目标不惜调动国家资源。这对于某些企业而言却是有利可图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早就习惯了在冷战中发财，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中，它们不得不面对美国国防和情报开支的大幅缩减。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团体（本章下文将论述）与它们想法一致，华盛顿执迷于保持主导权对这些组织而言大有可为。其中包括面对国防预算裁减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xiii, 30, 40.

② Memorandum of February 18, 1992, <http://www.gwu.edu/~nsarchiv/nukev/aul/ebb245/index.htm>.

③ See Scott, *The Road to 9/11*, 191-192.

④ “Joint Vision 2020 Emphasizes Full-Spectrum Dominance,” *Defense Link*,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45289>, emphasis added.



而出现的新型私营军队服务承包商，或可称为带有企业色彩的暴力组织。

布热津斯基那妖言惑众的狂言妄语和其著作所错误使用的隐喻词汇倒也贴切。“封臣”可绝非一只手就可轻松摆弄的。他们是有自我思想的人类，而在人类社会之中，权力超出公平范围，虽非必然，但却极有可能引发嫉恨，甚至最终招致成功颠覆。从亚洲就可见一二，例如，伊朗反对美国主义的演进。

那种由一位棋手独霸的想法同样也是荒谬错误的，尤其是在中亚地区，这里的主导性国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地区性国家都各有弱势。在这里，诸如 BP 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等跨国企业是主要的棋手。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他们的影响力更大，引导着地方权力及美国政府的行为，不论是官方台面还是地下暗箱，真正的地方势力在这两方面尤其擅长，而政府因对这两方面掌控乏力而声名狼藉：第一，曾因布热津斯基的忘乎所以而被嘲弄的“蠢蠢欲动的穆斯林派”；第二，非法走私，毒品走私尤甚。<sup>①</sup>

### 真正的大棋局：暴力不绝的得益者

然而，布热津斯基最终也没有局限在自己的棋局隐喻中。下棋是为了赢棋。布热津斯基的目标却截然不同：要永远限制中国权力，尤其是俄罗斯。因此，他非常理性地反对可能会威胁该目标的举动，如西方社会攻打伊朗，同时他支持能够长期遏制俄罗斯的举措，如建设一个西方阵营和天然气管道，形成围攻之势。1995年，布热津斯基飞抵阿塞拜疆，协助有关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天然气管道（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建设的谈判，该管道将阿塞

<sup>①</sup> 布热津斯基对伊斯兰圣战分子根本无所畏惧，因此，在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布热津斯基组建工作小组故意刺激穆斯林对苏联的不满情绪（Scott, *The Road to 9/11*, 70-71）。



拜疆和土耳其连为一体。<sup>①</sup>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论述过，布热津斯基（虽然毋庸置疑他从战略的角度自我思辨）因此提出了一项大大满足石油行业及其赞助者需求的政策。后者就包括他的赞助人洛克菲勒，正是此人首先帮助他和基辛格在全国打响名号。<sup>②</sup>

2001年3月，最大的几家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谢夫隆和壳牌）便有机会参与即将上任掌权者的能源战略制定，其中还包括中东政策，渠道是通过秘密参与切尼副总统的能源特别小组（Energy Task Force）。<sup>③</sup> 我们后来得知，该特别小组还制定了伊拉克油田地图，西南地区被化为九大“探索区”。2月，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一份文件便已经提出，切尼的特别小组将会考虑“采取行动，以发现未知的及已有的石油

① 他为自己说服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Aliyev）同意建设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天然气管道而感到自豪。（Zbigniew Brzezinski, “Geopolitically Speaking: Russia’s ‘Sphere of Influence’ —Chechnya and Beyond,”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Spring 2000, 24, [http://www.azer.com/aiweb/categories/magazine/81\\_folder/81\\_articles/81\\_brzezinski.html](http://www.azer.com/aiweb/categories/magazine/81_folder/81_articles/81_brzezinski.html)）. 这条非常有利于美英两国石油公司的管道，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经济因素，它让一个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地区更为混乱不堪。See Pepe Escobar, “Liquid War across Eurasia and the Asia - Pacific: Postcard from Pipelineistan,” *The Asia -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http://japanfocus.org/-Pepe-Escobar/3149>.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70 - 79.

③ Dana Milbank and Justin Blum, “Document Says Oil Chiefs Met with Cheney Task Force,” *Washington Post*, Nov. 16, 2005. 这篇报道指出，三大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罔顾事实而刻意否认：“白宫文件说明，数家大型石油公司的执行官与副总统切尼的能源特别小组曾于2001年会面——环境保护主义者早就怀疑此事，而就在上周，产业官员在国会上却予以否认。……上周，在参议院能源和商业两个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听证会上，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公司和康菲石油公司（Conoco Phillips）的首席执行官们均表示，其公司并未参与2001年的特别小组。壳牌石油主席宣称，‘据本人了解’，本公司并未参与该小组，BP美国公司首席说自己并不知情。白宫文件当中并未提及雪佛龙公司，不过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已经发现该公司是向特别小组‘提供详细能源政策建议’的众多公司之一。”



和天然气油田”。<sup>①</sup> 早些时候，石油公司就已经参加了一个非政府特别小组，该小组要求“针对如何评估伊拉克的军事、能源、经济和政治外交，立即开展政策探讨”。<sup>②</sup>

当然，推动攻击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绝非只有石油公司。“9·11”事件之后，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在五角大楼成立了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特殊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 OSP），不久便“与中情局以及五角大楼自身的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势均力敌，成了布什总统了解伊拉克是否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和“基地”组织有来往的主要情报来源”。<sup>③</sup> 政府领导层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得到了副总统切尼办公室路易斯·利比的支持，这大幅提升了其影响力，击败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的怀疑主义者：这两项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莫须有罪名，或是如一位评论家所称的“以信仰为基石的情报”，曾一度成为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有些人从未改变这些说辞，最著名的要数迪克·切尼。

许多记者也急不可待地推广特殊计划办公室的教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萨达姆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章，和特殊计划办公室一样，其消息完全依赖于伊拉克流亡者阿迈德·沙拉比（Ahmed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188 - 89, citing Linda McQuaig, “Crude Dudes,” *Toronto Star*, September 20, 2004; Jane Mayer, “Contract Sport,” *New Yorker*, February 16 - 23, 2004.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189; “Strategy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of the James A. Baker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ask Force, 40, *emphasis added*.

③ Seymour M. Hersh, “Selective Intelligence: Donald Rumsfeld Has His Own Special Sources. Are They Reliable?” *New Yorker*, May 6, 2003.





Chalabi) 的言论。<sup>①</sup> 米勒书籍的合著者劳里·麦尔罗伊 (Laurie Mylroie) 更甚, 此人认为: “萨达姆不仅是 1993 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幕后黑手, 而且在过去十年里, 每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 他都难逃干系, 包括轰炸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俄克拉荷马市政府大楼被炸为平地以及“9·11”事件。”<sup>②</sup> 这些鼓吹者, 尤其以费斯、利比和麦尔罗伊最为有名, 他们都和以色列有关联, 与石油公司别无二致, 都有动机希望美国军队能够以军事手段在中亚站稳脚跟。<sup>③</sup>

### 私人军事承包商, 以暴力为营利手段

美国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所采取的错误军事回应, 已经引起了很多反恐专家的注意, 例如已从美国军队退休的安德鲁·巴塞维奇 (Andrew Bacevich) 上校称: “为应对伊斯兰暴力激进分子而发起全球战争的概念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应该入侵占领他国。这无法根除威胁。相反, 这会让国家破产, 军队灭亡。”<sup>④</sup>

① Michael Massing, “Now They Tell U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6, 200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6922>.

② Peter Bergen, “Armchair Provocateur—Laurie Mylroie: The Neocons’ Favorite Conspiracy Theorist,” *Washington Monthly*, December 2003, <http://www.washingtonmonthly.com/features/2003/0312.bergen.html>.

③ For Israel links, see Michael Lind, *Made in Texa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139 (Feith);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166 (Libby); Michael Isikoff and David Corn, *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 (New York: Crown, 2006), 68 - 70 (Mylroie).

④ Jon Wiener, “Obama’s Limits: An Interview with Andrew Bacevich,” *The Nation*, August 28, 2008, [http://www.thenation.com/blogs/notion/350252/obama\\_s\\_limits\\_an\\_interview\\_with\\_andrew\\_bacevich](http://www.thenation.com/blogs/notion/350252/obama_s_limits_an_interview_with_andrew_bacevich). Cf. Andrew Bacevich,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转下页注))



由于预算缩紧，伤亡惨重，人们对战争深恶痛绝，美国只好重新利用难以驾驭的附属组织，作为其在边远地区行使公共权力的代言人。笔者将在本章节中着重关注其中一家所谓的私人军事承包商（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PMCs），这些承包商以雇主名义开展各类暴力活动。这些组织令人回想起曾经四处掠夺的雇佣兵，或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些富裕的城市和州所雇用的私人军队。<sup>①</sup>

回望历史，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雇佣兵原本是被雇来遏制暴力的，但结果这些臭名昭著、恣意妄为的雇佣兵反而为暴力火上浇油。在未受雇用前，他们中有些人简直就是嗜血成性的强盗土匪。另有些人转而调头攻击祖国，例如受人爱戴的法里纳塔（Farinata），但丁（Dante）还将此人写入《神曲三部曲》之《地狱》（*Inferno*）。毕竟，这些雇佣兵真正的集合之力意味着，随着局势变化，他们开始向自己名存实亡的雇主讨价还价。<sup>②</sup>（他们是早

---

（接上页注④）Books, 2008）。迈克尔·舒尔（Michael Scheuer）也提出，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反恐之战实际是向后倒退了一大步。Scheuer, “Experts Fears ‘Endless’ Terror War,” *MSNBC*, July 9, 2005, <http://www.msnbc.msn.com/id/8524679>. 彼特·伯根也认同：“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让很多圣战分子甚为高兴。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他们的行动——外部受阻且内部分裂——可能在9月11号之后的一年左右就要彻底失败。”Bergen, “The Jihadists Export Their Rage to Book Pages and Web Pag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1, 2005. Richard A. 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246. “美国无端向这个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仅此一件事，就足以让基地组织和新一代的各种类似团体借着绝佳理由招兵买马。”

① 笔者绝对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相似性的人。See, e. g., Thomas Jäger and Gerhard Kümmel,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Chances, Problems, Pitfalls and Prospects*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22; Eugene B. Smith, “The New Condottieri and US Policy: The Privatization of Conflict and Its Implications,” U. S. Army War College, *Parameters*, Winter 2002, <http://www.carlisle.army.mil/usawc/Parameters/02winter/smith.pdf>, 104.

②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74), 22.



期暴利企业的代表，遏制他们搞破坏的最常见方法就是“通过贿赂逃避问题”。<sup>①</sup>)

为了缓解五角大楼资源有限的压力，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中大范围利用私人军事承包商。美国向伊拉克发起战争时，私人军事承包商雇用的人员一度达到十万人次，到2010年阿富汗战争期间，雇佣人数与此不相上下。在针对这两个国家的战争中，他们中有些人还参与了一些备受争议的事件，例如伊拉克阿布扎比监狱丑闻，以及费卢杰4名合同工被杀害焚尸。2007年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案，在灭火过程中，八位伊拉克平民命丧黄泉，之后，伊拉克政府便吊销了最具争议性的公司——黑水公司(Blackwater)的营业许可证。<sup>②</sup> [经过多次负面曝光之后，2009年，黑水公司将自己的正式名称改为未知世界(Xe Worldwide)，不过原名仍在使用。]

忽视公众对诸如黑水公司这样的私人军事承包商的舆论谴责，是这些公司和五角大楼动机的差别所在。拉姆斯菲尔德和驻伊拉克军队所扬言的目标是要终止那里的暴力行径，然而显而易见，暴力持续上演时，私人军事承包商却能发战争财。因此，部分最大的私人军事承包商也就成了奉行遭人诟病的“反恐之战”的政治支持者。

黑水公司是最臭名远扬的一个例子。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是该公司的创立者和唯一所有人，他的家族是共和党以及诸如国家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等右翼机构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妹妹曾告诉媒体，“我们家族为国家共和党提

① Donald J. Kagay and L. J. Andrew Villalon, eds., *Crusaders, Condottieri, and Cannon*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286.

② “Iraq Reviewing Security Firms after Blackwater Shooting,” FoxNews.com, September 18, 2007,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297153,00.html>.



供了最大的现金支持”。<sup>①</sup>

黑水公司是美国右倾势力的副产品，美国主流媒体对其不吝批评。但是，它绝非是大棋局上的唯一一颗棋子，不过它有实力左右整盘棋局。较少受到注意的是特勤 LLC 公司（Diligence LLC）。与黑水公司不同，该公司和华尔街来往甚密，（2003 年 7 月）在巴格达设立企业，为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公司提供安全服务。12 月，该公司新建子公司——特勤中东（Diligence Middle East），服务内容也扩展到屏蔽、审核培训地方雇员、为企业客户提供日常情报消息。<sup>②</sup>

笔者个人推测，诸如特勤公司这样的机构，完全有能力从伊拉克战争中获益，并为战争火上浇油，甚至也有手段为引发战争推波助澜。

自然而然，特勤公司的政治影响力已经盖过了黑水公司。该公司的两位创立董事兰尼·格里菲斯（Lanny Griffiths）和艾德·罗杰斯（Ed Rogers）同时还建立了极具影响力的共和党游说集团——巴伯尔—格里菲斯—罗杰斯组织（Barbour Griffiths and Rogers，后更名简称为 BGR）。哈利·巴伯尔（Haley Barbour）是该组织的资

① “之前，贝琪·普林斯（Betsy Prince）——埃德加（Edgar）和艾沙（Elsa）的女儿，埃里克的妹妹——嫁入了迪弗斯家族（DeVos），这个家族是共和党及保守派事业最大的资助者之一（‘我对现金赞助的了解不多，只知道我们家族是国家共和党最大的现金赞助人之一’，贝琪·迪弗斯 1997 年在美国国会《点名报》（Roll Call）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1996~2000 年，2003~2005 年，贝琪担任密西根共和党主席，其丈夫迪克（Dick）在 2006 年曾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密西根州长。埃里克·普林斯本人在给共和党以及在与保守派重要人物拉关系时，非常慷慨。他和第一任及第二任妻子为共和党候选人及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约 30 万美元。” Ben Van Heuvele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Ties to Blackwater,” *Salon*, October 2, 2007, [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07/10/02/blackwater\\_bush](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07/10/02/blackwater_bush). Cf. Robert Young Pelton, *Licensed to Kill, Hired Guns 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Crown Books, 2006); 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ew York: Nation Books/Avalon, 2007). 2009 年 3 月 30 日，埃里克·普林斯宣布，自己将不再担任未知世界首席执行官职务。

② David Isenberg, “Corporate Mercenaries—Part 2: Myths and Mystery,” *Asia Times*, May 19,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FE20Ak02.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FE20Ak02.html).



深创始人，1993 ~ 1997 年还担任共和党国家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主席。

特勤 LLC 公司在伊拉克注册，并以私人军事承包商身份从事商业活动。而由于该公司其实是中情局的附属，因此大可称为私人情报承包商（Private Intelligence Contractor, PIC）。<sup>①</sup>

特勤公司由威廉姆·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创建，他是唯一一位领导中情局和 FBI 两家机构的人。麦克·贝克（Mike Baker）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效力中情局 14 年，担任实地秘密特工，负责反恐和反暴乱行动。惠特利·布鲁纳（Whitley Bruner）是该公司驻巴格达首席行动官，曾担任中情局驻伊拉克首席代表。<sup>②</sup>

它在特勤中东公司的合作伙伴是新桥战略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纽约时报》认为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希望前往伊

---

① 黑水公司的所有人埃里克·普林斯，旗下还有一家私人情报承包商——整体情报处理公司（Total Intelligence Resolutions），该公司的共同所有人还包括 J. 科夫·布莱克（JCofer Black）（曾担任中情局反恐中心的主任），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er）（曾担任中情局行动理事会副会长），以及恩里克·“瑞克”·普拉多（Enrique “Ric” Prado）（曾供职于中情局反恐中心），而更早前曾就职于中情局“准军事”特别行动小组（Special Operations Group）。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CIA Assassins?” *The Nation*, August 20,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90831/scahill1> .

② David Isenberg, “Myths and Mystery,” *Asia Times*, May 20, 2004. 在中情局期间，布鲁纳为阿迈德·沙拉比与中情局相互合作牵线搭桥。Aram Roston, *The Man Who Pushed America to War*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9), 76. 后来，布鲁纳加入巴伯尔-格里菲斯-罗杰斯组织，2007 年，他担任 BKI 战略情报组织（BKI Strategic Intelligence）全职主席。2004 年，布鲁纳与巴伯尔-格里菲斯-罗杰斯组织及一位以色列私人军事承包商一起合作，帮助乔治·W. 布什再度竞选。Laura Rozen, “From Kurdistan to K Street,” *Mother Jones*, November 2008,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08/11/kurdistan-k-street>.



拉克从商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其中包括那些企图让纳税人埋单的重建项目中分杯羹的企业”。<sup>①</sup>《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如此描述了其政治影响力：

新桥战略公司创建于(2003年)5月，并引发公众关注，因为其董事会成员中有不少是共和党要员——绝大多数均与布什政府机构(官员)或其家族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中包括乔治·H.W. 布什总统竞选宣传总监乔·艾尔巴(Joe Allbaugh)，以及之前乔治·H.W. 布什的同僚艾德·罗杰斯和兰尼·格里菲斯。<sup>②</sup>

巴伯尔、格里菲斯、罗杰斯的公司是特勤公司的首位赞助商，特勤公司、巴伯尔—格里菲斯—罗杰斯组织以及新桥战略公司同在距离白宫四个街区的同一栋楼同一楼层里。《金融时报》认为，新桥战略公司能够拿下合同，完全仰仗着与总统的兄弟奈尔·布什(Neil Bush)的关系。<sup>③</sup>克林顿白宫幕僚参谋长马克·麦克拉迪(Mack McLarty)辞职之后，他开始担任特勤公司主管，同时还和亨利·基辛格共同领导基辛格—麦克拉迪协会，直至2008年。

① Douglas Jehl, "Washington Insiders' New Firm Consults on Contracts in Iraq,"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03.

② *Financial Times*, Dec. 11, 2003. 特勤公司副主席艾德·罗杰斯是乔治·H.W. 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头号助理之一。从白宫卸任之时，他谈下一单大生意，为前任沙特情报局长以及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挂名负责人卡马尔·亚当担任游说人，当时，英美两国的监控官正打算起诉其犯罪。罗杰斯借用阿德南·哈绍吉为中间人，从而拿下这份合同，不过在白宫对此提出批评之后，这单生意被取消。Peter Truell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362-364.

③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1, 2003. Cf. *Mother Jones*, March/April 2004: "最近，布什与新桥战略公司一位高级顾问达成一项年价值高达6万美元的咨询协议，该公司是乔治·W. 布什前任竞选经理设立的，'旨在把握'战后伊拉克的'经济机遇'。他的工作内容是：每周电话3小时。"



历史最为悠久的，规模最大的私营国防承包商恐怕要数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1940年，美国军队雇用这家管理咨询公司（援引该公司官网措辞）目的是，“现在协助国家准备战斗，未来协助国家恢复和平”。1953年，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受雇于美国政府，研究重编菲律宾土地所有权记录，以协助中情局官员爱德华·兰斯戴尔（Edward Lansdale）在当地主持的反起义项目。<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该公司还为中情局传奇特工麦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提供了临时住所和虚假身份，此人后来成了同样极具传奇色彩的中情局摇钱树阿德南·哈绍吉的专门情报官员。<sup>②</sup>

2006年，该公司已经在全球拥有18000名雇员，其中包括〔依据2002年《信息周刊》（*Information Week*）数据〕超过1000名前情报官员。<sup>③</sup> 该公司与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关系密切，后者上任时深知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经济机遇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主管时，便聘用该公司重组经济机遇办公室，将很多项目否决或外包。该公司深受拉姆斯菲尔德的器重和信任，2004年被安排协助布什总统准备国防预算计划。……而

① Tim Shorrock, *Spies for Hire: The Secret World of Intelligence Outsourc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40, 41.

② 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的两位官员也是拿骚天堂岛桥梁公司的受益人，另外还有休闲国际的詹姆斯·克罗斯比，休闲国际这家公司为中情局与保罗·海利维尔、迈耶·郎斯基地下组织的关联遮掩（敬请参阅第七章）。理查德·尼克松在天堂岛桥梁公司那里也有经济利益。Anthony Summers with Robbyn Swann, *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Viking, 2000), 244-245.

③ Shorrock, *Spies for Hire*, 43, citing *Information Week*, February 25, 2002. 2008年，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一分为二：处理政府业务的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大部分由私人证券公司卡利乐集团（Carlyle Group）持有；布茨公司（Booz & Company）拥有商业合同，被收购并以合作伙伴形式运作。



作为美国司令部（Central Command）的顾问，该公司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发挥了核心作用。<sup>①</sup>

另一位评论员指出，在拿下合同协助规划国防预算之前，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早在过去六年里，就已经从国防部获得了价值超过 30 亿美元的合同。<sup>②</sup> 在布什当政的最后两年里，该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迈克·麦康内尔（Mike McConnell）向公司请假并担任政府国家情报机关第二主管。

另一家私人情报承包商是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市值高达 80 亿美元，主要合同业务包括国防、情报和国家安全。记者唐纳德·巴莱特（Donald Barlett）和詹姆斯·斯蒂勒（James Steele）是退伍军人，按照他俩的描述：

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已经展现出世间少有的能力，可以在任何可能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它是国家安全部门这面大墙背后隐形的手——作为政府一部分，该领域获得的资金没有上限，每次哪位政治家口出“恐怖主义”一词，其不断膨胀就有了保障。换言之，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代表了一家已然成为某种永久政府的私营企业。……（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体现出比艾森豪威尔最恐怖梦魇还要令人颤栗的东西——“军事—工业—反恐体系”。<sup>③</sup>

① Shorrock, *Spies for Hire*, 51.

② Elizabeth Brown, “Outsourcing the Defense Budget: Defense Contractors Are Writing the President’s Defense Budget,”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July 29, 2004, <http://projects.publicintegrity.org/report.aspx?aid=363&sid=200>.

③ “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雇用 44000 人，收入 80 亿美元。该公司的主要商品是人力资源，包括伊拉克战争背后的众多‘专家’……（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是一家‘秘密公司’，手上有 9000 份政府合同，很多还牵扯到机密情报工作。” Donald L. Barlett and James B. Steele, “Washington’s \$8 Billion Shadow,” *Vanity Fair*, March 2007, <http://www.vanityfair.com/politics/features/2007/03/spyagency200703?currentPage=1>.



(两人之后的文章明确说明，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并非一家统一的官僚机构，相反，更像是一个为单个企业赢取合同的平台：“你在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基本工作就是要向所有政府机构销售高科技理念，提供创新性技能，让这些机构掏腰包购买，刺激它们的购买欲望。”<sup>①</sup>)

罗伯特·M. 盖茨 (Robert M. Gates) 在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前，曾是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成员。该公司的雇用人员主要来自中情局、美国国安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国家安全机构的数十位要员都曾在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拿薪水，其中包括约翰·M. 达奇 (John M. Deutch)，他曾是吉姆·卡特总统麾下的能源部副部长，并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中情局局长；海军少将威廉姆·F. 拉本 (William F. Raborn，约翰逊总统时期的中情局局长)，曾负责指挥“北极星”潜艇的开发；海军少将鲍比·雷·英曼 (Bobby Ray Inman)，曾先后担任美国国安局局长、中情局副局长和国防情报局副局长。<sup>②</sup>

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还提供了有关萨达姆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从而为自己在伊拉克赢得了数量可观的合同项目。

① Barlett and Steele, "Washington's \$ 8 Billion Shadow."

② Barlett and Steele, "Washington's \$ 8 Billion Shadow": "1999年，马可·A. 波斯特 (Mark A. Boster) 辞去副助理大法官一职，加入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三个月之后，他就代表新东家到访司法部——这违背了联邦法律。波斯特为一项民事调解支付三万美元。" 有一段时期，另一家私人情报承包商因特洛普公司 (Interop) 将中情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 (James Woolsey)、FBI 前局长路易斯·弗里 (Louis Freeh) 及摩萨德前局长丹尼·亚托姆 (Danny Yatom) 聚到了一起 (Rozen, "From Kurdistan to K. Street")。



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员工诱使人们认定，萨达姆·侯赛因所统治的伊拉克储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想斩草除根就必须诉诸武力。当并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该公司组建委员会，以期调查为何美国情报出现如此致命错误。负责调查的委员会副主席戈登·奥勒（Gordon Oehler）是为中情局效力 25 年的老将；杰弗里·R·库珀（Jeffrey R. Cooper）是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一家下属机构的副总裁和首席科技官员；萨缪尔·维斯纳（Samuel Visner），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副总裁，主要负责企业发展，曾数次供职于美国国安局。后来领导伊拉克调查小组（Iraq Survey Group，该小组指出，侯赛因并未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证明这场战争的缘起纯属捏造）工作的大卫·凯（David Kay）也是该公司的股东，曾担任该公司反恐技术分析中心（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 Technology and Analysis）的主任。<sup>①</sup>

毋庸赘言，这个以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成员为主导的委员会绝不会指出公司本身就是问题的一大症结。不过依照巴莱特和斯蒂勒的看法，1998 年这位大卫·凯曾向参议院军队服务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报告称，萨达姆·侯赛因“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旧当政”，因此“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他警告道，除非美国现在立即行动，“否则这个全球头号军事大国将受人钳制”。

后来的四年里，凯和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其他盟友们不断强调伊拉克的威胁。退役将军维恩·唐宁（Wayne Downing）是阿迈德·沙拉比的密友，他竭力游说要攻打伊拉克，认为伊拉克人

<sup>①</sup> Charlie Cray,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rp Watch*, <http://www.corpwatch.org/section.php?id=17>; cf. Barlett and Steele, "Washington's \$8 Billion Shadow."



“在海外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将无所不用地来攻打我们”。这位退役将军在网络或有线电视媒体出现时，多数时候是被简要定位为“军事分析家”。其实媒体应该更准确地介绍他，他是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公司股东。

“9·11”事件，对于上千个家庭而言是民众的惨剧，对于整个美国而言是国之灾难，可对于这家公司而言却是喜出望外。袭击事件爆发之后，布什总统启动全球反恐战争，其主要结果是向那些声称自己将为此有所作为甚至鞠躬尽瘁的公司注入上百亿美元资金。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早已万事俱备。四年前，该公司就预见到政府下一个开支重点，于是就成立了反恐技术分析中心。根据该公司的说法，成立该附属中心的目的在于“从全面视角分析恐怖分子威胁，其中包括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乎寻常的危险爆炸物以及影响国家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2006年10月，该公司言之凿凿地向潜在投资者说，“反恐之战是一个大有可图的增长型产业”。<sup>①</sup>

巴莱特和斯蒂勒曾提到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高级分析师弗利茨·厄马斯（Fritz Ermarth），从盖茨就职于中情局到后来担任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官员，两人就一直保持长期联络。2003年，厄马斯评论过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他赞同鲍威尔指控萨达姆持有“用于离心机而非火箭研究”铝管的说法（这些指控其实重复朱迪思·米勒的虚假报道）。不过厄马斯指责鲍威尔未曾提及两件事：一是，伊拉克参与了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劳里·麦尔罗伊提出的这一指控如今受到质疑）；二是，“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及其盟国为西欧和土耳其的恐怖分子撑腰”[暗指罗伯特·盖茨和克莱尔·斯戴林一度提出的有关莫梅特·阿里·阿加（Mehmet Ali Ağca）图谋暗

<sup>①</sup> Barlett and Steele, “Washington’s \$ 8 Billion Shadow.”



杀教皇保罗二世的造假指控]。<sup>①</sup>

笔者自然不会认为，单靠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一家之力就点燃了攻打伊拉克的战火。国防项目承包商、石油公司、私人军事承包商和私人情报承包商互相勾结，从而激发了主导欲望，进而控制了所有那些恋栈权力的人，笔者不得不承认，其中也包括力图飞黄腾达的学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就类似上一代的越南和老挝，要确保能渗入华盛顿决策层，就是要支持干预，即使连普通路人也能看出这将祸害无穷。

学术机构的点头附和甚至也推动了情报行业私营化，笔者上文对此有所论述。在政治学家安娜·林德（Anna Leander）看来，

私营公司不仅提供情报而且还分析情报。私营机构的译员、分析师和“审讯员”被聘用，例如 Titan 公司和 CACI 公司就曾参与阿布贾里布监狱（Abu Ghraib）丑闻。还有更为直接的，一些私营公司被聘来分析威胁风险，并提出应对建议。这包括由特勤 LLC 公司和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制定的国家安全情况图，这两家公司主营业务便是情报搜集和分析。……情报行业的私营化对私人军事承包商和国家安全话语权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直接影响。它让私人军事承包商有能力直接构建这些话语权。它们提供的消息愈来愈多，已经成了判断某事究竟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衡量基础。

林德总结道，这种私营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它“强化了人们从军事角度对安全的理解，反过来又让私人军事承包商成了尤为合法

<sup>①</sup> Fritz W. Ermarth, "Colin Powell's Briefing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Brief Comments from an Ex - Intelligence Officer,"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inthenationalinterest.com/Articles/Powell% 27s% 20UN% 20Speech/Powell% 27s% 20UN% 20speech% 20ermarth.html](http://inthenationalinterest.com/Articles/Powell%20UN%20Speech/Powell%20UN%20speech%20ermarth.html). 劳里·麦尔罗伊也转述了厄马斯的说法，"Fritz Ermarth, Iraq & Al Qaeda,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5, 2003, [http://www.mail - archive.com/sam11@erols.com/msg00040.html](http://www.mail-archive.com/sam11@erols.com/msg00040.html).



的安全专家”。<sup>①</sup>

另一位政治学家查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他更为严厉地评判了升级论的观点，并认为，针对伊拉克的威胁“通货膨胀”，并没有在“思维市场”中得到有效监管。他为这种失败提出了五个原因，他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一些政治学家的充分支持。但是，这五个原因并未包括巴莱特和斯蒂勒所提出的一个明显理由——利益。<sup>②</sup>

前任中情局分析师、退伍军人雷蒙德·麦戈文（Raymond McGovern）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是如何引发腐败的，他在向乔治·H. W. 布什总统递交的一份中情局每日讯息中写道：

让一位政府分析师描述事实真相，且与总统有所距离，都已困难重重。那么，对于一位为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或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工作的分析师而言，其难度更甚。员工放任自我，改动分析结果，迎合承包商喜好。……承包商的立足点是金钱。<sup>③</sup>

## 假标记操作、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和国内监视

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假借专家之名却行鼓吹之实。据说特

- 
- ① Anna Leander, "The Power to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3, 2005, 803. 《观察家》（*Observer*）报道，根据“布什政府的消息来源”，“在开罗被关押和审讯的基地组织网络成员，曾在捷克共和国获取炭疽药瓶”。“Iraq ‘behind US Anthrax Outbreaks’,” *Observer*, October 14, 2001,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1/oct/14/terrorism.afghanistan6>.
- ② Chaim Kaufmann, "Threat Infl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4, [http://muse.jhu.edu/journals/international\\_security/v029/29.1kaufmann.html](http://muse.jhu.edu/journals/international_security/v029/29.1kaufmann.html). 他的文章当中没有提及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和特勤公司。
- ③ Shorrocks, *Spies for Hire*, 36-37.



勤 LLC 公司和其盟友在海外的同伙被指开展假标记行动，以燃起战火。尽管每每想起我们便不寒而栗，然而显而易见，我们在美国其实早已经历过至少一次的、伤害无辜平民的致命性假标记行动。笔者所指的是 2001 年的炭疽邮件事件，起初 FBI 怀疑此事与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斯蒂芬·哈特费尔（Steven Hatfill）有关，后来又将目标转向美国政府位于底特里克堡（Fort Detrick）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SAMRIID）的布鲁斯·伊文斯（Bruce Ivins）。哈特费尔曾在该实验室工作，他本人和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有业务往来。<sup>①</sup>《沙龙》（Salon）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谈到底特里克堡时指出，“炭疽邮件本身来自这家美国实验室，指责伊拉克是发送这些邮件的罪魁祸首的虚假报告也来自这家实验室”。<sup>②</sup>

曾收到致命性炭疽邮件的两位参议员——达什利（Daschle）和莱伊（Leahy）均为民主党人，两人最早对仓促提出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 Bill）提出了质疑。<sup>③</sup> 遭遇了炭疽恐慌之后，两

① Marilyn W. Thompson, “The Pursuit of Steven Hatfill,”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3 (Hatfill - SAIC). 当时，劳里·麦尔罗伊在 CNN 表示：“要想制造致命性的炭疽，必须是相当专业高端的机构才能办到。没有多少政党组织有这实力。”萨达姆·侯赛因“仍旧以恐怖主义形式继续着战争。炭疽不太可能仍旧藏在信件中。可能的情况是，炭疽被放在城市地铁里，或是在美国建筑物的排气系统里。萨达姆想报复我们。我们怎么对伊拉克，萨达姆就要怎么对美国”。CNN, October 29, 2001, <http://archives.cnn.com/2001/COMMUNITY/10/29/mylroie>.

② Glenn Greenwald, “Vital Unresolved Anthrax Questions and ABC News,” *Salon*, August 1, 2008, <http://www.salon.com/opinion/greenwald/2008/08/01/anthrax>.

③ Cf. *Time*, November 26, 2001: “参议院多数派领导达什利，被列为瞄准民主党乃至整个参议院的打击对象，莱伊也被列入名单的理由则没有太多广泛性，更多是因为特定缘由。他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会长，该委员会负责反垄断、反恐立法等各项事务。” See also Anthony York, “Why Daschle and Leahy?” *Salon*, November 21, 2001, <http://dir.salon.com/story/politics/feature/2001/11/21/anthrax/index.html>.

人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该法案。法案通过之后，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合同商们迎来了新的利益空间——对美国公民实施监视——同时还联合形成了新的情报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作为五角大楼国内安全任务的一部分，前任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2002年组建了反恐实地行动办公室（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 office），工作人员主要是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BAE集团、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以及其他经过审批的劳务供应商。一如我们所见，反恐实地行动办公室的宗旨是发现涉嫌对布什政府图谋不轨的人，以及这些人的行动方针。……目前，美国共有43家已建和将建的联合中心，中心的反恐分析师们将共享并分析来自情报机构、FBI、地方警局、私营数据库和匿名情报贩子的各种数据。……根据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说法，这个项目为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获取了“一手遮天的国内监视权”。<sup>①</sup>

这些联合中心，“将军队、FBI、各州警局以及其他机构连为一体，在体制内部得到了美国陆军大力推崇，以防止军队监视国民的工作遭到限制”。<sup>②</sup> 2009年3月，面对这些谴责，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Napolitano）指出，这些联合中心的任务绝非是要开展独立的监视国民的行动，而是要将合法获取的信息整合起来，这些信息早已经四分五裂地散落在“各自为政”的数据库中。<sup>③</sup> 她并

<sup>①</sup> Shorrock, *Spies for Hire*, 344.

<sup>②</sup> Julian Assange, “The Spy Who Billed Me Twice,” Wikileaks, [http://wikileaks.org/wiki/The\\_spy\\_who\\_billed\\_me\\_twice](http://wikileaks.org/wiki/The_spy_who_billed_me_twice). 2009年3月军队手册《美国警力情报行动部队行动理念》（*US Army Concept of Operations for Polic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提到：“这（联合）不包括对美国军事情报行动的限制，因为其具体实施受到警力原则和标准的限制和监管。”

<sup>③</sup> Phil Leggiere, “Napolitano Praises Fusion Centers,” *HSToday*, March 13, 2009, <http://www.hstoday.us/content/view/7616/149>.



未提及，有些所谓的信息来自私营机构甚至来路不明。

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其中一位承包商尼奥玛·塞克 (Neoma Syke) 曾在一家联合中心工作，身兼二职。“2003 ~ 2004 年，她在‘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工作’，为‘该公司’第 205 号军队情报营项目 (205<sup>th</sup> Military Intelligence Battalion) 担任军队保护分析师。塞克担任‘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承包商’期间，确切地说，为‘该公司’第 205 号军队情报营项目工作时期，她显然还在美国太平洋陆军 (US Army Pacific, USARPAC) 危机行动中心 (Crisis Action Center) 担任反情报检察官”。<sup>①</sup>

### 特勤 LLC 公司的俄国伙伴：阿尔法银行 (Alfa Bank) 和远西有限公司 (Far West Ltd)

被严厉指责涉嫌蓄意误导的还有特勤 LLC 公司在海外的合作伙伴以及在俄罗斯的盟友——特别是一家和情报相关的小型私人军事承包商——远西有限公司。

特勤公司在俄罗斯的主要跨国联系机构是阿尔法银行。2001 ~ 2007 年的特勤公司总裁是前任美国大使和军队谈判员理查德·伯特 (Richard Burt)，他和巴伯尔—格里菲斯—罗杰斯组织以及基辛格协会均有关联。伯特是一位新保守主义者，曾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是“对俄罗斯的一大恩惠”，他还是阿尔法银行莫斯科高级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阿尔法银行在华盛顿的势力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它旗下的图曼石油公司 (Tyumen) 依靠哈里伯顿 (Halliburton) 的游说从美国进出口银行 (US Export-Import Bank) 获取了 4.89 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克林顿) 白宫和国务院曾试图否决这笔和俄

<sup>①</sup> Assange, “The Spy Who Billed Me Twice.”





罗斯的交易。然而在哈里伯顿的强力游说之下，美国国会（当时由共和党控制）推翻了否决。……国务院的担忧主要基于，图曼公司受控股集团阿尔法集团（Alfa Group）掌控，经俄罗斯调查，该集团与黑手党有来往。<sup>①</sup>

在某个时期，哈里伯顿和特勤的领导们是阿尔法在华盛顿的盟友和“保护伞”，他们被指曾与位于俄罗斯的一个黑色团伙有接触，而该团伙又和阿尔法过往甚密，早在1998年，该团伙便将自己打造成为俄罗斯远西有限公司（如今称为远西 LLC 公司）。<sup>②</sup>

远西公司的总裁弗拉基米尔·费林（Vladimir Filin）曾在一次媒体访谈中介绍公司的业务和支持者。他说，

远西公司负责从阿富汗将企业货物安全运送至黑海各港口，我们在阿富汗设有办公室……不过最具商业价值的路线要数从巴格拉姆（Bagram）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和玛噶斯（Magas）[玛纳斯（Manas）] 的美国空军基地。顺便说一句，它离位于坎特（Kant）的俄罗斯空军基地非常近。大量的货运船要穿过玛噶斯，那里适合商业航运。这是一笔大买卖，比起从阿富汗穿过塔吉克斯坦的商业货运线路更能营利。因此，我们去年将所有通过塔吉克斯坦的水上运输全部撤销，也关闭了我们在那里设立的办公室……

至于我们的伙伴是谁则是商业秘密了。不过我可以介绍的是，他们是来自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四家私营企业，除了船舶运输，它们还有其他业务。其中一家是一个美国知名集团的分支。该公司也是我们的共建者。<sup>③</sup>

① “Cheney Firm Won \$3.8bn Contracts from Government,” *Observer*, July 21, 200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2/jul/21/globalisation.georgebush>.

② *Novyi Region*, November 27 - 30, 2006; English summary in “U. S. Companies I, inked to Vice - President Cheney Supervised the Transfar of Ukrainian WMD to Iran,” *Left.ru*, <http://www.left.ru/burtsev/ops/novyiregion.phtml>.

③ *PravdaInfo*, September 2, 2005, <http://www.pravda.info/news/3601.html>.



远西公司的敌对者“尤里·亚谢涅夫”(Yuri Yasenev, 网络上的一个假名)指出,远西公司的美国伙伴们是:

——“克洛格—布朗—鲁特”(Kellogg, Brown & Root, KBR 哈里伯顿公司)——在哥伦比亚、阿富汗、科索沃、格鲁吉亚和伊拉克。

——“特勤伊拉克 LLC 公司”[由科威特人穆罕默德·阿·萨加 (Mohammed as-Sagar) 控制]——在伊拉克。<sup>①</sup>

“亚谢涅夫”更为具体地指出,远西公司在哥伦比亚等地区的主营业务其实是毒品走私,费林本人将此罪名推给控制着巴格拉姆的美国人。<sup>②</sup>

“亚谢涅夫”针对远西公司提出的部分指控——但是不包括刚才列出的各项内容——曾被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和詹姆斯敦基金会 (Jamestown Foundation) 的右翼学者约翰·邓洛普 (John Dunlop) 在美国公之于众。不过,“亚谢涅夫”提出远西公司和 KBR 哈里伯顿公司、特勤 LLC 公司有关联,并且还和以色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来往,对此,邓洛普只字未

① Yuri Yasenev, “Rossiyu zhdet oranzhevaya revolyutsiya” (“An Orange Revolution Is in Store for Russia”), compromat.ru, December 17, 2004, <http://www.compromat.ru/main/surikov/saidov.htm>; partial translation at [http://www.lefi.ru/burtsev/ops/yasenev\\_en.phtml](http://www.lefi.ru/burtsev/ops/yasenev_en.phtml): 亚谢涅夫暗示,2003~2004年,格鲁吉亚远西公司和 KBR 哈里伯顿公司在两次玫瑰革命 (Rose Revolution) 中合作,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 (Shevardnadze), 格鲁吉亚现今统治者萨卡什维利 (Saakashvili) 上台。Peter Dale Scott, “The Global Drug Meta - Group: Drugs, Managed Violence, and the Russian 9/11,” *Lobster*, October 29, 2005, <http://www.lobster-magazine.co.uk/articles/global-drug.htm>.

② “——弗拉基米尔·伊利西 (Ilyich) (费林), 美国人也参与了毒品交易, 这是真的吗? ——是的, 他们所处的环境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他们控制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空军运输飞机从这里起飞前往美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过去两年里, 这个基地是将阿富汗海洛因运送至美国其他基地以及欧洲各点的最大中转枢纽。其中不少是运送至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从那里,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黑手党将海洛因运送至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 Alexander Nagorny, “Narkobarony iz CIA i MI - 6,” *PravdaInfo*, September 13, 200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t Lefi.ru, <http://lefi.ru/inter/2005/narkobarons.phtml>.



提。邓洛普甚至没有点名道姓提及远西公司。但是，邓洛普几乎完全依赖于“亚谢涅夫”的信息，以支撑自己的论点，他认为，远西公司的一些成员很早就开始为1999年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做准备，这些事件之后，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sup>①</sup>

邓洛普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历史学家大卫·萨特 (David Satter) 这样总结了1999年恐怖分子的袭击。

(1999年)8月5日，车臣游击队领队沙弥尔·巴萨耶夫 (Shamil Basayev) 所带领的一队穆斯林军力从车臣南部的达吉斯坦 (Dagestan) 进入，似乎计划引发反俄罗斯暴乱。8月9日，斯捷帕申 (Stepashin) 下台，普京上任总理一职。8月22日，这股势力撤回至车臣，并无重大伤亡，人们怀疑，此次入侵实为挑衅。8月底，俄罗斯空军轰炸位于达吉斯坦的瓦哈比 (Wahhabi) 村庄，人们猜测是为了报复之前的入侵行为，而在几天之后，莫斯科、布伊纳克斯 (Buinaksk) 和伏尔加顿斯克 (Volgodonsk) 多栋公寓发生爆炸，被夷为平地。

右翼倾向的萨特认为爆炸案“并非车臣恐怖分子所为，相反实为俄罗斯政府行径，旨在为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sup>②</sup>

---

① John B. Dunlop, “‘Storm in Moscow’: A Plan of the Yeltsin ‘Family’ to Destabilize Russia,” Hoover Institution, October 8, 2004, <http://www.sais-jhu.edu/programs/res/papers/Dunlop%20paper.pdf>. 笔者于2005年10月发表文章批评该文，不久这篇文章就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院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网站上消失了。

② David Satter, “The Shadow of Ryazan: Is Putin’s Government Legitimate: Is Putin’s Government Legitimate?” *National Review*, April 30, 2002,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comment/comment-satter043002>. as Cf. David Satter, *Darkness at Dawn: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Criminal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 2.



有关1999年8月事件萨特所提出的解读，我们大可称为对假标记“首版”解释——实为“俄罗斯政府行径”，他的同事邓洛普对此加以完善，添加了其他阴谋策划者。根据修订的“第二版”，6月份时，一群车臣伊斯兰教徒和一位克里姆林宫代表在阿德南·哈绍吉的里维埃拉（Riviera）别墅秘密会晤，共同谋划8月份的爆炸案和达吉斯坦入侵事件。<sup>①</sup>依照邓洛普的说法，这次会见的牵线人是格勒乌（GRU，全称“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退休官员安顿·苏瑞克夫（Anton Surikov），从其他信息来源我们发现，此人曾担任远西公司领导。援引邓洛普的说法，

1999年8月初，叛军首次入侵达吉斯坦高地，次日，调查性报刊《弗西亚周报》（*Versiya*）出版了一篇别开生面的报告，认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Russian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主任沃洛申（Aleksandr Voloshin）曾与俄罗斯头号通缉犯沙弥尔·巴萨耶夫秘密会见，主要是通过格勒乌退休官员安顿·苏瑞克夫从中斡旋，见面地点选在国际军火商阿德南·哈绍吉位于尼斯（Nice）和摩纳哥之间[博略（Beaulieu）]的别墅。<sup>②</sup>

邓洛普认为，俄罗斯寡头执政者鲍里斯·贝瑞左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的三位门徒是这起阴谋的罪魁祸首，此三人即为华伦

① Patrick Cockburn, *Independent*, January 29, 2000: “俄罗斯科学院对比政治学中心成员伯利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在《新报》（*Novaya Gazeta*）周刊上撰文写道，莫斯科等地的爆炸案是由格勒乌（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一手策划。他指出，他们利用谢弗尼·巴萨耶夫（Shirvani Basayev）控制的团体，安放炸药，此人是车臣军阀沙弥尔·巴萨耶夫的兄弟。9月，布伊卡斯克（Buikask）、莫斯科及伏尔加顿斯克等地发生爆炸案，造成300人遇害。根据文章所说，卡加利茨基的消息来源对格勒乌了如指掌，他指出，8月，沙弥尔·巴萨耶夫进入达吉斯坦，早在6月时，他就已经与克里姆林宫的一位高级领导在法国会面商议妥当。”

② Dunlop, “Storm in Moscow.”



汀·尤马舍夫 (Valentin Yumashev, 叶利钦的女婿)、亚历山大·沃洛申 (Alexander Voloshin) 以及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Roman Abramovich)。那一时期, 这些人都是克里姆林宫叶利钦“家族”的成员。邓洛普忽视了一点, 安顿·苏瑞克夫曾在伦敦国防研究中心 (London Centre for Defence Studies) 待过一段时间, 并且, 他本人也承认自己与中情局前任官员弗利茨·厄马斯有过接触。<sup>①</sup>

(Left.ru) 协会的俄罗斯研究院专家们为这些事件提出了“第三版”解读: 他们不仅认为“俄罗斯政府”或贝瑞左夫斯基幕僚牵涉其中, 而且认为, 其中还牵扯一个和中情局密切相关的国际毒品网络 (与阿德南·哈绍吉网络类似)。<sup>②</sup>

根据他们的论点, 笔者着重提出, “俄罗斯版的‘9·11’事件”是上述会见时所讨论的巨额交换的一部分, 其中还包括重新启动途经科索沃普里什蒂纳机场 (Pristina Airport) 运输阿富汗海洛

---

① 安顿·苏瑞克夫给奥勒科·格瑞奇涅夫斯基 (Oleg Grechenevsky) 的信件: “在 1996 年, 我便和政治学家厄马斯先生认识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事, 我们也从未刻意隐瞒。”弗利茨·厄马斯直到 1998 年才从中情局退休。Cf. Argumenty I Fauty, Sep. 15, 1999, <http://www.aifru/oldsite/986/art010.html>. 两人于 1996 年结识, 确实是众所周知。(俄罗斯期刊《生意人报》(Commerzant) 刊载了两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参加 1996 年 4 月全球安全国际研讨会时的照片)。然而, 2002 年, 苏瑞克夫在普拉达 (Pravda.ru) 上发表的论文公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或者说说得确切些, 是谣言), 将厄马斯和苏瑞克夫的敌对者贝瑞左夫斯基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从国内以及部分海外政治生活各种操纵行为视角来观察, 贝瑞左夫斯基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正是为此目的, 英国特别机构‘将贝瑞左夫斯基移交给’美国相关部门。据我们了解, 弗利茨·厄马斯曾担任中情局官员, 是东欧地区特别行动的专家, 他和寡头统治者来往甚密。1998 年 8~9 月, 俄罗斯财政通过纽约银行 (Bank of New York, BONY) 洗钱即俄罗斯门丑闻, 实为此人的行动项目之一。他和前任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有联系, 后者在华盛顿没有正式职务, 不过众所周知, 他与切尼关系密切。也许正是厄马斯建议贝瑞左夫斯基不要再关注积弱无望的俄罗斯自由党这个小团体, 而要转向资助共产党并与其合作, 现在还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http://english.pravda.ru/politics/2002/10/09/37954.html>)。

② Left.ru Press Conference, [http://left.ru/2005/11/preskonf\\_eng.html](http://left.ru/2005/11/preskonf_eng.html).



因的路线，而那里不久前被俄军占领。<sup>①</sup> 笔者注意到，邓洛普在援引主要消息来源“亚谢涅夫”的信息时小心甄选，当提及远东公司和其他情报机构以及毒品走私时，尤其谨慎。笔者简要提出，这宗大买卖的核心也许是政治势力的重新分配，目的就是毒品走私本身。

邓洛普的确指出了针对其中一位参会者有关毒品交易的指控，“他是一位名叫阿奉索·达夫铎维奇（Alfonso Davidovich）的委内瑞拉银行家。拉美地区的媒体认为他曾为哥伦比亚左翼叛变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队（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umbia, FARC）洗钱，在麻醉剂交易的资助下，该组织曾向当权政府发动武装斗争”。<sup>②</sup>

2005年之后的四年里，（根据谷歌搜索）笔者是给出有关远西公司信息的唯一一位西方人。笔者在文章中指出，该公司借恐怖分子暴力活动滋事挑衅，参与了毒品走私，这和本章主题极为相关——那些靠长期暴力斗争活动发财的人，有时也会挑起战斗。

笔者文章里的大部分信息来源也存在争议性。但是2009年6月，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周日版》（*Sunday Herald Sun*）报道了远西公司，这在西方主流媒体还是第一次。这是因为在一起远西公司走私案中——笔者先前也谈到这起案件，<sup>③</sup> 四名案件相关者被害，其中一位是澳大利亚公民萨弗拉茨·海德（Sarfracz Haider）。根据《先驱太阳报周日版》报道，海德被害是一场光怪陆离的阴谋案的结果——足可以写本间谍小说——据传，俄罗斯核导弹被盗，该导弹以6300万美元价格卖给了伊朗……20个Kh-55型号、射程达3000千米的核导弹以及4个20万吨的核弹头被一个秘密组织盗走，

① Scott, “The Global Drug Meta - Group,” [http://lobster-magazine.co.uk/articles/global-drug.htm#\\_ftn9](http://lobster-magazine.co.uk/articles/global-drug.htm#_ftn9); Peter Dale Scott, “The Tao of ‘9·11’,” Jacket 34, October 2007, <http://jacketmagazine.com/34/scott-p-d-Sshtml>.

② Dunlop, “Storm in Moscow.”

③ 笔者修改过的论文，在2006年8月12日墨尔本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宣读。



该组织的成员曾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情报和军事机构官员。

根据乌克兰国会和海德家人的调查，这些事件的其中一个解说版本是，这些武器最后去了伊朗和中国。

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的前任情报官赫里霍里伊·奥梅利琴科上校（Hryhoriy Omelchenko）在给总统写的信中详细描述了那次军火交易的过程。这些信件中也确切提出，53岁的海德先生涉嫌是军火走私团伙的成员之一，他们将导弹卖给了伊朗和中国。……当萨姆·海德（Sam Haider）和律师、地方官员就其父亲在塞浦路斯的地产而纠缠不清时，一位名叫鲁斯兰·萨多夫（Ruslan Saidov）的男子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是他父亲萨弗拉茨的朋友和商业搭档……“他说，这次导弹盗窃案的幕后策划者是一家情报军事顾问公司——远西公司的合伙人”。<sup>①</sup>（实际上，萨多夫本人是远西公司的一名官员。）

澳大利亚媒体的这份报道，印证了先前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均认为远西公司和走私及命案有关。

乌克兰导弹走私案的另外三位参与者已经被害。第一位是瓦列里·马列夫（Valeriy Malev），负责领导乌克兰特种产品出口公司（Ukrspetsekспорт，一家军火出口公司）：2002年3月6日，他在一起神秘的车祸中死亡。2004年1月，SH遗产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萨弗拉茨·海德）在驾驶一辆四轮摩托车时被撞 [据调查，这些导弹被运往伊朗，那家公司借与伊朗国

---

① Laurie Nowell, “Did an Aussie Sell Nukes to Iran?” *Sunday Herald Sun*, June 7, 2009: “他说，我父亲之所以遭人谋杀是因为远西公司和伊朗同伙担心，美国人会抓住他，然后逼他说出导弹的事。他们担心，他知道太多有关他们交易的内幕，掌握的情况远远超过其他人。”远西公司的同伙都是俄罗斯或乌克兰前任军事或情报官员，和俄罗斯以及原卫星国的军队及黑手党势力均过往甚密。他们将导弹送出乌克兰，然后打着SH遗产控股有限公司的名号，将其运至塞浦路斯，而这家公司的所有人和唯一主管便是萨弗拉茨·海德。



家石油公司 (NOIC) 驻乌克兰萨塔科股份有限公司 (SATAK Co. Ltd) 运送汽油涡轮机械的虚假合同为掩护。] 而在同一个月, 乌克兰商人谢伊·佩特洛夫 (Serhiy Petrov) 在南非自己的车里被炸死, 此人曾是远西这家咨询公司的领导。<sup>①</sup>

据报道, 此案件本身就曾在 2005 年引起广泛关注。2005 年 3 月 18 日, 简 (Jane) 在《情报文摘》(Intelligence Digest) 中指出, “毋庸置疑, 如果没有乌克兰高层官员的首肯与合作, 导弹不可能销售给伊朗和中国……有充分证据表明, 乌克兰将导弹卖给伊朗得到了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保驾护航”。<sup>②</sup>

后来, 《外交政策》编辑莫利塞斯·纳伊姆 (Moisés Naím) 以这起案件为依据提出, 凡是政府官员参与的走私案件, 主角是非法组织, 而非国家机构。<sup>③</sup> 和笔者的论点一样, 其重心在于强调假标记事件的存在: 实际上, 将责任推给乌克兰政府也许是下级官员的所作所为, 至少部分意图是要令政府难堪, 动摇军心。

然而, 纳伊姆在论述过程中写道, “这些交易背后的动机是利益, 而非政治”。他的观点被一家俄罗斯新闻媒体严厉反驳, 这家媒体援引乌克兰信息来源并指出, Kh-55 导弹走私案是由包括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内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挑起的, 旨在为发动伊朗战争找借口。<sup>④</sup>

2005 年, 费林公开说明, 自己所在的远西公司曾因为与乌克兰

① *Kommersant - Ukraina*, Kiev, July 17, 2007, 3, as reported by BBC Monitoring Kiev Unit, July 18, 2007.

② “X-55 Long Range Cruise Missile,”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iran/x-55.htm>. Cf. *Financial Times*, March 18, 2005.

③ Moisés Naím, *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Anchor, 2006), 279-280.

④ “US Companies Linked to Vice - President Cheney Supervised the Transfer of Ukrainian WMD to Iran,” Burtsev.ru, <http://left.ru/burtsev/ops/novyiregion.phtml>.





特种产品出口公司（这是乌克兰的一家国有机构）的一些交易而行贿 3000 万美元，不过他否认远西公司曾参与过 Kh-55 导弹非法贩卖。<sup>①</sup> 根据《真理报》（*PravdaInfo*）的报道，他曾与远西公司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安顿·苏瑞克夫和阿莱克塞·利克文切夫（Alexei Likhvintsev）——一起会见了布什政府的代表。后来，费林谈到由于担心会被美国执法机构判刑，所以自己才会和搭档们仓促从欧洲搬迁到巴西和迪拜。依照费林的说辞，某位美国高官警告他和自己的搭档，由于他们参与了 2001 年的 Kh-55 导弹事件，很有可能被判刑。<sup>②</sup> 之后，费林在玻利维亚参加了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总统的就职典礼，在这个国家，他改弦更张，成了反对中情局的激进分子，指责中情局是“彻头彻尾的世界恶魔”。<sup>③</sup>

① *PravdaInfo*, November 16, 2005, 据息，费林能够承认，是因为伊万·德米多夫（Ivan Demidov）在乌克兰期刊《奥伯康》（*Obkom*，音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德米多夫在文章中指责费林的两个远西公司同伙——李奥尼德·科西亚科夫（Leonid Kosyakov）和阿莱克塞·利克文切夫（Alexei Likhvintsev），两人均为乌克兰将军，以及俄罗斯亿万富翁弗亚斯拉夫·坎托（Vyacheslav Kantor），此人是尤先科的顾问，德米多夫认为此三人试图控制乌克兰的敖德萨（Odessa）和伊利乔夫斯克（Ilyichevsk）两个海港。德米多夫的文章 [题为《谁从“毒品橘子”里挤橘汁》（*Who Squeezes Juice from DrugInjected Oranges?*）] 暗示，这个团体将毒品伪装成化肥，然后通过坎托的阿克伦公司（Akron）将其出口至南美地区。文章还转载了乌克兰出口官员列出的一份远西公司贸易伙伴的名单：KBR 哈里伯顿公司（美国）、特勤伊拉克 LLC 公司（科威特）和流星战略解决公司（Meteoric Tactical Solutions）（南非）。德米多夫在文章中写道：“曾在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高级官员的弗利茨·厄马斯，在格勒乌的这个团体中，发挥着‘监督者’的作用，主要是指远西公司的几个重要同伙：KBR 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迪克·切尼那个圈子的成员。”

② Editorial staff of burtsev.ru, <http://www.left.ru/burtsev/ops/bolivia.phtml>, citing Vladimir Filin, *Pravda Info*, July 29, 2005, <http://www.pravda.info/news/3377.html>. Cf. *Financial Times*, March 18, 2005. 费林承认远西公司曾向乌克兰官员行贿，之后他改弦更张。Cf. *Boston Globe*, February 12, 2006, A1.

③ Natalia Roeva, *PravdaInfo*, February 24, 2006, partially translated. 洛耶瓦本人就是远西公司的合作人。



## 有关远西公司的“第四版”解读： 一个永不停歇的摧毁机器

费林在国家情报机构联盟局势中的倒戈相向，或许更多是台面之举，而非本质之变。即便如此，它还是印证了笔者要在此给出的远西公司之所以生事挑衅的“第四版”解读。那就是，远西公司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促进企业发展（其中包括毒品走私），尤其要使局势动荡不安，唯有此才能确保未来合同不断，有条件非法制造并走私毒品，还免受法律制裁。如果在分析 Kh-55 导弹丑闻之后，远西公司是否还能通过美国控制的巴格拉姆和玛纳斯机场继续经营自己的“出口”业务，一定会有惊奇发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就意味着，在远西公司的活动中，美国人要是没有狼狈为奸，至少也曾容忍放纵。

目前所收集的证据统统指向了有关在哈绍吉别墅会面的“第四版”解释：这绝非是形势所迫的特殊阴谋，而是一个长期搞破坏网络的部分环节——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支持俄罗斯或是美国，而是要引发骚乱，削弱高加索地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从而为公司发战争财创造条件，加快毒品走私。<sup>①</sup>

除此之外，使用哈绍吉别墅这一情况也是一个证据。在 1991

① 远西公司散播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抹黑美国和俄罗斯。鲁斯兰·萨多夫曾“指责美国军队情报（国防情报局）高级官员卡莱布·汤普（Caleb Temple）上校及其同事在近东地区从事海洛因走私活动，还利用哈瓦拉资金转移系统洗钱”（<http://lefruburtsev/ops/hawalaph.html>）。2009年8月，弗拉基米尔·费林宣称，最近被劫持的“北极海号”船只，伪装成是要运送芬兰木材，其实是途经阿尔及利亚将武器送入伊拉克。Cristina Batog, “The Truth Is Adrift with the Arctic Sea,” *Asia Times*, August 26, 2009,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KH26Ag01.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KH26Ag01.html); cf. J. R. Nyquist, “Never Ask the Wolves to Help You against the Dogs,” *GodlikeProductions.com*, August 21, 2009, <http://www.godlikeproductions.com/bbs/reply.php?messageid=869607&page=1&quote=3460278>.



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多位哥伦比亚走私犯及其同伙，其中“第 69 位，阿德南·哈绍吉——国际军火走私犯，据称他曾将武器贩卖给哥伦比亚毒品走私贩，特别是卖给麦德林·卡特尔（Medellin Cartel）”。<sup>①</sup> 这自然和邓洛普的报告前后一致，邓洛普指出，据说远西公司的阿奉索·达夫铎维奇“曾为哥伦比亚左翼叛变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队洗钱”。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美国为打击亚洲的恐怖主义而发动军事入侵，非但没有减少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反而增加了危险。笔者个人的总结一方面更为严厉，另一方面也更为乐观。那就是，将美国拖入这些危机冲突的是美国未曾看透的势力，其中有些势力的源头藏在民间。如果说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需要改变，那么华盛顿更需要改变，它不能再继续喂养暴徒，美国民众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甚至命丧海外，可这些暴徒却一直从中谋利。

如果认为，当美国意识到这种愚蠢，就能够停下脚步，其实是痴人说梦。但是，我们眼睁睁看到，公共机构掌控各种行动的权力继续腐蚀，而这些行动是以私人利益为动机。总统和国会似乎都已无力扭转腐败局面，对于他们，对于我们，这局面都难以阻挡。

如果想去检查并改变战争机器的运转，毫无疑问，第一步就是要更为仔细地检查并曝光要求我们听之任之的各股势力。

---

① DIA Report of September 23, 2991, “Subj: (U) IIR [ DELETED ] /Narcotics—Colombian Narco - Trafficker Profiles,”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31/dia910923.pdf>. Cf.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2004.

## 第九章

# “9·11”事件和操纵深度事件的美国传统

分析五角大楼规划方案，可以清楚发现，对于一小撮高级民事和军事官员而言，美国可能在古巴蓄意滋事，以期美国干预找借口，这是一种可能被频繁采用的行动计划，而非哈瓦那和莫斯科异想天开的、无中生有的诽谤。<sup>①</sup>

操纵一系列的挑衅事件，从而为军事干预正名，不仅可行，而且凭借可用资源完全可以实现。<sup>②</sup>

### 操纵深度事件，为战争找借口

除了阿富汗战争之外，美国历时最长的两场战斗要数 20 世纪 60 年代的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现如今，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国会之所以会支持这两场战争，完全是被刻意蒙骗的结果：1964 年东京湾事件（Tonkin Gulf），2003 年所谓萨达姆持有大规模杀伤性

---

① James G. Hershberg,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Did Kennedy Plan a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Cuba?”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ed. James A. Nath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242.

② Joint Chiefs of Staff, “Courses of Action Related to Cuba (Case II),” Report of the J-5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 1963, NARA #202 - 10002 - 10018, 21, <http://www.maryferrell.org/mffweb/archive/viewer/showDoc.do?docid=167&relPageId=21>.



武器的论调。笔者将在本章论证，阿富汗战争之前也有深度事件开道，那就是我们知之甚少的“9·11”事件，而且分析美国战争机器是否参与其中，也很有必要。

即便是在九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依然无法接受，“9·11”事件居然是一场深度事件，而且我们曾被刻意误导。不过，美国——最主要还是国会——也一时无法看透东京湾事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实乃骗局。参议员莫斯（Morse）曾有根有据地质疑第二次东京湾事件（现在我们知道，此事子虚乌有），不过在1964年，当国会投票表决《东京湾决议》（*Tonkin Gulf Resolution*）时，只有一位参议员支持。2002年，只有一位国会议员投票反对《伊拉克战争决议》（*Iraq War Resolution*），该决议认为伊拉克持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不论我们接受哪种版本的“9·11”事件分析——即便是官方所谓的此事是19位阿拉伯人和“基地”组织成员独立行为的分析——“9·11”事件显而易见是我们所称的深度事件：在主流媒体和公众意识中被系统性忽视或扭曲的事件。“9·11”事件委员会（“9·11” Commission）高级顾问约翰·法姆（John Farmer）后来撰写了一本书声援委员会对一系列事件的解读，不过他也承认，“发生袭击的那个早晨，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被严重误导了”，他还指出，“政府某些层面，在某些时刻……达成一致意见，不说出事实的真相”。<sup>①</sup> 我们可以有凭有据地指出，“9·11”事件中存在欺骗，至少从事后来看是如此。如果和东京湾事件对比，就能看出问题，即两次事件是否受到某种程度的“操纵”（援引自196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文件），对此笔者无法下定论。

---

① John J. Farmer, *The Ground Truth: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 under Attack on 9/11* (New York: Riverhead, 2009). 9/11 Commissioner Tim Roemer also told CNN on August 2, 2006.



东京湾事件也是一次深度事件，既有滋事挑拨也有欺骗蒙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言之凿凿，“有确切证据”表明美国驱逐舰将遭遇第二次“无端袭击”，正因此，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今天，我们得知，根本不存在第二次袭击，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就连第一次袭击也是故意挑唆招致的。诚然，东京湾和“9·11”事件之间存在的“深度事件”类似之处如此惊人，笔者有必要用一定篇幅好好探究。

显而易见，伊拉克战争之前，发生了秘密深度事件——针对美国无辜公民的致命假旗帜行动。笔者所指的是2001年炭疽邮件事件，后来发现，这些炭疽的源头就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FBI曾怀疑是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斯蒂芬·哈特费尔发送了这些邮件，后来也将隶属美国政府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布鲁斯·伊文斯列入怀疑名单。<sup>①</sup>不过那时，各种报告混淆视听，例如西蒙·瑞夫（Simon Reeve）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刊载的文章：

近几周来，美国遭遇炭疽恐怖，伊拉克被认定是此次事件最有可能的源头。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目前正在制定新计划，将对萨达姆·侯赛因进行报复性军事打击。虽然针对装有炭疽孢子的邮件的调查还在继续，不过美国科学家们已经有了“里程碑式的”发现，矛头直指伊拉克。美国调查者们

① Marilyn W. Thompson, "The Pursuit of Steven Hatfill,"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3 (Hatfill -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当时，劳里·麦尔罗伊在CNN表示：“要想制造致命性的炭疽，必须是相当专业高端的机构才能办到。没有多少政党组织有这实力。”萨达姆·侯赛因“仍旧以恐怖主义形式继续着战争。炭疽不太可能仍旧藏在信件中。可能的情况是，炭疽被放在城市地铁里，或是在美国建筑物的排气系统里。萨达姆想报复我们。我们怎么对伊拉克，萨达姆就要怎么对美国”。CNN, October 29, 2001, <http://archives.cnn.com/2001/COMMUNITY/10/29/mylroic>.



愈发坚信，奥萨姆·本·拉登“基地”组织的一些身份不明的“隐藏”支持者通过走私将炭疽带入美国境内，然后邮寄给众多目标人物。<sup>①</sup>

很久之后，当谈到底特里克堡时，《沙龙》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指出，“炭疽邮件本身就来自这家政府实验室，指责伊拉克是这些邮件罪魁祸首的虚假报告也来自这家实验室”。<sup>②</sup> 曾收到致命炭疽邮件的两位参议员——达什利（Daschle）和莱伊（Leahy）——均为民主党派，两人最早对仓促提出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 Bill*）提出了质疑。<sup>③</sup> 遭遇了炭疽恐慌之后，两人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该法案。

不论身在美国的哪些人是炭疽袭击事件的罪人，本次事件都是长期策划的一次假旗帜欺骗行动，信件中还有字体潦草的词语“真主万能”推波助澜。为将伊拉克拉下水，操纵秘密深度事件的同性

- 
- ① Simon Reeve, "Scientists Link Iraq to Anthrax Terror Attacks," *Sunday Mail* (London), October 28, 2001.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learn the identity of Reeve's "scientists."
- ② Glenn Greenwald, "Vital Unresolved Anthrax Questions and ABC News," *Salon*, August 1, 2008, <http://www.salon.com/opinion/greenwald/2008/08/01/anthrax>. Cf. Richard Butler, ambassador in residence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01; "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被认为是‘9·11’袭击事件的组织者，2009年6月他在布拉格和一位伊拉克情报官员会面，很有可能就在这时将炭疽交给阿塔先生。有些报道提出，一些伊拉克高级情报官员和基地组织成员碰头。"不过巴特勒这番有关伊拉克、阿塔、炭疽和“基地”组织的言论已经被人反驳，然而理查德·切尼及其同事詹姆斯·伍尔西仍旧对此深信不疑，大力宣扬。Cf.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66, 228 - 229.
- ③ Cf. *Time*, November 26, 2001. "参议院多数派领导达什利，被列为瞄准民主党乃至整个参议院的打击对象，莱伊也被列入名单的理由则没有太多广泛性，更多是因为特定缘由。他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会长，该委员会负责反垄断、反恐立法等各项事务”。See also Anthony York, "Why Daschle and Leahy?" *Salon*, November 21, 2001, <http://dir.salon.com/story/politics/feature/2001/11/21/anthrax/index.html>.



质且更复杂的例子要数伪造大量文件，故意扬言伊拉克曾从尼日利亚购买黄饼铀矿，以将伊拉克拖下马。

“9·11”事件之后，笔者对以下观点越发深信不疑。

(1) 通过从整体上分析深度事件，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其基础问题。<sup>①</sup>

(2) 不论我们如何分析深度事件，它们全都进一步让美国政治走向腐蚀腐败，目前是自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代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

(3) 表现出重复特征的深度事件蒙蔽了美国，这个国家经历的所有近期的战争皆为此故。

笔者在本书复审末期，对这种分析的影响有了更为严谨的体会。姑且不论众说纷纭的“9·11”事件（我们留待下文探讨），自1959年以来近乎所有的美国对外战争——20世纪60年代的老挝和越南战争，198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均是美国战争机器先发制人，却又扬言是为应对敌人的无端入侵而不得不战。在这些事件中，借口托词都源自欺骗性事件，就某种程度而言，绝大多数都牵扯到全球毒品网络的因素。

### 诺斯伍兹计划 (Operation Northwoods): 针对古巴的挑衅和蒙蔽行动

从《诺斯伍兹计划项目》(Project Northwoods)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得知，五角大楼擅长策划暴行，以作为发起战争的借口。1962年，时任反对卡斯特罗古巴项目[该计划也被称为猫鼬计划(Operation Mongoose)]总指挥的爱德华·兰斯戴尔(Edward

<sup>①</sup> See, e.g., Peter Dal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341–396.





Lansdale) 提出了要求, 而诺斯伍兹计划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出的回复。兰斯戴尔要求“简洁、准确描述能够让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sup>①</sup> 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雷姆尼泽 (Lyman Lemnitzer) 签署的这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假旗帜行动, 例如: 我们可以在迈阿密地区、佛罗里达其他城市甚至在华盛顿策划一起古巴共党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袭击的对象可以是那些想在美国寻求庇护的难民。我们可以炸沉一艘装满古巴人、正要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船只 (真炸或假炸)。我们还可以试着拿在美国的古巴难民做文章, 甚至可以让他们受伤, 当然过程要广泛报道。在仔细选定的地点, 引爆塑料炸弹, 逮捕古巴特工, 对外公布事先备好的文件, 以证明此事和古巴政府有关, 这也将有利于制造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以上只是文件附录九段文字中的一段, 这篇附录提出了一长串 (援引原文文字) 用于对付古巴的可行的“挑衅事件”和“蒙蔽事件”。

雷姆尼泽提交这样的一份挑衅事件文件并不奇怪。就在几个月之前, 也就是 1961 年 7 月, 他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Allen Dulles) 共同支持了一项要对苏联进行核突袭的计划, “时间定在 1963 年末, 在这之前要营造一段高度紧张的时期”。<sup>②</sup> 空军利昂·

① Joint Chiefs of Staff,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ch 13, 1962 (Northwoods Document), 1, NARA # 202 - 10002 - 10404, 128, reproduced in Michael C. Ruppert,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4), 595.

② Notes on National Security Meeting, July 20, 1961, in James K. Galbraith and Heather A. Purcell, “Did the U. S. Military Plan a Nuclear First Strike for 1963?” *American Prospect*, Fall 1994, 88; cf. James W. Douglass,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8), 235.



约翰逊将军 (Leon Johnson) 后来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 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估测, 如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苏联死亡人数至少会达到 1.4 亿”。<sup>①</sup>

一年之后, 在 1963 年 5 月,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另一份文件写道, “要借用挑衅事件为入侵创造理由”, 并辩称“操纵一系列的挑衅事件, 并为军事干预正名是可行的, 完全可以通过现有资源实现”。<sup>②</sup> 这份文件是由 J-5 部门, 即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和政策理事会 (JCS Directorate of Plans and Policy) 准备, “以回复 (1963 年 3 月 25 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要求, 有鉴于通过操纵事件为入侵创造替代性理由非常便利, 就在古巴挑起暴乱的条件和预期提出评价和建议”。<sup>③</sup> 这位主席就是肯尼迪选来接任雷姆尼泽职位的麦斯维尔·泰勒 (Maxwell Taylor)。在公众印象里, 面对国际危机, 泰勒推崇灵活应对而非“大规模报复”。不过这位将军自 1961 年就一直和其他鹰派人物往来, “说服肯尼迪……在老挝和越南南部开展军事行动”。<sup>④</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1963 年, 泰勒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 推动了 J-5 部门针对越南北部扩大袭击的计划, 或所谓的 34A 行动。

所有这些针对古巴的密谋都是为了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空袭古巴”(OPLAN312 行动)和“入侵古巴”(OPLAN316 行动)。这些绝非纸上谈兵, 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策划, 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已

① Douglass,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239 - 240.

② Joint Chiefs of Staff, “Courses of Action Related to Cuba (Case II),” Report of the J-5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 1963, NARA #202 - 10002 - 10018, 21, <http://www.maryferrell.org/mffweb/archive/viewer/showDoc.do?docId=167&relPageId=21>.

③ Joint Chiefs of Staff, “Courses of Action Related to Cuba (Case II),” Report of the J-5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 1963, NARA #202 - 10002 - 10018, 4.

④ Gareth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65, cf. 148.



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sup>①</sup> 公众没有意识到对古巴执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封锁其实是 OPLAN316 行动计划的铺垫。<sup>②</sup>

在支持这些行动的过程中，J-5 部门为制造借口，或者也可称为“蒙蔽事件”，发挥了工作坊的作用。1990 年，詹姆斯·G. 海斯堡（James G. Hershberg）写道：

分析五角大楼规划方案，可以清楚发现，对于一小撮高级民事和军事官员而言，美国可能在古巴蓄意滋事，以期为美国干预找借口，这是一种可能被频繁采用的行动计划，而非哈瓦那和莫斯科异想天开的、无中生有的诽谤。<sup>③</sup>

诺斯伍茨文件中所构思的诸多假旗帜蒙骗行动中，至少有一件也许真被付诸实践了——在另一个国家“海岸上，人们发现了或者截获了装有武器的古巴船只”。1963 年 11 月，委内瑞拉宣布在本国海岸上发现了一批隐藏的古巴武器，包括冲锋枪、机关枪和弹药。而就在不久前，约翰·F. 肯尼迪曾询问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是否有证据说明卡斯特罗侵犯委内瑞拉，而这证据要“能在公共平台上拿出手，例如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中情局官员们将一把隐藏的冲锋枪带给肯尼迪集团，据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报告称，总统的回复是：“干得好。”<sup>④</sup>

① 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肯尼迪总统备忘录，“我们不仅做好准备执行您将下达的任何有关古巴的命令，而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万事俱备，有能力应对苏联军队可能采取的任何相关措施。” November 16, 1962, JCSM - 910 - 62,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msc\\_cuba186.asp](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msc_cuba186.asp). 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称，本国军队适逢良机，可以执行 CINCLANT OPLANS 312 - 362 行动（“空袭古巴”）和 316 - 62 行动（“入侵古巴”）。

② 大西洋首席指挥总部发给大西洋军舰总部的电报，1962 年 9 月 21 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hereinafter *FRUS*), Vol. 10, 1082 - 1083.

③ Hershberg,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242.

④ Stephen G. Rabe, *The Most Dangerous Area in the World: John F. Kennedy Confronts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107.



## 操纵蒙蔽事件的普遍性

过去一个世纪里，策划致命阴谋，夺取无辜平民性命，这种事情绝非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家之举，相反在很多国家都很普遍。颇具代表性的要数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阿尔及利亚事件，当时法国武装力量的反动分子，为抵制戴高乐将军推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计划，组建了秘密军事组织（Secret Army Organization），肆无忌惮地轰炸平民，医院和学校都是其轰炸目标。<sup>①</sup> 这一策略的执行就是依赖一个特别反恐小组的假旗帜挑衅事件，该小组是由法国地区监督理事会（Territorial Surveillance Directorate，法语原文 Direction de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组建，其目的就是要开展恐怖袭击，阻止政治妥协。<sup>②</sup>

笔者在他处提到，秘密军事组织在意大利的盟友也复制了这种“紧张策略”，1969 年和 1980 年军事情报人员分别在米兰丰塔纳广场（Piazza Fontana）和博洛尼亚火车站（Bologna Railway Station）策划了假旗帜恶性爆炸事件。据说，1961 年米兰事件的策划者之一基多·吉亚奈蒂尼（Guido Giannettini）曾在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向美国军官教授军变技巧。<sup>③</sup> 不久之后，在 1962 年 3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依照吉亚奈蒂尼的策略，准备了自己的文件——《诺斯伍茨文件》，詹姆斯·巴姆福德（James Bamford）曾撰文写道，这文件

- 
- ① 仅在 1962 年 3 月一个月内，秘密军事组织平均每天就制造 120 起爆炸案。“The Generals’ Putsch,” <http://countrystudies.us/algeria/34.htm>.
- ② Roger Faligot and Pascal Krop, *DST, Police Secrète* (Paris: Flammarion, 1999), 174.
- ③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4, 181 - 182, citing Fabrizio Calvi and Frédéric Laurent, *Piazza Fontana: La Verità su una Strage* (Milan: Mondadori, 1997), 109.



“是在向美国街头的无辜平民索命”。<sup>①</sup>

在土耳其出现的类似袭击事件也说明，存在一个超出法律界限的“秘密团体”——军事力量的结合体，其中包括得到中情局撑腰的格莱蒂奥（Gladio）组织前成员，“还有大量的安全情报官员、土耳其地下组织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库尔德工人党（PKK，库尔德分裂分子）叛变分子”。<sup>②</sup> 这个黑色秘密团体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土耳其大规模的海洛因走私。该团体曾被指控在诸多案件中杀害上千名平民，例如2005年在谢姆丁利（Semdinli）的一家书店里引发致命的爆炸袭击。最初人们认为这次袭击案的始作俑者是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结果发现真正的黑手是土耳其准军事武装情报人员，他们的合作者先前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后来投靠政府。<sup>③</sup> 2008年4月23日，前内政部部长莫梅特·阿尔（Mehmet Agar）因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这起阴谋斗争，不得不接受审判。<sup>④</sup>

① James Bamford, *Body of Secrets*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82.

② Gareth Jenkins, “Susurluk and the Legacy of Turkey’s Dirty War,” *Terrorism Monitor*, May 1, 2008, <http://www.jamestown.org/terrorism/news/article.php?articleid=2374142>.

③ Nicholas Birch, *Irish Times*, November 26, 2005, <http://www.ireland.com/newspaper/world/2005/1126/1908792893FR26TURKEY.html>. 土耳其前总统及首相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后来对此事发表评论：“根本原则应该是只有一个国家。在我国，却存在两个国家。……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台面上的。……理应实际存在的国家却被抛至一边，理应被抛至一边的国家却实际存在。” Jon Gorvett, “Turkey’s ‘Deep State’ Surfaces in Former President’s Words, Deeds in Kurdish Town,”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6, [http://www.washington-report.org/archives/Jan\\_Feb\\_2006/0601037.html](http://www.washington-report.org/archives/Jan_Feb_2006/0601037.html).

④ Jenkins, “Susurluk and the Legacy of Turkey’s Dirty War,” a Google search. 2008年6月7日，在谷歌上搜索关键词“Semdinli + PKK”（谢姆丁利 + 库尔德工人党），英文出版物的搜索结果共157条，其中，两条来自美国。而在这两条当中，其中一条（《华盛顿时报》2005年12月6日）压根没有提到秘密团体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另一条（《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8日）明确了秘密团体，不过并未论及其不为人知的行动。如果搜索关键词“deep state”（秘密团体），同样发现，美国媒体对这类事件的报道奇缺。



笔者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曾提出，美国也存在类似的军事力量，同样也是由情报官员以及地下毒品走私团伙成员构成，他们也许是官方肆无忌惮遮掩“9·11”真相的最终黑手，这件事迅速推动美国攻打阿富汗。<sup>①</sup>此外，笔者指出，数十年来美国机构和“基地”组织有着紧密合作，《“9·11”事件委员会报告》（9/11 Commission Report）和美国主流媒体对该地下恐怖主义的毒品走私活动只是一语带过。<sup>②</sup>

还有另一个超乎寻常又秘而不宣的事实有待解释，“基地”组织劫机行动的头号训练师阿里·穆罕默德（Ali Mohamed）是双面间谍，一方面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另一方面还和中情局保持来往，中情局曾利用他做特工，20世纪80年代还协助他来到美国。<sup>③</sup>阿里·穆罕默德施行了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爆炸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将他和另一位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扣押在温哥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处（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后来他才被释放。<sup>④</sup>几乎可以肯定，阿里·穆罕默德绝非美国安插在“基地”组织的唯一一个双面间谍。“9·11”劫机事件的两个罪犯，纳瓦茨·哈兹密（Nawaz al-Hazmi）和哈立德·阿米达（Khalid al-Mihdhar）曾获准进入美国。就在不久前，他们被人发现曾在马来西亚的一次“基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4-7, 14-17.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121-122, 124-127, 163-169.

③ Scott, *The Road to 9/11*, 139-142, 150-160; Peter Lance, *Triple Cross: How bin Laden's Master Spy Penetrated the CIA, the Green Berets, and the FBI—And Why Patrick Fitzgerald Failed to Stop Him* (New York: Regan/HarperCollins, 2006).

④ Scott, *The Road to 9/11*, 153, citing *Toronto Globe and Mail*, November 22, 2001. 美国媒体对这一重要事实以及记录此事的两本著作——兰斯的《三岔路》（*Triple Cross*）和笔者的《通向“9·11”之路》（*The Road to 9/11*）全都视而不见，这绝非偶然。《纽约时报》后来终于提到了《三岔路》，然而却是因为其出版商朱迪丝·里根（Judith Regan）被鲁伯特·默多克新闻集团解雇（*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06）。



地”组织峰会中现身，局势非常敏感，白宫通告了FBI局长，然而FBI却没有收到消息——他们才是最应该被通知的。<sup>①</sup>

我们看到，劳伦斯·赖特（Laurence Wright）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文评论中情局封锁有关哈立德·阿米达消息的类似做法，他总结说：“中情局也许正在遮掩某项海外行动，担心FBI会将其公之于众。”<sup>②</sup>而另一种可能性是中情局利用沙特情报机构做保险丝或中间人，认为纳瓦茨·哈兹密和哈立德·阿米达二人是可以信赖的特务，能够渗透进藏在美国的“基地”组织。利用双面间谍是广泛采用的一种情报技术，但同时也风险重重，中情局就有切身教训。2009年11月，其七位雇员在一起自杀性“基地”组织爆炸案中死亡，而持炸弹者曾一度被中情局认为是大可放心的双面间谍。<sup>③</sup>

在本书中，笔者无法提出究竟谁才是“9·11”事件的凶手。笔者的目标是论证以下观点。

（1）正如前文所述，毋庸置疑，“9·11”事件，是一次有玄机的深度事件：在主流媒体和公众认识中，该事件均被系统性地忽视或篡改。

（2）“9·11”事件的根源没有水落石出，却迅速引发战争，

---

① 笔者在他处曾提出，FBI未被告知的原因，也许和1963年10月中情局向FBI隐瞒李·哈维·奥斯瓦德的重大信息的理由如出一辙——换言之，三人均已被选为即将上演的灾难的指定犯人，必须确保FBI不要干预他们的行动。Se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354-357, 387-391.

② Lawrence Wright, “The Agent,” *New Yorker*, July 10 and 17, 2006, 68; discussion in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388-389.

③ “中情局坚信，约旦医生哈曼·卡里·阿布穆拉·巴拉维（Human Khalil Abu-Mulal al-Balawi）将帮助中情局渗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甚至可能找到基地组织神秘的二号头目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不过结果发现，这位线人还是一个杀手，12月30日，此人在中情局驻阿富汗基地实施自杀性爆炸，七位中情局雇员身亡。” Claire Suddath, “Brief History: Double Agents,” *Time*, January 25, 2010,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53712,00.html#ixzz0ccXO8nJI>.



它和其他很多深度事件如出一辙。尤其与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非常相似，这就说明两起事件的根源绝非来自外部，至少从部分上来说，其驱动力源自于国内主导势力。

(3) 现在必须面对残酷的真相，姑且不论阿富汗战争，美国近年来参与的重大冲突——1959年老挝战争、<sup>①</sup>1964年越南战争以及1993年伊拉克战争，毫无疑问，在此之前均有伪造的国外袭击的证据，笔者将其称为“操纵性深度事件”。<sup>②</sup>

如果最后一项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就足以让我们进一步审视“9·11”事件：是否这次的深度事件和以往的不一样，其目的并非是要欺骗美国公众，这究竟是真是假？

虽然笔者不打算去深入分析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金日成（Kim Il-sung）从北边入侵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回顾布鲁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对华盛顿高层的讽刺挖苦，因为几周前，他们行为诡异，这暗示了这一事件中，公众舆论被人操纵。

（1950年）6月14日，中情局估测随时入侵（韩国）的可能性。无人否认。五天之后，中情局预测入侵即将上演。……现在，科森（Corson）……提出，6月14日的报告已经被泄露给“相关圈子”，因此“担心国会的行政评论员们会公开提出这一

① 笔者之所以将老挝加进来，原因在于，约瑟夫·奥尔索普处心积虑，拖着一条带伤的腿故意展示于四位村民面前，然后宣称，老挝已经遭受“越南北部共产主义分子全线大炮攻击”（详见第四章）。

② 除此之外，乔治·H. W. 布什副总统等人严重歪曲哥伦比亚事件，以此为1986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决议行动令221号正名。布什通过这一举动，终于在1989年将禁毒及激进的“安登倡议”（Andean Initiative）实现了军事化。See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The CIA, Drugs, and Armies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94-103;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87-88.





问题。最后，白宫决定要告知国会，朝鲜方面一切正常。”……难道大家所期待的，不是国会被告知，朝鲜方面现在一塌糊涂？除非有人故意想让国会大吃一惊，勃然大怒。<sup>①</sup>

在康明思完成这篇文章的十多年后，2001年8月6日，中情局在一篇总统《每日简报》中预测“本·拉登决意袭击美国”，并提出支撑性报告，“其中谈到本·拉登计划劫持美国飞机”。<sup>②</sup>众所周知，布什和切尼根本毫无动作，还在那个 month 延长度假，1950年和1964年的情形再度上演，国会又一次被弄得大吃一惊，勃然大怒。

## 东京湾——一次操纵性深度事件

1964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言之凿凿，“有确切证据”说明，美国驱逐舰将面临第二次“无端袭击”，正因此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今天，我们得知所谓的第二次袭击根本空穴来风，而且中情局控制的鱼雷船只和美国驱逐舰停留在越南北部水域，故意骚扰，有

①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611, 613, emphasis added, quoting William R. Corson,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Empire* (New York: Dial, 1977), 315 - 321, whole passage quoted in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61. 笔者也未曾打算将1989年的巴拿马涵盖进来，尽管有人提出，被称为入侵缘由之一的一次事件——一位未携带武器的名叫罗伯特·帕茨 (Robert Paz) 的水兵遭人杀害——可能就是挑衅的结果，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根据美国军队及民众消息来源”，被害士兵是“强硬冲锋组织” (Hard Chargers) 的成员，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向巴拿马国防军 (Panamanian Defense Forces, PDF) 挑衅”。据称，“‘美国高级官员’对该组织的‘伎俩策略’了如指掌，这些官员对‘独裁者曼纽尔·A. 诺列加指挥的巴拿马各项挑衅行动’备感焦虑”。Wikipedia, “United State Invasion of Panama,” citing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2, 1990, “Some Blame Rogue Band of Marines for Picking Fight, Spurring Panama Invasion”.

②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zed ed. (New York: Norton, 2004), 261 - 262.



意挑起事端。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乔治·波尔（George Ball）后来在1977年的一次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访谈中表示：

当时，这起战争的很多相关人士一直在寻求可以发动轰炸袭击的借口。向东京湾派遣驱逐舰的首要目的便是为了挑衅。……大家觉得，一旦驱逐舰出了问题，那就能成为我们苦苦等待的挑衅事端。<sup>①</sup>

包括弗雷德里克·洛奇沃（Fredrik Logevall）在内的众多历史学家与波尔持相同观点。

OPLAN - 34A 突袭行动和德索托（Desoto）巡逻行动完全是滋事挑衅，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不过挑衅也分蓄意所为或偶然事件，刻意谋划或不期而至。那么这次事件是否是蓄意所为？当然要论及8月4日所谓的第二次袭击，那绝对是刻意策划的。首先，8月2日袭击事件仅数小时之后，连同“C. 特纳乔伊（C. Turner Joy）号”驱逐舰一起，“麦道克斯号”驱逐舰（Maddox）便被开回东京湾。赫利克（Herrick）舰长接到命令，在第一次袭击周边地点执行规避战术，为期两天。……历史学家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总结道：“向紧邻北越南海滨地区派出两部驱逐舰，时长96个小时？理性想想，河内要是这么做，岂不招人耻笑。”<sup>②</sup>

- 
- ① Bamford, *Body of Secrets*, 301. 威廉·邦迪对这一判断持不同看法，并提出将北部战争升级“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计划”，Robert Mc - Namara, “The Tonkin Gulf Resolution,” in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 Vietnam War Anthology*, ed. Andrew Jon Rott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83, 但是，波尔认为爆炸案符合部分人的计划，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 ② Fredrik Logevall,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00, citing John Prados,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5), 51.



加雷斯·波特 (Gareth Porter) 补充道, 东京湾事件之后, “约翰逊的国家安全团队想利用 OPLAN - 34A 破坏行动和海军巡逻双管齐下, 使事态更加恶化”。挑衅策略的支持者包括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约翰·麦克诺顿 (John McNaughton) 以及大名鼎鼎的麦斯维尔·泰勒将军 (1964 年的这个时候, 他担任美国驻西贡大使)。<sup>①</sup>

泰勒早自 1961 年开始, 便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在老挝和越南进行军事干预, 这已为众人所知。现在我们发现, 肯尼迪遇害四天之后, 这天, 约翰逊的首份越南问题政策文件 (1963 年 11 月 26 日 NSAM 273 号文件) 发布, 泰勒发出电报 (JCS3697 号电报) 要求针对越南北部地区开展为期 12 个月的渐进行动, “程度逐渐加强”。<sup>②</sup> 1963 年 11 月 20 日, 泰勒在夏威夷檀香山批准了这些计划, 后来在施行过程中它们被称为 OPLAN - 34A 行动, 此时肯尼迪尚未遇害。约翰·纽曼 (John Newman) 和詹姆斯·盖布拉斯 (James Galbraith) 认为,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批准了这些计划的筹备工作, 不过并未告知麦克纳马拉”。<sup>③</sup>

①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200 - 201. Cf. *FRUS, 1964 - 1968*, Vol. 1, 714 - 715.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Actions to Implement NSAM No. 273, 26 November 1963,” H. D. 费尔特 (H. D. Felt) 上将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见附录文件, 1963 年 12 月 11 日, NARA#202 - 10002 - 10109。同一份文件指出, “中情局对西贡 (即现在的胡志明市) 站点下达加紧计划的命令, 该指挥部署是在檀香山会议召开之后发出的 (CAS 84972, 1963 年 11 月 25 日)”。詹姆斯·盖布拉斯的评论一针见血: “换言之, 中情局开始制订强化计划以实施 OPLAN-34A 行动。该行动将对越南北部开展海上突袭和破坏, 最后引发东京湾事件, 战火进一步蔓延, 而时间是在约翰逊总统签署政令同意该行动的前一天。” James K. Galbraith, “Exit Strategy: In 1963, JFK Ordered a Complete Withdrawal from Vietnam,” *Boston Review*, November 24, 2003, <http://www.bostonreview.net/BR28.5/galbraith.html>.

③ Galbraith, “Exit Strategy”; cf. John Newman, *JFK and Vietnam: Deception, Intrigu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2), 434;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94.



这位要求 J-5 部门考虑“操纵事态”为入侵古巴找借口的男人，难道就没有为向越南派兵而故技重施？实在说不过去。如果单从文件记录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实属不易，因为正如笔者在他处所论，有关 OPLAN-34A 行动的很多文件现如今不知在何处，就连 1964 年 1 月 16 日约翰逊核准的 34 号行动清单也尚未对外公布。<sup>①</sup> 不过美国派出驱逐舰，连同 OPLAN-34A 海岸袭击行动，这些手法和《诺斯伍茨计划项目》提出的第一条提议非常接近。

似乎需要借用合法的挑衅手段，以作为美国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的基础，那么秘密的蒙蔽计划……大可作为首步行动，刺激古巴有所动作。蒙蔽行动要让古巴感到即将面临入侵命运，这是重点。通过执行这样的计划，如果古巴采取了相应的回应，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可以迅速从演练变为干预。<sup>②</sup>

不仅如此，1964 年 8 月 4 日这一天（东京湾由相安无事变成战争悲剧的日子），不同部门官员们的各自行为表明，美国高层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美国这次挑衅事件就是要给美国报复铺路。我们从不久前刚刚解禁的一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内部工作历史文件中发现，1964 年 8 月 4 日，国家安全局处理 122 条信号情报（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统观这些情报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8 月 4 日这一天，北越南地区并未出现第二次袭击：“那天晚上，河内的海军没有任何其他任务，只是在修复 8 月 2 日受损的两艘船只。”不过这 122 条情报，白宫只收到 15 条——“能够证明所谓共产主义者袭击两艘驱逐舰

①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94-295.

②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ch 13, 1962 (Northwoods Document), NARA #202-10002-10404.

舰的情报”。<sup>①</sup>

在8月4日下午，中情局越南北部问题的一位分析专家……总结认为，美国船只上无人开火。他就此内容在《最新情报简报》（*Curr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上撰写了一段话，《简报》一般会发给白宫以及其他一些主要机构，第二日上午出版。接着就出了怪事了。最新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的主任，这位身居高位的官员……放下身段来到局内部，要求将这段文字删除。他解释说：“我们现在不要把这话让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副总统（Lyndon Baines Johnson, LBJ）知道。他早就执意要轰炸越南北部了。”<sup>②</sup>

也许有人认为，在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所发生的平行事件显示，政府部门之间怀有相同的军事升级意愿或倾向，能够在两者无须任何密谋串通的情况下，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形成互补合力。不过笔者认为更为可信的解释是，在更高层的官员之间早已达成共识，OPLAN-34A行动和德索托巡逻行动是为报复袭击铺路的挑衅事件。

不可一带而过的还有一件事，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仍有不少高级官员坚信，与中国共产党决一死战是迟早的事，还再次搬出陈纳德将军提出的由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执行大规模着陆的建议。<sup>③</sup>

① Robert J. Hanyok, "Skunks, Bogies, Silent Hounds, and the Flying Fish: The Gulf of Tonkin Mystery, 2 - 4 August 1964," *Cryptologic Quarterly*, declassified i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132,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32/relea00012.pdf>.

② Ray McGovern, "CIA, Iran and the Gulf of Tonkin," *Consortium News*, January 12, 2008, <http://www.consortiumnews.com/2008/011108a.html>.

③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132, cf. 67, citing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314, 318.



这似乎解释了在东京湾事件不久之前，美国在老挝贯彻的一系列旨在恶化的操纵性事件，此做法与美国意图将战火烧到越南南部以外非常相似。1963~1964年，人们再度发觉，和1950年如出一辙，当地的国民党分子，这次完全是武装力量，直接参与了鸦片走私，这发人深省。<sup>①</sup>

## “9·11”事件、东京湾和肯尼迪遇害

尽管起初不大情愿，不过后来笔者渐渐地越发喜欢将约翰·F.肯尼迪遇害事件（越南战争紧随其后）和“9·11”事件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在两个层面上感到这种对比颇有成效：第一，事件策划的核心成分；第二，利用事端，取得预期效果。

事件策划的方式。甚至连《“9·11”事件委员会报告》都承认，2001年夏天，“国家急不可待”地要向“基地”组织发动进攻。这份记录有力地驳斥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2002年5月发出的论调，“我想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些人……会拿飞机当导弹，会劫持飞机去当导弹”。<sup>②</sup>然而就在这“急不可待”的危机之中，2001年8月，中情局堂而皇之地向FBI隐瞒重大情报。如果当时分享这些情报，也许就能帮助FBI查找其中一位劫机犯哈立德·阿米达。正是因为扣住消息，8月，一位FBI特工准确

①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88, 93-103.

②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olds Press Briefing,” May 16,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5/20020516-13.html>. 如今我们知道，9月11日这一天，举行了好多次战斗演习，其中还包括在杜勒斯机场（Dulles Airport）附近的国家侦察办公室（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进行的实验，检测“飞机即将撞向建筑物”将会出现的情况。Scott, *The Road to 9/11*, 215-216;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August 22, 2002; *Boston Globe*, September 11, 2002, [http://www.boston.com/news/packages/sept\\_11/anniversary/wire\\_stories/0903\\_plane\\_exercise.htm](http://www.boston.com/news/packages/sept_11/anniversary/wire_stories/0903_plane_exercise.htm).



预言道：“有一天有些人会丧命”。<sup>①</sup>

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战争阴谋》(*The War Conspiracy*)一书中指出,中情局这次向FBI隐瞒关键情报,罪无可恕,与1963年10月中情局向FBI隐瞒有关李·哈维·奥斯瓦德的重要信息完全如出一辙。前FBI局长克莱伦斯·凯利(Clarence Kelley)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抱怨,消息被隐瞒是1963年11月22日未能监视奥斯瓦德的主要原因。<sup>②</sup>换言之,要不是因为消息隐瞒,肯尼迪遇害或“9·11”事件就不会上演。

在《战争阴谋》一书中,笔者通过详细地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奥斯瓦德(以及后来的哈立德·阿米达)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被选为行动的指定对象。也许这样做最初并非是要让他们犯罪,违反美国法纪,恰好相反,也许这些措施是让奥斯瓦德与某项针对古巴的行动联系起来,而哈立德·阿米达则与“基地”组织的行动有关联(笔者推测)。不过随着有关二人的事迹渐渐增多,很有可能一些狡猾之人便将制裁行动改为谋杀计划,事后还要加以遮掩。此时,奥斯瓦德(以及和他类似的哈立德·阿米达)就不再只是指定对象,而且还是指定犯人。

即使不了解细节,在肯尼迪遇害事件和“9·11”事件问题中,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得出结论,不论是无辜还是有意,中情局或多或少都牵涉其中。当论及中情局向FBI隐瞒有关奥斯瓦德情报的问

---

① 9/11 Commission Report, 259, 271;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2006), 352-354 (FBI探员)。“9·11”事件之后,另一位FBI探员甚至更为气愤不平:“他们(中情局)不想让FBI干预他们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通知FBI。……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了“9·11”事件。这就是事件的原因。……他们也是杀人凶手。他们害死了三千多条人命”。James Bamford, *A Pretext for War: 9/11, Iraq, and the Abuse of America's Intelligence Agencies* (New York: Doubleday, 2004), 224.

② Clarence M. Kelley, *Kelley: The Story of an FBI Director* (Kansas City, MO: Andrews, McMeel, and Parker, 1987), 268, quoted in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389.



题时，甚至连中情局前任官员简·罗曼（Jane Roman）后来也认为，隐瞒消息这一举动说明“（中情局）对有关奥斯瓦德的情报文件动了些手脚”。<sup>①</sup>劳伦斯·赖特在《纽约客》撰文评论，中情局故技重施，隐瞒有关哈立德·阿米达的情报，他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中情局也许正在遮掩某项海外行动，担心FBI会将其公之于众。”<sup>②</sup>

简而言之，从这一角度出发，在美国历史上，“9·11”事件绝非没有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将“9·11”事件视为在合法、井然秩序的政府中一次绝无仅有的偏离事变——它确是某种尚未解释的深度事件，延续不断地腐蚀美国公正政治的宪法体制以及公众自由。

更让人如坐针毡的是，本章所涉及的一系列深度事件（朝鲜战争、肯尼迪遇害、东京湾事件和“9·11”事件）存在很多共同特征，它们足以说明事情缘由并非完全来自外界，至少部分是源自本国的主导势力。这些事件还和其他深度事件有更多的相似性，最明显当属普韦布洛号事件（U. S. S Pueblo）和伊朗门事件，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不是发起战争，而是防止了战争。<sup>③</sup>这就说明，内部机构对这些深度事件的不同态度，胜利方不一定总是那些一门心思要发动战争、试图实现帝国霸权的人。

这对期望看到一个和平的美国的那些人而言自然舒心，不过这更让人如芒在背，因为自二战以来，那些让美国历史跌跌荡荡的、众多首尾不一的行动或深度事件也许并非是一连串互不相干的事

① Jefferson Morley, *Our Man in Mexico: Winston Scott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CIA*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8), 196-198; discussion in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387-388.

② Wright, "The Agent," 68; discussion in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388-389.

③ 伊朗门事件丑闻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历史重演，一些主要参与者——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尼加拉瓜反叛军、尼加拉瓜反叛军物资供应网络，同时还进行国际毒品走私。See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1), 480, 490-500;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故，至少从部分上来看，它们是由一股或多股秘密势力刻意为之，而如今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对肯尼迪遇害事件和“9·11”事件的利用。不管人们心目中所接受的肯尼迪总统遇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即便是坚信李·哈维·奥斯瓦德是朝总统开枪的那个人而且凶手只有他一人，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以此为由加大了中情局对美国民众的监控。笔者在《深度政治》（*Deep Politics*）一书中提出这种结局的缘由如下。

沃伦委员会提议要增加情报服务机关对国内的监控工作，该提议备受争议（《沃伦委员会报告》（*Warren Report*, WR），第25~26页）。有些不合逻辑的是，《沃伦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奥斯瓦德是独自一人行动（《沃伦委员会报告》，第22页），……并且情报服务机关、FBI和中情局，应该更为紧密地协调对组织团伙的监控（《沃伦委员会报告》，第463页）。委员会特别提议，情报服务机关需要开发电脑化的数据库，能够和中情局已有数据库兼容。<sup>①</sup>

四年之后，这种模式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害事件中再度出现。就在从巴比（Bobby，即罗伯特·肯尼迪——译者注）被枪射中到其死亡的24小时时间，美国国会仓皇出台一项法令——其实之前早已起草完成，这已不是首例——以保护总统候选人的名义，进一步加大了情报服务机关手中的情报权力。<sup>②</sup> 这绝非一次细微或良性改变：此举得到了约翰逊批准，审议时间短，然而自此尼克松总统开

<sup>①</sup>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280.

<sup>②</sup> Public Law 90 - 331 (18 U. S. C. 3056); discussion in Peter Dale Scott, Paul L. Hoch, and Russell Stetler, *The Assassinations: Dallas and Beyo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443 - 446.



始严重地职权滥用。

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Chicago Democratic Convention）上场面混乱，出现暴力事故，会场内外都有被借调给情报服务机关的军队情报监视特工。他们中有些人还是所谓“正义军团（Legion of Justice）的恶棍，芝加哥警察厅情报处（Chicago Red Squad）对一些地方反战组织放纵不管”。<sup>①</sup>军队情报特工之所以来到会议现场，完全是该法令所批的，而通过该法令时，巴比·肯尼迪正奄奄一息。<sup>②</sup>

这让我们联系起“9·11”事件。当天，就在最后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撞机之前，白宫批准了所谓的政府连续性（Continuity of Government, COG）计划的制订。毋庸置疑，其实政府连续性计划早就被提出了——《“9·11”事件委员会报告》两次确认了该观点，分别在第38页和第326页。<sup>③</sup>也许正是有了政府连续性计划，才有后来的《爱国者法案》和国土安全部“终结游戏项目”（Project Endgame）。该计划为期十年，旨在扩大扣押所，仅在2007年便耗资4亿美元。<sup>④</sup>毫无疑问，布什时代最令人震惊的特点全都在政府连续性计划中得到延展——无证监视、无证拘留甚至违背人身保护权，该权利是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所赋予的。

COG（Continuity of Government）的官方全称是“政府连续性”计划，可是我们大可将其解读为“政府改变性”（Change of Government）计划。其实早在22年前，阿方索·夏尔迪（Alphonso Chardy）就曾在《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上总结，这些规划“是对《宪法》的中止……对军队指挥官的紧急任命……宣布

① George O'Toole,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Norton, 1978), 145, quoted in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278-279.

② Joan M. Jensen, *Army Surveillance in America, 1775-198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4.

③ *9/11 Commission Report*, 38, 326; Scott, *The Road to 9/11*, 228-229.

④ Scott, *The Road to 9/11*, 238, 240-241.



推行军事法”。<sup>①</sup>

虽然我们对政府连续性计划有所认知，然而所知有限。我们知道，这类高度机密的计划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和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的时代，然后在乔治·H.W. 布什和克林顿的时代延续。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这些计划的两位核心人物，“9·11”事件时期，此二人施行了这些计划，尽管当时的总统是克林顿，不过这两位共和党人士才是主要机构的头目，甚至没把政府放在眼里。<sup>②</sup>

我们知道，直到 2007 年，美国仍在执行政府连续性计划，当时布什总统颁布国家安全总统令第 51 号令（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 51, NSPD 51），将 2001 年 9 月 14 日宣告的紧急戒备状态延长一年，在出现任何“灾难性紧急情况”时，总统有权仅凭一人之言就可宣布执行“政府连续性”计划。布什总统宣布，国家安全总统令第 51 号令包含了“绝密连续性附件”，“未经授权不得公开”。由于选民强烈要求知道“9·11”真相，受此压力，国土安全委员会（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的国会议员迪法茨奥（DeFazio）曾两次要求阅读这些附件，第二次的申请书还有委员会主席的签名，但他的申请遭到拒绝。

### “9·11”事件：不仅是另一起深度事件， 更是一次宪法深度事件

“9·11”事件是一起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深度事件。和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密切相关的深度事件频频上演，大大超出我们的认知能力。20 世纪 60 年代以及 70 年代初期轰动一时的种种暗杀事

<sup>①</sup> Alphonso Chardy, “Reagan Aides and the ‘Secret’ Government,” *Miami Herald*, July 5, 1987; Scott, *The Road to 9/11*, 241.

<sup>②</sup> Scott, *The Road to 9/11*, 183 - 187.



件全部都是深度事件——至少有六位政客在坠机事件中丧生。也许这些坠机事件中很多只是偶然，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死亡人数中只有一位是共和党人，其余五位均为民主党人。<sup>①</sup>对这几位去世的民主党人士——参议员保罗·威尔斯通（Paul Wellstone）、国会议员哈勒·伯格（Hale Boggs）以及尼克·贝吉希（Nick Begich），官方解释已经遭到挑战。同样的，在1970年，汽车工人联合会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在一次坠机事件中“意外”死亡，这也令人心生疑窦。<sup>②</sup>

这些深度事件，有些——尤其是约翰·F. 肯尼迪的遇害——特别突出，已经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所参与的重大战争——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有深度事件开道，从而共同推动了美国现今依靠战争发财的经济体制。

① 共和党参议员海恩茨（Heinz）和道尔（Tower）也因飞机事故丧生，不过是在两架飞机相撞之后。1983年9月，民用飞机KAL007被苏联截击机击中，保守民主党拉里·麦克多纳德（Larry McDonald）在这起事故中死亡。

② Michael Parenti, *Dirty Truth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96), 201, 206: “在这次致命性撞机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人数次企图谋杀沃尔特和维克多·鲁瑟（维克多坚信，针对他本人的谋杀计划其实是向沃尔特传递一种警告。）这些事件中，州和联邦执法机构在调查过程中将懒散推诿发挥到极致，侧面反映出政府部门可能勾结串通，或至少对犯罪行为纵容不管。……第三，与前一年令人生疑的撞机危险相同，后来那次致命性的飞机失事也是因为这架小飞机上的高度表出了故障。在如此短的时间间隔里，鲁瑟两次搭乘的飞机出现同样的技术问题，这巧合太令人难以置信。……在后来与我们的一次访谈中，维克多强调：‘（撞机事故之前）政府就不时表现出憎恶情绪。不仅仅是因为沃尔特对越南和柬埔寨问题的立场，而且我本人也在工会中数次揭露中情局眼线，这和沃尔特也有一定关联性。……暴徒和中情局之间存在细微差别。两者有不少交集。在工会关系的整个历史沿革中，工业、胡佛和黑手党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联盟关系。……你必须考察右翼企业集团，以及这些集团与国家安全体制的关联。’考察这种关联绝非易事。FBI一直拒绝公开多达200页的有关鲁瑟死亡事件的文件，其中包括实地特工与胡佛之间的大量信件。很多公开的文件——部分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全被涂抹掉了。现在要想弄清楚其中到底牵扯到什么国家安全因素，或者FBI和中情局为什么还藏着如此多有关沃尔特·鲁瑟的死亡秘密，着实不易。”



不过所有这些深度事件中，对国家结构和国家《宪法》都造成影响的，“9·11”事件是首例。2001年9月11日早上10点，政府连续性计划开始实施，《美国宪法》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就发生了改变。直至今天，政府连续性计划究竟产生了哪些现实影响，我们仍一头雾水。然而有一点显而易见，即缩减人身保护权和《第四修正案》适用范围。政府连续性计划和“9·11”事件之后，美国屡屡变更法令让美国的宪法体制和英国的越发相似。在英国，成文法严格受限，以未受界定皇家特权做补充：君主拥有的多项权力，无须法律基础。<sup>①</sup>

英国皇家特权的滥用曾饱受争议，成了最终导致美国革命的因素之一。和现在一样，鉴于当时的帝国部署，需要常备军投入战斗。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大可以说，实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需要一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再度缩减了《宪法》规定的公共国家范畴。

国会法律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总统权力，过去一直是争论焦点，未来仍将受到广泛争议。不过有一点清楚无误，乔治·W. 布什政府重拾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所表达的激进或者说君主观点，这在美国政治史上还是首次，即“总统所为，绝不违法”。<sup>②</sup>

曾在乔治·W. 布什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克·高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表示，在白宫里，切尼的法律顾问大卫·爱丁

① See discussion in Jack N. Rakove, "Taking the Prerogative Out of the Presidency: An Originalist Perspectiv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7, No. 1 (March 1, 2007): 85-100; Frederick A. O. Schwarz Jr. and Aziz Z. Huq, *Unchecked and Unbalanced: Presidential Power in a Time of Terror* (New York: Rodale, 2007), 153-158.

② Interview with David Frost, aired May 11, 1977, in Schwarz and Huq, *Unchecked and Unbalanced*, 159; Robert D. Sloane, "The Scope of Executive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8 (2000): 341, <http://www.bu.edu/law/central/jd/organizations/journals/bulr/documents/SLOANE.pdf>, 346.



顿 (David Addington) 反复提出, “《宪法》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特权以采取必要行动救国家于危难”。<sup>①</sup> 高德史密斯总结说: “恐怖主义时期的总统——恐怖总统——饱受 (尼克松时期) 帝国总统之患”。<sup>②</sup>

切尼得到了爱丁顿的支持, 在 1987 年《伊朗门事件少数派报告》(*Iran-Contra Minority Report*) 中, 他清楚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最高行政长官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责任支持君主式的特权概念, 让他可以超越法律界限。”为证明自己的论调, 切尼援引了杰斐逊 (Jefferson) 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事件, 但是杰斐逊并未采用“特权”一词, 而是用“出自必然法则、自我保护法则以及危难之际救国于水火的法则”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sup>③</sup> 不过切尼 - 爱丁顿为继续向恐怖主义宣战而要求获得特权, 这和杰斐逊穷尽毕生之力打击特权势力相去甚远, 毕竟杰斐逊使用此手段仅一次, 他俩的做法反倒与英国 17 世纪的君主法律理论颇为相似。<sup>④</sup>

在探讨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或君主观时, 我们听到一种主张, 总统也许会无视或边缘化那些规定严禁实施酷刑的条约。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宣布“政府连续性”计划之前, 联邦政府的三大机构就通过相互制衡推行了一系列严禁实施酷刑的法律, 结果却未能执行。<sup>⑤</sup>

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切尼的政府连续性计划一脉相承, 布什政府同样侵犯了人身保护权, 该权利是由《大宪章》所赋予, 英国国会

① Jack Goldsmith, *The Terror Presidency: Law and Judgment insid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Norton, 2007), 82.

② Goldsmith, *The Terror Presidency*, 183.

③ *Minority Report,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 - Contra Affair*, 100th Congress, 1st sess., House Report No. 100 - 433, Senate Report No. 100 - 216, 465.

④ Schwarz and Huq, *Unchecked and Unbalanced*, 174.

⑤ Schwarz and Huq, *Unchecked and Unbalanced*, 72; cf. Sloane, “The Scope of Executive Power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347.



1679年将其纳入法定权利，美国《宪法》也承认。然而，在分析如今我们所面临的宪法危机时，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前所未有、无端反常的事件，相反，这危机的根源早已埋藏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之路中，我们认识这一点至为重要。

## “9·11”事件、深度事件和美国社会的 全球主导思想

过往的这些深度事件长久延续，这对那些希望能够了解并更正其根源的人而言是一大难题。美国主流媒体（如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早就合起伙来为朝鲜战争、东京湾事件和约翰·F. 肯尼迪遇害案散播谎言，它们和政府一道刻意隐瞒真相，绝不让任何一事情露出真面目。<sup>①</sup>

正如笔者在他处所述，这折射出问题所在，国家战争机器以全球主导为目标，不仅在华盛顿的街头盛行，连主流媒体甚至是高校大学都已经接受近年来国家战争机器对《宪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权的侵犯，它们完全无视或至少以沉默方式对待那些深受此害的人们。<sup>②</sup> 正如接受官僚集体思考是国家在体制内升迁的必要条件，人们要想参与主流公共生活，承认这种眼下通行的思潮已渐渐成为一大条件。

笔者的这一观点其实远比普遍通行的“商业共识”概念要狭窄，这一概念由加布里埃尔·考尔考（Gabriel Kolko）提出，即所

① Cf. th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media critic Philip Weiss, “When Black Becomes White,” in *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ed. Kristina Borjess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2), 186; 主流媒体（对肯尼迪遇害的各种推测）的反应平淡无奇——只是老老实实、毫无意义地报道政府言论，循环往复。

②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10, 383, 395.



谓的“中央现实”，强调“统治阶级如何推行其政策”。<sup>①</sup>笔者认为，至少从里根时代开始，笔者现在所描述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在统治阶层中盛行，他们不顾一切要保住自身特权，甚至不惜牺牲社会上其他人士的利益，也要扩大特权范围。

不过笔者所说的思想观念聚焦的范围更为狭窄——起初只是想捍卫美国的全球主导权，后来逐渐是要在这个资源有限而且在不断减少的时代里，不断扩大自身的主导权。渐渐地，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共识，而更多的是严重的分歧和争议。

不过这种思想也并非众望所归，这是可以肯定的。其实早就有各种嘹亮的反对之声，例如詹姆斯·雷森（James Risen）和埃里克·李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曾在《纽约时报》上披露，布什政府藐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FISA），在美国境内无证监听电话内容。<sup>②</sup>

布什政府衰落之年，就是否应该攻打伊拉克，媒体不断爆出反对声音。前近东事务（Near Eastern Affairs）助理国务卿 J. 斯科特·卡朋特（J. Scott Carpenter）曾透露，2007 年中期，切尼不遗余力号召对伊朗施行空袭，不过被五角大楼官员们否决了，他们坚持事先清楚了解在冲突升级的进程中，美国究竟可以走多远。<sup>③</sup>

① Gabriel Kolko, *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xii - xiii.

② James Risen and Eric Lichtblau, "Spying Program Snared U. S. Call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05.

③ Gareth Porter, "Attack Iran? Cheney's Already Tried," AlterNet, June 10, 2008, <http://www.alternet.org/audits/87488>; "根据乔治·W. 布什政府一位官员的消息，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强烈反对迪克·切尼副总统去年（2007 年）夏天提出的建议，他要求向伊朗革命卫队（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s）基地发动空袭，五角大楼则要求政府必须事先清楚了解，在与伊朗冲突升级的进程中，美国究竟可以走多远。当时的国务院近东事务局助理国务卿 J. 司各特·卡朋特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国防部高级官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利用恶化升级作为反对切尼提议的主要论据。8 月，麦克莱契（McClatchy）报业报道，根据两位伊朗政策官员的消息，好几周之前，切尼就已经提议‘向伊朗的可疑训练营发动空袭’。”





不过在其他一些没有太多公开讨论的问题上，尤以伊拉克战争为甚，《时代周刊》未能发挥出当年美国攻打越南时它所扮演的公正评论员的作用，令人大跌眼镜。总体而言，正如克里斯汀娜·博杰森（Kristina Borjesson）在其书中的哀叹那般：“调查报告缩水……因为代价高昂，容易招来官司，可能还会伤及企业利益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母公司的公关部门。”<sup>①</sup> 批判性思考“9·11”事件，就像思考当年的肯尼迪遇害案。《邮报》（*Post*）就曾顶住压力预言，探寻“9·11”事件真相的过程将“嘈杂刺耳，各执一词……各种阴谋轮番上演”。<sup>②</sup>

### 全球主导共识里的深度事件和阴谋诡计

很多左翼美国外交政策评论家喜欢强调历史的实质延续性，从20世纪40年代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战后规划“战争与和平研究”（War and Peace Studies）项目，到20世纪50年代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计划要推行“永久的战争经济”，再到1993年克林顿在联合国宣布，美国将“在可能时进行多边行动，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sup>③</sup>

从这一视角观察美国政策，让不少人哀叹，尤其是亚历山大·

- 
- ① Borjesson, *Into the Buzzsaw*, 13, 甚至连乔治·W. 布什的前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Scott McClellan）都在其著作中将媒体称为布什政府挑唆战争的“共犯”。Scott McClellan, *What Happened: Inside the Bush White House and Washington's Culture of Decep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70, 125.
- ②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06. Cf. BBC, "Paranoia Paradise," April 4, 2002,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1909378.stm](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1909378.stm). 这些文章的共同策略是出人意料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离奇古怪的信念观点上，力图将其塑造成批评反阴谋论的代表。
- ③ E. g., Paul L. Atwood, "War and Empire Are and Always Have Been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Global Policy Forum*, February 2006, <http://www.globalpolicy.org/empire/history/2006/022006history.htm>.



科克本 (Alexander Cockburn), 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被“‘9·11’事件阴谋主义观”的“根本无知”和“蠢钝”取而代之。<sup>①</sup> 不过大家也相当有可能承认, 美国政策一直存在延续性, 并且还暗藏着关键且反复的内部分歧, 从而滋生了美国结构性的深度事件。这些事件, 一方面不断地牵涉到华尔街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之间的摩擦, 另一方面也牵扯到日益强势的中西部和得克萨斯州阳光地带的石油军事经济中心。

麦克阿瑟将军 (General MacArthur) 凭着中西部和得克萨斯州的支持, 扬言要挑战杜鲁门和国务院。此时, 传统的东北地区欧洲先论者和新富阶层亚洲先论者相互敌对。在 1952 年的竞选中, 外交政策的辩论焦点是民主党的“限制观”和共和党的“击退观”。继弗兰茨·舒曼 (Franz Schurmann) 之后, 布鲁斯·康明思撰文探讨这种分歧, 就连中情局内部也意见各异, 一方面是“华尔街式的国际主义”, 另一方面是“牛仔式的扩展主义”。<sup>②</sup>

很多人遵循了迈克尔·克莱尔 (Michael Klare) 的做法, 将这种冲突, 甚至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内部的冲突, 定义为“贸易商”和“普鲁士”武士之间的冲突。<sup>③</sup> 由于所谓的“火神”团体影响力渐增——主要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迪克·切尼和保罗·沃尔福威茨, 他们得到了“新美国世纪计划”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的支持。自此, 这种分歧常被称为维持现状的多边主义者和寻求美国不可动摇霸主地位的单边主义者之

① Alexander Cockburn, “The Age of Irrationality: The 9/11 Conspiracist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Left,” *Counter Punch*, November 28, 2006, <http://www.counterpunch.org/cockburn/11282006.html>.

②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23, cf. 13 - 14; Herbert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③ Michael Klare, *Beyond the “Vietnam Syndrom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81).



间的冲突。<sup>①</sup>

笔者所论及的以及其他的各种深度事件，例如 U-2 飞机坠机事件，仔细分析其根源就可发现，在维持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方法上，存在贸易倾向（多边主义者）和武士倾向（单边主义者）的对立。数十年来，倾向武士的分支明显只是一小支队伍，却是一支激进而又资金实力雄厚的小队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倾向贸易的这支大队伍相对消极、组织涣散。因此，以掌握主导权为目标的战争体制，在军事—工业体系强劲的资金支持之下，外加众多深度事件，虽然不是永远独占鳌头（例如 1968 年的“普韦布洛号”事件），不过却一次又一次占得上风。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小撮队伍，领袖是保罗·尼兹（Paul Nitze），联合了来自军事—工业体系的企业高管，如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还有倾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新保守主义人士，如理查德·珀里（Richard Perle），他们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联盟，如当前危机委员会。对于这群人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当福特总统执掌白宫时，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起抵制亨利·基辛格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sup>②</sup>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还秘密修改政府连续性计划条款，在“9·11”事件中付诸实施，两人公开参与组建新机构取代当前危机委员会，即“新美国世纪计划”。

弗莱彻·普劳蒂（Fletcher Prouty）上校所在办公室与中情局和美国空军都有交集。据他推测，有一个“特工队”（Secret Team）存在中情局内部可又不仅限于此，该队伍不仅参与了东京湾事件（把握时机，将已经制定好的针对北越的军事计划付诸实

① E. g., Robert Wright,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Slate*, October 11, 2001  
<http://www.slate.com/id/117170>.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57 - 61. Cf. Jerry Sanders,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ain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施)，还参加了其他深度事件，例如1960年的U-2坠机事件（在普劳蒂看来，根本就是有预谋的，想拿准时机，破坏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之间的高峰会议），甚至包括刺杀肯尼迪总统（此事之后，这支特工队“开始掌控了战争的大方向，并掌管美国所有活动”<sup>①</sup>）。

普劳蒂的一个观点既适用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也适用于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他认为，中情局的举动遵循着一种行为模式，这些行为“在东南亚地区完全失控”。

地下特工……通过发起一件细微、秘密却足以引发公然报复的挑衅袭击事件，从而埋下铺垫。这些秘密袭击事件，也许是由第三方执行，也许是由不受国家管制的雇佣兵执行，后者的物资由中情局秘密供应，毋庸置疑，这些事件将反过来引发美国国内的关注。……这不是什么新把戏。但是在越南北部问题上，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和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将这种手法玩到了新高度，也为东京湾袭击事件奠定了模式。<sup>②</sup>

笔者之所以要提及普劳蒂的观点，其实是为了说明笔者的一些不同看法。笔者看来，他的“队伍”概念其实是笔者全球主导思想的地方化，过于狭隘，仅指代一个有限的群体，他们是一丘之貉，长期以来策划阴谋。他曾经指出这种阴谋主义思想，遭到G.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批评。

我们所有人都严重倾向于执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显

① L. Fletcher Prouty, *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1997), <http://www.ratical.org/ratville/JFK/ST>.

② Prouty, *The Secret Team*, Cha 2.



现的缺陷之下，总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邪恶阴谋。……（阴谋论）总在鼓吹一种信念，只要我们除掉一些恶徒，整个世界就会安然无恙。<sup>①</sup>

笔者现在的立场和几年前笔者回应多姆霍夫时的立场是一致的：“一直以来，我都相信，了解肯尼迪谋杀案的真相，其结果不在于找出‘一些恶徒’，而是看到体制和准军事框架，它已经成为国家系统管理的方式。”<sup>②</sup> 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援引了笔者这番论述，并补充道：“总而言之，国家安全机构的阴谋（或者是笔者所称的深度事件）是我们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而非其衍生物。”<sup>③</sup>

到现在，笔者所论及的深度事件的结局，主要都是战争机器取得一系列胜利。<sup>④</sup> 不过也有一些结构性深度事件，尤其是1972~1974年的水门事件和1986~1987年的伊朗门事件，则可称为暂时性的失败。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笔者曾试图说明，当福特总统执掌白宫时，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对水门事件之后开展的改革恨之入骨，因为这些改革提醒着他们自己的失败。两人立即推行各种举措，力图颠覆这些改革。笔者认为，这些举措的巅峰当属“9·11”事件后，两人终于将谋划已久的政府连续性计划付诸实践，他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负责构思这项计划了。

因此，自二战以后，武士倾向的队伍，原本只是一支边缘化的

---

① G. William Domhoff, quoted in *Conspiracies, Cover - Ups, and Crime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Mind Control in America*, by Jonathan Vanki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1), 125 - 126.

②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FK*, 11.

③ Parenti, *Dirty Truths*, 188.

④ 在约翰·肯尼迪遇害案中，这种观点遭到质疑，尤其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这一传统议题，笔者个人最近的看法 se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285 - 340。



阴谋小团体，后来却随着里根和布什当政，开始逐渐占据中心位置。最佳代表要数自1981年之后国家政策委员会影响力的提高，起初该机构的出资人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亿万富翁纳尔逊·邦克·亨特（Nelson Bunker Hunt），其设立目的明显是为削弱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影响力。<sup>①</sup>将20世纪50年代和今时今日相比照，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较之五角大楼，国务院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经济日益军事化，如今的问题是，一个更倾向贸易化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能否再度赢得上风，不至于让美国最终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甚至一败涂地。

当布什时代进入尾声，不为所知的政府连续性程序入侵国家体系，很多人撰文感慨，布什领导的白宫是一种新的帝国总统制度，将民主彻底颠覆。<sup>②</sup>时至今日，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民主党人士的支持下，这位新的民主党总统并未终止隐秘的政府连续性统治管理。2009年9月，他还宣布美国再度进入紧急状态，重蹈当年“9·11”事件之后的覆辙。

## “9·11”事件对《宪法》权力及 国会的威胁

怀疑论者会认为，国会依旧存在，而且具备《宪法》所赋予的复审并限制行政行为的权力。的确，2002年，国会联合委员会对中

①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14; Michael Standaert, *Skipping towards Armageddon: The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of the Left Behind Novels and the LaHaye Empire* (Brooklyn, NY: Soft Skull Press, 2006), 112-114.

② Charlie Savage, *Takeover: The Return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Subver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7), 51. 奇怪的是，萨维奇并未明确提及政府连续性，不过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政府连续性计划的十年，是自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福特政府失去权势地位之后，“一群狂热的阴谋分子”秘密策划，企图让“帝国式的总统复辟”之举。



情局和 FBI 在“9·11”事件之前和之后的行为展开调查。<sup>①</sup>然而，国会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委员会报告中一段关键部分，即有关中情局、沙特政府和劫机犯哈立德·阿米达来往的准确论述，被政府当局加密，不得外泄。当《新闻周刊》(Newsweek) 收到一些爆炸性的讯息，委员会成员和员工（而非沙特政府）成了 FBI 泄密案件的调查对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鲍勃·格雷厄姆 (Bob Graham) “认为泄密调查明显是当局为了震慑国会之举。如果果真如此，那他们就成功了。联合委员会成员及其员工大为惊恐，对调查一事三缄其口”。<sup>②</sup>

国会两院民主党多数派当选，可是对现今形势并未做出什么改变。2007 年第 110 届国会《保护美国法案》(Protect America Act) 批准无证电子监视（布什政府称其为政府连续性条款<sup>③</sup>），正如总统所愿，该法案限制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法庭监管权。第 110 届国会未能取消 2006 年的《军事委员会法案》(Military Commissions Act)。正如罗伯特·帕里 (Robert Parry) 在《巴的摩尔纪事报》(Baltimore Chronicle) 上撰文所写，“该法案彻底无视非本国公民的人身保护权，其中包括合法定居

① U. 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U. 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Joint Inquiry into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Senate Report 107-351.

② Philip Shenon, *The Commission: The Uncensored History of the 9/11 Investigation* (New York: Twelve/Hachette, 2008), 54-55.

③ “2005 年，美国国安局无证电子监控事件首次曝光，布什在美国总统办公室 (Oval Office) 发表全国演说并坚称，正在考虑的间谍行动‘每 45 天’就会复审一次，这是评估‘政府连续性’所受威胁的计划之一”，Christopher Ketcham, “The Last Round - Up,” *Radar Online*, May 15, 2008, <http://circleof3.blogspot.com/2008/05/last-round.html>. Cf. President's Radio Address, December 15, 2005,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12/20051217.html>: “我授权的各项行动大约每隔 45 天就会复审一次。每次审核都是基于最新的情报评估，分析恐怖分子对本国政府连续性的威胁，以及本国国土将面临的灾难性打击。”



的“外国人”。<sup>①</sup>

让人不安的是，国会没太多心思甚至压根不愿去挑战或质疑对于反恐战争的压倒性思维。我们如今仍旧处在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下，第一次进入紧急状态还是2001年9月14日布什总统宣布的。<sup>②</sup>2001年9月18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撰文，“周五，布什总统一声令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推行近500项蓄谋已久的法律条款，有些条款可以让他有权强制推行审查制度和戒严法”。《华盛顿时报》所指的是2001年9月14日总统《第7463号宣言》（*Proclamation 7463*），即《鉴于恐怖分子袭击，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宣言》（*Declaration of National Emergency by Reason of Certain Terrorist Attacks*）。之后，2001年9月23日第13224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3224*）再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007年9月20日，布什总统再度官方宣布延长该行政令。<sup>③</sup>2009年9月10日，尽管民众请愿不要延长，可奥巴马总统在未经讨论的情况下，再度将其延长。<sup>④</sup>

## 政府连续性、《第51号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总统令》 （NPSD-51）、国会相互制衡面临挑战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国家宪法制度带来了影响，而随着2007年5

- 
- ① Robert Parry, “Gonzales Questions Habeas Corpus,” *Baltimore Chronicle*, January 19, 2007.
- ② 9/11 Commission Report, 38, 326; Scott, *The Road to 9/11*, 228-229.
- ③ White House Notice of September 20, 2007,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9/20070920-9.html>.
- ④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0,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Notice-of-continuation-from-the-president-regarding-the-emergency-declared-with-respect-to-the-September-11-2001-terrorist-attacks>. A press briefing by Obama's spokesman Robert Gibbs the same day did not mention the extension.



月9日总统推行《第51号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总统令》（*National Security and 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 - 51*, NSPD - 51）之后，这种影响更为严重。该总统令规定（甚至没有媒体报道），“当总统宣布进入灾难性紧急状态，总统有权力处理政府所有事宜，并指挥所有私营部门各项活动，以确保国家走出紧急状态，‘保持宪政’”。<sup>①</sup>

这项总统令，虽然没有明确表述，然而却貌似颠覆了水门事件后于1977年《国家应急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所规定的国会监管的法律条文。<sup>②</sup>

各大报纸中，只有《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第51号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总统令》，指出“这道总统令正式宣告，权力从国土安全全部转移到了白宫”。<sup>③</sup> 报道补充如下。

2001年袭击事件之后，布什指派近100名高级文职官员，在华盛顿之外的地区秘密巡视，为期数周或数月不等，以维护国家安稳。这像个影子政府，凭借着长期以来的“连续性行动计划”得以生存。

但是，《华盛顿邮报》没有注意到，这些据传要颠覆《宪法》乃至国会的政府连续性计划是高度保密的——它们是20年来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秘密筹划的成果，即便在有些时期，两人均没有在政府供职。<sup>④</sup>

- 
- ① Jerome Corsi, "Bush Makes Power Grab," *World Net Daily*, May 23, 2007, [http://www.worldnetdaily.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55824](http://www.worldnetdaily.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55824).
  - ②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National Emergency Powers," updated August 30, 2007, 10ss,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98-505.pdf>.
  - ③ *Washington Post*, May 10, 2007.
  - ④ Scott, *The Road to 9/11*, 183-187, citing James Mann, "The Armageddon Plan," *Atlantic Monthly*, March 2004,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prem/200403/mann>; James Mann, *The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转下页注)



在选民以及很多“9·11”事件真相探寻运动成员的要求下，国会议员彼得·迪法茨奥（Peter DeFazio）的确曾试图查阅《第51号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总统令》保密附件中所提及的政府连续性计划。不过他和国土安全众议院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f Homeland Security）主席俩人申请查阅这些附件均被拒绝，理由是委员会不具备特殊许可。国会想要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不过，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已经无所作为，新上任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延长了紧急状态时间，借机为政府连续性正名。

国会无所作为，自然没有履行《国家应急法》所规定的法定责任，该法案是水门事件之后的改革之一。2001年9月11日，切尼制订政府连续性计划，三天之后，《第7453号紧急宣言》（*Emergency Proclamation 7453*）批准该计划。《国家应急法》特别说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最多六个月之内，并且紧急状态延续时，不得迟于六个月期限之末，国会议院必须召开会议，共同投票表决是否该终止紧急状态”（50 U. S. C. 1622, 2002）。

然而在未来九年里，国会从未召开过任何会议，讨论2001年9月14日布什总统宣布的紧急状态。2009年1月，民间组织请愿要求国会承担起自身责任，结果实质性的回复只有一个：一位国会议员发回一封邮件，该法案已不在政府连续性计划管制之下。

果真如此，那么国会议员杰克·布洛克斯（Jack Brooks）在1987年所做出的一番论述则很有道理，他认为政府连续性计划

---

（接上页注④）*Cabinet*（New York: Viking, 2004），138 - 145；Bamford, *A Pretext for War*, 70 - 74. Cf. Peter Dale Scott, “Congres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Continuity of Government Planning: The Showdown,” *Counter Punch*, March 31, 2008, <http://www.counterpunch.org/scott03312008.html>.



“将颠覆美国《宪法》”。<sup>①</sup> 在颠覆过程中，国会和媒体都是沉默不语的共犯，而公众几乎一头雾水。

---

<sup>①</sup> Scott, *The Road to 9/11*, 184; Ross Gelbspan, *Break - Ins, Death Threats, and the FBI: The Covert War against the Central America Move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184.

第四部分  
美国与今日阿富汗



## 第十章

# 奥巴马与阿富汗： 美国遭毒品腐蚀的战争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参与总统大选，很多人觉得，“这改变了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我们太需要找到一个新方向了”。<sup>①</sup> 与之前绝大多数竞选赢家一样，至少从约翰·F. 肯尼迪开始，形形色色的投票人为之所动，纷纷支持奥巴马，期待着他能带来显著变革。然而在一年之内，奥巴马不顾一切地效仿布什，令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中越陷越深，不仅如此，他还将战火蔓延到巴基斯坦。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变革，恐怕没多少投票者希望看到。

而在我们这些人看来，这压根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坚信，在华盛顿存在着一台势力猖獗、根深蒂固的战争机器。当年吉姆·卡特当选之后，众人大失所望，如今情形和那时如出一辙：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承诺要缩减国防预算。结果事与愿违，他不仅提高了国防预算，还在印度洋扩张美国势力。<sup>②</sup>

笔者在《通向“9·11”之路》一书中写道，卡特当选之后，

---

① John Nichols, "Obama's Campaign Merits a Peace Prize," *The Nation* (blogs), October 10,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blogs/thebeat/482916/obama\\_s\\_campaign\\_merits\\_a\\_peace\\_prize](http://www.thenation.com/blogs/thebeat/482916/obama_s_campaign_merits_a_peace_prize).

②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65-69.



表面上看，得益于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美国寻求单边主义唯我独尊的传统将会得到遏制。但是……20世纪70年代时值“智利反革命运动”，凭借大量资金援助，推动保守思潮。……1979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II》签署通过，此时，卡特已经批准着手新型武器开发，增加军队预算（彻底违背了自己竞选时的承诺）。<sup>①</sup>

卡特违背诺言，他这套复杂的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当政时，再度被成功复制。当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地位显赫，甚至在克林顿时期就已经为乔治·W. 布什总统的新保守主义派胜出搭好了舞台。<sup>②</sup>

## 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模板

战争机器内，部分成员的目标30多年来从未改变：再干一次，要干得漂亮，一雪越南战争失败的前耻。不过，取得阿富汗战争胜利的主要障碍和当年越南战争别无二致，即没有一个易于安抚的社会，没有坚实的中央政府或政治势力做后盾。对于这种与越南战争的类似性，奥巴马在演讲中予以否认，他说：“和越南不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支四处散乱的叛军。”然而，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人类学研究协调员托马斯·H. 约翰逊（Thomas H. Johnson）及克里斯·梅森（Chris Mason）非常精准地阐释了越南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相关性。他们有一句值得回味的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66-67.

② Scott, *The Road to 9/11*, 67-68, 参考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对美国所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评估。Cf. Len Colodny and Tom Schachtmen, *The Forty Years Wa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cons, from Nixon to Obam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365-366.



话：“与其把阿富汗战争比喻成越南战争，倒不如说越南战争是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模板。”

人们常说，20世纪里的那些冲突，美国只是把之前的战争重打一遍，近来，不少分析家和记者都喜欢将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也许是担心比喻过度，绝大多数人避而远之。其实大可不必——与其说越南战争是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比喻，倒不如说是一个模板。八年来，美国再度陷入与当年越南战争别无二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重走50年前的老路而不自知，真是莫大之痛。<sup>①</sup>

他们援引杰弗里·莱克德（Jeffrey Record）的论述如下。

“美国无法在越南取得持久胜利，根本的政治障碍就是那个政治上非法、军事上短浅、整体上腐败的越南南部附庸政权。”把这句话里的“越南南部”换成“阿富汗”，这句话依然准确无误地描述了今天的喀布尔政府。与阿富汗相似，从国家层面来说，越南南部聚集着一群唯利是图、严重腐败的军阀，他们很多人都和油水丰厚的鸦片贸易难逃干系，走出首都，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在越南，我们国家流血流汗，人力物力损失惨重，所换来的这点军事好处，根本就不足以耗去敌人的队伍，他们也不会放下反击的念头，国家体制失效无能，官员贪赃枉法，毫无才干，自私自利之风大行其道，这种政治风气如何能维持那点军事好处。<sup>②</sup>

① Thomas H. Johnson and M. Chris Mason, “Refighting the Last War: Afghanistan and the Vietnam Template,” *Militar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09, 1.

② Johnson and Mason, “Refighting the Last War,” 5, citing Jeffrey Record, “How America’s Own Military Performance in Vietnam Aided and Abetted the ‘North’ s’ Victory,” in *Why the North Won the Vietnam War*, ed. Marc Jason Gilbert (New York: Palgrave, 2002), 119.





如果约翰逊这篇文章稍微迟一点写，他没准还会谈到中情局在阿富汗的一颗棋子——艾哈迈德·瓦利·卡尔扎伊（Ahmed Wali Karzai），此人是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总统的弟弟。艾哈迈德·瓦利·卡尔扎伊曾是头号毒品走私贩，凭借自身势力明目张胆地协助伪造竞选结果。<sup>①</sup>这简直就是越南吴廷琰（Ngo Dinh Nhu）的翻版，他是吴廷琰总统（Ngo Dinh Diem）的弟弟。吴廷琰也是越南毒品走私组织者，他那令人闻风丧胆的人民劳动革命党（Can Lao）秘密部队干了不少事，其中包括在当地伪造竞选结果。<sup>②</sup>

近亲腐败，而且往往和毒品有关，这是美国所安排或支持的政权惯有的特色。有这种特色的还包括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Echeverría）的小舅子鲁宾·佐诺·阿瑟（Rubén Zuno Arce）以及伊朗国王的姐妹。对于吴廷琰，由于其兄长当选总统是靠外国支持，缺乏民间拥戴，于是不得不依赖毒品生意“获得必要资金”，从而施行政治镇压。<sup>③</sup>卡尔扎伊两兄弟的情况也如出一辙。

约翰逊忽视了另一种相似性。起初，美国在越南支持的是一支四面受敌的小队伍——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当年是在法国庇护下成长起来的。2001年，在北方联盟的支持下，美国打响阿富汗战争。该联盟其实是塔吉克—乌兹别克（Tajik-Uzbek）少数派联盟，涉嫌毒品走私，对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南部的普什图（Pashtun）多数派恨之入骨。当年美国一开始便同信仰天主教的吴氏家族勾结，从而犯下致命错误，疏离了越南农村。与此类似，在阿富汗，美国一开始就依靠北方联盟塔吉克少数派使得自身在阿富汗的影响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09.

②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1997), 239; A. J. Langguth, *Our Vietn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99;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203.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03.



力受限。[越南天主教少数派至少还和农村的佛教徒说同一门语言。但塔吉克人说达里语（Dari），这是波斯语的一支，普什图人大多数完全听不懂。]

加雷斯·波特撰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官方宣称阿富汗国民军（Afghan National Army, ANA）士兵种族平衡，其实这与事实背道而驰，根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数据，军队中，塔吉克少数派如今所占比例大大超过普什图人，后者是该国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塔吉克人主导阿富汗国民军，国家安全部门居然被敌对种族所掌控，这让普什图人大为不满，而塔吉克人愈发觉得普什图人和塔利班过往甚密。

自2002年组建阿富汗国民军以后，塔吉克人基本上控制了军队领导权，自一开始，塔吉克人就超乎寻常的在部队里占了大多数。然而，阿富汗国民军最初的种族构成还勉强算是平衡。10月30日公布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报告》指出，占人口25%的塔吉克人，目前占到所有阿富汗国民军受训士兵的41%，阿富汗国民军受训士兵中只有30%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占主导地位的关键在于2007年阿富汗国民军在坎大哈（Kandahar）和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农村地区很难征募到士兵。<sup>①</sup>

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是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犯下重大的战略失

① Gareth Porter, "Tajik Grip on Afghan Army Signals New Ethnic War," *IPS News*, November 28, 2009, <http://www.ipsnews.net/news.asp?idnews=49461>. Cf. James Denselow, "How National Is the Afghan Army?" *Guardian*, October 2, 2009. 2010年2月，美国海军在赫尔曼德省普什图核心地带马里加（Marja）发动穆斯塔克行动（Operation Moshtarak）。美国媒体解释，“穆斯塔克”的意思是“协同”——这不是普什图族语，而是达里语。



误，现在又重蹈覆辙：在一个一直以来都存在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国家，美国却企图推行中央国家集权。<sup>①</sup> 约翰逊和梅森援引埃里克·伯格鲁德（Eric Bergerud）的论述，解释了越南吴氏家族缺乏合法性的原因。

越南政府在乡村农民那里没有合法性，而农民占人口的比例最大。……在农民看来，越南政府唯我独尊、贪污腐败而且效率低下。……越南南部的城市精英阶级行事作风像外国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小团体掌握着这个贫困国家的绝大多数财富和权力，精英统治阶级对农村人民的态度，说好听点是家长统治，说难听点就是剥削统治。<sup>②</sup>

约翰逊有根有据地质疑了美国企图在阿富汗强行实施喀布尔计划，这使这个国家更为复杂多样。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19世纪的一位英国外交官亨利·罗林森爵士（Henry Rawlinson）曾这样描述阿富汗的特点：“完全由不同氏族组成，权力不平等，风俗习惯各异，之所以能凑在一起，基本是依靠统治头领个人的能力。阿富汗人心中压根没有欧洲所谓的爱国主义，因为这里没有共同国家可言。”时至今日，此番总结依然正确，也为那些立足现实的阿富汗重建计划者和未来政治规划者提供了关键的微妙信息。<sup>③</sup>

① Spencer Tucker, *Vietnam*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9), 87.

② Eric Bergerud, *The Dynamics of Defeat: The Vietnam War in Hau Nghia Provi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3, quoted in Johnson and Mason, "Refighting the Last War," 5.

③ Thomas H. Johnson, "Ismail Khan, Heart, and Iranian Influence," *Strategic Insights*, July 2004, <http://www.ccc.nps.navy.mil/si/2004/jul/johnsonJul04.as>.



根据约翰逊所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头八年，军队打击敌方的策略基本上是重走越南战争失败的老路。

自2002年起，阿富汗战争实施的战术——在各个层面都是以清剿行动为基础的消耗战，这和当年越南战争所采用的策略别无二致。越南战争时期，这些行动名为“搜寻摧毁任务”。阿富汗战争期间，则更名为“清剿行动”和“联合搜寻”，不过目的是一致的，即搜查各种可能武器，或是短期内清剿一块无甚价值、面积狭小、随机发现的聚点，然后交给当地安全部队，可是安全部队根本无法控制这些聚点，接着又在其他地方清剿。……麦克里斯特尔将军（General McChrystal）是战争爆发之后首位发现这个问题的美国指挥官，他认为遏制叛乱的基本原则是要保护人民，而不是在农村追打那些没受过教育、成天扛着枪的男孩。不过，他担任指挥官四个月之后，情况似乎没有多少改观，反而是颁布了一道为期八年的延期命令，要求不得听信敌人的祈求，利用空袭轰炸建筑物，越来越多的男孩命丧枪口。<sup>①</sup>

睿智老练的观察家罗里·斯图尔特（Rory Stewart）也同样对新的反叛乱策略持悲观态度。策略的支持者提出，每50位公民需要对应一位“训练有素的反叛乱士兵”，或者军队人数从30万（针对阿富汗普什图地区）增加到60万（针对整个国家）。<sup>②</sup>“在马来亚（Malaya）这种地方，成功镇压叛乱的关键是控制边境、拥有与地方人口数量相对应的庞大士兵队伍、得到主要民族团体的强大支持、存在长期履行责任以及可信赖的地方政府，这些在阿富汗都

① Johnson and Mason, "Refighting the Last War," 7-8.

② Rory Stewart, "Afghanistan: What Could W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4, 2010, 62.

没有。”<sup>①</sup>

约翰逊和梅森对阿富汗战争复制了越南战争模板的描述非常有意义。不过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阿富汗农村地区的势力。

阿富汗农村地区处于平衡态势时，其权力由氏族长老、伊斯兰教高僧和政府构成。……在和平稳定年代，三角权力关系中最长的一边是氏族长老，主要依赖族长制度。第二长的是高僧，不过远比第一要短。由于历史传统关系，政府权力范围极小。然而，普什图经历了伊斯兰教化的回弹，这是哈克将军在巴基斯坦发起的，而后又受到苏联—阿富汗战争的推波助澜，30年之后，三角权力关系中的宗教一支获得了最大权力，圣战分子也随之握有更大的权力，更爱滋事挑衅。

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只是略显老旧，因为现在多了毒品走私，民兵也依靠毒品走私，自1980年以后，这已经成为权力平衡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时候，贾拉勒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或哈吉·巴希尔·努尔扎伊（Haji Bashir Noorzai）这样的氏族长老凭借着毒品走私获得更多权力，这类氏族的毒品走私网络时常从父辈传给子辈。不过现在，真正手持最高权力的人是毒品走私贩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他是来自北边的普什图吉尔扎伊人，没有牢固的氏族基础。希克马蒂亚尔和越南战争时期的唐文光将军（Dan Van Quang，音译）非常相似，前者的权力一直依赖于在阿富汗库纳尔省（Kunar）和努里斯坦省（Nuristan）复杂的海洛因走私网络。<sup>②</sup>

① Rory Stewart, "The Irresistible Illusi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uly 9, 2009, <http://www.lrb.co.uk/v31/n13/rory-stewart/the-irresistible-illusion>.

②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How Heroin Is Bankrolling the Taliban and Al Qaeda*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St. Martin's Press, 2009), 127-129.



今天，我们意识到在阿富汗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毒品一直都扮演着主要角色，这种认识越清晰深刻，我们就越能发觉越南战争绝非是阿富汗战争合适的模板，虽然前者也牵涉毒品，不过毕竟不占核心位置，其实更佳的模板应该是 1959 ~ 1975 年中情局依靠毒品走私提供资金、但未被打响的老挝之战。

## 阿富汗与老挝模板

笔者大篇幅援引了约翰逊在《军事研究》（*Military Review*）上发表的悲观文章，因为笔者认为即便是非军事专业读者也应该阅读这篇文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他完美地借用越南战争做比喻，如果我们回顾中情局在老挝问题上的彻底惨败，就会发现这比喻显得愈发贴切。

就越南而言，其问题无外乎是天主教和山民（*Montagnard*）少数派之间的矛盾。越南总体是一个国家，说同一门语言，执行的是由法国确立的同一套法律制度。与之相反，老挝是由近 100 个操不同语言的氏族松松散散构成的一个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占主导地位、使用泰语的老龙族（*Lao Loum*）人数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山岭地区难以逾越，法国人相当精明，没有在老挝投入过多精力去建立什么中央政权，当时的老挝在南部和北部各有一个首都。<sup>①</sup> 和阿富汗相似，但有别于尼泊尔，老挝以前和现在（指作者写本书时——译者注）都是世界上没有铁路的国家之一。

法国人为了维持自己在老挝的最低统治，主要依赖两个少数派，这两派的语言不是泰语，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越南语和洪族语。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的战争历时太长，在老挝培育出两支部队，一支是支持法国的皇家老挝军队（*Royal Laotian*

<sup>①</sup> 南部省份直接由驻万象（*Vientiane*）的总督管理，总督同时还负责管理——间接——北部半独立的琅勃拉邦（*Louangphrabang*）王国。



Army)，虽然和洪族游击队联手，但总是纰漏不断；另一支是支持越南的寮国战斗部队（Pathet Lao，即“巴特寮”）。因此，当1954年老挝正式宣布独立时，其实是一个由两支部队、语言风俗大相径庭的氏族构成的准主权国，氏族之间界限的确定完全是任意为之，只给西方社会提供方便。要不是后来美国带着“建设国家”这种幼稚想法来到这里，这个国家也许能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美国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手握强权的中央政府，完全是痴人说梦，结果很快就导致老挝出现两个严峻的问题：大范围的贪污腐败（比越南更甚）和内战。<sup>①</sup>

中情局对老挝的策略，貌似体现了杜勒斯兄弟对任何形式的中立主义的反对，其目的是要分裂老挝，将其变为反共战场，而不能让其安安静静接受法国殖民之后首位首相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的领导，这位首相是一位中立主义者（国王的侄子）。1961年，一位中情局官员告知《时代》杂志，中情局的目标就是要“‘分化’老挝的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sup>②</sup> 如果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中情局就得偿所愿，其在老挝挑起的冲突持续了近15年。

美国不得法的过度干预造成的结局便是将一个反对越南、信奉佛教的老挝，变成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之一。美国的主要盟友是洪族的一支，之前曾与法国联手，族人伤

① 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在老挝开展项目时（或可称为庞大而又浪费的项目），内部腐败严重，主要是中情局承包商威利斯·伯德（Willis Bird）行贿，对此国会曾开展调查。See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96; Martin E. Goldste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186-187; U. S. Congress, House, *U. S. Aid Operations in Laos*, House Report No. 546, 86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② *Time*, March 17, 1961; discussion in Peter Dale Scott,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78.



亡惨重，甚至可以说是种族灭绝。1971年，伦敦《卫报》曾指出，洪族的村民“希望能远离战争——哪怕只是想保持中立或是不愿将自己13岁的孩子送到中情局的部队去打仗，结果美方便立即停止供应大米和交通设施，最后这些人还是命丧美国空军轰炸之下”。<sup>①</sup>

大家从未觉得在与越南不同的老挝，“这个制度成功了”，<sup>②</sup>或者说如果美国不是在平民层面决策失误的话，或许美国就成功了。<sup>③</sup>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美国在老挝的行动自一开始就是个灾难。真正从这场战争中获利的只有这群人——国际毒品走私贩——科西嘉（Corsican）、中国国民党或者美国。

自1959年获得中情局帮助的那一刻起，中情局的客户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就首次直接命令其部队参与鸦片走私，“以作为其（老挝）军队和政府的另一收入来源。……这一决策最终使老挝西北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洛因制造中心之一”。<sup>④</sup>中情局不仅协助欧安·莱提肯将军——富米·诺萨万的继任者，及其依靠毒品走私为资金来源的军队，甚至还为老挝高级将领们提供飞机，这些将领不久之后就心甘情愿“为他们运送鸦片”。<sup>⑤</sup>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老挝撤出，鸦片产量便迅速下滑，从1975年估计的200吨减少到1984年的30吨。<sup>⑥</sup>

① *Guardian* (London), October 14, 1971. Cf.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20 – 321.

② Cf. Leslie H. Gelb and Richard K. Betts, *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79).

③ Mark Moyar, *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54 – 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300.

⑤ John Prados, *Lost Crusader: the Secret Wars of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8.

⑥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40.



## 阿富汗历史性的破坏

和老挝类似，阿富汗直到 21 世纪依然保留着所谓“曼荼罗式”（Mandala）<sup>①</sup> 的历史特色，即一个没有主权、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山脉两侧，各种民族、法律体系、语言和宗教团体（逊尼派和什叶派）松松散散地聚在一起。<sup>②</sup> 自 18 世纪阿富汗杜兰尼（Durrani，又译“杜拉尼”）王朝伊始，阿富汗就一直是一个被外国势力践踏摧残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即使从技术上说，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然而阿富汗的统治者相继被英国和俄国推上去接着又被拉下来，英国和俄国一直在一个双方公认的缓冲区或者叫中立区开展有影响力的竞争。

杜兰尼王朝时期，不同氏族的首领松散地达成联盟，这种社会稳定性是相互容忍、谨小慎微的产物，而非由中央权力一支政治势力独霸。权力分散的一种表现就是没有哪个人有能力在阿富汗境内建设铁路——这是其他邻国国家建设的主要领域之一。<sup>③</sup>

① Martin Stuart - Fox, *A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② 笔者同意托马斯·H. 约翰逊的这番评价：“19 世纪英国外交官亨利·罗林森爵士总结了阿富汗的特征，即‘完全由不同氏族组成，权力不平等，风俗习惯各异，之所以能凑在一起，基本是依靠统治头领个人的能力。阿富汗人心中压根没有欧洲所谓的爱国主义，因为这里没有共同国家可言’。时至今日，此番总结依然正确，也为那些立足现实的阿富汗重建计划者和未来政治规划者提供了关键的微妙信息。” Thomas H. Johnson, “Ismail Khan, Heart, and Iranian Influence,” *Strategic Insights*, July 2004, <http://www.ccc.nps.navy.mil/si/2004/jul/johnson Jul04.asp>.

③ 铁路从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围绕阿富汗。阿富汗境内有可落脚车站的两条铁路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苏联建设的，起始点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英国人害怕俄罗斯人在阿富汗的势力渐长，故时而打破这种相互容忍的平衡关系。尤其值得瞩目的是，1839年，英军突袭阿富汗，12000人的军队被彻底歼灭，只剩下一位随军医生。英国公开支持其中一位名叫舒亚·沙阿（Shuja Shah）的杜兰尼家族成员的言论，此人是亲英派，流亡印度，被英国人救了回来。1842年，英军撤退，这一灾难性的变化导致此人最后被人暗杀。

阿富汗的社会构成依赖于复杂的氏族网络，却由于这样的一些干涉而被破坏。尤其是二战之后，冷战拉大了喀布尔和农村地区的差距。阿富汗的城市地区朝西方式的城市文化发展，后继的数代官僚也是在其他地区学校接受培训，多数是在莫斯科。因此，他们与阿富汗农村地区的距离越拉越远，这些人被灌输的思想是，农村人是反动分子，没有教养，落后愚昧。

与此同时，尤其是在1980年之后，农村地区温和的苏菲派（Sufi）领袖被冷落。相反，激进的圣战伊斯兰教领袖则备受重用，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特工提供了大量资金，实际上，这些资金来自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 美国沉迷于依靠毒品支撑的战争： 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

1959年，中情局单边宣布对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当时中情局没有预见到这会导致老挝鸦片产量会大幅增多。不过20年后，这段历史并没有让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退缩，1978年和1979年，他与阿富汗毒品走私贩首先建立了联系。

显而易见，此时卡特总统的白宫已经预测到未来的毒品问题。1980年，白宫毒品问题顾问大卫·马斯托（David Musto）曾向白宫毒品滥用战略委员会（Strategy Council on Drug Abuse）建议：“我们要去阿富汗支持种植鸦片的人……难道我们不应该吸取老挝



的教训吗？”<sup>①</sup> 中情局拒绝马斯托掌握他完全有合法权利获取的数据。1980年5月，马斯托公开表示他的担忧，他在《纽约时报》一篇专栏里写道：金新月地区（Golden Crescent）的海洛因已经（也是第一次）在纽约引发了医药危机。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这一危机必将恶化”。<sup>②</sup>

中情局，连同其栽培的伊朗情报机构萨瓦克（SAVAK，全称为“伊朗安全与情报组织”——译者注），起初试图增强右翼势力对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 Khan）政权的压力。穆罕默德·达乌德的政策让人不满（和先前的梭发那·富马类似），他希望与苏联和西方社会都能保持良好关系。1978年，萨瓦克和中情局资助的伊斯兰教特工从伊朗带来了“大笔资金”，试图清除军队里的左翼官员，并摧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sup>③</sup>

故意挑拨分化的结局和老挝的情况如出一辙：左翼、右翼势力激烈对抗，很快左翼势力胜出。<sup>④</sup> 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自保，左翼官员在一次政变中推翻并将达乌德杀死；他们转而设立左翼政权，该政权走极端主义，不得人心，1980年，苏联（正如布热津斯基所预言）出兵干预阿富汗，培植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派系。<sup>⑤</sup>

1979年5月，中情局与圣战组织军阀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61, citing interview with Dr. David Musto.

② David Musto, *New York Times*, May 22, 1980, quoted in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62.

③ Diego Cordovez and Selig S.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Withdraw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quoted in Scott, *The Road to 9/11*, 77.

④ Douglas Little,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223; Cordovez and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 16-17, 23-28.

⑤ Scott, *The Road to 9/11*, 77-79; Little, *American Orientalism*, 150.



建立联系，他也许是阿富汗地区追随者最少的军阀，但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毒品走私圣战分子。<sup>①</sup> 希克马蒂亚尔最著名的事迹要数朝着长袍的妇女脸上泼硫酸，阿富汗反对军不待见此人，可三军情报局却乐意用他，原因也许在于，他是唯一一位接受英国所定杜兰线（Durand Line）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分界线的阿富汗领袖。1994年，一位阿富汗领袖告诉《纽约时报》的提姆·温纳，“我们过去没有选择这些领袖。美国人给希克马蒂亚尔送去武器，从而造就了他。现在，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控制这些人，叫他们停止杀戮，将我们从他们的魔爪中救出”。<sup>②</sup> 罗伯特·D. 卡波兰（Robert D. Kaplan）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其他政党的领导、原教旨主义者及温和派都对希克马蒂亚尔恨之入骨”。<sup>③</sup>

三军情报局将绝大部分美国资金全部拨给两个边缘性的原教旨主义派系——其中一支由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另一支由阿卜杜勒·拉苏尔·沙耶夫（Abdul Rasul Sayyaf）领导，三军情报局自信自己能够控制这两个组织，根本原因在于，这两支均不得民心。<sup>④</sup> 这一决策与美国惯用的言辞大相径庭，美国一直扬言自己在协助阿富汗自由运动。<sup>⑤</sup> 凭借氏族关系为基础、深得民意的反抗团体，对这种圣战萨拉菲斯特分子的势力恨得咬牙切齿，“原教旨主义者要求取消氏族结构，理由是这种结构和（萨拉菲斯特分子）所

①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46, 49;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75–478.

②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4.

③ Robert D. Kaplan, *Soldiers of God: With Islamic Warrior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68–69.

④ See discussion in Scott, *The Road to 9/11*, 73–75, 117–122.

⑤ 例如，布热津斯基写道：“我通过特别协调委员会（简称 SCC）推动了一项决策，要对那些致力于捍卫国家独立的阿富汗人民抱以更大同情。”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427. 在同一页上，他写道：“就攻打阿富汗问题，我也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埃及交换了意见。”对于早期与巴基斯坦具有决定作用却铩羽而归的接触，他只字未提。



认为的中央集权制的伊斯兰国家不相符，这一要求让他们相当不满”。<sup>①</sup>

与此同时，在三军情报局和中情局的庇护下，希克马蒂亚尔立即着手鸦片和海洛因国际走私行动，以弥补自身不得民意的缺憾，不过他可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得到了三军情报局和海外势力的帮助。1979年2月，巴基斯坦禁止种植鸦片，同年4月伊朗也禁止种植，之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区域“吸引了西方毒品卡特尔组织和‘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财富猎人），他们想在部落区设立海洛因处理工厂”。<sup>②</sup>

1979年，数个海洛因实验室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设立。1979年4月30日加拿大《麦克莱恩杂志》（*Maclean's Magazine*）很快报道了这一情况。阿尔弗雷德·麦考伊认为，“1980年，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鸦片主导了欧洲市场，并且美国非法的毒品需求中60%由他们提供”。<sup>③</sup>麦考伊还提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控制了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地区的六家海洛因实验室，“而该地区完全受三军情报局掌控”。<sup>④</sup>

美国很快就受到影响，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海洛因在1979年之前还不值一提，却在1980年占据美国市场60%的份额。<sup>⑤</sup>到1986

① Cordovez and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 163.

② M. Emdad-ul Haq, *Drugs in South Asia: From the Opium Trade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algrave, 2000), 188. 根据一项当代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和欧洲就开始将毒品从阿富汗走私出来。See Catherine Lamour and Michel R. Lamberti, *Th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Opium from Growers to Pusher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190-192.

③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47.

④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58; Michael Griffin,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148 (labs); Emdad-ul Haq, *Drugs in South Asia*, 189 (ISI).

⑤ Scott, *The Road to 9/11*, 73-75, citing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75 (leading drug lords), 464 (60 percent).



年，该地区生产的高级海洛因首次占到全球 70%，仅在巴基斯坦就新增吸毒者 65 万人。据目击者证实，将毒品从该地区运送出去的巴基斯坦军用卡车，同时也将美国军队的“秘密”援助送了进来。<sup>①</sup>

然而在 1986 年之前，巴基斯坦唯一一次海洛因重大查获事件是因为一位挪威检控官强制要求，而不是那次美国大使馆 17 位麻醉剂官员所发起的事件。根据调查此事的一位 FBI 领导的说法，多达八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吗啡，仅有一个位于巴基斯坦的源头，为一个在纽约的西西里岛黑手党“披萨党”（Pizza Connection）供应吗啡，1978～1984 年，80% 流入美国的海洛因都源于此。<sup>②</sup>

与此同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推动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是 1980 年法国前任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德·马朗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提议的，建议中情局偷偷将毒品送至苏联军队。<sup>③</sup> 虽然后来亚历山大·德·马朗什否认执行了“蚊子计划”（Operation Mosquito），不过有报告指出，很快就有来自拉美地区的海洛因、印度大麻甚至可卡因进入苏联军队，连同与中情局—三军情报局紧密相关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战争结束之前，“不少美国情报特工都密切参与了毒品交易”。<sup>④</sup> 玛西亚·法尔科（Mathea Falco）曾在

①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61–464, 474–480; Lawrence Lifshultz, “Inside the Kingdom of Heroin,” *The Nation*, November 14, 1988; Peters, *Seeds of Terror*, 37–39.

② Ralph Blumenthal, *Last Days of the Sicilian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88), 119, 314.

③ John K. Cooley,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128–129; Jonathan Beaty and S. C. Gwynne, *The Outlaw Bank: A Wild Ride into the Secret Heart of BCC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305–306.

④ Beaty and Gwynne, *The Outlaw Bank*, 306, cf. 82; see also Stéphane Allix, *La Petite Cuillère de Schéhérazade* (Paris: Ramsay, 1998), 35, 95; Peters, *Seeds of Terror*, 45–46.



吉米·卡特政府下担任国务院国际麻醉剂管制中心（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主任，莫琳·奥斯（Maureen Orth）从她那了解到，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都曾唆使圣战分子让苏联军队沉迷毒品。<sup>①</sup>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07年，全球鸦片中93%来自阿富汗。并且，非法种植罂粟为阿富汗带来40亿美元收入，<sup>②</sup>占该国经济总量（75亿美元）一半以上，这是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UN Office of Drug Control, UNODC）做出的统计。<sup>③</sup>这也相当于巴基斯坦1/3的经济总量，尤其对于三军情报局而言，它们已经是中亚毒品交易的关键。1999年，根据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统计，三军情报局通过销售非法毒品，每年获利约25亿美元。<sup>④</sup>

## 2001年美国重蹈覆辙，再度依靠毒品走私贩

这场靠毒品为资金来源的战争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现如今依然存在：据说，现在仅在巴基斯坦一个国家，吸毒者就多达500万。然而，2001年，美国还是决定要让历史重演：企图在毒品走私贩的协助下，要强制影响一个散乱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大的种族至少有12个，所使用的语言互不相通。这与当年利用老挝的洪族一样。2001年，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也是拉拢一个显要的少数民族——以塔吉克为主导的北方联盟。一个更加相似的对照是，2000年（在克林顿总统即将下台前几周），中情局选择北方联盟的艾哈迈德·沙赫·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作为首要盟友，尽管其

① Maureen Orth, *Vanity Fair*, March 2002, 170 - 171. 一位塔吉克社会学家补充说，她知道“在当时毒品大范围运送”，并且她时常听说，俄罗斯士兵“被诱惑尝尝味道”。

② *USA Today*, January 12, 2009.

③ *Newsweek*, April 7,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29577>.

④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9, 1999.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马苏德是毒品走私贩；如果中情局（和他）在潘杰希尔省（Panjshir）设立永久基地，那将会和海洛因交易纠缠不清”。<sup>①</sup>

美国要借用毒品走私贩以在阿富汗站稳脚跟，这是板上钉钉的决策。2001年，中情局通过招募甚至是引入毒品走私贩以扩大联盟，对抗塔利班，这些走私犯一般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伙计。例如，其中一个哈吉·扎曼（Haji Zaman），他退出后住在法国第戎市（Dijon），“英国和美国的官员……和他会面并劝说他……回到阿富汗”。<sup>②</sup>

2001年的阿富汗，1980年的阿富汗，再现了1959年老挝的情况，美国的干涉为国家毒品辛迪加财团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农村地区日益动荡不安，国家上空的飞机飞来飞去，鸦片产量增加了两倍多，从2000年的3276吨（2001年降到185吨，因为当年塔利班严禁鸦片）飙升至2007年的8200吨。

为什么美国总是在支持当地最强大的毒品走私贩？数年之后，笔者总结了其中的惯常逻辑。

部分是因为现实政治（德语 *realpolitik*，又译“权力政治”）——通过毒品走私所反映出的地方权力关系。部分是因为需要摆脱国内政治的限制：由于美国预算有限，走私犯们则提供了额外所需的资金，同时他们还提供了不受战争条约限制（如美国）的资产。……这些事实……导致情报网络一直和石油及毒品

① Steve Coi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Penguin, 2004), 536.

② Philip Smucker, *Al Qaeda's Great Escape: 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 on TerRor's Trail*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2004), 9. 2001年12月4日，《亚洲时报》报道，巴基斯坦毒品大佬以及前任国会议员阿尤布·阿弗里迪（Ayub Afridi）被判刑，后从监狱中释放，还参与了美国攻打阿富汗的行动。（<http://www.atimes.com/ind-pak/CL04DF01.html>）；Scott, *The Road to 9/11*, 125.





相互勾结，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是石油美元（petrodollars）和毒品美元（narcodollars）。这些关系网，尤其是在中东，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不仅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影响到美国政府、美国银行及公司，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sup>①</sup>

由于受到麦可·科塞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和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等作者分析的影响，笔者现在更加坚信，美国银行，正如同一些石油大鳄，都因毒品走私而大获其利。参议院的一份员工报告估测，“全球每年有 5000 亿美元至 1 万亿美元的犯罪收入通过银行洗钱，大约一半是通过美国的银行”。<sup>②</sup> 2004 年，伦敦《独立报》（*Independent*）报道，毒品走私“成为继石油和军火贸易之后全球排名第三的最大现金交易”。<sup>③</sup>

佩特拉斯的结论是，美国已经变成了毒品资本主义经济体，牵扯到大量的游资或非法钱财，而且多数来自毒品走私。

华盛顿和大众媒体所描绘的美国，英勇战斗在打击毒品走私、毒品资金洗钱和政治腐败的最前线：所呈现的形象是清白无辜的双手抵抗来自第三世界（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非法钱财。

- 
- ① Peter Dale Scott, "Afghanistan, Colombia, Vietnam: The Deep Politics of Drugs and Oil," <http://www.peterdalescott.net/qov.html>.
- ② U. S. Congress, Senate, *Minority Staff Report for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Hearing on Private Ban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A Case Study of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November 9, 1999, [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 这些数字引用频率高，不过也颇具争议。即便实际数字只是参议院报告数字的一半，来路不明的资金依旧是美国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那些否认这一事实的人让笔者回想起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认为，美国的海外贸易（当时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约 2%）份额太小，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值一提。今天，不会再有人这么想了。
- ③ *Independent* (London), February 29, 2004. Cf. Michel Chossudovsky, "The Spoils of War: Afghanistan's Multibillion Dollar Heroin Trade," *Global Research*, May 5, 2005, <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CHO404A.html>.



事实恰好与之相反。美国的银行早已制定了极其细致的政策，将非法资金转入美国，然后用这些资金投资合法生意，或是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以此使这些资金合法化。美国国会召开了无数次听证会，披露曝光银行的非法操作行为，通过了多项法律，要求所有公共执法者和私营银行家加大执法力度。然而大银行依旧我行我素，非法资金数目成倍增长，不论是参议院还是银行都不愿意停止这些行为，因为这会折损他们的利益，这些行为能为他们带来高收益，还能支撑一个可能会摇摇欲坠的帝国。<sup>①</sup>

加拿大评论员阿萨德·伊斯米（Asad Ismi）总结了一些细节。

美国可卡因开支高达 1970 亿美元，其中 91% 是在银行，美国银行每年为 1000 亿美元的毒品资金洗钱。被确定的洗钱渠道包括：波士顿银行（Bank of Boston）、纽约共和国家银行（Republic of National Bank of New York）、地标第一国家银行（Landmark First National Bank）、大美国银行（Great American Bank）、肯塔基人民自由银行信托公司（People's Liberty Bank and Trust Co. of Kentucky）及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Riggs National Bank of Washington）。

花旗银行曾帮助劳尔·萨利纳斯（Raul Salinas）——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的兄弟——将数百万美元资金从墨西哥转出，以假名存入秘密的瑞士银行账户。……除此之外，汉诺威制造公司（Manufacturers Hanover）、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和欧文信托（Irving Trust）曾经承认，自己并未向美国政府上报资金转账情况 [1970 年制定的《银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要求，凡是超过 1

<sup>①</sup> James Petras, " ' Dirty Money ' Foundation of U. S. Growth and Empire," *La Lornada*, May 19, 2001, Narco News, <http://www.narconews.com/petras.html>.



万美元的交易均要上报]。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由于未曾上报超过 120 亿美元的转账, 被处以 475 万美元的罚款。<sup>①</sup>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 (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主席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 (Antonio Maria Costa) 的信息印证了佩特拉斯的分析, “在全球危机严峻时期, 多达数十亿美元的毒品资金让金融体系幸免于难”。根据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 的报道, 科斯塔表示自己已经掌握了证据, 去年, 一些面临倒闭危险的银行, 所能获得的“唯一流动投资资金”就是有组织犯罪的收入。他指出, 最后 3520 亿美元 (约合 2160 亿英镑) 的毒品收益大部分进入到经济体系。……科斯塔表示, 大约在 18 个月之前, 他开始注意到情报机构和起诉机构, 从而首次发现了非法资金被金融体系吸收的证据。他说: “在好几起事件中, 毒品收益是仅有的流动投资资金。2008 年下半年, 银行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流动性, 因此, 流动资本成了重要因素。”<sup>②</sup>

## 战争机器与被毒品腐蚀的阿富汗战争

因此, 促使奥巴马将毒品腐败战争升级为战争机器, 绝非仅是以华盛顿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为中心的官僚阴谋这么简单。它在我们

① Asad Ismi, “The Canadian Connection: Drugs, Money Laundering and Canadian Banks,” AsadIsmi.ws, <http://www.asadismi.ws/cancon.html>. 波士顿银行替走私贩杰纳洛·安吉罗 (Gennaro Angiulo) 洗钱金额高达 200 万美元, 最终被罚款 50 万美元。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1985; Eduardo Varela - Cid, *Hidden Fortunes: Drug Money, Cartels and the Elite Banks* (Sunny Isles Beach, FL: EICid Editor, 1999).

② Rajeev Syal, “Drug Money Saved Banks in Global Crisis, Claims UN Advisor,” *Observer*, December 13,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global/2009/dec/13/drug-money-banks-saved-un-chief-claims>.



生活的社会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根基，有一个诸多势力交融的大联盟，已经扩张到全球范围。正因如此，社会发出的某个理性声音，根本无法劝停战争机器，例如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针对阿富汗反恐行动提出建议：“在打击基地组织的绝大多数行动中，美国军事力量应最小化，如果由当地军事势力负责具体实施，将更具合法性，且较之美国部队，他们对实施环境更为了解。换言之，美国部队最好少涉足，最好不涉足。”<sup>①</sup>

这台战争机器也不会因为近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一项研究结论而停下脚步，“外国军队的干预，是促使塔利班复苏的重要因素”（从当年苏联干预的后果中，就该谨记这一教训）。<sup>②</sup> 为了给自己所谓“全方位主导”的国际战略正名，五角大楼迫切需要在阿富汗发起“反恐战争”，就像十年前，它需要在哥伦比亚发起“禁毒之战”，最后适得其反。

当然，全方位主导本身绝非最终目的；那些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也竭力推动这一战略，尤其是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该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其他地区有巨额投资。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在其著作《资源战争》（*Resource Wars*）中指出，美国向阿富汗宣战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巩固美国在波斯湾和里海的势力，确保石油源源不断供应”。<sup>③</sup>

① RAND Corporation, "How Terrorist Groups End: Implications for Countering al Qaeda," Research Brief, RB - 9351 - RC, 2008,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9351/index.1.html](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9351/index.1.html).

② Gilles Dorronsoro, "Focus and Exit: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the Afghan Wa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009,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afghan\\_war\\_strategy.pdf](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afghan_war_strategy.pdf).

③ Michael T.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quoted in David Michael Smith, "The U. S. War in Afghanistan," *The Canadian*, April 19, 2006, <http://www.agoracosmopolitan.com/home/Frontpage/2006/04/19/01181.html>, emphasis added. Cf. Scott, *The Road to 9/11*, 169 - 170.



相比较于阿富汗的资源，美国石油公司更注重把握这个建设管道的契机，以获得苏联国家的汽油资源。1998年，优尼科公司（Unocal）执行官约翰·马拉斯卡（John Maresca）向众议院国家关系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证实，从土库曼斯坦开始，途经阿富汗，最后抵达巴基斯坦海岸的石油管道〔名为“中亚石油管道（简称 Centgas）”〕计划将带来盈利。<sup>①</sup> 第二条穿过阿富汗的石油管道也在优尼科公司计划之中，该公司还曾组织一个塔利班代表团访问美国，其目的就是培训和游说。

为协助塔利班征服喀布尔，优尼科公司预拨资金〔据法国观察员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所言〕，这已经违反了美国法律。不过优尼科公司负责管道项目的副总裁却表示，公司“并未提供任何现金回报”给该政权的成员，以换取他们的合作。<sup>②</sup>

就在“9·11”事件之后，巴基斯坦前任外交官尼亚兹·奈克（Niaz Naik）曾告诉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为支持优尼科公司建设途经该国、连接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的石油、汽油管道计划，乔治·W. 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前曾威胁塔利班。<sup>③</sup> 根据查尔摩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评论，“支持该企业的项目（石油、汽油双管道计划）似乎是布什政府决定于2001年10月7日攻打阿富汗的主要考量”。<sup>④</sup>

① Scott, *The Road to 9/11*, 166, 170;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C. 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9-180. 参议员汉克·布朗（Hank Brown）支持优尼科公司的项目，他期待喀布尔的失败，在他看来这是建立稳定政府的契机。

② Brooke Shelby Briggs, “The Taliban, Unocal and a Pipeline,” *Pacific News Service*, <http://130.94.183.89/magazine/pipeline.html>.

③ BBC, September 18, 2001.

④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4), 176.



## 奥巴马 2009 年增兵，前景难测

两位见多识广的观察家都曾经对巴拉克·奥巴马寄予厚望，当奥巴马在 2009 年 12 月宣布向阿富汗新增兵 3 万人次时，两人的评价则出现分歧。这次增兵，每年将耗去 300 亿美元，而美国驻扎在当地的兵力将达到 9.8 万人，另外还有非美国籍的外国军队 3.2 万人，美国花钱雇的雇佣兵 10.4 万人，费用全部通过美国的承包商，例如黑水公司支付。<sup>①</sup>

苏格兰人罗里·斯图尔特（Rory Stewart）曾赞赏奥巴马的演讲，他本人在阿富汗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包括步行横穿该国的宏伟之举。早在 2009 年 7 月，斯图尔特就曾表示，美国应该从掌握主导权的幻想中醒来，放弃主导阿富汗国家建设的野心，制定更加切实的目标。

对待阿富汗的最佳政策就是减少外国兵力，将现有 9 万人大

---

① Phyllis Bennis, "Annotate This: President Obama's Afghanistan Escalation Speech,"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December 2, 2009, [http://www.fpif.org/articles/annotate\\_this\\_president\\_obamas\\_afghanistan\\_escalation\\_speech](http://www.fpif.org/articles/annotate_this_president_obamas_afghanistan_escalation_speech). 艾米·高德曼（Amy Goodman）总结了杰瑞米·斯加西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艾米指出：“据说，黑水公司先前曾参与了一次未对外公开的美国军队无人飞机轰炸事件，巴基斯坦境内数十人死亡。黑水公司的员工一直在执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项秘密行动，他们是军队高级别秘密行动小组的成员。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先前不为人知的各项行动就包括美国首次承认的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军事活动。据某个军队情报来源所言，黑水公司的员工实际上同时执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和中情局执行无人飞机轰炸行动。中情局的无人飞机轰炸行动已经是众所周知。不过据这个消息，部分被认为是中情局所为的最血腥无人机轰炸，实际上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所为。另外，这篇文章还揭露，黑水公司与当地一家安全公司额外签署协议，与巴基斯坦势力联手开展地面行动。这些行动就包括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及其他地区搜查住宅，封锁边境。黑水公司的其他责任还包括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行动做规划。”



幅缩减至约 2 万人。在这之后，国际社会还面临两大目标：发展和反恐。两者不等同于阿富汗国家建设……

减少军队数量，不再执迷于国家建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彻底退出：美国政府必须在发展援助机构所关切的各项领域开展有计划的项目，如供电、供水、灌溉、医疗、教育、农业、农村发展等。我们不应该去控制阿富汗，也无法预测阿富汗的未来。将来，这个国家也许会变得更加暴力，也许会找到一个分权平衡点，也许会形成崭新的统一国家，但是如果其社区依然想继续与我们合作下去，那么我们可以利用 30 年的时间在阿富汗社会中推动积极的转变，以遏制消极趋势。<sup>①</sup>

在斯图尔特看来，这些建议是奥巴马 12 月 1 日宣布新增派 3 万兵力的基础，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总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和参谋长们所要求的 75%。

奥巴马的核心——改革性——观念在于，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责任、途径和利益都是有限度的。正如他所说，“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战争的代价”。不能只为了眼下的理由来制定和执行阿富汗政策——“竭尽所能”且“不惜代价”——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所能做的终究有限。对于我们实在办不到的，我们也大可不必让自己担上道德责任的重负。……无人妄言胜利。他的目标不再是击败塔利班，而是遏制塔利班：“不能让塔利班有能力颠覆政府。”他明确反对长期的“国家建设项目”。他所说的不是放任“基地”组织，而是要保持对“基地”组织施压。……奥巴马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进一步增加兵力，从而提高了自己对将军们的影响力，也从公众

<sup>①</sup> Stewart, "The Irresistible Illusion."



那里获得了支持。<sup>①</sup>

斯图尔特坚信，奥巴马将会把兵力保持在这新水平，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就有可能很快导致将军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反暴乱能够行之有效——这种反对的声音不禁叫人回想起越南战争时期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所经历的遭遇。

不过，斯图尔特的这份自信并不被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看好，他也是一位眼光犀利的观察家，曾担任美军上校。巴塞维奇提出如下质疑。

有人提出，先是增加我们在阿富汗的兵力，接着又自信满满地说，18个月之后，我们会小心谨慎收回兵力。（奥巴马）这话说得就好像战争是一个可预测、可操控的工具，完全可以由坐在华盛顿办公室里的人们精准无误地操纵。我个人认为，越南史，以及更为广阔的战争史，给了我们不同的教训。那就是，当政客们宣战，实际上是在孤注一掷。他们完全不知道，哪些数字会飙升。他们所谓预测战局、控制战况、影响结局的能力其实是极其不稳定的。因此，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总统从自身对战争史的理解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sup>②</sup>

当被问及为何奥巴马否认自己是在复制越南模式，巴塞维奇的回答如下。

我个人认为，很不幸，总统误读了越南史。我个人的感觉是，总统决定将阿富汗战争升级，很是勉为其难。我认为有必

① Stewart, "Afghanistan," emphasis added.

② Andrew Bacevich, Democracy Now, December 2, 2009,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12/2/vietnam\\_vet\\_scholar\\_andrew\\_bacevichon\\_obama](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12/2/vietnam_vet_scholar_andrew_bacevichon_obama).





要回想，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曾经也不太情愿升级越南战争。约翰逊总统不得不说服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是承认越南战争失败，无疑会对他的国家领导能力带来严重影响，还会损伤美国的声誉，所以他只好加大力度。而且他不断自我安慰，即使局势恶化，他本人和其将军们也能够控制局面。我想，这也将是奥巴马如今所作所为的一个致命错误。<sup>①</sup>

巴塞维奇思考奥巴马决策的时间越长，他的结论就愈显悲观。

从历史上来说，对于那些没有明朗胜算的战争而言，默认战略就是消耗战。如果不知道如何取得胜利，那就试着与对手拖延，希望对方能在你之前耗尽兵力、资金和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均是如此。反暴乱教条的复苏，还被称赞为军事妙计，让美国开展了一次后现代化的消耗战。我们不再耗尽敌人气力，而是把敌对国喂大，同时自己还花掉上千亿美元的资金（从海外借），牺牲了数百名战士（从国内派）。最后结局如何呢？已经有了裁决：当美国耗尽兵力和资金，这历时长久的战争没有以胜利告终，反而是搞得心力交瘁，财政空虚。<sup>②</sup>

斯图尔特推测，奥巴马能否在未来抵制住增兵要求，能否在制定新阿富汗政策时继续利用反暴乱策略（如果这样，那么增兵是必

① Democracy Now, December 2, 2009.

② Andrew Bacevich, "Obama, Tell Me How This Ends," *New York Daily News*, December 23, 2009, [http://www.nydailynews.com/opinions/2009/12/23/2009-12-23\\_obama\\_tell\\_me\\_how\\_this\\_ends\\_is\\_afghanistan\\_just\\_a\\_new\\_war\\_of\\_attrition.html? page=1](http://www.nydailynews.com/opinions/2009/12/23/2009-12-23_obama_tell_me_how_this_ends_is_afghanistan_just_a_new_war_of_attrition.html? page=1).



然的)，一切还要看将来。<sup>①</sup>

笔者虽然时常质疑他人预测将来的能力，不过此时此刻也忍不住预言，比起斯图尔特有保留的乐观态度，巴塞维奇的忧虑更接近事实。笔者之所以如此预言，原因在于，不论是斯图尔特还是巴塞维奇，俩人都没有提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心悬不定的总统个人意愿，也不是五角大楼凌驾众人之上的战略教条，而是第三个因素：华盛顿的战争机器早已被毒品腐蚀，它的主导思想才是关键。

### 美国阿富汗战争的毒品问题

美国想要在阿富汗施行“全方位的主导权”，从而让战争冲突不断拉长，全球毒品走私将继续从中谋利，有的获利者恐怕还会秘密游说推动这件事情。笔者担心，情报机构动用资源，途经中亚，运送阿富汗的海洛因，违背人们意愿，而政策又无改变，估计还会和以前一样，中情局会加以庇护。<sup>②</sup> 诸如花旗银行这样的美国超级银行——所谓的“大而不倒”——自经济衰退以来，较之先前，对每年经自己之手洗钱的上千亿美元非法盈利更为依赖。<sup>③</sup>

在阿富汗和老挝（越南的情况不一样），海洛因一直都是主要的出口产品，意义重大，贸然中断鸦片生产，将会让那些鸦片生产

①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阿富汗战争新的战争历程，以支撑反叛乱信条：“今年，面对塔利班复苏，在任的美国总指挥斯坦利·A·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A. McChrystal）将军发出警告，如果不增加兵力，不加大反叛乱力度，就有可能败下阵来。奥巴马总统同意此观点，下令新增3万名士兵，美国的总兵力由此达到10万人”。（*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09）。

② “Deep Events and the CIA’s Global Drug Connection,” 9/11 Truth, <http://9/11truth.org/article.php?story=20081012142525948>。

③ U. S. Congress, Senate, *Minority Staff Report for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Hearing on Private Ban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A Case Study of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November 9, 1999), [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



地区面临赤贫危险。2001~2002年严冬，是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第一年，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幸亏海洛因的流通没有被打断，要是没有了鸦片收入，大量阿富汗人将会饿死。

实际上，每一项阿富汗经济研究的结论，都和2006年的《世界银行报告》相互吻合，“鸦片经济的规模和其非法本质就足以说明，鸦片已经渗透并严重影响了阿富汗的经济、国家、社会和政治”。<sup>①</sup>“要是把鸦片拿走，无疑就是抽走了该经济体中的氧气，也就等同于踩了那些依靠鸦片交易不断壮大的大佬的脚，其中包括政界军队人物，以及在坎大哈的罪犯和商人”。<sup>②</sup>

美国媒体在报道阿富汗鸦片和海洛因问题时，由始至终都抱着一种偏见，总是指责塔利班制造鸦片，而忽视了喀布尔政府以及西方国家的军队参与。例如，2008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

据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执行主席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所说，近些年来，阿富汗已经生产了如此之多的鸦片，以至于塔利班开始减少罂粟种植，储存鸦片原料，以稳定价格，保住暴乱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sup>③</sup>

但是，杰里米·哈蒙德（Jeremy Hammond）回应道：

- 
- ① William Byrd and Christopher Ward, "Afghanistan: Drug Industry and Counter - Narcotics Policy,"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8, 2006,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SOUTHASIAEXT/0,,contentMDK:21133060~pagePK:146736~piPK:146830~theSitePK:223547,00.html>.
  - ② Australian journalist Michael Ware, *Time* magazine's correspondent in Kandahar, "Afghanistan—America's Blind Eye," ABC/TV (Australia), April 10, 2002, Reporter: Mark Corcoran, <http://www.mickware.info/2002/files/2b3c5632e1c8falad68b6f83ae91a8c3-93.ph>.
  - ③ Kirk Kraeutler, "U. N. Reports That Taliban Is Stockpiling Opiu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08.



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的这份报告后面，附有科斯塔先生的评论，他问道：“谁来收取这些钱？地方霸主。换言之，到了年末，军阀、毒品头目还有叛军要从毒品种植、生产和走私中抽取近5亿美元的税收。”很显然，科斯塔先生并没有用“塔利班”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而是指出了更大范围的参与者，他们从鸦片交易中获利，而这，绝不仅局限于塔利班。<sup>①</sup>

2006年，上文所提到的世界银行的那份报告指出，“就高层而言，大约有25~30位关键走私犯，他们大多数是在阿富汗南部，控制着主要的（毒品）交易和转移，与位居政府和政治高层的赞助者密切合作”。<sup>②</sup> 2007年，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道，“海洛因交易中最高层的四人均系阿富汗政府高官”。<sup>③</sup> 2009年12月，《哈泼斯》（*Harper's*）杂志出版了一篇详细介绍阿卜杜·拉兹克（Abdul Razik）上校的文章，说他是“斯平布尔达克地区（Spin Boldak）的龙头老大”，是一个毒品走私贩，是卡尔扎伊的盟友，他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受了喀布尔和坎大哈一群狡诈阴险的官员、以及触角很长的北约组织指挥官的唆使摆弄，在他们看来，此

① Jeremy R. Hammond, 《纽约时报》在其他问题上也常常误导读者。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的确指出，供应严重过多，储存鸦片也许是成本并未下降的可能原因之一。科斯塔先生表示，‘鸦片市场没有出现相应的价格变动只是因为储存量的增多，所有证明均指向塔利班’。不过科斯塔先生本人的此番言论似乎将这篇报道的实际发现政治化了。根据估测的鸦片供应量，鸦片的市场价格的确说明有人控制了储存量，塔利班也的确从鸦片交易中获利。不过，指责塔利班就是理论上的鸦片储存方，似乎能给出的唯一证据也属偶然；而且，即便我们认为有人正在储存鸦片，也有可能是除塔利班之外的其他军阀和毒品大佬。

② “Afghanistan: Drug Industry and Counter-Narcotics Policy,”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Nov. 28, 2006,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SOUTHASIAEXT/0,contentMDK:21133060~pagePK:146736~piPK:146830~theSitePK:223547,00.HTML>.

③ *Daily Mail*, July 21, 2007.



人控制的这个关键边境小镇，对他们攻击塔利班大有帮助”。<sup>①</sup>

例如，在2005年，美国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特工们在谢尔·穆罕默德·阿坤扎达（Sher Mohammad Akhundzada）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超过九吨的鸦片，此人是赫尔曼德省的省长，也是卡尔扎伊的密友，卡尔扎伊曾在2001年驾驶摩托车陪同阿坤扎伊进入阿富汗。英国成功要求此人必须下台。<sup>②</sup> 不过据新闻报道证实，阿坤扎达下台的同时，在阿富汗参议院赢得了一席之地。<sup>③</sup>

曾担任省长的军阀古尔·阿迦·沙尔扎伊（Gul Agha Sherzai）备受美国信赖，曾于2009年资助卡尔扎伊再次竞选，此人也参与了毒品交易。<sup>④</sup> 2002年，古尔·阿迦·沙尔扎伊是美国与主要走私犯哈吉·巴沙尔·诺尔扎伊（Haji Bashar Noorzai）之间数额巨大的交易的中间人，美国同意诺尔扎伊走私毒品，交换条件是诺尔扎伊必须向美方提供塔利班的情报及武器信息。<sup>⑤</sup> 2004年，根据众议院

① Matthieu Aikins, "The Master of Spin Boldak," *Harper's*, December 2009, <http://harpers.org/archive/2009/12/0082754>.

② *Independent* (London), April 13, 2006; James Nathan, "Ending the Taliban's Money Stream: U. S. Should Buy Afghanistan's Opium,"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8, 2009.

③ *Afghanistan News*, December 23, 2005, <http://www.afghanistannewscenter.com/news/2005/december/dec232005.html>.

④ *Independent*, March 9, 2009,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former-warlord-to-fight-karzai-in-afghanistan-polls-1640164.html#mainColumn>. 2008年，奥巴马访问阿富汗，他会面的首位阿富汗领袖就是古尔·阿迦·沙尔扎伊。2002年7月21日，伦敦《观察家报》报道，为确保接受卡尔扎伊新政府，古尔·阿迦·沙尔扎伊和其他军阀“收取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交易，中间人则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组织”。

⑤ Mark Corcoran,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 2008, [http://www.abc.net.au/foreign/blog\\_mark.htm](http://www.abc.net.au/foreign/blog_mark.htm). “在这起犯罪案件的书面证词中，他发现了和美国官员的合作历史，包括与中情局，时间可以追溯到1990年。2002年初，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努尔扎伊表示，自己向美国部队交出了15卡车的塔利班武器，其中包括‘400个由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制造的防空导弹’。” Tom Burghardt, "The



国家关系委员会的证词，诺尔扎伊每 8 个星期就会向巴基斯坦走私 2 吨的海洛因。<sup>①</sup>

哈蒙德援引了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年度报告的统计数据，他估测，报告中所称的塔利班鸦片收入（9000 万 ~ 1.6 亿美元），不到 2008 年阿富汗毒品总收入的 5%（34 亿美元），不到 2009 年总收入的 6%（28 亿美元）。据估计，所有暴乱分子（不仅是塔利班）的收入大约在 2 亿 ~ 4 亿美元，不到 2008 年阿富汗毒品总收入的 12%（34 亿美元）。反过来，这个数字只是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对这片罂粟的国际市场价值（650 亿美元）估测的 5%。<sup>②</sup> 尽管这次估测数字的细节值得商榷，不过有一点显而易见，塔利班及其他暴乱分子所占的阿富汗毒品交易比例，素来不多。

自然，阿富汗毒品走私活动中，牵扯了更大更多的金融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阿富汗当地的毒品大佬、“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希贝尔·爱德蒙兹（Sibel Edmonds）曾指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情报机构相互勾结，利用国际关系网，转移阿富汗海

---

（接上页注⑤）Secret and (Very) Profitable World of Intelligence and Narcotrafficking," *Dissident Voice*, January 2, 2009, <http://www.dissidentvoice.org/2009/01/the-secret-and-very-profitable-world-of-intelligence-and-narcotrafficking>. Cf. James Risen, *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165 - 166.

① USA Today, Oct. 26, 2004. 努尔扎伊最终于 2005 年在纽约被捕，他来纽约是应一家私人情报公司——洛塞塔研究公司（Rosetta Research）之邀请。美国媒体对他被捕一事的报道并未指出，洛塞塔研究公司未能给努尔扎伊提供豁免保护，这种豁免特权以往是中情局提供（*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7,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2/26/AR2008122602099.html>; *New York Sun*, January 29, 2008, <http://www.nysun.com/foreign/justice-dept-eyes-us-firms-payments-to-afghan/70371>）。

② 私人通讯，December 29, 2009, citing UNODC reports of 2008 and 2009; cf.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2009。



洛因。<sup>①</sup>除此之外，爱德蒙兹提出，“FBI也在收集能够指证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证据——包括户主姓名——他们一直在协助国外的特工”。<sup>②</sup>道格拉斯·雷森（Douglas Risen）指出，其中一位高级官员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声称，“打击麻醉剂不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因此，国防部在阿富汗和这问题没有关系”。<sup>③</sup>

早前曾提及，洛蕾塔·拿破里奥尼（Loretta Napoleoni）曾指出，有一条土耳其和三军情报局赞助的伊斯兰派毒品线路，均为“基地”组织盟友，这条运输线路横穿中亚—西亚，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发，穿过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最后抵达科索沃。<sup>④</sup>曾担任美国缉毒局驻中东高级特工的丹尼斯·戴尔证实，中情局长久以来就在该地区的毒品关系网中有利益关联。笔者曾在一次反毒品大会上亲耳听他说道：“为缉毒局和相关机构供职30年，我的调查对象最后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在为中情局效力。”<sup>⑤</sup>

据估计，毕竟毒品走私中，超过80%的利润会落到消费国手

- 
- ① Sibel Edmonds and Philip Giraldi, “Found in Translation: FBI Whistleblower Sibel Edmonds Spills Her Secrets,”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January 28, 2008, <http://www.amconmag.com/article/2008/jan/28/00012>. 其他作者也曾撰文讨论美国情报机构与土耳其毒品—情报网络的相互勾结；例如，Daniele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224–241; Martin A. Lee, “Turkey's Drug–Terrorism Connection,” *Consortium News*, January 25, 2008, <http://www.consortiumnews.com/2008/012408a.html>.
- ② London *Sunday Times*, January 6, 2008,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middle\\_east/article3137695.ece](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middle_east/article3137695.ece): “‘如果对外公开有关FBI在这件事情中的信息，很多高官都要接受犯罪审讯’，她说。”
- ③ Risen, *State of War*, 154.
- ④ Loretta Napoleoni, *Terror Incorporated: Tracing the Dollars behind the Terror Network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 90–97: “三军情报局培训伊斯兰叛乱分子，并提供武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数个海湾国家以及塔利班则提供资金。……每个月，估计有4吨~6吨的海洛因从土耳其运出，经过巴尔干半岛国家，抵达西欧”（90, 96）。
- ⑤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x–xi.



中。<sup>①</sup> 我们坚信，这些利润有不少后来被用于游说向阿富汗开战。

毒品利润中大部分流向了喀布尔政府的支持者，正因如此，美国打击阿富汗毒品交易的战略，非常明确地将目标限定在打击支持反动分子的毒品走私贩上。<sup>②</sup> 过去和现在，中情局都在卡尔扎伊政权（由哈密德·卡尔扎伊领导，曾为中情局的帮手<sup>③</sup>）中找了不少帮手，而这些战略则间接地增加了其在鸦片市场中的份额，还包括总统的兄弟艾哈迈德·瓦利·卡尔扎伊，他是中情局非常活跃的帮手；以及阿卜杜·拉什德·杜斯图姆（Abdul Rashid Dostum），他也曾是中情局的帮手。<sup>④</sup>

笔者曾在他处分析过，美国海外禁毒行动的目标绝非是永远无望的根除毒品。一直以来，所有这些行动的动机都只不过是改变市场份额：瞄准特定敌人，由此确保国家安全机构或者中情局的那帮走私犯盟友能够掌控毒品走私。20世纪60年代的老挝就是如此，当时中情局在空军支持下，为欧安·莱提肯的部队提供军事支援，以夺取在老挝的一支有争议的鸦片运送队伍。<sup>⑤</sup> 而今天的阿富汗问题也如出一辙，美国政策的打击对象只是那些支持暴乱分子的走私犯。

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5, 2009, <http://www.iht.com/articles/reuters/2009/01/25/europe/OUKWD - UK - FINANCIAL - UN - DRUGS. ph>  
Cf. *Daily Telegraph* (London), January 26, 2009.

② James Risen, "U. S. to Hunt Down Afghan Lords Tied to Talib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09: "美国军队的指挥官已经上报国会，……只能将支持叛乱的那些人（毒品走私贩）列为目标。"

③ Nick Mills, *Karzai: The Failing American Interven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 (Hoboken, N. J.: Wiley, 2007), 79.

④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09.

⑤ Douglas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 R.: TrineDay, 2009), 333.





## 毒品腐败战争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但是，对毒品走私的容忍让我们看到与 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和老挝战争的另一相似之处：阿富汗是海洛因出口大国，当地的美国士兵毒瘾越来越重。虽然总是会听见高层对此加以否认，不过 [根据《沙龙》肖恩·麦克卡纳 (Shaun McCanna) 的披露] “要想找到一位从阿富汗归来的有毒瘾的美国士兵，压根不难。曾与我交流过的几乎所有‘永久自由行动’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的退伍老兵都知道，基地有海洛因，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身边的某人在服役期间吸过毒”。<sup>①</sup>

据报道，除阿富汗巴格拉姆 (Bagram) 空军基地之外，海洛因供应都很便利，这和 40 年前越南龙滨 (Long Binh) 的美国基地情况如出一辙，这反映出另一个令人警觉的相似性。越南战争达到巅峰时，海洛因被装在死人棺材里，<sup>②</sup> 通过水路运至美国，因此我们从前任苏联驻阿富汗指挥官迈姆特·盖列夫 (Mahmut Gareev) 将军那得知：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毒品经常是通过美国飞机被运出阿富汗。阿富汗的毒品走私每年为他们带来近 500 亿美元的收入——足以满足美国军队在当地的开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也就不会

① Shaun McCanna, "It's Easy for Soldiers to Score Heroin in Afghanistan," *Salon*, August 1, 2007, [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07/08/07/afghan\\_heroin](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07/08/07/afghan_heroin). Cf. Megan Carpentier, "Is The Military Ignoring the Heroin Problem in the Ranks?" *AirAmerica.com*, October 20, 2009, <http://airamerica.com/politics/10-20-2009/military-ignoring-its-heroin-problem/?p=all>; Gerald Posner, "The Taliban's Heroin Ploy," *The Daily Beast*, October 19, 2009, [http://www.thedailybeast.com/blogs\\_and\\_stories/2009-10-19/the-heroin-bomb/full](http://www.thedailybeast.com/blogs_and_stories/2009-10-19/the-heroin-bomb/full).

② Valentine,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171, cf. 103.



干预、更不会阻止毒品生产。<sup>①</sup>

还有很多人也发出类似于盖列夫的指责，其中包括前任三军情报局指挥官、巴基斯坦将军哈密德·古尔（Hamid Gul）。

“阿卜杜·瓦利·卡尔扎伊（Abdul Wali Karzai）是阿富汗最强的毒品巨头，”他一针见血地说道。他还补充说，“毒品大佬们同时还参与了武器走私，这在阿富汗是一个‘大有可图的行当’”。“不过在我看来，最叫人担忧的问题是军事飞机，连美国的军事飞机都用上了。毒品路线向东穿过中亚各个共和国，接着途经俄罗斯部分领域，然后抵达欧洲及之外的地区，你这说法没错。不过有些线路是直接抵达的，运输工具就是军事飞机……巴基斯坦仍旧还有阿富汗人，他们有事会联系我，并将消息传给我。有些可信度非常高。我能辨出真假。所以，他们说美国军事飞机的用途便在于此。因此，如果这是真的，那的确非常、非常让人担忧”。<sup>②</sup>

另一个略微不同的证词是来自现任阿富汗禁毒部长胡代达德·胡代达德（Khodaidad Khodaidad）将军。

阿富汗禁毒部长表示，外国军队正通过在阿富汗制造毒品而赚取利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周六的报道，胡代达德·胡代达德将军曾指出，多数毒品储藏在美国、英国和

① General Mahmut Gareev, “Afghan Drug Trafficking Brings US \$ 50 Billion a Year,” *Russia Today*, August 20, 2009, [http://russiatoday.com/TopNews/2009\\_08\\_20/afghanistan-us-drug-trafficking.html](http://russiatoday.com/TopNews/2009_08_20/afghanistan-us-drug-trafficking.html).

② Jeremy R. Hammond, “Pakistan. General Hamid Gul on Destabilizing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August 27, 2009, [http://axisoflogic.com/artman/publish/Article\\_56790.shtml](http://axisoflogic.com/artman/publish/Article_56790.shtml).



加拿大部队控制的两个省份。他还提到，北约部队还在自己的管控地区征收鸦片生产税。<sup>①</sup>

尽管各种证词层出不穷，不过笔者也不会全盘接收。本文所摘录的这些信息来源没有哪个可以被完全视为客观公正，毫无偏袒。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证词似乎还是有根据的。与越南和老挝的情形相似，美国先是在1980年，之后在2001年，在阿富汗与毒品走私贩主动联手，这是解读美国所支持的卡尔扎伊政权如今之所以深度腐败的主要因素。大家必须考虑，是不是有些美国人不愿意让阿富汗的帮凶用毒品走私的收入，进一步充实中情局给他们的补贴，就像当年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一样。

简而言之，美国在阿富汗铆足了劲支持一个不得民心、腐败堕落的政权，结果陷入绝境，要想理解这一困局，必须从美国与当地毒品走私活动的历史着手——比起越南战争，这和当年美国在老挝的所作所为更加类似。正是因为对毒品经济的长久干预模式——加之毒品走私贩的协助——让观察家们大失所望，他们曾热切期待奥巴马能在这方面带来转机。

有个问题依旧萦绕：在这场曾毒品和腐败相互强化的战争画上句号之前，还会有多少美国人、阿富汗人以及巴基斯坦人断送性命？美国无视反对，依旧加大对穆斯林世界的干预，这场冲突还要蔓延至多少其他国家——也门、索马里还是苏丹？<sup>②</sup>

① “Occupiers Involved in Drug Trade: Afghan Minister,” Press TV, November 1,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0130&sectionid=351020403>.

② See William Blum, “The Anti-Empire Report, No. 6,” January 6, 2010, <http://killinghope.org/bblum6/aer77.html>; Rick Rozoff, “2010: U. S. to Wage War throughout the World,” Stop NATO, December 31, 2009, <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2009/12/31/2010-u-s-to-wage-war-throughout-the-world>.

# 第十一章

## 结论：战争机器和毒品的 深度政治

任何思想都有社会根源。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心里，官僚的所有思想都有官僚根源。<sup>①</sup> 在主流社会的核心之地，这种官僚思想慢慢就具备了力图夺取主导权的特征，而这种欲望所塑造的结果便成了笔者所称的战争机器的一部分。<sup>②</sup>

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市（Palo Alto）一辆 MG 跑车发生爆炸，尽管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和笔者亲眼所见，不过事后也就遗忘了，这就说明，以社会为根源的思想，其程度的强化来自内部力量——换言之，心理特征及外部力量——社会礼仪风俗。笔者所称的深度事件——那些理解起来过于困难或痛苦不堪的事情——或是毫不留情地被封锁消息，或是遭人遗忘，或是被那些无力解读的人们所忽视。这些深度事件的基本系统性模式为笔者所称的深度政治创造了条件。

---

① 本来一贯如此，如今得益于数码技术则尤甚。桑德拉·布拉曼（Sandra Braman）曾描述，福利国家将快速地被信息国家取代，并将后者定义为政府官僚“蓄意、直接并不断操纵信息的创造、处理、传播和应用，以方便自己行使权力”。Sandra Braman, *Change of State: Information, Policy and Pow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1, emphasis added.

② Henry A. Giroux, “Democracy and the Threat of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s beyond Barack Obama,” *Truthout*, February 15, 2010, <http://www.truthout.org/democracy-and-threat-authoritarianism-politics-beyond-barack-obama56890>.



## 战争机器的功能之一——庇护毒品走私

本书想传达的意旨在于，在美国，有一种毒品走私的深度政治，正是这种毒品的深度政治，才导致美国出现了四处宣战的战争机器。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何美国要在阿富汗发动战争，美国的战争方式如何，以及美国为何不会迅速撤军。我们已经得知，无数一线专家透露，我们不应该继续向阿富汗派兵，相类似的，我们听闻了无数有理有据的论证，禁毒本身已无法再为毒品问题带来成效，这与 20 世纪 20 年代应对酒精问题的境况别无二致。如果没有考虑到在战争机器里存在着身居高位的走私庇护者——身处体制内部，不去保护民间社会免受毒品走私之害，却要包庇那些进行毒品走私不被民间社会发现的人，所有的这些解读都只是枉然，毫无意义。<sup>①</sup>

笔者所称的毒品走私庇护者的深度政治，其实是指一个比本书所论述的外在表象更为普遍、根基更深的现象，例如，中情局与毒品走私贩历来密切的关联，美国缉毒局办事不力，以及所谓的禁毒战争。笔者论述的深度事件，其蔓延之广，以至任何人都难以全然洞悉，包括笔者本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抓住悬而未决的线索，例如被人遗忘的帕罗奥图市爆炸案，然后开始将点连成线。

撰写本书，让笔者在观察自身生命时，获得一种抓住新线索的能力——这一线索笔者早已论述一二，不过对其影响则未做合理分析。

---

① 例如，保罗·菲茨杰拉德（Paul Fitzgerald）和伊丽莎白·高德（Elizabeth Gould）从新颖的视角分析阿富汗历史，他们的结论支持了安全与发展国际委员会（Senlis Council，该国际智囊机构后更名为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ICOS）提出的合理建议，即“将阿富汗鸦片转为医药之用，阿富汗的农民将成为最大受益者”（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2009），322，不过合理性无法引导毒品政策的指定，能够对政策施加影响的只能是位高权重的走私庇护者，1980 年大卫·马斯托提出该论点。



1987年夏，笔者在位于华盛顿的发展政策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Policy, ICDP）担任高级研究员，这家华盛顿智囊机构的目标之一就是调查披露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的代理人参与毒品走私一案，也就是所谓的“伊朗门事件”。得益于此，如被召唤，笔者将有机会在不对外公开的国会委员听证会上担任专家见证人，听取该案件的相关证词。

不过笔者未被叫去。组织那次会议的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Rangel）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正如笔者数年前在《可卡因政治》（*Cocaine Politics*）一书中所写那样，他“之所以召开那次会议，只是为了满足其选民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他本人根本就没打算、没安排也没受命一定要去调查这些指控”。<sup>①</sup> 指控尼加拉瓜反抗军牵涉毒品问题的报告有三份，其中一份是笔者递交的，他听完报告宣读之后，立即终止了会议。

两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7月23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如此开头：

有人指责尼加拉瓜反抗军的头目参与了毒品走私，一个国会委员会一直在调查此事，昨日该委员会公布报告，宣称并未发现能够证明这些指责的证据。

众议院议员、毒品滥用及管制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Narcotics Abuse and Control）主席查尔斯·B. 兰格尔（民主党—纽约，简称D-N.Y.）说：“没有哪位证人能够给出证据，证明尼加拉瓜反抗军领导层参与了毒品走私案件。”……该委员会已经收到来自数百位证人的大量证

<sup>①</sup>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The CIA, Drugs, and Armies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80.

词……<sup>①</sup>

所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数百位证人，不过确实实有三位证人，均指出有这样的证据。（这谎言的源头是《华盛顿邮报》，其出版商是约瑟夫·奥尔索普的朋友凯瑟琳·格雷厄姆，第二年凯瑟琳就在中情局总部向听众说道：“有些事情公众不必也不应该知道。”<sup>②</sup>）兰格尔立即撰写了长达四页的说明，否定了矛头指向他的言论，不过《华盛顿邮报》拒绝发布该说明信。但是，1987年7月26日，《华盛顿邮报》收回了那篇报道，今天已经无法在律商联讯（Lexis Nexis）上查阅到该报道了。

不过这篇报道的余波并未消亡，而是帮了走私庇护者一把。在一份递交给众议院伊朗门事件—尼加拉瓜反抗军委员会（House Iran/Contra Committee）主席李·哈密尔顿（Lee Hamilton）的报告中，这件事情被用来说明“媒体曝光，并指责美国政府容忍尼加拉瓜反抗军领导的毒品走私罪行，或者说反抗军的领导……实际上参与过这类行动”。<sup>③</sup>

该报告发布时间为1987年11月，所引用的证据是篇被召回的报道，为让自己站得住脚，蓄意将撰写时间篡改成1987年7月23日，也就是报道被召回的三天前。对情况更了然于心的哈密尔顿正是通过这种手法，才得以让这谎言继续下去。[几年之后，中情局

① David S. Hilzenrath, "Hill Panel Finds No Evidence Linking Contras to Drug Smuggling,"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1987.

② Alexander Cockburn and Jeffrey St. Clair, *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 (London: Verso, 1998), 31.

③ U. S. Congress,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100th Cong., 1st Sess., House Report No. 100-433, 630-631. 成员报告以少数派众议院共和党报告的附件形式公布出版，这份共和党报告是由时任国会议员迪克·切尼提交的。



总督察弗雷德·希茨（Fred Hitz）发布的一篇报告揭露，1987年时任众议院情报永久附属委员会（Hous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主席哈密尔顿会定期从中情局那里收到有关尼加拉瓜反抗军的毒品走私报告。<sup>①</sup>]

为了对抗发展政策国际中心，防止伊朗门事件毒品丑闻扩散，所采取的手段绝非散布假消息那么简单。当时，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在中情局的协助下，不惜代价——有时甚至是违背法律——阻碍参议员约翰·凯里（John Kerry）调查伊朗门事件毒品关联案。诺斯蓄意指责凯里的其中一位证人杰克·泰雷尔（Jack Terrell，当时他供职于发展政策国际中心），称他是“恐怖主义威胁分子”，曾蓄谋“刺杀美国总统”。凭借这一诡计，诺斯引得FBI不仅调查泰雷尔，连整个发展政策中心都没放过。<sup>②</sup>

据传，FBI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联手，一位名叫文斯·康尼斯特拉罗（Vince Cannistraro）的委员会成员发现，诺斯“正企图干预官方对尼加拉瓜反抗军参与毒品走私一案的调查”。<sup>③</sup>

当时，笔者认为诺斯和哈密尔顿的各种举动是为了掩盖中情局的某项行动——伊朗门事件。不过不论他们目的为何，取得的结果是保住毒品走私，据官方估计（根据《新闻周刊》），洪都拉斯走私贩胡安·拉蒙·马塔·巴列斯特罗，仅他这一位尼加

① Peter Dale Scott, *Drugs, Contras and the CIA: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Cocaine Economy: An Analysis of Media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Gary Webb Stories in 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 (1996 - 2000)* (Los Angeles: From the Wilderness Publications, 2000), <http://www.drugwar.com/cv4.shtm>, citing CIA,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Allegations between CIA and Contras in Trafficking Cocaine to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19, 1998*, paras. 237, 287, 308, 1099.

② See discussion in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125 - 177, 142 - 146.

③ Ben Bradlee Jr., *Guts and Glory: The Rise and Fall of Oliver North* (New York: D. I. Fine, 1988), 426;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145.





拉瓜反抗军支持者，提供的“海洛因数量便占美国消耗总量的1/3”。<sup>①</sup>

## 包庇“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毒品走私

李·哈密尔顿包庇毒品走私可不仅局限在为伊朗门事件洗白。作为“9·11”事件委员会联合主席及其委员会报告的签署人，哈密尔顿还要负责为“基地”组织毒品走私罪行洗白：“毒品交易是塔利班的一个收入来源，不过对于基地组织而言，情况则不同，没有可靠证据说明本·拉登参与过毒品交易，或是通过毒品走私赚取利润。”<sup>②</sup>

委员会的报告否认“基地”组织参与毒品交易，这全然无视大量的反驳证据，有些还是官方证据。2003年12月，美国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曾披露，在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附近拦截了一艘独桅帆船，装载大约2吨、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的印度大麻。根据中央司令部消息，说明毒品运输和“基地”组织存在“确切关联”。<sup>③</sup>

《“9·11”事件委员会报告》于2004年7月对外公布，4个月之前，即2004年3月发生马德里爆炸案，当时（而非之后）大家都将罪名推给“基地”组织。<sup>④</sup>2004年4月，西班牙当局（正确）

① Scott and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41 - 42 and passim, quoting *Newsweek*, May 13, 1985.

② *9/11 Commission Report*, 171. 笔者发现这种论调倒向一边，存在误导性，不过以尤索夫·波丹斯基（Yossef Bodansky）截然相反的观点尤甚，他认为：“据估计，塔利班从毒品交易中的年收入达到80亿美元。本·拉登控制管理这些资金——通过俄罗斯黑手党洗钱”。Yossef Bodan - sky, *Bin Laden: The Man Who Declared War o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Prima, 2001), 315.

③ “US ‘Seizes al - Qaeda Drugs Ship’,” BBC News, December 19, 2003.

④ E. g., CBS News, March 11, 2004.



宣布，爆炸案凶手的“资金来源显然是毒品”。<sup>①</sup> 2009年12月，据称是“基地”组织成员的三名男子被纽约联邦法庭起诉，罪名是密谋途经非洲走私海洛因以资助其恐怖行动。

《“9·11”事件委员会报告》重蹈覆辙，没能分析“基地”组织在美国主要资助者的毒品交易等各项罪行。例如，阿基法难民中心（Al-kifah Refugee Center），“位于布鲁克林的一家法鲁克清真寺（Farouq mosque），核心人物是族长奥马·阿布戴尔·拉曼（Sheikh Omar Abdel Rahman）”，此人后来被捕，因“（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及其他阴谋（所谓的‘地标爆炸阴谋’或‘恐怖日阴谋’）”而被判刑。<sup>②</sup> 1993年，《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据调查者所说，“轰炸纽约市地标建筑（恐怖日）阴谋共有大概11位罪犯，均涉嫌走私毒品”。<sup>③</sup>

报告否认在美国与恐怖主义—毒品存在关联，这和美国竭力保住阿富汗海洛因走私的举动相互吻合。据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所说，2001年美国发动袭击之初，“五角大楼列出了位于阿富汗超过25家的毒品实验室和仓库，不过拒绝轰炸它们，理由是其中有些是属于中情局新北方联盟的盟友”。<sup>④</sup> 拉希德“从联合国毒品控制办公室官员那得知，美国人掌握的毒品实验室

① CBS News, April 14, 2004: “调查员表示，从以毒品为生的罪犯手中截获了炸药。毒品盈利也被用来购买雷管、手机、汽车和租用公寓。”

② 9/11 Commission Report, 72; discussion in Peter Dale Scott,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41–147, 155–160.

③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93. Cf. J. R. de Szigethy, “Crime Scene—World Trade Center,” *AmericanMafia.com*, September 2004, <http://www.americanmafia.com>: “惨案（自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开始）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所作所为，这些人还参与了毒品走私。”

④ Ahmed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320.



信息远比他们对外宣称的要多得多，没有炸掉它们，是禁毒工作的一大败笔”。<sup>①</sup>

根据詹姆斯·雷森（James Risen）的分析，位于美国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高层的新保守主义者总是拒绝跟踪这些目标毒品实验室。<sup>②</sup>正如我们所见，自二战起，这些人就在华盛顿制造了一种毒品庇护模式。<sup>③</sup>尤其是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与暴乱分子相关的毒品走私愈发成为官方关注焦点。不过正如前面章节所述，暴乱分子从阿富汗毒品走私所获得的收入只是总收入的1/10，其余大头均被卡尔扎伊政府和相关军阀瓜分了。

换言之，美国官方对全球毒品走私活动的庇护持续至今。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将美国军队派至世界遥远角落的战争机器当中，有一些人——毫无疑问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正不遗余力地包庇主要毒品走私贩，躲避公众制裁。

## 2010年的美国及全球毒品走私

前文曾提及，自1945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就一

①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427.

② James Risen, *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154, 160-163.

③ Peter Dale Scott,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希贝尔·爱德蒙兹提到通过这种方式庇护毒品走私，并且法院下令禁止自己讨论此事，对此，她切中要害地问道：“是否是因为美国的诸多盟国，例如，土耳其、几乎所有的中亚各国、“9·11”事件之后的阿富汗，这些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强烈依赖于这类非法物品的种植、加工、运输和销售？是否是因为一个现实，那些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的国家，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类非法生产和非法交易，这些国家是美国军事产业集团的衣食父母？或者，是否是因为害怕暴露出我们国家自身的财政体制、游说公司、某些当选及任命的官僚，他们其实也是受益人？”Sibel Edmonds, “The Highjacking of a Nation,” National Security Whistleblowers Coalition, November 29, 2006, <http://nswbc.org/Op%20Ed/Part2-FNL-Nov29-06.htm>.



直是正邪两极。这厢一些美国机构费尽心力要巩固国际法律体系，那厢有些美国秘密组织——主要是中情局——却借用犯罪分子，尤其是毒品走私贩，开展秘密活动，不断颠覆国际法律。<sup>①</sup> 不论这类活动的真实意图为何，一些特定国家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立法体系饱受腐败和跨国犯罪的侵蚀，其所造成的长期结果是，这样的一个全球体系愈发顽固。

40年来，对于中情局与毒品走私贩（及他们的银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以图谋维持右翼政府统治的事实，我们美国人早已心知肚明。这种模式在多国上演，意大利、墨西哥、泰国、老挝、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巴拿马、洪都拉斯、土耳其、巴基斯坦，及现在的阿富汗——此处仅列举本书将讨论到的国家。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Zardari，他本人被指控腐败）曾谈道：

美国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抛之脑后，转而支持独裁者，以操纵并剥削我们。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穆罕默德·齐亚·哈克（Muhammad Zia ul-Haq）对巴基斯坦人民实施铁腕统治，同时利用巴基斯坦作为在阿富汗战场对抗苏联的挡箭牌。那十年将我们原本和平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海洛因”的社会，枪支和毒品成了国家代名词。<sup>②</sup>

① 笔者在论述公共政策和秘密政策的分裂时，并不意味着中情局是一个“无赖组织”。笔者曾在他处写道，中情局其实反映了国家金融体制的意愿，借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名言，“自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以来，就已经成了政府当家人”（Scott, *The Road to 9/11*, 1-7）。

② “在与苏联对抗之时，美国支援了圣战分子中最激进派系，这些派系最终演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1989年，苏联败走离去，美国弃巴基斯坦于不顾，在阿富汗制造了一段真空时间，由此形成了现在的恐怖分子。”



随着全球毒品走私升级，加之中情局的庇护，全球范围的国际腐败体系日益根深蒂固。情报和毒品的狼狈为奸侵蚀着一个又一个国家，毒品走私和政府腐败横行无忌。

美国还有其他动机——最主要是自然资源，例如石油，使美国成为在第三世界扶持腐败且暴政的独裁者，其中包括扎伊尔的蒙博托 (Mobuto)、巴拿马的诺列加 (Noriega)、智利的皮诺切特 (Pinochet)、菲律宾的马科斯 (Marcos)、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 (Suharto)、巴基斯坦的齐亚 (Zia) 和韩国的朴正熙 (Park Chung Hee)。正如纳奥米·克莱因 (Naomi Klein) 所言，美国利用这些独裁者施行经济铁腕控制，要是民主国家绝对不会采纳。<sup>①</sup> 这些独裁者或其家庭有半数以上都和毒品走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sup>②</sup> 美国国内对此也早已心知肚明。

我们已经知道，20世纪80年代，在中情局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以及阿富汗圣战者错综复杂的关联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帝国的幕后存在一些超级操纵者，例如阿德南·哈绍吉 (Adnan Khashoggi)、布鲁斯·拉帕波特 (Bruce Rappaport) 及马可·里奇 (Marc Rich)，他们这些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和中情局有瓜葛，时至今日依然和美国来往密切。<sup>③</sup> 根据美国官员们的信息，奥萨马·本·拉登本人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设有账户，其中一位官员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是“资助恐怖分子行动的衣食

①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7).

② Cockburn and St. Clair, *Whiteout*, 265 - 269, 285 - 290, <http://aangirfan.blogspot.com/2005/05/drugs-business-in-indonesia.html>.

③ Peter Truell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135 - 137, 384; Bartholomew B. J. Henderson, *A Conflict of Interest: "Fraud and the Collapse of Titans"* (Bloomington, IN: IUiverse, 2002), 214.



父母”。<sup>①</sup>

尽管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 1991 年破产，可是其所协调的网络依旧存在，且丝毫未受影响。

一份长达 70 页的法国情报报告指出：“本·拉登的财政网络及他的投资网络，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实现自身欺诈行为而建立的网络非常相似，均雇用相同的人员队伍（银行及其下属机构的前任主管和领导、武器商、石油商和沙特投资商）。本·拉登各项行动的显著共同特征在于，恐怖分子网络是以一个庞大的金融结构做支撑。”<sup>②</sup>

自“9·11”事件以后的这些年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网络纷纷崛起——如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印度等不同国家。不过初期掌握的证据说明，绝大多数恐怖分子网络的背后，都隐藏着同样的金融体系——或者称为“背景”更为贴切。对于 21 世纪的美国而言，仍旧沿用了 20 世纪的做法，一直利用并庇护毒品走私贩及其赞助者，以此作为跟踪恐怖分子网络的手段。而那个金融体系或者说“背景”，其本身就是真正的敌人之一、真正的症结之一。但是，我们并未看到——未来也难以看到——力图摧毁“庞大的金融结构”（或者称为“体系”或“背景”）本身的努力。

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金融网络的生死存亡依赖于不同国家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而它在情报与毒品之间的纽带关系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点。其影响力早已走出美国本国，我们早

① Paul Thompson, *The Terror Timeline: Year by Year, Day by Day, Minute by Minute* (New York: HarperCollins/Regan Books, 2004), 259.

②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02, [http://www.library.cornell.edu/colldev/mideast/qdagold, htm](http://www.library.cornell.edu/colldev/mideast/qdagold.htm).



前注意到，参议院官员估计“每年通过世界各地银行进行洗钱的非法交易高达 5000 亿 ~ 10000 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流经美国银行”。<sup>①</sup>

现状腐败不堪，美国却竭力维持，相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不论他们多么罪孽深重，却极力打破现状。

### 达伍德·易卜拉欣 (Dawood Ibrahim)、 三军情报局和中情局

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是一个关键佐证。正如艾哈迈德·拉希德所述，三军情报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扩张，“仰仗着中情局的支持以及从美国军队那里获得大量援助……，该情报局形成了一个可与之媲美的框架，对（巴基斯坦）政府各个层面都能施加巨大影响”。<sup>②</sup>今天的三军情报局与美国彼此照应，包庇达伍德·易卜拉欣，此人是卡拉奇地区（Karachi）和孟买港区的头领，但同时他也是毒品走私贩、恐怖分子以及政界的大财阀。<sup>③</sup>

格雷琴·彼得斯（Gretchen Peters）将易卜拉欣描述为“全球犯罪集团”的大佬。<sup>④</sup>“易卜拉欣因为涉嫌参与 1993 年造成数百人丧生的孟买爆炸案而被印度通缉，另外还被指控将大量毒品走私运送至英国和欧洲，此人是唯一一位被华盛顿模糊定性为‘全球恐怖

① U. S. Congress, Senate, “Minority Staff Report for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Hearing on Private Ban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A Case Study of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November 9, 1999, [http://hsgac.senate.gov/l10999\\_report.htm](http://hsgac.senate.gov/l10999_report.htm).

② Ahmed Rashid, “The Taliban: Exporting Extremism,”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November - December 1999): 21 - 35.

③ Misha Glenny, *Mc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Global Criminal Underground* (New York: Knopf, 2008), 122 - 144.

④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How Heroin Is Bankrolling the Taliban and Al Qaeda*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St. Martin's Press, 2009), 165.



分子帮凶’和‘海外毒品大佬’的人，臭名昭著”。<sup>①</sup>

2003年，美国宣布达伍德·易卜拉欣为“全球恐怖分子”，因为此人涉嫌运用经济手段与奥萨马·本·拉登共享毒品走私线路。<sup>②</sup>2005年，《美国新闻》（*U. S. News*）撰文称，达伍德·易卜拉欣是“全球最急切缉拿归案的恐怖分子之一”，并称他是巴基斯坦军队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的一枚棋子。

三军情报局为达伍德开出条件：如果他重新回到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并一直与三军情报局合作，情报局可以保证，该国的海滨毒品走私路线全部由他掌控。到现在12年了，达伍德已经把巴基斯坦当成自己的老家，人们认为，他在这里拥有数家商场、数栋豪宅，而且还控制着水上和陆地走私线路，将武器送至印度，将海洛因送至欧洲。印度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类似于美国FBI）认为他的公司年收入高达数亿美元，成员约有5000人。

据美国官员称，在巴基斯坦，达伍德和数个恐怖组织相互勾结，其中包括虔诚军（Lashkar-e-Taiba），印度认为该组织是（2005年）10月新德里爆炸案的元凶，造成至少60人死亡，此外该组织还涉嫌策划了2001年血流成河的印度国会袭击案。达伍德被指控曾与基地组织头目碰面，甚至还与“基地”组织成员达成协议，共享他的走私路线。<sup>③</sup>

① Peters, *Seeds of Terror*, 165.

② U. S. Treasury Fact Sheet, “Dawood Ibrahim,” [http://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reports/fact\\_sheet.pdf](http://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reports/fact_sheet.pdf), Peters, *Seeds of Terror*, 166.

③ “A Godfather’s Lethal Mix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U. S. News*, November 27, 2005. 即便是在三军情报局拉拢之前，易卜拉欣就在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人庇护他。2003年孟买爆炸案发生之后，在印度方面的要求下，警方两次逮捕达伍德·易卜拉欣的兄弟安尼斯（Anees），不过因为易卜拉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统治家族当中的影响力，安尼斯两次均被释放。





据报道，最迟在2007年7月，缉毒局打算与印度情报人员合作，逮捕易卜拉欣。<sup>①</sup>一周以后，《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报道，三军情报局已经召集了易卜拉欣及其两位高级中尉，“以先发制人，应对华盛顿可能采取的制裁举动”。<sup>②</sup>

2008年3月，《印度时报》称：

“D公司”现在已经正式成为虔诚军恐怖网络的一部分，巴基斯坦臭名远扬的三军情报局唆使达伍德·易卜拉欣将自己的黑帮与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联合起来，这是启动反印度行动的策略之一。根据印度情报机构对三军情报局行动的跟踪，两股势力已经相互勾结，将对印度造成危险。<sup>③</sup>

七个月之后，虔诚军在孟买策划了一起严重的爆炸袭击，易卜拉欣的犯罪集团“D公司”为这起案件提供了后勤援助。不久之后，《日本时报》(*Japan Times*)前总编岛津洋一(Yoichi Shimatsu)撰文写道，易卜拉欣“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合作，为圣战分子提供经济援助，正是因为他知道太多美国在该地区‘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他永远不会被移交给印度”。<sup>④</sup>

① *Times of India*, July 30, 2007.

② *Times of India*, August 7, 2007.

③ *Times of India*, March 28, 2008,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SI\\_reach\\_will\\_expand\\_with\\_D-Company\\_merger/articleshow/2905397.cms](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SI_reach_will_expand_with_D-Company_merger/articleshow/2905397.cms): “据一位安全官员所说，‘达伍德黑帮的不少成员都在拉合尔(Lahore)附近的巴哈瓦尔布尔(Bahawalpur)虔诚军中心(简称LeT)被洗脑，并学习使用武器。资金主要是来自房地产投资、孟买的贫民窟重建局(SRA)项目、以及通过西部海域沿着阿拉伯海从拉噶德(Raigad)到门格洛尔(Mangalore)的柴油及各类必需品走私。我们早就警告德里(Delhi)，达伍德正在从事走私活动，逍遥法外’。”

④ Jeremy Hammond, “Role of Alleged CIA Asset in Mumbai Attacks Being Downplayed,” *Foreign Policy Journal*, December 10, 20 (18, [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article\\_4113.shtml](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article_4113.shtml)).



达伍德……吸引了美国秘密特工的注意，当时在他们与占领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开战时，此人曾帮助伊斯兰圣战分子。达伍德本人曾帮助过美国不少秘密行动，通过美方操控的、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Kathmandu）的赌场，将资金转移给阿富汗反叛军。达伍德不想得罪任何一方，所有难免自乱阵脚，为伊斯兰劫机者提供旅行证件和其他便利。为了给他些教训，华盛顿的特务头子试图非官方地“没收”他在尼泊尔赌场的投资。<sup>①</sup>

2009年，人们对美国与达伍德·易卜拉欣关系网之间的关联有了新发现，当时一位名叫大卫·海德里 [David Headley，化名达沃德·吉兰尼 (Daood Gilani)] 的美国公民被捕，理由是“涉嫌于2008年协助总部在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在孟买策划谋杀案，导致16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六名美国公民”。<sup>②</sup> 印度、英国和加拿大的媒体都曾披露一个重要事实，而美国媒体则只字未提，那就是海德里其实是一位双面间谍，曾因毒品犯罪被捕，之后先后被缉毒局和中情局聘用。据《伦敦时报》（*London Times*）所述：

（海德里）在1997年引起美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当时他因为走私海洛因在纽约被捕。他后来因为替美国缉毒局办事，渗透到与巴基斯坦有关联的毒品黑帮，从而获得减刑。印度调查员曾要求将海德里先生交给他们，却遭拒，故而怀疑此人一直从美国安全机构那获取报酬——非常积极地为中情局卖命——不过此人的

① Yoichi Shimatsu, “Was Criminal Mastermind behind the Mumbai Attacks?” <http://theragblog.blogspot.com/2008/11/was-criminal-mastermind-behind-mumbai.html>. operations; cf. Milt Bearden, *The Main Enemy: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IA's Final Showdown with the KGB*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94-95.

② “Alleged Terrorism Plotter David Headley,” *Time*, December 9, 2009.



拥护对象变成了虔诚军……海德里虽然一直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监视之中，不过他却获准可以在3月份返回印度。当时，那次行程的细节，美国政府对印度官员三缄其口，令印度方面大为不满。印度媒体推测，海德里先生正被美国主子庇护着——专家认为这种猜测有凭有据。B. 拉曼 (B. Raman) 表示：“印度方面认为，美方办事没有透明公开。”拉曼曾担任印度海外情报机构印度调查分析局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反恐主任。“海德里是缉毒局特工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他是否还在为中情局办事则有待商榷，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中情局知道这个人，也知道他穿过次大陆的一举一动。”<sup>①</sup>

## 毒品走私贩、美国媒体和美国战争机器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扬言，易卜拉欣和其前人一样，现在也许正受到美国情报高层的某种庇护。2008年11月，孟买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官员和主流媒体首先附和了印度方面的说法，认为袭击者来自虔诚军，大约一周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报道了印度提出的将达伍德·易卜拉欣引渡的额外要求。<sup>②</sup>不过2008年12月7日之后的69天里，根据律商联讯的数据，共有61条提到易卜拉欣的新闻，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英国、新加坡和丹麦，但是没有一条来自美国。直到奥巴马当政时期，这种沉默依旧没有打破：2009年6月，在谷歌新闻中搜索“易卜拉欣”，得到122条结果，没有哪条来自美国；2010年1月，律商联讯再度从全

① “Mumbai Terror Suspect David Headley Was ‘Rogue US Secret Agent’,” *Times* (London), December 17,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sia/article6960182.ece>. Cf. *National Post* (Canada), December 17, 2009.

② E. g.,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08.



球范围搜索到 63 个结果，没有一条来自美国。

美国对全球头号毒品走私贩的包庇已经扩大到媒体保护。以中情局之前的帮手、国民党驻泰国第三军的李文华为例，詹姆斯·米尔斯将此人精准地描述为“全球最有权势的毒品走私贩之一……他掌控的提纯鸦片占据了大部分的美国海洛因市场”。<sup>①</sup>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行动方案”（Operation Paper）首度批准美国支持此人的国民党军队，《纽约时报》就再也没有报道过此人，也再没提及过其盟友国民党第五军段希文将军。与此类似的，人们也找不到对阿尔伯特·西西里亚·法尔肯（Alberto Sicilia Falcon）的报道。据 R. T. 奈勒（R. T. Naylor）描述，此人“于 1975 年在提华纳被捕，罪名是在墨西哥主导策划迄今规模最大的大麻和可卡因走私案”。<sup>②</sup> 即便一些和美国有关联的毒品走私贩上了新闻，例如泰国独裁者炮·斯里亚诺恩或是叙利亚毒品军火商蒙齐尔·卡萨尔（Monzer al-Kassar），他们的毒品交易行为也鲜被提及。

所有思想都有社会根源。美国大众必须跳出美国主流媒体为他们设定的框架，才能真正思考。

格雷琴·彼得斯已经做了非常贴切的总结。

到目前，美国当局一直强调逮捕“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高

① James 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s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789. 米尔斯也援引了段希文将军对泰国边境巡逻警（Border Patrol Police, BPP）的描述，该组织“腐败不堪，从事毒品运输活动”。米尔斯评论道：“这说明了一些问题，因为边境巡逻警是由中情局创建的，直接接受中情局驻曼谷工作站领导”（Mills, *Underground Empire*, 780）。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情局与边境巡逻警的关联，详情敬请参阅道格拉斯·瓦伦丁的论述（信息来源于缉毒局）。*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R: TrineDay, 2009), 254-255.

② R. T. Naylor, *Hot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Debt* (New York: Linden/Simon and Schuster, 1987), 267.



价值目标人物，而不是去追踪他们所仰仗的体系。前国务院禁毒主任罗伯特·查尔斯（Robert Charles）曾指出：“就像是我们碰到一台内燃机，我们企图抓住单个活塞，反而忘了我们只需要切断汽油就行了。”“9·11”事件过去八年了，反恐战争最大的败笔不是奥萨马·本·拉登依然在逃，不是塔利班死灰复燃，也不是“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民族地区再度重组并有可能再次向西方发动袭击。相反，败笔在于，西方执法机关极其无能，未能切断让这些网络滋生膨胀的资金流。<sup>①</sup>

但是，格雷琴·彼得斯指责美国无力控制毒品走私贩对哈瓦拉体系（Hawala System）的运用，或者说以交易为基础的洗钱活动。为赢得主流媒体赞同声，她并未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的相关事实，这些资金流动很大部分的终点是在美国，美国银行在危机时刻不问来源吸取现金，从而复苏。

笔者这里想再度援引参议院报告的信息：“目前的一些估测数据显示，每年通过世界各地银行进行洗钱的非法交易高达5000亿~100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流经美国银行。”<sup>②</sup>同一份报告还指出，花旗银行曾为墨西哥总统卡洛斯·沙尔林纳斯（Carlos Salinas）的兄弟劳尔（Raúl）以及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办理过私人业务，后者当时还是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总统的丈夫，后来自己成了巴基斯坦的总统。

有件事过去无人论及，扎尔达里曾深陷重大腐败丑闻，他所掌控的公司曾将数千万资金存入位于瑞士和迪拜的花旗私人

① Peters, *Seeds of Terror*, 165, emphasis added, citing interview with Robert Charles, May 23, 2007.

② U. S. Congress, Senate, Minority Staff Report for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Hearing on Private Ban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A Case Study of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November 9, 1999, [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



银行。

源头是 ARY 国际交互公司 (A. R. Y. International Exchange)，该公司的所有人是阿卜杜·拉扎克·雅各布 (Abdul Razzak Yaqub)，这个富可敌国的巴基斯坦人主要从事黄金生意，住在迪拜。拉扎克还拥有一家巴基斯坦电视台。贝娜齐尔·布托政府曾给拉扎克颁发独家许可证，允许他在支付完成仅三个月后就可进口黄金，这为他带来巨大利润。拉扎克借此许可证，将价值超过 5 亿美元的黄金进口至巴基斯坦。拉扎克已经否认曾与扎尔达里有任何支付关系。<sup>①</sup>

根据这份参议院报告，

1997 年 9 月 8 日，应巴基斯坦政府要求，瑞士政府下令冻结扎尔达里和布托在瑞士花旗银行及其他三家银行的账户。由于 1997 年 1 月花旗银行便已关闭扎尔达里的账户，因此，直到 1997 年 11 月末，花旗银行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通知美国当局有关账户的事情。11 月末，花旗银行就扎尔达里账户一事联系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和美国货币监理署 (OCC)。因为据猜测，《纽约时报》将披露此事，而最终在 1998 年 1 月该报报道，称扎尔达里先生收受贿赂，而且他在迪拜和瑞士均有花旗银行账户……1997 年 12 月 5 日，花旗银行就扎尔达里的账户一事准备了一份《可疑行动报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并发给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递交这份报告已经是银行关闭扎尔达里账户 14 个月之后的事了，距离 1996 年 11 月扎尔达里先生涉嫌腐败二次被捕

① 扎尔达里因毒品走私罪被巴基斯坦法院审判，不过 2008 年宣判无罪 (Dawn, May 20, 2008, <http://www.dawn.com/2008/05/20/top8.htm>)。



已经13个月，距离瑞士政府下令四家瑞士银行（包括瑞士花旗银行）冻结扎尔达里所有账户已经快2个月。……花旗集团联合主席约翰·里德（John Reed）向附属委员会报告称，1994年2月他正准备去巴基斯坦出差，不过此时花旗银行官员劝告他，那里风声正紧，扎尔达里涉嫌贪污腐败，所以他必须和此人保持距离，银行可不想和这个人拉扯上什么关系。然而一年之后，这家私人业务银行就在瑞士为扎尔达里开了三个账户。里德先生向附属委员会成员说，当自己得知扎尔达里账户一事，他心想，账户官员真是“愚不可及”。<sup>①</sup>

要想了解美国与国外罪犯及情报人员的关系——尤其是毒品勾当，我们必须超越主流书籍，即便是最佳书籍，而要去读读诸如汤姆·布格哈特（Tom Burghardt）等作家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

巴基斯坦影子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与塔利班、“基地”组织、中情局以及英国军情六处（MI6）有组织行动上的关联，一直涉嫌为世界各地的恐怖行动甚至部分地区的核走私提供资金，主要是通过毒品交易和其他勾当获取“非法资金”。尽管有这样丑恶不堪的历史，三军情报局及其犯罪组织帮凶长期以来被华盛顿视为美国所谓“反恐战争”的盟友。美国“反恐官员”现在天天扬言要将易卜拉欣、他的外号为“迈蒙虎”（Tiger Memon）的同伙、三军情报局前任局长（退役中尉）哈密德·古尔（Hamid Gul）将军绳之以法，一些匿

---

① U. S. Congress, Senate, Minority Staff Report for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Hearing on Private Ban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A Case Study of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November 9, 1999, [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http://hsgac.senate.gov/110999_report.htm).



名人士常将这帮人归类为“亡命之徒”——还能叫什么呢？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恣意拿这些人做噱头，横跨各洲实施袭击行动。<sup>①</sup>

中情局之所以选用这帮人，显而易见不是为了美国公众利益，相反是为了实现战争机器的目标，也就是在该地区的美国军队和美国石油公司，及回收和利用诸如扎尔达里这种腐败领导人资金的大银行。佩佩·埃斯科瓦尔在《亚洲时报》(Asia Times)上撰文称，“美国基地帝国”如今“依旧自视甚高，沿用着新大博弈模式(New Great Game Mode)——换言之，通过诸如巴格拉姆这样的基地密切监视俄罗斯和中国，力图阻止俄罗斯以巴基斯坦为中转搭建通向中东的商业之路”。

埃斯科瓦尔继续评论道：

最后但绝不是最次要的一个因素，能源之战。这就牵扯到神秘乃至超乎自然的、价值76亿美元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简称TAPI)，这条管道将汽油从土库曼斯坦东部输出，经过阿富汗东部赫拉特市(Herat)，接着途经塔利班控制的尼姆鲁兹省(Nimruz)和赫尔曼德省(Helmand)，然后穿过巴基斯坦俾路支省(Balochistan)，接着又抵达阿拉伯海的巴基斯坦瓜德尔港(Gwadar)。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投资者都不会在战火区投资建设汽油管道，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稳定”阿富汗。<sup>②</sup>

2008年4月，四个相关国家的石油部长达成一致意见，开始建

① Tom Burghardt, "Organized Crime, Intelligence and Terror: The D-Company's Role in the Mumbai Attacks,"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13, 2008,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1385>.

② Pepe Escobar, "The Secrets of Obama's Surge," *Asia Times Online*, April 2, 2009,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D02Df03.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D02Df03.html).





设 TAPI 管道。<sup>①</sup> 不过巴基斯坦局势不断恶化，尤其管道将经过的坎大哈周边地区，建设计划几乎将瞬间付之东流。<sup>②</sup> 2009 年 5 月 24 日，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与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ud Ahmadinejad）在德黑兰会晤，双方签署协议，计划建设另一条管道（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从伊朗南帕尔斯（South Pars）油田出发，经由俾路支省进入巴基斯坦，至此，TAPI 管道建设计划前景愈发黯淡。<sup>③</sup>

笔者预测，鉴于目前阿富汗—巴基斯坦冲突不断，恐怕未来问题解决无望，更有可能出现的结局不是 TAPI 管道，而是海洛因走私。<sup>④</sup> 另外，笔者认为，如果愿意，美国大可扭转局势，停止无人机袭击，大幅减少军事暴力行动，从而更为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截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最佳办法就是让西方社会将毒品使用合法化，建立政府对鸦片制剂使用的监管。这将有利于购买阿富汗现今种植的鸦片，同时又能利用诸如藏红花等替代性植物，尽快取代鸦片种植。

笔者虽然这么说，不过对于美国现行政治制度能否推行这类改革，笔者不抱任何希望。格雷琴·彼得斯在其著作中的论述条理清晰，但是她认为，将动乱地区的阿富汗鸦片种植田地购买下来，恐

① Aftab Maken, "TAPI Gas Pipeline Finalized," *The News (Pakistan)*, April 25, 2008, [http://www.thenews.com.pk/top\\_story\\_detail.asp?Id=14300](http://www.thenews.com.pk/top_story_detail.asp?Id=14300).

② "Progress on TAPI Pipeline in Doubt," UPI, June 18, 2008, [http://www.upi.com/Energy\\_Resources/2009/06/18/Progress-on-TAPI-pipeline-in-doubt/UPI-29261245335324/](http://www.upi.com/Energy_Resources/2009/06/18/Progress-on-TAPI-pipeline-in-doubt/UPI-29261245335324/). Cf. *TheHindu*, October 18, 2008, <http://www.hindu.com/2008/10/18/stories/2008101859541000.htm>; *Eurasianet*, March 26, 2009,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news/articles/eav032609c.shtml>.

③ Bruce Pannier,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Iran - Pakistan 'Pipeline of Peace'?" *Radio Free Europe*, May 25, 2009, [http://www.rferl.org/content/What\\_Are\\_TheProspects\\_For\\_IranPakistan\\_Pipeline\\_Of\\_Peace/1739236.html](http://www.rferl.org/content/What_Are_TheProspects_For_IranPakistan_Pipeline_Of_Peace/1739236.html).

④ As Ahmed Rashid quotes in *Taliban*, "艾哈迈德·拉希德在《塔利班》(*Taliban*)一书中援引道："和平能带来管道，可管道带不来和平"。Ahmed Rashid, *Taliban* New Haven, C. 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9.



怕也没有市场消化它们。<sup>①</sup> 显而易见，她这本书的对象是华盛顿政策制定者，自然不会考虑，哪怕只是理论推测，是否存在为禁毒时代画上句号的另一途径。

然而，很多观察家却眼光犀利，禁毒这项受西方政府控制的西方政策，恰好是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正如米沙·格兰尼（Misha Glenny）在《超级黑帮》（*McMafia*）一书中指出的，“禁毒……是恐怖分子集团的天赐良机”，因为“毒品交易的巨大收益恰好得益于这类活动的非法性”。<sup>②</sup>

笔者并不打算费大篇幅讨论这显而易见的结论，因为数十年的经历告诉笔者，反正华盛顿是绝对不会把这些话听进去的。至于各种缘由，各人自猜。笔者本人的推测是，就很多层面来看，存在一种极端不理性，而美国战争机器的政策重心也是源头之一。<sup>③</sup>

也许，华盛顿今时今日能看清楚，便是我们现在的阿富汗政策，如果最初目的是为了美国更加安全，那么结局却是大大地背道而驰。正如所测，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已经扩展到了邻国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性。<sup>④</sup> 如今，那里的战况

① Peters, *Seeds of Terror*, 227-228. 事实上，安全与发展国际委员会提出购买罂粟种植园的建议，其实是设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创造新市场，这些国家目前无法承担起药用鸦片制剂的费用。

② Glenny, *McMafia*, 226-227.

③ 笔者在华盛顿待了六个月，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一位国会议员一听到“合法化”一词，便立即猛捶桌子，气急败坏地说：“我绝不允许在这个委员会出现那个字眼。”笔者后来得知，此人在纽约的法律公司是路易斯·西里洛（Louis Cirillo）的代表，肯定没少因此获利。据传，在1970年，“美国消费的海洛因中近20%都要归咎于西里洛”。

④ “（美国导弹袭击）让人痛心；然而圣战主义网络非但没有因此消弱，反而强化了。殉道者的鲜血召唤了更多殉道者。正是因为这些袭击，圣战团体非但没有江河日下，反而日益壮大。敌国美国曾计划要在阿富汗围攻塔利班，想终止塔利班的伊斯兰运动；不过自从圣战者从这里（巴基斯坦）发展起来，美国压根休想斩草除根。只要这里〔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发生袭击，（转下页注）



日益严峻，据可靠报道，“基地”组织成员开始撤离巴基斯坦，在也门和索马里连连制造冲突，并将战火蔓延。<sup>①</sup>

显然，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多次袭击行动，通过电视，全球观众看得真真切切，这些袭击引发穆斯林圣战分子频频反击，哪怕他们和这些行动并无直接关联。即便是在美国本土，“据警方消息，一位 23 岁的男子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大受刺激，（2009 年 6 月 1 日）周一上午，这位男子从自己卡车里朝 [小石城 (Little Rock)] 征兵站站外值守的两位士兵开枪射击，导致一名二等兵丧生，另一名受伤”。<sup>②</sup> 五个月之后，我们得知另一惨剧，纳达尔·马里克·哈桑 (Nidal Malik Hasan) 少校在胡德堡 (Fort Hood) 制造了一起屠杀案，这位美国陆军精神病医生极不情愿自己即将被派往伊拉克。<sup>③</sup> 令人哀叹的是，这样的悲剧将来会层出不穷，不过华盛顿的政策却将丝毫不变。

五角大楼的考虑似乎是，如果干掉了敌方最高层领导，方寸大乱，那么针对美国的行动也就没了指挥，最后不过是一个低端的治安问题。但是，事实上，圣战分子早已四处游击，一部分还是美国自身瓦解行动的结果。例如，2004 年马德里屠杀惨案在现实层面就和全球恐怖主义存在行动关联：其资金来源正是当地

---

（接上页注④）圣战队伍就会壮大。” Mullah Nazeer Ahmad, the emir of the Taliban Mujahideen in Pakistan's tribal district of South Waziristan, February 2009 interview, reprinted in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Special Dispatch No. 2392, June 10, 2009, <http://www.memri.org/bin/articles.cgi?Page=archives&Area=sd&ID=SP239209>.

① Laura Kasinof, "A New Base? Al Qaeda Rises in Yem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0, 2009,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story?id=7880681&page=1>. Erich Schmitt and David E. Sanger, "Some in Qaeda Leave Pakistan for Somalia and Yemen," *New York Times*, June 11, 2009.

② *New York Times*, June 2, 2009.

③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09.



毒品走私。<sup>①</sup>

如果美国能够试着履行自身宣扬的理想，遵守国内法和国际法，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约，美国的安全问题将得到更好的解决。这自然意味着，美国应该改变其在中亚的军事行动，减少暴力政策。

然而到目前，不论是之前的布什政权，还是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华盛顿都在反其道而行之。阿富汗—巴基斯坦冲突不断升级，反恐火烧到了也门。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公众社会不断受到侵犯。2001年9月，布什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尽管需要国会立法审议，不过奥巴马在未经国会讨论的情况下，依旧将紧急状态延长。<sup>②</sup> 穆斯林仍旧被囚禁，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违背了所谓《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权。

美国人民选出了第一位非洲裔的美国总统，因为他们相信了他所做出的改革承诺。然而，显而易见，要想改变美国战争机器的全球主导权观念，恐怕还需要旷世的举国之力。

## 美国干涉最终导致全球毒品生产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情局畅行无阻，早已陷入利用毒品走私贩做帮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没有理由去相信，中情

- 
- ① “有些爆炸案的凶手是受了本·拉登的蛊惑，经过长达两年的调查，最后并未发现有关基地组织为爆炸案提供计划、资金或给予帮助的证据，基地组织甚至在案件发生之前对此一无所知”。*Independent* (London), November 7, 2006; cf. James J. F. Forest, ed.,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Insurgency in the 21st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439; “大麻麻醉剂和迷幻药交易对行动开展至为关键，其收入用来支付汽车、住宿和炸药费用。”
- ② Peter Dale Scott, “‘Continuity of Government’ Planning: War, Terror, and the Supplanting of the U. S. Constitution,” *The Asian -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May 2010, [http://japanfocus.org/\\_Peter\\_Dale\\_Scott/3362](http://japanfocus.org/_Peter_Dale_Scott/3362); Peter Dale Scott, “To All Readers: Help Force Congress to Observe the Law on National Emergencies!!!” (with Dan Hamburg), March 24, 2009, <http://www.911truth.org/article.php?story=20090324183053848#r7>.



局已经着手摆脱这个泥潭，这是事实。中情局利用并庇护走私犯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从毒品生产统计数据中便可一窥究竟，每当美国插手干涉，毒品产量便上升，一旦美国停止干预，产量就会下降。

例如，1979年，由于美国间接干预，阿富汗鸦片产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这种现象反复出现。鸦片罂粟种植的公顷面积增加两倍多，1999年已达到9.1万公顷的高峰（2001年因为塔利班问题下降至8000公顷），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万公顷，2007年增加到19.3万公顷。在2008年，种植面积下降到15.7万公顷，这主要是因为之前生产过量，大大超出市场可吸收量。

没有人应当为这种增长而感到大为震惊：在任何一个毒品生产地区，但凡是美国从军事或政治层面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绝无例外。20世纪50年代，这种模式频频再现，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sup>①</sup> 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sup>②</sup>

最具讽刺意味的当属哥伦比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所谓“禁毒战争”不过是蛊惑人心的旗号。笔者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预言，这次干预必将导致毒品产量的增加，而非减少。<sup>③</sup> 可是即便如此，笔者仍被实际增量吓了一跳。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

①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16, 191.

②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93, 431. 1975年美国完全撤出，老挝毒品产量依旧短暂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毒品走私贩昆沙在国际上的动作，泰国一直依赖此人对付缅甸和万象的共产主义者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428-431)。

③ Peter Dale Scott, "Honduras, the Contra Support Networks, and Cocaine: How the U. S. Government Has Augmented America's Drug Crisis," in *War on Drugs: Studies in the Failure of U. S. Narcotic Policy*, ed. Alfred W. McCoy and Alan A. Block (Boulder, C. O.: Westview Press, 1992), 126-127. 笔者曾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论述此观点。



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5.6 倍（从 130 公顷增加到 750 公顷）。<sup>①</sup> 解读这种毒品产量增长模式难以一言蔽之。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干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之一，而非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

华盛顿如今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阿富汗毒品生产问题是美国如今在阿富汗所面对的诸多难题的主要源头。现担任奥巴马政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理查德已于 2010 年逝世——译者注）曾在 2008 年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毒品是美国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关键，“必须瓦解阿富汗毒品当道的现状，否则一切均会付诸东流”。<sup>②</sup> 历史告诉后人一个事实，是毒品让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 Salafism）猖獗，而不是圣战萨拉菲主义让毒品猖獗。<sup>③</sup>

然而目前，美国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没有遏制毒品走私，反而是让问题更为严峻。在这段令人惶恐难安的历史中，所谓的反恐战争——尤其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只是最新章节。

- 
- ①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 1999*, 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暨强制法事务局（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Affairs）公布，U. 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March 2000, [http://www.state.gov/www/global/narcotics\\_law/1999\\_narc\\_report](http://www.state.gov/www/global/narcotics_law/1999_narc_report). 自那时起，产量便开始减少，不过仍然高于 1990 年的水平。
- ② Richard Holbrooke, “Breaking the Narco - Stat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3,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1/22/AR2008012202617.html>.
- ③ 笔者使用了普遍认为有失贴切的措辞“圣战萨拉菲主义”，而舍弃了使用频率更高的“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措辞都会让圣战萨拉菲主义带上一种合法性和历史性，笔者觉得它远远不配。笔者所说的圣战萨拉菲主义，其根源是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和德奥班德教派主义（Deobandism），部分可被看作是应对英美两国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影响力的产物。奥萨马·本·拉登以 13 世纪泰米亚赫（Imam Taki al Din ibn Ibn Taymiyyah）为例，不过泰米亚赫的圣战主义思想是基于 1258 年蒙古人血洗巴格达这一事件。笔者曾在别处论述过，历史充分证明，“对于任何文化而言，外来干预虽非必然但很有可能会导致暴力和排外反应，甚至幻想能回到只存在于神话之中的纯洁往昔”（Scott, *The Road to 9/11*, 260 - 261）。

## 结束语

本书介绍了秘密行动势力和毒品走私势力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虽不易察觉和揭示，却是一种有害无益、沾满血腥、持续不断且经常带有犯罪性质的联系，我将它称为“全球毒品网络”。我已经说过，人们对全球毒品网络（包括在这一网络中起辅助作用的任何黑暗势力）在美国各种深度事件和美国政治特别是美国战争机器发动的各种战争及其他国外冒险活动中的作用知之甚少。早期，少数群体利用各种保密性措施作掩护、将毒品贩子当作资产，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出了若干决定，导致美国战争机器逐渐能够在东南亚和阿富汗接连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通过欺骗性的深度事件将这些战争伪装成针对敌人挑衅采取的反击。在阿富汗的例子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来上任的美国总统愿意并有意延长或重复了老挝及越南战争的悲剧，其中包括上任时即承诺改变这种状况的总统，奥巴马。

尽管我所描述的美国政治已深深陷入了各种强大的深度势力相互交织的怪圈中，而且人们对这些势力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并不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毫无希望。我之所以编写本书，动力就来自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和世界还有希望，因此没有理由放弃努力或是将其异化。

正如我在《通往“9·11”之路》（*The Road to 9/11*）中所写



的那样，我确实认为必须努力提高美国民权社会的一体化程度，然后才有希望使美国政治发生方向上的重大改变，从而摆脱永久性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眼中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完全无可救药的或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可能称赞过美国各位战后总统的一些重要行动，虽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明显是靠美国战争机器的因素及其秘密势力才得以崛起的。无论未来数十年里将发生什么，至少人们可以记住美国的 20 世纪（就像英国的 19 世纪和罗马的二世纪一样）是一个避免大战的时代，尽管损失惨重且不必要的小战也时有发生。

如果这些被证明是历史的结论，那么我们应该感谢下面这些人。

- 杜鲁门，在批准了“行动方案”后，于 1952 年从朝鲜召回了麦克阿瑟将军并拒绝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 艾森豪威尔，曾威胁说在朝鲜使用核武器，1954 年在奠边府发生的法国防御战中拒绝进行军事干预；

- 肯尼迪，一方面使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又拒绝了那些将带来严重后果的建议，包括以核武器攻击俄罗斯、侵略古巴以及向老挝派驻 6 万名美国军人；

- 约翰逊，曾发动第一次针对北越的秘密战争，但也拒绝将战争升级和扩大的危险建议；

- 尼克松，在扩大和强化越南战争的同时，还费尽心思地试图和中国及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

- 卡特，继续推进中美及美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 里根，与曾经被他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达成了谅解。

甚至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对这段时期仍然不太了解），我们还应该感谢下面这些人。

- 乔治·H.W. 布什，发动了海湾战争，并抵住压力，拒绝将这场战争演变成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战争；

- 当然还有乔治·W. 布什，无故入侵了伊拉克，2006 ~ 2007





年抵制住了新保守派非常现实的压力，没有炸毁（甚至可能用核武器攻击）伊朗核设施。

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和它的政治。但可以确定的是，关于美国力量的叙述都只有一种色彩，或乐观或悲观，因此都难免失于片面。战争机器的力量不断促使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但有时这些力量也会受到钳制。简而言之，公众国家和战争机器虽然相互交织，却不相同（即使这种关系就像同一个人在喝醉和清醒两种状态下受审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作者都选择了给予美国政府及其所谓的民主制度适度的赞美，而没有按照惯例报以热烈的掌声。尽管我在本书中有很多批评的言论，但最后我还是要给予一些称赞。

我要把更多的赞美送给美国人民。诚然，美国的民主正逐渐增强，但与此同时，荒唐的候选人和罪恶勾当的激增也激起了民愤。我要把 1/3 的赞美给予全体美国人民，为他们的人性和对沙文主义的抵抗而欢呼。

我要把另外 1/3 的赞美给予那些主张和平的美国人。冷战期间，他们用突出的示例告诉我们，自下开展的非暴力劝导也能有效地重塑社会。我主要指的是美国的民权运动，它不但结束了国内隐性且合法的种族主义，而且鼓舞了全球各地开展其他类似的运动，虽然有些已经成功，有些尚未成功。我们还可以加上反战运动，它以广泛的舆论促使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提早结束，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土地和人民为其他国家追求自由的民族带去了希望和鼓励，而且未来仍将如此，但前提是广泛的美国民众能够将受到毒品和战争腐蚀的政治制度恢复到正确的位置。

# 参考文献

## 文件

Church Committee Report; U. S. Cong. , Senate, 94th Cong. , 2nd sess. ,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April 26, 1976, Senate Report No. 94 - 755.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zed ed. New York: Norton, 2004.

U. S. Congress, Senate, 102nd Cong. , 2nd Sess. *The BCCI Affair: A Report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Senator John Kerry, Chairman, and from Senator Hank Brown, Ranking Member,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Narcotic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eptember 30, 1992.

## 书

Anderson, Scott, and Jon Lee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The*



*Shocking Expose of How Terrorists, Nazis, and Latin American Death Squads Have Infiltrated the 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 New York: Dodd, Mead, 1986.

Astorga, Luis. *Drogas sin Fronteras.* Miguel Hidalgo, Mexico: Grijalbo, 2003.

Bacevich, Andrew J.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 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aer, Robert.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New York: Crown, 2003.

Baker, Chris, and Phasut Phongph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eaty, Jonathan, and S. C. Gwynne. *The Outlaw Bank: A Wild Ride into the Secret Heart of BCC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Belanger, Francis. *Drugs, the U. S., and Khun Sa.* Bangkok: Editions Duang Kamol, 1989.

Bird, Kai. *The Chairman: John J. McCloy,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and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Block, Alan A. *Masters of Paradise.*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1.

Block, Alan A., and Constance A. Weaver. *All Is Clouded by Desire: Global Ban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Westport, C. T.: Praeger, 2004.

Blum, William. *Killing Hope: U. S. 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Monroe, M. 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5.

Borjesson, Kristina, ed. *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2.

Bradlee, Ben, Jr. *Guts and Glory: The Rise and Fall of Oliver North.* New York: D. I. Fine, 1988.



Brook, Timothy,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 – 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Brown, Anthony Cave. *The Last Hero: Wild Bill Donova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Castle, Timothy N.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 1955 – 19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ockburn, Alexander, and Jeffrey St. Clair. *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 London: Verso, 1998.

Coll, Steve.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Penguin, 2004.

Colodny, Len, and Tom Schachtman. *The Forty Years' Wa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cons, from Nixon to Obama*. New York: Harper, 2009.

Cooley, John K.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Cordovez, Diego, and Selig S.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Withdraw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rn, David. *Blond Ghost: Ted Shackley and the CIA's Crusad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Corson, William R. *The Armies of Ignorance: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Empire*. New York: Dial, 1977.

Crile, George. *Charlie Wilson's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Oper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Dinges, John. *The Condor Years: How Pinochet and His Allies Brought*



*Terrorism to Three Continents*. New York: New Press, 2004.

Douglass, James.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Maryknoll, N. Y. : Orbis Books, 2008.

Dreyfuss, Robert. *Devil's Gam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 Isla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2005.

Emdad-ul Haq, M. *Drugs in South Asia: From the Opium Trade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Epstein, Edward J. *Agency of Fear: Opiat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New York: G. Putnam's, 1977.

Fabre, Guilhem. *Criminal Prosperity: Drug Traffick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Financial Crise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Farah, Douglas. *Blood from Stones: The Secret Financi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4.

Ferguson, Thomas, and Joel Rogers. *Right Turn: The Decline of the Democrat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Fineman, Danie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 - 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Fitzgerald, Paul, and Elizabeth Gould. *Invisible History: Afghanistan's Untold Stor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2009.

Ganser, Daniele. *NATO's Secret Armies: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Gerges, Fawaz. *America and Political Islam: Clash of Cultures or Clash of Intere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lenny, Misha. *Mc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Global Criminal Underground*. New York: Knopf, 2008.



Griffin, Michael.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Grose, Peter. *Gentleman Spy: The Life of Allen Dulles*. Boston: Richard Todd/Hough-ton Mifflin, 1994.

Halperin, Morton, with Jerry Berman, Robert Borosage, and Christine Marwick. *The Lawless State: The Crimes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Agencies*. New York: Penguin, 1976.

Hammond, Thomas. *Red Flag over Afghanistan: The Communist Coup,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Boulder, C. O. : Westview Press, 1984.

Handley, Paul M.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pol Adul-yadej*. New Haven, C. 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nhimäki, Jussi.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ersh, Burton. *The Old Boys: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A*. New York: Scribner's, 1992.

Hersh, Seymour.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1983.

Hinckle, Warren, and William Turner. *Deadly Secrets: The CIA-Mafia War against Castro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FK*.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2.

Hiro, Dili *War without End: The Rise of Islamic Terrorism and Global Response*. London: Routledge, 2002.

Hogan, Michael J.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 - 19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Holzman, Michael.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 and 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8.

Isaacson, Walter.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Johnson, Chalmers.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4.

Jones, Adam, ed. *Genocide, War Crimes and the West: History and Complicity*. London: Zed Books, 2004.

Jones, Howard. *Death of a Generation: How the Assassinations of Diem and JFK Pro-longed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Jordan, David C. *Drug Politics: Dirty Money and Democraci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Judis, John. *The Folly of Empire: What George W. Bush Could Learn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and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Scribner's, 2004.

Juhasz, Antonia. *The Tyranny of Oil: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ndustry—And What We Must Do to Stop It*. New York: HarperCollins/William Morrow, 2008.

Kaplan, David E., and Alec Dubro. *Yakuza: The Explosive Account of Japan's Criminal Underworld*. Reading, M. A.: Addison-Wesley, 1986.

Kaplan, Robert D. *Soldiers of God: With Islamic Warrior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Kepel, Gilles.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M. A.: Belknap Press, 2002.

Kessler, Ronald.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6.

Klare, Michael T.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1.

———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Petroleu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Klein, Naomi.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Henry Holt, 2007.

Krüger, Henrik. *The Great Heroin Coup Drug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Fascism*. Translated by Jerry Meld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Kux, Denn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 - 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 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0.

Kwitny, Jonathan. *The Crimes of Patriots: Dope, Dirty Money, the CIA, and the Nugan Hand Bank*. New York; Norton, 1987.

Labévière, Richard. *Dollars for Terr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lam*.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0.

Leary, William M.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Asia, 1946 - 1955*.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Lernoux, Penny. *In Banks We Trust*. Garden City, N. Y. : Anchor/Doubleday, 1984.

Levy, Adrian, and Catherine Scott-Clark. *Deception: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ret Trade in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Walker & Co. , 2007.

Lintner, Bertil.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Chiangmai; Silkworm Books, 1999.

——— *Blood Brothers: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of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Marshall, Jonathan. *Drug Wars: Corruption, Counterinsurgency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Forestville, C. A. : Cohan and Cohen, 1991.

Marshall, Jonathan, Peter Dale Scott, and Jane Hunter. *The Iran-*





*Contra Connection: Secret Teams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Reagan Er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McCoy, Alfred W.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McCoy, Alfred W., and Alan A. Block, eds. *War on Drugs: Studies in the Failure of U. S. Narcotics Policy.* Boulder, C. O. : Westview Press, 1992.

McKean, David. *Peddling Influence: Thomas "Tommy the Cork" Corcor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Lobbying.* Hanover, N. H. : Steerforth, 2004.

McSherry, J. Patrice. *Predatory States: Operation Condor and Covert War in Latin America.* Lanham, M. D.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Mills, James. *The Underground Empire: Where Crime and Government Embrace.* New York: Dell, 1986.

Napoleoni, Loretta. *Terror Incorporated: Tracing the Dollars behind the Terror Network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

Naylor, R. T. *Hot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Debt.* New York: Linden/Simon and Schuster, 1987.

Newsday Staff and Editors. *The Heroin Trai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Parry, Robert. *Lost History: Contras, Cocaine, and Other Crimes.* Arlington, V. A. : Media Consortium, 1997.

Pelton, Robert Young. *Licensed to Kill: Hired Guns 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Crown, 2006.

Peters, Gretchen. *Seeds of Terror: How Heroin Is Bankrolling the Taliban and AlQaeda.*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St. Martin's Press, 2009.

Porter, Gareth. *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rados, John.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Persian Gulf*.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 *Lost Crusader: The Secret Wars of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afe for Democracy: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Quincy, Keith. *Harvesting Pa Chay's Wheat: The Hmong of America's Secret War in Laos*. Spokane: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C. 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Jih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C. 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Renard, Ronald D. *The Burmese Connection: Illegal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Triangle*. Boulder, C. O. : Lynne Rienner, 1996.

Reynolds, E. Bruce. *Thailand's Secret War: The Free Thai, OSS, and SOE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isen, James. *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Rubin, Barnett.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 From Buffer State to Failed State*. New Haven, C. 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ampson, Anthony. *The Seven Sisters: 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Shaped*. New York: Viking, 1975.



Sanders, Jerry.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ain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Scahill, Jeremy.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ew York: Nation Books/Avalon, 2007.

Schroen, Gary. *First In: An Insider's Account of How the CIA Spearheaded the War on Terrorism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residio/Ballantine, 2005.

Schurmann, Herbert Franz.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Scott, Peter Dale.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Drugs, Oil, and War: The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Colombia, and Indo-china*. Lanham, M. D.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 *The Road to 9/11: Wealth,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The War Conspiracy: JFK, 9/11, and the Deep Politics of War*. Ipswich, MA: Mary Ferrell Foundation Press, 2008.

Scott, Peter Dale,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The CIA, Drugs, and Armies in Central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Shackley, Theodore, with Richard A. Finney. *Spymaster: My Life in the CIA*. Dulles, V. A. : Potomac Books, 2005.

Shorrock, Tim. *Spies for Hire: The Secret World of Intelligence Outsourc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Smith, Richard Harris.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Stuart-Fox, Martin. *A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mmers, Anthony, with Robbyn Swann. *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Viking, 2000.

Taylor, Robert H.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uomintang Intervention in Burma*. Data Paper 93.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73.

Trento, Joseph J.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Forum/Prima/Random House, 2001.

———. *Prelude to Terror: The Rogue CIA and the Legacy of America's Private Intel-ligence Network*.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5.

Trocki, Carl, ed. *Gangsters,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8.

Truell, Peter, and Larry Gurwin. *False Profits: The Inside Story of BCCI, the World's Most Corrupt Financial Empi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Valentine, Douglas. *The Strength of the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War on Drugs*. London: Verso, 2004.

———. *The Strength of the Pack: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spionage Intrigues That Shaped the DEA*. Springfield, O. R. : TrineDay, 2009.

Walker, William O. , III.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nglo-American Search for Order in Asia, 1912 - 1954*. Durha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Warner, Roger. *Back Fire: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War in Vietn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Weiner, Tim.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Yousaf, Muhammed, and Mark Adkin. *The Bear Trap: Afghanistan's Untold Story*. London: Leo Cooper, 1992.

# 索引

- “9·11”事件 5, 6, 37, 41, 79, 274, 312, 316, 325, 326, 336, 353~355, 357, 363~365, 371~376, 378, 380, 382, 384, 386, 387, 391, 418, 438~440, 443, 450, 457
- E. P. 巴里 122
- E. P. 巴利 294, 297
- E. 霍华德·亨特 85, 299
- FBN 见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
- J. 埃德加·胡佛 281
- J. 格雷厄姆·帕森斯 174
- M 基金 165, 166
- PSB D-23 153~155, 157, 159~161, 164, 180
- 阿卜杜拉·凯特里 32, 51, 60, 305, 311
- 阿卜杜勒·卡迪尔·汗 21
- 阿德南·哈绍吉 261, 289, 331, 332, 345, 346, 352, 442
- 阿德南·哈绍吉 289~292, 298, 311, 314, 351
- 阿尔弗雷德·哈特曼 294
- 阿尔弗雷德·考克斯 130, 139
-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 1, 2, 81, 140, 149, 196, 200, 265, 410, 433
- 阿尔文·梅尔尼克 263
- 阿方索·夏尔迪 375
- 阿奉索·达夫铎维奇 347, 352
- 阿富汗 6~8, 15~21, 23, 27, 28, 39, 41, 48, 78, 112~114, 134, 135, 193, 198, 203, 214, 215, 218, 219, 223, 241~244, 246, 249, 250, 295, 302~305, 307, 309, 311, 314, 316, 319~321, 328, 337, 342, 343, 346, 352~354, 357, 363~365, 377, 393~403, 405~413, 416~432, 434, 439~442, 447, 453~460
- 阿富汗阿拉伯人 21
- 阿迦·哈桑·阿贝迪 18, 298, 300



- 阿莱克塞·利克文切夫 350
- 阿里·穆罕默德 363
- 阿曼 18, 19, 24, 295
- 阿曼银行 19, 295
- 阿纳托利·戈里钦 269
- 阿塞拜疆 52, 214, 215, 303, 304, 306, 311, 323, 324, 428
- 埃德·迪尔伯恩 214, 303
- 埃德温·P. 威尔逊 286
- 埃德温·马丁 125
- 埃迪·契里尼 282~285, 292
- 埃夫里尔·哈里曼 270
- 埃吉尔·克罗赫 221, 228, 234
- 埃克森美孚 323, 324, 417
- 埃里克·普林斯 17, 328, 330
- 艾德·莱文森 263
- 艾德·兰兹厄力 270
- 艾德·罗杰斯 329, 331
- 艾哈迈德·拉希德 439, 444, 454
- 艾哈迈德·瓦利·卡尔扎伊 398, 429
- 艾伦·A. 布洛克 81, 285
- 艾伦·杜勒斯 44, 45, 47, 121, 130, 149~151, 157~159, 176, 178, 179, 358
- 艾伦·多尔夫曼 267, 277
- 艾森豪威尔 44, 111, 148, 150, 151, 153~156, 160, 161, 180, 181, 188~190, 194, 280, 333, 385, 461
- 爱德华·K. 莫斯 284, 286, 289
- 爱德华·兰斯戴尔 163, 332, 357
- 爱国者法案 339, 356, 375
- 安德鲁·巴塞维奇 326, 421
- 安顿·苏瑞克夫 345, 346, 350
- 安格勒顿 223, 268, 270
- 暗箱操作 243
- 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 51
-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34
- 奥兰多·博斯 64
- 奥兰多·勒特里尔 8, 62, 274
- 奥利弗·诺斯 214, 304, 376, 437
- 奥林·哈奇 299
- 奥萨马·本·拉登 215, 264, 442, 445, 450, 459
- 巴哈马群岛 93, 192, 255, 256, 259~261, 263, 264, 266, 278, 290, 300
- 巴基斯坦 16, 18~21, 23, 40, 41, 93, 169, 193, 218, 223, 225, 242, 292, 294, 295, 298, 299, 303, 305, 306, 309, 317, 321, 352, 395, 402, 407, 409~413, 418, 419, 427, 431, 432, 441, 442, 444~447, 450~457, 459
- 巴拉克·奥巴马 395, 418
- 巴里·凯尔 84
- 巴拿马 25, 95, 96, 199, 200, 272, 276, 299, 303, 366, 441, 442
- 巴西 54, 59, 65, 174, 175, 275,



- 299, 350
- 保罗·海利维尔 38, 80, 87, 97,  
120 ~ 122, 127, 135, 143, 150,  
169, 198, 253, 255, 283, 293,  
294, 299, 332
- 保罗·海利维尔 38, 80, 87, 97,  
120 ~ 122, 127, 135, 143, 150,  
169, 198, 253, 255, 283, 293,  
294, 299, 332
- 保罗·蒙多里尼(蒙多洛尼) 81
- 保罗·尼兹 47, 384
- 保罗·沃尔福威茨 315, 322, 383
- 保密 44, 126, 130, 240, 255,  
262, 390, 391, 415, 460
- 鲍比·贝克 263
- 鲍比·雷·英曼 334
- 鲍格才家族 50
- 北部湾事件 6
- 北方联盟 23, 398, 412, 439
- 北京 67, 141, 185, 211
- 北越 162, 163, 175, 176, 182,  
183, 384, 461
- 贝蒂尔·林特纳 232
- 本·巴卡·梅迪 248
- 本格特国际 283
- 本格特矿业公司 260
- 比比·瑞波佐 283, 289, 292
- 比尔·莱尔 111, 156, 158, 164,  
167, 181, 183, 185, 187
- 彼得·菲利普斯 36
- 毕斯·西里尔 82, 88, 127, 136
- 避难所计划 122, 297
- 波·格里茨 236
- 波斯湾 18, 417
- 玻利维亚 34, 90, 275, 350
- 伯顿·赫什 109, 197
- 伯顿·坎特 122, 256, 266
- 伯纳德·福尔 176, 185
- 伯纳德·霍顿(伯尼) 200, 214
- 布茨·埃伦·汉密尔顿公司 332,  
338, 340
- 布鲁金斯学会 23
- 布鲁克俱乐部(纽约) 50, 177
- 布鲁斯·康明思 95, 126, 139,  
365, 383
- 布鲁斯·拉帕波特 18, 293 ~ 295,  
442
- 布鲁斯·伊文斯 339
- 布瑞格丹·布兰卡 97
- 蔡美儿 101, 102
- 参谋长联席会议(JCS) 14, 50,  
122, 131, 133, 143, 144, 160,  
174, 181, 313, 322, 354, 358,  
359, 361, 368, 381
- 查尔摩斯·约翰逊 37, 418
- 查尔斯·戴高乐 247
- 查尔斯·普莱蒂上校 49
- 朝鲜 21, 126, 130 ~ 133, 142,  
157, 165, 186, 307, 308, 365,  
366, 373, 380, 385, 461
- 朝鲜战争 126, 130 ~ 133, 157,  
186, 307, 308, 365, 373, 380,

- 385, 461
- 潮州 67, 138, 168, 203, 227, 296
- 陈弼臣 119, 141, 142, 168, 169, 262
- 达伍德·易卜拉欣 444 ~ 448
- 大卫·海德里 447
- 大卫·凯 335
- 大卫·洛克菲勒 44, 66, 396
- 大卫·马斯托 242, 407, 434
- 大卫·莫拉莱斯 207, 208
- 大卫·帕卡德 384
- 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 143, 159, 177, 181, 189, 277
- 丹尼尔·K. 路德维格 278
- 丹尼尔·法恩曼 133, 171, 313
- 丹尼斯·戴尔 217, 265, 428
- 丹尼斯·华纳 178
- 掸邦 22, 115 ~ 117, 119, 146, 186, 187, 193, 194, 196, 233 ~ 235, 238
- 道格拉斯·费斯 325
- 道格拉斯·瓦伦丁 32, 88, 123, 200, 219, 249, 268, 449
- 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 47, 208, 210
- 迪恩·艾奇森 126, 132, 150
- 迪克·切尼 274, 314, 350, 381, 383, 436
- 迪诺·契里尼 283, 286, 287
- 地缘政治学 318
- 第 113 军事情报组 3
- 第二次世界大战 111, 120, 221, 241, 247, 457
- 东部开发公司 122, 296
- 东南亚 7, 15, 55, 59, 80, 87, 93, 109, 111 - 115, 120, 121, 127, 128, 133, 135, 136, 138, 140, 141, 144, 146, 149, 153, 154, 162, 163, 171, 172, 181, 184, 194, 200, 206, 218, 222, 225, 230 - 233, 238 - 241, 243 - 248, 250, 261, 278, 296, 308, 385, 460
- 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 162, 194
- 毒品 1, 5 ~ 11, 13, 15, 16, 20, 22 ~ 24, 26 ~ 28, 31, 34, 35, 37, 39, 41 ~ 43, 47 ~ 49, 51 ~ 53, 60, 61, 63, 64, 66 ~ 87, 89 ~ 93, 96 ~ 98, 100 ~ 115, 118, 119, 121 ~ 123, 125, 127, 133 ~ 138, 140, 141, 144, 146 ~ 150, 152, 153, 163, 167 ~ 171, 183, 185, 188, 189, 191 ~ 194, 196 ~ 206, 208 ~ 221, 223 ~ 229, 232, 234, 235, 238 ~ 246, 248, 250, 251, 253 ~ 257, 260, 265, 268, 269, 274, 279 ~ 281, 285, 290, 291, 293, 294, 296 ~ 299, 301 ~ 317, 323, 343, 346, 347, 350 ~ 352, 357, 363, 373, 394, 395,





- 398, 402, 403, 405, 407, 409 ~ 416, 423 ~ 445, 447 ~ 452, 454 ~ 460, 462
- 毒品代理 52, 112 ~ 114
- 毒品走私 24, 26, 31, 34, 37, 39, 41, 42, 47, 48, 52, 53, 61, 67, 68, 72, 73, 76 ~ 78, 80 ~ 86, 89 ~ 93, 96 ~ 98, 100, 105, 108, 109, 111, 113 ~ 115, 118, 123, 127, 135 ~ 138, 140, 144, 147, 150, 153, 163, 168 ~ 170, 188, 194, 196, 198, 199, 204, 214, 216, 219, 221, 226, 227, 239, 242 ~ 246, 248, 250, 253 ~ 255, 268, 269, 274, 279, 291, 293, 297, 299, 303, 308 ~ 311, 323, 343, 347, 351, 352, 363, 373, 398, 402, 403, 405, 407, 409, 412 ~ 414, 423, 425, 427 ~ 430, 432, 434 ~ 445, 448 ~ 451, 454, 457 ~ 460
- 杜鲁门主义 59
- 段希文将军 137, 147, 186, 194, 449
- 俄罗斯 27, 40, 55, 72, 100, 105, 303, 311, 320, 323, 341 ~ 351, 407, 412, 426, 431, 438, 453, 461
- 恩里克·卡马雷纳尤里 77, 98
- 儿玉誉士夫 165, 166, 261, 309
- 发展政策国际中心 (ICDP) 435, 437
- 法国 7, 10, 32, 42, 54, 67, 72, 81, 91, 93, 94, 105, 154, 155, 159 ~ 161, 172, 173, 177, 178, 188, 205, 222 ~ 225, 244 ~ 250, 264, 286, 291, 311, 313, 345, 361, 398, 403, 404, 411, 413, 418, 443, 461
- 法左·哈克 242, 309, 310
- 翻版中情局 269, 272, 274, 309, 314
- 梵蒂冈银行 12
- 飞鹰计划 9, 10, 17, 34, 61, 63, 64, 67, 275, 310, 311, 317
- 菲德尔·卡斯特罗 13, 63, 82, 258, 276, 284, 285
- 菲律宾 81, 121, 165, 171, 204, 260, 332, 442
- 费迪南·马科斯 260
- 费尔南多·古铁雷斯·巴里奥斯 25, 75, 78
- 佛罗里达 63, 91, 105, 122, 135, 144, 198, 206, 208, 255, 280, 281, 285, 291, 294, 296, 301, 358
- 弗吉尼亚·希尔 88, 127, 136
- 弗拉基米尔·费林 342, 351
- 弗莱彻·普劳蒂 37, 384
- 弗兰克·卡斯特罗 13, 64
- 弗兰克·科波拉 49, 92, 254
- 弗兰克·威斯纳 15, 45, 47, 129,



- 130, 139, 150, 151, 178, 257, 279
- 弗利茨·厄马斯 336, 346, 350
- 弗农·沃尔特斯 62
- 富米·诺萨万 180, 187, 190, 191, 196, 405
- 哥伦比亚 16, 22, 296, 343, 417
- 哥伦比亚计划 27
- 格雷琴·彼得斯 444, 449, 450, 454
- 格伦·格林沃尔德 339, 356
- 共和党 46, 126, 150, 151, 153, 154, 157, 169, 280, 299, 310, 328 ~ 331, 342, 376, 377, 383, 436
- 贡勒 173, 179 ~ 183
- 古巴 9, 11, 62 ~ 64, 74, 81, 86, 93, 191, 207, 208, 222, 250, 256, 258, 271, 272, 274, 276, 284, 286, 287, 293, 310, 353, 357 ~ 360, 369, 372, 461
- 古巴联合革命组织协会 (CORU) 63, 64
- 古巴流放者 250
-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 20, 23, 214, 242, 304, 309, 311, 402, 408 ~ 410
- 古斯塔沃·迪亚兹·奥尔达斯 76
- 国际多元化公司 (I. D. C.) 259 ~ 261
- 国际海事银行 294, 295, 311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02, 103, 141
-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 (BCCI) 8, 18 ~ 21, 38, 52, 60, 72, 96, 244, 255, 264, 289, 293 ~ 296, 298 ~ 303, 309 ~ 311, 314, 331, 373, 411, 442, 443
- 国际信用银行 264, 283
-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242
- 国际银行 244, 299, 300
- 国家安全调查中心 (CISEN) 78 ~ 80
- 国家安全法 44
- 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14, 44, 48, 122 ~ 124, 132, 133, 154, 160, 163, 164, 170, 176, 179, 254, 313, 324, 350, 359, 437
- 国家政策委员会 17, 328, 387
- 国民党 22, 38, 43, 44, 47, 48, 73, 74, 88, 89, 95, 96, 108 ~ 110, 112, 113, 115, 116, 118 ~ 121, 123 ~ 129, 131 ~ 140, 142 ~ 148, 150, 151, 154, 159, 164, 166 ~ 170, 174, 184 ~ 189, 192 ~ 194, 197, 198, 201, 203 ~ 205, 209 ~ 212, 215, 216, 222, 227, 229, 232, 234, 235, 237, 240, 250, 257, 279 ~ 281, 299, 308, 371, 405, 449
- 哈里·S. 杜鲁门 131
- 哈里·安斯林格 134, 150



- 哈里伯顿 341 ~ 343, 350
- 哈立德·阿米达 274, 363, 364,  
371 ~ 373, 388
- 哈利·巴伯尔 329
- 哈米德·卡尔扎伊 214, 304, 398,  
429
- 哈珀·昆仲(卡波·昆扎拉) 116
- 哈瓦那 5, 13, 81 ~ 83, 221, 248,  
270, 284, 353, 360
- 海地国家情报服务处(SIN) 24
- 海洛因 2, 7, 15, 20 ~ 24, 34,  
63, 80, 82, 90 ~ 92, 108, 120,  
128, 134, 138, 139, 141, 146,  
147, 168, 183, 192, 193, 197,  
199, 200, 202, 203, 205, 206,  
210, 211, 215, 217 ~ 227, 232,  
234, 238 ~ 240, 242 ~ 250, 260,  
264, 280, 304 ~ 307, 310, 312,  
343, 346, 351, 362, 402, 405,  
408, 410, 411, 413, 423 ~ 425,  
427, 428, 430, 438, 439, 441,  
445, 447, 449, 454, 455
- 海湾和西方工业有限公司 64
- 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 7, 87,  
113, 121, 123, 144, 145, 149,  
156, 159, 160, 163, 170, 183,  
184, 192, 198, 201, 250, 257,  
279, 281, 299, 308, 309
- 韩国 38, 56, 89, 365, 442
- 汉克·格林斯潘 292, 296
- 汉纳矿业公司 59
- 核保银行 278
- 赫伯特·伊特金 270
- 赫蒙族 16, 111, 155, 163, 172,  
173, 181 ~ 185, 188 ~ 190, 196,  
205, 211, 212, 303
- 黑暗象限 8, 171
- 黑尼亚·埃德侯特 214, 303
- 黑手党 35, 49 ~ 51, 82, 91, 92,  
112, 135, 136, 147, 166, 202,  
205 ~ 208, 222, 245, 247, 250,  
253, 254, 258, 267 ~ 272, 284 ~  
286, 288, 297, 304, 306, 307,  
310, 311, 342, 343, 348, 377,  
411, 438
- 黑水公司 16, 17, 315, 328 ~ 330,  
419
- 亨利·基辛格 64, 222, 270, 275,  
331, 384
- 亨利·卢斯 128, 129, 154, 155
- 亨利克·克鲁格 247
- 洪都拉斯 78, 98
- 胡安·拉蒙·马塔·巴列斯特罗  
437
- 花旗银行(纽约花旗银行) 13,  
60, 103, 104, 106, 290, 415,  
423, 450 ~ 452
- 华尔街 3, 15, 24, 43 ~ 46, 65,  
94, 101, 150, 151, 156, 157,  
256, 266, 293, 299, 329, 383
- 华莱士·格罗夫斯 258, 259, 281,  
282, 290, 292



- 华盛顿 6 ~ 8, 10, 17, 18, 21, 28, 35, 36, 39, 47, 51, 62, 63, 72, 94, 101 ~ 104, 116, 118, 124, 125, 128, 134, 145, 148, 150, 154, 157, 161, 162, 169, 173, 176 ~ 179, 181, 190, 194, 198, 200, 212, 274, 278, 279, 286 ~ 288, 299, 308, 310, 318, 322, 337, 341, 342, 346, 352, 358, 362, 365, 380, 389, 390, 395, 414 ~ 416, 421, 423, 435, 436, 440, 444, 446, 447, 452, 455 ~ 457, 459
- 怀汀·维劳尔 257
- 灰狼计划 32 ~ 35, 225
- 灰色操作 259, 267
- 回降 114, 153, 154, 157, 159, 180
- 惠特利·布鲁纳 330
- 混乱计划 271, 274
- 基地组织 16, 17, 305, 327, 337, 356, 364, 417, 438, 441, 445, 456
- 基督教民主党 254
- 缉毒局 (CDEA) 24 ~ 26, 32, 36, 74, 76 ~ 78, 86, 98, 105, 134, 199, 200, 204 ~ 206, 217 ~ 219, 232, 234 ~ 237, 239, 240, 245, 246, 265, 302, 303, 426, 428, 434, 446 ~ 449
- 缉毒体系 71, 72
- 吉尔吉斯斯坦 305, 306, 342
- 吉列尔莫·苏亚雷斯·梅森 61
- 吉米·霍法 277
- 吉米·卡特 67, 213, 242, 298, 411
- 吉姆·奥康尼尔 207
- 吉姆·卓林克霍尔 256, 265
- 加雷斯·波特 161, 368, 399
- 加利福尼亚 1, 7, 62, 77, 109, 126, 280, 433
- 加拿大 39, 80, 81, 95, 105, 363, 410, 415, 431, 447
- 假标记操作事件 5
- 柬埔寨 110, 143, 155, 162, 180, 201, 203, 224, 230, 231, 377
- 江萨·差玛南 193, 229
- 蒋介石 95, 96, 126, 128 ~ 130, 138, 139, 145, 154, 157, 177, 185, 192, 280, 370, 398
- 杰克·安德森 234, 284, 285
- 杰克·布卢姆 90
- 杰里米·哈蒙德 424
- 杰伊·拉弗斯通 268, 315
- 金三角 (缅甸—老挝—泰国) 22, 135, 146, 197, 203, 212, 218, 224 ~ 226, 233, 234, 243, 245, 250, 260
- 金新月 22, 219, 242, 243, 250, 408, 410
- 禁毒运动 227, 245
- 禁毒战争 217 ~ 219, 222, 226 ~



- 228, 232, 234, 239, 242, 245,  
246, 434, 458
- 经批准的暴行 31, 34
- 军事政变 65, 66, 119, 123, 142,  
175, 180, 230, 262
- 卡尔·豪斯霍弗尔 320
- 卡拉奇 16, 20, 444, 445
- 卡洛斯·帕莱茨 62
- 卡洛斯·沙尔林纳斯·德·戈塔 74
- 卡马尔·亚当 301, 331
- 卡萨布兰卡计划 106, 290
- 卡斯托银行 122, 192, 255, 256,  
258, 259, 261, 265 ~ 267, 277,  
278, 284, 293, 294, 300, 301,  
309
- 卡特勒·利吉银行 255, 256, 294
- 凯瑟琳·格雷厄姆 178, 436
- 凯文·菲利普斯 56, 276, 319
- 康多莉扎·赖斯 371
- 康拉德·布莱克 39
- 科林·鲍威尔 336
- 科索沃解放军 (KAL) 304, 305,  
312
- 科学应用国际公司 (SAIC) 318,  
333 ~ 341, 355
- 《可卡因政治》 249, 435
- 可卡因 24 ~ 27, 34, 78, 90, 91,  
97, 98, 199, 221, 250, 296,  
411, 415, 449
- 克莱尔·陈纳德将军 87, 96, 126,  
278, 279
- 克里斯·梅森 396
- 肯尼迪 (约翰·F. 肯尼迪、罗伯特·  
肯尼迪) 6, 11, 14, 37, 134,  
163, 165, 184 ~ 186, 188, 189,  
191, 201, 208, 221, 254, 268,  
272 ~ 274, 284, 285, 288, 290,  
291, 309, 312, 313, 319, 359,  
360, 368, 371 ~ 375, 377, 380,  
382, 385, 386, 395, 421, 461
- 空中警察增援部队 (PARU) 111
- 恐怖主义 1, 10, 63, 253, 274,  
311, 316, 317, 326, 333, 339,  
352, 355, 363, 379, 437, 439,  
448, 454 ~ 456
- 昆沙 209, 210, 215, 216, 233 ~  
240, 243, 458
- 拉斐尔·卡罗·昆特罗 78
- 拉凯·卢西亚诺 50, 74, 81, 92,  
253, 265
- 拉美反共联盟 (CAL) 60, 61
- 拉斯维加斯 241, 263, 266, 271,  
272, 290, 292
- 莱曼·雷姆尼泽 358
- 莱斯特·阿蒙尔 95
- 兰德公司 174, 175, 417
- 兰尼·格里菲斯 329, 331
- 拦截计划 220, 221
- 劳尔·沙尔林纳斯·德·戈塔 103
- 劳里·麦尔罗伊 326, 336, 339,  
355
- 劳伦斯·赖特 364, 373



- 老挝 2, 7, 16, 22, 26, 39, 68, 90, 111, 113, 120, 128, 135, 137, 143, 146, 153, 155, 159, 162, 163, 168, 170 ~ 192, 196 ~ 212, 214, 215, 222 ~ 224, 226 ~ 228, 230, 231, 234, 235, 240 ~ 244, 250, 261, 299, 302, 303, 307 ~ 309, 313, 317, 337, 357, 359, 365, 368, 371, 403 ~ 405, 407, 408, 412, 413, 423, 429, 432, 441, 458, 460, 461
- 老挝共产党 240
- 老挝战斗部队 241
- 雷·克莱恩 61, 89, 299, 315
- 雷曼兄弟 104
- 冷战 42, 51, 55, 113, 124, 231, 316, 321, 322, 407, 462
- 黎巴嫩 93, 223, 264, 265, 299, 316, 317
- 李·哈密尔顿 436, 438
- 李·哈维·奥斯瓦德 273, 309, 364, 372
- 李弥 89, 108, 109, 119, 125, 128, 130 ~ 136, 139, 140, 142, 145, 148, 151, 154, 157, 166, 197, 198, 209
- 李文华将军 232, 240
- 里查德·尼克松 7, 66, 150, 166, 211, 217 ~ 223, 225 ~ 227, 232, 234, 242, 245 ~ 247, 249, 280, 283, 284, 289, 292, 297, 302, 332, 336, 375, 378, 379, 421, 461
- 理查德·比塞尔 150
- 理查德·伯特 341
- 理查德·赫尔姆斯 46, 277, 301, 360
- 理查德·杰夫 256
- 理查德·梅隆·斯凯菲 38
- 理查德·珀里 315, 384
- 理查德·史迪威 126, 129, 148, 149, 209, 314
- 理查德·维格里 38
- 理查德·西科德 210, 213, 214, 303, 304, 311, 314
- 利比亚 213
- 联邦调查局 (FBI) 3, 9, 10, 14, 71, 76, 77, 79, 84, 85, 94, 206, 207, 363
- 联邦麻醉药品管理局 (FBN) 81, 82, 88, 91, 134 ~ 136, 138, 140, 150, 200 ~ 202, 219, 249, 265
- 联合国 21, 22, 58, 112, 113, 129, 134, 135, 141, 168, 243, 244, 336, 382, 412, 416, 424, 425, 427, 439, 457
- 联合果品有限公司 59, 279
-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JSOC) 16, 209, 314, 419, 420
-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16, 209, 314, 419, 420



- 联行 223, 264
- 列奥尼达斯·阿里亚斯·托雷斯 25
-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280
- 卢徐水 (Vichien Wachirakaphan)  
199, 240
- 鲁伯特·默多克 38, 39, 363
- 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 276
- 吕西安·寇内因 89, 90
- 律师 44 ~ 47, 78, 122, 123, 165,  
169, 198, 208, 228, 256, 266,  
268 ~ 270, 277, 282, 293, 348
- 伦恩·克劳德尼 36, 221, 228
- 罗伯特·M. 盖茨 334
- 罗伯特·邦纳 (缉毒局局长) 25
- 罗伯特·布鲁尔 235
- 罗伯特·怀特 275
- 罗伯特·鲁斯洛 184
- 罗伯特·马休 207, 267
- 罗伯特·帕里 310, 388
- 罗伯托·德·奥布伊森 61, 91
- 罗伯托·卡尔维 296
- 罗杰·华纳 180
- 罗里·斯图尔特 401, 419
- 罗纳德·里根 66, 91, 299
- 罗兴汉 203, 232 ~ 237, 239, 240,  
243
- 洛厄尔·詹森 78
- 洛克菲勒家族 66
- 洛克希德 261, 262, 292, 309
- 洛蕾塔·拿破里奥尼 304, 428
- 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  
(BNDD) 134, 205, 221, 224,  
226, 228, 235, 247 ~ 249
- 马克·麦克法林 25
- 马里奥·布罗德 268, 270
- 马里奥·桑多瓦尔·阿拉尔空 61,  
91
- 马里奥·维兰纽瓦·马德里 104
- 马庆万 204
- 马赛利诺·因纳莱塔 85
- 马思雨 203, 204, 260
- 马歇尔计划 59, 94, 170
- 玛丽·卡特涂料公司 282
- 迈阿密 9, 24, 25, 33, 64, 67,  
122, 123, 135, 144, 150, 169,  
198, 206 ~ 208, 221, 250, 263,  
276, 283, 290, 311, 358, 375
- 迈阿密国家银行 122, 135, 263,  
290
- 迈克·麦康内尔 333
- 迈克尔·汉德 200, 213, 303
- 迈克尔·莱丁 314
- 迈克尔·莱文 205, 217, 227
- 迈克尔·帕伦蒂 37, 386
- 迈克尔·唐雷 61
- 迈耶·朗斯基 81 ~ 83, 87 ~ 89,  
93, 96, 97, 122, 123, 127,  
135, 192, 206, 263, 264, 266,  
272, 282
- 麦尔斯·科普兰 292, 332
- 麦克·贝克 330
- 麦克·华莱士 24



- 麦斯维尔·泰勒将军 368
- 麦塔集团 72, 89, 93, 96, 240
- 曼纽尔·孔特雷拉斯 34, 62
- 曼纽尔·诺列加 25
- 猫鼬计划 357
- 美国大使馆 7, 50, 66, 142, 146, 183, 197, 234, 411
- 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 59, 415
- 美国国会 67, 169, 214, 233, 275, 304, 328, 342, 374, 415
- 美国国际集团 (AIG) 126 ~ 128, 278
- 美国国务院 85, 102, 113, 125, 134, 138, 174, 181, 238, 275, 279, 281, 304, 305, 412, 458
- 美国航空公司 87, 121, 145, 169, 174, 178, 180, 183, 185, 188, 190, 191, 196, 211, 214, 279, 303
- 美国合作 446
- 美国和国外电力公司 13
- 美国禁毒 219, 226, 232, 237, 239, 245
- 美国空军 261, 342, 384, 405
- 美国陆军情报 268
- 美国宪法 378
- 孟山都公司 36
- 米尔顿·弗里德曼 65, 101
- 米尔顿·卡茨 94
- 米格尔·纳扎尔·哈罗 25, 75, 77, 199
- 米奇·哈弗 36
- 米切尔·温贝尔 89, 90, 299
- 米歇尔·辛多纳 296
- 秘鲁 25, 299, 441
- 缅甸 7, 22, 26, 43, 44, 48, 67, 68, 89, 108, 109, 112, 113, 115 ~ 121, 126, 128, 130, 132, 133, 135, 137, 138, 140, 142 ~ 146, 148 ~ 150, 154, 155, 157, 159, 162, 166 ~ 171, 174, 175, 184 ~ 186, 193, 194, 196, 198, 203, 210, 215, 223, 227, 231 ~ 234, 236 ~ 240, 243, 244, 250, 257, 279, 308, 432, 458
- 民用航空运输公司 (CAT) 22, 87, 121, 129, 130, 132, 139, 140, 145, 146, 148, 149, 173, 189, 192, 211, 257, 281
- 摩萨德 171, 264, 272, 283, 296, 334
- 莫里斯·克莱曼 256, 266
- 莫利塞斯·纳伊姆 349
- 莫梅特·阿里·阿加 32, 311, 336
- 墨西哥 22, 24, 25, 54, 56, 67, 70 ~ 93, 96 ~ 107, 123, 127, 138, 199, 220, 245, 247, 248, 272, 290, 398, 415, 441, 450
- 墨西哥国民银行 106
- 墨西哥联邦安全部 (DFS) 25, 97, 98
- 穆罕默德·“鲍勃”·哈桑 262





- 穆罕默德·摩萨台 51, 308  
纳奥米·克莱因 65, 66, 442  
纳尔逊·邦克·亨特 387  
纳尔逊·格罗斯 232, 233  
纳隆·吉滴卡宗 229  
纳瑞宣委员会 142  
南越 162, 176, 180, 226  
尼尔·埃文斯 303  
尼尔森·洛克菲勒 46, 66, 95  
尼古拉斯·迪克 308  
尼加拉瓜反抗军 78, 98, 214, 435 ~  
437  
尼科尔·史密斯 117  
尼亚兹·奈克 418  
纽甘—汉德银行 200, 250, 260,  
301 ~ 303, 312  
纽约社会名流录 45, 47  
纽约市 7, 9, 15, 17, 24, 38, 44 ~  
47, 49, 50, 59, 81, 90, 92,  
126, 139, 148, 150, 151, 156,  
177, 178, 187, 222, 226, 238,  
240, 243, 253, 265, 268, 269,  
295, 325, 330, 363, 364, 373,  
381, 408, 409, 411, 415, 422,  
424, 425, 427, 435, 439, 447,  
449, 451, 455  
纽约银行 60, 106, 290, 311, 346  
诺伯特·施莱 165  
诺斯伍兹计划 357, 358  
欧安·莱提肯将军 177, 203, 204,  
261, 405, 429  
欧内斯托·塞迪略 74  
欧文·布朗 91, 203, 268  
帕莱茵银行 122, 255, 263, 294,  
298  
炮·斯里亚诺恩 93, 119, 121,  
123, 141 ~ 143, 145, 146, 150,  
152, 163, 168, 183, 193, 194,  
196, 210, 262, 281, 289, 449  
培·萨纳尼空 174, 175  
佩佩·埃斯科瓦尔 453  
披汶·颂堪 116  
皮特·布鲁顿 293  
片山诗 261, 309  
频·春哈旺 119, 123, 146, 183  
平德林 261  
朴东善 38  
普利茨克(家族) 277  
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269  
乔纳森·马歇尔 142, 259  
乔纳森·谢尔 43  
乔治·H.W. 布什 9, 274, 315,  
331, 365, 376, 461  
乔治·奥姆斯特德将军 299  
乔治·波尔 367  
乔治斯·蓬皮杜 247  
人民劳动革命党(越南) 398  
日本 56, 81, 89, 93, 112, 115,  
116, 118, 121, 126, 128, 129,  
155, 157, 164 ~ 167, 260, 261,  
309, 446  
日内瓦协议 161, 162

- 萨尔瓦多 25, 61, 91  
萨尔瓦多·阿连德 66  
萨瓦克 (SAVAK) 408  
塞尔瓦托·格莱尼洛 271  
塞特里斯·法索利斯 139  
三合会 67, 68, 115, 133, 138, 203  
三军情报局 (ISI) 19, 21, 407, 409~412, 428, 431, 442, 444~446, 452  
桑托·特莱菲肯特 206, 260, 267  
沙克利 200, 206~215, 250, 276, 277, 302, 303, 311, 314  
山姆·吉安卡纳 258, 267, 285  
商业银行 266, 278, 300, 301  
上流社会 12~15, 50, 95, 121, 150, 156, 157  
深度国家 3, 31, 33~35, 39~41, 76  
深度历史 1, 6, 12, 13, 48, 109  
深度事件 1, 5, 6, 8, 11, 12, 37, 41, 52, 251, 353~357, 364~366, 373, 374, 376~378, 380, 382~386, 433, 434, 460  
深度势力 3, 5, 15, 16, 35, 53, 246, 460  
深度政治 52, 53, 96, 374, 433, 434  
深度政治 52, 53, 96, 374, 433, 434  
圣战分子 214, 303~305, 311, 314, 323, 327, 402, 409, 412, 441, 446, 447, 456  
圣战者 20, 23, 214, 215, 242, 244, 250, 442, 455  
石油 26, 46, 54, 59, 60, 94, 105, 112, 166, 294, 324, 325, 327, 383, 387, 413, 414, 417, 418, 442, 443, 453  
石油巨头 54, 59  
世界反共联盟 34, 60, 61, 88, 90, 128, 226  
世界贸易公司 (WCC) 46, 93~96, 109, 120, 121, 123, 139, 141  
世界穆斯林联盟 (WML) 54  
世界商业银行 263, 264, 296  
市场原教旨主义 65, 100, 101, 104  
笹川良一 309  
收入差距 54, 55, 57, 104  
水莽铜矿开采有限公司 59  
水门事件 6, 37, 48, 53, 87, 255, 274, 276, 283, 289, 291, 302, 315, 386, 390  
水门事件之后的改革 41, 391  
水门事件之后的改革 41, 391  
私人军事承包商 (PMCs) 326~328, 330, 337, 341  
私人情报承包商 (PICs) 330, 333, 334, 337  
斯戴法诺·戴利·奇阿伊 33, 51,



- 60, 62, 67, 311
- 斯蒂芬·哈特费尔 339, 355
- 斯坦菲尔特·特纳海军上将 276
- 宋子文 38, 128, 138, 145, 280, 281, 289, 398
- 苏加诺 231, 262, 309
- 苏利文与克伦威尔 (律师事务所) 45, 46
- 苏联 15, 19, 23, 42, 43, 59, 86, 112, 123, 124, 153, 173, 181, 191, 198, 242, 273, 295, 302, 303, 315, 317, 320 ~ 323, 336, 358, 359, 377, 402, 406, 408, 411, 412, 417, 418, 430, 441, 447, 461
- 梭发那·富马亲王 172 ~ 174, 179, 180, 187
- 他依·吉滴卡宗 119
- 塔利班 16, 23, 134, 135, 214, 244, 304, 320, 399, 413, 417, 418, 420, 422, 424 ~ 428, 438, 441, 444, 449, 450, 452 ~ 455, 458
- 台湾 95, 126 ~ 128, 139, 140, 145, 146, 148, 151, 165, 174, 185, 186, 188, 202 ~ 204, 299, 307, 308
- 泰迪·克莱克 272
- 泰国 7, 22, 26, 38, 56, 93, 108 ~ 121, 123 ~ 125, 128, 129, 132 ~ 135, 137, 138, 140 ~ 164, 167 ~ 173, 176, 179 ~ 189, 193 ~ 196, 199, 201, 203, 208, 210, 212, 215, 216, 218, 222, 223, 226 ~ 232, 234 ~ 237, 240, 241, 243, 246, 250, 257, 262, 280, 281, 302, 308, 309, 313, 432, 441, 449, 458
- 泰国边境巡逻警察 (BPP) 111, 124, 132, 143, 144, 147, 148, 151, 152, 156 ~ 159, 161, 163, 164, 167, 172, 183, 184, 210
- 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 111, 113, 143, 153, 155, 156, 159, 161 ~ 164, 167, 170, 172, 173, 176, 180 ~ 185, 187, 189, 208
- 唐纳德·巴莱特 333
-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274, 314, 328, 332, 340, 383, 390, 396
- 陶驷驹 67, 68
- “特工队” 37, 384
- 特勤 LLC 公司 329, 330, 337, 338, 341, 343
- 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帽) 1, 174, 178 ~ 180
- 提波·罗森鲍姆 264, 283, 296
- 提姆·温纳 196, 255, 409
- 天堂岛 282 ~ 285, 332
- 土耳其 31 ~ 35, 40, 41, 43, 53, 93, 100, 155, 222 ~ 226, 231, 245, 246, 248, 249, 285, 305 ~ 307, 311, 313, 317, 324, 336,



- 342, 343, 362, 427, 428, 440, 441
- 托马斯·科克伦 126, 127, 169
- 托尼·坡 (安东尼·坡塞坡尼) 201, 202
- 瓦哈比主义 54, 459
- 外交关系委员会 (CFR) 10, 17, 44, 45, 313, 382~384, 387
- 王宝 173, 181~183, 185, 189, 190, 196, 200, 202, 206~208, 210, 211, 213, 223, 226, 245, 302
- 危地马拉 59, 61, 88, 89, 91, 257, 258, 299, 308, 312
- 威利斯·伯德 8, 109, 111, 120, 123, 142, 158, 168, 184, 185, 191, 299, 404
- 威利斯·伯德 8, 109, 111, 120, 123, 142, 158, 168, 184, 185, 191, 299, 404
- 威廉·J. 多诺万将军 122
- 威廉·M. 里亚雷 173
- 威廉·S. 杨曼 278
- 威廉·伯德 183, 184
- 威廉·伯雷 129, 279
- 威廉·多诺万 45, 92, 94, 113, 120, 128, 139, 148, 156, 157, 254, 280, 293
- 威廉·哈维 82, 206, 289
- 威廉·杰弗逊 (比尔)·克林顿
- 威廉·凯西 17, 94, 97, 157, 311, 317, 411
- 威廉·科尔比 274
- 威廉·科森 130, 149, 212, 277
- 威廉·史蒂文森 94, 123
- 威廉·斯蒂芬森 46, 94, 120, 121, 141, 157
- 威廉·沃克尔 124
- 威廉·杨 111, 201, 234
- 维尔纳·洛茨 78
- 维克多·考夫曼 132, 187
- 维克多·里赛尔 269
- 维克多·沙逊男爵 95
- 维托·基诺维斯 49, 253
- 维托·米塞里 50
- 委内瑞拉 24~26, 276, 360, 441
- 魏学刚 203, 240
- 蚊子计划 411
- 沃尔特·S. 罗伯森 174
-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 130, 131, 151, 156
- 沃尔特·鲁瑟 12, 269, 377
- 沃兰迪米洛·蒙特西诺斯 25
- 吴廷琬 398
- 吴廷琰 180, 398
- 五角大楼 6, 16, 124, 131, 133, 154, 172, 174, 175, 179, 180, 187~190, 209, 314, 325, 328, 340, 353, 357, 360, 381, 387, 416, 417, 423, 428, 439, 456
- 五角大楼文件 163
- 西班牙 53, 55, 56, 63, 93, 319,

- 438, 443
- 西尔维斯托·卡罗拉 92
- 西贡 2, 118, 127, 204, 206, 209, 211, 308, 368
- 西欧多尔·沙克利 149, 207, 255, 276, 277, 302, 314
- 西提·萨维斯拉 183
- 西西里岛 81, 92, 250, 265, 411
- 希贝尔·爱德蒙兹 33, 304, 306, 316, 427, 440
- 希腊 52
- 悉尼·温伯格 95
- 香港 67, 68, 81, 96, 123, 128, 130, 138, 139, 141, 152, 202 ~ 204, 206, 207, 224, 244, 245, 247, 260, 285, 296
- 协胜堂 73, 88, 140
- 新安义三合会 68
- 新保守派 114, 462
- 新美国世纪计划 (PNAC) 383, 384
- 新政 58, 59, 143
- 信风计划 256, 284, 298
- 行动方案 43, 108, 109, 125, 126, 129, 131 ~ 135, 139, 143, 146 ~ 148, 150, 151, 156, 159, 208, 250, 297, 314, 449, 461
- 雄鹰计划 221, 222
- 休闲国际 258, 281 ~ 285, 292, 332
- 雪佛龙公司 324
- 鸦片 1, 2, 6, 7, 15, 20, 22, 23, 43, 54, 67, 74, 80, 81, 86 ~ 88, 108, 110, 114 ~ 121, 123, 125, 132 ~ 142, 145 ~ 147, 149, 151 ~ 153, 164, 167 ~ 169, 171, 172, 183 ~ 186, 188, 192 ~ 203, 205, 207 ~ 212, 215, 222 ~ 228, 233 ~ 236, 238 ~ 246, 248 ~ 250, 257, 261, 302, 304, 305, 371, 397, 405, 407, 410, 412, 413, 423 ~ 426, 429, 432, 434, 449, 454, 458
- 亚历山大·德·马朗什 310, 411
- 亚洲 1, 15, 35, 38, 39, 54, 67, 68, 74, 84, 89, 90, 99, 108, 111, 119, 123, 126, 128, 136, 145, 147, 152, 158, 164, 166, 169, 184, 185, 188, 206, 217, 226, 245, 246, 248, 260, 279, 281, 285, 302, 309, 313, 323, 352, 383, 413, 453
- 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APACL) 89
- 伊拉克 43, 114, 308, 316, 317, 324, 325, 327 ~ 331, 333 ~ 339, 343, 350, 351, 353 ~ 357, 365, 377, 381, 382, 456, 461
- 伊朗 16, 18, 19, 21, 43, 48, 51, 66, 171, 194, 214, 223, 254, 277, 279, 291, 308, 310 ~ 312, 314, 317, 321, 323, 347 ~ 349, 373, 379, 381, 398, 408,



- 410, 431, 436, 437, 454, 462
- 伊朗国王 66, 223, 398
- 伊朗门事件 276, 314, 373, 386, 435, 437, 438
- 伊丽莎白·卡罗尔 102
- 伊斯坦布尔 32, 83
- 以色列 122, 214, 264, 272, 292, 294 ~ 296, 298, 304, 307, 308, 310, 314, 326, 330, 343
- 意大利 12, 14, 33, 34, 49 ~ 52, 61, 72, 91 ~ 93, 112, 122, 135, 155, 164, 247, 253, 272, 285, 296 ~ 298, 307, 313, 327, 361, 441
- 印度红野牛 (红牛) 228, 229
- 印度尼西亚 38, 46, 52, 56, 65, 119, 141, 167, 169, 175, 231, 262, 263, 309, 442
- 印度支那 15, 111, 112, 123, 153 ~ 155, 160, 161, 175, 183, 223, 229, 243, 244, 403
- 英国 42, 46, 49 ~ 51, 54 ~ 57, 59, 60, 67, 94, 95, 114 ~ 116, 132, 157, 168, 194, 204, 233, 234, 294, 306, 319, 346, 367, 378 ~ 380, 400, 406, 407, 409, 413, 418, 426, 431, 444, 447, 448, 452, 461
- 英国石油公司 (BP) 59
- 英国西印度公司 57
- 英奇·戈登·莫斯沃尔德 278
- 优尼科 418
- 雨果·查韦斯 25
- 远西有限公司 341, 342
- 约翰·铂尔曼 263
- 约翰·迪奥卡迪 269, 271
- 约翰·法姆 354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50
- 约翰·怀顿 (“约翰·斯凯索”) 272
- 约翰·卡布 61
- 约翰·凯里 437
- 约翰·考夫林 118
- 约翰·库萨克 224, 249
- 约翰·拉·罗卡 271
- 约翰·罗塞利 13, 207, 267, 268, 284
- 约翰·麦克马洪 17
- 约翰·普拉多斯 10, 181, 367
- 约瑟夫·奥尔索普 176, 365, 436
- 约瑟夫·拜登 299
- 约瑟夫·弗朗西斯·奈斯莱恩 287
- 约瑟夫·麦卡锡 281
- 约瑟夫·特伦托 36, 45, 94, 206, 208, 209, 212, 213, 277, 314
- 越南 1, 22, 39, 90, 93, 113, 114, 143, 146, 147, 154, 155, 162, 163, 172, 179, 184, 188, 200, 202, 206, 212, 218, 227, 228, 230, 231, 240, 246, 276, 299, 303, 309, 320, 337, 353, 357, 359, 365, 367 ~ 371, 377,

- 382, 385, 396 ~ 405, 421 ~ 423,  
429, 430, 432, 460, 461
- 越南战争 22, 114, 146, 147,  
172, 218, 246, 320, 353, 357,  
365, 371, 396, 397, 401 ~ 403,  
421, 422, 430, 432, 460, 461
- 云南 108, 116 ~ 118, 120, 121,  
126, 131 ~ 134, 137 ~ 140, 185,  
203, 222
- 詹姆斯·贝克 299
- 詹姆斯·伯恩汉姆 129
- 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 292
- 詹姆斯·克罗斯比 282, 332
- 詹姆斯·雷森 381, 440
- 詹姆斯·鲁德鲁姆 223, 225
- 詹姆斯·米尔斯 116, 147, 199,  
235, 236, 265, 449
- 詹姆斯·佩特拉斯 414
- 詹姆斯·普卢梅里 49, 270
- 詹姆斯·瑞迪 38
- 詹姆斯·斯蒂勒 333
- 詹姆斯·汤普森 120
- 战略服务处 95, 121, 130
- 战略情报局 (OSS) 44, 47, 81,  
87, 89, 93 ~ 95, 97, 116 ~ 118,  
120 ~ 124, 126 ~ 128, 134 ~ 136,  
140, 142 ~ 144, 151, 156 ~ 158,  
183, 201, 202, 209, 254, 255,  
272, 278, 293, 294, 297, 299,  
308, 315
- 战争机器 6, 8, 11, 15, 17, 35 ~  
37, 39, 41, 59, 68, 174, 180,  
192, 218, 313, 318, 352, 354,  
357, 380, 386, 395, 396, 416,  
417, 423, 433, 434, 440, 448,  
453, 455, 457, 460 ~ 462
- 账外资产 126
- 正义军团 3, 375
- 政策协调处 (OPC) 14, 109
- 政策协调处 14, 15, 17, 35, 43 ~  
45, 47 ~ 49, 87, 109, 112, 113,  
116 ~ 118, 123 ~ 126, 129 ~ 132,  
134 ~ 136, 139, 140, 142 ~ 146,  
148 ~ 151, 156, 178, 190, 192,  
198, 208, 209, 250, 253 ~ 255,  
277, 279, 313, 314
- 政府腐败 442
- 政府连续性计划 (COG) 375,  
376, 378, 379, 384, 386 ~ 391
- 芝加哥 3, 12, 14, 33, 39, 65,  
101, 256, 266, 268, 277, 305,  
306, 375
- 芝加哥警厅情报处 3, 375
- 智利 8 ~ 10, 34, 51, 59, 61 ~ 66,  
204, 206, 274 ~ 276, 307, 310,  
314, 315, 396, 441, 442
- 智利国家情报部 (DINA) 34, 61 ~  
63
- 中国 13, 38, 54, 67, 68, 73,  
74, 81, 87, 88, 95, 96, 101,  
109, 112, 114 ~ 116, 118 ~ 120,  
123 ~ 136, 138 ~ 141, 143 ~ 146,



- 149, 150, 155, 157, 165, 168,  
176, 185, 186, 188, 189, 191,  
194, 198, 201, 202, 204, 205,  
222, 231, 234, 239, 241, 243,  
244, 257, 262, 278, 280, 298,  
299, 307, 323, 348, 349, 370,  
405, 453, 461
- 中国游说团 126, 1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 96, 126
- 中央情报局 (CIA) 2, 7, 8, 10,  
11, 14 ~ 18, 20 ~ 22, 24 ~ 27,  
37, 44 ~ 47, 50, 52, 53, 61 ~  
63, 69, 72 ~ 74, 76, 77, 79,  
80, 82, 86, 87, 91, 93, 94,  
96, 108, 109, 114, 120, 122,  
126, 130, 133, 139, 149 ~ 151,  
153, 155, 157, 158, 161, 164,  
165, 173, 179, 181, 185, 187,  
193, 196, 197, 200, 206, 208,  
209, 213, 221, 226, 246, 253,  
255 ~ 259, 261, 265, 266, 268 ~  
270, 276, 277, 279, 285 ~ 288,  
290, 293, 294, 314, 315, 317,  
330, 343, 363, 365, 370, 373,  
385, 405, 413, 423, 427, 435 ~  
437, 440, 446, 447
- 钟丽淇 88, 127, 136
- 朱迪思·米勒 325, 336
- 茱莉亚·契里尼 286, 287
- 猪湾事件 63, 221, 259, 283, 293
- 准国家 33, 35, 39 ~ 41, 43, 51
- 准政治 8, 53, 17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  
和阿富汗之路

SS号=13928534